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总策划 张余胜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修订版）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余大钧 译

兰州大学出版社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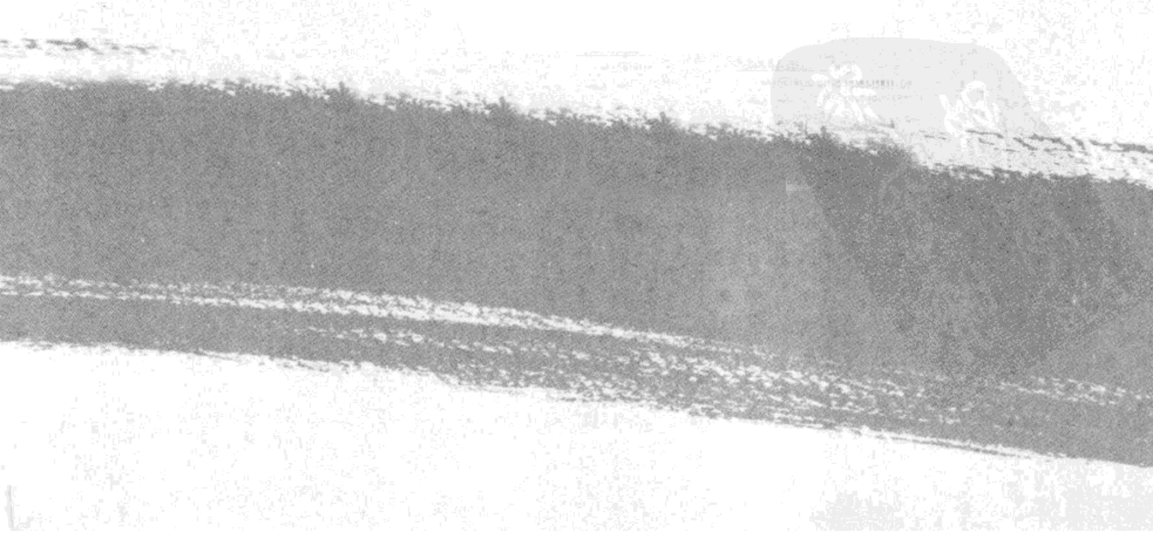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修订版）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余大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修订版/余大钧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3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871-7

Ⅰ.①北… Ⅱ.①余… Ⅲ.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②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Ⅳ.①K289-53②K2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579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修订版)(上册)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余大钧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总 印 张 53.75
总 字 数 718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871-7
定　　价 160.00 元(上、下册)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出版说明

随着20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20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余太山

2010年6月30日

《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导读*

余静

余大钧先生(1936—2006)是我国知名的蒙元史研究专家,致力于蒙元史研究40余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他的翻译成就,涉及蒙古史、元史、北方民族史、中亚史等多个学术领域,为我国史学资料建设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余先生所译拉施特《史集》(3卷,共4册,前两卷与周建奇合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书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我国蒙元史研究者对外文文献的利用,为我国蒙古史、民族史乃至世界史学科的资料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余先生曾先后执教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改为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蒙元史、元史专题、蒙元政治制度史、元史研究文献、辽金宋元史研究文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课程,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不乏诸如张帆、刘晓等国内蒙古元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余先生于1963年2月至1985年6月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所)工作期间,担任蒙古史方面的外文基本史料和重要论著的翻译工作,并编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具体负责俄、英、德、法、日、蒙等多种文字译文的审校、编辑工作。20余年间负责编辑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近70辑,共700多万字,内容涉及中国北方民族史、蒙元史、明清蒙古史、蒙古近现代史、中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考古、文献学等领域,对史学界,尤其是蒙古史、元史、民族史方面的研究者,有多方面的

* 本文以原版中《译者的话》为底本撰写而成。

参考价值。其中,余先生发表在《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上的蒙古史方面外文论著译文(共100余篇,约160万字),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参考的便利。但因该刊物属于该研究室(所)编印的内部交流学术刊物,发行范围不广,影响了学术界对译文的充分利用;加之距发行时间过去了近20年,刊物已不易见到。有鉴于此,200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请余大钧先生将其中的一部分译文(近40篇,70余万字)编为合集《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出版,以满足广大学人之需。但因种种原因,原版存在一些讹误,此次经修订后,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再版发行,将尽可能减少这一缺憾。

余大钧先生所译《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共分3部分:北方民族史编、蒙元史编、明清蒙古史编,收录日、俄(前苏联)、美等国著名学者关于蒙古史、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的译文近40篇,涉及匈奴、柔然、突厥、蒙古等族的族源、衍变迁徙、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军事、法令、考古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收录了大量长篇论文,如日本史学家对正史"北狄"传、《元史·释老传》的笺注,对匈奴、柔然等族历史的考证,对蒙元时期统治阶层的核心"怯薛"、诸监、行尚书省的研究,以及俄、美等国学者对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及其后裔的研究。这些行文严谨、视野开阔的论文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下对各篇分别做简要的介绍。

一

第一部分为北方民族史编,共收译文20篇。

本编所收正史《北狄传》笺注14篇,译自日本著名史学家内田吟风、护雅夫、田村实造、佐口透等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1卷(1980年版)、第2卷(1979年版)。内田吟风为日本研究匈奴、鲜卑、柔然等族史的专家,著有《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等。护雅夫为著名的突厥史研究专家,他善于以汉文文献与古代突厥鲁尼碑文对照研究东、西突厥

汗国,著有《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1967 年初版、1971 年再版)、《古代游牧帝国》(1976 年)等。田村实造为研究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史的学者,尤精于辽史,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等。佐口透是日本著名的新疆史、中亚史学家,主要研究自蒙古时期至 19 世纪的中亚史,尤精于 18—19 世纪新疆史的研究,著有《俄罗斯和亚细亚草原》、《十八至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民族史》等。正史北狄传笺注各篇,充分利用多种文献资料(含碑刻等),并结合古今、日本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相关注释和研究成果,举凡史书中所涉及的名号、器物、人名、地名、职官、制度、律令、礼仪、习俗、宗教、舆服、度量、民族、部族、史事、纪年、典籍(如同一事不同文献的记载、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记录)等方面都详加注释,并进行了大量的考订、辩误工作,将自己的研究所得渗人其中,涉及到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正史北狄传的史料利用价值,尤其是内田吟风的匈奴传、蠕蠕传笺注,护雅夫的西突厥传笺注,佐口透的铁勒传、回纥传笺注,反映了日本史学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止对正史北狄传的研究成就和注释水平,对研究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元 89 年至 91 年东汉与南匈奴联军 3 次大败北匈奴,北匈奴在连续遭受沉重打击后,被迫放弃世居故地漠北高原,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路。匈奴人西迁欧洲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拉开了东方游牧民族向西迁徙的序幕,对欧洲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就匈奴西迁及其与欧洲匈人的关系问题,18 世纪法国人德经(1721—1800)的《匈奴、突厥、蒙古人通史》(1756 年)首次推断欧洲中世纪匈人即汉文史籍所载匈奴,并描述了匈奴不断西迁人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自此,人们将视线聚焦于迟至 2 世纪中叶仍活动于今新疆北部的匈奴与 4 世纪后期出现于罗马边境的匈人之间的关系。19 世纪德国人夏德(1845—1927)撰写的《论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1899 年)和《匈人研究》(1901 年)等论文,对德经所依据的中文史料加以补证,进一步从文献上证明匈奴即匈人。到了 20 世纪,日本著名民族史专家内田吟风先后于 30 年代、50 年代撰文《匈奴西迁考》(1936

年,最初名为《匈奴西迁表》)和《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进一步支持了匈人、匈奴同族论和匈奴西迁欧洲的论点。

本编所收内田吟风著《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学者根据东西方典籍记载、语言比较、考古学研究、人种体型研究等对匈人、匈奴同族论的研究见解,具体阐述了与匈人、匈奴同族论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是研究匈人、匈奴同族论的一篇重要文献。

内田吟风的《匈奴西迁考》,研究北匈奴的西域经略及其西迁至欧洲的经过,并试图扩充匈人、匈奴同族论的证明资料。文章通过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周书》、《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的梳理,详细列出北匈奴从公元48年至375年的活动年表,从而理清了北匈奴西迁的经过、从蒙古地区撤退后北匈奴在东突厥斯坦的活动情况,以及他们进入欧洲前夕的情况,修正了夏德教授的《论伏尔加河的匈人与匈奴》中的考证错误,并附以较以往更为明确适当的论证资料,坚定地支持了夏德论文中的伏尔加河匈人与北匈奴为同族说的论点。《匈奴西迁考》是研究匈奴西迁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前苏联学者里日斯基的《匈奴与东胡》译自前苏联奥克拉德尼科夫等编的《西伯利亚史》第1卷(1968年版)第5章。此文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论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与东胡各族史,值得重视的是本文较多地利用了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籍记载相印证,论述了匈奴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武器、防御工事等历史情况。

柔然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北方少数民族,继匈奴、鲜卑之后,于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勃兴于蒙古地区,活跃于我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最强盛时,其势力遍及大漠南北,北达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到大兴安岭,西边远及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使天山南路诸国臣服。然而至6世纪初,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乱及突厥的兴起,强盛了1个多世纪的柔然汗国土崩瓦解了。除一部分迁居中原内地,一部分留在漠北逐渐融合到突厥、契丹

部落中外，另一部分则辗转西迁。而西方历史上也记载有以阿哇尔著称的骑马民族在6世纪中叶被突厥人击败，一部分人逃到了拜占庭。同匈奴西迁一样，柔然与阿哇尔的关系问题，长期为西方史学界所关注。内田吟风的《柔然阿哇尔同族论考》就是根据欧洲众多学者对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研究论著，结合东、西方史料，从柔然、阿哇尔的族名都带有虫、蛇之意，以及柔然、阿哇尔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的比较，东、西方史籍关于柔然、阿哇尔被突厥击灭后其残部西迁的记载，进一步论证了柔然即阿哇尔族。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1869—1930)，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大东方学家，他擅长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并结合其他多种语文史料研究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民族及中亚、西亚各国、各族的历史，论著、研究成果颇为丰硕。本编所收巴托尔德的《突厥蒙古诸民族史》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2000多年间突厥、蒙古诸民族在中国西北边疆到东欧的广大地域上衍变、发展的历史。

俄国东方学家俾丘林(1777—1853)曾将中国正史北狄传等编译为《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3卷，并在该书中通过注释、总论等方式发表其对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满语族各民族的族源、衍变关系、地理分布等问题的见解。俾丘林的这部书对日后俄国和前苏联的东方学家影响很大，后来不少俄国和前苏联的东方学家关于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的族源、衍变关系的见解往往起源于俾丘林。本编摘译了该书第1卷中对汉文史料所作的注释及总论，以供研究者参考。

二

第二部分为蒙元史编，共收译文15篇。

普兰·迦儿宾(1182—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从13世纪20年代起到40年代初期，由于蒙古大军两次大举西征，兵锋及于东南欧地区，使得欧洲各国统治者及罗马教廷大为震惊。从40年代起，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等便多次派出传教使团到蒙古地区了解蒙古方面的情况(诸如蒙古人的生活、习惯、风

俗、宗教、历史、政治、法令、军事等),并到蒙古地区传教,以便使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教,停止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进攻。其中,最早奉教皇之命率领使团前往蒙古地区的就是普兰·迦儿宾。1245年,普兰·迦儿宾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携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信前往蒙古劝说蒙古停止攻掠,并探听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同年4月,他从里昂出发,经东欧、中亚,于1246年7月到达蒙古国首都和林附近的大汗行宫。8月,参加了贵由被推戴为大汗的盛典。他在蒙古共居住了4个月。11月,携贵由答教皇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用拉丁文写成出使报告《蒙古人的历史》,向教皇复命。《蒙古人的历史》是欧洲人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写下的最早记述蒙古人情况的著作。该书详述了旅程见闻及13世纪前半期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法令、军事等情况,同时还包含了有关12世纪至13世纪初蒙古、塔塔儿、篾儿乞惕、乃蛮等游牧部落历史的若干早期传说,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正因如此,该书一向为蒙古史研究者及学者们所重视,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利用,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俄国学者马列英(1869—1938)的俄文译注本(与《鲁布鲁克行纪》合刊,1911年圣彼得堡出版)利用达维札克拉丁原文校本及其他拉丁文本译出,所加注释吸收了达维札克及1911年以前巴托尔德、贡布耶夫、布列什奈德等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1957年,前苏联学者沙斯契娜对这个译本增补了大量的注释,由莫斯科国家地理学文献出版社再版。沙斯契娜增补的注释广泛吸收了伯希和、田清波、柯立甫、玉尔、考狄、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科兹洛夫、雅库博夫斯基、吉谢列夫等东方学家和蒙古史学者、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篇所收中译本即是根据这个俄译本转译的。

巴托尔德的《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突厥蒙古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关于畏吾儿文献及其对蒙古人的影响问题》、《伊斯兰教载籍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记载》、《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问题》,是其研究蒙元史的重要论文。在这些

论文中，巴托尔德对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的历史，对蒙古军何以能够战胜军队数多得多的各文明民族，建立起统治疆域无比辽阔的蒙古帝国，庞大的蒙古帝国的统一何以能够保持数十年，帝国瓦解后蒙古对各国的统治何以能够继续长期存在，成吉思汗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所起的历史作用，突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畏吾儿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等等问题，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巴托尔德在上述论文中，发挥了其善于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其他多种语文史料进行研究的特长。

前苏联史学家密尔彼尔德等撰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论述了蒙古国的建立及蒙古对亚洲各国的征战，元朝崩溃的历史以及蒙古征服斡罗思（俄罗斯）、中亚、高加索地区，以及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下蒙古诸汗国逐渐崩溃的历史。此文较多地利用了古俄文编年史资料及用亚美尼亚文等书写的外文资料，对研究13—15世纪蒙古史颇有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本文在论及蒙古西征及其对被征服地区统治的问题上，过多地着眼于消极方面（战争中的杀戮、经济文化方面的破坏、蒙古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的种种落后影响、民族歧视压迫），却较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角度去研究、论述蒙古西征及蒙古统治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进步发展的久远积极影响，不免偏颇。

日本学者本田实信主攻蒙古史、东西交通史，尤其是蒙元时代的伊利汗国史。所著《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考》，根据波斯文史料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和《元史》的记载，研究成吉思汗西征波斯地区后，1230—1256年蒙古统治波斯地区的历史和早期统治机构伊朗总督府及1251年设置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此文对以往不很清楚的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统治波斯的早期历史和统治机构，尤其是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作了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

前苏联学者吉谢列夫作为世界知名的大考古学家，长期从事中亚、蒙古、南西伯利亚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极为丰富，著有《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古代蒙古的城市》等100多种（篇）专著和论文。本编收入的《从哈剌哈林“跑出来”的石龟》，是吉谢列夫根据在古

代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遗址发掘时找到的石龟毛坯,论述了哈剌和林古代工匠的凿石技术。

蒙古学者德·纳旺的《哈剌和林出土的铁器》,根据1950年在哈剌和林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所发现的18件铁铧、52个各种大小的大车轴承、多个铁矛头,论证了古代哈剌和林城具有生产铁制武器、农具的手工业作坊,并论证了农业在古代蒙古京城附近的居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学者谢尔·奥扎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综述了自1889年以来,尤其是1921年蒙古革命胜利后,直到1960年为止,俄国、前苏联和蒙古考古工作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历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其中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匈奴时期、突厥时期、辽蒙元明清时期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日本学者野上俊静专长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的研究。他的《元史·释老传笺注》,利用汉、藏文古籍,对《元史》卷202《释老传》作了详细的注释。《释老传》中的汉译藏文人名、词语皆被还原为藏文原文。此文对研究元代喇嘛教、道教等宗教史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片山共夫对蒙元时期的怯薛(禁卫军)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本编所收的《关于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论元朝的昔宝赤》两文,研究作为元朝统治阶层核心的怯薛。前一篇研究怯薛出身者的家世,通过对正史、元人文集、方志等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蒙元时期蒙古、色目、汉、南人怯薛所出自的总计217个家族、399人进行考察,得出结论:(1)怯薛出身者中被征服各国的王族、大臣、近臣、贵族世家、大族、军事长官等统治领导者上层人物很多,由此可见,在蒙古对被征服各国、各族的统治方面,蒙元怯薛制起到很大的怀柔、牵制作用。(2)被吸收入怯薛的契机,除质子外,尚有"军功"、"来归"、"才俊"、"世袭"、"财物"等,其中汉、南人被吸收入怯薛的最重要契机为"才俊",元世祖统治中国时,颇注意博访汉、南人知识分子,将他们吸收入怯薛。(3)蒙古、色目怯薛出身者家族及元宪宗以前归附蒙古的汉人怯薛出身者家族,被承认为勋旧世家。(4)从元成宗时起,禁止汉、南

人新加入怯薛，以免汉、南人在元朝统治阶层核心怯薛中的比例扩大。后一篇论文研究元朝怯薛中的昔宝赤（鹰夫），对昔宝赤的职掌、管理机构，以及昔宝赤机构的成立、扩大过程和中央近侍昔宝赤与地方昔宝赤的关系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明“构成昔宝赤的基本部分的人们，乃是蒙古征服各国过程中由于帝室而被凑集起来的人们，这些人成了以帝室为侍奉对象的私属民。被委任管理他们的就是近侍昔宝赤。”从而使得昔宝赤的这种二重构造的意义更为明确。

日本学者丹羽友三郎主要研究元代官制，他的《关于元朝诸监的一些研究》，研究元朝中央机构中的诸监（度支监、利用监、章佩监、都水监、秘书监、司天监、国子监、阑遗监等21个中央机构）及其特点（诸监数量多，长官多员制，官员数多，其品秩比历代高，官制屡次变革，来回设立、撤销、升降，官员数也常增减），以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此文对元朝诸监做了较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

三

第三部分为明清蒙古史编，收有《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和《喀尔喀法典》。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达延汗巴图蒙克经过20多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并陆续将统治的领地分封给自己的9个儿子（另有两个儿子，早死，无后），由其后裔世袭。在此之后，明清大部分蒙古王公均出自达延汗后裔。因此，研究清楚达延汗后裔世系，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蒙古史及清代蒙古史均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塞瑞斯所撰《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利用大量蒙、汉文史籍的记载材料，通过笺注方式对明人萧大亨《北虏风俗》附录《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约完成于1592—1595年间）上的300名达延汗后裔蒙古王公及其他人物（如蒙古王公的妻妾等）作了细致的考证，并将表中的汉译蒙古人名、部落氏族名、地名还原为蒙古语原名。塞瑞斯的这部功力颇深的著作，对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参考价值。

《喀尔喀法典》是18世纪外蒙古多种法规、条例的汇编，是研究清

代蒙古法律、社会状况、经济的重要资料。1933 年,前苏联学者扎姆察拉诺将该法典蒙古原文的唯一传世抄本译为俄文。译者据扎姆察拉诺俄译本转译。

余大钧先生作为我国民族史学界著名的翻译家,精通多种外文,尤其擅长多语种混合的学术论著的翻译。他所翻译的这部《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收入了日本、欧美学术界关于内陆欧亚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论文,涉及多个语种,是日、俄、美等国学者对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外国学者的最高研究水平,同时余先生长期从事蒙元史的研究、翻译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翻译水平。我们期待此书的再版能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译者的话

本书所收蒙古史、北方民族史方面的译文，为译者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改为蒙古史研究所)工作时所译，绝大部分曾刊载在该研究室编印的内部交流学术刊物《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上。今收集在一起，以供有关研究者研究参考。

第一部分为北方民族史编，共收译文20篇。

本编所收正史北狄传笺注14篇，译自日本著名史学家内田吟风、护雅夫、田村实造、佐口透等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1卷(1980年)、第2卷(1979年)。内田吟风为日本研究匈奴、鲜卑、柔然等族史的专家，著有《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等。田村实造为研究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史的学者，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等。护雅夫为研究突厥史的专家，著有《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等。正史北狄传笺注各篇，尤其是内田吟风的匈奴传、蠕蠕传笺注，护雅夫的西突厥传笺注，佐口透的铁勒传、回纥传笺注，反映了日本史学界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对正史北狄传的研究成就和注释水平，对研究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族史具有参考价值。

本编所收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根据东、西方典籍、语言比较、考古学研究、人种体型研究，东、西方学者对匈人、匈奴同族论的研究见解，具体阐述了与匈人、匈奴同族论有关的各方面问题，是研究匈人、匈奴同族论的一篇重要文献。

内田吟风的《匈奴西迁考》，研究北匈奴的西域经略及其西迁经过，并试图增加匈人匈奴同族论的一些证明资料，是研究匈奴西迁史的重要文献。

前苏联学者里日斯基的《匈奴与东胡》译自苏联奥克拉德尼科夫

等编《西伯利亚史》第1卷(1968年版)第5章,此文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论述了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匈奴与东胡各族史,值得重视的是本文较多地利用了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蒙古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籍记载相印证,来论述匈奴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武器、防御工事等历史情况。

内田吟风的《柔然阿哇尔同族论考》,根据欧洲众多学者对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研究论著,结合东西方史料,从柔然、阿哇尔族名都带有虫、蛇之意,及柔然、阿哇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语言、人类学方面的一致,东西方史籍关于柔然、阿哇尔被突厥击灭后其残部西迁的记载的一致,进一步论证了柔然即阿哇尔族。

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1869—1930)擅长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结合其他多种语文史料研究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各民族及中亚、西亚的历史。本编所收巴托尔德的《突厥蒙古诸民族史》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8世纪的2000年间,突厥、蒙古诸民族在中国西北边疆到东欧的广大地域上衍变、发展的历史。

俄国东方学家俾丘林(1777—1853)曾将中国正史北狄传等编译为《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3卷,并在该书中通过注释、总论等方式发表其对蒙古语族、突厥语族、通古斯满语族各民族的族源、各族衍变关系、地理分布等见解。俾丘林的这部书对后来俄、苏东方学家的影响很大,后来不少俄、苏东方学家关于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的族源、各族衍变关系的见解往往起源于俾丘林。本编摘译了该书第1卷中对汉文史料所作的注释及总论,以供研究者参考。

第二部分为蒙元史编,共收译文15篇。

普兰·迦儿宾的《蒙古人的历史》。普兰·迦儿宾(1182—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士。1245年,奉罗马教皇之命携教皇致蒙古大汗信前往蒙古劝说蒙古停止攻掠,并探听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同年4月,他从里昂出发,经东欧、中亚,于1246年7月到达蒙古国首都和林附近大汗行宫。8月,参加了贵由被推戴为大汗的盛典。他在蒙古共居住了4个月。11月,携贵由答教皇诏书仍由

陆路西归。1247 年秋，回到里昂，用拉丁文写成出使报告《蒙古人的历史》，向教皇复命。《蒙古人的历史》详述了旅程见闻及 13 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法令、军事等情况，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中译文据俄国马列英从拉丁文原著译出、苏联沙斯契娜详加注释的俄译本转译。

巴托尔德的《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突厥蒙古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关于畏吾儿文献及其对蒙古人的影响问题》、《伊斯兰教载籍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记载》、《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问题》，是其研究蒙元史的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巴托尔德对成吉思汗创建蒙古国的历史，对蒙古军何以能战胜军队数量远超蒙古的各文明民族，建立起统治疆域无比辽阔的蒙古帝国，庞大蒙古帝国的统一何以能保持数十年，帝国瓦解后蒙古对各国的统治何以能继续长期存在，成吉思汗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所起的历史作用，突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畏吾儿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等等问题，发表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上述论文中，发挥了巴托尔德善于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其他多种语文史料进行研究的特长。

前苏联史学家密尔彼尔德等撰《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论述蒙古国的建立及蒙古对亚洲各国的征战，元朝崩溃的历史以及蒙古征服斡罗思、中亚、高加索地区及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下蒙古诸汗国逐渐崩溃的历史。此文较多利用了古俄文编年史资料及亚美尼亚文等外文资料，对研究 13—15 世纪蒙古史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本田实信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考》，根据波斯文史料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书和《元史》的记载，研究成吉思汗西征波斯地区后，1230—1256 年间蒙古统治波斯地区的历史和早期统治机构伊朗总督府及 1251 年设置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此文对以往不很清楚的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统治波斯的早期历史和统治机构，尤其是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作了较具体深入的研究。

苏联学者吉谢列夫的《从哈剌哈林"跑出来"的石龟》,根据在古代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遗址发掘时找到的石龟毛坯论述了哈剌和林古代工匠的凿石技术。

蒙古学者德·纳旺的《哈剌和林出土的铁器》,根据1950年在哈剌和林城遗址发掘时发现的铁铧18件、大小大车轴承52个、铁矛头多个等,论证了古代哈剌和林城具有生产铁制武器、农具的手工业作坊,并论证了农业在古代蒙古京城附近的居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学者谢尔一奥扎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综述了自1889年以来,尤其是1921年蒙古革命胜利后,直到1960年为止,俄、苏、蒙考古工作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历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其中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匈奴时期、突厥时期、辽蒙元明清时期的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

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的《元史·释老传笺注》,利用汉、藏文古籍,对《元史》卷202《释老传》作了详细的注释。《释老传》中的汉译藏文人名、词语皆被还原为藏文原文。此文对研究元代喇嘛教、道教等宗教史颇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片山共夫的《关于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论元朝的昔宝赤》两文,研究作为元朝统治阶层核心的怯薛(禁卫军)。前一篇研究怯薛出身者的家世,得出结论:(1)怯薛出身者中被征服各国的王族、大臣、近臣、贵族世家、大族、军事长官等统治领导者上层人物很多,由此可见,在蒙古对被征服各国、各族的统治方面,蒙元怯薛制起到很大的怀柔、牵制作用。(2)被吸收入怯薛的契机,除质子外,尚有"军功"、"来归"、"才俊"、"世袭"、"财物"等,其中汉南人被吸收入怯薛的最重要契机为"才俊",元世祖统治中国时,颇注意博访汉南人知识分子,将他们吸收入怯薛。(3)蒙古色目怯薛出身者家族及元宪宗以前归附蒙古的汉人怯薛出身者家族,被承认为勋旧世家。(4)元成宗时起,禁止汉南人新加入怯薛,以免汉南人在元朝统治阶层核心怯薛中的比例扩大。后一篇研究元朝怯薛中的昔宝赤(鹰夫),对昔宝赤的职掌、管理机构、昔宝赤机构的成立扩大过程、中央近侍昔宝赤与地方昔

宝赤的关系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日本学者丹羽友三郎的《关于元朝诸监的一些研究》,研究元朝中央机构中的诸监(都水监、秘书监、司天监、国子监等21个中央机构)及其特点(诸监数量多,长官多员制,官员数多,其品秩比历代高,官制屡次变革,反复设立、撤销、升降,官员数也常增减),以及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此文对元朝诸监作了较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

第三部分为明清蒙古史编,收有《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和《喀尔喀法典》两篇。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达延汗巴图蒙克经过20多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区,并陆续将统治的领地分封给自己的9个儿子(另两个儿子,早死,无后),由其后裔世袭。在此之后,明清大部分蒙古王公均出自达延汗后裔。因此,研究清楚达延汗后裔世系,对研究明中后期蒙古史及清代蒙古史均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塞瑞斯所撰《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利用大量蒙、汉文史籍的记载材料,通过笺注方式对1592—1595年间制成的萧大亨《北虏风俗》附录的《达延汗后裔世系表》上的300名达延汗后裔蒙古王公及其他人物(如蒙古王公的妻妾等)作了细致的考证,并将表中的汉译蒙古人名、部落氏族名、地名还原为蒙古语原名。塞瑞斯的这部功力颇深的著作,对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参考价值。

《喀尔喀法典》是18世纪外蒙古多种法规、条例的汇编,是研究清代蒙古法律、社会状况、经济的重要资料。1933年,苏联学者扎姆察拉诺将该法典蒙古原文的唯一传世抄本译为俄文。译者据扎姆察拉诺俄译本转译。

目录

上　册

蒙元史编

北方民族史编



1 《史记·匈奴列传》笺注

〔日〕内田吟风

匈奴,[1]其先祖夏后氏(夏王朝之一族)之苗裔也,曰淳维。[2]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骆驼)、驴、蠃(骡)、駃騠(汗血马)、騊駼(所谓普尔日瓦里斯基马)、弹騱(野驴之类)。[3]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氏族等之分有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形似矛之铁柄武器)。[4]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毛织毛皮之衣)。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

〔1〕匈奴——“匈奴”两字古代音被认为作 flōng-nah,被认为与希腊语作 phrounoi 之匈人有联系。4 世纪时之粟特人记前赵之匈奴人作 xwn。汉字“匈奴”与 phrounoi、xwn 音相近,殆无疑也。侵入欧洲之匈人,为匈奴之后裔或被称为其后裔之同系统民族。参阅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创元社 1953 年版,第 237 ~ 242 页;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 1975 年版,第 167 ~ 200 页。

〔2〕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乐彦《括地志》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亦谓匈奴始祖为夏后氏之子孙,推其名淳维与獯粥有异。有云淳维(Chiun-yü)、薰粥(Chiung-ju)、匈奴(chiung-nu)三名出自同一原名。总之,以言语风习全然不同于汉民族之匈奴族为夏之子孙 ,所传可谓全然误矣。

〔3〕关于匈奴之马类,见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全国书房,1948 年)。关于语源,蒲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载《大亚细亚学报》第 9 卷,1962 年)第 246 页 ,推定駃騠为叶尼塞语马(kut) 的古语形态 kuti;方壮猷:《匈奴语言考》(1930 年)认为駃騠为蒙古语 kuti(马),騊駼为 chigitai(野骡),弹騱为 taki(野马)。

〔4〕匈奴人爱用之双刃剑,即类乎径路刀者。

讳，[1]而无姓字。[2]

夏道衰，而公刘（周王朝之远祖）失其稷官（管农业之官职），变于西戎，邑于豳（陕西旬邑县西）。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公刘之九世孙），亶父亡走岐下（在陕西岐山县），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周文王）伐畎夷氏。[3] 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河南洛阳），复居于酆鄗（在陕西省西安市西），放逐戎夷泾、洛以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其后二百有余年（百余年之误），[4]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5]自是之后，荒服（中国以外之蛮族诸国）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命吕侯所制法律，一名《吕刑》）之辟。[6]

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7]之故，与申侯有卻。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陕西省临潼县附近之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陕西省泾阳附近），而居于径、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洛阳）。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

是后六十有五年（公元前 706 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应作四十二年），[8]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公元前 636 年）。襄王奔于郑之氾邑（河南襄城）。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

---

〔1〕讳——死后或在世时，避免口说或笔述某人的本名之习惯。

〔2〕《史记》作"无姓字"，《汉书》作"无字"。据后文所述，匈奴有挛鞮氏、呼衍氏、须卜氏以下诸氏姓。因此《史记》此处所谓"无姓字"应理解为系指匈奴以前古代北方民族之事。

〔3〕畎夷氏——被称为昆夷、犬夷、犬戎等之蛮族。

〔4〕从周武王伐殷纣王至周穆王时不到 200 年。

〔5〕不知是说侵入犬戎族的狩猎地随心所欲捕获珍贵野兽，还是说讨平以白狼、白鹿为部族图腾之诸部族。

〔6〕《吕刑》（《甫刑》）的内容见于《书经 · 吕刑篇》等。周穆王对外征讨后，于诸侯外蕃服从周朝之际，严峻周朝刑法，颁布规定赎法之《甫刑》（《吕刑》）以保持朝廷威权，增加财政收入。

〔7〕周幽王立褒姒为后，并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废太子宜臼生母申后（申侯之女），以此之故周与申侯不和。

〔8〕据《春秋左氏传》云：庄公三十年（公元前 663 年），齐伐山戎，以其病燕也。

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

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河南嵩县），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诗经・鲁颂・閟宫》篇），"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山西太原）"（《小雅・六月》篇），"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小雅・出车》篇）。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圁水，即无定河或秃尾河）、洛（洛水，为潞水之误）之间，号曰赤翟、白翟。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陕西陇县西北）以西（陇以西，即甘肃陇西县东北、渭北地方）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陕西邠县南）、泾、漆（漆水，发源于陕西同官县北）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公元前569年）。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句注山，在山西代县西北25里）而破并代（代，山西省北部地区）以临胡貉。[1]其后，即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西河之误，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上郡（陕西绥德地区），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2]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25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昭王之母）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后汉书・西戎传》：诱杀于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甘肃临洮地区）、北地（甘肃环县地区）、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

〔1〕胡为北狄之总名，后来专指匈奴。貉为自古以来住于中国东北塞外之蛮族，被认为属通古斯系。公元前2世纪住在满洲东部至朝鲜半岛中部，后来的高句丽国被认为是该民族所建之国。

〔2〕义渠诸城在今甘肃宁县西北。有将义渠与匈奴视为同族的说法。但两者风习等有差异，战国、秦汉史籍也均将两者作为不同的部族加以记载。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在鄂尔多斯右翼旗黄河外、腾格里诺尔东北)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1],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河北赤城县)至襄平(辽东辽阳市附近)。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燕、赵、秦)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 10 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黄河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因河(黄河)为塞,筑 44 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绥远五原地区之一地)至云阳(陕西大荔县),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甘肃临洮县西南)至辽东(辽阳市附近)万余里。又渡河据阳山(阴山山脉中靠南面之山)。北假(乌喇特旗西北之农耕地)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2]盛。匈奴单于[3]曰头曼(似为蒙古语 tümen,万人长),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鄂尔多斯地区)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蒙古语 Baghadur 勇者,一说 Bogd 神圣),后有

---

[1]东胡为繁荣于东部蒙古地区之民族。东胡之后裔鲜卑族,尤其是鲜卑拓跋部族之语言,曾被认为是突厥语或原突厥语之原型,见博德贝尔格(P·Boodberg):《拓跋魏的语言》,载《哈佛亚洲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巴津(L·Bazin):《拓跋语研究》,载《通报》第 39 卷第 4~5 期,1950 年。但是蒲立本(Pullyblank)的《古汉语的辅音体系》(载《大亚洲学报》第 9 卷,1962 年)一文及李格提的《拓跋语,一种鲜卑语方言》(《蒙古学》,1970 年)中,认为蒙古语具有鲜卑语的特征。

[2]月氏为战国、秦时代游牧于甘肃西部至天山东部之民族。后来被匈奴驱逐,迁移至阿姆河流域,吞并曾推翻希腊系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大夏国,建立大月氏国。有以其为突厥族或藏族的说法,但以其为伊朗系斯基泰族的说法为有力。

[3]单于——其原音考证为近于 tagjhü。见豪西希(Haussig),Theophylakts Exkursüber die Skythischen Volker,Byzantion 23,1953;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匈奴单于庭的位置》,载《东方学》第 12 卷,1956 年。关于单于称号之全称撑犁孤涂单于之语源,参阅后注。

所爱阏氏(妻妾)[1]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公元前209年)。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里余,各居其边为"瓯脱"。[2] 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3]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甘肃平凉西北)、肤施(陕西绥德东南),遂侵燕、代。

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

[1]蒲立本在其《古汉语的辅音体系》(1962年)一文中认为阏氏相当于后来指妻之恪尊(吐谷浑族)、可孙(拓跋族)、可敦(突厥族)等一系列语词之原形 qati。

[2]《史记》、《汉书》之古注说明瓯脱为国境守备兵所居之土室、土穴,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1941年)将瓯脱比定为通古斯语 Otok(天幕)、察合台语 Otak(住室)。

[3]下文又有"遂侵燕、代",此处"侵燕、代"3字被认为大概是衍文。《汉书》省略此3字。

30余万。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1] 匈奴谓贤曰"屠耆",[2]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即左贤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上谷郡,保定、易州、宣化及顺天、河间之一部等地区)以往者,东接秽貉、[3]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陕西之肤施、安定、宜川、榆林、横山、鄜、长武、米脂及甘肃之宁县,绥远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右翼前旗等地区)以西,接月氏、氐、羌;[4]而单于之庭,直代(今河北怀安、阳原、蔚、浑源,山西大同、阳高、天镇、广灵、灵丘及察哈尔正黄旗、镶蓝旗等地区)、云中(山西怀仁、左云、右玉以北,绥远道各县、鄂尔多斯左翼、喀尔喀右翼、四子部落等),[5]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

---

[1]《汉书》增出"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关于其原语之比定等,见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匈奴单于庭的位置》(载《东方学》第12卷,1956年);关于匈奴的国家机构,见护雅夫:《匈奴的国家》(载《史学杂志》第59卷第5期,1950年),普里察克(O. Pritsak):《二十四长》(载《远东》第1卷,1959年)。又,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1941年)将骨都侯比定为蒙古语 Khutuk、突厥语 Kut、Kntluk(威严神圣),博德贝尔格在其1936年所撰《拓跋魏的语言》认为骨都侯之官为单于族之姻族世有,将此词解释为突厥语 qudu(岳父)附加以汉语"侯"字,巴律:《拓跋语研究》第244页认为骨都侯意为"带来幸福之物"之古蒙古语 qurtulghu。又,"谷蠡"之音,《史记卫将军列传索隐》注作"禄离"。

[2]"屠"音同"诸"。白鸟库吉在其《西域史研究》上册中将屠耆比定为蒙古语 čiger(正直)、突厥语科伊巴勒方言 Sagastex(贤)。孟卡奇(Munkacsi)在《评白鸟博士匈奴语言考》(载 Keleti Szemle 第4卷第2期,1930年)中将屠耆比定为蒙古语 čečen Sesen(贤)。

[3]秽貉——读作 Wai hak,秽貉为同族或不同之二部族,尚无定说。为居于中国东北至朝鲜半岛东北部之民族,被考证为通古斯族[白鸟库吉(1934年)、和田清(1944年)、三上次男(1966年,《古代东北亚史研究》)]。

[4]氐、羌——分布于今陕西西部至甘肃南部、青海之藏系民族之二大部族。

[5]单于庭之位置,被认为初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后期在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哈剌和林附近。见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单于庭的位置》(1956年)及其《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

王、相封(封为汉代讳字“邦”之代字,相封与相国相当。《汉书》省去“封”字)、都尉、当户、巨渠之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1]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2]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尺,约27厘米)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家财,家人);有罪小者轧,[3]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

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4]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山西朔县)。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公元前201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山西太原)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32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山西大同之东),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40万

---

[1]《汉书》作龙城,《后汉书》作龙祠。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全国书房,1948年)第225~279页上说:龙城非固有名词,实为类似后世蒙古族“敖包”之小土包。为其上堆积以草木等物供祭祀之小土包。但据城、庭之字判断,又据《汉书》所记汉军烧打龙城之大规模行动判断之,可认为龙城为匈奴祭祀祖先之大庙祠。

[2]蹛林非地名 而为“在林中到处驰走之祭礼”,见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1948年版),第225~279页。

[3]按:正文中注释[6]遗漏,原文如此。

[4]此五国在匈奴之北鄂毕河、色楞格河流域。《汉书·匈奴传》浑庾作浑窳,鬲昆作隔昆,薪犂作龙新犂。鬲昆即后世之坚昆(吉尔吉斯),丁零一作丁灵、丁令,即后世之铁勒族。关于这些部族之遗迹,见角田文卫:《古代北方文化研究》(祖国社,1954年),第95~122页;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要说篇》(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第88~90页;三上正利:《鄂毕河上游的古代文化》(载《古代学》第10卷第1期,1961年)。

骑围高帝于白登(大同以东之丘陵)7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白面之黑马),北方尽乌骊马(黑马),南方尽骍马(赤黄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1]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

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一名娄敬)结和亲之约。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山西之右玉、左云、平鲁、朔、大同、山阴、浑源、应、雁门关及察哈尔镶蓝旗)、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

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吕太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陕西肤施县东)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

[1]汉高祖用陈平谋遣使谓阏氏曰:单于至汉地,爱汉之美女,将令阏氏宠衰(《新论》、《汉书音义》)。

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1]及其旁26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烽火台)之地。

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似为泻卤之误,碱性土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孝文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2]绣袷绮衣(绣有花纹之赤绢衣),绣袷长襦(绣有花纹之袄)、锦袷袍各一,比余[3]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4](带

---

〔1〕楼兰——塔里木盆地东边,罗布泊地区之雅利安族系城邦国家Kroraina,楼兰为其音译。位居从汉至天山地区之要道,与汉有紧密联系。据其遗迹调查结果,有希腊化时期的繁荣文化。见赫尔曼(A·Herrmann):《楼兰》,1931年(有松田寿男日译本,1963年平凡社版)。

乌孙——直到受冒顿单于攻击时为止,为今甘肃省甘州地区之游牧民族。后来逐走伊犁河流域之月氏,在该地再建乌孙国,见内田吟风:《有关月氏迁往巴克特里亚的地理年代的考证》(载《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4、5、8期,1938年)。

呼揭——即《汉书·匈奴传》记述郅支单于之事时所记乌揭部族,与唐代突厥有密切关系之突厥系民族Oγuz为其后裔。乌揭、呼揭被认为是Oγuz之音译。

〔2〕甚苦兵事服绣袷崎衣——“服”,有释作“天子所自服也”者,“兵事服”,有释作“单于甚苦戎服(战争)”者,又有将“服”释作“绣……”之总括语者。

〔3〕比余——古注:“辫发之饰”、“梳”,并记作“比疏”。有考虑其古音为Piso,归结为朝鲜语Pis,Pit(辫发之栉)者。见方壮猷:《匈奴语言考》(《国学季刊》第2卷第4期,1930年)。

〔4〕胥纰,又记作鲜卑、犀毗、师比,古注:“胡革带钩。”原音Särbi,即意为兽型带钩之蒙古语Serbe。

钩)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

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1]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乳汁及乳制品)之便美也。”

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与近世之蒙古包同)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法令规约)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当?”

---

[1]汉代大郡户12万,人口约五六十万。关于匈奴之实际人口数,见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创元社,1953年)、《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公元前 166 年），匈奴单于 14 万骑入朝那（甘肃平凉东南）、萧关（宁夏固原东南——原文如此，下同。译者注），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甘肃镇原县东），使奇兵（出敌不意所遣军队）入烧回中宫（位于宁夏固原县地区之汉宫殿），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禁卫北军之长官）周舍、郎中令（禁卫军郎卫之长官）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 10 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

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1] 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帝后二年（公元前 162 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阘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头）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

---

〔1〕《史记》原文"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可理解为匈奴军远至代郡者有万余人。又可理解为远至代郡，共杀掠汉民一万余人。《汉书·匈奴传》无"代郡"2 字，本纪全然未涉及侵入代郡事。

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匈奴逃入汉地者之名)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四岁(公元前160年),[1]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军臣单于立四岁(应作一年余,公元前158年),[2]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河北蔚县南之北峪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西安市西南)、渭北棘门(咸阳市东北)、霸上(西安市东北)以备胡。

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公元前157年,后元七年),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

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国境之贸易场),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栏出物,与匈奴交,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山西左云附近)。汉伏兵30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

---

[1]《史记》原文之"后四岁"误,据《汉书》当做后元四年。

[2]孝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寇上郡、云中,《史记》之"立四岁"误,应从《汉书》所记改为"立岁余"。

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亭,有烽燧之小垒)。是时,雁门尉史(郡之下级武官)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

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1]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贸易场)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2]得胡首虏 700 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 7000 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得,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

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

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河北密云附近)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

其明年(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秋,匈奴 3 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 3 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

其明年(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鄂尔多斯),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3]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也。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数月而

---

〔1〕《汉书·武帝纪》曰:"王恢……下狱死。"

〔2〕《汉书》作龙城,《后汉书》作龙祠。

〔3〕什辟县——《汉书》作斗辟县。"什"或"斗"均为"绝"之意,"辟"为"远"之意。

死。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1]略千余人。其秋，[2]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其明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3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其明年（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3]将六将军（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将军李息、张次公），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4]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朱英（《汉书》作朱央），略千余人。

其明年（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9000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军3000余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5]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似为次于自己之王之意），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

其明年（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其明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一作焉耆山，甘肃山丹县东之大黄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黄金像）。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公孙敖）数万骑出陇西、北地2000里击匈奴。过居

[1]《汉书·匈奴传》作“共友”，《史记·卫青列传》作太守“友”。

[2]《武帝纪》作“夏”。

[3]据《史记·卫青列传》等云，卫青以车骑将军出征，归国后封为大将军。

[4]据《史记·卫青列传》云，右贤王与爱妾一人、壮骑数百脱走。

[5]翕侯——古音 hiep－gu，匈奴用于乌孙、月氏、康居等当时其他游牧民族中的官号 yabru 之音译，唐代音译为叶护。

延(似为宁夏嘎顺诺尔,或为额济纳河上流山丹河),攻祁连山(在甘肃省张掖、酒泉南面),得胡首虏3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张骞)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热河平泉),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公孙敖)后骠骑将军(霍去病)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4万余人,号10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函谷关以东地)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鄂尔多斯)、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其明年(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其明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谋曰:"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14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9000级,北至阗颜山(似为杭爱山脉西南之一支脉)赵信城[1]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出代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7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似为宁夏西

---

〔1〕赵信城——匈奴之城。关于匈奴建造的若干城堡,见内田吟风:《古代游牧民族中的土木建造技术》(载《东洋史研究》第11卷第2期,1951年),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要说篇》(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第93~94页。

北沙漠中之一山)，禅姑衍(似为嘎顺湖、索果湖附近之小山)[1]，临瀚海(似为贝加尔湖)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省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

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丞相府事务官)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南越、东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2]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 2000 余里，至浮苴井(似为杭爱山北之一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似为塔米尔河)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 18 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迎接外国使臣之官吏)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能，即身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徙远走，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似为贝加尔湖)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

---

〔1〕但狼居胥山、姑衍也可能在外蒙古。需要再加研究。封禅为山中举行之中国古代祭天仪式。

〔2〕但《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记匈奴入寇。

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汉使王乌等窥匈奴。

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节，表明担任使臣之符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汉使杨信于匈奴。

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以为郡（玄菟、乐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甘肃东部）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阿姆河流域之大月氏国）、大夏（巴克特里亚地区之吐火罗人之国），又以公主妻乌孙王，[1]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胘雷（包头以东、萨拉齐附近）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

是岁（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

杨信为人刚直倔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

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宠贵之宫内官），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之秋）。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

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

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赵破奴）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乌维单于

[1]乌孙王愿得尚汉公主，元封六年，汉武帝遣江都王刘建之女江都公主细君妻之，于是两国修好。

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1]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也。

自此以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余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

是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锡尔河上游费尔干纳地区的伊朗族王国），而令因杅将军敖（公孙敖）筑受降城（在乌喇特旗内，归绥市之西）。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其明年（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两万余骑出朔方西北2000余里，期至浚稽山（在推河上游）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400里，匈奴兵8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护军之官），维王为渠（渠帅之官），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于匈奴。

匈奴儿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儿单于立3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也。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榆林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城垒、障壁）列亭（相连之小兵舍）至庐朐（阴山山脉之一山）。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嘎顺、索果二湖）上，[2]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

---

[1]《汉书》作“詹师庐”。

[2]此后成为汉军之重要驻屯地。近时其地发现大量汉代文书（木简），所谓居延汉简，受到世人重视。

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障。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

是岁（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1] 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呴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白登山之败辱），高后（吕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百世（九世之误）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也。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

（注：自此以下至"太史公言"以前之文非司马迁之原文，系后人补记。）

（下略）

（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1 卷，东京 1980 年，第 3～41 页。）

[1]汉武帝由于大宛拒绝向中国输出良马，派遣大军远征费尔干纳地区大宛国，包围其都城。大宛国人杀其王而投降贰师将军。参阅桑原隲藏：《东西交通史论丛》（弘文堂，1933 年），第 118～274 页；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册（岩波书店 1941 年），第 289～376 页；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荻原星文馆，1933 年），第 1～43 页。有人认为贰师将军之名是由于李广利征伐大宛国 Nisa（Nisayah）地方（今马尔吉朗）而获得的。

2 《汉书·匈奴传》笺注

〔日〕内田吟风

2.1 上卷

[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以前笺注基本上同于内田吟风《史记·匈奴列传》笺注,以下录其为《史记》笺注所无者,余不赘录。]

[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第 3751 页第 6~7 行]单于姓挛鞮氏(《后汉书》作虚连题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注:相当于蒙古—突厥语"天"tengri),谓子为"孤涂"[似相当于通古斯语"子"guto,以及叶尼塞语(bi)kjal],单于者,广大之貌也(似相当于蒙古语"广"delgüü),言其像天单于然也。

译者注:[ ]内所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行,为译者方便中国读者检读所加,为原书所无。下同。

[《汉书》第 3777 页第 5~8 行]明年(天汉元年,公元前 100 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其明年(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天山山脉之东端)。

[3777 页 8~9 行]涿邪山(巴里坤湖以东之尼赤金山)。

[3777 页 14 行]后二岁(天汉四年,公元前 97 年),汉使贰师将军六万骑,步兵七万,出朔方……

[3778 页 1 行]余吾水(似为内蒙古之翁金河)。

[3778 页 2 行]……连斗十余日,游击(韩说)亡所得。因杅(公孙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3778 页 12~14 行]单于既立六年(征和二年,公元前 91 年),而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其明年之误），[1]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于是汉遣贰师将军7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3万余人（本纪作两万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征和三年事）。

[3778页14~15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郅居水，似为今哈绥河）。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兜衔山似为翁金河东北之一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安侯，即鄂尔浑河）度（渡）姑且水（姑且水，即推河）。

[3779页3行]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2]

[3779页4行]蒲奴水（似为塔楚河）。

[3779页7行]汉恐车师（车师，位于吐鲁番之城郭国家）兵遮重合侯，乃遣闿陵侯（闿陵侯即成娩，原为匈奴之介和王，归降于汉）将兵别围车师，尽得其王民众而还。

[3779页10行]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以前已投降匈奴之汉将）将5000骑要击汉军于夫羊句山峡。[3]

[3779页10~12行]贰师遣属国胡骑[4]两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5]匈奴奔走，莫敢拒敌。

[3779页12行]会贰师妻子坐巫蛊收，[6]闻之忧惧。

---

〔1〕据本纪，征和二年匈奴入寇上谷、五原，三年入寇五原、酒泉，可见此处"其年"为"其明年"之误。

〔2〕颜注："从疾道而追之。"应理解为不只在大道上而且也从侧道上搜索，未发现匈奴人。但也有以邪径为和林川东南之斜车山者（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收入《蓬莱轩丛书》，1915年）以及释追邪为山名，认为追邪山即čughai（阴山）者（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

〔3〕据古注：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师古曰："句山，西山也。"似为呼和浩特西北2400余里固尔班塞坎特山之一峡，参阅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

〔4〕汉朝安置投降蛮夷于边郡，称之为属国，尤其是汉武帝元狩二年设五属国于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置都尉、丞、侯等官管理之。

〔5〕颜注："应劭曰：'本汉将筑此城。将亡，其妻率余众完保之，因以为名也。'张晏曰：'范氏能胡诅者。'"被认为系汉将所筑之城。

〔6〕巫蛊——指使巫祝诅咒人之事。有人控告贰师将军于昌邑王即帝位时诅咒汉武帝，遂以大逆不道罪腰斩贰师将军之妻、子及其他连累者或将受连累者投入狱中之事件（按：此处史事记述有误，应是有人控告贰师将军欲使昌邑王日后能即帝位而诅咒汉武帝，详情可参阅《汉书·刘屈氂传》）。

[3779页15行]决眭都尉煇渠侯。[1]

[3780页1~3行]贰师闻之,斩长史,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2]……贰师降。单于……以女妻之,尊崇在卫律上。

[3780页10~11行]其明年(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3]杂缯万匹[4]……"

[3780页12~13行]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曰:"汉,礼义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5]何也?"

[3781页2~3行]胡故时祠兵(视兵器为神体,军神),[6]常言得贰师以社。

[3781页4行]谷稼(匈奴人耕种之黍类)不孰,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

[3781页10行]三岁(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崩。

[3781页13行]后三年(孝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单于欲求和亲,会病死。

[3782页11行]后二年(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秋,匈奴入代,杀都尉。

[3782页12行]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住在匈奴境内之中国人)[7]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

[3782页13~15行]乃更谋归汉使不降者苏武、马宏等,匈奴归此

---

[1]据《功臣表》,其人为以属国都尉击匈奴有功,封煇渠(鲁阳县之一地)之侯之匈奴系出身者,名雷。决眭为匈奴官号。

[2]此燕然山并非后来窦宪时去塞3000余里之燕然山,盖此处记作"速邪乌之燕然山"。张兴唐:《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曰:"今察哈尔宣化县东三十里中,亦有燕然山,似贰师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或为宣化县东之燕然山也,待考。"

[3]一石之重量为120斤(汉代1斤为258.24克),容量同于一斛,等于十斗或一百升(每升为0.3425公升)。从古人之酒量可达一石五斗等等,可见容量之大概。

[4]一匹为四丈即四十尺(每尺为27.65厘米),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937年)。

[5]宰相江充诬太子,太子怒,发兵与江充战,旋败死之事件(余按:江充未任宰相)。

[6]匈奴尊奉其武器径路刀为神。

[7]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等所记"秦人"之词语判断之,可推知汉时塞外民族一般称中国人为"秦人"。

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时，单于立三岁矣。[1]

[3783页3行]明年(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匈奴发左右部两万骑。

[3783页5行]明年(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复遣9000骑屯受降城以备汉。

[3783页6~8行]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2]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3783页8~12行]明年(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单于使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后无几，右贤王、犁汙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今甘州山丹县东南)、屋兰(山丹县西北)、番和(凉州府永昌县西)。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3]骑士射杀犁汙王，赐黄金200斤，马200匹，因封为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据《功臣表》，在元凤三年二月)。

[3784页6行]其明年(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3000余骑入五原。

[3784页7~13行]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4]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两万骑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于是拜[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两万骑出辽东(元凤三年冬)。匈奴闻汉兵

---

〔1〕苏武归汉为元凤元年，相当于单于即位之第五年，此为发议归还二人之年。

〔2〕从来有以游牧民族入侵农业地区为其饥饿之直接结果之说法。但游牧国家入侵农业地区发生于游牧民食足、富盛时，其饥饿时则向农耕国家请求和平，此种事例当时甚多。见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1953年)、《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

〔3〕担任归属汉朝之属国千长(《续汉书·职官志》曰："张掖属国有千人官。")之义渠族之王。关于义渠族参照内田吟风：《史记·匈奴列传》笺注(第5页注〔2〕)。

〔4〕乌桓，一作乌丸，亡于匈奴冒顿之东胡之后裔，游牧于东蒙古老哈河流域，服属于匈奴。后(后汉时代)当匈奴势衰，勃兴于东蒙古，造成对中国之威胁。乌桓被认为是蒙古族或突厥族。有将"乌桓"之名称比定为蒙古语Ulan(红)、古突厥语Uran、突厥—蒙古语Uruq(母亲系亲属)等说法，尚无定说。又有以乌丸之古音为Awan，视后世侵入欧洲之亚洲民族Awar为乌桓之同名的说法。

至，引去……乌桓时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敝，击之，斩首6000余级，获三王首，还，封为平陵侯（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

[3785页3～4行]匈奴……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乌孙公主上书[1]……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大王，突厥语意为王之bäg、bi，加上意为"大"之keng）复上书。

[3785页5～10行]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凡五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塞各二千余里。及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古音作hiep－gu，突厥语官名yabgu（叶护）之音译]以下5万余骑从西方人。

[3785页15行至3786页2行]度辽将军（范明友）出塞1200余里，至蒲离候水（似为额济纳河），斩首捕虏700余级，虏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韩增）出塞1200余里，至乌员，斩首捕虏，至候山[2]百余级，虏马牛羊2000余。蒲类将军（赵充国）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巴里坤湖），乌孙先期至而去，汉兵不与相及。

[3786页4行]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千600里，至鸡秩山（呼和浩特西北之一山）。

[3786页6～7行]虎牙将军（田顺）出塞800余里，至丹余吾水（似为霭布哈河）上。

[3786页9行]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3]名王（高位之王）、犁汙都尉、千长、将（《西域传》作"骑将"）以下3.9万余级，虏马、牛、羊、驴、羸、橐驼70余万（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

[3788页11行]其明年（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西域城郭[4]共

---

[1]乌孙公主上书昭帝，见《西域传》"乌孙"条。

[2]乌员之位置不明，但据载先至乌员，后至候山，当为巴里坤湖东面之一地。古注："员音云。"又据所载蒲类将军未至所期至之蒲类海即巴里坤湖，至侯山以西返回，可推知候山为巴里坤湖以东之一山。

[3]居次——被释作匈奴已婚妇女之称号。格罗特1921年时以为即突厥语kiš，白鸟库吉在《西域史研究》上册（1941年）中认为"居次"与汉语"公主"相关联。

[4]西域城郭——塔里木盆地诸绿洲上所建城郭国家。当时汉侍郎郑吉以此城郭诸国兵万余及己所率汉屯田兵士1500共同攻陷车师国。

击匈奴,取车师国(吐鲁番盆地哈剌和卓地区),得其王(乌贵)及人众而去。

[3788页12行~3789页3行]其明年(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后二岁("明年"之误,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匈奴遣左右奥鞬(官名,似即突厥语 irkin)[1]各6000骑,与左大将再击汉之田车师城者,不能下。其明年(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丁令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匈奴遣万余骑往击之,无所得。其明年(似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单于将10万余骑旁塞猎,欲入边寇。未至,会其民题除渠堂亡降汉言状,汉以为言兵鹿奚卢侯[2],而遣后将军赵充国将兵4万余骑屯缘边九郡(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备虏。月余,单于病呕血,因不敢入,还去,即罢兵。乃使题王都犁胡次等入汉,请和亲,未报,会单于死。是岁,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

[3789页10~14行]握衍朐鞮单于者,代父为右贤王,乌维单于耳孙(曾孙)[3]也。握衍朐鞮单于立,复修和亲,遣弟伊酋若王胜之[4]入汉献见(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

[3790页4行]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神爵二年秋,公元前60年)。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神爵三年四月,公元前59年)。

[3790页14行]其明年(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

---

[1]格罗特在1921年时以奥鞬为"鄂尔浑河",但据唐颜师古注曰"奥音郁"以及康居国内有奥鞬城等情,实难得出奥鞬即外蒙古鄂尔浑河之结论。当为后世突厥族泛用之官号俟斤 irkin。

[2]意为报告军事情况之鹿奚卢(封地名)侯爵。言兵侯之另一例见于《赵充国传》。据《赵充国传》可知,鹿奚卢为当时单于来到之地点(但《赵充国传》作符奚卢,鹿、符之异文,想系误记所致)。

[3]耳孙,指玄孙之子或曾孙。握衍朐鞮被视为郅支、呼韩邪之同辈人,则此处应指曾孙。

[4]《本纪》曰:"神爵四年五月,匈奴单于遣弟呼留若王胜之来朝。"呼留、伊酋为同名异字译。

2.2 下卷

[3795页5~6行]屠耆单于还,以其长子都涂吾西[1]为左谷蠡王。

[3795页8~9行]明年(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屠耆单于使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鞬[2]王为乌藉都尉各两万骑,屯东方以备呼韩邪单于,是时,西方呼揭王[3]来与唯犁当户(当户为官号)谋。

[3796页2~3行]车犁单于败,西北走,屠耆单于即引西南,留闟敦[4]地。

[3796页7行]其明年(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袭屠耆单于屯兵。

[3796页10行]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遬累(官号)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冬十一月)。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5]

[3796页11行]是时李陵[6]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

[3796页14行]其后二年(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闰振单于率其众东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与战,杀之,并其兵,遂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其兵走,[7]郅支都单于庭。

[3797页3~11行]呼韩邪之败也,左伊秩訾王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从其计,引众南近

---

[1]吾西,前文作吾斯,与后文之牙斯等均为同一种官名。其古汉语音作 nguo - sie,被认为似与日语 nusi、usi(大人)有关联之词。

[2]据古注,奥音郁。奥鞬即后世突厥族等之官号俟斤 irkin。

[3]呼揭为昔日冒顿单于时匈奴所征服西域26国中之一,即后世之 Oghuz 族。

[4]后汉末,乌桓族之一君长蹋顿势甚盛。唐李贤注曰:"君长蹋顿,匈奴王号之一。"似即突厥族官号吐屯 tudun。

[5]两人之投降见于《宣帝纪》、《功臣表》,五凤二年冬十一月温敦以单于资格投降。

[6]汉武帝时投降匈奴受厚遇之汉将李陵。

[7]原文"进攻呼韩邪。呼韩邪破其兵走"为"进攻韩邪破其兵,呼韩邪走"之误(错简)。古注曰:"郅音质。"

塞，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1] 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是岁，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也。

[3798页5~9行]明年（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事在冬十二月），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2]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 黄金玺、緺绶（诸侯之制）、玉具剑[3]……矢四发[4]……安车[5]一乘……黄金20斤[6]……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7] 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住在长安附近之宫殿）。

[3798页13行]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在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黄河西北岸西北方之城塞）……又转边谷米糒，前后3.4万斛，[8]给赡其食。

[3798页14~15行]明年（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两单于俱遣使朝献，汉待呼韩邪使有加。明年（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事在正月），礼赐如初，加衣110袭，锦帛9000匹，絮8000斤（单于二月归国）。

[3800页4行][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9]

[3800页5行]小昆弥乌就屠。[10]

[3800页7行]乌揭。[11]

---

[1]据《本纪》可知，呼韩邪遣子入侍为甘露元年正月之事。又，前一年"五凤四年"条所见"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据《萧望之传》可推知为闰振单于之事。

[2]甘泉宫——位于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之汉宫殿，别名云阳宫。原为秦代离宫，汉代加以扩建，据说从该宫可望见长安城（《关中记》）。

[3]剑柄饰玉之剑。参阅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全国书房，1948年）。

[4]一发12矢，一说一发一矢。

[5]安车——有宽座之马车。汉朝以来朝廷用安车招迎贤士、老人之例甚多，赐予安车为所谓给予优待的表示。

[6]汉代一斤等于258.24克。

[7]长平——在陕西省泾阳县西南，泾水附近之坡道。

[8]斛——等于十斗或一百升，汉代一升等于0.3425公升。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937年）。

[9]《陈汤传》曰：郅支"西收右地"。

[10]昆弥为乌孙王之称号。当时，汉朝授予乌孙王元贵靡大昆弥之号，而对于前乌孙王翁归靡与匈奴妇人所生下之乌就屠自立称昆弥，则授予小昆弥之号。

[11]《陈汤传》作"呼偈"。前文之"呼揭"与呼偈、乌揭同，即后来Oghuz族。

[3801页1行]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遣使上书求侍子。[1] 汉遣谷吉送之(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郅支杀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瓯脱[2]皆杀之。

[3801页7行]诺水(似为呼和浩特市南之黑河)。

[3801页8行]径路刀(匈奴之两刃之剑)。

[3802页10行]康居(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之游牧民)。

[3803页7~8行]元帝以后宫良家[3]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4]

[3804页3~4行]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5]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

[3806页5行]及竟宁中(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

[3807页16行至3808页1行]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6]小女为当于居次。

[3808页4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单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汉纪》作黄浑,《通鉴》作莫浑)等奉献朝正月。既罢,遣使者送至蒲反。[7]

[3808页13行]明年(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单于上书愿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

[3810页3、9行]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此温偶駼(似为后世之Ongüt汪古惕族)王所居地也。

---

〔1〕郅支所遣侍子驹于利受甘露元年入侍汉廷,至郅支要求返还此侍子时(初元四年),居留汉廷凡九年。《陈汤传》所云"今既养全其子十年",举其概数而言也。

〔2〕匈奴人称国境线上之兵舍为瓯脱,参阅内田吟风:《史记·匈奴列传》笺注(第7页注〔2〕)。

〔3〕按汉代制度,三代以上无涉于犯罪等事之善良门第称为良家。

〔4〕王墙,又作王嫱、王樯。《后汉书·南匈奴传》曰:"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5〕汉朝安置蛮族降民于边郡之一定区域,仍让其保持游牧生活、部族制度,称之为属国,置之于属国都尉(汉人)管辖下。

〔6〕须卜为夫家氏姓,当于为夫之官号。"居次"也有用作嫂居次之用语例。"居次"被认为匈奴语指夫人、妻。

〔7〕蒲反为山西省永济县。但蒲反为蒲泽之误,汉代五原郡蒲泽县接近呼韩邪所居之光禄塞。

[3810页14行]明年(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侍子(右股奴王乌鞮牙斯)死,归葬。

[3813页2行]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40余万,然不敢窥西河(鄂尔多斯地),乃筑长城以界之。

[3813页10~11行]于是浮西河(接近五原之黄河一支流)绝大幕,破寘颜(杭爱山脉之西南支脉),袭王庭(右贤王之帐营地),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似为宁夏西北之一山),禅于姑衍(似为嘎顺、索果湖附近之一小山),以临瀚海(似为贝加尔湖)。

[3814页6行]卢山(匈奴西部之山)。

[3814页14~15行]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1]

[3816页12~13行]置城郭都护36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库穆塔克沙漠)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

[3817页9~10行]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大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2]

[3817页11行]单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车田卢水(河名,位置不明)。

[3818页9行]会西域车师后(国)(今新疆吉木萨尔孚远)王句姑(《西域传》作姑句)、去胡来王(居于柴达木盆地之游牧民族之王号)唐兜(姑羌国王)皆怨恨都护校尉。

[3818页13行]臣知(囊知牙斯)父呼韩邪单于蒙无量之恩。

[3820页4行]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皮革、毡布类贡物)。

[3820页8行]匈奴颇杀(乌桓)人民,驱妇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匈奴之东部地区)。

[3822页13行]明年(建国二年,公元10年)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

---

[1]指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范明友击破乌恒(参阅本传上卷)、始元三年讨平姑缯(西南夷)、武帝元封三年征服朝鲜、元鼎六年平定南越及翌年平定东越、施行郡县制于两越(广东、广西地区)。荡姐为羌族。元帝永光三年平定陇西川姐之叛乱。

[2]《通鉴》云:"单于知之,不悦。"《哀帝纪》云:"二月,归国,单于不说。"

谋降匈奴。

[3822页14行]车师(注;新疆雅尔和屯)。

[3823页3行]戊己校尉。[1]

[3827页1~2行]云常欲与中国和亲,又素与咸厚善,见咸前后为莽所拜,故遂越舆而立咸为乌累若鞮单于。[2]

[3827页9行]天凤元年(公元14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内)制虏塞下。

[3831页3~4行]文帝中年……从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长安之动植物园),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山西代县附近)。

[3831页13行]当孝武时……虽开河南之野(鄂尔多斯平原),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河北省怀来)之北九百余里。

[3832页16行~3833页1行]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呼韩邪、复株絫、乌珠留三单于)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元帝、成帝、哀帝三代)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

[3833页15行]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王畿之外按远近分为侯服、甸服、绥服、要眼、荒服),物土贡(按五服远近定纳贡制),制外内。

---

〔1〕戊己校尉初置于汉元帝初元元年,屯田车师前王庭(交河城,即雅尔和屯),率戊校己校等兵镇护西域。

〔2〕下文曰"舆"可知咸为兄。但咸为于粟置支侯之贱官,而舆为右贤王,故曰越舆而立咸为单于。

参考书目

巴津:《拓跋语研究》(L · Bazin, Recherchers sur les parlers T' O - pa),载《通报》第 39 卷第 4 ~5 期,1950 年。

博德贝尔格:《拓跋魏的语言》(P. 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 o - pa Wei),载《哈佛亚洲学报》第 1 卷第 2 期,1936 年。

张兴唐:《史记汉书匈奴地名今释》,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 年版。

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全国书房,1948 年。

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 · 要说篇》,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 年。

榎一雄:《关于史记匈奴传补续说》,载《东洋学报》第 26 卷第 4 期,1939 年。

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国学季刊》第 2 卷第 4 期,1930 年。

方壮猷:《匈奴王号考》,载《燕京学报》第 8。

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研究 · 西域篇》,荻原星文馆,1933 年。

哈隆:《关于月氏问题》(G · Haloun, zur üe - tsi Frage),载《德国东方学会学报》(ZDMG)第 91 卷第 2 期,1937 年。

原田淑人:《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0 年。

豪西希:《塞奥非拉克茨 · 埃克斯库尔斯论斯基泰族》(H. W. Haussig Theopylakts Exkurs über die Skythischen Völker)载 Byzantion(《拜占庭》)第 23 卷,1963 年。

亨宁:《粟特文古代文书的年代》(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载《东方学学院通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the Orental Studies)第 12 卷,1948 年。

赫尔曼:《楼兰》(A. Herrmann, Lou - Lan),1931 年(有松田寿男日译本:《楼兰》,1963 年,平凡社)。

桑原隲藏:《东西交通史论丛》,弘文堂,1933 年。

伊藤道治:《汉代居延战线之展开》,载《东洋史研究》第 12 卷第 3 期,1953 年。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6 年。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中华书局,1959 年。

三上次男:《关于秽人及其民族性格》,载《朝鲜学报》第 2、3 卷,1951 年。

三上正利:《鄂毕河上游的古代文化》,载《古代学》第 10 卷第 1 期,1961 年。

三上次男:《古代东北亚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66 年。

护雅夫:《匈奴的国家》,载《史学杂志》第 59 卷第 5 期,1950 年。

孟卡奇:《评白鸟库吉博士〈匈奴语言考〉》(B. Munkacsi, über Sprache des Hiung - nu - Stammes von Dr. K. Shiratori),载 Keleti Szemle 第 4 卷第 2 期,1930 年。

村田治郎:《东洋建筑系统史论(一)》,载《建筑杂志》第 45 卷,1931 年。

普利察克:《二十四大臣》(O. Pritsak, Die 24 Ta - Chen),载 Orient Extremus(《远东》杂志)第 1 卷,1959 年。

普利察克:《匈人、匈奴之族名》(O. Pritsak, Xun, der Volksname der Hsiung - nu),载《中亚学报》(CAJ)第 6 卷,1961 年。

蒲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E. G. Pullyblank,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载《大亚洲学报》(Asis Major)第 9 卷,1962 年。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一)》,载《史学杂志》第 21 卷第 4 期,1910 年,又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 4 卷。

白鸟库吉:《关于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之金人》,载《三宅古稀论集》,1929 年。

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岩波书店,1941 年。

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蓬莱轩丛书》所收,1915 年。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 年。

角田文卫:《古代北方文化研究》,祖国社,1954 年。

内田吟风:《关于周代之蒙疆》,载《东洋史研究》第 4 卷第 4、5 期,1937 年。

内田吟风:《月氏迁至巴克特里亚地理年代考》,载《东洋史研究》第 3 卷第 4、5、8 期,1938 年。

内田吟风:《古代游牧民族中的土木建筑技术》,载《东洋史研究》第 11 卷第 2 期,1951 年。

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创元社,1953 年。

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匈奴单于庭的位置》,载《东方学》第 12 卷,1956 年。

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

王先谦:《汉书补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1959年重印。

米田贤次郎:《汉代的边境组织》,载《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期,1953年。

李格提:《拓跋语,鲜卑语的一种方言》(L. Ligeti,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 -Pi),收载于《蒙古学》(Mongolian Studies),1970年。

(辑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1卷,东京,1980年,第45~151页。)

3 乌桓、鲜卑传笺注

〔日〕河内良弘

3.1 《后汉书·乌桓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第2979页第4行]以穹庐[1]为舍。

[2979页8行]不相傜(殿本作“徭”)役。

[2979页10行]报寡嫂(殿本作“嫂”)。

[2979页11行]以髡头[2]为轻便。

[2979页11~12行]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3],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妇女首饰之一种)、步摇(妇女之发饰,步则摇之),妇人能刺韦(韦,熟皮)作文绣,织氀毼(毛织物)。

[2980页15行]徙逐于雍狂之地(注:周围封闭之荒地)……在丁令[4]西南,乌孙[5]东北焉。

[2981页5~6行]及武帝(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6](?—公元前117年)击破匈奴左地(察哈尔、热河地

〔1〕穹庐——天幕式小屋,参阅江上波夫:《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1949年版,第39~56页。

〔2〕髡头——周围残留、中央剃落之剃发方式。参阅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大学文学部刊,1953—1954年。

〔3〕句决——极高之冠帽,即顾姑冠。参阅江上波夫:《关于蒙古妇女之顾姑冠》,载《人类学杂志》第53卷第6期。

〔4〕关于“丁令”,参阅内田吟风:《丁令柔然史二考》,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1958年11月;护雅夫:《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之原住民》,载《北海道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报告》第11辑,1956年;护雅夫《关于魏略西戎传所记有关丁令之记事》,载《东洋学报》第40卷第1期,1957年。

〔5〕参阅白鸟库吉:《乌孙考》,收载于《西域史研究》上册,1941年。

〔6〕见《史记》卷111,《汉书》卷55。

区)、因徙乌桓于上谷(郡治在河北省怀来县南)、渔阳(郡治在河北省密云西南)、右北平(郡治在河北省平泉县)、辽西(郡治在辽宁省朝阳县,殿本无"辽西"2字)、辽东(郡治在辽宁省辽阳县北)五郡塞外。

[2982页3行]建武二十一年(45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3000骑出五阮关[1]掩击之。

[2982页7行]二十五年(48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0人[2]率众向化。

[2982页9~10行]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81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3]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

[2982页11~13行]班彪上言:……宜复置乌桓校尉[4]……帝从之。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5](河北省怀柔县西北)。

[2983页2~4行]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夏(六月),渔阳(河北省密云县西南)乌桓与右北平(河北省平泉县)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允[6]……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7]高渠谷。

[2983页5行]戎朱廆。[8]

[2983页10行]又战于沙南,[9]斩首500级。乌桓遂围眸于兰池城。

---

[1]李贤注:"关在代郡。"《后汉书集解》:"《说文》云:阮,代郡五阮关也。案:关在代郡广昌县。"

[2]《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作"九千余人"。

[3]《三国志·魏志·乌丸传》云:"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4]乌桓校尉——正式名称为护乌桓校尉,秩禄二千石,拥节。其僚属:长史一、司马二人,各秩六百石。见《后汉书》卷118《百官志》"护乌桓校尉"条。

[5]李贤注:"甯城,县名。《前[汉]书》甯县作'宁'",《史记》甯城亦作"宁",宁、甯两字通也。《后汉书集解》:"惠栋曰:上谷,宁县之城也。《魏土地记》云:在大宁西二十里。"

[6]《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所收《魏书》作"乌丸率众王无何",《后汉书·乌桓传》也作"无何"。

[7]九原县属五原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地区内。

[8]《三国志·魏志》所引《魏书》及《后汉书·天文志》等作"戎末廆"。

[9]沙南县属云中郡。《后汉书·郡国志(五)》"云中郡沙南"条:"案:乌桓有兰池城,乌桓之围耿晔处。"

[2983 页 10 行]积射士。[1]

[2983 页 11 行]上郡。[2]

[2983 页 11～12 行]永和五年(140 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叛),[3]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余众悉降。[4]

[2983 页 12～13 行]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5]

[2983 页 13～14 行]延熹九年(166 年)夏(六月),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鲜卑)[6]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7]

[2984 页 3～4 行]中平四年(187 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8]人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9]

[2984 页 4 行]五年(188 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10]

---

[1]追踪贼之捕射兵。

[2]陕西省绥德市附近。《后汉书・郡国志(五)》曰:"上郡,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永和五年九月,上郡移至夏阳(陕西省韩城县),见《后汉书》卷6《顺帝纪》。

[3]《后汉书・顺帝纪》:"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后汉书・匈奴传》作"王")吾斯、车纽等叛,围美稷。五月,度辽将军马续讨吾斯、车纽破之。"

[4]《后汉书・顺帝纪》:"永和六年夏五月,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天山即"通天山",在山西省石楼县南。其后,句龙王吾斯于汉安二年(143 年)十一月被使匈奴中郎将马实刺杀。第二年建康元年夏四月,马实击破南匈奴左部,于是乌桓全部为马实降伏。

[5]《后汉书》卷65《张奂传》:"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

[6]《后汉书》卷7"延熹九年六月"条曰:"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本文南匈奴下"鲜卑"二字似非衍字。

[7]《后汉书》卷65《张奂传》曰:延熹九年,"其夏,[鲜卑]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匈奴、乌桓闻奂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唯鲜卑出塞去。"

[8]见《后汉书》卷73《刘虞传》。

[9]《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四年六月,"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乌桓之叛,由于后汉一再动员乌桓出阵镇压诸郡叛乱,引起乌桓人反感所致。

[10]《后汉书》卷73《刘虞传》:"虞到蓟……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宏,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叛乱遂平定。

[2984页6行]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从子蹋顿[1]有武略，代立，总摄三郡[2]。

[2984页9～10行]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3]

[2984页12行]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4]斩之，首虏20余万人。[5]

3.2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第831页3行]《书》载"蛮夷猾夏"，[6]《诗》称"猃狁孔炽"，[7]久矣其为中国患也。

[831页11行～832页1行]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8]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田豫有马城之围，[9]毕轨有陉北之败。[10]青龙中，帝乃听王

[1]《后汉书》卷17《冯异传》："又降匈奴于林闟顿王"，李贤注曰："匈奴王号。《山阳公载记》：'顿字作碓。'《前书音义》：'闟音蹋、顿音碓。'"

[2]指上谷大人难楼、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之3郡。

[3]参照《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三国志》卷8《魏志·公孙瓒传》。后汉末争乱时期，从华北逃入乌桓部落中之汉人甚众。广阳人阎柔为其中之一。柔与幽州牧刘虞之从事鲜于辅亲密，鲜于辅与公孙瓒作战时，推柔为乌桓司马。乌桓司马为护乌垣校尉之幕僚，但实质上掌握乌桓佣兵，在地方上有势力。柔招诱乌桓、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水，大破之，斩邹丹等4000人。

[4]《后汉书集解》："柳城在昌黎县西南六十里，汉末为乌桓所据。案昌黎，后汉辽东属国都尉所治也。"

[5]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十二年秋七月从蓟县附近出发，从卢龙向西北，经古北口出平泉。八月，在大城子方面与乌桓决战，《后汉书》卷9"建安十二年秋八月"条曰："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

[6]《尚书·舜典》。

[7]《诗经·小雅》。

[8]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五原，从今陕北至内蒙古一带。其中心在今呼和浩特(归绥)地区。

[9]魏文帝初年，田豫为救援鲜卑之素利，率军讨伐，归途中在马城被包围。见《三国志》卷26《魏志·田豫传》。

[10]见《三国志》卷9《魏志·毕轨传》及《魏志·明帝纪》"青龙元年六月"条。陉北为山西省代县西北句住山以北地区。

雄遣剑客刺之。[1] 然后种落离散……

[832 页 12～13 行]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2]

[832 页 14 行]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3]

[833 页 14～16 行]至安帝时，渔阳、右北平、雁门乌九率众王无何等复与鲜卑、匈奴合，钞略代郡、上谷、琢郡、五原，乃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左右羽林五营士，发缘边七郡黎阳营兵合两万人击之。[4] 匈奴降，鲜卑、乌丸各还塞外。

[835 页 5 行]建安十一年，[5]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6] 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7]兵马甚盛。

[835 页 10～11 行]《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俭率众军讨辽东。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叶，昔随袁尚奔辽西，闻俭军至，率众 5000 余人降。[8]

---

〔1〕见《三国志·魏志·轲比能传》。

〔2〕参照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之研究》，载《满蒙史论丛》第四，1943 年，第 59 页。

〔3〕参阅水野清一：《赤峰金石期文化之风箱口》，载《人类学杂志》第 59 卷第 8 期。

〔4〕参照《后汉书》卷 47《梁慬传》"永初三年冬"条。

〔5〕《后汉书·乌桓传》作建安十二年，《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于"建安十二年秋七月"条。应作十二年。

〔6〕曹操军之行进路线为卢龙塞口、白檀、平冈、鲜庭、白狼山、凡城。见《三国志·魏书》"建安十二年"条，又参阅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之研究》，《满蒙史论丛》第四，1943 年，第 95 页。

〔7〕凡城在朝阳西南、大城子东北。参阅箭内亘：《南北朝时代之满洲》，《满洲历史地理》第 1 卷，1913 年，第 329 页。

〔8〕《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景初元年七月"条："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王护留等居辽东，率群众随俭内附。"《三国志》卷 28《魏志·毌丘俭传》："右北平乌丸单于寇娄敦、辽西乌丸都督率众王护留等，昔随袁尚奔辽东者，率众五千余人降。寇娄敦遣弟阿罗槃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缯彩各有差。"

3.3 《后汉书·鲜卑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第2985页1行]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1]

[2985页2行]饶乐水。[2]

[2986页4行][永元]九年(97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3]

[2986页5~8行]延平元年(106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遇虏伏发,士卒悉走……显中流矢……殁于阵。[4]

[2986页15行]元初二年(115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5]

[2986页15行~2987页1行]复攻扶黎营,[6]杀长吏。

[2987页1~2行][元初]四年(117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1300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7]

---

[1]鲜卑之名起于鲜卑山的说法有疑问。《史记·匈奴列传》中有"胥纰"一语,张晏注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鲜卑之名被认为出自服用饰以瑞兽之带钩。此语与满语Sabi(祥瑞)有关。参阅船木胜马:《鲜卑史序说》,载《白山史学》第十号、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版。

[2]李贤注:"水在今营州北。"营州,今朝阳。《三国志·鲜卑传》所引《魏书》作"作乐水"。据白鸟库吉氏曰:作乐、饶乐皆鲜卑语之音译,相当于今西拉木伦河。见《白鸟库吉全集》第四卷(1970年5月版)。

[3]参阅《后汉书》卷20《祭肜传》、卷4《和殇帝纪》"永元九年八月"条。

[4]《后汉书》卷81《刘茂传》附有张显传。又,参照《后汉书》卷4《殇帝纪》"延平元年夏四月"条。

[5]《后汉书》卷5《安帝纪》"元初二年八月"条无虑县之注曰:"属辽东郡。虑音闾。有医无闾山,因以为名焉。"今辽宁省北镇县附近。

[6]《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九月"条作"又攻夫黎营,杀县令。"[李贤]注:"扶黎,县,属辽东属国,故城在今营州东南。"营州在辽宁省朝阳县之大凌河畔。据《后汉书集解》,惠栋以为"扶黎"为"无虑"县之音转。

[7]《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夏四月"条:"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辽西郡故城在平州东面阳乐城,今抚宁县西关外。参照《满洲历史地理》卷1。

[2987 页 3 行]黎阳营。[1]

[2987 页 4~5 行][元初]六年(119 年)秋,鲜卑人马城塞。[2]

[2987 页 5~7 行]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 3000 人……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又发积射士 3000 人,马 3000 匹,诣度辽营[3]屯守。

[2988 页 3~4 行][延光]三年(123 年)秋(七月),[鲜卑]复寇高柳,[4]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南匈奴日逐王比之弟[之称号])。

[2988 页 7~8 行]时(永建二年 [127 年]二月)辽东鲜卑 6000 余骑亦寇辽东玄菟。[5]

[2988 页 13 行]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6]

[2988 页 14~15 行]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7]

[2989 页 3 行]檀石槐。[8]

[2990 页 9 行]汉有阗颜、瀚海之事。[9]

[2993 页 15 行~2994 页 1 行]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藏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 2000 余里。檀石

---

[1]在河南省濬县东北。俗称雍营。后汉光武帝以幽、冀 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参阅《后汉书》卷 23《窦宪传》。

[2]马城塞在山西省大同西南之朔县。

[3]度辽营,永平八年(65 年)三月创设,屯五原之曼柏,即今陕西省神木县南。度辽将军为监视新降伏之南匈奴而置,其后骚乱一再起,遂常设之。

[4]《后汉书·光武帝纪》卷 1 下[李贤]注曰:"高柳,县,属代郡,故城在今云州定襄县。"

[5]玄菟郡之郡治在今辽宁省沈阳市东北。鲜卑之来寇玄菟,此非最早之事。据《后汉书·安帝纪》,建光元年(121 年)十一月、延光三年(124 年)六月皆曾来寇玄菟。

[6]《后汉书·天文志》作"戎末廆"。

[7]辽东属国为汉代在辽东地区为统辖服属于汉之乌桓所程设之行政区划。其境界东起辽河西岸,西至山海关,北至今之边墙。参照《满洲历史地理》卷 1 。《后汉书集解》惠栋注曰:辽东属国有无虑县。

[8]关于檀石槐,参阅船木胜马:《关于后汉后期之鲜卑》,载《东洋大学纪要》第 19 卷,昭和四十年九月。

[9]蒙古之沙漠被称为瀚海。据《史记》匈奴列传、骠骑列传,元狩四年(前 119 年)武帝遣大将军卫青等击匈奴时,卫青至阗颜山,斩杀匈奴万余人。其时,霍去病率军出右北平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战,至狼居胥山祭天,登山见瀚海。

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1]奔还,死者十七八。

[2994页8行]后出攻北地,廉[2]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

3.4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笺注

[836页12行]鲜卑……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3]

[837页2~3行]和帝(88—105年)时,鲜卑大都护校尉廆帅部众从乌丸校尉任尚击叛者,封校尉廆为率众王。[4]

[837页3行]殇帝(105—106年)延平中(106年),鲜卑乃东入塞,杀渔阳太守张显。[5]

[837页5行]是后或反[6]或降,或与匈奴、乌丸相攻击。

[837页5~7行]安帝末,发缘边步骑两万余人,屯列冲要。后鲜卑八九千骑穿代郡及马城塞入害长吏,[7]汉遣度辽将军邓遵、中郎将马续出塞追破之。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等7000余人诣遵降。[8]

[837页7~8行][邓]遵去后,其至鞬复反,围乌丸校尉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9]

[837页8~9行]顺帝时(125—144年),复入塞,杀代郡太守。[10]

---

[1]数十骑,殿本作"数千骑"。《后汉书集解校补》曰:"上言各有万骑,下言死者十七八,则育等所余固应各有二三千骑。"

[2]廉,县名,属北地郡。在甘肃省固原县东北、甘肃环县南部。

[3]《殿本三国志考证》:元本"西城"作"西域"。

[4]参照《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六年冬十一月"条。

[5]参照《后汉书·殇帝纪》"延平元年夏四月"条。

[6]据《后汉书·安帝纪》曰:永初三年(106年)九月,"雁门乌桓及鲜卑叛,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

[7]参照《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五年八月"、"元初六年秋七月"条。

[8]参照《后汉书·安帝纪》"永宁元年十二月"条。

[9]参照《后汉书·安帝纪》"建光元年九月"条。据《后汉书·鲜卑传》,乌丸校尉为徐常,幽州刺史为庞参。

[10]参照《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元年八月"条。

汉遣黎阳营兵屯中山、[1]缘边郡兵屯塞下,调五营[2]弩帅令教战射。

[837页10行]后乌丸校尉耿晔将率众王出塞击鲜卑,多斩首虏。[3]

[837页10~11行]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投鹿侯从匈奴军[4]3年。

[837页13行]檀石槐。[5]

[837页14~15行]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6]北300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

[837页16~17行]桓帝(146—167年)时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征之,不克[7]。

[838页3行]至灵帝(168—189年)时,大钞略幽、并二州。[8]

[838页6~7行]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渟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至于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9]

[835页14行~836页1行]后代郡乌丸能臣氏等叛,求属扶罗韩,[10]扶罗韩将万余骑迎之,到桑乾。[11]

---

[1]据《资治通鉴·汉纪(四三)》"永建元年冬十月"条胡三省注曰:黎阳营兵屯于中山北界之旧中山郡,今之定州。定州即河北省定县。

[2]《后汉书·顺帝纪》[李贤]注曰:"五营,五校也,谓长水、步兵、射声、胡骑、车骑等五校尉也。"

[3]参照《后汉书·顺帝纪》"永建二年二月"条。

[4]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曰:"投鹿侯上有脱文。"《后汉书·鲜卑传》曰:"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匈奴军,据内田吟风氏之说,应释作"征讨匈奴之军"。

[5]关于檀石槐,参阅船本胜马:《关于后汉后期之鲜卑——以檀石槐时代为中心》(《东洋大学纪要》第19卷,1965年9月)。

[6]《读史方舆纪要》卷44曰:"高柳城在大同府东南九十里……弹汗山在府东北。"《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曰:"高柳,县,属代郡,故城在今云州定襄县。"《三国志集解》曰:"高柳在大同府阳高县西。"

[7]参照《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元年十二月"条。

[8]参照《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元年十二月"条。

[9]据《三国志集解》云:"汗"为"汙"之误,"汙"与"倭"同音,"汗人"实为"倭人"。《后汉书·鲜卑传》作"倭人"。

[10]参照《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四月"条。

[11]《资治通鉴·汉纪(六十)》"建安二十三年七月"条,胡三省注曰:"桑乾县,属代郡。宋白曰:今云州东至桑乾督帐一百五十里。"在今大同东150华里。

3.5 《三国志·魏志·轲比能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第 838 页 11 行]轲比能本小种鲜卑。[1]

[839 页 11 行]马城。[2]

[839 页 14 行]陉北。[3]

[839 页 14~15 行]楼烦。[4]

[839 页 15 行]至[太和]三年中,[王]雄遣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5] 素利、弥加、厥机皆为大人……

---

〔1〕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曰:"据《晋书》,轲比能之后,即契丹也。"

〔2〕《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七月"条[李贤]注曰:《搜神记》曰:"……其故城,今朔州也。"相当于今山西省大同西南之朔县附近。

〔3〕《资治通鉴·魏纪(四)》"青龙元年六月"条胡三省注曰:"陉,音刑。陉北,陉岭之北也,唐代州雁门县有东陉关、西陉州。"

〔4〕《后汉书》卷22《杜茂传》[李贤]注曰:"楼烦,县名,属雁门郡,故城在今代州崞县东北。崞音郭。"前揭《资治通鉴》"青龙元年六月"条胡三省注曰:"阴馆、楼烦二县,汉皆属雁门郡,而《晋志》无之,盖已弃之荒外矣。"

〔5〕《三国志集解》所收李慈铭注曰:"其弟下有脱文,素利死于太和二年,厥机死于汉时,皆在刺杀比能之前。"

参考书目

百衲本、殿本《后汉书》、《三国志》。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

钱大昭:《后汉书弁疑》。

惠栋:《后汉书补注》。

司马光编、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卢弼:《三国志集解》。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

潘眉:《三国志考证》。

钱大昭:《三国志弁疑》。

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之研究》,载《满蒙史论丛》第4卷,1943年。

久保靖彦:《关于后汉初期之乌桓——有关护乌桓校尉之一考察》,载《史苑》第24卷第1期,1963年。

石黑富男:《鲜卑游牧国家的领域》,载《北大史学》第4卷,1957年10月,第80~91页。

志田不动磨:《鲜卑语的学习》,载《历史学研究》第1卷第2期,1933年12月,第124~125页。

志田不动磨:《辽西鲜卑段氏考》,载《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40年3月,第329~352页。

船木胜马:《鲜卑史序说》,载《白山史学》第2卷,1956年1月,第9~16页。

船木胜马:《关于后汉后期之鲜卑》,载《东洋大学纪要·文学》,1965年9月,第79~80页。

内田吟风:《鲜卑及诸北族系贵族在北朝政局中之地位》,载《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3期,1936年2月,第1~17页。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方壮猷:《鲜卑语言考》,载《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第1429~1468页。

陈垣:《〈切韻〉与鲜卑》,载《图书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第83~88页。

林旅芝:《鲜卑史》,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7 年。

（辑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1 卷，东京,1980 年。）

4 蠕蠕、芮芮传笺注

〔日〕内田吟风

4.1 《魏书·蠕蠕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第2289页4～5行］蠕蠕,[1]东胡[2]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北魏始祖,拓跋力微)之末(277年左右),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3]

［2290页2行］涿邪山(巴里坤湖以东之一山)。

［2290页4行］跋那山(陕西绥德县附近)。

［2290页7行］高车(铁勒族)。[4]

［2290页12行］弱洛水(Sarakha河,即土拉河上游之喀鲁喀河)。

---

〔1〕蠕蠕,在中国史籍上又记作芮芮、茹茹、柔然等,其正确原音(原名)不明。有将其原名比定为蒙古语tsetsen(贤明)或jusun(法则),或JoJin(异国人)之诸说,但尚无定说。惟据对可汗名等研究,可知其为使用蒙古语之民族。6世纪中叶侵入欧洲,征服以多瑙河为中心、北至波罗的海、西抵易北河地域之亚洲系游牧民族阿哇尔,被认为是蠕蠕西迁之一支,至少为与蠕蠕近缘之亚洲游牧民族。参阅内田吟风:《有关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若干问题》,载《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6期,1962年。

〔2〕东胡——春秋战国时代住在东蒙古,威胁中国之游牧民族,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征服。东胡过去曾被认为系通古斯民族或蒙古、通古斯混合族。其后,东胡后裔鲜卑之语言被释作突厥语,于是东胡被释作突厥系民族之说颇有力。但近年又有以鲜卑语(尤其是鲜卑拓跋语)为蒙古语之学说。见蒲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载《大亚洲学报》第9卷,1962年);李格提:《拓跋语,鲜卑语的一种方言》,1970年。《北史》无"东胡之苗裔也"6字。

〔3〕有将木骨闾比定为与"头秃"有关之蒙古语mukhur之说(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1910年)。又有"将蠕蠕始祖名木骨闾、氏族名郁久闾之词根骨闾、久闾比定为古蒙古语qur、qurt(虫,或作为狼的隐语之虫),认为蠕蠕系以狼为图腾,称狼为虫之民族"的学说,见豪西希:《塞奥菲拉克茨·埃克斯库尔斯论斯基泰族,载《拜占庭》第23卷,1963年)。

〔4〕突厥系民族之一种,中国人以其所用车之形状名之曰"高车"。铁勒之原音为Terek(古阿尔泰语之车)。

[2290 页 15 行]頞根河(鄂尔浑河)。

[2291 页 1 行]其西则焉耆(Agni 今 Karashar,喀喇沙尔),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贝加尔湖),南则临大碛。

[2291 页 2～3 行][社仑]自号丘豆伐可汗(Küteleburi Khaghan),"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1]犹魏言皇帝也。

[2291 页 8 行]天兴五年(402 年),社仑闻太祖征姚兴,遂犯塞,入参合陂(和林格尔附近),南至豺山(朔平县西北)及善无(朔平县)北泽。

[2291 页 11 行]部落立社仑弟斛律,号蔼苦盖可汗(似为 Ukhagan Khaghan),魏言姿质美好也(Ukhagan,蒙古语"聪明")。

[2292 页 7 行]大檀……国人推戴之,号牟汗纥升盖可汗(似为 Mükügesek – Khakan),魏言制胜也(蒙古语 müküge – sek,有只有大胜之后喜好胜利的意味)。

[2292 页 10 行]始光元年(424 年)秋,[大檀]乃寇云中(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2]

[2292 页 13～15 行][始光]二年(425 年),世祖大举征之,东西五道并进: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间,车驾从中道,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宜城王奚斤、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3] 诸军至漠南……

[2293 页 7～8 行][神䴥二年(429 年)四月]车驾出东道向黑山,[4]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贼庭。五月,次于沙漠南,

[1]可汗之号,至迟从 3 世纪左右起在鲜卑族中间用于对酋长之尊称,并非蠕蠕所创始。然社仑之被称为可汗,已高升至皇帝之尊称。见内田吟风:《柔然史序说》(载《羽田博士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 年)。藤田丰八:《关于蠕蠕之国号及可汗号》(《东洋学报》第 13 卷,1900 年)一文中将"丘豆伐"释为蒙古语 Kütele(指挥)加接尾语 buri。以下蠕蠕可汗名之解释均据内田此文。有人认为可汗(Khaghan)一同源于伊朗语 Kav Kavan(王中之王),然考虑到鲜卑人自古使用此词,可认为此词源于阿尔泰语 qan 强化之 qap – qan 一词。见西诺(Sinor):Qapqan(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JRAS,1954 年)。

[2]此云中为盛乐宫所在之云中郡。此据本纪所记蠕蠕军攻陷盛乐宫事可知。

[3]黑漠、白漠、栗园、尔寒山等地的正确位置不详,但据《长孙翰传》,此处之从黑漠出击,该传记作"出长川",长川即于延水也,即今东洋河上游,因此可认为以上各地在察哈尔兴和附近。

[4]黑山,似为四子部落以南 130 华里之哈喇和硕山。大娥山不详。

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克鲁伦河)。

[2293页10~12行]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兔园水(funzula河=土拉河),去平城3700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似为达赖诺尔湖),[1]西接张掖水(注:额济纳河),北渡燕然山(似为肯特山),[2]东西5000余里,南北3000里。

[2293页13行][神䴥二年]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巳尼陂(似是贝加尔湖以南之山冈)。[3]

[2293页15行][大檀]子吴提立,号敕连(似为Tängri)可汗,魏言神圣(tängri为蒙古语"天、神"之意)。

[2294页4~6行][太延]四年(438年),车驾幸五原,遂征之……车驾出中道,至浚稽山(推河上源杭爱山脉之一山),……陈留王崇从大泽(居延海)向涿邪山(蒲类海东之尼赤金山),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漠北之一高山)。[4] 西登白阜(《北史》作"子阜",不详),刻石记行,不见蠕蠕而还。

[2294页8~9行][太延五年]吴提果犯塞……至七介山(大同附近),京邑大骇,争奔中城。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不详)。

[2294页13行][真君四年,443年]车驾至鹿浑谷(乌该诺尔湖附近之溪谷),与贼将遇,吴提遁走,追至頞根河(鄂尔浑河),击破之。车驾至石水(色楞格河南岸支流齐老图河)而还。

[2294页15行]吴提死,子吐贺真立,号处(注:处,其原音似为Dje)可汗,魏言"唯"(答应之词"是"、"对")也(蒙古语dje,意即,"是"、"对")。[真君]十年正月,车驾北伐,高凉王[5]那出东道。

[2295页6~8行]太安四年(458年),车驾北征……吐贺真远遁,

[1]中国古代人常称贝加尔湖为瀚海,此瀚海当是蒙古东部大湖。

[2]燕然山为兔园水以北不远之山,似是肯特山。

[3]《魏书·乌洛侯国传》有巳尼大水,被认为是贝加尔湖。

[4]天山,通常指哈密以北之喀尔里克塔格,此处所说之天山在涿邪之北,似为漠北之一高山。

[5]原文误作"高昌王",参阅《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丛编·柔然资料辑录》(1962年)。

其莫弗(官名,bagaput)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1]来降。

[2295页10行]和平五年(464年),吐贺真死,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似为Zulbujin)可汗,魏言“惠”也(蒙古语Zul:天惠,bujin:慈惠)。

[2295页11行]皇兴四年(470年),予成犯塞,车驾北讨……诸将会车驾于女水(萨拉齐附近,大黑河之支流)……改女水曰武川。

[2296页6行]太和元年(477年)四月,遣莫何(官名)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貂裘,比拔等称……

[2296页11行][太和]九年(485年),予成死,子豆仑立,号伏古敦(似为Bekitun)可汗,魏言“恒”(蒙古语bekitun,意为贞固、永续)。

[2296页12行]豆仑怒,诬石洛侯谋反,杀之,夷其三族。[2]

[2296页15行]金山(阿尔泰山)。

[2297页3行]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原音似为Kesak birdagēci,蒙古语“享受幸福者”之意)可汗,魏言悦乐也。

[2297页3~4行]那盖死,子伏图立,号他汗(原音似为Daghan,蒙古语,有任官、就业等意)可汗,魏言绪也。

[2297页9行][伏图]子丑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原音似为Türüber badaraburi)可汗,魏言彰制也(蒙古语türüber,意为“以法制”,badaraburi意为“按照”)。

[2297页11~12行][延昌]四年(515年),遣使俟斤(官名,irkin)尉比建朝贡。

[2298页1~2行]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年20许,为医巫(治病之珊蛮),假托神鬼。

[2298页4行]可贺敦(可汗之妻之号,Khaghatun)。

[2298页9行]俟力发(官名,iltäbär)示发。

[2300页9行]百子帐(特大天幕)。

---

[1]一落可认为平均二、三穹庐,约20人之规模。见内田吟风:《关于乌桓族之研究》(载《满蒙史论丛》第四,1943年),第51页。

[2]中国对三族的解释始终不外乎三种解释:①父母、兄弟、妻子;②父族、母族、妻族;③父、子、孙。至于蠕蠕三族之内容,不详。

[2300页13行]示发走奔地豆于(洮儿河、西拉木伦河之间的部族)。

[2300页14行]推婆罗门为主,号弥偶可社句(原音似为Midalügeijurik,意为"不动的心")可汗,魏言安静也。

[2301页3行]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官名,原音似为baghatarkhan)去汾。

[2301页9行][正光二年,521年]九月,蠕蠕后主俟匿伐(原音似为Iltäbär)来奔怀朔镇(置于呼和浩特西北、阴山之要处)。

[2302页1行]沃野[镇](置于北河之北)。

[2302页6行]吠哒。[1]

[2302页8~11行][正光]四年(523年),阿那瓌众大饥,入塞寇抄……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出塞3000余里,至瀚海(似为达赖诺尔湖),不及而还。

[2302页13行][正光五年]沃野镇人破六韩(匈奴姓。似为蒙古语barughan,意即暗色衣氏族)拔陵反。

[2302页15行~2303页1行]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马稍盛,乃号敕连头兵(丘之误)豆伐(《北史》作敕连头兵伐。原音似为Teng ridu Küteleburi)可汗,魏言把揽(蒙古语从天上统治之意)也。

[2303页6行]建义初(528年),孝庄诏曰:"……蠕蠕主阿那瓌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额济纳河)无尘,刊迹狼山(五原西北之北部阴山),铭功瀚海(贝加尔湖)……"

[2303页8行]太昌元年(532年)六月,阿那瓌遣乌句兰(似为蒙古语Ulaqlar驿马官)树什伐(《北史》作"树升伐")。

4.2 《北史·蠕蠕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第3264页2行]阿那瓌兄弟塔寒(塔寒

---

[1]即拜占庭史作Ephthalites,波斯史作Hayathelit,被认为蒙古或突厥系民族之游牧民族。原住地为阿尔泰山。5世纪初西迁,440年前后占领撒马尔罕、巴尔赫地区,与拜占庭发生交涉,使波斯遭难。

为官名 tarkhan)。

[3264 页 5 行]元象元年(538 年)……九月,[阿那瓌]又掠肆州秀容(山西省朔县西北),至于三推(推,堆之误。三堆,山西静乐县)。

[3264 页 12~13 行]近有赤铺步落坚胡(山西西部之匈奴系稽胡)行于河西(鄂尔多斯、额济纳地区),为蠕蠕主所获。

[3265 页 4 行]阿那瓌遣莫何(官名)去折豆浑十升等朝贡。

[3265 页 6 行]吐豆登(似为官名)郁久闾譬浑。

[3266 页 5 行]天保三年(552 年),阿那瓌为突厥[1]所破,自杀。

[3266 页 6~7 行] 铁伐寻为契丹[2]所杀。

[3266 页 8~9 行]文宣乃北讨突厥,迎纳蠕蠕,废其主库提,立阿那瓌子菴罗辰为主,致之马邑川(浑河,桑乾河最上流)……亲追突厥于朔方(鄂尔多斯地区)。

[3266 页 12 行]恒州黄瓜堆(山西省应县西,桑乾河北)。

[3266 页 15 行]金川(不详,似为河北省北边之一河)。

[3266 页行 15 行~3267 页 1 行]白道(从呼和浩特向北之道)。

[3267 页 4 行]中男(11 岁以上、17 岁以下男子)。[3]

4.3 《宋书·芮芮传》笺注

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似均可音写为 Tartar)。[4] 亦匈奴别种。[5] 自西路(青海—四川路)通京师(建康,今南京市),3 万余里。

---

〔1〕5 世纪初,突厥住在天山东部裕尔都斯地区,附属于蠕蠕,利用锻炼技术为之服役,6 世纪中叶,突厥攻并高车族扩大势力,背叛蠕蠕,后遂取代蠕蠕成为蒙古地区之主人。突厥又书作突屈,有人认为"厥"音为クツ,突厥读音应以トックツ为正确,总之,突厥为原名 Türk(一说为其蒙古语复数形 Türküt)之汉字音译。

〔2〕契丹为游牧于西拉木伦辽河流域之蒙古系民族。5 世纪以后见于史书,后来 10 世纪初建立跨越满蒙华北地区的国家——辽朝。

〔3〕按北周制度,10 岁以下为"小",17 岁以下为"中"("中男"),西魏同。

〔4〕据《魏书》,大檀为柔然第二代可汗之名。

〔5〕《梁书》、《南史》也将芮芮即蠕蠕记作匈奴之一部族(按《梁书》、《南史》云:"芮芮国……匈奴别种"),从民族上言,匈奴为突厥系民族,蠕蠕为蒙古系民族,实为不同民族。然本文所谓匈奴,可解释作国家(部族联合体)名,蠕蠕之祖先昔时曾为从属于匈奴之一部族,因此不得谓本文所述必误。

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西域诸国:焉耆(Agni,今喀喇沙尔)、鄯善(建都于罗布泊、米兰地区之国)、龟兹(Kucha,今库车)、姑墨(Kamak,今阿克苏),东道诸国(承德、辽阳地区)并役属之。无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毡帐为居,随所迁徙。其土地深山则当夏积雪,平地则极望数千里,野无青草,地气寒凉,马牛龁枯啖雪,自然肥健。

国政踈简,不识文书,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至今颇有学者。

去北海(贝加尔湖)千余里,与丁零(铁勒,Terek)[1]相接。常南击索虏(南朝对北魏之蔑称),世为仇雠,故朝廷每羁縻之。

4.4 《南齐书·芮芮虏传》笺注

芮芮虏,塞外杂胡(复合种族)也,编发左衽。晋世,什翼圭(北魏太祖)[2]入塞内后,芮芮逐水草,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刻木记事,不识文书。马畜丁肥,种众殷盛,常与魏虏为仇敌。

宋世,其国相希利垔解星算数术,通胡、汉语,常言南方当有姓名齐者,其人当兴。

升明二年(478年)太祖(齐太祖萧道成,当时为宋宰相)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轨[3]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

[齐]建元元年(479年),八月,芮芮主发30万[4]骑南侵,去平城700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上[齐太祖]初践祚,不遑出师。二年、三年,芮芮主频遣使贡献貂皮杂物,与上书,欲伐魏虏,谓上"足下",自称"吾"。献狮子皮裤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

---

[1]突厥系民族,繁荣于色楞格河流域等地。由于其所使用车高大,中国人也称之为高车族。其原名似源出于"车"即蒙古语 telegen,terege。可认为丁零,铁勒为其音译,高车则为其意译。

[2]什翼圭——北魏太祖道武帝,名珪。误作什翼圭,系与其父什翼犍之名相混所致。《南齐书》对北魏人物误记甚多。

[3]《通鉴》等书作王洪范,《南史》有《王洪轨传》,当以洪轨为正确。

[4]《建康实录》作40万,《魏书·高祖纪》作十余万。

时有贾胡在蜀见之,云此非狮子皮,乃扶拔[1]皮也。

国相邢基祇罗迴奉表曰:"……[从略]……"

永明元年(483 年),王洪轨还京师,经途3万余里……

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

自芮芮居匈奴故庭10年,丁零胡[2]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

先是,益州刺史刘俊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国威德。道经鄯善(西域罗布泊附近米兰地区)、于阗(Hvatana 国,今和田附近),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青海区,当时吐谷浑族地区)道而抵益州。

4.5 《梁书·芮芮传》笺注

……天监中(502—519 年),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始筑城郭,名曰木末城。[3]

[天监]十四年(515 年),遣使献乌貂裘。普通元年(520 年),又遣使献方物。是后数岁一至[4]焉。

---

[1]又记作"符拔"之兽,《后汉书》注曰:扶拔,似麟,无角。

[2]丁零,又记作铁勒或高车之突厥系民族。高车,以其车高大而得之族名(系汉人所追加者)。丁零、铁勒与古突厥语"车"即 telegen、telege 有关,当系 Terek 之汉字音译。

[3]木末,或系木来之误。可认为是建于北魏沃野镇以北木赖山(被认为鄂尔多斯之北、阴山西部之一山)之城。

[4]其后有大通二年(528 年)、中大通元年(529 年)、大同四年(538 年)、大同七年(541 年)来贡之记载。

参考书目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原载《史学杂志》第 21 卷第 4 期, 1910 年;并被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 4 卷。

豪西希:《塞奥非拉克茨·埃克斯库尔斯论斯基泰族》,载《拜占庭》第 23 卷,1963 年。

内田吟风:《柔然族史序说》,载《羽田博士纪念东洋史论丛》,1950 年。

藤田丰八:《关于蠕蠕之国号及可汗号》,载《东洋学报》第 13 卷,1900 年。

西诺(D. Sinor):《Qapqan》载《皇家亚洲学会报》(JRAS),1954 年。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丛编》,载《柔然资料辑录》,1962 年。

内田吟风:《有关乌桓族之研究》,载《满蒙史论丛》卷 4,1943 年。

内田吟风:《有关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若干问题》,载《东洋史研究》第 37 卷第 6 期。

克拉德(L. Krader):《汗—可汗及蒙古王权的开始》,载《中亚学报》第 1 卷。

内田吟风:《柔然札记》,《阿尔泰学》,1957 年,威斯巴登·哈尔索维茨。

科尔劳茨(A. Kollautz)、宫川(H. Miyakawa):《蒙古地区的柔然和欧洲中部的阿哇尔人》,[奥]克拉根福市鲁道夫书店(有限保证社团),1970 年。

内田吟风:《匈奴蠕蠕传地名考》,载《泷川博士纪念论文集》,1957 年。

内田吟风:《丁令柔然史二考》,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论丛》,1958 年。

内田吟风:《关于蠕蠕侵入寄多罗月氏领有之巴尔赫》,载《东洋史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1959 年。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编:《历代各族传记会编》卷 2 下,中华书局,1959 年。

白鸟库吉:《可汗及可敦称号考》,载《东洋学报》第 11 卷第 3 期,1921 年;并收入《白鸟库吉全集》卷 5。

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4 年。

李格提:《拓跋语,鲜卑语的一种方言》,收载于《蒙古学》,1970 年,阿姆斯特丹。

(辑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1 卷,东京,1980 年,第 215 ~ 262 页。)

5 《魏书·高车传》笺注

〔日〕护雅夫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1]

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

其种有狄氏、袁纥氏、[2]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

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日;“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3]

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陈,头别冲突,乍出乍入,不能坚战。

其俗蹲踞亵渎,无所忌避。

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结言既定,男党营车阑马,令女党恣取,上马袒乘[4]出阑,马主立于阑外,振手惊马,不坠者即取之,坠则更取,

---

〔1〕在“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句中,《北史》(百衲本、殿本)脱落“敕勒,诸夏以为”6字。

关于狄历、敕勒、丁零之原音有种种说法。我认为这些族名以及铁勒均应写作 Türük,与 Türk 相近。Türk 之音写则为突厥。所谓“高车丁零”,据后文所述,乃“使用高轮子车的丁零人”之意。

〔2〕《魏书》、《北史》百衲本、殿本均作“表纥氏”,误,应作“袁纥氏”。

〔3〕关于此始祖传说以及后来产生的高车族祭祀,参阅护雅夫:《关于古代突厥族(高车族)的一个始祖传说》(载《北方文化研究报告》第8卷,1953年);护雅夫:《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的子孙们——》(讲谈社,1967年版)。

〔4〕百衲本《魏书》、《北史》作“袒乘”,殿本《魏书》、《北史》作“祖乘”。“袒乘”,是。

数满乃止。

俗无谷,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日,将妇归,既而将[1]夫党还入其家马群,极取良马。父母兄弟虽惜,终无言者。颇讳取寡妇而优怜之。

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

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2]之移去。至[3]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4]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5]

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稍,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

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他,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6]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

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

后徙于鹿浑海[7]西北百余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亦每侵盗于国家。[8] 太祖亲袭之,[9]大破其诸部。

---

〔1〕《北史》(百衲本、殿本)无“将”字。

〔2〕“弃”——百衲本《北史》作“集”。

〔3〕《北史》(百衲本、殿本)无“至”字。

〔4〕羖羊——去势之羊、黑羊。

〔5〕轩冕——轩为大夫所乘之车,冕为大夫以上所戴之冠,由此转意,“轩冕”指高位高官、贵显者。

〔6〕作乐——奏乐。

〔7〕鹿浑海——白鸟库吉氏比定为鄂尔浑河东面 Ugei - nor,内田吟风氏附和之。但,松田寿男氏认为“鹿浑”系“鄂尔浑”之音译。参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第 4 卷,岩波书店,1970 年,第 105 ~ 106 页)及其《弱水考》(同上《全集》第 5 卷,岩波书店,1970 年,第 8 ~ 9 页);内田吟风:《后魏柔然表》(上)(载《东洋史研究》第 8 卷第 5、6 期,1944 年,第 297 页)及其他;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70 年增补版,第 207 页)。

〔8〕国家——《北史》作“魏”。

〔9〕太祖亲袭之——《北史》作“魏道武袭之”。魏太祖道武帝在位年代为公元 386—408 年。

后太祖[1]复度弱洛水[2]，西行至鹿浑海，停驾简轻骑，西北行百余里，袭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20余万。

复讨其余种于狼山，大破之。[3] 车驾巡幸，[4]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太祖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诸军同时云合，破其杂种30余落。

卫王仪别督将[5]从西北绝漠千余里，复破其遗迸七部。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6]

太祖自牛川[7]南引，大校猎，[8]以高车[9]为围，骑徒遮列，周700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10]，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11] 属之西山。[12]

寻而高车姪利曷莫弗[13]敕力犍率其900余落内附，[14]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置司马、参军，赐谷两万斛。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30余落内附，[15]亦拜为威远将军，[16]置司马、参军，赐衣服，岁给廪食。

---

〔1〕太祖——《北史》作"道武"，下同。

〔2〕弱洛水——白鸟库吉氏认为相当于"发源于接近杭爱山南端沙漠之边缘、东北流入土拉河"之喀鲁喀河，内田吟风既曾同意此说，又在另一处比定为西拉木伦河。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第105～107页)及其《弱水考》(第9～10页)；内田吟风之前揭论文及其《柔然族史序说》(《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洋史研究会1950年，第138、164页。)

〔3〕此为登国五年(390年)之事。

〔4〕《北史》无"幸"字。

〔5〕"将"——《北史》作"诸将"。

〔6〕此为天兴二年(399年)之征讨。

〔7〕牛川——山西省西北边境外之川。内田吟风氏推定为"今东洋河上流及其一条支流"，见其《柔然族史序说》(第162页)。

〔8〕筑起木垣(马塞)，阻塞动物逃走的道路而举行的狩猎。

〔9〕高车——既可理解为，许多高车族人，又可理解为"高轮之车"。

〔10〕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天兴元年(398年)被定为京城。

〔11〕白登——在大同之北。

〔12〕天兴二年(399年)之事。

〔13〕莫弗——内田吟风氏认为莫弗意为"勇士"之突厥·蒙古语 baghatur 之音译，而非表示"神(天)之子"之伊朗语 bagh - fūr > bagh - pūr 之译写，见内田吟风：《后魏柔然表(上)》(第286页)及其《柔然族史序说》(第157页)。

〔14〕天兴三年(400年)十一月之事。

〔15〕天兴四年(401年)正月之事，但《魏书》卷2《太祖本纪》作"三千余落"。

〔16〕威远将军——百衲本《北史》作"威远将"，殿本《北史》作"威远军"。

蠕蠕社仑[1]破败之后，收拾部落，转徙广漠之北，侵入高车之地。斛律部部帅倍侯利患之，曰"社仑新集，兵贫马少，易与耳"。乃举众掩击，人[2]其国落。高车昧利，不顾后患，分其庐室，妻其妇女，安息寝卧不起。社仑登高望见，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杀之，走而脱者十二三。倍侯利遂来奔[3]，赐爵孟都公。

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奋戈陷陈，有异于众。北方之人畏[4]婴儿啼者，语曰："倍侯利来"，便止。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5]。"其服众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亲幸，赏赐丰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国礼[6]，溢曰忠壮王。

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乌，[7]频破之。[8]

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后世祖[9]征蠕蠕，破之而还，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在巳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司徒长孙翰、尚书令刘洁等谏，世祖不听，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至于巳尼陂，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10]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

高宗[11]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会车驾临幸，[12]莫不忻悦。

---

[1]社仑——即蠕蠕之丘豆伐可汗(401—402年在位)。社仑败于魏军为天兴五年(402年)正月之事。

[2]人——《北史》(百衲本、殿本)作"之"。

[3]遂来奔——《北史》作"遂奔魏"。

[4]畏——《北史》作"畏之"。

[5]百衲本、殿本《魏书》、《北史》均作"倍侯"。

[6]国礼——《北史》作"魏礼"。

[7]百衲本、殿本《魏书》、《北史》均作"袁纥乌"，应作"袁纥、乌纥"，脱落"纥"字。

[8]天兴六年(403年)之事。

[9]《北史》作"太武"，下同，世祖太武帝在位年代为424—452年。

[10]神䴥二年(429年)之事。

[11]《北史》作文成，高宗文成帝在位年代为452—465年。

[12]和平五年(464年)之事。

后高祖[1]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2]高车不愿南行,遂推袁纥树者[3]为主,相率北叛,游践金陵,[4]都督宇文福追讨,大败而还。又诏平北将军、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继先遣人慰劳树者。树者入蠕蠕,寻悔,相率而降。[5]

高车之族,又有十二姓:[6]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干氏[7],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豆崘[8]之世,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9]高车之众十余万落。太和十一年(487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怒,率所部之众西叛,至前部[10]西北,自立为王,[11]国人号之曰"候娄匐勒",犹魏言大天子也。穷奇号"候倍",犹魏言储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在南。豆崘追讨之,频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

十四年(490年),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之贼,臣谏之不从,遂叛来至[12]此而自竖立。当为天子讨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观虚实。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

---

[1]《北史》作"孝文",下同。高祖孝文帝471—499年在位。

[2]南讨——征讨南齐。

[3]百衲本、殿本《魏书》、《北史》均作"表纥树者",误,应作"袁纥树者",即"袁纥部人树者"之意。

[4]金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之古盛乐城西北之北魏诸帝陵墓,葬有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五帝。

[5]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之事。

[6]关于此处所记"十二姓"与开头部分所记六氏之关系,参阅护雅夫:《关于高车传中所见诸氏族名称——高车诸氏族之分布》(载《东方学》第1卷,1948年)。

[7]《北史》作"达薄氏"。

[8]蠕蠕伏古敦可汗(485—492年在位)。

[9]《北史》(百衲本、殿本)于"统领"二字之下有"军"字。

[10]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

[11]关于高车向西发展建立独立国,据松田寿男曰:"在太和九年(485年),迟至后十年之初来降。"见松田寿男前揭书第211页。又,关于高车向西发展、独立之事,参阅同书第205~212页。

[12]《北史》(殿本、百衲本)无"至"字。

者薄颉随于提来朝，贡其方物。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1]复与于提使高车，各赐绣袴褶一具，杂綵百匹。

穷奇后为哌哒[2]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诏遣宣威将军、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置之高平镇。

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3]，谋害阿伏至罗，阿伏至罗杀之。阿伏至罗又残暴，大失众心，众共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4] 岁余，哌哒伐高车，将纳弥俄突，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5]

弥俄突既立，复遣朝贡，又奉表献金方1、银方1、金杖2、马7匹、驼10头。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60匹。世宗[6]诏之曰："卿远据沙外，频申诚款，览揖忠志，特所钦嘉。蠕蠕、哌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往来路绝，奸势，不得妄令群小敢有凌犯，拥塞王人，罪在不赦。"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为伏图所败，西走300余里。伏图次于伊吾北山。[7]

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内徙，世宗[8]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见威军，怖而遁走。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伏图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孟威。又遣使献龙马5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80人，赤紬十匹，杂彩60匹。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9]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10]

---

〔1〕可足浑为姓(部族名)，长生为名，又称朱长生。

〔2〕哌哒——从5世纪中叶起的1个世纪间，崛起于中央亚细亚的民族，即 Ephtalite，Hephtalite。

〔3〕余妻——正妻以外之妻，或指儿子的生母以外之母。

〔4〕据内田吟风氏认为，此为正始三年(506年)之事，见内田吟风：《后魏柔然表(下)》(《东洋史研究》第9卷第3期，1944年，第159页)。

〔5〕永平元年(508年)之事。

〔6〕世宗——《魏书》(百衲本、殿本)作"世祖"，《北史》(百衲本、殿本)作"宣武"，此处据《北史》之"宣武"改作"世宗"。世宗宣武帝496—515年在位，宣武帝下此诏为永平元年(508年)之事。

〔7〕此亦永平元年之事。

〔8〕世宗——《北史》作"宣武"。

〔9〕莫何去汾——高车之官号。

〔10〕此为永平元年之事。

肃宗[1]初[2]，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3]战，败，被擒，丑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其部众悉入哌哒。

经数年，哌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伊匐既复国，遣使奉表，[4]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开国公、高车王。伊匐复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罗门[5]走投凉州[6]。

正光中(520—525年)，伊匐遣使朝贡，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褥，鞦鞦一副，伞扇各一枚，青曲盖5枚，赤漆扇5枚，鼓角10枚。诏给之。[7] 伊匐后与蠕蠕战，败归，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8]

天平[9](534—537年)中，越居复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

兴和中(539—542年)，比适又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10]，齐献武王[11]欲招纳远人，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拜安北将军、肆州刺史。既而病死。[12]

初，太祖时，有吐突邻部，在女水上，常与解如部相为唇齿，不供职事。登国三年(388年)，太祖亲西征，渡弱洛水，复西行趣其国，至女水上，讨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尽略徙其部落畜产而还。

又有纥突邻，与纥奚[13]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长帅，拥集种类，常

---

[1]《北史》作明帝，肃宗孝明帝515—528年在位。

[2]熙平元年(516年)。

[3]丑奴——蠕蠕之豆罗伏跋豆伐可汗(508—520年在位)。

[4]神龟元年(518年)之事。

[5]婆罗门——蠕蠕之弥偶可社句可汗(521—524年在位)。

[6]正光二年(521年)之事。

[7]正光二年(521年)之事。

[8]内田吟风氏认为其事在正光三年(522年)以后、天平元年(534年)以前，并推定为永熙二年(533年)之事。见其《后魏柔然表(下)》第168页。

[9]天平及其后之兴和，皆为东魏之年号。

[10]来奔——《北史》作"奔东魏"。

[11]《北史》作"神武"，指北齐高祖神武皇帝、东魏之实权者、北齐事实上之创始者高欢。

[12]兴和三年(541年)之事，是年高车国亡。

[13]纥突邻、纥奚——百衲本《北史》作"绝突邻"、"绝奚"，下同。

为寇于意辛山。[1] 登国五年(390 年),太祖勒众亲讨焉,慕容驎[2]率师来会,大破之。纥突邻大人屋地鞬、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皇始二年(397 年),车驾伐中山[3],军于栢肆[4],慕容宝[5]夜来攻营,军人惊走还于国,路由并州,遂反,将攻晋阳[6],并州刺史元延付平之。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等复聚党反于阴馆[7],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死者数千人。太祖闻之,遣安远将军庾岳[8]还讨匿物尼等,皆殄之。

又有侯吕邻部,众万余口,常依险畜牧。登国中(386—395 年),其大人叱伐为寇于苦水河。八年(393 年)夏,太祖大破之,并擒其别帅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9]之间。及灭卫辰[10]后[11],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车驾还,卫辰子屈丐[12]奔其部。太祖闻之,使使诏太悉伏执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获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太悉伏来赴不及,遂奔姚兴,[13]未几亡归岭北。[14] 上郡[15]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天赐五年,屈丐尽劫掠总服之。及平统万,[16]薛干种类

---

[1]据内田吟风氏曰:"意辛山相当于今东洋河上流以北之地",因此"纥突邻部居于阴山北麓偏东之东洋河上流以北地区"。见其《柔然族史序说》第 162 页。

[2]慕容驎——五胡十六国之后燕第一代君主慕容垂之子。

[3]中山——后燕首都,今河北省定县。

[4]栢肆——在今河北省藁城之北方。

[5]慕容宝——后燕第二代君主(396—398 年在位),慕容垂之第四子。

[6]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北。

[7]阴馆——在今山西省代县之北。

[8]庾岳——百衲本《北史》作"库兵",殿本《北史》作"庾兵"。

[9]三城——今陕西省肤施之东南。

[10]卫辰——五胡十六国之一夏国第一代君主赫连勃勃之父,称刘氏。

[11]登国六年(391 年)之享。

[12]即后来的赫连勃勃,字屈丐,一作屈孑。

[13]五胡十六国之一后秦第二代君主(394—416 年在位)。

[14]登国八年(393 年)之事。

[15]今陕西省绥德县。

[16]夏国之京城。

皆得为编户矣。

而牵屯山[1]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2]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3],劫掠左右,西及金城[4],东侵安定[5],数年间诸种患之。天兴四年(401 年),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6],木易干将数千骑弃国遁走,尽徙其人于京师。余种分迸,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

又黜弗、素古延等诸部,富而不恭,天兴五年(402 年),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

又越勒倍泥部,[7]永兴五年(143 年),转牧跋那山[8]西。七月,遣奚斤讨破之,徙其人而还。

(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1 卷,东京,1980 年,第 265 ~ 285 页。)

---

[1]牵屯山——《北史》作"帅屯山"。

[2]世传——《北史》(百衲本、殿本)作"示传"。

[3]武力壮勇——《北史》(百衲本、殿本)作"有武壮力勇"。

[4]金城——今甘肃省皋兰之西。

[5]安定——今山西省解县。

[6]高平——今甘肃省固原。

[7]越勒倍泥部——《北史》作"越勤倍泥部"。

[8]跋那山——今陕西省绥德附近之一山。

6 室韦、契丹、奚传笺注

〔日〕田村实造

6.1 《魏书·失韦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第2221页6~8行]失韦[1]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6000里。路出和龙(辽宁省朝阳县)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10日至啜水[2],又北行3日有盖水[3],又北行3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回300余里,又北行3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3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里余,名㮈水[4]……[下略]

6.2 《北史·室韦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第3129页10行]武定二年(544年)四月,始遣使张乌豆伐(《魏书·失韦传》作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

[3129页12~13行]其后分为五部,不相总一……突厥以三吐屯[5]总领之。

[3130页6行]无羊,少马,多猪、牛,与靺鞨同俗。[6]

---

〔1〕失韦,《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作"室韦"。

〔2〕啜水——西拉木伦河。此河唐代称为作乐水、饶乐水、弱乐水,唐代以后称为潢水、枭罗箇没里、世里没里等。

〔3〕盖水——《北史·室韦传》作"善水"。

〔4〕㮈水——《唐书》作"捺水"、"那河",今嫩江。

〔5〕吐屯为突厥官名 Tudun 之音译。

〔6〕《隋书·室韦传》"无羊少马多猪牛"之后有"造酒食啖"四字,则谓"造酒食啖"之风俗与靺鞨同。《隋书》所记似较正确。

6.3 《旧唐书·室韦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第5356页13行~5357页1行]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居猺越河[1]北。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日本海)。

[5357页11行]塞曷支部落……居啜河[2]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

[5358页1行]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3]合……东流注于海(日本海)。

6.4 《新唐书·室韦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第6176页2行]室韦,契丹别种……地据黄龙(营州)北。

[6176页8行]每溽夏,西保贰勃、次对二山。[4]

[6177页2~3行]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注:石勒喀河)。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瓦部。[5]

6.5 《魏书·契丹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第2223页8行]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6]

---

[1]猺越河——据白鸟库吉:《室韦考》(《白鸟库吉全集》卷4,第352~354页)。可比定为发源于今兴安岭,东南流入嫩江之绰尔河。

[2]啜河——当系《魏书》以下之室韦传中与啜水不同之河水名。据白鸟库吉:《室韦考》,此河被比定为注入贝尔湖之哈拉哈河。

[3]那河,即松花江之东段;忽汗河为牡丹江之别称瑚尔哈河。

[4]《隋书》、《北史》二山名作贷勃、欠对。

[5]参阅田村实造:《蒙古族的始祖传说与移住问题》"唐代的蒙古部"条(《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中册,第363~365页)。

[6]松漠——松林及沙漠之意,指西拉木伦河(潢水)与老哈河流域。

[2223 页 10～12 行]显祖时,使莫弗(官名?)纥何辰奉献……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1]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

[2223 页 13～14 行]太和三年(479 年)……莫贺弗[2]勿于率其部落车 3000 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大凌河)东。

6.6 《北史·契丹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第 3128 页 12～13 行][隋时,]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河北省卢龙县)正北 200 里,依托纥臣水(老哈河)[3]而居。

6.7 《隋书·契丹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第 1881 年 7～8 行]其后稍大,居黄龙(营州之别名,又称和龙,今辽宁省朝阳)之北数百里。

[1881 页 11 行起]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4] 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

---

[1]以上各部被称为契丹古八部。关于契丹古八部,参阅田村实造:《辽朝建国前的契丹族》,载《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第 76～78 页。

[2]莫贺弗,又作莫贺咄、莫何费、莫弗等,当系突厥·蒙古语官名 baghatur 或 bātur 之音译,本义为"勇者"。大概突厥人将此类官号授予契丹或奚之部长,在《北史》、《隋书》、《新唐书》"室韦传"中,亦为酋长之称号。

[3]参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二,《乌桓·鲜卑》(3)"乌侯秦水"条(《白鸟库吉全集》卷 4,第 97～107 页)。

[4]白貔河,一作白狼水,指今大凌河。

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200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500里,南北300里,分为10部。兵多者3000,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1]

6.8 《新唐书·契丹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第6168页7行]大酋(别部之大酋)辱纥主(注:突厥官名)曲据又率众归,即其部为玄州,拜曲据刺史,隶营州都督府。未几,窟哥举部内属,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以达稽部为峭落州,纥便部为弹汗州,独活部为无逢州,芬问部为羽陵州,突便部为日连州,芮奚部为徒何州,坠斤部为万丹州,伏部为匹黎、赤山二州,俱隶松漠府,[2]即以辱纥主为之刺史。

[6172页2行~6173页3行]天宝四载,契丹大酋李怀秀[3]降,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是岁,杀公主叛去……更封其酋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契丹在开元、天宝间,使朝献者无虑二十……至德、宝应时再朝献,大历中十三,贞元间三,元和中七,大和、开成间凡四,然天子恶其外附回鹘,不复官爵渠长。会昌二年,回鹘破,契丹酋屈戌始复内附……咸通中,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寖强。习尔之死,族人钦德嗣。光启时,方天下盗兴,北疆多故,乃钞奚、室韦,小小部种皆役服之,因入寇幽、蓟……钦德晚节政不竞,其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时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不肯代,

[1]关于隋代之契丹族,参阅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第二章"辽朝建国前之契丹族"第二节"契丹族之住地"。

[2]关于此八部之名,参阅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第二章第三节"八部同源说"大贺氏八部条。

[3]李怀秀——两《唐书》本纪作李怀节。

自号为王而有国,大贺氏遂亡。[1]

6.9 《魏书·库莫奚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第2222页10行]库[2]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3]之别种也。

6.10 《新唐书·奚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第6174页10行]奥苏悔落(《旧唐书》作奥苏梅落)。

[6175页5行]诏立它酋婆固(《旧唐书》作娑固)为昭信王、饶乐都督。

[6175页10行]然阴结回鹘、室韦兵犯西城、[4]振武。

---

[1]李怀秀以后,即天宝十四年以后之契丹酋长(松漠都督)世系,由于安史之乱唐朝方面史料缺乏,《辽史》卷63世表亦云:"自禄山反、河北割据,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至武宗会昌二年契丹部长屈戍内附以前情况不明。

关于屈戍以后至习尔之、钦德之事迹,参阅田村实造:《唐代契丹族研究》(《满蒙史论丛》卷1,第40~52页)、《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第二章第三节"八部同源说",第88~93页。

又,关于太祖耶律阿保机之独立及统一契丹八部的经过,参阅《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第三章第一节"太祖之统一与迭剌部",第二节"太祖之建国与汉人、汉城"。

[2]库,汲古阁本《魏书》作厍,音Shiya。

[3]关于宇文氏,参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卷4)五"宇文氏"(第128~133页)。

[4]西城,不明其为何地。若在西城郡,则可比定为陕西省安康县。

参考书目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室韦考》(《白鸟库吉全集》卷4,岩波书店)。

津田左右吉:《室韦考》(《津田左右吉全集》卷12,岩波书店)。

松井等:《契丹勃兴史》(《满鲜地理历史研究》一)。

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三和书房)。

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六)。

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上册(《东洋史研究丛刊》十二)。

(辑译自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1卷,东京,1980年,第287~340页。)

7 《隋书·铁勒传》笺注

〔日〕佐口透

铁勒[1]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2]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

独洛河[3]北有仆骨[4]、同罗、[5]韦纥、[6]拔也古、[7]覆罗[8]并号俟斤，[9]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10]胜兵可两万。伊吾[11]以西，焉耆[12]之北，傍白山，[13]则有契弊、[14]薄落职、[15]乙咥、[16]苏婆、[17]那曷、[18]乌讙、[19]纥骨、[20]也咥、[21]於尼讙[22]等，胜兵可两万。

---

〔1〕铁勒——同于敕勒、丁零，均为 Türk 之音译。

〔2〕西海——巴尔喀什湖或咸海。

〔3〕独洛河——土拉河。

〔4〕仆骨——部族名，Boqut（Boqu 之复数形）。

〔5〕同罗——部族名，Tongra。

〔6〕韦纥——部族名，Uyghur（同纥、维吾尔）。

〔7〕拔也古——部族名，Bayirqu（Bayarqu）。

〔8〕覆罗——《北史》脱落“罗”字。有人认为覆罗即高车丁零之副伏罗部的后身。

〔9〕俟斤——突厥称号 irkin，一泽颉斤，铁勒诸族中部族长之称号。

〔10〕蒙陈、吐如纥之原音不明，斯结—Siqit（?），浑—Qun，斛薛—斛及薛之合成语。

〔11〕伊吾——今哈密。

〔12〕焉耆——喀喇沙尔（今新疆焉耆县）。

〔13〕白山——天山山脉东部之一山，突厥语 aqtagh。

〔14〕契弊——契苾羽之异译，或许是《魏书》、《高车传》中之解批。

〔15〕薄落职——不明，或许是葛逻禄族之 Bulaq 氏族。

〔16〕乙咥——čigil（?），或许是葛逻禄族之一氏族。

〔17〕苏婆——不详。

〔18〕那曷——《北史·铁勒传》作婆那曷，“婆”音“伏”。

〔19〕乌讙——《北史·铁勒传》作乌护（Oghuz?）。

〔20〕纥骨——结骨（吉尔吉斯族）。

〔21〕也咥——读作 Yädiz = ädiz。

〔22〕於尼讙——《北史·铁勒传》作於尼护。

金山[1]西南有薛延陀[2]、咥勒儿、[3]十槃、[4]达契[5]等,1 万余兵。

康国[6]北,傍阿得水,[7]则有诃咥、[8]曷巀、[9]拨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篺、[10]苏拔、[11]也末、[12]渴达[13]等,有 3 万许兵。

得嶷海[14]东西有苏路羯[15]、三索咽篾、[16]促隆忽[17]等诸姓,8000 余。

拂菻[18]东侧有恩屈、[19]阿兰、[20]北褥九离、[21]伏嗢昏[22]等,近两万人。

---

[1]金山——阿尔泰山。

[2]薛延陀——铁勒之强部。

[3]咥勒儿——部族名,不详。

[4]十槃——部族名,不详。有人认为即悦槃,可疑。

[5]达契——部族名,不详。十槃达契之句读法不明确。

[6]康国——指撒马尔罕。

[7]阿得水——Atil, Itil 之音译,大河之意,锡尔河或伏尔加河。

[8]诃咥——不详,或许是阿哇(ädiz)之讹。

[9]曷巀——《北史·铁勒传》作曷截。《隋书》卷 67《裴矩传》作曷萨部落。有人比定为 Khazar 族,也有人连同"诃咥"连读为"诃咥曷巀"。

[10]拨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篺——以上 5 个部族名之原语不明。比千,《北史》作比干;悉何篺(?),《北史·铁勒传》作悉何嵯(?)。

[11]苏拔——Subar(?),有人以为是不里阿耳族之一部落。

[12]也末——有人认为读作 Yamak。

[13]渴达——《北史·铁勒传》作谒达。

[14]得嶷海——得嶷,读作 tängiz,突厥语"海"或"湖"之意,指巴尔喀什湖。

[15]苏路羯,原语不明。

[16]三索咽篾——原语不明。唯知另有三姓咽蔑之部族名(《新唐书》卷 111),未知"三索"是否为独立的部族名。《北史·铁勒传》作三素咽篾。据《新唐书》卷 111《王方翼传》,三姓咽蔑分布于从伊丽河至热海(伊克湖)之地区。

[17]促隆——不详,《北史·铁勒传》作"促萨忽"。

[18]《北史》(百衲本、殿本)作"拂东菻",误,应作"拂菻东"。拂菻指叙利亚、巴勒斯坦等罗马统治的东方地区,也指拜占庭帝国。

[19]恩屈——不详,有人推测为 Oghur 或 Onoghur。

[20]阿兰——Alan,部族名。

[21]北褥九离——有人比定为 Baškir(巴失乞儿族,但非确定的说法。有人认为此处应读作"北褥、九离伏、嗢昏")。

[22]伏嗢昏——有人比定为"不里阿耳"(Bulghar)。

以上四部族分布于从咸海起、经乌拉尔山脉南部、以迄黑海一带的地区。

北海[1]南则都波[2]等。

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3]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4]而少马。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开皇(581—600年)末,晋王广[5]北征,纳[启]民,[6]大破步迦可汗,[7]铁勒于是分散。

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8]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9]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10]居贪汗山。[11] 复立薛延陀内俟斤[12],字也咥,[13]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14]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15]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16]

(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2卷,1979年东京版,第3~9页。)

---

[1]北海——即贝加尔湖,殿版《北史·铁勒传》误作"比海"。

[2]都波——即近代之图瓦族。

[3]并无君长——据《通典》卷199及其他资料,应作"有君长"(护雅夫氏的说法)。

[4]多牛羊——《北史·铁勒传》无"羊"字。

[5]晋王广——百衲本《隋书》作晋王讳,殿本《隋书》及《北史》均作晋王广,即隋炀帝。

[6]《北史·铁勒传》作纳启人。

[7]大破步迦可汗——步迦可汗,西突厥室点蜜之子(576—603年? 在位),先称达头可汗(Tardu qughan),后名步迦可汗(Böge? qaghan)。《北史》作"破步迦可汗",无"大"字。

[8]处罗可汗——即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

[9]俟利发俟斤——突厥官号 iltäbär、irkin、部族长之称号。

[10]易勿真莫何可汗,原音不明,"莫何可汗"读作 Bagha qaghan。

[11]贪汗山——《隋书》作"贪汙山",兹从《北史·铁勒传》作"贪汗山"。为高昌之北之 Boghdo Ola(博格多山),此山之北在准噶尔盆地之南端。

[12]薛延陀内俟斤——"内"字衍。又,《北史》作"薛延陀内公俟斤子"。

[13]也咥——读作 Yädiz(?)。

[14]处罗可汗既败——《北史·铁勒传》无"处罗可汗"4字。

[15]高昌——吐鲁番,参阅《隋书·高昌传》。

[16]《北史》卷99《铁勒传》抄录自《隋书》卷84《铁勒传》,本文参据之,并注记字句之异同。

8 突厥传笺注

〔日〕山田信夫

8.1 《周书·突厥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第908页2行]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似为鲜卑族之国),在匈奴之北。

[909页1行]魏废帝元年正月,土门发兵击茹茹,大破之于怀荒(怀荒镇,在长城外,今乌兰察布盟东南方)北,阿那瓌自杀。

[909页2行]土门遂自号伊利[1]可汗,犹古之单于也。

[909页3~4行]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2] 又破[邓]叔子于沃野[镇](今巴彦淖尔盟东部,五原北方)北木赖山(《北史》作赖山,似为狼山)。

[909页5行]科罗死,弟俟斤[3]立,号木杆可汗。

[909页8~9行][俟斤]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4]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

[909页13~14行]大官有叶护(yabghu),次设(shad),次特勤

[1]伊利,一定是写来表现与"国家"有关之突厥语 il,当系正式称号之一部分。又,其个人之名,突厥碑文、粟特语碑文作 Bumïn(布门)。

[2]伊利可汗之嗣立者,《隋书·突厥传》作"弟逸可汗"。在《北史·突厥传》中,本书及《隋书》之两种记载并存,惟"逸可汗"作"阿逸可汗"。

[3]俟斤,一般而言为古突厥族广泛使用之称号 irkin 之音写。关于 irkin 参照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第一卷第二编第三章(山川出版社,1967年)。但《隋书·突厥传》作"俟斗",与之相应之《北史》记事中作"俟叔"。

[4]此为据传闻之中国人之地理概念,西方之里海、咸海等似被混同不分而概称之为西海。至于对贝加尔湖则有较具体概念。

(tägin),次俟利发(iitäbir),次吐屯发。[1]

[909 页 15 行]侍卫之士,渭之附离(böri),夏言亦狼也。

[910 页 10～12 行]可汗恒处于都斤山[2]……五月中旬,集他人水(塔密尔河),拜祭天神。于都斤山西(原本误作"四")500 里有高山迥出,上无草树,谓其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

[910 页 12 行]其书字类胡(伊朗系民族)。

[911 页 5 行][保定]三年(563 年)诏随公杨忠率众一万与突厥伐齐,忠军度陉岭(山西省代县之句注山,雁门关在该岭)。

[912 页 2 行]高绍义自马邑(在山西省朔县东北)奔之。

8.2 《隋书·突厥传》笺注

[中华书局《隋书》第 1863 页 5 行]突厥之先,平凉(注:甘肃固原县)杂胡也。

[1864 页 11～12 行][死者]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3]

[1864 页 12～13 行]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4]及嫂。

[1865 页 10 行]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5]之子,摄图最贤。"因迎

---

〔1〕原本"设"误作"没"。原本"特勤"为"特勤"之误,此已成定说,但也有"勤"字并非误字之新见解。总之,此词相当于突厥语 tägin。吐屯发之"发"字似误,吐屯似为官职 tudun,《北史·突厥传》作"吐毛发"。关于以上诸称号,参阅护雅夫前揭书。

〔2〕于都斤山——ütükän,又写作乌德鞬、郁督军,指北蒙古杭爱山脉之一部分。其地接近鄂尔浑河上游,[在史书上]屡次被提及,自古以来为支配北蒙古的突厥系、蒙古系民族的最重要地区。参阅山田信夫:《突厥圣地于都斤山》,载《静冈大学文理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卷 1。

〔3〕关于此墓葬制度之记事,《周书》上也有同样记载。墓的木标与立石之关系不明确。本书的记事可信。但本书殿本与《北史》有脱字、误字,意义均不明确。又,此处所说之石被称为"巴尔巴尔"。有许多遗迹被发现。

〔4〕《周书》、《北史》作后母。

〔5〕(指)乙息记(逸)、木杆、佗钵、褥但兄弟 4 个可汗。

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1]。

[1865页13~14行]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河北省东北端，离山海关数十公里）。

[1866页1~2行][沙钵略]悉众为寇，控弦之士40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似在甘肃省嘉峪关方面），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槃（甘肃庆阳县附近），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在甘肃固原县方面）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1866页14~15行]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似为契骨之误）[2]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束纥罗[3]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4]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5]

[1869页4行][沙钵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乌兰察布盟归绥市北方）内。

[1869页5~6行]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国[6]部落乘虚掠其妻子。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

[1870页3行]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7]等奉表以闻。

[1870页10行]紫河镇（鄂尔多斯东部乌兰木伦河畔）。

[1872页3行]沙钵略子曰染干。[8]

---

[1]此称号当然是突厥语之音写。突厥可汗号之突厥语原义尚未全部阐明，莫何（bagha）始波罗（ishbara）均以“勇健”之意，曾为当时之中国人所言及。沙钵略、始波罗，只不过是ishbara的两种音写[同名异译]。莫何始波罗可汗又作始波罗莫何可汗（见后文沙钵略可汗所上表文）。

[2]《北史》作契骨（吉尔吉斯人）。若为北方，当然是契骨。唯当时东方之契丹也是强敌。若北方为东方之误写，则契丹正确。

[3]原文“束”应据《北史》订正为“东”。东纥罗，通常写作同罗，应为当时突厥族之一：Tongra。又，薄弧，似即常写作仆固者，当系突厥族之Buqu。

[4]百衲本无“稽”字，兹据殿本及《北史》补。察，同于设，杀等，当系官号shad之音写。

[5]百衲本作“诔剿”，诔为诛之误。

[6]此阿拔为柔然之一部，与后来又西迁至欧洲之著名阿哇尔人很有关系，也有人认为阿拔为突厥族ädiz之音写阿跌之误。

[7]窟含真——《北史》“含”作“合”；又，《隋书》卷1帝纪作“库合真特勤”。

[8]别的史料以染干为叶护可汗处罗侯之子，似是。

[1872 页 4 行]突利[1]以为然。

[1872 页 7~8 行]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旧镇。[2]

[1875 页 1 行]赐物 20(《北史》作"二千")段。

[1875 页 8 行]帝亲巡云内(山西省大同市),溯金河(白道川之别名)。而东,北幸启民所居。

[1876 页 2~3 行][大业十一年,615 年]车驾避暑汾阳宫(山西省静乐县东北),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

8.3 《旧唐书·突厥传》笺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第 5160 页 4 行] [贞观]八年[颉利可汗]卒……其旧臣胡禄达官(darqahan)吐谷浑邪自刎以殉。

[5167 页 2~3 行]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有众五千余人。又抄掠九姓(toquz oghuz),[3]得羊马甚多,渐甚强盛,乃自立为可汗……

[5168 页 1 行]元珍后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4]

[5168 页 7~9 行]默啜遣使上言:"请还河西[5]降户,即率部落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制许之。默啜遂攻讨契丹……则天寻遣使册立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6]

[5172 页 9 行]初,默啜景云中率兵西击娑葛(突骑施之君长),破灭之。

---

[1]原本作"突厥",据《北史》订正为"突利"。

[2]度斤旧镇,通说以为在北蒙古于都斤山地区,但也有以为在漠南之新见解。参阅护雅夫:《度斤旧镇小考》(《北大史学》卷 3,1955 年)。

[3]多半似当书作九姓铁勒,为突厥族九部之联合体。突厥碑中作 toquz oghuz。回纥等均系其中之一部。参照羽田亨:《论九姓回鹘与 toquz oghuz 之关系》(《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所收)。

[4]有元珍当时并未死的说法,而且认为此元珍与后来的活跃人物暾欲谷是同一人。关于此元珍、暾欲谷问题,参照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卷 1,第 560~565 页。

[5]"河西"可能为"河曲"(鄂尔多斯)之误。

[6]据突厥碑文,默啜作 Qapaghan 可汗,其可汗号中之"颉跌利施"四字,突厥语作 il tiriš,"集国"之意。

[5173 页 13 行]俄而降户阿悉烂(Arslan)、跌跌思泰等复自河曲(鄂尔多斯)叛归。

[5174 页 1~3 行]张知运既不设备,与降户战于青刚岭(甘肃省环县北方),为降户所败……贼至大斌县(陕西省绥德县西北),又为将军郭知运所击,贼众大溃,散投黑山呼延谷(黄河北岸乌喇特旗之西),释张知运而去。

[5176 页 4 行]玄宗发都,至嘉会顿。[1]

[5177 页 5~7 行][开元]二十年(732 年),[2]阙特勤死,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3]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20 年,[4]小杀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卒。

[1]"嘉会"似可认为是地名。刘茂才释为"诸侯拜谒皇帝会集之地"。见刘茂才:《东突厥汉文史料集》,第 618 页。

[2]据碑文等可知,阙特勤死于前一年,即开元十九年(731 年)。

[3]后来在北蒙古鄂尔浑河畔,此碑与小杀即毗伽可汗之碑文一起被发现。除玄宗所赠汉文碑,还有突厥语碑文,为有关古代突厥民族的语言、历史的珍贵资料。

[4]据碑文等,已确认毗伽可汗之卒年为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此误。

参考书目

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卷 1,山川出版社,1967 年。

刘茂才:《东突厥汉文史料集》,二卷,威斯巴登,1958 年。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

克利亚什托尔内伊:《作为中亚史料的古突厥卢尼体碑铭》,莫斯科,1964 年。

岩佐精一郎:《岩佐精一郎遗稿》,东京,1936 年。

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下(《白鸟库吉全集》第四、五卷),岩波书店,1970 年。

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下,东洋史研究会,1957、1958 年。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 年。

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满蒙史论丛》四,1943 年)、《翁金碑文译注》(《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洋史研究会,1950 年)。

马洛夫:《古突厥文文献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 年;《蒙古地区和吉尔吉斯地区古突厥文文献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 年。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吉劳德((Giraud,R.):《天突厥帝国》(L'empire der Turcs Célestes),巴黎,1960 年。

古米列夫:《古代突厥人》,莫斯科,1967 年。

以上所列为最新的主要参考书,其他许多研究论文,可参阅上列各书所引用论著及所列文献目录。

(辑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2 卷,第 29~64,92~138,186~188 页。)

9 《隋书·西突厥传》笺注

〔日〕护雅夫

西突厥[1]者,木杆可汗[2]之子大逻便[3]也,与沙钵略[4]有隙,因

---

〔1〕关于"突厥"一词,以其为 türk 加蒙古语复数语尾 - üt 所成 türküt 之汉语音写之马迦特、伯希和说占支配地位。宫崎市定氏认为"厥"也读作"クッ",突厥不读作"トッケッ"而读作"トックッ",与原音チェルキェト相近,学者中赞从其说者不少。但近年蒲立本提倡突厥不必要为 türküt 之音写而为 türk 之汉字音写之说。我认为蒲立本的见解正确。这样,将突厥特意读作トックッ的必然性看来不存在了。丝毫无妨其读作通音トッケッ。参阅伯希和:《突厥的汉文名"突厥"的来源》,载《通报》第 16 卷,1915 年;蒲立本:《突厥的汉文名》,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 85 卷 2 期,1965 年;宫崎市定:《关于突厥的字音》,《亚洲史研究》卷 4,东洋史研究会,1964 年。

关于"突厥"一词的意义,以 F. W. K. Müller,以为其意为"强力者"的说法为有力,但科诺诺夫对此说异议颇多。见科诺诺夫:《"突厥"一词试析》,载《苏联民族学》,1947 年第 1 期,此篇论文对有关"突厥"之意义、语源的研究史作了简略叙述,有便于读者了解。

〔2〕殿本作"木扞可汗"。被认为相当于 1956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粟特语碑上所见之人物 Mughan- qaghan。参阅护雅夫:《有关粟特人在突厥帝国内部所起作用的一个资料——布古特碑文》,载《史学杂志》81 卷 2 期,1972 年。

〔3〕大逻便——号阿波可汗〔Apa- qaghan〕。古米列夫认为大逻便与东罗马史料中所见 Turum 为同一人物,此推断尚需进一步详细研究。古米列夫、豪西希据东罗马、伊斯兰史料及亚美尼亚、粟特语等史料中所见人名或称号比定西突厥、东突厥(北突厥)之可汗名或称号,并还原其突厥语之原名,推定其意义,但彼等之说不能轻率从之。上述其他语言之史料与中国史料(尤其有关西突厥之中国史料)之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与考古学资料之比较研究,为留给今后之课题。参阅:古米列夫:《拜占庭史科所记突厥第一帝国的大内讧》,载《拜占庭年鉴》第 20 卷,1961 年;古米列夫:《古代突厥人》,莫斯科,1967 年。豪西希:《塞奥菲拉克茨·埃克斯库尔斯论斯基泰族》,载《拜占庭》,第 23 卷,1953 年;豪西希:《有关欧洲阿哇尔人起源的史料》,载《中亚学报》,1957 年第 2 期。

又,"大罗(逻)"为突厥语"酒器",之意,见《通典·突厥》。

〔4〕沙钵略(始波罗)可汗。沙钵略(始波罗)为 išbara(išpara)之音写,意为"勇健者"。参阅伯希和:《中亚问题札记九条》,载《通报》第 26 卷,1929 年;《通典·突厥》。

分为二,[1]渐以强盛。东拒都斤,[2]西越金山,[3]龟兹、铁勒、[4]伊吾及西域诸胡[5]悉附之。

大逻便为处罗侯[6]所执,[7]其国立鞅素特勤[8]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

---

[1]关于突厥在名义和事实上均已分裂之事,参照《隋书·突厥传》。松田寿男氏考察其经过,得出了"西突厥于公元583年取得政治独立"的结论。但关于西突厥独立的年代,除松田说外,还有582年、603年、603年冬至604年、611—612年等诸说。参阅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岑仲勉:《西突厥以何时分立》(《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1958年);克里什托尔内伊:《古突厥碑》,莫斯科,1964年;古米列夫:《古代突厥人》"大内讧"章。

东突厥又称北突厥。关于西突厥的早期历史,近年内田吟风氏提出了新的说法,其中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之点颇多。我认为目前我国对西突厥史的研究,以松田寿男氏前揭书所收各篇论文最为出色。参阅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一)(二)(三),载《研究》33、36、46号,1964、1965、1970年。

[2]突厥碑中有 ü(ö?)tükän yïš(郁督军之密林)ü(ö?)tükän yer(郁督军之地)。汉文史料中有于都斤山、乌德鞬山、郁督军山等名。关于其地相当于现今何处,参阅:《隋书·突厥传》;岑仲勉:《外蒙于都斤山考》(《突厥集史》下册,北京,1958年);山田信夫:《关于突厥圣地郁督军山之札记(1)》,《静冈大学文理学部研究报告·人文科学》(一);L. P.波塔波夫:《有关突厥郁督军山的新资料》,载《苏联东方学》,1957年第1期。

[3]阿尔泰山脉。"金山"为突厥碑文中所见 Altun yïš(黄金密林)之意译。据松田寿男氏曰:"此山[金山]也在阿尔泰山脉内,尤其是指从科布多沿乌尔莫该提、乌兰、达比斯腾3个著名的山峰(dawan)以迄喀拉·额尔齐斯(突厥碑文之 ärtisügüz)、乌伦古河流域之间的[阿尔泰山脉]部分。"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4]参照《隋书·铁勒传》、《旧唐书·铁勒传》。

[5]诸胡——所谓"胡"起初主要指中国北方异民族,[后来,]尤其是南北朝时期以后,主要指西突厥斯坦的伊朗系民族,其中包括粟特人(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区——所谓索格底安那、土兰索阿纳、马维兰纳赫儿(阿拉伯语)的伊朗系居民)。粟特人自古以来从事国际贸易,在东突厥斯坦、甘肃省西北部、西突厥辖有的天山山脉北部地区、蒙古高原等地建立过居留地,在唐代长安也有许多粟特人居住。尤其是西突厥势力下的粟特居留地遗迹,经苏联学者的发掘、调查,查明了其实际情况及其与西突厥的关系。参阅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卷1,山川出版社,1967年;护雅夫:《有关突厥帝国内部粟特人所起作用的一个资料》、护雅夫:《有关粟特人向东方发展的一个考古学资料》,载《游牧社会史探求》,第45期,1972年。

[6]处罗侯——号叶护可汗,隋册立为莫何(Baγa)可汗。

[7]参照《隋书·突厥传》。

[8]关于西突厥可汗系谱,沙畹、岑仲勉、古米列夫等各有见解,但他们的说法均有不少可进一步研究讨论之点。此处不对他们的见解一一介绍。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西突厥世系考》(《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所收)、古米列夫:《古代突厥人》一书中"大内讧"章。

又,tegin 又读作 tigin,为突厥诸族可汗(君主)子弟所戴称号之一。中国正史中,几乎在一切场合下将此词译写作"特勤",因此外国学者有人认为此词意为突厥语一种高官 töra(原意为"天幕中最高席位"、"法律")之音写,此种见解不正确。

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581—600年）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1]乱，[2]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3]

处罗可汗[4]居无恒处，然多在乌孙[5]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6]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7]

官有俟[利]发、阎洪达[8]，以评议国事，自余与东国同。每[9]五月八日，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10]致祭焉。

当大业（605—617年）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11] 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

---

〔1〕突厥国家创建者伊利（Ilig）可汗之弟室点蜜（瑟帝米，突厥碑文作 estäm - qaγan）之子。在东罗马史料中记作 Tardou。有关突厥族的东罗马史料，请参阅莫拉夫奇克（G. Moravcsik）：《拜占庭突厥学》（Byzantinoturcica），第2版，第1～2卷，柏林，1958年。又，参阅内藤ミドリ：《东罗马与突厥外交史料——Menandri protectoris Fragmenta（米南德里·普罗特克托里斯书之片断）》译注：《内陆亚细亚史论集》，内陆亚细亚史学会，1964年。

〔2〕参照《隋书·突厥传》。

〔3〕处理有关外国事务、朝贡、凶仪、祠庙等事的官名。

〔4〕此处及以下之处罗可汗为前见之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而非东突厥之处罗可汗，这是无须赘言的。

〔5〕关于乌孙，目前可参阅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卷1，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71年版；《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译注。

〔6〕以今塔什干为中心之地区。松田寿男氏认为：此"石国北"殆即后来统叶护可汗庭移往之"石国北千泉"（见《旧唐书·突厥传》），并将千泉比定为 Aulie - ata 东方之 Merke 附近。与此说相对，内田吟风氏认为此千泉"在远离 Merke 西南，便于波斯人经营等事之塔什干北郊 Chirchik 河上源地带"。参阅松田寿男前揭论文，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三）》。

〔7〕殿本作"应婆"，应以"应娑"或"鹰娑"为正确。松田寿男氏认为其地相当于龟兹北方大裕尔都斯山谷中。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8〕埃利发——原音为 iltäbär 或 eltäbär，一译颉利发、意利发、颉利吐发、颉利调发，为东突厥较强大部族首长所戴称号。iltäbär、eltäbär 为古突厥语"部族统治者"之意。在东突厥，相对较弱小部族首长称 irkin（俟斤、乙斤）。人们认为对西突厥也大致相同，但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阎洪达之语源、意义、机能，现尚不明。参阅护雅夫：《铁勒诸部中之 eltäbär、irkin 称号研究》（前揭书所收）。

〔9〕百衲本作"年五月八日"，殿本作"每五月八日"。

〔10〕参照《周书·突厥传》、《隋书·突厥传》。

〔11〕参照《隋书·铁勒传》、《旧唐书·铁勒传》。

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1]与处罗国其势敌耳。[2] 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廷。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3]也!"处罗闻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

君肃又说处罗曰:"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道远,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4]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5]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帝将西狩,大业六年(610 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与车驾会

[1]参照《隋书·突厥传》、《北史·突厥传》。

[2]百衲本、殿本均作"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应作"启民与处罗其国势敌耳"。

[3]中国于匈奴国家瓦解后,常称北亚、中亚之游牧国家为匈奴,称其君主可汗为单于(匈奴君主之称号)。关于此点,参照《旧唐书·西突厥传》。

[4]吐谷浑——从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起以迄唐代,以青海湖地区为中心繁荣之国。为藏系民族,处于鲜卑系王统治之下。

[5]莫贺咄——突厥——蒙古语意为"勇者"、"英雄"之 baghatur 的音写。但无论 bagha 或 čur 均可用作称号(有时用于名字前),莫贺咄也有可能为重复之称号。设——Šad 之音写,一译杀、察,为可汗族(阿史那氏族)出身、被授予封建领地者所戴之称号。此处所谓莫贺咄设,即位时成为突厥帝国最后一个可汗颉利可汗。参照两唐书《突厥传》、《旧唐书·西突厥传》;护雅夫:《突厥第一帝国之官号 Šad 研究》(前揭书所收)。

于大斗拔谷[1]。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之如何。

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2]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帝取桃竹[3]白羽箭一枝[4]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经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

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5]东,保时罗漫山。[6] 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7] 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叮咛晓谕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

以[大业]七年(611 年)冬,处罗朝于临朔宫,帝享之。处罗稽首[8]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帝曰:"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9]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

---

[1]其他史料作"大斗拔谷"、"达斗拔谷"等,"升"为"斗"之误。大斗拔谷,被认为相当于今甘肃省山丹县以南之地。参照《新唐书·西突厥传》。(按:原文本作"升",今据中华点校本改作"斗"。)

[2]不用说,是求中国王朝下嫁公主。

[3]竹的一种。

[4]百衲本作"二枝",殿本作"一枝"。关于使者携带箭的风习,目前可参阅护雅夫:《关于"分与箭的故事"——北亚萨满教研究之一节》,《北方文化研究报告》七,1952 年。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山脉东段南麓吐鲁番盆地,尤其是其中的哈剌火州。

[6]被比定为伊吾(哈密)东北方之卡尔里格·塔格(雪山)。一作折罗漫山。见松田寿男:《天山、白山及时罗漫山》(前揭书所收)。

[7]玉门关,为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方所设关,与其南之阳关均位于中国通西域之要道上。晋昌城在其东面,即今甘肃省安西县以东。

[8]稽首——中国最重的拜礼形式之一。

[9]东突厥(北突厥)自沙钵略可汗开皇五年(585 年)向隋朝称臣,经历叶护(莫何)可汗、都蓝可汗、启民可汗统治时代,到大业十一年(615 年)始毕可汗包围隋炀帝于雁门为止,基本上与隋朝保持和平关系。见护雅夫:《突厥与隋唐两王朝》(前揭书所收)。

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

明年(612年)元会,处罗上寿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1] 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2]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诏留其累弱[3]万余口,令其弟达度阙[4]牧畜会宁郡。[5]

处罗从征高丽,[6]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

[大业]十年(614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7]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8]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9]

(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2卷,东京,1979年,第191~207页。)

---

〔1〕在突厥碑文上,突厥可汗被称为 tängritäg tängridä bolmïš türk bilgä qaghan,如“天”(或“神”)、从天上降生之突厥贤明可汗;或:如“天”(或“神”)、在天上生成之突厥贤明可汗等。因此,本文所渭“圣人可汗”似为对突厥可汗之尊号,转用于对中国皇帝隋炀帝者。参阅护雅夫:《突厥启民可汗上表文》(前揭书所收)。

〔2〕殿本脱落“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9字。

〔3〕累弱——此处之“累”似与“羸”(疲、弱)同义。

〔4〕《旧唐书·西突厥传》作阙达设、《新唐书·西突厥传》作“阙达度设”。其完全称号《新唐书·西突厥传》之“阙达度设”可认为是 Köl Tarduš – šad 之音写。因而本文之“达度关”系“阙达度(设)”之误(按:原文作“达度关”,今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改)。

〔5〕甘肃省靖远县。

〔6〕此处所谓高丽,又作高句丽。隋炀帝于大业七年(611年)、八年(612年,)、十年(614年)三次征讨高句丽。处罗可汗从征高句丽,系大业八年之事。

〔7〕隋炀帝于大业十二年(616年)赴江都(江苏省江都县)离宫,翌年,唐公李渊(唐高祖)举兵陷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立其孙(恭帝)即位,改元义宁。但隋炀帝留在江都,不欲北归,遂引起其从行将士之不满,他们于义宁二年(618年,唐武德元年)以宇文化及为首谋者举行叛乱,杀死炀帝。本文“江都之乱”指此。

〔8〕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拥立炀帝之侄杨浩占据魏县(河北省大名县),随后又杀浩即帝位,建国号为许。义宁三年(619年),为隋末蜂起于各地之群雄之一窦建德击破擒杀(按:618年5月隋禅位于李渊,“义宁”年号不复存在;619年确切说应为唐武德二年)。

〔9〕详见两唐书《西突厥传》。

10 《旧唐书·西突厥传》笺注

〔日〕护雅夫

西突厥本与北突厥[1]同祖。初,木杆[2]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其国即乌孙之故地,东至突厥国,西至雷翥海,[3]南至疏勒,北至瀚海,[4]在长安北7000里。自焉耆国西北7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8日行,至其北庭。[5] 铁勒、龟兹及西域诸胡国,皆归附之。其人杂有都陆及弩失毕、[6]歌逻禄、[7]处月、[8]处密、[9]伊吾等诸种。风俗大抵与突厥同,唯言语微差。

其官有叶护,[10]有特勤,[11]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又有乙

---

〔1〕又称"东突厥"。

〔2〕此误,当如《隋书·西突厥传》所记,作"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

〔3〕雷翥海——沙畹比定为咸海,内田吟风氏从之。见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二)》。

〔4〕据沙畹言,当指蒙古沙漠西北部。

〔5〕《通典》曰:"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参照《新唐书·西突厥传》。

〔6〕关于"都陆"、"弩失毕",参阅后文。"都陆",后文又译作"咄陆"、"咄六"等。都陆、弩失毕之原语不明。豪西希以"都陆"为 Tul-oq (oq 意为"箭")之音写,余未从其说。见豪西希:Theophylakts Exkurs。

〔7〕参照《新唐书·回鹘传(下)》。

〔8〕据松田寿男氏之考证:"处月部之驻地在轮台县(乌鲁木齐)以东、金满县(吉木萨尔)以西","在博格多鄂拉之北麓地带,尤其当从靠乌鲁木齐方面求之"。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增补版)所收]。

〔9〕据松田寿男氏曰:处密(处蜜)之驻地在从乌鲁木齐西面喀屯博格多鄂拉向北流之玛纳斯、乌兰乌苏两河流域。见前揭论文。

〔10〕叶护(Yabγu)为亚于可汗之突厥官号。

〔11〕参阅《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2页注释〔8〕)。

斤[1]、屈利啜、[2]阎洪达、颉利发、吐屯、[3]俟斤等官,皆代袭其位。

处罗可汗,隋炀帝大业中(605—617年)与其弟阙达设[4]及特勤大奈入朝。仍从炀帝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

遇江都之乱,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归长安,[5]高祖为之降榻,引与同坐,封归义郡王。献大珠于高祖,高祖劳之曰:"珠信为宝,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竟不受之。

先与始毕[6]有隙,及在京师,始毕遣使请杀之,高祖不许。群臣谏曰:"今若不与,则是存一人而失一国也,后必为患。"太宗曰:"人穷[7]来归我,杀之不义。"骤谏于高祖,由是迟回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萨那于内殿,与之纵酒,既而送至中书省,纵北突厥使杀之。太宗即位,令以礼改葬。

阙达设初居于会宁,有部落3000余骑。至隋末,自称阙达可汗。[8] 武德初,遣使内属,拜吐乌过拔阙可汗,厚加抚慰。寻为李轨[9]所灭。

特勤大奈,隋大业中(605—617年)与曷萨[10]那可汗同归中国。及从炀帝讨辽东,以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后分其部落于楼烦。[11]

---

[1]"乙斤"与下文"俟斤"同为 irkin 之音写。关于"颉利发"(iltäbär),参阅《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3页注释[8])。

[2]"屈利啜"当为 köl čur 之音写。köl 之本义为"湖",转为"如湖水般充满智慧者"之意,为称号或人名,又被用作称号或人名之一部分。čur 为称号,其意义今尚不明。

[3]吐屯——见于突厥碑文等处之 tudun 之音写。从后文有关统叶护可汗的记载中可知,吐屯为对突厥支配下诸国之监察官、贡赋征收官。

[4]参照《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6页注释[4])。又,《资治通鉴》作"阙度设"。

[5]参照《隋书·西突厥传》。

[6]所谓东突厥(北突厥)第一帝国之可汗。参照隋书、两唐书《突厥传》。有人认为"始毕"为 sibir 之音写,此种见解除时代错误外,别无所有。

[7]百衲本作"寡";殿本作"穷",从之。

[8]《新唐书·西突厥传》、《资治通鉴》作"阙可汗"。"阙阴"为 köl 之音写。此人称可汗以前称"阙达度设"(Köl Tarduš-šad)。《旧唐书》此处之"阙达可汗"也可能是 Köl Taghrduš-qaghan 之音写。

[9]隋末举兵于各地之群雄之一。

[10]"婆":不消说为"萨"之误。殿本作"萨"。"萨"书作音似之"娑","娑"又误书作"婆"。(按:原文作"曷婆那",今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改"婆"作"萨"。)

[11]山西省静乐县。

会高祖举兵，大奈率其众以从。隋将桑显和袭义军于饮马泉，诸军多已奔退，大奈将数百骑出显和后，掩其不备，击，大破之，诸军复振。拜光禄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战功，赏物五千段，赐姓史氏[1]。

武德初，从[2]太宗破薛举。又从平王世充，破窦建德、刘黑闼，[3]并有殊功。赐宫女3人，杂彩万余段。贞观三年(629年)，累迁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实封300户。十二年(638年)卒，赠辅国大将军。

初，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拘，其国人遂立[曷][4]萨那之叔父，[5]曰射匮可汗。射匮可汗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6]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遂与北突厥为敌，乃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7] 寻卒。弟统叶护可汗[8]代立。

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9]，南接罽宾，[10]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11] 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

〔1〕此史氏不消说为史那氏之"史"，后文阿史那怀道之称为史怀道亦同。

〔2〕百衲本无"从"字，殿本有。

〔3〕薛举、窦建德、刘黑闼，与李轨同，均为隋末举兵于各地之群雄。

〔4〕百衲本、殿本脱落"曷"字。

〔5〕《隋书·西突厥传》只说射匮可汗为"其酋长"，裴矩奏言谓其为"都六之子，达头之孙"。关于西突厥之可汗、酋长系谱有诸种说法，各种说法均有商榷余地。参阅《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2页注释〔8〕)。余不在此提出此等问题。

〔6〕据内田吟风氏，此为咸海。见《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三)》。

〔7〕松田寿男氏比定为库车北面之大裕尔都斯河谷，内田吟风氏从之。阅参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前揭书所收)及内田吟风前揭论文。

〔8〕"统"，又写作"瞰"，当系突厥语之音写。据克里亚什托尔内伊，"瞰"当系意为"第一"、"最初"之突厥语 ton - tun 之音写。其说被认为正确。见 S. G. 克里亚什托尔内伊：《瞰欲谷——阿史德元珍》，载《突厥学文集》，莫斯科，1966年；克里亚什托尔内伊：《古突厥卢尼体文碑》，莫斯科，1964年。

〔9〕不消说为萨珊波斯王朝。

〔10〕当时系指阿富汗之 Kapisa(诃毗施)与加兹尼(鹤悉那)。

〔11〕参照《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3页注释〔6〕)。

武德三年(620 年),遣使贡条支[1]巨卵。时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抚结,与之并力以图北蕃,统叶护许以五年冬。大军将发,颉利可汗[2]闻之大惧,复与统叶护通和,无相征伐。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请婚,其计安在?”封德彝[3]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4]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高祖遂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遇颉利可汗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

贞观元年(627 年),遣真珠统俟斤[5]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 5000 匹。

时统叶护自负强盛,无恩于国,部众咸怨,歌逻禄种多叛之。颉利可汗不悦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而过。”统叶护患之,未克婚。为其伯父所杀而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6] 太宗闻统叶护之死,甚悼之,遣赍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会其国乱,不果至而止。

莫贺咄侯屈利俟毗[7]可汗,先分统突厥种类为小可汗,及此自称大可汗,国人不附。弩失毕部[8]共推泥孰莫贺设[9]为可汗,泥孰不

---

〔1〕关于条支指何地,意见不一。最新的说法为宫崎市定氏之说,他将条支比定为叙利亚,认为条支定系塞乌科斯朝或塞列乌基亚之省略音写,见宫崎市定:《条支、大秦与西海》(《亚洲史研究》卷 1,东洋史研究会,1957 年)

〔2〕所谓东突厥(北突厥)第一帝国的最后一个可汗,参阅《新、旧唐书·突厥传》。Ilig (Il-lig)-qaran 意为“保有国家之可汗”。

〔3〕《新唐书·西突厥传》亦作“封德彝”,《资治通鉴》据《实录》作“裴矩”。

〔4〕所谓“远交近攻政策”。“远交近攻”为秦范睢之言。

〔5〕真珠——古突厥语 yinčü 或 yenčü,[汉语]珍珠之音转。

〔6〕关于“莫贺咄”之原音,参阅《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 84 页注〔5〕)。“屈利”当为 köl 之音写。古米列夫以“俟”为意为“诸侯”之“侯”,其说误。此处与突厥语音写不相违,唯其原音不明。参阅古米列夫《古代突厥人》“大内讧”章。

〔7〕殿本作“昆”,不消说为“毗”(昆)之误写。

〔8〕关于弩失毕诸部落,参阅此传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

〔9〕缪勒(F. W. K. Müller)认为“泥孰(熟)”即回鹘文摩尼教文书所见 nïzük 之音写,其说尚非定说。

从。时统叶护之子咥力特勤避莫贺咄之难，亡在康居，[1]泥孰遂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2] 连兵不息，俱遣使来朝，各请婚于我。太宗答之曰："汝国扰乱，君臣未定，战争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许。仍讽令各保所部，无相征伐。其西域诸国及铁勒先役属于西突厥者，悉叛之，国内虚耗。

肆叶护既是旧主之子，为众心所归，其西面都陆可汗[3]及莫贺咄可汗部豪帅，多来附之。又兴兵以击莫贺咄，大败之。莫贺咄遁于金山，寻为咄陆可汗所害，国人乃奉肆叶护为大可汗。

肆叶护可汗立，大发兵北征铁勒，薛延陀[4]逆击之，反为所败。肆叶护性猜狠信谗，无统驭之略。有乙利[5]可汗者，于肆叶护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灭之。[6] 群下震骇，莫能自固。肆叶护素惮泥孰，而阴欲图之，泥孰遂适焉耆。其后设卑达干[7]与突厥弩失毕二

---

〔1〕康居为汉、魏时代占据锡尔河下游地区之游牧民族及其所建国家之名称。此处指索格底安那地区。关于索格底安那及其居民粟特人（胡），参照《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2页注〔5〕）。

〔2〕"钵罗"也许为"沙钵罗"之省略、išbara之音写。

〔3〕与后文咄陆可汗为同一人物，被认为指前文泥孰[莫贺设]。

〔4〕薛延陀——铁勒诸部族之一。参照《隋书·铁勒传》、《旧唐书·铁勒传》。外国有谓薛延陀为由突厥碑文所见sir及tarduš所成复合语sir－tarduš之音写，其说颇有影响，然此说实误。参阅小野川秀美：《铁勒之一考察》，载《东洋史研究》第5卷2期，1940年；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卷1所收，1967年）。

又，豪西希认为薛延陀为东罗马史料中所见Serinda之音写，其说不可从。又，豪西希有关突厥（不仅中亚、北亚）之说法谬误甚多，无批判地采用其说时需加谨慎。见豪西希：《塞奥菲拉克茨·埃克斯库尔斯论斯基泰族》及《有关欧洲阿哇尔人起源的史料》。

〔5〕乙利——似为ilig之音写。

〔6〕百衲本作"以非族灭之"，殿本作"以非罪族灭之"；《新唐书·西突厥传》百衲本、殿本均作"听谗种夷之"。《资治通鉴》作"肆叶护以非其族类，诛灭之"。

〔7〕殿本作"没卑达干"，《新唐书·西突厥传》百衲本、殿本亦作"没卑达干"，《资治通鉴》作"设卑达干"。达干之突厥原词tarqan为意为显官之汉语"达官"之突厥语音写，此词当系再次转译为汉语时写作"达干"。见护雅夫：《有关突厥帝国内部粟特人所起作用的一个资料——布古特碑文》。

部[1]豪帅潜谋击之,肆叶护以轻骑遁于康居,寻卒。

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咄陆可汗泥孰者,亦称大渡可汗。[2] 父莫贺设,本隶统叶护。武德中(618—626年),尝至京师。时太宗居藩,务加怀辑,与之结盟为兄弟。既被推为可汗,遣使诣阙请降,太宗遣使赐以名号及鼓纛[3]。贞观七年(633年),遣鸿胪少卿刘善因至其国,册授[4]为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5]

明年(634年),泥孰卒,其弟同娥设[6]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7]

沙钵罗咥利失可汗以贞观九年上表[8]请婚,献马500匹。朝廷唯厚加抚慰,未许其婚。

---

〔1〕原文"突厥弩失毕二部"应理解为"突厥、弩失毕两部落",沙畹即如此翻译。然据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弩失毕诸部落及都陆(咄六、咄陆)诸部落构成西突厥,则不当将突厥与弩失毕并列。《新唐书·西突厥传》此处作"弩失毕部"。据以上理由,原文可译为"突厥之弩失毕二部落",唯"二部"不可理解。似意为弩失毕五部落中之"二部"。原文此处之"突厥"或系"都陆(咄六、咄陆)"之误。

〔2〕大渡可汗——似为 Tarduš - qaghan 之音写。

〔3〕军中所用鼓及将军营所立大旗。

〔4〕册授——唐代任命三品以上官授予敕书之事,又,所授敕书亦称册授。与此相对,任命五品以上官曰"制授",任命六品以下官曰"敕授"。

〔5〕殿本作"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资治通鉴》据《实录》只作"奚利邲咄陆可汗"。"奚利邲"当系 iltäbär(俟利发)之音写,参照《隋书·西突厥传笺注》注(第83页注〔8〕)。"吞"似可认为与"暾"、"统"等语同为 ton 之音写,然不能确言。参照前面注(第89页注〔8〕)。

〔6〕同娥,古突厥语 toŋa 之音写,意为"豹"、"英雄",人名或称号,又用作人名或称号之一部分。

〔7〕咥利失,或系古突厥语表示"征集之事"之 tiriš 或 teriš 之音写。

〔8〕汉代奏疏分四类,其第三类称表,用于陈情。后来,上书均称表,对皇太子以下称"启"。

俄而,[1]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2]故称十箭焉。又分十箭为左右厢[3],一厢各置五箭。其左厢号五咄六[4]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其右厢[5]号为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号为十箭。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五咄六部落居于碎叶[6]以东,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以西,[7]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

咥利失既不为众所归,部众携贰,为其统吐屯所袭,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余骑拒之,战数合,统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8]设,与保焉耆。

其阿悉吉阙俟斤[9]与统吐屯等召国人,将立欲谷设[10]为大可汗,

---

[1]《新唐书·西突厥传》曰:"[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松山寿男氏曰:"'俄而'之用语不可照原样信从,又西突厥号称十姓部落,不可认为在贞观年间。"确实如松田寿男所指出:"西突厥枚举为十姓,限于现存有关记载,不见于唐代以前。"但是,集五部落而成之都陆(咄六、咄陆)与弩失毕之名称见于此前(见《旧唐书·西突厥传》开首之文及前文所云"弩失毕部共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然而从《旧唐书·西突厥传》开首之文对整个西突厥全部含糊不清之情形,不能提供都陆、弩失毕诸部落从西突厥初期起即已存在之证据,从前文所云"弩失毕部共推泥孰莫贺设"之文,则显然弩失毕诸部落至迟在失利咥可汗在位之前即已存在。《旧唐书·焉耆传》曰:"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不协,奔于焉耆",说明咄陆、弩失毕诸部落在咥利失可汗即位以前即已存在。关于西突厥分为十部落之时间,仍有必要探讨。

[2]关于部落或部族之首长持箭作为其地位之象征,目前可参照护雅夫:《关于"分与箭的故事"》。

[3]厢,意为"正堂两侧之部屋"、"正殿之东西壁"。此处左厢、右厢当分别为左翼、右翼之意。

[4]一译都陆、咄陆。

[5]殿本作"左厢"。百衲本作"右厢",是。

[6]碎叶——楚河之古名 Suy - āb 之音写,大致相当于今托克马克附近。尤其可参阅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前揭书所收)。

[7]松田寿男引用此段文曰:"此处谓碎叶为两部之边界,然后文谓沙钵罗咥利失、乙毗咄陆两可汗反目时,双方相约以伊列河(伊犁河)为界,又,突骑施(Türgiš)部确定碎叶为根据地以前,被报告居于伊丽水(伊犁河)。因此,问题中之西突厥二大群以伊丽河(今察林河所注入之伊犁河,古代渡河点)为界分为东西的看法是稳当的。"咄陆五部落驻地"在伊犁河流域,又自此直到北方的天山北麓地带",弩失毕五部落驻地"主要在碎叶地区及自此以西"地区。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前揭书所收)。

[8]步利,意为"狼"之突厥语 böri 之音写。

[9]"古"字为"吉"字之讹。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并作"吉"。关于"阿悉吉(结)阙俟斤",参照后文及《新唐书·突厥传》。(按:原文作"古",今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改之。)

[10]"欲谷",据克利亚什托内伊说为表示"珍贵物"之突厥语 yoquq 之音写,其说是。见克利亚什托内伊:《暾欲谷碑》,载克氏所撰《古突厥卢尼体碑铭》一书中。

以[咥]利失[1]为小可汗。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又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复得旧地,弩失毕、处密等并归咥利失。

[贞观]十二年(638年),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2]。乙毗咄陆可汗既立,与咥利失大战,两军多死,各引去。因与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3]以西属咄陆,以东属咥利失。[4]

咄陆可汗又建庭于镞曷山[5]西,谓为北庭。自厥越失、[6]拔悉弥、[7]驳马、[8]结骨、[9]火焊、[10]触木昆[11]诸国皆臣之。

[贞观]十三年(639年),咥利失为其吐屯俟利发[12]与欲谷设[13]通谋作难,咥利失穷蹙,奔拔汗那而死。

弩失毕部落酋帅迎咥利失弟伽那[14]之子薄布特勤而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15]

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既立,建庭于睢合水[16]北,谓之南庭。东以

---

[1]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咥利失"。

[2]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乙毗咄陆可汗"。

[3]即伊犁河。

[4]参照前文。沙畹举出3条理由,认为此处原文有误,咄六统治伊犁河以东(而非以西)地区,咥利失统治伊犁河以西(而非以东)地区。此为今后可探讨之问题。

[5]准确地点不明。

[6]似为部族名,此名不见于他处,不明其指何部族。

[7]相当于见于所谓突厥碑文中之 Basmil。720年时,占据以别失八里为中心之地区。参照《新唐书·回鹘传(下)》。

[8]即《新唐书·回鹘传(下)》之驳马,其现今的位置不能断定。

[9]唐代在多数场合下音写为"黠戛斯"。参照《新唐书·回鹘传(下)》。

[10]阿姆河下游之花剌子模,唐代音写为"火寻"。此处"火焊"似即指"火寻",其他不详。

[11]"触水昆"为"触木昆"之误,可能相当于见于后文之"处木昆",然不能断言(按:原文本作"触水昆",今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改之)。

[12]由于吐屯与俟利发为不同称号,此语组可认为是"吐屯及俟利发"之意,沙畹即如此翻译。但是,由于吐屯为对突厥统治下诸国之监察官、贡赋征收官(见前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俟利发表示部族长(见前文),此语组又可理解为"曾任吐屯的一个俟利发"。《资治通鉴》此处只记作"俟利发"。

[13]不消说即是前文之乙毗咄陆可汗。

[14]相当于《新唐书》之伽那设,参照后注。

[15]据《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在他之前曾立咥利失之子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此可汗第二年死去后,又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即位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资治通鉴》从《旧唐书》。

[16]《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虽合水",即今楚河。

伊列河为界，自龟兹、鄯善、[1]且末、[2]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3]何国、[4]穆国、[5]康国，皆受其节度。

累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6]慰勉。贞观十五年（641年），令左领军将军[7]张大师往授焉，赐以鼓纛。

于时咄陆可汗与叶护频相攻击。会咄陆遣使诣阙，太宗谕以敦睦之道。咄陆于时兵众渐强，西域诸国复来归附。未几，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咄陆可汗既并其国，弩失毕诸姓心不服咄陆，皆叛之。咄陆复率兵击吐火罗，破之。自恃其强，专擅西域。

---

〔1〕罗布泊以西之绿洲国。

〔2〕鄯善西南、塔里木盆地东南边之绿洲国，车尔成（Cherchen）。

〔3〕又曰碣石（Kesh），相当于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赫里夏勃兹。

〔4〕撒马尔罕以西之绿洲国。

〔5〕布哈拉西南、阿姆河南岸之绿洲国。

〔6〕盖有天子印之诏书。

〔7〕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及《资治通鉴》等均作“左领军将军”。此处“左右”二字为衍字（按：原文此处本有“左右”二字，今依作者意并结合中华书局点校本删去）。

遣兵寇伊州[1],安西都护[2]郭[孝]恪[3]率轻骑2000自乌骨[4]邀击,败之。咄陆又遣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5]郭[孝]恪又击走之。[孝]恪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6]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

---

〔1〕唐朝收服占据天山山脉东端伊吾(哈密)的粟特殖民集团。贞观四年(630年)在该地设置州,称为西伊州。六年(632年),改称伊州。

〔2〕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灭掉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将该地区以西州之名编入唐朝直辖领土,同年九月设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地。"显示唐朝对西域之势力者,有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前者维持对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国之霸权,监督哈密以西诸国,掌握交通、贸易。后者旨在制御金山以西、天山以北诸游牧部族,加以安抚及防御各游牧族之入侵。北庭都护府系则天武后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于天山北麓吉木萨尔之地庭州设置者"(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前揭书所收)。

在安西都护府管辖下设置四都督府,有所谓安西四镇。随着唐朝与西突厥、吐蕃等势力关系的变化,安西都护府及其四镇也有变动。松田寿男氏考虑到前人研究业绩,对其间事情详加探讨,得出结论大致如下:

(1)唐朝的势力于贞观十八年(644年)达到焉耆,接着于二十二年(648年)达到龟兹,安西都护府从高昌移驻龟兹。

(2)阿史那贺鲁发生叛乱后,于显庆三年(658年)被镇压(见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安西都护府又退回高昌。

(3)咸亨元年(670年)安西四镇为吐蕃攻陷,此时之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

(4)上元二年(675年),四镇中之少数或部分从吐蕃手中收复。最后,"咸亨元年吐蕃陷四镇,数年后次第收复"。

(5)由于调露元年(679年)裴行俭西征的结果(《新唐书·西突厥传》),王方翼筑碎叶城(今托克马克)。由于此,遂成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

(6)西突厥由于吐蕃之攻势,"不久,四镇之经营一度成为泡影,这一看法绝不武断"。

(7)在代替阿史那氏族西突厥之突骑施势力对碎叶镇的威胁下,碎叶镇名义上存在,但似乎仅能勉强维持。

(8)长寿元年(692年)收复安西四镇,此时之四镇为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9)由于突骑施,碎叶镇"基础动摇"。即,"唐与突骑施之关系,时战时和,反复进行,或放弃碎叶,或苦心支撑"。"就碎叶镇之安定度、维持力而言,似均较龟兹(安西)、于阗(毗沙)、疏勒三镇为弱。因此唐朝为不放弃镇守碎叶镇,让傀儡的突厥可汗尽力招抚十姓,再建西突厥可汗家族对碎叶之统治,不抛弃使之成为自家囊中之物的企望。于是,长安四年(704年),阿史那怀道册立为十姓可汗(见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阿史那献遂再次移居碎叶"。

(10)这样,开元七年(719年),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移驻碎叶,其结果使四镇成为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见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

〔3〕殿本也脱落"孝"字。

〔4〕似为位于高昌北方之山名。

〔5〕吐鲁番盆地西南角托克逊地区所设县名。

〔6〕乌鲁木齐北方之喀屯博格多敖拉。

咄陆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斩之以徇；寻为泥孰啜部将胡禄居[1]所袭，众多亡逸，其国大乱。

贞观十五年，部下屋利啜等谋欲废咄陆，各遣使诣阙，请立可汗。太宗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乙毗可汗之子，[2]是为乙毗射匮可汗。

乙毗射匮可汗立，乃发弩失毕兵就白水[城][3]击咄陆。[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

中国使人先为咄陆所拘者，射匮悉以礼资送归长安，复遣使贡方物，请赐婚。太宗许之，诏令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4]葱岭[5]等五国为聘礼。[6] 及太宗崩，贺鲁反叛，射匮部落为其所并。

阿史那贺鲁者，曳步利设射匮特勤之子也。初，阿史那步真[7]既来归国，咄陆可汗乃立贺鲁为叶护，以继步真，居于多逻斯川，[8]在西

---

[1]殿本也作"胡禄居"，《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均作"胡禄屋"，看来是"胡禄屋"正确。

[2]《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资治通鉴》作莫贺咄之子，胡三省注曰：此莫贺咄即统叶护可汗之伯父、杀统叶护而自立为莫贺咄候屈利俟毗可汗者也(见前文)。

[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曰："呾罗斯城(Talas，Tārāz，奥利埃—阿塔，今江布尔市附近)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沙畹据穆斯林史料将白水城比定为伊斯非札卜(Isfījāb)。《新唐书·西突厥传》称此城为"白水胡城"，可见此城为粟特人(胡人)所建殖民城市。

[4]在和田西北、叶尔羌之南，即在西域南道上之绿洲国喀尔噶里克(Karghalik)。

[5]葱岭，一般指帕米尔而言。文中此处为唐代所置葱岭镇(守捉)所在，指帕米尔东南部色勒库尔溪谷中之塔什霍尔罕(Tashkurgan)。

[6]松田寿男氏曰：此处之文为"将此五国赠给西突厥可汗，使其有对此五国干涉权"之意。但我同意沙畹理解为"将此五国从西突厥割让给中国"之意。只能这样认识是因为正如松田氏所说："唐朝焉耆以西之商路直到[发生此事件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止，并无已从政治上加以控制的证据"，"其时仅有安西府，尚无四镇存在的明证"。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7]参照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

[8]多逻斯可认为是Talas(Tārāz)之音写。但沙畹认为：①Talas习用译写文字作怛，不作多；②怛逻斯川与城在西州之西，而后文曰：多逻斯在西州之北；③阿史那贺鲁统治之处密、处月、歌逻禄诸部族驻地在吐鲁番之北——根据以上理由，此处之多逻斯川相当于喀喇额尔齐斯河。又，后文"弩失毕"为东部"咄陆"之误。关于此点，今后似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但据松田寿男氏云：中国史料中所见"川"字与其说意为河流，不如说表示平原。见松田寿男：《碎叶路考》(前揭书所收)。

州直北1500里，统处密、[处月]、姑苏、[1]歌罗禄、[弩]失毕[2]五姓[3]之众。其后，咄陆西走吐火罗国，射匮可汗遣兵迫逐，贺鲁不常厥居。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乃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庭州。[4]寻授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高宗即位(649年)，进拜左骁卫大将军，瑶池都督如故。

永徽二年(651年)，与其子咥运率众西遁，据咄陆可汗之地，总有西域诸郡，[5]建牙于双河[6]及千泉[7]，自号沙钵罗可汗，统摄咄陆、弩失毕十姓。

其咄陆有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阙啜，贺鲁以女妻之；三曰摄舍提暾啜；四曰突骑施贺逻施啜；五曰鼠尼施处半啜。弩失毕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结阙俟斤，最为强盛；二曰哥舒阙俟斤；三曰拔塞干暾

[1]此"姑苏"，据冯承钧指出，可能与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见"哥舒"为同一部族名。见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

[2]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均有"处月"、"弩"3字。

[3]此处"五姓"不知是指处密、处月、姑苏、歌罗禄作为四姓加上弩失毕五部落作为一姓，还是指弩失毕五部落作为五姓。又，如前所述，沙畹认为"弩失毕"系"咄陆"之误。

[4]在天山北麓吉木萨尔以北五里，突厥语称为别失八里。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设北庭都护府于此。

[5]殿本也作"郡"，似为"部"字之误。

[6]伊犁河东面之博罗塔拉河。

[7]参照《隋书·西突厥传笺注》(第83页下注[6])。

沙钵俟斤;四曰阿悉结泥孰俟斤;五曰哥舒处半俟斤。[1] 各有所部,胜兵数 10 万,[2] 并羁属贺鲁。西域诸国,亦多附隶焉。

贺鲁寻立咥运为莫贺咄叶护,数侵扰西蕃诸部,又进寇庭州。[永徽]三年(652 年),诏遣左武候大将军[3]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燕然都护[4]所部回纥兵 5 万骑讨之,前后斩首 5000 级,虏渠帅 60 余人。

[永徽]四年(653 年),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5]与五弩失毕请击贺鲁,破其牙帐,斩首千余级。[6]

---

[1]此处之处木昆、胡禄居(屋)、摄舍提、突骑施、鼠尼施、阿悉结、哥舒、拔塞干,均当视为部族名。因而,本文之五啜、五啜斤,似可译为"处木昆部之律啜"、"胡禄居(屋)部之阙啜"、"阿悉结部之阙俟斤"、"哥舒部之阙俟斤"等。原文为行文简洁而记述如上。"胡禄居"为"胡禄屋"之误,参照第 97 页注[1]。斯米尔诺娃认为处木昆为穆斯林史料中所见氏族名哲木勤(Jamūkīn)之音写,见奥·伊斯米尔诺娃:《突厥学札记》,载《东方国家和民族》第 11 卷,莫斯科,1971 年。松田寿男氏同意沙畹的说法,将处木昆部驻地比定于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南、注入阿拉之额敏河流域,即塔城地区。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前揭书所收)。

胡禄屋部之原名不明。据松田寿男曰:《新唐书》"西突厥传"、"地理志"所记正确,其驻地不可不比定于 Ebin Gesun nor 以南。见其《弓月考》。

摄舍提之原名不明。松田寿男认为《新唐书》之比定不误,不可不求其驻地于博罗塔拉河。见其《弓月考》。

突骑施,突厥碑文中所见 Türiš 之音写。据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说,突骑施乘阿史那氏族势衰而勃兴,统治西突厥诸部及其领域内之粟特人居留地。当其势力扩大后,他们将牙帐迁至碎叶川地区,在此以前,他们据有碎叶川地区东北之伊犁河上中游盆地。

鼠尼施之原名不明。据松田寿男曰:"鼠尼施部驻于鹰娑川即大裕尔都斯溪谷,殆无疑也。"见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

阿悉结(吉)、哥舒、拔塞干三部族驻地不明。土耳其学者 B·宛格勒将阿悉结比定为突厥碑文中所见之 Izgil,其说余未赞从。哥舒,可认为相当于突厥碑文所见之 Qošu。又据《旧唐书·哥舒翰传》:"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可知哥舒翰出身于此哥舒部落。不过由此"可见弩失毕部之哥舒与咄陆部之突骑施有较深关系,当然,此非其后突骑施勃兴、南迁时代之事。"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又,松田寿男曰:"咄陆部所属五姓之名,在现存史书上有明白记载,弩失毕五姓,仅知前述阿悉吉、拔塞干、哥舒三部名,其余不详","在阿悉结、哥舒两部之强势荫庇下","五弩失毕部中亡失于历史记载之二姓"中之一姓,实为驻于从伊塞克湖起以至纳伦河谷地区之弓月部。见其《弓月考》。又,关于咄陆五部与弩失毕五部之边界及其驻地,参阅第 93 页注[7]。

[2]原文"各有所部胜兵数十万、并羁属贺鲁",也可译为"各拥有所支配下的精兵数十万,全都服属于贺鲁"。作者译作:"各拥有支配下的部众,精兵共数十万,全都服属于贺鲁。"此即沙畹之理解,冯承钧所依从者。

[3]殿本、《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左武卫大将军"。

[4]参照《新唐书·突厥传》。

[5]殿本也作"真珠护",据《新唐书》(百衲本、殿本)可知脱落"叶"字。

[6]《新唐书·西突厥传》有"为贺鲁所拒,不得前"之语(疑有误)。似应从《旧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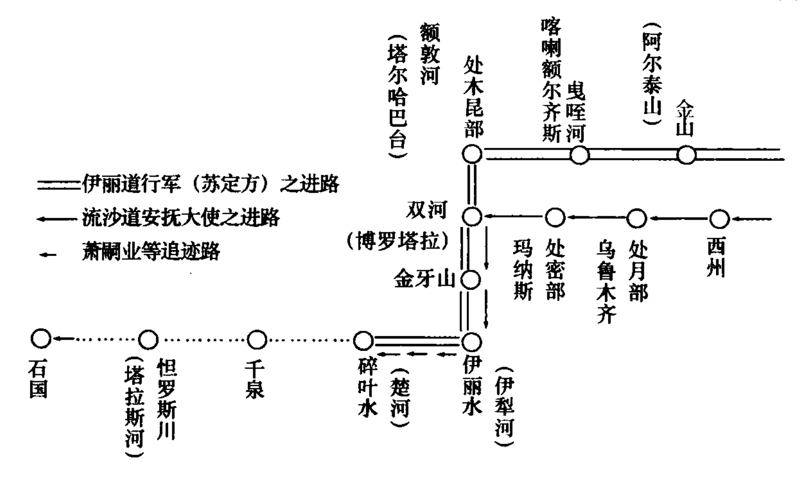
显庆二年(657年),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率师讨击,仍使右武卫大将军[1]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2] 定方行至曳咥河[3]西,贺鲁率胡禄居阙啜[4]等二万余骑列阵而待。定方率副总管任雅相[5]等与之交战,贼众大败,斩大首领都搭达干等二百余人。贺鲁及阙啜轻骑奔窜,渡伊丽河,兵马溺死者甚众。

[萧]嗣业至千泉贺鲁下牙之处,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率众来降。弥射又进次双河,贺鲁先使步失达干鸠集散卒,据栅拒战。弥射、步真攻之,大溃;又与苏定方攻贺鲁于碎叶水,[6] 大破之。

---

〔1〕《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右屯卫大将军"。

〔2〕以下征讨阿史那贺鲁战役之经过,两唐书《西突厥传》、《苏定方传》记载最详。但由于史料混乱,难以了解真相。"此次战役就其原貌而言,①作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的苏定方统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及瀚海都督回纥婆闰(回纥人)等的行军。②被任命为流沙道安抚大使的阿史那弥射(后来的兴昔亡可汗)及阿史那步真(后来的继往绝可汗)[见后文及《新唐书·西突厥传》]的行军。③对阿史那贺鲁加以彻底打击后,脱离本军尾追、将贺鲁虏获的萧嗣业及回纥婆闰的进军。共包含以上三个军事行动。不顾这些,两唐书对三个军事行动未加认真区别。只在书桌上收集起来的资料几乎不管如何加以批判也不能做到过分恰当。"(松田寿男前揭论文)对这些史料行细分析研究,努力使"此次大剿捕战役之全貌呈现出来",得出了如下图示的结论:



〔3〕今喀喇额尔齐斯河,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4〕应作"胡禄屋"。

〔5〕百衲本作"左雅相"不消说,为"任雅相"之误。

〔6〕今楚河。

贺鲁与咥运欲投鼠耨设，至石国之苏咄城[1]旁，人马饥乏，城主伊涅达干[2]诈将酒食出迎，[3]贺鲁信其言入城，遂被拘执。萧嗣业既至石国，鼠耨设乃以贺鲁属之。[4]

贺鲁谓嗣业曰："我破亡虏耳！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败，天怒我也。旧闻汉法，杀人皆于都市，[5]至京杀我，请向昭陵，[6]使得谢罪于先帝，是本愿也。"高宗闻而愍之。及俘贺鲁至京师，令献于昭陵及太庙，[7]诏特免死。

分其种落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8]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9]

[显庆]四年(659年)，贺鲁卒。诏葬于颉利[10]墓侧，刻石以纪其事。

---

[1]沙畹据穆斯林史料记载，认为此城相当于塔什干附近之舒图尔喀斯，松田寿男从其说。见松田前揭论文。

[2]《资治通鉴》作"伊沮达干"，《旧唐书》殿本及《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伊涅达干"。阻、沮为涅之误。沙畹认为"伊涅"为意为"弟"之突厥语 ini 之音写。余认为此词似为突厥可汗等所用称号 inäl 之音写。

[3]殿本作"许"，许为诈之讹写。

[4]松田寿男氏为显示其分析、考证结果，作成唐征讨阿史那贺鲁军之进路图，兹转载于前。参照松田前揭论文。

[5]都会之商业地区，尤其是商店栉比的繁荣区。

[6]在陕西省醴泉县东北约25公里之九嵕山。

[7]天子之祖庙。

[8]详见《新唐书·西突厥传》。

[9]参照前文。

[10]指颉利可汗，即所谓东突厥(北突厥)第一帝国最后一位可汗。关于其死去，参照两唐书《突厥传》。

阿史那弥射者，室点密可汗[1]五代孙也。初，室点密从单于[2]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

---

〔1〕又写作室点蜜、瑟帝米（见《新唐书·西突厥传》）。所谓突厥碑文中有云："当上方蓝天、下方暗地创造时，两大间亦造成人类之子孙。人类子孙之上，坐有我祖宗 Bumin（土门）可汗及 Istämi 可汗"。室点密即 Istämi 之音写。在东罗马史料中.他被称做 silziboulos、Dizaboulos 等名。上揭突厥碑文中之 Bumin 可汗，指突厥国家的创建者伊利可汗（本名土门、吐门），silziboulos 为其弟，并应为达头之父。松田寿男推测说："诚然，《阙特勒碑》、《仳伽可汗碑》[属于所谓突厥碑文之列]所示室点密可汗之名，与土门可汗同为突厥国最初君主。但是两碑建立于唐贞观时代一百年以后之开元时代，铭文明示两可汗为'我祖先'。大概，据碑所载，这只不过是东西两突厥分裂以后，采取了从称两者有共同祖先之观念或称两者有同等地位之主张所产生的说法罢了。""要之，室点密可汗即突厥碑文 Istämi 可汗之名，唐初以前所有中国人丝毫不知，大概是分裂后突厥人想出的传说君主之名。因而他的事迹、系谱不可信。西突厥从唐贞观二年（628 年）统叶护可汗死后，国内统治逐渐崩坏，陷于乱离状态。这时取得中国援助，设谋划策之阿史那弥射（后来在唐朝被册立为带有中国式可汗号的兴昔亡可汗）或阿史那贺鲁，当时将在突厥族中被认为西突厥始祖的室点密可汗与自己的血统相结合，作为承认自己为正统的一个手段出现之时，遂有了不外乎两唐书上有关室点密的说法。"这样，松田假定"唐史所载室点密（瑟帝米）可汗即 Istämi 可汗"，"似为传说上之名称"，并得出"似为伊利可汗（土门）之弟、达头可汗之父的可汗之名不可求之于米南德笔下之 silziboul（silziboulos）"的结论。见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前揭书所收）。

又，内田吟风对于突厥碑文之 Istämi 可汗相当于室点密，Būmin 可汗相当于伊利可汗的通说持有怀疑，他说："因为碑文所记为人类创世期之事，将 Būmin、Istämi 比定为现实的第 6 世纪的可汗土门、室点密实为不可能之事。又，Būmin，土门（伊利）两名称间对音不同，如何能视为同一。西突厥之室点蜜作为大人物并非突厥本部之可汗，只不过是叶护[根据后文"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句]。何况东西两突厥进入敌对关系后，在所建东突厥系复兴突厥的碑文中没有记颂西突厥始祖室点蜜的道理。总而言之，碑文中之 Būmin，Istämi 为神话传说上之始祖，与此相对，第 6 世纪时征服中亚诸国之室点蜜，仿照始祖之名而称 lstämi 者，不过是一个叶护。"见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一）》。

余尤其从所谓突厥碑文的建立之事及其性质考虑，对松山、内田两氏的说法大有怀疑，此处仅介绍两氏之说，余将于另有机会时发表个人意见。

〔2〕内田吟风将此句读作"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他根据豪西格的说法，认为此处"单于"为 targüt 之音写，此句文似为"室点蜜扫除哌哒、柔然在西突厥斯坦之势力，与单于即拜占庭史料所云 targüt 率领之匈人（西迁之匈奴）余众合并，树立庞大势力"时之事。见内田吟风前揭论文。但此处余认为应如沙畹、松田寿男译作"服从单于"。松田氏关于此处所见"单于"说："众所周知，单于为匈奴之王号，突厥无此称号，茹茹（蠕蠕）、铁勒、突厥等匈奴以后主要北方游牧国的主权者全都称可汗。因此文中单于二字明示此句全系可疑之传说。"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但中国历史家于匈奴国家崩溃后，多称北亚诸游牧国家为"匈奴"，称其君主为"单于"，故此处之"单于"无妨读之为"可汗"。沙畹也如此认为，他说：此处之单于"无疑指室点密之兄土门可汗"。但是，室点密独力征服中央亚细亚，并不服从土门。又，本文所谓"十大首领"、"兵十万众"中之"十"，松田氏指出似与"十姓部落"之"十"有关。余也认为此句文未能如实记载事实。

统其众。弥射在本蕃[1]为莫贺咄叶护。

贞观六年(632年),诏遣鸿胪少卿刘善因就蕃立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以鼓纛、彩帛万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为可汗,遂谋杀弥射弟侄20余人。弥射既与步真有隙,以贞观十三年(639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授右监门大将军。其后步真遂自立为咄陆叶护,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复携家属[2]入朝,授左屯卫大将军。

弥射后从太宗征高丽有功,封平襄县伯。显庆二年(657年),转右武卫大将军。及讨平贺鲁,乃册立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分押贺鲁下五咄六[3]部落;步真授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仍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因下诏曰:"……[从略]"

龙朔中(661—663年),又令弥射、步真率所部从䬃海道大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尝欲并弥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弥射欲谋反,请以计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悬师在弥射境内,遂集军吏而谋曰:"弥射若反,[4]我辈即无噍类。今宜先举事,则可克捷。"乃伪称有敕,令大总管赍物数百万段分赐可汗及诸首领。由是弥射率其麾下,随例请物,海政尽收斩之。其后西蕃盛言弥射非反,为步真所诬,而海政不能审察,滥行诛戮。

则天临朝(684年),十姓无主数年,[5]部落多散失。垂拱(685—688年)初,遂擢授弥射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寻进授元庆左卫大将军。如意元

---

[1]本蕃,此语也出现于此后之文中,可理解为与"本藩"同义,只可译为"本国"。松田寿男、内田吟风两氏均将"本蕃"理解为"本国"。见松田:《碎叶与焉耆》及内田前揭论文。

[2]沙畹将"复携家属"与"扶老携弱"相比较,说:此处"复"与"扶"同义。

[3]又音写作"咄陆"、"都陆"

[4]殿本作"弥射欲反"。

[5]前条所述之苏海政军队归国(662年)后,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在西突厥纠集余众与吐蕃联合。唐朝于咸亨二年(671年)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廷都督。阿史那都支自号十姓可汗(西突厥之可汗),与李遮匐一同联合吐蕃人寇安西。唐朝派遣裴行俭用计擒获他们。此为调露元年(679年)之事,由此可知本文所谓"十姓无主数年"似指679年至684年之间数年。关于阿史那都支、李遮匐,参照《新唐书·西突厥传》。但是,永淳元年(682年)有阿史那车簿之反叛,他与安西都护王方翼所率军队战于伊丽水、热海,败。

年(693年),为来俊臣诬谋反被害。其子献,[1]配流崖州。[2] 长安三年(703年),召还。累授右骁卫大将军,袭父兴昔亡可汗,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献本蕃渐为默啜[3]及乌质勒[4]所侵,遂不敢还国。开元中(713—741年),累迁右金吾大将军。卒于长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卫大将军。与弥射讨平贺鲁,加授骠骑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寻卒。其子斛瑟罗,本蕃为步利设,垂拱(685—688年)初,授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天授元年(690年),拜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赐濛池都护。寻卒。子怀道,神龙年(705—707年)累授右屯卫大将军、光禄卿,转太仆卿兼濛池都护、十姓可汗。[5]

自垂拱以后,十姓部落频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尽。及随斛瑟罗才六七万人,徙居内地,[6]西突厥阿史那氏于是遂绝。

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为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众皆畏之;[乌质勒]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都督20员,各统兵7000人。尝屯聚碎叶

[1]关于阿史那献之生涯、事迹之其他,尤其可参阅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第三节《十姓可汗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

[2]海南岛北岸之地名。《新唐书》作"振州"、则在海南岛南岸。

[3]所谓东突厥(北突厥)第二帝国之第二代可汗。突厥碑文中称作 Qapγan 可汗。以往此可汗号通常读作 Qapγan 可汗,最近以读作 Qapγan 的说法为有力。参阅两唐书《突厥传》。

[4]突骑施之君主,突骑施的势力在他的时代有惊人的发展。

[5]松田寿男注意到此处所谓"濛池都护"之官名,他说:"此官职原为继住绝可汗兼领,意味着他是陷没于突骑施的弩失毕五姓的首领。统治十姓中半数之此可汗,此时拥有十姓可汗之号。其时唐朝之册立十姓可汗,始终有坚持对抗突骑施之目的,可以说是唐朝树立的对抗势力。可是唐朝第一次树立的对抗势力[阿史那怀道]完全失败了,于是又册立阿史那献以代替他。"见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前揭书所收)。为帮助读者理解,根据松田氏的论著,列出唐朝保护下的西突厥可汗系谱如下:①对五咄陆部之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元庆—献(第二代十姓可汗)。②对五弩失毕部之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斛瑟罗—怀道(第一代十姓可汗)—昕(第三代十姓可汗)。

[6]据松田寿男认为在天授元年(690年),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1] 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2]相接，东南至西、庭州。[3]

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景龙二年（708 年），诏封为西河郡王，令摄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册立。未至，乌质勒卒。其长子娑葛代统其众，诏便立娑葛为金河郡王，仍赐以宫女 4 人。初，娑葛代父统兵，乌质勒下部将阙啜忠节[4]甚忌之，以兵部尚书宗楚客当朝任势，密遣使赍金 700 两以赂楚客，请停娑葛统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充使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游兵所获，遂斩嘉宾，仍进兵攻陷火烧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

景龙三年（709 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讨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两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默啜顾谓遮弩曰："汝于兄弟尚不和协，岂能尽心于我。"遂与娑葛俱杀之。默啜兵还，娑葛下部将苏禄鸩集余众，自立为可汗。苏禄者，突骑施别种也。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之地，寻遣使来朝。开元三年（715 年），制授[5]苏禄为左羽林军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为特勤，遣侍御史解忠顺赍玺书册立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

上乃立史怀道[6]女为金河公主[7]以妻之。时杜暹为安西都护，

---

〔1〕《新唐书·西突厥传》：乌质勒"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为小牙。"碎叶川谓托克马克周围之平原，伊丽水谓伊犁河与 Chiyarin 河合流点。松田寿男：弓月城即"伊犁九城之地"，"从历史沿革可比拟于固尔札附近，似可寻求于蒙古帝国时代伊犁之中心都市、繁荣之阿力麻里（阿里马）城之同一地区内"。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前揭书所收）。

〔2〕松田寿男注意到此段文中二次出现"诸胡"，从这一事实，他认为突骑施的发展"是由于伊犁河盆地与西突厥斯坦的商业关系而得以实现，又，弓月城和碎叶城也是由于那样的商业关系而出现，可视为市场城市"。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3〕百衲本作"东至西南庭州"，殿本作"东南至西庭州"，《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东至西庭州"。西州即吐鲁番，庭州即吉木萨尔（别失八里）。

〔4〕《旧唐书·宗楚客传》作阿史那忠节，《郭元振传》作阿史那阙啜忠节，因此可认为忠节出身于阿史那氏。

〔5〕唐代任命五品以上、[四品以下官]所用敕书曰制授。

〔6〕指阿史那怀道。

〔7〕《新唐书·西突厥传》作"交河公主"。

公主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与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岂合宣教与吾节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马经雪寒,死并尽。苏禄大怒,发兵分寇四镇。会杜暹入知政事,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城守久之,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1]仅全。苏禄既闻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献方物。

[开元]十八年(730年),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2]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赍而遣之。

苏禄性尤清俭,每战伐,有所克获,尽分与将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于苏禄。既以三国女[3]为可敦,又分立数子为叶护,[4]费用渐广,先既不为积贮,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有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度[5]两部落,最为强盛。百姓又分为黄姓、黑姓两种,互相猜阻。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夏,莫贺达干勒兵夜攻苏禄,杀之。[6]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立苏禄之子咄火仙为可汗,以辑

---

[1]指龟兹。

[2]开元十一年(723年)改称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分掌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庶务。

[3]指北突厥、吐蕃之女,加交河公主共3人。可敦,意为皇妃之突厥、蒙古语。

[4]百衲本作"分立数子叶护",殿本作"分立数子为叶护",《新唐书》(百衲本、殿本)作"以数子为叶护"。

[5]《新唐书·西突厥传》作"都摩支"。

[6]当时阿拉伯势力大致已完成对粟特地区的入侵,据穆斯林史料,"突厥之一可汗"与被称为 dihqān 之地方豪族联合,抵抗阿拉伯人,使他们遭到很大损失,因此,他们被称为阿布·穆咱希木,也就是"攻击者"、"头上出角的象或牡牛"。此突厥可汗一般而言与苏禄的事相符。据穆斯林史料所记,此"突厥可汗"为库尔苏勒所杀,而据中国史料,如本文所述,杀害苏禄者为莫贺达干。马迦特及沙畹认为上述库尔苏勒为阙啜之阿拉伯语形态,为莫贺达干所戴之称号。余对此说法并无立异之意图,但认为中国史料与穆斯林史料之比较研究,有慎重结合考虑之必要。

其余众，与莫贺达干自相攻击。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1]盖嘉运，嘉运率兵讨之，大败都摩度之众，临阵擒咄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还。又欲立史怀道之子昕为可汗以镇抚之，莫贺达干不肯，曰："讨平苏禄，本是我之元谋，若立史昕为主，则国家何以酬赏于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贺达干统众。二十七年二月，嘉运率将士诣阙献俘，玄宗御花萼楼以宴之，仍令将咄火仙献于太庙。俄又黄姓、黑姓自相屠杀，各遣使降附。

（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2卷，东京，1979年，第208～259页。）

[1]《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七年七月"条作"北庭都护"。松田寿男氏曰："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唐朝面对与突骑施作进退两难之决战之重大事态，不能克服难局，遂将安西、北庭两都护合并，从而将安北四镇节度与伊西北庭节度两使合并为一人兼掌，委任盖嘉运掌此大任。"见松田寿男：《碎叶与焉耆》（前揭书所收）。

11 《新唐书·西突厥传》笺注

〔日〕护雅夫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6055页8～10行]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1] 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曰室点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2] 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3]有之,东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师北7000里,由焉耆西北7日行得南庭,北[4] 8日行得北庭,与都陆、弩失毕、歌逻禄、处月、处蜜、伊吾诸种杂。

[6055页12行～6056页2行]初,东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弟佗钵可汗。[5] 佗钵死,先令戒其子菴罗必立大逻便,国人以其母贱,不肯立,而卒立菴罗。菴罗后以让木杆兄子摄图,是为沙钵略可汗。而大逻便别为阿波可汗,[6]自臣所部,沙钵略袭击之,杀其母,阿波西走达头。当是时,达头为西面可汗,即授阿波兵十万,使与东突厥战。而阿波竟为沙钵略[7]所擒。[8] 及启民可汗时,达头可汗岁以

〔1〕关于此处所见系谱之可疑,参照松田寿男:《西突厥王庭考》(《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收)。

〔2〕参照《隋书》铁勒、突厥传,《北史》突厥传。“步迦”意为“贤明”之突厥语 bilgä 或与其大致同义之 bögü 之音写。

〔3〕嶋崎昌认为此“乌孙故地”即“汉代乌孙之实际驻地”,“大致在天山以北,从伊犁地区至准噶尔地区方面”。见嶋崎昌:《可汗浮图城考(上)》(载《东洋学报》46卷2期,1963年)。

〔4〕《旧唐书》在此“北”字前有“又”字,《通典》在“北”字前有“南庭”。嶋崎昌补充《通典》所记,正确理解为“由焉耆北八日行”。根据松田寿男,以“南庭”在库车北方之裕尔都斯溪谷,比定“北庭”为可汗浮图城,并将此可汗浮图城之位置求之于吉木萨以东之古城。见嶋崎昌:《可汗浮图城考(上)(下)》(载《东洋学报》49卷2、3期,1963年)。

〔5〕过去一直以佗钵可汗为 Tabar(支配)可汗之音译。此可汗被认为相当于粟特语碑文中所见之 Taspar 可汗。见护雅夫:《有关突厥帝国内部粟特人所起作用之一资料》。

〔6〕阿波为 apa 之音写,apa 为表示“长老”之突厥语。

〔7〕正确而言,擒阿波者为沙钵略可汗之弟、继承他即位之叶护可汗(莫何可汗)。

〔8〕以上过程参照《隋书·突厥传》、《北史·突厥传》。

兵相加,而隋常助启民,故达头败奔吐谷浑[1]。

[6056 页 13 ~ 14 行]明年,射匮[2]使使来,以曷萨那有世憾,请杀之。

[6057 页 1 ~2 行]射匮[3]亦连年系贡条支巨卵、狮子革等。

[6058 页 3 ~5 行][肆叶护死,]国人迎泥孰于焉耆,立之,是为咄陆可汗……[父]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设。[4]

[6058 页 9 行 ~6059 页 1 行]咄陆可汗死,弟同俄设立,是为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然不为众悦赖,其部统吐屯以兵袭之,咥利失率左右战,统吐屯不胜去。咥利失与其弟步利设奔焉耆……后西部卒自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而与咥利失交战,杀伤不可计,乃因伊列河约诸部:河以西受令于咄陆,其东咥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国矣。[5]

[6059 页 4 ~6 行]弩失毕大酋迎伽那设之子毕贺咄叶护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太宗诏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册命,赐鼓纛,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东薄伊列河,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6]

[6059 页 9 行]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自乌骨[7]狙击,败之。

[6059 页 12 行]遂与共攻康居,道米国。[8]

---

[1]参照《隋书·突厥传》、《北史·突厥传》。

[2]据《旧唐书·西突厥传》及沙畹所指出,"射匮"为"始毕"之误。

[3]据《旧唐书·西突厥传》及沙畹所指出"射匮"为"统叶护"之误。

[4]如沙畹所已指出者:此处谓伽那设即泥孰,为后文沙钵罗咥利失之兄,《旧唐书·西突厥传》却以伽那为咥利失之弟。两唐书《西突厥传》有关可汗、首领之系谱,于此可见其记述混乱之一例。

[5]咥利失可汗及其兄奚利邲咄陆可汗(泥孰)与焉耆有密切关系,唐朝为之后援,与此相对,乙毗咄陆可汗(欲谷设)与高昌联合,关于前前后后复杂情况,参照嶋崎昌前揭论文及《关于唐朝征讨高昌之原因》(载《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科四,1958 年)。

[6]嶋崎昌根据本条记事指出说:"可见此可汗之统治及于伊犁河以南之天山至塔里木盆地(以焉耆为其东端)以及西突厥斯坦、阿富汗的北部。"见嶋崎昌前揭论文。

[7]有认为此即 Oghuz 的说法,但如此断定尚有慎重探讨之必要。

[8]撒马尔罕(康国)及其南面碣石(史国)中间的 Maimarg。

［6059 页 14 行］度叶水[1]，及石国，左右亡去略尽，乃保可贺敦城[2]。

［6060 页 9～10 行］有执舍地、[3]处木昆、婆鼻[4] 3 种者。

［6061 页 12～13 行］愿发射脾、处月、处蜜、契苾等兵，赍一月食，急趋之，大军住凭洛水上为之景助[5]……今胡[6]骑出前，唐兵蹑后。

［6062 页 1～5 行］永徽四年（653 年），罢瑶池都督府……是岁（653 年），咄陆可汗死……明年（654 年）[7]［程］知节击歌逻禄、处月……会副总管王文度不肯战，降怛笃城，[8]取其财，屠之。

［6062 页 7～8 行］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9]，俟斤嬾独禄[10]等万余帐迎降。

---

〔1〕沙畹认为此"叶水"为"碎叶水"之略称，可比定为楚河，斯米尔诺娃从之。见斯米尔诺娃：《突厥学札记》。

〔2〕斯米尔诺娃将此"可贺敦城"比定为穆斯林史料所记载的锡尔河支流奇尔奇克河北面的可敦喀斯（"可敦城"）。见斯米尔诺娃：《突厥学札记》。

〔3〕沙畹认为此部似即两唐书《西突厥传》所见咄陆五部落中之"摄舍提"部。

〔4〕沙畹说此部族名不见于别处，或系"娑鼻"之误，可能相当于后文之"射脾"。但即便"射脾"也情况不明。岑仲勉认为此系"（弩）失毕"之同音异写，然未确言。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5〕松田寿男认为凭洛水殆即从吐鲁番西北之天山山脉东部之高峰博格多敖拉北坡流出之察罕乌苏河。又，他说上文所见诸部族"散居于博格敖拉山北侧至额连哈比尔尕山北麓"。见松田寿男：《卑陆国、郁立师国及其他》（前揭书所收）。又，根据此文，这些部族均服属唐朝势力。关于事态必然成为如此，参照松田寿男：《论唐代庭州之领县》（前揭书所收）。

〔6〕在此场合下之"胡"，并非粟特人，而系指广义之"戎狄"。

〔7〕应作显庆元年（656 年）。

〔8〕《旧唐书·高宗本纪》"显庆元年九月"条、《苏定方传》作"恒笃城"，《旧唐书·程知节传》，《新唐书·高宗本纪》同条、《苏定方传》、《程知节传》等均作"怛笃城"。

〔9〕松田寿男根据其他史料，认为"分出金山道""似可断定系'分出西州、金山两道'不留意地削去'西州'、'两'三字所成"。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前揭书所收）。

〔10〕《旧唐书·苏定方传》作"嬾独禄"，据同传，他是处木昆部俟斤（部长）。

[6062 页 12 ~ 15 行][苏]定方命[萧]嗣业、婆闰趋邪罗斯川[1]追虏,任雅相提降兵踵后……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2]

[6063 页 1 行][萧]嗣业次千泉,弥射至伊丽,[3]处月、处蜜诸部皆下。

[6063 页 9 ~ 10 行]贺鲁已灭,裂其地为州县,以处诸部。[处]木昆[4]部为匐延都督府,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为嗢鹿都督府,突骑施阿利施部为絜山都督府。[5]

[6064 页 6 行]思结[6]都曼率疏勒、朱俱波、[7]喝槃陀[8] 3 国叛。

[6064 页 11 行]咸亨二年(671 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9]以安辑其众。[10]

[6064 页 11 ~ 15 行]仪凤中(676—679 年),都支自号十姓可汗,与

---

〔1〕据《旧唐书 · 西突厥传笺注》(第 100 页注〔2〕)之图示,松田寿男认为此"邪罗斯川"指"多逻斯(Talas)川"。但岩佐精一郎认为此"邪罗斯川"相当于突厥碑文中景云年间(710—711 年)突骑施的重要地方 yarišyazi(邪利施原野),其地在碑文中为东突厥军越过阿尔泰山脉、渡过喀拉额尔齐斯河所攻入的突骑施住地,从其地为敌方十万军集结之地看来,"可认为是接近博罗塔拉方面突骑施根据地的重要地方","这一比定若能成立,此条记事[即本文之叙述]并无[如松田氏所认为]转入千泉条后之必要"。岑仲勉未说明理由,将 yarišyazi 译作邪罗斯平原。松田寿男认为岩佐氏的说法"确实正确,余不惜遵从其说",大致认为:①本条记事所记为追击军的情况。②据《旧唐书 · 回纥传》所记:"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至邪罗川,贺鲁西奔石国","不如说两唐书编者误以多罗斯为邪罗斯,或将两名混同使用,无论如何存在有可疑的段落。"将自己的说法让了步。见岩佐精一郎:《论突厥之复兴》,《岩佐精一郎遗稿》下册,上海,1963 年;岑仲勉:《突厥文碑注释》,《突厥集史》下册,上海,1958 年;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2〕据松田寿男认为,金牙山为双河出固勒札等为中心之所谓"伊犁九城"之地的重要关隘,似乎也写作弓月城。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3〕至伊丽,《旧唐书 · 西突厥传》作"至伊丽水"。松田寿男根据前后关系怀疑此句系"不谙此方面地理之编者所误植,若此句并非误植,则'至'字似当改为'指'或'向'字",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4〕百衲本、殿本均脱落"处"字。

〔5〕松田寿男对其时为突骑施部设置两个都督府曰:"盖因突骑施在当地较其他部落有势力,住域广大也。"并推测"嗢鹿"殆即突厥语意为大之 ulugh 之音写,絜山为弓月山之略称。见松山寿男前揭论文。

〔6〕殆即突厥碑文巾所见 Izgil 之音写。

〔7〕和田西北、叶尔羌以南喀尔噶里克。参照前文及《旧唐书 · 西突厥传》。

〔8〕帕米尔东南部萨里科勒溪谷中之塔什库尔干。

〔9〕据前文,此为在处木昆部落所设都督府之长官。

〔10〕《资治通鉴》等作"五咄陆之众"。

吐蕃连和,寇安西,诏吏部侍郎裴行俭讨之。行俭请毋发兵,可以计取。即诏行俭册送波斯王子,[1]并安抚大食,若道两蕃[2]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谒,遂禽之,召执诸部渠长,降别帅李遮匐[3]以归,[4]调露元年(679年)也。西姓自是益衰,[5]其后二部(咄陆部及弩失毕部)人日离散。

[6065页5行]突厥施质汗、胡禄。[6]

[6065页9行]未几,擢[阿史那]献碛西节度使。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以西帐落3万内属,玺书嘉慰。[7]葛逻禄、胡[禄]屋、[8]鼠尼施三姓已内属,为默啜侵掠。

[6065页13行]而突骑施已围拨换、大石城,[9]将取四镇。会[汤]嘉惠拜安西副大都护,即发三姓[10]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共击之。

---

〔1〕被阿拉伯军追逐、亡命至中国病死之萨珊朝波斯之俾路兹(耶祖多卡尔特三世之子)之子、在唐朝作人质的泥涅师。

〔2〕道两蕃,松山寿男译作"指导两蕃"。但是,例如《旧唐书·裴行俭传》作"路由两蕃部落",《新唐书》同传作"路出两蕃",因此,此处应译作"经过两蕃地区"。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3〕松田寿男曰:"文中裴行俭所降服之别帅名李遮匐,大概是Dizabul之音写。可认为西突厥始祖Silzibul、Dizabul(突厥碑文之Istämi可汗,瑟帝米、室点蜜)之同名者,这一说法不便立即接受。"见松田寿男:《增补十五则》(前揭书所收)。关于Istämi可汗(室点蜜、瑟帝米)、Dizaboulos,参阅《旧唐书·西突厥传笺注》(第102页注〔1〕)。

〔4〕"此时裴行俭一行占领碎叶城,远征军副将检校安西都护留于此城,以五旬修筑该城,西域胡人[粟特人]纵观,莫测其方略,为之惊叹。据此可知王方翼之经营碎叶城于裴行俭主持西征时。"见松田寿男:《弓月考》(前揭书所收)。

〔5〕关于突厥抵抗之消除,参照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6〕沙畹作"突厥施质汗、胡禄",松田寿男改"厥"为"骑",译作"突骑施质汗及胡禄",并认为"胡禄似即胡禄屋"。余依从沙畹。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7〕松田寿男根据若干史料曰:"西突厥余烬都担之叛乱于开元三年(714年)三月平定,六月,枭首于长安,十月,都担掀起叛乱之根据地胡禄屋部内属",又,"所书平定都担之乱,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应改为'碎叶以东帐落'。因胡禄屋属于咄陆部,显然居于碎叶以东,碎叶以西五弩失毕则为突骑施部牢固掌握。"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8〕百衲本、殿本均脱落"禄"字。

〔9〕拨换,库车以西阿克苏。松田寿男译作"拨换之大石城",别的史中料作"钵换及大石城"。此为两地,大概为相近之两地。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10〕指谋落(谋剌)、炽俟(婆匐)、踏实力三姓。参照《新唐书·回鹘传》。

[6066 页 1 行][阿史那]献终以娑葛[1]强狠不能制,亦归死长安。

[6066 页 2 行]突骑施吐火仙[2]之败。

[6066 页 11～12 行]俄,[娑葛]与其将阙啜忠节[3]交怨,兵相加暴。

[6067 页 2 行]大都护郭元振表娑葛状直,当见赦,诏许,[4]西土遂定。

[6067 页 4 行]默啜归语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协,能尽心事我乎?"两杀之。[5]

[6068 页 4 行]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6]更相猜仇。

[6068 页 10 行]又料[7]西国散亡数万人,悉与拔汗那王。

[6069 页 1 行]昕至俱阑城,为莫贺咄[8]所杀。莫贺咄自为可汗,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诛斩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阙颉斤为三姓叶护。[9]

[6069 页 3 行]天宝元年(742 年),突骑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10]为可汗,数通使贡。

---

[1]松田寿男曰:其时娑葛已死(见后文及《旧唐书·西突厥传》),"此处所书娑葛,大概是指在他战败之后的突骑施可汗,即努力于复兴之苏禄"。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沙畹已曾指出此事。

[2]苏禄之子,参照后文及《旧唐书·西突厥传》。

[3]案《旧唐书·西突厥传》,阙啜忠节为娑葛之父乌质勒之部将。

[4]据《旧唐书》中宗本纪、郭元振传等,唐朝于景龙二年(706 年)七月赐娑葛名守忠,授以归化可汗称号,册立为十四姓可汗。关于此十四姓之内容有几种说法,有再探讨之必要。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5]松田寿男以此为景云二年(711 年)之事。见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6]有认为突厥碑文中所见 qara Türgiš 相当于此黑姓突骑施之说法,松田寿男也有相同见解。但突厥语之 qara,意为黑,转义表示"一般的"、"庶民",因此上述见解不能依从。参阅松田寿男前揭论文。

[7]百衲本、殿本均作"料",可能为"收"字之误。

[8]据前文,昕为莫贺达干所杀,《资治通鉴》从之。

[9]案沙畹指出:葛逻禄之首长称三姓叶护。

[10]什契尔巴克认为是 Il-etmiš Qutlugh bilgä 即"组织国家之幸福贤明(者)"之音写;余认为是 Il-tirmiš Qutlugh bilgä 即"集合诸部族幸福贤明(者)"之音写。见什契尔巴克:《关于突厥钱币上所铸字的音读》,载《东方学研究所学术集刊》第 14 卷,1958 年;护雅夫:《古代突厥人的社会构造》(前揭书所收)。

[6069 页 3～4 行][天宝]十二载(753 年),黑姓部立登里伊罗蜜施[1]为可汗。

[6069 页 5～6 行]乾元中(758—760 年),黑姓可汗阿多裴罗[2]犹能遣使者入朝。

[6069 页 6～7 行]大历(766—776 年)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役于葛[逻][3]禄,[4]斛瑟罗余部附回鹘。及其破灭,有特庬勒居焉耆城,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5]众至二十万。

(辑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2 卷,东京,1979 年,第 260～298 页。)

[1]沙畹以其为 Tängri-bolmiš 即"天上形成(者)"之音写,他对"登里"后之"伊"音理解得不清楚。此称号或名称意为"天送(者)"之 Tängri-ilitmiš 之音写,然不能断言。

[2]阿多,似为突厥语表示"父"之 ata 之音写。裴罗——古突厥人之称号或名字,或用作称号、名字之一部分之 boyla 之音写。

[3]百衲本、殿本均脱落"逻"字。

[4]在穆斯林史料中有突骑施之最高君主名 Khutughlān 可汗者,此名也许可认为相当于突厥语 Qut oghlan(幸福儿子)可汗。但是此人在中国史料中找不到。

[5]"领"应当作"岭"。金莎岭为吐鲁番北面天山山脉之一部,即朱汪·帖列克·巴什敖拉。

12 《旧唐书·回纥传》笺注

〔日〕佐口透

回纥,[1]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2]其俗骁强,依托高车,[3]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4] 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

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隋开皇(581—600年)末,晋王广[5]北征突厥,大破步迦可汗,[6]特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7]击特勒诸部,厚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为变,遂集其渠帅数百人尽诛之,[8]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9]并号俟斤,[10]后称回纥焉。[11]

在薛延陀北境,居娑陵水[12]侧,去长安6900里,随逐水草,胜兵5万,人口10万人。

---

〔1〕回纥——部族名,Uyghur。

〔2〕百衲本、殿本作"其象微小",他本作"其众微小"。

〔3〕高车——部族名,严密而言,当称高车丁零。隋代时成为以铁勒为中心之集团。参阅《魏书·高车传》。

〔4〕古汉语音 d'ək - lək。

〔5〕晋王广——隋文帝第二子,即后来的隋炀帝。

〔6〕步迦可汗——突厥室点蜜可汗之子,别名达头可汗之第九代可汗(576—603年)。

〔7〕处罗可汗——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

〔8〕"自突厥有国……尽诛之",据《隋书·铁勒传》写成,惟改"铁勒"为"特勒"。

〔9〕仆骨——Boqu,同罗——Tongra,回纥——Uyghur,拔野古——Bayïrqu,(Bayarqu)。覆罗——《旧唐书》百衲本、殿本作"覆罗步",据《隋书·铁勒传》此处作"覆罗并号俟斤",乃知"步"为"并"之误,兹改正之。

〔10〕俟斤——突厥官号,irkin。

〔11〕此处视特勒(Türk)与回纥为同一,不正确。

〔12〕娑陵水——色楞格河。

初，有特健俟斤[1]死，有子曰菩萨，[2]部落以为贤而立之。贞观(627—649年)初，[3]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4]遣子欲谷设[5]率10万骑讨之，菩萨领骑5000与战，破之于马鬣山，[6]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7]仍遣使朝贡。[8]

菩萨劲勇，有胆气，善筹策，每对敌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少制众，常以战阵射猎为务。其母乌罗浑[9]主知争讼之事，平反严明，部内齐肃。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

贞观中(627—649年)擒降突厥颉利等可汗之后，北虏惟菩萨、薛延陀为盛。太宗册北突厥莫贺咄[10]为可汗，遣统回纥、仆骨、同罗、思结、阿跌等部。

回纥酋帅吐迷度[11]与诸部大破薛延陀多弥可汗，[12]遂并其部曲，奄有其地。贞观二十年(646年)，南过贺兰山，[13]临黄河，遣使入贡，以破薛延陀功，赐宴内殿。太宗幸灵武，受其降款，[14]因请回鹘已南置邮递，通管北方。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官主之，[15]以回纥部为瀚海府，拜其俟利发吐迷度为怀化

---

[1]特健俟斤——《新唐书·回鹘传》作"时健俟斤"，不知孰是。惟可知此回纥部长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在世。

[2]菩萨——回纥第二代部长，古突厥语 pusar。

[3]正确言之，为贞观元年(627年)。

[4]颉利可汗——东突厥(所谓突厥第一帝国)最后一个可汗，Ilig qaghan。

[5]欲谷设——yukuk šad，《通鉴》"贞观元年十二月"条作"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

[6]马鬣山——位置不明，一定为漠北之一山。

[7]活颉利发——颉利发为突厥称号 iltäbär，"活"之原音不明。

[8]据《新唐书·回鹘传》及其他资料，此为贞观三年(629年)之事。

[9]乌罗浑——人名，其原语不明。

[10]应改正为"西突厥莫贺咄"，莫贺咄读作 Baghatur 或 Bagha čur。莫贺咄杀其诸父[原讹，应作侄——译注]统叶护可汗自立，称屈利俟毗可汗。

[11]回纥第三代部长(？—648年)，其名字之原语不明。

[12]《旧唐书·铁勒传》之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Ilkülüg šad Istämi qaghan)，即夷男之子拔灼之称号。

[13]今宁夏贺兰山脉。

[14]灵武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宁夏。唐时曾设置灵州或灵武郡。此句在时间上说来应提前读。

[15]六府七州设置年代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时吐迷度已自称可汗,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以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微府[1],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部[2]为皋兰州,斛萨[3]为高阙州、[4]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林溪州,[5]跌结[6]为鸡鹿州,阿布思[7]为蹛林州,白霫为寘睢颜州;[8]又以回纥西北结骨[9]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10]为烛龙州。于故单于台[11]置燕然都护府[12]统之,以导宾贡。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吐迷度为其侄乌纥[13]所杀。初,乌纥烝[14]其叔母,遂与俱陆莫贺达干俱罗勃[15]潜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16] 乌纥、俱罗勃,并车鼻之婿也,乌纥遂夜领骑十余劫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遣人给乌纥云:"将奏而为都督,替吐迷度也。"乌纥轻骑至礼臣所,跪拜致谢,礼臣擒而斩之以闻。太宗恐回纥部落携离,十月,遣兵部尚书崔敦礼[17]往安抚之,仍以敦礼为金山道副将军。赠吐迷度左卫大将军,赙物及衣服设祭甚厚。以吐迷度子前左屯卫大将军、翊卫左郎将婆闰[18]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19]使持节回纥部落诸军事,

---

〔1〕百衲本等各本作"金徽府",误,应以"金微府"为正。

〔2〕百衲本等各本作"浑都府",误衍一"都"字。

〔3〕似为斛薛之异译。

〔4〕殿本作"高厥州"。

〔5〕殿本作"榆溪州"。

〔6〕通常作"奚结"(《新唐书·回鹘传》)。

〔7〕阿布思——不详。《新唐书》作"思结,蹛林州"(按:原文作"归林州",今据中华书局本改)。

〔8〕殿本作"寘颜州",正确。

〔9〕指 Qirqiz 族。

〔10〕部族名,读作 küräbür,构成九姓回鹘之一氏族名。

〔11〕位于今绥远归化城以南,和林以北。

〔12〕燕然都护府于龙朔三年(663年)二月移至回纥领域内,称为瀚海都护府(据《通鉴》"龙朔三年二月"条)。

〔13〕人名,读作 uyghur 或 oghuz。

〔14〕殿本误作"蒸"。

〔15〕俱罗勃(küräbür?),人名,俱陆莫贺达干(külüg bagha tarqan)称号。

〔16〕回纥之一首领,《通鉴》"贞观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条作"突厥车鼻可汗"。

〔17〕参照《旧唐书》卷81《崔敦礼传》。

〔18〕回纥第四代部长(661—663年),婆闰之原音不明。

〔19〕原语似为 Ulugh iltäbär。

瀚海都督。后俱罗勃来朝，太宗留之不遣。

诏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1]统五啜、五俟斤[2]二十余部，居多罗斯水[3]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回纥不肯西属突厥。

永徽二年(651年)，贺鲁破北庭，[4]诏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5]领兵二万，取回纥五万骑，大破贺鲁，收复北庭。

显庆元年(656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6]苏定方、[7]任雅相、萧嗣业[8]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9]于阴山，[10]再破于金牙山，[11]尽收所据之地，西逐至耶罗川。[12] 贺鲁西奔石国，[13]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14]城主伊涅达干[15]执贺鲁送洛阳。以其地置濛池、昆陵府，[16]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17]为二府都督，统十姓右厢五弩失毕、左厢五咄陆。[18] 以贺鲁种落分置州县，西尽波斯。加婆闰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永徽六年(655年)，[19]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

---

〔1〕西突厥之王族、武将。称沙钵略可汗，后来归顺唐朝。参照《旧唐书》卷194《阿史那贺鲁传》。此为永徽二年之事。

〔2〕五个啜(čur)、五个俟斤(irkin)之意。啜、俟斤为西突厥王侯之称号。

〔3〕中央亚细亚之塔拉斯河。

〔4〕别失八里。

〔5〕参照《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

〔6〕参照《旧唐书》卷68《程知节传》。

〔7〕参照《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

〔8〕参照《旧唐书》卷83(萧嗣业传)。

〔9〕此次征讨为显庆二年(657年)之事。

〔10〕被认为指天山北路塔尔巴哈台山脉。

〔11〕被认为指伊犁地区博罗霍罗山脉之一部。

〔12〕被认为是多罗斯(塔拉斯)之误记，也有人认为是《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贺鲁传记事中之邪罗斯川，即突厥碑文中 yarïš yazi 之音译，也即博罗塔拉附近之喀喇额尔齐斯河。参照《岩佐精一郎遗稿》第160～161页、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47页。

〔13〕šaš，即后来的塔什干。

〔14〕有将该城比定为伊本·霍尔达德别所记载的朔图尔卡斯的说法(沙畹：《西突厥史料》)。

〔15〕百衲本作“伊沮达”，殿本作“伊涅达干”。达干为称号 tarqan，故应当作“达干”。《通鉴》相应条文作“伊沮”，伊涅(ini)可能为幼小之意。《旧唐书》卷194《阿史那贺鲁传》作“伊涅达干”。

〔16〕均为都护府。

〔17〕弥射与步真均为西突厥首领，太宗时来降于唐朝。

〔18〕应作左厢五咄陆、右厢五弩失毕。左厢、右厢为表示突厥左右行政区划之语，咄陆、弩失毕各指下位的行政区划。

〔19〕原文“永徽六年”为“显庆六年”(661年)，即“龙朔元年”(661年)之误。

高丽。

龙朔中(661—663年),婆闰死,[1]侄比粟毒[2]主领回鹘,[3]与同罗、仆固[4]犯边,[5]高宗命郑仁泰讨平仆固等,比粟毒败走,[6]因以铁勒本部为天山县。[7]

永隆中(680—681年)独解支,[8]嗣圣中(684—704年)伏帝匐,[9]开元中(713—741年)承宗、[10]伏帝难,[11]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左杀右杀[12]分管诸部。

开元中(713—741年),回鹘渐盛,杀凉州都督王君㚟,[13]断安西诸国[14]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15]退保乌德健山,[16]南去西城1700里,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300里。[17]

有十一都督[18],本九姓部落:[19]一曰药罗葛,[20]即可汗之姓;二曰

---

〔1〕《通鉴》记婆闰之死于龙朔元年(661年)十月条下。

〔2〕百衲本作"妹比粟毒","妹"为"侄"之误。回纥第五代部长(661—680年?)。此人名又记录作"比粟毒"、"子比粟""子比来粟"。此处作"比粟毒"。其原语不明。

〔3〕自此以下有数处以"回鹘"代替"回纥"。

〔4〕同于仆骨,读作Buqu。

〔5〕自龙朔元年(661年)十月起约一年半之间,铁勒诸部叛唐。

〔6〕此次铁勒叛乱之平定,在龙朔三年初(《通鉴》及《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龙朔三年正月"条)。

〔7〕此天山似为伊吾(哈密)北方之时罗漫山。参照《岩佐遗稿》第161页。

〔8〕回纥第六代部长(680—?年),死去年代不明。

〔9〕回纥第七代部长(695—719?年)。

〔10〕回纥第八代部长(719—727年)。

〔11〕回纥第九代部长(727—743?年)。

〔12〕"杀"为突厥称号šad,左杀意即左王,右杀意即右王。

〔13〕参照《旧唐书》卷10《王君㚟传》。王君㚟,兼河西节度使。

〔14〕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支配下之西域诸国。

〔15〕王君㚟流放回纥部长承宗,其族子瀚海司马护输于开元十五年向王君㚟复仇之事件。参照两唐书《王君㚟传》及《通鉴》"开元十五年(727年)闰九月"条。此次反叛为开元十五年之事,据《新店书》王君㚟传、《通鉴》,郭知运死于开元九年,似非此次讨伐之当事者)。

〔16〕山名,ötükän。

〔17〕西城指鄂尔多斯右翼旗黄河外之西受降城。"碛石口"应作"碛口"。

〔18〕官职名,源于中国,古突厥语书作tutuq,地方军司令官。

〔19〕并非指九姓铁勒(Toquz oghuz),而谓回纥由九氏族组成。参照羽田亨:《九姓回鹘》。又可参考哈米尔顿:《脱忽思·乌古思与翁回鹘》

〔20〕读作Ybghlaqar,此为可汗家的氏族名。

胡咄葛;[1]三曰咄罗勿;[2]四曰貊歌息讫,[3]五曰阿勿嘀;[4]六曰葛萨;[5]七曰斛嗢素;[6]八曰药勿葛;[7]九曰奚耶勿。[8] 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9]收一部落,破葛逻禄,[10]收一部落,各[11]置都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每行止斗战,常以二客部落为军锋。[12]

天宝(742—755年)初,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13]遣人朝,[14]封奉义王。三载(744年),击破拔悉密,[15]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16]又遣使入朝,因册为怀仁可汗。

及至德元载(756年)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遣故邠王[17]男承寀封为敦煌王,将军石定番,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18] 及至其牙,[葛勒]可汗[19]以女嫁于承寀,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20] 肃宗在彭原,[21]遇之甚厚。

二载(757年)二月,回纥又使首领大将军多揽[22]等15人入朝。

---

〔1〕古汉语音 ghuo-tuət-kât,原语推定为 Quturghar、utarghar 等。

〔2〕即“啒罗勿”、“俱罗勃”。原音推定为 ki-ulăb´,uət > küräbür。

〔3〕古汉语音 mak-kâ-siək-kiət。

〔4〕古汉语音 â-miuət-tsêk。

〔5〕古汉语音 kât-sât。原语似为 Qazar-Qasar。

〔6〕古汉语音 ghuk-uət-suo。

〔7〕古汉语音iak-miuət-kât,原语推定为 Yaghmurqar 等。

〔8〕古汉语音 ghiei-ia-miuət,又作爱邪勿 âi-ia-miuət。

〔9〕百衲本作“枝悉密”,殿本作“拔息密”,应作“拔悉密”,部族名,Bašmil。

〔10〕部族名,Qarluq。

〔11〕百衲本作“葛”,以殿本作“各”为正确。

〔12〕百衲本作“锋”,殿本作“锋”。

〔13〕读作 Yabghu iltäbär。称号。有此称号之酋长《新唐书·回鹘传》之骨力裴罗(Qutlugh Boila),护输之子。回纥(帝国)第一代可汗(744—747年),与《唐会要》之“叶护逸标苾”(Yabgh uiltäbär?)为同一人物。

〔14〕《通鉴》天宝元年(742年)记其遣使入贡事。

〔15〕百衲本作“枝悉密”,据殿本“拔悉密”订正。

〔16〕Qutlugh bilgä kül qughan 。但以 šine-usu 碑文之 kül bilgä qughan 为正确 。唐朝赠册号称怀仁可汗。其都城为今喀喇巴勒噶孙废墟。

〔17〕邠王守礼。

〔18〕指安禄山叛乱时,唐朝向回纥请求出兵救助。

〔19〕此可汗非骨力裴罗,而是其子磨延啜,即葛勒可汗(747—759年),回纥第二代可汗。

〔20〕读作 Bilgä qunjču。

〔21〕甘肃省安化之南。

〔22〕回纥人名。

九月戊寅，加承寀开府仪同三司，[1]拜宗正卿，[2]纳回纥公主为妃。回纥遣其太子叶护[3]领其将帝德[4]等兵马4000余众，助国讨逆，肃宗宴赐甚厚。又命元帅广平王见叶护，约为兄弟，接之颇有恩义。叶护大喜，谓王为兄。

戊子，回纥大首领达干[5]等13人先至扶风，[6]与朔方[7]将士见仆射郭子仪[8]，留之，宴设3日。叶护太子曰："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子仪固留之，宴毕便发。其军每日给羊200口、牛20头、米40石。及元帅广平王率郭子仪等至香积寺[9]东20里，西临沣水。贼埋精骑于大营东，将袭我军之背。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10]指回纥驰救之，匹马不归，因收西京。[11]

十月，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12]西，初次于曲沃。[13] 叶护使其将军车鼻施吐拨裴罗[14]等旁南山而东，遇贼伏兵于谷中，尽殪之。子仪至新店[15]，遇贼战，军却数里。回纥望见，逾山西岭上曳白旗而趋击之，直出其后，贼众大败，军而北坑，逐北20余里，人马相枕藉，蹂践而死者不可胜数，斩首十余万，伏尸30里。贼党严庄[16]驰告安庆绪[17]，率其党背东京[18]北走渡河，而叶护从广平王、

---

[1]文官之最高散官。

[2]宗正寺长官，掌管皇族之事。

[3]磨延啜之子。

[4]回纥人名。

[5]tarqan，突厥称号。又被用作人名。

[6]陕西省长安之西约百公里处，在渭水北岸。

[7]朔方节度使治所，以灵武即灵州为治所。

[8]参照《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其时子仪任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

[9]位于长安城南郊山地中。

[10]参照《旧唐书》卷121《仆固怀恩传》。

[11]西京指京兆府长安。关于香积寺之战及唐军收复西京，《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至德二年九月丁亥"条有记载。

[12]河南省陕州。

[13]山西省南部平阳府曲沃县。

[14]"罗"，百衲本作"副"，殿本作"罗"。车鼻施似为人名，裴罗读作boila。

[15]位于陕州以西。

[16]安禄山之部将，参照《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

[17]安禄山之子。

[18]东京，河南府洛阳。

仆射郭子仪入东京。初收西京,回纥欲入城劫掠,广平王固止之。及收东京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广平王又赍之以锦罽宝贝,叶护大喜。

及肃宗还西京,十一月癸酉,叶护自东京至。敕百官于长乐驿[1]迎,上御宣政殿宴劳之。叶护升殿,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及辞归蕃,上谓曰:"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卿等力也。"叶护奏曰:"回纥战兵,留在沙苑,[2]今且须归灵夏取马,更收范阳,[3]讨除残贼。"

己丑,诏[4]曰:"……回纥叶护……可司空,仍封忠义王,每载送绢二万匹至朔方军,宜差使受领。"乾元元年(758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亥阿波[5]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阁之[6]等六人并朝见,至閤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六月戊戌,宴回纥使于紫宸殿前。秋七月丁亥,诏以幼女封为宁国公主[7]出降。其降蕃日,仍以堂弟汉中郡王瑀为特进、试太常卿、摄御史大夫、充册命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使,以堂侄左司郎中巽为兵部郎中、摄御史中丞、鸿胪卿,副之,兼充宁国公主礼会使。特差重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仆射、冀国公裴冕送至界首。

癸巳,以册立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8]上御宣政殿,汉中王瑀[9]受册命。甲午,肃宗送宁国公主至咸阳磁门驿,公主泣而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

及瑀至其牙帐,毗伽阙可汗衣赭黄袍,胡帽,坐于帐中榻上,仪卫甚

---

[1]浐水(从陕西省蓝田北流、注入渭水之河)之东、长乐陂之驿站(《通鉴》"至德二年十月癸酉"条注)。

[2]陕西省大荔县以南20里。

[3]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安禄山之根据地。

[4]参照《大唐诏令集》卷128"命官"条,《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至德六年十一月)。

[5]百衲本作"多亥阿彼"。"阿彼"就认为是apa(祖先、长姊)之音译。"多亥",别的史料中译"多彦"、"达亥"。

[6]黑衣大食指阿拉伯乌马叶王朝。阁之,似为Qādī之音译。

[7]肃宗第二女。

[8]即上述磨延啜、葛勒可汗。

[9]殿本缺"瑀"字。

盛，引瑀立于帐外，谓瑀曰："王是天可汗[1]何亲？"瑀曰："是唐天子堂弟。"又问："于王上立者为谁？"瑀曰："中使雷卢俊。"可汗又报曰："中使是奴，何得向郎君上立？"雷卢俊竦惧，跳身向下立定。瑀不拜而立。可汗报曰："两国主君臣有礼，何得不拜？"瑀曰："唐天子以可汗有功，故将女嫁与可汗结姻好。比者中国与外蕃亲，皆宗室子女，名为公主。今宁国公主，天子真女，又有才貌，万里嫁与可汗。可汗是唐家天子女婿，合有礼数，岂得坐于榻上受诏命耶！"可汗乃起奉诏，便受册命。翌[2]日，册公主为可敦[3]，蕃酋欢欣曰："唐国天子贵重，将真女来。"瑀所送国信缯彩衣服金银器皿，可汗尽分与衙官、酋长等。及瑀回，可汗献马500匹、貂裘、白氎[4]。

八月，回纥使王子骨啜特勤[5]及宰相帝德等骁将3000人助国讨逆。肃宗嘉其远至，赐宴，[6]命随朔方行营使仆固怀恩押之[7]，九月甲申，回纥使大首领盖将[8]等谢公主下降，兼奏破坚昆[9]5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十二月甲午，回纥使3妇人，谢宁国公主之聘也，赐宴紫宸殿。

乾元二年（759年），回纥骨啜特勤等率众从郭子仪与九节度于相州[10]城下战，不利。三月壬子，回纥王子骨啜特勤及宰相帝德等15人自相州奔于西京，肃宗宴之于紫宸殿，赏物有差。其月庚寅，回纥特勤辞还行营，上宴之于紫宸殿，赐物有差。乙未，以回纥王子新除左羽林军大将军员外置骨啜特勤为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员外置。

---

〔1〕天可汗——大唐帝国皇帝之意。突厥碑文中之 Tängr qaghan。

〔2〕殿本作"翼"日。

〔3〕指皇妃之称号，qatun。

〔4〕百衲本作"百疊"。

〔5〕骨啜，读作 Qut čur 或 Qut lugh，特勒、特勤，称号 tägin。

〔6〕百衲本作"赐寡卷"，殿本作"赐宴"。

〔7〕百衲本作"押当"，殿本作"押之"。

〔8〕盖将——似为盖将军之意。

〔9〕部族名，Qirqiz。葛勒可汗即磨延啜，之一生忙于征服北族之战争，也曾征讨叶尼塞河上游之黠戛斯族。

〔10〕河南省安阳县。

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1]死。长子护叶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2]，其妻为可敦。六月丙午，以左金吾卫将军李通为试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充吊祭回纥使。毗伽阙可汗[3]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4]竟以无子得归。秋八月，宁国公主自回纥还，诏百官于明凤门外迎之。上元元年(760 年)九月己丑，回纥九姓可汗[5]使大臣俱陆莫达干[6]等人朝奉表起居。[7] 乙卯，回纥使 20 人于延英殿通谒，赐物有差。十一月戊辰，回纥使延支伽罗[8]等 10 人于延英殿谒见，赐物有差。

宝应元年(762 年)，代宗初即位，以史朝义[9]尚在河洛[10]，遣中使刘清潭征兵于回纥，又修旧好。其秋，[11]清潭入回纥庭，回纥已为史朝义所诱，云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可汗乃领众而南，已八月矣。清潭赍敕书国信至，可汗曰："我闻唐家已无主，何为更有敕书?"中使对曰："我唐家天子虽弃万国，嗣天子广平王天生英武，往年与回纥叶护兵马同收两京，破安庆绪，与可汗有故。又每年与可汗缯绢

---

[1]读作 Bilgä kül 可汗，此为第一代骨力裴罗之称号，《旧唐书》此回记事系第二代磨延啜之事误记。磨延啜死于乾元二年(759 年)四月，据《唐会要》及其他史籍应属无疑。因而此处应订正作"磨延啜(登里啰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可汗死"。

[2]读作 Tängri qaghan，其可汗号之全称为登里啰汨没密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毗伽可汗(Tängri-dä qut bolmiš il tutmiš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此可汗为回纥第三代可汗(759—780 年)，据《新唐书·回鹘传》及其他史料可知，此可汗名移地健，即位前称号为牟羽可汗。移地健，"少子"之意，似为与蒙古系 üčken 等相近之语。牟羽为 bögü、bügü(勇敢的)之音译。牟羽可汗受唐朝册号为英义建功。

[3]如前所述，为"英武威远可汗"之误。

[4]古突厥诸族中葬礼时所谓剺面仪礼。

[5]又称九姓回纥可汗，回纥王国可汗之称号

[6]读作 külüg bagha tarqan。

[7]原文不明确，参阅《新唐书·回鹘传》。

[8]人名，原音似为 jani qara。

[9]史思明之子。安史之乱时，杀其父史思明即位，广德元年(763 年)在唐军攻讨下自杀。

[10]黄河及洛水地区。

[11]据《通鉴》为秋九月之事。

数万匹，可汗岂忘之耶?”然回纥业已发至三城[1]北，见荒城无戍卒，州县尽为空垒，有轻唐色，乃遣使北收单于兵马仓粮，又大辱清潭。

清潭发使来奏云：“回纥登里可汗倾国自来，有众十万，羊马不知其数。”京师大骇。上使殿中监药子昂驰劳之，及于太原北忻州南，子昂密数其丁壮，得四千人，老小妇人相兼万余人，战马四万匹，牛羊不纪。先是，毗伽阙可汗[2]请以子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嫁之。及是为可敦，与可汗同来，请怀恩及怀恩母相见。上敕怀恩自汾州见之于太原，怀恩又谏国家恩信不可违背。

初欲自蒲关[3]入，取沙苑[4]路，由潼关东向破贼，子昂说之云：“国家频遭寇逆，州县虚乏，难为供拟，恐可汗失望，不如取土门[5]路入，直取邢、洺、卫、怀。[6] 贼中兵马尽在东京，可汗收其财帛，束装南向，最为上策。”可汗不从。又说“取怀州太行路，[7]南据河阴[8]之险，直扼贼之喉，亦上策也”。可汗又不从。又说“取陕州太阳津[9]路，食太原仓[10]粟而东，与泽潞、河南、怀郑[11]节度同入，亦上策也”。可汗从之。子昂因入奏，上以雍王适为兵马元帅，[12]加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以子昂兼御史中丞，与前潞府兼御史中丞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以中书舍人韦少华[13]充元帅判官兼掌书记，给事中李进兼御史中丞，充元帅行军司马，东会回纥登里可汗营于陕州黄河北。

---

[1]指朔方之三受降城，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位于黄河北岸，东受降城在胜州对岸，今托克托县方面，西受降城在今五原方面。

[2]据前文所述，为毗伽可汗即英武威远可汗(磨延啜)之误。

[3]蒲津关之略称。黄河之渡津，位于陕西省朝邑县东境，黄河西岸。

[4]在陕西大荔县(同州)南12里。

[5]位于河北、山西省境之井陉县之太行山脉之一支脉之关口。

[6]邢州，河北省邢台县；洺州，河北省永年县；卫州，河南省汲县；怀州，河南省沁阳县。

[7]通过太行山脉之路。

[8]河南省河阴县。

[9]陕州(河南省陕县)以北之黄河渡津。

[10]在陕州西南5里。

[11]泽州、潞州，今山西省东南部城市晋城县、长治县；怀州，河南省沁阳县。

[12]雍王适为已故肃宗之孙，后来的德宗皇帝。此为宝应元年十月之事(据《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

[13]百衲本作“章少华”，殿本作“韦少华”，应作“韦少华”。

元帅雍王领子昂等从而见之，可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礼倨。子昂辞以元帅是嫡孙，两宫[1]在殡，不合有舞蹈。回纥宰相及车鼻将军庭诘曰："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辞以身有丧礼，不合。又报云："元帅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相拒久之，车鼻遂引子昂、李进、少华、魏琚各搒捶一百，少华、琚因搒捶，一宿而死。以王少年未谙事，放归本营。

而怀恩与回纥右杀[2]为先锋，及诸节度同攻贼，破之，史朝义率残寇而走。元帅雍王退归灵宝。[3] 回纥可汗继进于河阳[4]，列营而止数月。去营百余里，人被剽劫逼辱，不胜其弊。怀恩常为军殿。及诸节度收河北州县，仆固玚[5]与回纥之众追蹑二千余里，至平州石城县[6]，枭朝义首而归，河北悉平。[7] 怀恩自相州[8]西出崞口路[9]而西，可汗自河阳北出泽、潞[10]与怀恩会，历太原，遣使拔贺那[11]上表贺收东京，并进逆贼史朝义旌旗等物。辞还蕃，[12]代宗引见于内殿，赐彩200段。

初，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及是[13]朝贺，又纵横大辱官吏。以陕州节度使郭英乂[14]权知东都留守。

---

[1]指玄宗、肃宗。

[2]"杀"——突厥称号 šad。《通鉴》"宝应元年十月丙寅"条作"左杀"。可汗之下设有左右杀。

[3]陕州之西，今灵宝县。

[4]河南省孟县，位于黄河北岸。

[5]仆固怀恩之子。

[6]河北省卢龙县。

[7]据《通鉴》，为广德元年(763 年)正月之事。

[8]河南省安阳县(彰德)。

[9]百衲本作"峙口路"，殿本作"崞口路"。

[10]泽州为山西省晋城县，潞州为山西省长治县。

[11]突厥人名，读作 Baghana。

[12]《通鉴》宝应二年(763 年)"正月条"曰：史朝义首级送至京师。《旧唐书》卷 11《代宗本纪》"宝应二年二月甲午"条："回纥登里可汗辞归蕃。"

[13]百衲本作"及时"，殿本作"及是"。

[14]参照《新唐书》卷 133《郭英乂传》。

时东都再经贼乱，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1]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2]郑[3]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4]。

代宗御宣政殿，出册文，加册可汗为登里颉咄登密施含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5]，可敦加册为婆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6]。"颉咄"，华言"社稷法用"[7]；"登密施"，华言"封竟"[8]；"含俱录"，华言"娄罗"[9]；"毗伽"，华言"足意智"[10]；"婆墨"[11]，华言"得怜"。以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王翊充使，就可汗行营行册命焉。可汗、可敦及左右杀、诸都督、内外宰相已下，并加实封2000户，令王翊就牙帐前礼册。左杀封为雄朔王，右杀封为宁朔王，胡禄都督封金河王，拔览将军封为静漠王，诸都督11人并封国公。[12]

寻而怀恩叛，投灵武，有朔方旧将任敷、张韶等，收合余烬，众至数万。广德二年(764年)秋，乃引吐蕃之众数万人至奉天县，[13]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众拒之而退。

永泰元年(765年)秋，怀恩遣兵马使范至诚、任敷将兵，又诱回纥、吐蕃、吐谷浑、[14]党项、[15]奴剌[16]之众20余万，以犯奉天、醴泉、凤翔、同

---

[1]唐代宗时宦官，活跃的政治家、武人。鱼朝恩率领禁军最精锐之神策军。

[2]河南省临汝县。

[3]河南省郑州。

[4]《通鉴》"宝应元年十月"条下也记有此事。

[5]唐朝封赠回纥第三代牟羽可汗之称号。读作 Tängri [dä] [qut bolmiš] il tut miš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据《唐会要》，此为宝应二年(763年)六月(广德元年六月)之事。

[6]婆墨，《新唐书》作娑墨，此突厥语之古汉语音 sa-bok 之原语，可推定为 säwüg ~ säwig(可爱的)。

[7]"颉咄"之"咄"为衍字。或应连下读作"咄登密施"。颉，il(国)之音译，《通鉴》释作"社稷登用"。

[8]应读作"咄登密施"，tutmiš(建立国家)之音译。

[9]读作 alp külüg，alp 意为"勇敢的"、külüg 意为"有名望"。"娄罗"为"聪明敏才"之意。

[10]读作 bilgä，"足意智"与"毗伽"均为贤明之意。

[11]原音不明，被推定为 säwüg。

[12]以上封册、封赏为广德元年七月之事(据《通鉴》)。

[13]据《通鉴》，此为广德二年十月之事。奉天县，陕西省乾县，在长安西北150里，原醴泉县之地。

[14]占据青海地区的游牧民国家，由鲜卑族及藏族组成。

[15]唐古特族。

[16]突厥或铁勒系之种族，住于鄂尔多斯南边，似与党项族杂居。

州等处,[1]被其逆命。先以郭子仪屯泾阳,[2]浑日进屯奉天,数摧其锋。[3] 又闻怀恩死,吐蕃将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4]旧路而归。

回纥首领罗达干[5]等率其众二千余骑,诣泾阳请降,子仪许之,率众被甲持满数千人。回纥译曰:"此来非恶心,要见令公[6]。"子仪曰:"我令公也。"回纥曰:"请去甲。"子仪便脱兜鍪枪甲,策马挺身而前,回纥酋长相顾曰:"是也。"时太子太保[7]李光进、兼御史大夫路嗣恭戎装介马在子仪之侧,子仪指视回纥曰:"此是渭北节度李太保。"又曰:"此是朔方军粮使路大夫。"回纥便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回纥之众为左右翼,各数百人,渐进,子仪麾下亦驰而至,子仪麾退之。子仪命酒与之饮,赠之缠头彩三千匹。子仪执回纥大将可汗弟合胡禄都督药罗葛[8]等手,责让之曰:"我国家知汝回纥有功,报汝大厚,汝何背约负信,犯我王畿?我须与汝战,何乃降为!我一身挺入汝营,任汝拘絷,我麾下将士,须与汝战。"回纥又译曰:"怀恩负心,来报可汗,云唐国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来。今知天可汗见在上都,令公为将,怀恩天又杀之。今请追杀吐蕃,收其羊马,以报国恩。然怀恩子,可敦兄弟,请勿杀之。"

合胡禄都督等与宰相磨咄莫贺达干、[9]宰相暾莫贺达干、[10]宰相护都毗伽将军、[11]宰相揭拉裴罗达干、[12]宰相梅录[13]大将军罗达干、平章事海盈阙达干[14]等,子仪先执杯,合胡禄都督请咒,子仪咒曰:"大唐天

---

[1]位于陕西省中部、渭水北岸。
[2]陕西省泾阳县,在渭水上游。
[3]百衲本作"锋",据殿本订正为"锋"。
[4]陕西省泾水流域之邠州
[5]人名,"罗"之原语不明,达干为称号 tarqan。
[6]中书令。郭子仪为中书令。
[7]中国官名,又称太子太傅。太子之辅导,掌管官属之高官。
[8]读作 Alp ulugh tutuq Yaghlaqar。
[9]"磨咄",不明。莫贺达干读作 Bagha tarqan。
[10]读作 Ton bagha tarqan。
[11]护都,似为 qut 或 qutlugh。毗伽,bilgä。
[12]原音不明。裴罗,在"骨力裴罗"一词中读作 boila。
[13]突厥称号 buiruq。
[14]"海盈",原音不明。阙达干,读作 kül tarqan。

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译曰：“如令公盟约。”皆喜曰：“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1]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骑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征矣。”欢跃久之。子仪抚其背，首领等分缠头彩以赏巫师，请诸将同击吐蕃，子仪如其约。翌日，使领回纥首领开府石野那[2]等6人入京朝见。

又五日，朔方先锋[3]兵马使、开府、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兵马合于泾州[4]灵台县西50里赤山岭，共破吐蕃等十余万众，斩首5万余级，生擒一万余人，驼马牛羊凡百里相继，不可胜纪，收得蕃落五千余人。初白元光等到灵台县西，探知贼势，为月明，思少阴晦，回纥使巫师便致风雪。及迟明战，吐蕃尽寒冻，弓矢皆废，披毡徐进，元光与回纥随而杀之蔽野。仆固名臣，怀恩之侄，尤为骁将，亦领千余骑来降。寻而子仪又使回纥宰相护地毗伽将军[5]，宰相梅录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罗达干等196人来见，上赐宴于延英殿，锡赉甚厚。闰月，子仪自泾阳领仆固名臣入奏，回纥进马，及宴别，前后赉缯彩十万匹而还。时帑藏空虚，朝官无禄俸，随月给手力，谓之资课钱。税朝官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课以供之。[6]

大历六年(771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7]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300骑犯金光门、朱雀门。[8] 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

七年(772年)七月，回纥出鸿胪寺，入坊市强暴，逐长安令邵说于

---

〔1〕指珊蛮(巫术师)。

〔2〕人名，原音不明。《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记作“石野那”(按：原文作“古野那”，今据中华书局本改)。

〔3〕百衲本作“先锋”，据殿本订正为“先锋”。

〔4〕甘肃省灵台县(平凉府泾州)。

〔5〕前文记作宰相护都毗伽将军。

〔6〕据《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此为永泰元年十月之事：“诏税百官钱，市绢十万以赏回纥。”

〔7〕唐之官厅名。掌管有关外国事务、朝贡等事。在长安城内。

〔8〕长安城之城门。

含光门[1]之街，夺说所乘马将去。说脱身避走，有司不能禁。

八年(773年)十一月，回纥140人还蕃，以信物一千余乘。回纥恃功，自乾元(758—759年)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40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1万匹来求市，[2]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3]

十年(775年)九月，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十三年(778年)正月，回纥寇太原，过榆次、[4]太谷，[5]河东节度留后、太原尹、兼御史大夫鲍防[6]与回纥战于阳曲[7]，我师败绩，死者千余人。代州都督张光晟[8]与回纥战于羊武谷，破之，回纥引退。先是辛云京[9]守太原，回纥惧云京，不敢窥并、代，知鲍防无武略，乃敢凌逼，赖光晟邀战胜之，北人乃安。

德宗(780—804年)初即位，[10]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11]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12]不为礼。而九姓胡[13]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其宰相顿莫贺达干[14]谏曰："唐，大国也，且无负于我。前年入太原，获羊马数万计，可谓大捷矣。以道途艰阻，比及国，伤耗殆尽。今若举而不捷，将安归乎?"可汗不

---

〔1〕长安城之城门。

〔2〕《通鉴》记于"大历八年八月"条下。

〔3〕《通鉴》"大历八年十一月戊子"条下有相许市6000匹之事。

〔4〕山西省榆次县，在太原之南。

〔5〕山西省太谷县，在太谷之南。

〔6〕参照《旧唐书》卷146《鲍防传》。

〔7〕山西省临汾县。

〔8〕参照《旧唐书》卷127《张光晟传》。

〔9〕参照《旧唐书》卷110《辛云京传》。

〔10〕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崩，德宗即位

〔11〕即通知代宗崩之事。《通鉴》记梁文秀至回纥于建中元年(780年)"六月条"下。

〔12〕即牟羽可汗(唐朝册封"英义建功"之称号)，《旧唐书·回纥传》此处记其移地健之名。

〔13〕指粟特商人。

〔14〕Ton bagha tarqan，移地健牟羽可汗之从兄弟(据《通鉴》)。

听。顿莫贺乘人之心，因击杀之，并杀其亲信及九姓胡所诱来者凡2000人。[建中元年(780年)]顿莫贺自立号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1]使其酋长建达干[2]随文秀来朝。命京兆尹源休[3]持节册为武义成功可汗[4]。

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回纥可汗[顿莫贺]遣首领墨啜达干、[5]多览将军[6]合阙达干[7]等来贡方物，且请和亲。[8]

四年(788年)十月，回纥公主[9]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门[10]见之。时回纥可汗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上言："昔为兄弟，今为子壻，半子也。"又詈辱吐蕃使者，及使大首领等妻妾凡56妇人来迎可敦，凡遣人千余，纳聘马2000。德宗令朔州[11]、太原分留700人，其宰相首领皆至，分馆鸿泸[寺]、将作[监]。[12] 癸巳，见于宣政殿。乙未，德宗召回纥公主、出[13]使者对于麟德殿，各有颁赐。庚子，诏咸安公主降回纥可汗，仍置府官属视亲王例。以殿中监、嗣滕王湛然为咸安公主婚礼使，关播[14]检校右仆射、送咸安公主及册回纥可汗使。

贞元五年(789年)十二月，回纥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15]薨，废朝三日，文武三品以上就鸿胪寺吊其来使。

贞元六年(790年)六月，回纥使移职伽达干[16]归蕃，赐马价绢三

---

[1] Alp qutlugh bilgä qaghan，回纥第四代可汗。建中元年(780年)即位，贞元五年(789年)去世。

[2]《唐会要》、《通鉴》"建中元年六月"条作"聿达干"。

[3]参照《旧唐书》卷127《源休传》。

[4]武义成功可汗，又称长寿天亲可汗。

[5]墨啜似可读作 Baqčur。

[6]"多览"之原音不详。

[7]读作 Alp kül tarqan。

[8]请求唐朝咸安公主下嫁。

[9]可汗之妹毗伽公主。

[10]长安城皇城之一门。

[11]山西省朔县(大同府朔州)。

[12]掌管土木工事之官厅。

[13]此处"出"似当读作"并"。

[14]参照《旧唐书》卷130《关播传》。

[15]读作 Qutlugh 长寿天亲 bilgä qaghan，即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达干)。

[16]"移职伽"，原音不明。似可推定为 ičigä。

十万匹。以鸿胪卿郭锋[1]兼御史大夫,充册回纥忠贞可汗[2]使。是岁(贞元六年,790年)四月,忠贞可汗为其弟所杀而篡立。时回纥大将颉于伽斯[3]西击吐蕃未回,其次相率国人纵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为可汗,[4]年方十六七。及六月,颉于伽斯西讨回,将至牙帐,次相等惧其后有废立,不欲汉使知之,留锋数月而回。

颉于伽斯之至也,可汗等出迎郊野,陈[5]郭锋[6]所送国信器币,可汗与次将相等皆俯伏自说废立之由,且请命曰:"惟大相生死之。"悉以所陈器币赠颉于伽斯以悦之。可汗又拜泣曰:"儿愚幼无知,今幸得立,惟仰食于阿爹。"[7]可汗以子事之,颉于伽斯以卑逊兴感,乃相持号哭,遂执臣子之礼焉。尽以所陈[8]器币颁赐左右诸从行将士,己无所取。自是其国稍安,乃遣达比特勤、[9]梅录[10]将军告忠贞可汗之哀于我,且请册新君。使至,废朝三日,仍令三品以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

是岁(790年),吐蕃陷北庭都护府。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回纥[11]征求无厌,北庭差近,凡生事之资,必强取之。又有沙陀[12]部落6000余帐,与北庭相依,亦属于回纥,肆行抄夺,尤所厌苦。其先葛禄[13]部落及白服突厥[14]素与回纥通和,亦憾其侵掠。因吐蕃厚赂见诱,遂附之。于是吐蕃率葛[逻]禄、白服[突厥]之

---

[1]百衲本原文"郭锋",后文作"郭锋",《通鉴》作"郭锋"。

[2]本名多罗斯。第四代可汗顿莫贺达干之子。回纥第五代可汗(789年)。称号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Tängridä bolmiš külüg bilgä qaghan)。唐朝赠予忠贞可汗之称号。

[3]读作 Ilügäsi,意为"国之荣光"。

[4]此可汗名阿啜(A čur?)。多罗斯之子。回纥第六代可汗(790—795年),称号为汩咄禄毗伽可汗(Qutlugh bilgä qaghan)。唐朝赠予奉诚可汗之称号。忠贞可汗死于三月,四月阿啜即位。

[5]百衲本缺"陈"字,据殿本补。

[6]此处百衲本、殿本均不作"郭锋",而作"郭锋"。

[7]ata,突厥语"父"之意。汉语也为"父"之意。

[8]百衲本作"赠",殿本作"陈"。

[9]"达比"之原音不明。此处之"特勤"读作 tägin。

[10]梅录(buiruq)系称号,此处为人名。

[11]百衲本、殿本原文作"吐蕃",据殿本考证,基于前后关系应作"回纥"为合理。

[12]又称沙陀突厥,突厥之别种。唐时分布于天山山脉东部。百衲本作"沙驼"。

[13]突厥系部族,Qarluq。唐代分布于天山山脉北部。

[14]种族系统不明。《新唐书·回鹘传》作"白眼突厥"。似应读作"白服"。

众去冬[1]寇北庭,回纥大相颉于伽斯率众援之,频败。吐蕃急攻之,北庭之人既苦回纥,乃举城降焉,沙陀[2]部落亦降。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袭古将麾下二千余众出奔西州[3],颉于利[4]亦还。

六年(790年)[5]秋,悉其国丁壮五万人,召袭古,将复焉,俄为所败,死者大半。颉于利[6]收合余烬,晨夜奔还。袭古余众仅百六十,[7]将复入西州,[8]颉于伽斯绐之曰:"第[9]与我同至牙帐,当送君归本朝。"既及牙帐,留而不遣,竟杀之。自是安西阻绝,莫知存亡,唯西州之人,犹固守焉。颉于伽斯败,葛禄乘胜取回纥之浮图川[10],回纥震恐,悉迁[11]西北部落[12]羊马于牙帐之南以避之。

贞元七年(791年)五月庚申朔,以鸿胪少卿庾鋋兼御史大夫,册回纥可汗及吊祭使。[13] 是月,回纥遣使律支达干[14]等来朝,告小宁国公主薨,废朝三日。故,肃宗以宁国公主降回纥[15],又以荣王女媵之;及宁国来归,荣王女为可敦,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16]二可汗。及天亲可汗立,出居[17]于外,生英武二子,为天亲可汗所杀。无几薨。

七年(791年)八月,回纥遣使献败吐蕃、葛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

[1]贞元五年(789—790年)十二月。

[2]此处百衲本不作"沙驼",而书作"沙陀"。

[3]高昌(吐鲁番)。

[4]应读作颉于伽斯。

[5]原文作"十年",据前后关系为"六年"之误。

[6]当以"颉于伽斯"为正。

[7]百衲本作"六十百",殿本改正为"百六十"。

[8]指龟兹。

[9]百衲本作"互",殿本作"第"。

[10]在西域蒲类县,即北庭都护府治所金满县以东百六十至八十里处,今木垒县。

[11]百衲本作"遣",殿本作"迁"。

[12]此"西北"可能指黠戛斯等俘虏部落。

[13]册立第六代奉诚可汗、吊祭故世之第五代忠贞可汗之使节。

[14]百衲本作"律支达",殿本改正为"律支达干"。

[15]回纥第一代怀仁可汗。

[16]即第二代(葛勒)、第三代(牟羽)两可汗。

[17]百衲本作"屈",殿本作"居"。

畜。先是,吐蕃入灵州,为[1]回纥所败,夜以火攻,骇而退。十二月,回纥遣杀支[2]将军献吐蕃俘大首领结心,德宗御延喜门[3]观之。

八年(792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4]检校右仆射,灵本唐人,姓吕氏,因入回纥,为可汗养子,遂以可汗姓为药罗葛灵,在国用事。因来朝,宠赍甚厚,仍给市马绢7万匹。

九年(793年)九月,遣使来朝贡。贞元十一年(795年)六月庚寅,册拜回纥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禄胡毗伽怀信可汗。[5]

元和四年(809年),蔼德易里禄没弭施合密毗伽可汗[6]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

八年(813年)四月,回鹘请和亲,使伊难珠[7]还蕃,宴于三殿,赐以银器缯帛。是岁,回鹘数千骑至鹏鹈泉[8],边军戒严。

十二月二日,[9]宴归国回鹘摩尼8人,令至中书见宰臣。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500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10]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乃诏宗正少卿李孝诚使于回鹘,太常博士[11]殷侑副之,谕其来请之意。

---

[1]百衲本作"及",殿本作"为"。

[2]原音不明。

[3]长安城皇城门之一。

[4]百衲本作"药罗灵",殿本作"药罗葛灵"。回纥可汗姓Yaghlaqar。

[5]Tängridä ülüg bolmiš alp qutlugh ulughbilgä qaghan,本名骨咄禄将军(Qutlugh sängün),他并非出自药罗葛氏,而是出自跌跌氏。贞元十一年二月第六代阿啜奉诚可汗死后,即位于795年之回纥第七代可汗(795—805年)。唐朝赠予怀信可汗之称号。由于此汗即位,药罗葛王朝血统中绝。

[6]此可汗之称号,"禄"应改为"罗汩","密"为衍字应删。"毗"字百衲本误作"里"。从而其称号读作Ai tängridä qut bolmiš alp bilgä qaghan,此可汗被比定为回纥第八代保义可汗(元和三年至长庆元年,808—821年)。又,有认为怀信可汗与保义可汗之间尚有俱录毗伽可汗的说法(羽田亨《唐代回鹘史研究》)。

[7]人名,Inanu。

[8]百衲本作"鹏鹈泉",据殿本改"鹏"为"鹏"。在包头、五原之北,大碛之南口(《岩佐精一郎遗稿》第94页)。

[9]原文"十二月二日",应作"十二年二月"。

[10]此条与《通鉴》"元和十二年正月"条记事对应。

[11]百衲本、殿本均作"博士",应作"博士"。参照《旧唐书》卷165《殷侑传》。

长庆元年(821年),毗伽保义可汗[1]薨,辍朝三日,仍令诸司三品以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者。四月,正衙[2]册回鹘君长为登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3]以少府监裴通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持节册立、兼吊祭使。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573人入朝迎公主,于鸿胪寺安置。敕:太和公主[4]出降回鹘为可敦,宜令中书舍人王起赴鸿胪寺宣示;以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5]检校户部尚书,持节充送公主入回鹘及册可汗使;光禄卿李宪加兼御史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充判官。吐蕃犯青塞堡,以回纥和亲故也。盐州[6]刺史李文悦发兵击退之。回鹘奏:"以一万骑出北庭,一万骑出安西,拓[7]吐蕃以迎太和公主归国。"其月敕:"太和公主出降回纥,宜特置府,其官属宜视亲王例。"

回纥自咸安公主[8]殁后,屡归款请继前好,久未之许。至元和(806—820年)末,其请弥切,宪宗以北虏有勋劳于王室,又西戎比岁为边患,逐许以妻之。既许而宪宗崩。

穆宗(821—824年)即位,踰年乃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将出降,回纥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9]遣使伊难珠、句录都督思结[10]并外宰相、驸马、梅录司马,兼公主一人、叶护公主一人,及达干并驼马千余来迎。太和公主发赴回纥国,穆宗御通化门[11]左个临送,[12]使百僚章敬

---

[1]《旧唐书·回纥传》未明记保义可汗之即位,《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记其死于"长庆元年二月癸巳"条下。

[2]于宣政殿册封。

[3][Kün]tängridä ulugh bolmiš küčülüg bilgä qaghan,唐朝赠予崇德可汗之称号,回纥第九代可汗(821—823年)。

[4]穆宗皇帝之妹。

[5]参照《旧唐书》卷163《胡证传》。

[6]盐州——宁夏盐池县。

[7]"拓",似可释作"拒"之意。

[8]德宗皇帝第八女。

[9]读作[Ai]tängridä qut bolmiš alq bilgä qaghan,此为已故保义可汗(808—821年)之称号。迎娶太和公主者实际为下一个、第九代崇德可汗(821—823年)。

[10]读作Külüg tutuq siqit。句录都督为称号。

[11]长安城东壁之一城门。

[12]百衲本作"使临送",据殿本改为"临送,使……"。又,《通鉴》"长庆元年七月辛酉"条有云:"太和公主发长安。"

寺前立班,仪卫甚盛,士女倾城观焉。十一月,振武节度张惟清奏:“准诏发兵三千赴蔚州[1],数内已发一千人讫,余二千人,待太和公主出界即发遣。”又奏:“天德[2]转牒云:回鹘七百六十人将驼马及车,相次至黄芦泉迎候公主。”丰州刺史李祐奏:“迎太和公主回鹘三千于柳泉下营拓吐蕃。”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赐回纥马价绢5万匹。三月,又赐马价绢七万匹。是月,裴度招讨幽、镇之乱,回鹘请以兵从度讨伐。[3] 朝议以宝应初回纥收复两京,恃功骄恣难制,咸以为不可,遂命中使止回纥令归。会其已上丰州北界,不从止。诏发缯帛7万匹赐之,方还。[4] 五月,命使册立登啰骨没密施合毗伽昭礼可汗[5],遣品官田务丰领国信十二车使回鹘,赐可汗及太和公主。

长庆二年(822年)闰十月,金吾大将军胡证、副使光禄卿李宪、婚礼使卫尉卿李锐、副使宗正少卿李子鸿、判官虞部郎中张敏、太常博士殷侑送太和公主至自回纥,皆云:初,公主去回纥牙帐尚可信宿,可汗遣数百骑来请与公主先从他道去。胡证曰:“不可”虏使曰:“前咸安公主来时,去花门[6]数百里即先去,今何独拒我?”证曰:“我天子诏送公主以投可汗,今未见可汗,岂宜先往!”虏使乃止。既至虏庭,乃择吉日,册公主为回鹘可敦。可汗先升楼东向坐,设毡幄于楼下以居公主,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以一妪侍,出楼前西向拜。可汗坐而视,公主再俯拜讫,复入毡幄中,解前所服而披可敦服,通裾大襦,皆茜色,金饰冠如角前指,后出楼俯拜可汗如初礼。虏先设大舆曲扆,前设小座,相者引公主升舆,回纥九姓相分负其舆,随日右转于

---

〔1〕河北省蔚县。

〔2〕丰州天德军,鄂尔多斯西北边丰州管下之军。

〔3〕幽州与镇州之武人掀起反乱,裴度任幽镇招抚使讨伐之。此为长庆元年(821年)七月之事,原文误作长庆二年三月。回鹘提出援助也如前述为长庆元年之事。

〔4〕此为长庆二年(822年)三月之事。

〔5〕读作[Ai]tängridä qut bolmiš alp bilgä 昭礼 qaghan,本名曷萨特勒(Qasar tägin?),唐朝赠予昭礼可汗之称号。回纥第十代可汗(长庆三年至太和六年,823—832年)。其可汗号中之“合”字,原文作“令”,兹订正为“合”。昭礼可汗受册封应在宝历元年(825年)五月(《唐会要》、《册府元龟》)。

〔6〕甘州有花门山堡之地,自其地东北千里至回纥本营。又,由此花门被用作回纥之别名。

庭者九，公主乃降舆升楼，与可汗俱东向坐。自此臣下朝谒，并拜可敦。可敦自有牙帐，命二相出入帐中。证等将归，可敦宴之帐中，流连号啼者竟日，可汗因赠汉使以厚贶。

太和元年（827 年），命中使以绢 20 万匹付鸿胪寺宣赐回鹘充马价。三年（829 年）正月，中使以绢 23 万匹赐回纥充马价。七年（833 年）三月，回纥李义节等将驼马到，且报可汗三月二十七日薨，[1]已册亲弟萨特勤。[2] 废朝三日，仍令诸司文武三品、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就鸿胪寺吊其使者。以左骁卫将军、皇城留守唐弘实为金吾将军兼御史大夫，持节充入回鹘吊祭册立使。九年（835 年）六月，入朝回鹘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 7 人，沙陀[3]小儿二人。

开成（836—840 年）初，[4]其相有安允合[5]者，与特勤柴革[6]欲篡萨特勤[7]可汗，萨特勤可汗觉，杀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鹘相掘罗勿[8]者，拥兵在外，怨诛柴革、安允合，又杀萨特勤可汗[9]，以㕎馺特勤[10]为可汗。有将军句录末贺[11]恨掘罗勿，走引黠戛斯领 10 万骑破回鹘城，[12]杀㕎馺，[13]斩掘罗勿，烧荡殆尽，回鹘散奔诸蕃。[14]

---

〔1〕据《通鉴》太和六年（832 年）"三月"条曰：第十代昭礼可汗为其部下所杀，从子胡特勤即位。胡特勤为回纥第十一代可汗，称号 Ai tangridä qut bolmiš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唐朝赠予彰信可汗之称号。

〔2〕似指曷萨特勤（昭礼可汗），此为有关胡特勤彰信可汗之事实之误记。又，百衲本作"以册亲弟萨特勤"，殿本书"以"为"已"。

〔3〕殿本作"沙陀"。

〔4〕到㕎馺特勤即位为止的记事，《通鉴》开成四年（839 年）"是岁"条下所记大致相同。

〔5〕原语不明。"安"指出身于布哈拉之"安姓"。或系粟特人。

〔6〕柴革——《通鉴》开成四年条作"柴革"（按：原文作"草"，今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改）。

〔7〕如前所述指曷萨特勤，实际应为胡特勤彰信可汗。

〔8〕有读作 Küräbür? 的说法。此人可能出身于九姓回鹘之一掘罗勿氏

〔9〕如前所述，应为胡特勤彰信可汗。

〔10〕百衲本作"卢级"，《唐会要》作"㕎飒"，殿本作"㕎馺"。《新唐书・回鹘传》作"㕎馺"。

〔11〕读作 Külüg bagha。

〔12〕鄂尔浑河畔之回鹘都城哈剌・巴剌合孙。

〔13〕百衲本作"卢级"，应作"㕎馺"。

〔14〕回鹘帝国灭亡于 840 年 10 月。

有回鹘相驱职[1]者,拥外甥庞特勤[2]及男鹿并遏粉[3]等兄弟5人、15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注:龟兹)。[4] 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5]

初,黠戛斯破回鹘,得太和公主。黠戛斯自称李陵[6]之后,与国同姓,遂令达干10人送公主至塞上。乌介途遇黠戛斯使,达干等并被杀,太和公主却归乌介可汗,乃质公主同行,南渡大碛,至天德界,奏请天德城与太和公主居。[7]

有回鹘相赤心者,与连位相姓仆固者,与特勤那颉啜[8]拥部众,不宾乌介。赤心欲犯塞,乌介遣其属嗢没斯[9]先布诚于天德军使田牟,然后诱赤心宰相同谒乌介可汗,戮赤心于可汗帐下并仆固二人。那颉战胜,[10]全占赤心下7000帐,东瞰振武、大同,[11]据室韦、黑沙、榆林,[12]东南入幽州[13]雄武军西北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14]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颉之众,全收7000帐,杀戮收擒老小近9万人。那颉中箭,透驼群潜脱,乌介获而杀之。乌介诸部犹称10万众,驻牙大同军北闾门山,时会昌二年(842年)秋,频劫东陕已北,天德、振武、云朔,[15]比罹俘戮。诏诸道兵悉至防捍,以河东节度使刘沔充南面招控回鹘使;以

---

[1]原语不明。有推定为Sabči或Savči的说法。

[2]百衲本作"特庞勤",据殿本改正为"庞特勤"。"特勤"为称号tägin。

[3]男鹿不可读作"儿子鹿","鹿"为人名。遏粉也是人名,其原语不明。

[4]关于以上回鹘南走、分散之事,《通鉴》开成五年(840年)"九月"条有相应记事。文中之吐蕃并非西藏,而是甘肃地区。

[5]参照《通鉴》会昌元年《841年》"二月"条。乌介特勤为昭礼可汗之弟、彰信可汗之叔(据《唐会要》)。到乌介投降中国为止,其间颇多曲折,有另行研究之必要。

[6]前汉武将,投降匈奴者。

[7]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末之事(据《通鉴》)。此事又记载于《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会昌元年八月"条下。

[8]有将原语比定为粟特语nākhiδ(金曜)的说法(羽田亨:《唐代回鹘史》第292页注191),也有读作Nair čur者。

[9]原语被比定为粟特语Wurmaẓt(木曜)。

[10]有谓此句有误者(羽田亨前揭书,第292页注193)。

[11]在山西省朔县所设置之军。

[12]归化城以北70里之地。

[13]幽州在今北京地区

[14]参照《旧唐书》卷180《张仲武传》。

[15]此三州在今山西省北部长城地带。

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充东面招控回鹘使。

[会昌]二年(842 年)冬、三年(843 年)春,[1]回鹘特勤庞俱遮、阿敦宁二部,[2]回鹘公主密羯可敦[3]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4]一部,及牙帐大将曹磨你[5]等七部,共 3 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有特勤嗢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三部,[6]回鹘相爱耶勿弘顺、[7]回鹘尚书吕衡等诸部降振武,三部首领皆赐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贞、思惠、思恩,充归义使。有特勤叶被沽兄李[8]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勤可质力[9]二部东北奔大室韦,有特勤荷勿啜[10]东讨契丹,战死。

会昌三年(843 年),回鹘尚书仆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 80 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 4 人已先入振武军[11]。是夜,河东刘沔[12]率兵奄至乌介营,乌介惊走东北约 400 里外,依和解室韦[13]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走。丰州刺史石雄[14]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15] 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847 年)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 10 万,所存止 3000 以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付之。

---

[1]殿本作“二年冬三月春”,羽田亨采用此一读法,释作“二年三月春”(羽田亨前揭书,第 241 ~248 页)。

[2]此二人之名原语不明。

[3]“密羯”之原语可能为 bilgä。

[4]阿跌——ädiz。

[5]曹,似为西域人名之“曹”,此人被认为是粟特人。

[6]阿历支、习勿啜之原语不详。

[7]“爱邪勿”为九姓回纥之一姓,原语被推定为 Ayamur? 等。“爱”字百衲本作“受”,兹据殿本订正为“爱”。

[8]此人名之读法不详。

[9]原语不详

[10]荷勿啜——ghâ-miuət čur 特勤(tägin)为称号。

[11]百衲本作“雄武军”,殿本作“振武军”。

[12]参照《旧唐书》卷 101《刘沔传》。

[13]和解室韦应即“黑车子室韦”,分布于张家口之北边(羽田亨前揭书第 255 页)。“依”字百衲本作“求”,殿本作“依”。

[14]参照《旧唐书》卷 161《石雄传》。

[15]以上“会昌三年”条与其他史料矛盾之处甚多,其细微之处有必要另行研究。

为回鹘相美权者[1]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2]于金山,以其弟特勤遏捻[3]为可汗,复有众5000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4]。

大中元年(847年)春,张仲武大破奚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848年)春,唯存名王[5]贵臣500人以下,依室韦。张仲武因贺正室韦经过幽州,仲武却令还蕃,遣送遏捻等来向幽州。遏捻等惧,是夜与妻葛禄、子特勤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奔之不及,回鹘诸相达官老幼大哭。

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分,七姓室韦各占一分。经三宿,黠戛斯相阿播[6]领诸番兵称7万,从西南天德北界来取遏捻及诸回鹘,大败室韦。回鹘在室韦者,阿播皆收归碛北。在外犹数帐,散藏诸山深林,盗劫诸蕃,皆西向倾心望安西庞[特]勤[7]之到。庞[特]勤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8],无复昔时之盛。到今时遣使入朝,进玉马二物及本土所产,交易而返。

史臣曰:……[下略]

(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2卷,东京,1979年,第301~362页。)

[1]"美权者"——语义不明确。

[2]乌介之死疑为大中元年之事,此前似为会昌六年之事。

[3]遏捻之音为且 ât-niep。

[4]百衲本作"石舍郎",殿本作"硕舍朗"。

[5]百衲本作"名主",殿本作"名王",名王为有势力王侯之意。

[6]人名,似为 Apa。

[7]庞之音被认为作 bâng。

[8]向安西移动之回鹘移至东方甘州之事,难以直接确认。从其后情势看来,移动至甘州之回鹘成为被称为甘州回鹘之集团。

13 《新唐书·回鹘传》笺注

〔日〕佐口透

13.1 卷上

[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第6111页11行]有时健俟斤[1]者,众始推为君长。

[6112页2~3行]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颉利[可汗]遣欲谷设领骑10万讨之,菩萨身将5000骑破之马鬣山,[2]追北至天山。

[6112页5~6行]菩萨死,其酋胡禄俟利发[3]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4]并有其地。

[6113页1~2行]帝坐秘殿,陈十部乐。[5]

[6114页1~2行]龙朔中,以燕然都护府领回纥,更号瀚海都护府,以碛为限,大抵北诸蕃悉隶之。[6]

[6114页2~3行]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7]云。

[6114页3~4行]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

---

〔1〕时健俟斤——《旧唐书·回纥传》作特健俟斤,"特"与"时"必有一误。回纥第一代部长。有将时健之原语释作 jegän(甥,或用作专名)的说法。

〔2〕位置不明,一定为漠北之一山。参照《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尒传》"贞观元年"条。

〔3〕胡禄俟利发为称号,读作 ulugh iltäbär。

〔4〕此为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之事(据《通鉴》)。

〔5〕唐代十种音乐。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胡旋舞、康国伎等西域系十部之音乐。

〔6〕龙朔三年(663年)二月之事。瀚海都护府设置于云中城,翌年改称单于都护府。

〔7〕赤水军——唐代在凉州地区设置之军。

啜,[1]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2]与同罗、霫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3]北。

[6114页5~10行][承宗]族子瀚海府司马护输乘众怨,共杀[王]君㚟(开元十五年,727年),梗绝安西诸国朝贡道。久之,奔突厥,死。子骨力裴罗立。会突厥乱,天宝(742—755年)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蜜击走乌苏可汗。[4] 后三年(天宝三年,744年),袭破拔悉蜜,斩颉跌伊施可汗[5],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义王,南居突厥故地,徙牙乌德鞬山、昆河[6]之间……悉有九姓[7]地。九姓者,曰药罗葛,曰胡咄葛,曰啒罗勿,曰……

[6114页15行]明年(天宝四年,745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8],遣顿啜罗[9]达干来上功。

[6115页6行]帝驻彭原,使者葛罗支[10]见。

[6119页7~8行]于是册可汗曰颉咄登里骨啜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11]。

[6121页10~11行]酋长突董、翳蜜施。[12]

[6122页3行]回纥使聿达干。[13]

---

[1]伏帝匐(695—719年?)攻突厥默啜之事,非确实之史实。又,默啜死于开元四年(716年)(钧注:意谓并非死于伏帝匐继立之第二年)。

[2]读作 irkin iltäbär,此语原为王侯之称号。又,"别部"之意不明,其君长似为伏帝匐。

[3]山西省朔县东北四十里马邑镇设置之军,唐中期以后为大同军。

[4]正确而言为乌苏米施(özmiš)可汗,突厥末期之可汗。《新唐书》卷133《王忠嗣传》"天宝元年(742年)"条,卷215下《突厥传》也有记载。

[5]拔悉蜜之可汗。颉跌伊施被推定为 iltäriš 之音译。

[6]河名,应作嗢昆河(Orqon)。

[7]此处应释作九姓铁勒之地。下文之九姓则指九姓回纥。

[8]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之弟。

[9]"顿啜"为称号,"罗"似为人名。

[10]回纥人名,原音似可推定为 Qalač。

[11]牟羽可汗之称号。但其语句错乱,正确应称"登里罗汨没蜜施颉咄登蜜施合俱录毗伽可汗(Tängridä qut bolmiš il tutmiš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唐朝授与之称号为英义建功可汗。

[12]突董似同于吐屯,为突厥官号 tudun。翳蜜施似可读作 itmiš(按:结合《新唐书·回鹘传》这部分前后文,此处"突董"恐应为人名。另,原文作者认为"突董"系"翳蜜施"之官号,故原文正文二者间无标点,今据中华书局校本添加)。

[13]前文作"建达干","聿"、"建"不知何者正确。

[6123 页 15 行～6124 页 1 行]明年(贞元四年,788 年),[1]可汗遣宰相跌跌[2]都督等众千余,并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逆主,且纳聘。

[6124 页 11～12 行]贞元五年(789 年),[汨咄禄长寿天亲毗伽]可汗死,子多逻斯立,国人号"泮官[3]特勤"……册拜爱登里逻汨没蜜施俱录毗伽忠贞可汗。[4]

[6125 页 2 行]白眼[5]突厥。

[6125 页 7～8 行]是岁(贞元六年,790 年),[忠贞]可汗为少可敦叶公主[6]所毒死,可敦亦仆固怀恩之孙,怀恩子为回鹘叶护,故女号叶公主云。

[6125 页 8～9 行][前]可汗[7]之弟乃自立,[颉于]迦斯方攻吐蕃,其大臣率国人共杀篡者,以[前]可汗[8]幼子阿啜嗣。

[6126 页 2～3 行][贞元]十一年(795 年),[奉诚]可汗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9]

[6126 页 6 行]永贞元年(805 年),[怀信]可汗死。诏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所嗣为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10]

---

[1]据《旧唐书·回纥传》及《唐会要》卷 6"杂录"条在贞元四年十月。

[2]跌跌为阿跌(ädiz)之讹。

[3]泮官,《册府元龟》作"判官",可能为汉语官名。

[4]Ai tängridä qut bolmiš külüg bilgä qaghan,回纥第五代可汗(789 年)。唐朝赠封为忠贞可汗。

[5]《旧唐书·回纥传》作白服突厥。似以作"白服"为正确。

[6]读作 Yab qunčuj。

[7]指第四代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达干)。(钧案:此注与同氏《旧唐书·回纥传》笺注不符)。

[8]指第四代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达干)。(钧案:此注与同氏《旧唐书·回纥传》笺注不符)。

[9]Ai tängridä ülüg bolmiš alp qutlugh ulug bilgä qaghan。唐赠封怀信可汗之称号。跌跌氏出身,回纥第七代可汗(795—805 年),可汗号中补记入 qutlugh。

[10]此可汗称为 Tängridä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被记载为继怀信可汗即位之可汗,羽田亨认为有此俱录毗伽可汗,山田信夫根据考证,考定继怀信可汗即位者为第八代可汗保义可汗。参照山田信夫:《九姓回鹘可汗系谱》。

[6126 页 7～8 行]元和初(元和元年,806 年),再朝献,始以摩尼[1]至,其法日晏食,饮水茹荤,屏湩酪,可汗常与共国者也。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

[6126 页 9～10 行]无几,可汗亦死,宪宗使宗正少卿李孝诚册拜爱登里罗汩蜜施合毗伽保义可汗。[2] 阅三岁,[3]使者再朝,遣伊难珠再请婚,不报。

13.2 卷下

[6129 页 5～6 行]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4]

[6129 页 6 行]句录、都督思结。[5]

[6129 页 8 行]诏以太和公主下降。主,宪宗女[6]也。

[6130 页 10～11 行]开成四年(839 年),其相掘罗勿作难,引沙陀共攻[彰信]可汗,可汗自杀,国人立㕎馺[7]特勤为可汗。

[6131 页 1～2 行]其相馺职与庞特勤[8]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于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勤为可汗,南保错子山。[9]

[6131 页 3～4 行][乌介]进攻天德城,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伽

---

[1]指摩尼教徒.被认为是粟特人。

[2]Ai tängridä qut bolmiš alp bilgä qaghan,回纥第八代可汗(808—821 年),唐朝赠封之称号为保义可汗。

[3]元和六年(811 年)。

[4][Kün]tängridä ülüg bolmiš kücülüg bilgä qaghan,回纥第九代可汗(821—823 年)。唐朝赠封之称号为崇德可汗。长庆元年(821 年)即位。

[5]Külüg tutuq Siqit。

[6]实际上宪宗之女定安公主元和十五年(820 年)降嫁保义可汗,此可汗死,穆宗重新以第十妹嫁崇德可汗。原文误记作"宪宗之女",应作"穆宗之女"。(钧案:原注误,太和公主为穆宗之妹,也即宪宗之女。原文不误。)据《唐会要》卷 6"和蕃公主"条,太和公主于长庆元年二月降嫁回纥崇德可汗出发。

[7]"㕎馺"之原语不明。回纥第十二代可汗(839—?)。

[8]殿本作"庞特勤"。"厖"音 mbang,"庞"音 b'ang,此人名似可推定为 Mangtägin。

[9]错子山之位置不明,被认为在回鹘本土南方,即戈壁沙漠北边。又,此节之事件可认为会昌元年(841 年)十一月末之事。

关[1]拒却之。

[6131 页 5～6 行]其相赤心与王子嗢没斯、[2]特勤那颉啜[3]将其部欲自归。

[6131 页 11 行]那颉啜收赤心众 7000 帐东走振武、大同，因室韦、黑沙[4]南閲幽州。

[6133 页 10 行～6134 页 1 行][庞]特勤已自称可汗，居甘州，有碛西诸城。宣宗（847—859 年）务绥柔荒远，遣使者抵灵州省其酋长，回鹘因遣人随使者来京师，帝即册拜嗢禄登里逻汨没蜜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5] 后十余年，一再献方物。懿宗（860—873 年）时，大酋仆固俊[6]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7]尽取西州、轮台[8]等城，使达干米怀玉[9]朝，且献俘，因请命，诏可。其后王室乱，贡会不常。史亡其传。[10]

[6134 页 5 行]薛延陀者，先与薛种杂居，后灭延陀部有之，号薛延陀，姓一利咥氏。[11]

[6134 页 7 行]西突厥处罗可汗之杀铁勒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据贪汗山，[12]奉薛延陀乙失钵为野咥可汗，[13]保燕末山。

[6134 页 11 行]乙失钵孙曰夷男。[14]

---

[1]此事实可能有误，参照《新唐书》卷 171《刘沔传》。又，云伽关位于天德城之北。

[2]原语比定为粟特语 urmazt，音似为 Ormuz。

[3]原语为粟特语 nakhiδ 加“啜”（čur），或 Nail čur。

[4]《旧唐书・回纥传》作“黑沙榆林”，为归化城北七十里之地。

[5]读作 ulugh tängridä qut bolmiš alp külüg bilgä qaghan，唐朝赠封“怀建”之称号。册封怀建可汗为大中十年（856 年）之事。

[6]仆固部出身之此酋，占据西州（高昌）、北庭。

[7]论尚热——应读作论恐热（Blon khoṅ－bsher），或者又书作尚恐热（shoṅ khoṅ－bsher）。

[8]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之东。

[9]“米”为粟特出身者所使用之姓。

[10]实际上移住于河西、天山方面之回鹘族历史在《五代史》、《宋史》等书上有作为甘州回纥、西州回鹘、高昌回鹘之记载。彼等又被称为所谓天山回鹘。

[11]《通典》卷 199 作“可汗姓壹利吐氏”。此似可读作 iltäriš。

[12]指天山山脉东部之一峰博格多山。

[13]野咥——似指 Yädiz（ädiz），有人认为指一利咥或 ärtis。

[14]人名，读作 Inäl。

[6135 页 1～2 行]册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1]……树牙郁督军山……东靺鞨，西叶护突厥，南沙碛，北俱伦水，[2]地大众附。

[6135 页 5～6 行]胜兵 20 万，[夷男]以二子大度设、突利失[3]分将之，号南、北部。

[6135 页 10 行]乃使大度设勒兵 20 万，南绝漠，壁白道川。[4]

[6136 页 13 行]又遣其仲父沙钵罗[5]献马 3000。

[6137 页 3 行][帝]召突利失[6]大享。

[6138 页 4～5 行]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7]

[6138 页 8 行]阿波设。[8]

[6138 页 10～11 行]众五六万奔西城，立真珠毗伽可汗昆弟子咄摩支，号伊特勿失[9]可汗。

[6139 页 2～4 行]初，延陀将灭，有丐食于其部者，延客帐中，妻视客人而狼首，主不觉，客已食，妻语部人共追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灭。"追者惧，却走，遂失之。至是果败此山下。[10]

[6140 页 1～2 行]有川曰康干河，[11]断松投之，3 年辄化为石，色苍緻，然节理犹在，世谓康干石者。

[6140 页 2 行][拔野古]风俗大抵铁勒也，言语少异。[12]

[6140 页 4 行]大俟利发屈利失。[13]

---

[1] Yinčü bilgä qaghan。

[2]《旧唐书·铁勒传》作"俱伦山"。

[3]大度设，读作 Tarduš šad，突利失读作 Töliš。

[4]在今内蒙古归化城(绥远)西北 30 里吴公坝方面。

[5]号泥敦俟斤(Nidun irkin)。

[6]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之侄突利设，参照《通鉴》"贞观十七年六月丁巳"条。

[7]读作 Illig külüg šad lstämi qaghan，"薛"似为衍字。

[8]读作 Apa šad。

[9]可能为 itmiš(树立)之音译。

[10]此狼首人身神，意谓蒙盖狼面之萨满(巫师)也，他的话可理解为预言薛延陀灭亡之传说。

[11]可认为指黑龙江。此河产青黑坚石，有使用作箭头之风习。

[12]尽管拔野古也是铁勒之一部，但《新唐书》如此记述，似应认为撰者记述的混乱。

[13]屈利失——原音不详，或可推定为 kül šad。

[6140页8行][仆骨之]酋娑匐俟利发歌滥拔延。[1]

[6141页2行]"曳落河",[2]犹言健儿云。

[6143页1~3行]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3]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4] 永徽初(永徽元年,650年),高偘之伐车鼻可汗,[5]三族皆内属。

[6143页12~13行]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为贺腊毗伽可汗。[6]

[6144页2~4行]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濒小海,西坚昆,南回纥,分三部,皆自统制。[7] ……死以木匮敛置山中,或系于树。[8]

[6145页3~6行]白霫居鲜卑故地,直京师东北5000里,与同罗、仆骨接。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南契丹,北乌罗浑,东靺鞨,西拔野古,地圆袤2000里,山缭其外,胜兵万人。业射猎,以赤皮缘衣,妇贯铜钏,以子铃缀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其君长臣突厥颉利可汗为俟斤。[9]

[6145页9行]斛薛[10]处多滥葛北,胜兵万人。奚结[11]处同罗北。

[6146页3~4行]又有鞠,或曰裓,居拔野古东北,有木无草,地多

---

[1]读作 Säwäg iltäbär qaling bayan qaling,有"结纳品"之意。"娑匐"异文作"婆匐",未知孰是。

[2]曳落河,似为突厥语,有谓为与察合台语 yilang(轻装兵)有关系之语词(羽田亨:《唐代回鹘史研究》)。

[3]北庭为别失八里,金山为阿尔泰山脉。仆固振水不详,似为额尔齐斯河上游。多怛岭可认为是塔尔巴哈台山脉,其原语不详。

[4]对比有关葛逻禄之穆斯林史料,谋落(或谋剌)读 Bulāq,炽俟读 čigil,踏实力读 Tukhsī。婆匐(可能为娑匐)为炽俟部内之氏族。参照米诺尔斯基译注:《世界境域志》Khallukh 项。

[5]阿尔泰山地区突厥别部之可汗。

[6]贺腊之原语可能为 Alp。相当于《新唐书·突厥传》之"颉跌伊施(Iltäriš)可汗",此可汗似有二个称号。

[7]都播或都波,殆即后之图瓦人。小海或即贝加尔湖。其住地被认为在坚昆族所住叶尼塞河之东。

[8]遗骸系于树枝上之葬礼,为西伯利亚原住民多见之习俗。

[9]霫与白霫为不同部族,上文将两者混同记述。霫为东胡后裔,为蒙古系部族,分布于鲜卑故地。白霫为突厥系,分布于拔野古东邻地。详见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所收)。

[10]两个部族名,被当做斛与薛之合成语。

[11]《旧唐书·回纥传》作跌结,关于其系统不详。

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惟食苔,俗以驾车。又以鹿皮为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1]

[6146页6行]又有駮马者,或曰弊剌,曰遏罗支,[2]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北极于海……覆桦为室。各有小君长,不能相臣也。[3]

[6146页10行]大汉[4]者,处鞠之北,饶羊马,人物颀大,故以自名。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谦河?)之濒。

[6146页12行~6147页4行]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5] ……直回纥西北3000里,南依贪漫山[6]。

[6147页4~5行]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7]

[6147页7行]谓岁首为茂师哀。[8]

[6147页12行]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9]。

[6147页14行]其君曰“阿热”。[10]

[6148页1~2行]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11]

[6148页4~5行]祠神唯主水草,祭无时,呼巫为“甘”[12]。

---

[1]鞠为西伯利亚饲育驯鹿之部族,被推定为通古斯系或叶尼塞·鄂斯契克系。

[2]駮(青白色花斑)为突厥语 ala(駮马)之音译。遏罗支也被当做突厥语 alaq(駮马)之音译。弊剌被认为即突厥诸方言 čubar(灰色、花斑之意)。参照《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第615~620页。

[3]似在叶尼塞河上游黠戛斯族之北方,分布至北冰洋方面,似非突厥语种族。

[4]分布于贝加尔湖西北方,被推定为叶尼塞种。

[5]关于黠戛斯之住地,记述不正确。其本土在叶尼塞河上游。

[6]似指唐努乌拉岭之东南峰。

[7]有显现出雅利安人种特征之处。

[8]突厥语 mös ai,意为“冰月”。

[9]迦沙——有原语为萨莫耶德语 kües(铁)的说法。

[10]有认为阿热之唐代音近乎 a-net,推定阿热为突厥语 inäl 的音译的说法。13世纪初有一乞儿吉思部长名为 urūs-ināl,可与此 ināl 加以比较。

[11]白鸟库吉认为“密的支它”为一词组,“密的”为萨莫耶德语 muat、mat(帐之意),“支它”为鄂斯克语 xot, kât(家、帐之意)。又,阿热本营驻在之青山被推定为殆即唐努拉岭之北峰喀喇·腾格里山。

[12]突厥语 qam,即萨满(巫师)之意。

[6148 页 12 行]东至木马突厥 3 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1]

[6149 页 2 行]其[坚昆之]酋长 3 人，曰讫悉辈，曰居沙波辈，曰阿米辈。[2]

[6149 页 8～9 行]后狄语讹为黠戛斯，盖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3]

[6149 页 11 行]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毗伽顿颉斤"。[4]

[6150 页 1 行]牢山亦曰赌满。[5]

[6150 页 4～5 行]会昌中……复遣注吾合素上书言状。注吾，虏姓也；合，言猛；素，左也；谓武猛善左射者。[6]

（辑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东京，1979 年，第 365～458 页。）

---

[1]都播（都波）为近代之山地阿尔泰族之图瓦人。弥列哥，不详。饿支相当于《元史》之玉须（üs）、乌斯（üs）兀儿速、兀速，拉施特记作 urasūt，指叶尼塞河上游之乌斯河，又指得名于河名之部族。

[2]此三人名之原语不详，"辈"为意为王侯、酋长之官号 bai。

[3]以"黔戛斯"一词为如此含义，无法确认。

[4]读作 Bilgä ton irkin。

[5]殿本作"赌蒲"。相当于前述贪漫山，似皆指唐努乌拉岭。

[6]"合"为 alp（勇敢的），"素"释作 sol（左），为突厥语。注吾之意义不明。

14 《旧唐书·铁勒传》笺注

〔日〕佐口透

[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第5344页1行][铁勒]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1]

[5344页1~3行]西突厥射匮可汗[2]强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乙失钵所部在金山者,西臣于叶护。[3]

[5344页11~13行][贞观]四年(630年),平突厥颉利之后,朔塞空虚,夷男率其部东返故国,建庭于都尉揵山[4]北,独逻河之南,在京师北3300里……立其二子[5]为南北部。

[5345页12行][贞观]十六年(642年),遣其叔父沙钵罗泥敦策斤[6]来请婚。

[5346页10行][薛]延陀复遣突利失[7]击思摩。

[5347页8行起]太宗至灵州,其铁勒诸部相继至数千人,仍请列为州县,北荒悉平。诏[8]曰:"……"

---

〔1〕此薛延陀为残留漠北之薛延陀,燕末山似为阿尔泰山之一峰,下文所载贞观三年叛颉利之薛延陀为向金山西南移动者。

〔2〕西突厥可汗(在位611—617年?)。达头可汗之孙。

〔3〕叶护——突厥王号yabghu,此处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Ton yabghu qaghan。

〔4〕据《通鉴》"贞观十二年八月"条,都尉揵山位于郁督军山东南。有认为似当读作尉都揵山,即是郁督军山。

〔5〕指拔灼与颉利苾。

〔6〕《通鉴》"贞观十六年九月癸亥"条作"沙钵罗泥熟俟斤",比较两文应读作"泥敦俟斤"(Nidun irkin)。

〔7〕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之侄突利设,"突利"读作Töli,"设"为突厥称号šad。参照《通鉴》"贞观十七年六月丁巳"条。又有将"突利失"释读为Töliš者。

〔8〕此为《破薛延陀告庙沼》或《破契苾幸灵州诏》,贞观二十年八月之诏,收于《唐大诏令集》卷79。文中"月禄(=胡禄)俟利发"读作ulugh iltäbär,指回纥部长吐迷度,参照《回鹘传》。

[5349 页 2 ~ 3 行][贞观二十一年,铁勒十余部置十三州府],又置燕然都护[1]以统之。

[5349 页 6 行]其骨利干北距大海。[2]

(辑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 2 卷,东京,1979 年,第 10 ~ 25 页。)

[1]治所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今五原方面。燕然都护府,后来移至漠北郁督军山成为瀚海都护府。

[2]可能指北冰洋或贝加尔湖。

15　西突厥传、回鹘传、铁勒传参考书目

〔日〕佐口透

沙畹:《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1903 年版(冯承钧汉译本,1934 年商务印书馆刊)。

羽田亨:《论九姓回鹘与 Toquz Oghuz 之关系》,转《东洋学报》9 卷 1 期,1919 年,第 1~61 页,第 141~145 页,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1957 年东洋研究会刊。

桑田六郎:《回纥衰亡考》,载《东洋学报》17 卷 1 期,1928 年,第 111~136 页。

岩佐精一郎:《关于突厥之复兴》(《岩佐精一郎遗稿》1936 年刊,第 77~168 页)。

米诺尔斯基译注:《世界境域志》,回历 372 年即公元 982 年的波斯地理书,伦敦,1937 年。

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报》7 卷 1、2 期,1938 年,第 1~55 页)。

小野川秀美:《铁勒之一考察》(《东洋史研究》5 卷 2 期,1939 年,第 1~39 页)。

田坂兴道:《关于中唐西北边疆情势》(《东方学报》东京 11 卷 2 期,1940 年,第 171~211 页)。

田坂兴道:《关于漠北时代回纥诸城郭》(《蒙古学报》卷 2, 1941 年,第 192~243 页)。

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译注》(《满蒙史论丛》卷 4,1943 年,第 249~427 页)。

小野川秀美:《蒙古史——中世》(《支那周边史》上册,1943 年,白杨社刊,第 335~427 页)。

前田直典:《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东洋学报》32 卷 1 期,1948 年第 62 ~91 页)。

护雅夫:《关于高车传所见诸氏族名》(《东方》卷 1,1948 年,第 142 ~154 页)。

山田信夫:《九姓回鹘可汗系谱》(《东洋学报》33 卷 3、4 期,1950 年,第 90 ~113 页)。

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研究》(1955 年,汇文堂书店刊)。

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研究》(1955 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刊)。

哈密尔顿(J. R. Hamilton)《汉文文献所载五代时之回鹘》,巴黎,1955 年。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 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刊。

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略论九姓乌古思问题》,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37 卷 1 ~2 期(1956 年),第 33 ~42 页。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1957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1957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刊。

羽田亨:《唐代回鹘史研究》(《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卷历史篇,1957 年,第 157 ~324 页)。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上、下卷(1958—1959 年,东洋史研究会刊)。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1958 年,北京,中华书局刊)。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 年,北京,中华书局刊)。

冯家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1958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刊)。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1958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刊)。

刘茂才:《东突厥史汉文史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 年。

哈密尔顿:《脱忽思乌古思与翁回鹘》,载《亚洲学报》,1962 年,第 23 ~63 页。

李符桐:《回鹘史》,1963 年,台北,文风出版社刊。

松田寿男:《有关绢马交易之史料》,转《亚洲内陆史论集》,1964年,第1~14页。

松田寿男:《新乐府中所见唐回鹘关系》,载《亚洲内陆史论集》,1964年,第95~110页。

内田吟风:《西突厥初世史研究》一、二、三,载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33号,1964年,第44~60页;36号,1965年,第38~55页;46号,1970年,第1~23页。

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之灭亡》,载《古代史讲座》第11卷,1965年,第199~228页。

护雅夫:《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卷1,1967年,山川出版社刊。

根本诚:《关于唐代天可汗》,载《游牧社会史探究》第36册,1968年。

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1968年,台湾,文风出版社刊。

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族史研究》,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1968年,第57~70页。

品克斯(E. Pinks):《宋代初期甘州回鹘(960—1028年)》,威斯巴登,1968年。

纳捷良耶夫等编:《古突厥语词典》,列宁格勒,1969年。

《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1970年,岩波书店刊。

艾达罗夫:《七世纪鄂尔浑古突厥文文献的语言》,阿拉木图,1971年。

马凯拉斯(Máckerras,C.):《唐书所载之回鹘帝国:744—840年中国—回鹘关系研究》,堪培拉,1972年。

森安孝夫:《关于回鹘西迁》,载《东洋学报》59卷第1、2期,1977年,第105~130页。

(译自佐口透等译注《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第2卷,东京,1979年,第459~462页。)

16 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

〔日〕内田吟风

16.1 序言

193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 F. J. 特加特教授在其所著《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书[1]中认为要真正理解古代欧洲的历史，不可能不顾亚洲的历史，他举出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之间的罗马为其中一例，指出在此期间欧洲境内的罗马帝国共发生了40件侵掠暴动事件，其中至少有27件实际上发源于相当于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匈奴与中国之间的斗争。

此事表明匈奴不仅对秦汉中国帝国有威胁，而且还影响到遥远西方的罗马帝国(在匈奴作为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境内以前就已影响到罗马帝国)。匈奴通过月氏民族间接地使伊朗北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世界发生激变，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兹将公元前罗马人已知东亚匈奴存在之事详细介绍于下节，其中有 K. 内密提及、J. 夏尔潘提尔两氏的考证。

特加特氏所论及的匈奴在世界史上所具有的政治作用的重要性，重新唤起我们的注意和兴趣。但现在许多研究家对匈奴的文化社会方面关心得更多。近年来在诺音乌拉、德列斯托维斯克、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伊勒莫伏以及鄂尔多斯、察哈尔各地发现匈奴遗迹及对其遗物的研究、搞清匈奴物质文化的本来面目，已驰名于世，并且伏尔加

〔1〕Frederick J. Teggart, Rome and China: A Study of Correlations in Historical Events (California, 1939)。日译本有山崎升译:《罗马与中国》，昭和19年(1944年)山一书房版。

流域、匈牙利各地的匈人遗迹也会有完全同样的结果。[1] 根据同时对发现的为数众多的匈奴人的遗骨的解剖学测量,我们对匈奴人的人种体型知道得极为明确。又,主要发端于搞清匈牙利语中突厥、蒙古语性质的借词的本质而对楚瓦什[2]语所作的研究,解决了多年的疑问,得出了匈人语、匈奴语一致的结论。

如今我们在中国青铜器上见到的斯基泰、萨尔马泰潮流,如果把匈奴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除外,就不可理解了。还有,在匈奴的遗迹中发现的丰富的博斯普鲁斯的希腊织布、萨尔马泰系纹样的饰金数以及在匈人遗物中被认出的中国美术样式,使我们对他们在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有了全面的认识。又,属于阿尔泰语的不里阿耳楚瓦什语的存在,从匈奴的西迁考虑起来可得到初步了解。

这样,对匈人、匈奴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就使前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匈人问题、匈人及匈奴的人种分类问题,以及匈人、匈奴的同族非同族问题的解决大有进展。本文主要回顾20世纪以来对同族非同族问题的研究经过,并试图对今后残留的若干问题进行概述。

---

〔1〕见江上波夫氏的著作,尤其是《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昭和23年(1948年)、《欧亚大陆北方文化研究》[昭和26年(1951年)]中所收各篇,又见梅原末治氏:《古代北方系文化研究》,昭和13年。当然,这些遗物同时也是匈奴的精神生活的反映。例如,见V. V. 戈利摩斯坦:《从古代西伯利亚的祭祀范围说起》、J. G. 安德森:《扮作动物模样的狩猎咒术》(早川二郎译,《考古学概论》所收)。

又,在本论文原刊之后出版的角田文卫氏:《古代北方文化研究》,昭和29年(1954年),江上波夫氏:《斯基泰系游牧文化》(《亚洲文化史研究》1965年版)以及加藤九祚1971年以后主编的季刊《欧亚大陆》上发表的诸译著,对苏联的匈奴遗物调查颇多述及。

〔2〕匈人后裔楚瓦什人在很大程度上已斯拉夫化,在前苏联境内的楚瓦什共和国及其邻近地区,楚瓦什人共约50万人口。

16.2 根据东西方古代典籍之诸研究(上)

众所周知,匈奴、[1]匈人同族说最初原为公元 17 至 18 世纪之交来华传教、研究中国边疆学术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刘应、宋君荣所提出的,当时尚未列出明确的论据。[2] 但法兰西学院教授德经在其所撰《匈人、突厥、蒙古人通史》[3](1756 年)一书中详细论述匈奴、匈人两者族名类似、民族性一致,中国文献所见匈奴西迁时期经过路线与欧洲史料所见匈人出现于欧洲时期所经路线一致等,第一个具体地主张匈人不能不是匈奴的后裔。

德经的说法得到许多人赞成,但由于他原来的论据不外乎所谓情况判断,因此持反对意见者也不少。[关于赞成、反对两种论点,在伊诺斯特朗采夫《匈奴与匈人——中国文献所谓匈奴、欧洲文献所谓匈人,有关这两个民族相互关系的学说的书志概观》[4](圣彼得堡 1900 年初版,列宁格勒 1926 年第二版)中有详细记述。]

但慕尼黑大学夏德博士在其所撰《论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5](1899 年)中对德经所论依靠后世编纂的中国[第二、三手]史料的缺点加以补正,根据根本的中国史料使德经的说法精确化,此外他将《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所见地名"粟特"比定为阿提拉死后匈人的退

---

[1]匈奴的现在中国音为 Hiung - nu。前世纪学者最初是从匈奴、匈的音的类似而想到匈奴、匈人为同一族。其后中国古代音韵的研究尚不能知"匈奴"二字的秦汉时代的正确发音,但也未能积极地提供出匈人与匈奴的音的类似的否定材料。不如采取白鸟库吉的说法,白鸟库吉在其《从东西交涉史上看游牧民族》一文中从《魏志·倭人传》将我国的夷守(hinamori)、滩津(nanotsu)译为卑奴母离、奴国之例推察"奴"字的古音,考证"匈奴"之音为 Huna, Hunna。值得思索的是下述圣希罗尼穆斯地图将 purinius 记作 funi,粟特文书所记匈奴古音也为 Huna、Hunna。关于 Holoun 氏的考证之说将于后文述及。

[2]刘应(C. Visdelou):《鞑靼地区简史》(德赫尔贝洛特:《东方丛书》第 4 卷收录,巴黎 1779 年版。);宋君荣(A. Gaubil),Traitè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西尔韦特勒·德—萨西版,1814 年。

[3]德经:《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1756—1758 年版。此书有德内尔特德文译本《匈人与突厥史》,格赖弗斯瓦尔德 1768 年版。

[4]伊诺斯特朗采夫著、蒙古研究所译:《匈奴研究史》,昭和 17 年生活社版。

[5]F. Hirth, Ueber Wolga-Hunn und Hiung-nu,载《慕尼黑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哲学语文历史学科通报》,1899 年度,第二册(慕尼黑 1900 年版),日译文有白鸟库吉译:《伏尔加匈人及匈奴考》(《史学杂志》第 11 卷第 8、9 期),在日译文中原文的脚注被省略掉了。

居地克里木半岛上的“速黑答黑”,又认为西史所见匈人征服阿兰族即该传所记匈奴征服奄蔡即阿兰,阿提拉最小的儿子赫尔纳克即匈奴王忽倪,从而从文献上证明匈奴即匈人。这篇论文及补正此文的《匈人研究》[1](1901年)受到学术界大部分人的承认。[2] 1910年,马迦特在其所撰《不里阿耳王侯表中的非斯拉夫词语》[3]一文中注意到《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所记被匈奴征服之奄蔡之事有“一名温那沙”之语,论及温那沙 Un-na-sa 之 sa 中有俄塞特语之接尾语 ston,阿兰语之*stān,此温那沙即阿兰语及波斯语之*Hūnastān,也即“匈人之国”之音译,以此补充、加强夏德的说法。又,此年 K. 内密提(Nemäti)在其所撰《匈奴即匈人的历史地理证据》一文中论证道:[4]

> 圣希罗尼穆斯(St. Jerome = 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约340—420年)的伊朗语地图(大英博物馆所藏)作于西历4世纪末至5世纪初,其可靠性已由 K. 缪勒作过考证。在该图上,在 Seresoppidum(Sera metropolis)附近记载有 Huniscite。最后,在中国附近记有 Huniscythae。
>
> 可是,这圣希罗尼穆斯地图是根据我们尚未找到的公元前7年8月制成的罗马地图及 Agrippa 的 Orbispictus 绘制的。总之,可见公元前的欧洲人已知道中国边境的匈奴,并称之为 Huni。
>
> 又,据斯特拉颇所记,巴克特里亚王德米特里(公元前206年

---

[1] F. Hirth, Hunnenforschungen(Keleti Szemle Ⅱ,1901年)。

[2] 夏德:《伏尔加匈人及匈奴考》误读《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的汉文,将匈奴王名误作“忽倪已”3字,以此3字相当于赫尔纳克或额尔纳斯,后来察觉到3字中“已”为副词,遂在其《匈奴研究》(1901年)中改用“忽倪”二字的古音与之相当。又,这篇《伏尔加匈人考》受到金斯米尔(T. W. Kingsmill)所撰《夏德博士与匈奴》一文(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学报》1901年第34卷)的全面反对。但是金斯米尔误读历史记载,将奄蔡误解为撒马尔罕的音译,又将忽倪已相当于波斯王 fuiruz,等等,由于这些根本性的错误被夏德在《金斯米尔与匈奴》一文,(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第30卷,1909年)中完全驳倒。又,帕克尔:《鞑靼千年史》(伦敦1924年版)将夏德比定忽倪已为赫尔纳克、额尔纳斯视为臆测,理由是此3字中“已”字含有 -i,不表现为终闭音 k(s),当时他尚未得知夏德已修正了说法。

[3] J. Marquart, Die nichtslawischen(altbulgarischen) Ausdrücke in der Bulgarischen Fürstenliste,载《通报》第11卷,1910年。

[4] 该文1909年发表于布达佩斯,《通报》有沙畹的概要介绍,我们从《亚洲评论季刊》第3集第29卷1910年上读到该文的英译文全文。

前后)的势力达到塞鲁人(SəRUN)处及法宇诺伊(FAYNOI,FRYNOI)处。[1] 可是,此处斯特拉颇的记载引自 Apollodorus 的佚书,其年代相当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此法宇诺伊即是匈奴,可知欧洲人称匈奴为法宇诺伊。这是匈奴 = 匈人的证据。

又,MisCella 史所收哥特历史学家 Cassiodorus 的佚文曰:"匈人又称 Fauni ficarii,为森林人中 hominessilvestres 的父系子孙。"

此外,约丹尼斯(Jordanes)记载说:"匈人,以 spiritus immundi(恶魔)为其父系祖先。"spiritusimmundi 为恶魔的名称,与所谓 Fauni ficarii 是同样的观念。这就是说匈人的前身被表达为恶魔的观念,这正与中国史学家称匈奴为鬼方的事实相对应。东方关于匈奴、西方关于匈人可见有完全相同的传承,[2]根据这点也可推断两者为同一族。[3]

其次,夏尔潘提尔(J. Charpantier)的《吐火罗的民族学位置》[4]注意到普里尼乌斯说在阿塔科里斯和 Tochari(即月氏)之间住有普尼人

---

〔1〕内密提氏合校斯特朗拉颇书诸异文,读作 faunoi,最为正确,内密提认为此塞鲁人(塞雷斯人)当即中国人,而 faunoi 即匈奴,他主张这是公元前 200 年欧洲人已在 faunio 即匈人的名称下知道中国邻近地区的匈奴的证据(也即匈奴 = 匈人的证据)。但是,根据此项史料所作的这种考证常利用基斯林(M. Kiessling)撰《匈奴(Hunni)》条(鲍利·维索瓦:《古典时代真正大百科全书》第 8 卷,1913 年版所收)的引文,而在此之前则大致有托马舍克(W. Tomschek):《斯基泰北方最古老的资料的鉴定》第 1 卷(载《维也纳科学院通报》第 116 卷,1888 年)上的引文可利用。

马迦特:《库蛮考》(《哥廷根皇家学社论文集》新集第 13 卷,1914 年)主张此 faunoi 当为印度名巴乌塔(Bhautta, Bhuta,西藏人),然而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此西藏说不能成立。又,W. 塔尔恩在其所撰《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W. W. Tam,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剑桥 1938 年版)中主张:"阿波罗多罗斯的塞雷斯是什么难以完全确定,据普里尼所传,塞雷斯是在希隆德族处的贸易绢的中介者,因此都难以认为是中国人。据 A. 赫尔曼推察:伊塞克湖地区为乌孙所居,而在乌孙人中间残留有月氏族,因而作为塔里木盆地居住民的 faunoi〔普里尼的 funi)并非匈奴,盖匈奴于公元前 174 年以前尚未进入塔里木盆地。"对于塞雷斯和匈奴进入塔里木盆地,塔尔恩的解释是正确的(塞雷斯指中国人是后来的事)。但是将 faunnoi 限定为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却并无明白的理由。将阿波罗多罗斯、普里尼所说的 faunoi(匈人)理解为乌孙的东邻匈奴是不会有多大的出入的。

〔2〕鬼方是否为匈奴是有疑问的,沙畹在对内密提氏这篇论文的批评(《通报》第 11 卷)中指出鬼方之名也有指西南夷的场合。然而汉代人称匈奴为鬼方有《汉书》等书的明文记载,汉人的这种思想西传至哥特史学家处也未必不可能。

〔3〕但是他以朗多鲁甫斯的记载作为基础,认为侵入欧洲的匈人是以匈奴为父、哥特人为母结合而成的民族。

〔4〕Die ethnographische Stellung der Tocharen(载《德国东方学会学报》第 71 卷,1917 年)。

（Phuni，即匈人），以及约丹尼斯记作 Phurini 的匈人被德奥尼西乌斯、佩里额格托斯记作 furnoi 之事，遂知希腊语 faunoi，furnoi，拉丁语 Phuni 皆匈奴之名之误传。[1]（他指出匈奴的古音为 * xiung - nu，x 与 f 常常互相替换，尤其是在母音 u 之前互相替换的情况更多。）

此后，哈隆（G. Haloun）的《关于月氏问题》[2]认为"匈"字中古汉语音 xiowon 中之中间音 - i -，在古代汉语音作 - i -，* - r -，因此不可能将匈奴现代音 Siung-nu 与 Hnni、Hūna 牵合为一。他根据"匈"字古音有 - r - 以及西蒙（W. Simon）的藏、汉语比较研究的成果，[3]认为"匈奴"的古代汉语音作 xbron - no，可认为与阿波罗多罗斯报告中的 FROYNOI（* FRYNOI）在名称上一致。他认为托勒密在药杀水（锡尔河）彼岸起巴尔喀什湖一带所记的 GHRYNAIOI SCHYTHAI 同样也是匈奴之音稍有讹变而成。阿勒泰姆（F. Altheim）的《阿提拉和匈人》（1931 年）[4]承认哈隆的这种说法，他认为阿波罗多罗斯的 phaunern 当即迪奥尼西乌斯·彼里格帖斯作为 Tocharer 和 Serer 邻人的 Phryner，从此 Phryner 的名称中，不难认出匈奴的古代汉语形态 xbron-no，托勒密的 GhRYNAIOI SChYThAI 为匈奴名称的较小形态，在托勒密的其他部分中又记作 ChOYNOI 即 Hunnen，这就有了匈奴即匈人的一个证据。

在夏德根据中国史料证明了这"匈奴即匈人"说后，根据欧洲史料的证明也连续发表，这一说法几乎成为定说。近年根据应称为中亚史料的粟特文书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说法，这一点不可忘掉。斯坦因以前曾在敦煌西面的哨塔内与许多汉文史料一起发现了 5 封粟特文书信。其后根据贝利（H. W. Bailey）的《一篇涉及甘州突厥人的和

---

[1]19 世纪欧洲史学界大多对记载民族大迁移以前的匈人事件，怀疑其真实可靠性。而德奥尼西乌斯、佩里额格托斯也仅记有匈人之名，贝伦哈尔德将它作为三四世纪之交的人，缪拉归罪于德基斯特的毁误。然而根据中国史料有匈奴西迁事实的实证（参照拙文《匈奴西迁考》），以及内密提、夏尔潘提尔等人所作的考证，证明了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2]载《德国东方学会学报》第 91 卷，1937 年。

[3]《汉藏语之相同处》（载《柏林东方语言研究室通报》第 32 卷（东亚研究），1929 年）。

[4]阿勒泰姆：Attila und die Hunnen，Baden-Baden，1951 年。

田文》(1949年)、亨宁(W. B. Henning)的《古粟特文书信年代》(1948年)[1]的研究,这是五胡十六国前赵(匈奴)攻陷洛阳、将晋怀帝抓住幽禁起来的数年间的事,其中在两封粟特文书信中,粟特商店的洛阳驻员将匈奴记作xwn(chwn)。此chwn据阿勒泰姆说,其读音与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所记的Chunus、Chuni(即匈人)完全一致,[2]根据此点,"匈奴即匈人"获得了更加明确的证明。

以文献为根据的匈奴、匈人同族论,如上所述得以成立。但1900年,夏德在《圣彼得堡科学院通报》上发表了《约翰内斯·冯·图罗奇的阿提拉世系谱》一文,[3]文中指出约翰内斯《封加罗鲁姆编年史》上的阿提拉世系谱中记有阿提拉的父祖Bezter(Beztur)、Kulche、Leuente等人物,从名号、死年等的一致可比定为古代匈奴单于冒顿、孤鹿姑、虚闾权渠等,又作为附说,文中提到亚美尼亚史学家额利舍·瓦尔达佩特及其后继者们曾说:高加索的匈人有名为Hailendurk者,其名源于匈人之王的族名,夏德提出如下假设:Hailendurk(k为复数结尾)似不外乎《后汉书》所记之单于氏族名"虚连题",对于这个假说学术界没有表示赞同。总之,如果夏德的这篇世系谱考正确的话,匈人与匈奴不仅是同一民族,而且还有同一王朝,然而他的考据所根据的"约翰内斯的阿提拉世系谱"的真实性却缺乏证明,这是最大的缺陷。此文发表后,前引伊诺斯特朗采夫书曾指出过这一点,布莱叶尔(J. Bleyer)的《匈牙利的匈人传说的日耳曼成分》(1906年)[4]也否定了此世系谱的史料价值,李盖提的《阿提拉世系谱与匈奴单于名》(1925年)[5]又精细论定此世系谱不过是匈牙利的一个编年史家借用10—13世纪匈牙利人(及

---

[1]贝利论文载《大亚洲学报》(Asia Major)新集第1卷,1949年;亨宁论文载《东方学院通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第12卷,1948年。二文认为在没有h音的粟特语中,以不单是阿拉米字母固有的x表现外国h(甚至汉语音k),因此这个xwn可读为Hun、Hūn或Xun、Xūn(即匈人)。

[2]前引阿勒泰姆书第二章注42:"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除不确实的章句诗句7,323外,常写作Chunnus,而不作Hunnus或Hunus。可是克劳迪安为适应音韵上的需要,却将Chunus与Hunus互相置换。"

[3]载《圣彼得堡科学院通报》第13卷,1900年。

[4]载《德国语言文学史论丛》第31卷,1906年。

[5]载《大亚洲学报》第2卷,1925年。

历史)之名编集的伪书,这部世系谱几乎不能认为有什么历史价值。

马迦特的论文《额朗沙尔》(1901 年)[1]也曾论及 Hailendur 为匈人之王的族名,将它比定为虚连题,这是要有证明匈人的统治部族与匈奴为同种族作为前提条件的。然而只以名称的近似为根据不过是一种假说。正如我以前在《匈奴与匈人——其人种特征的差异》(昭和23 年)[2]一文所论述的,匈奴与匈人的两统治部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人种特征的差异,因此将 Hailendur 之部族名与虚连题联结起来时,还有必要作充分的考察。同样,阿勒泰姆在其《匈人史》第 1 卷所反对的"匈人——不里阿耳王侯为 Dul。氏族中的 Vixtun 系,Dulo 可比定为屠各,Vixtun 可比定为冒顿",今后要进一步加以证明才能成立。[3]

16.3 根据东西方古代典籍之诸研究(下)

不管匈奴的统治部族与匈人的统治部族之间有无人种差异,如上所述,夏德大致根据中国文献证明了匈奴与匈人基本上为同一系统的民族和国家,接着又根据中亚、欧洲史料证明了这一点,但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光是夏德的考证对匈奴即匈人的证明还不充足。其理由有二。理由之一以我国白鸟库吉博士的《粟特国考》(大正 13 年)为代表。该文说:"夏德说所根据的《魏书·西域·粟特国传》奄蔡(阿兰 = Alan 族)的事迹有讹误、记载混乱,粟特国不应当如夏德所认为的作克里木半岛的速黑答黑,而是 Sogdiana,该传所记匈奴征服粟特之事,并非匈人征服阿兰人之事,而是嚈哒族征服 Sogdiana 的事件。因此,此粟特国传并没有什么可证明匈奴与匈人同族的史料。"(《东洋学报》第 14 卷 4 期)

理由之二为克拉普罗特(J. Klaproth)的论著《突厥、匈奴、Turc 同

[1]Eransahr,载《哥廷根皇家学社论文集》新集第 3 卷第 2 册,1901 年。

[2]载《学艺》第 32,昭和 23 年(1948 年)。又,参照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关于匈奴的人种体型》一文。

[3]同书上说:"Vixtun 为种族名,并非个人名,不可比定为冒顿。屠各原音为 tuγ-laγ(旗的所有者),不能相当于 Dulo。"

族考》(1825年)、《亚洲史述》(1826年)[1]发表后语言学者们信奉的“匈人的语言尽管为芬·乌戈尔语,但匈奴的语言却为突厥语(或蒙古语),两者为语言不同的异民族”的学说。

总之,要使夏德等的同族说能完全成立,必须证明:(1)粟特传有作为匈人文献的可靠性。(2)匈人与匈奴并非一为乌拉尔语系、一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不同,两者为同一语族。其中第一个问题,已被我在昭和12年的《匈奴西迁年表——关于匈人·匈奴的再考察》[2]一文所解决,拙文共举出12条理由证明《魏书·西域·粟特国传》所记匈奴征服奄蔡阿兰不能不是匈人征服Alan之事,此事与夏德释作克里木半岛的速黑答黑的记载相符。

可是江上波夫的论文《匈奴匈人同族论》[昭和19年(1944年)][3]认为此《魏书·粟特国传》的大部分所记为匈奴即匈人征服阿兰即Alan之事,然而传文中只有含有粟特地名的一小部分是由于《魏书》撰者误记混入,粟特如白鸟博士所考证为Sogdiana,不应当是夏德所认为的匈人退居之地速黑答黑。总之,江上波夫大体上采取了以《魏书·粟特国传》为匈奴匈人同族论的根本史料的夏德说,对其中有关粟特地名的部分则采取白鸟说,认为这一部分是与匈奴匈人全然无关的混入其中的Sogdiana的事,必须将这一部分除开。《魏书·粟特国传》说:

>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

[1]前一论文载《亚洲学报》1825年,后者原文为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 Asie,巴黎1826年版。

[2]载《东洋史研究》第2卷1期,昭和12年(1937年)。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所收《匈奴西迁考》为同一论文的修订补充。

[3]载《民族研究所纪要》第1卷,昭和19年(1944年),并收入《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昭和23年(1948年)。

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1]

只有方括号内的记载算作所记匈人征服克里木地区的阿兰、匈人之王赫尔纳克的事迹,其他部分则作为 Sogdiana 的记事。

同氏把《魏书》的粟特认作 Sogdiana,认为应当将记载它的部分从匈奴=匈人史料中除开的理由为:

(1)《魏书·西域传·粟特国传》挟带着记载 Sogdiana 近旁诸国之传。

(2)北魏时代粟特商人来中国经商的事迹很多,与其将此粟特认作阿兰的速黑答黑,不如说应当认为是作为商业国著名的 Sogdiana。

但是这些不一定是确定的论据。为什么呢?

(1)《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不一定能断定挟带着 Sogdiana 近旁诸国的记事。例如在粟特传前后所记洛那国(Ferghana Kasan 地区)、波斯国(Persia)、伏卢尼(Antiochia)都难说是 Sogdiana 地区之国。[在《魏书·西域传》中]干脆把粟特国作为完全与悉万斤国(Samarkand)不同的另一国家立传这一情况是应当重视的。

(2)以匈人的武力为背景的阿兰族应当看做当时西域的商业民族,这在夏德的《金斯米尔与匈奴》的注中、斯特拉颇的记事及以班布里的研究为基础的论说中均曾述及。又,前引近来特加特书(《罗马与中国》)述及阿布佐阿额·阿兰同盟时也曾谈到。

(3)而除将《魏书》的粟特国比定为 Sogdiana 外,拙稿《匈奴西迁年表》对于粟特国为克里木半岛速黑答黑列出了十几条理由,这些理由总得一一加以否定(但江上氏所论,如上所述,基本上也还是对于以《魏书·粟特国传》作为证明匈人匈奴同族的基本史料的夏德说的支持,而且江上氏的这篇《匈奴匈人同族论》的重要性,如后所述,在于使考古学领域新承认了同族论)。作为夏德说的补正说所应附加的,见

[1]末句又认为应读作"自后无使朝献",今据原译。但江上波夫在《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中将有关粟特国王的部分除去,只将奄蔡部分作为比定匈奴为匈人的史料,而赞成夏德的考证,其观点就稍欠彻底了。为什么呢?把粟特王的记事一除去,整个史料的时间关系就不清楚了,忽倪比定为赫尔纳克也无力了。又,此后后魏还让粟特入贡,因而后魏人对粟特人可认为有正确的知识,关于此点参照拙稿《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东洋史研究》第30卷第2、3期)。

于前引特加特书中的《奄蔡 = Abzoae》一节。

这就是《魏书·粟特国传》所见匈奴征服奄蔡的事件，西方史书记载为匈人征服阿兰族，《后汉书》、《魏略》等说："奄蔡，别名阿兰。"这是较为清楚的。然而奄蔡这个名称是什么，却得不到恰当的答案。夏德以其现代音 Jen-ts'ai·An-tsai 作为基础，根据古代中国人音译外国语时常将尾音 r 译作 t、k 或 n 的惯例，以及现代汉语的始音 ts 与过去 S 音相近的情况，考定奄蔡——Antsai-Arsai-Aorsi-Alanorsi，[1] 施勒格尔(G. Schlegel)以奄的古音有 m 音，考订奄蔡古音为 Am-tsai，而 Jem-tsai[2] 则不能成立。对此，特加特教授以《汉书·陈汤传》所说"阖苏(古音 Hap-so、Hap-suo)即奄蔡"为中心，指出奄蔡为普里尼所说伏尔加河东部的居民、与萨尔马泰人有来往的阿布佐阿额。[3] 白鸟博士从奄蔡的古音之一为 ap-čat 直接推定奄蔡当即 Abzoae，[4] 这就无意中与特加特的说法相一致。不过白鸟博士在此之外没对 Abzoae 与阿兰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特加特认为 Abzoae 加入了阿兰同盟，《魏略》等书所载"奄蔡，别名阿兰"就是记载 Abzoae 成为阿兰同盟的一个环节的事，这就使夏德的考证进一步明确了。

---

[1] 古奇米特(A. V. Gutschmidt)的《伊朗及其邻近地区史》(蒂宾根 1888 年版)与夏德无关地从历史的考察主张奄蔡即 Aorsi。

夏德的这一考定最初发表在他的《中国与东罗马》(上海 1885 年版)一书中，接着又再述于他的《伏尔加河匈人考》中。沙畹的《魏略西戎传注释》(《通报》1905 年)、明斯(E. H. Minns)的《斯基泰人和希腊人》(剑桥 1913 年版)都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他的考订。

[2] 施勒格尔：《外国语音汉语译写法的诀巧》，载《通报》第 1 集第 2 卷。

马迦特没有直接从奄蔡引出 Aorsi，他以奄蔡的古音比拟为桑斯库里特的 matsja-ka 即食鱼者，也即希罗多德、斯特拉颇的马萨革泰人，而阿兰人正是马萨革泰人的子孙(阿米安·马尔凯林)，从而间接地得出奄蔡为阿兰的结论。霍罗特也采取了他的说法。可是认为奄蔡的古音与马萨革泰相近，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就宁可采取白鸟博士的见解了，白鸟根据奄蔡的古音之一为 ap-cat，将它比定为 Abzoae。(参照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所收《匈奴西迁考》。)

[3] 托马舍克的《斯基泰北方最古老的资料的鉴定》(载《维也纳科学院通报》第 117 卷，1889 年)考定奄蔡的音写为 Ar-zoae，即 peutingeriana 地图所载之 Arsoae，普里尼所载 Abzoe 为 Arsoae 之讹。格罗特(J. J. M. Groot：《基督教以前时代的匈人》(柏林—来比锡 1925 年版)也将奄蔡的别名阖苏写作 Arzoae，与托马舍克有同样的看法。但不仅奄蔡及阖苏之音难以成为 Arzoae，而且 Peutingeriana 古代地图为 11 世纪之图，其原图并非源于 4 世纪，以此图订正普里尼所记之名的根据是薄弱的。

[4] 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载《东洋学报》第 7 卷 3 期、第 8 卷 3 期、第 9 卷 3 期，后又收载入其《西域史研究》。

又,榎一雄的《匈奴匈人同族论批判》(昭和 25 年)[1]认为《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所记载的是匈奴征服中亚 Sogdiana 之事,这事有阿米雅努斯·马尔凯里努斯所记 Chionitae(即匈人)统治该地区的相对应的事,据此就有了可作为证明匈奴匈人同族的事。这还可作为结论加强匈奴匈人同族说。但是:

(1) 这一说法认为《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并非记述克里木半岛的速黑答黑的事的主要理由为奄蔡这个地名的意义有被认为不清楚之点,对此,是根据前述特加特氏的新解释加以解决的。

(2) 匈奴王忽倪(赫尔纳克)征服 Sogdiana 之事有确立证据的必要。

(3)《隋书》等所记载的 Sogdiana 地区之王为被匈奴逐出的月氏的子孙之事,有必要加以解决。

(4) Chionitae 为波斯古经(Avesta)所记载的琐罗亚斯德的敌人,其起源古老,难以认作匈人。如果 Avesta 根据如同上说的 4 世纪的事实作成,则有必要找出证据。

将以上 4 点等等结合起来考虑,似应当说有待将来详论之点尚多。

16.4 按照语言比较所作出之诸研究

在语言领域内同族说也很快发展起来了。以匈奴语言为芬语甚至芬—乌戈尔语的看法在 19 世纪时由一部分学者提倡,不久就完全被放弃了。20 世纪时,专就匈奴语为突厥语说或匈奴语为蒙古语说不断进行争论。在欧洲,除较早由施密特(J. J. Schmidt)、B. 柏格曼等人主张蒙古语说,[2]有雷穆塞(A. Remusat)、克拉普罗特提倡的突厥语说,W. 肖特、夏德、沙畹、拉德洛夫、伯希和、O. 弗朗克等人也都持突厥

[1]刊载于《东洋文化》卷 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 25 年(1950 年)版。

[2]施密特的《中亚各民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领域的研究》(圣彼得堡 1824 年版)一书被认为最先具体地提倡匈奴为蒙古语说。

语说。[1]

与此相反,我国一般信奉白鸟库吉博士的蒙古语—通古斯语混合说。[2] 蒙古语说、突厥语说或蒙古—通古斯语混合说都以中国古代典籍中残留的汉字音译的匈奴语作为资料,要把匈奴语确定为在阿尔泰语中有近缘关系并有许多共同单词的突厥、蒙古、通古斯三语群之一,不如说还不能得出定论。但是说匈奴语基本上属于阿尔泰语,那在今天早就是没有疑问的事了。(正如后文所述,根据近年来对匈人古墓发现的骨骼测量的结果,匈人体型属于蒙古人种的A型,与现代通古斯族的体型完全相似,这一事实似可作为应当与白鸟博士的蒙古—通古斯混合语说联系起来考虑的事项。又,A. N. 伯恩斯塔姆的《突厥族的起源》(1935年)[3]认为,匈奴、突厥、蒙古的语汇的共同性是他们曾全都处在人种共同阶段上的证据。如下所述,鲍培等人认为匈奴语既

---

〔1〕例如:雷穆塞:《鞑靼语言研究》,巴黎1820年版;克拉普罗特:《突厥、匈奴、Turc同族论》(《亚洲学报》1825年);O. 弗朗克:《根据中国史料对突厥和斯基泰人的了解》(载《柏林皇家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1904年);J. J. M. 格罗特:《基督教以前时代的匈人》(柏林—莱比锡,1921年版);L. 巴津:《一段原突厥语原文》(《东方》第1卷,1948年)。根据伊诺斯特朗采夫:《匈奴研究史》可知,俄国最早由瓦西里耶夫在其论著《论汉语与中亚语言的关系》(1872年)中曾解读《晋书·后赵录》所见匈奴语"秀支替戾冈谷云云",没能解读通,但他认为此语具有突厥语形态;阿里斯托夫的《突厥族及部族人种构成纪要》(1896年)利用鄂尔浑碑文的语言,按照古代突厥语解读上面这段话,论述了匈奴语为突厥语说。又,前引阿勒泰姆书举出额贝尔哈特(W. Eberhar)的《中国边疆民族的文化和移居》(1949年)作为最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又,萨莫林(W. Samolin)的《匈奴、匈人、突厥》(《中亚学报》第3卷,1958年)根据中国正史所载匈奴后裔悦般与高车语言相同,而高车(铁勒)显然使用突厥语的事实,把匈奴语理解为突厥语,尽管道理简单,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分量的看法。

〔2〕白鸟博士在《蒙古民族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18卷2、3、4期)一文中发表这一看法,他还在《西域史上的新研究》(载《东洋学报》一、二、三)、《东胡民族考》(载《史学杂志》第21~24卷)中作了补充。他的看法在外国可根据他在1902年用德文发表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通报》上的《匈奴及东胡民族语言考》及1923年用法文在《亚洲学报》上发表的《匈奴起源考》获知。他的主张并未改变欧美持突厥语说(及蒙古语说)者的看法。反之,白鸟说却遭到蒙卡奇(B. Munkacsi)、兰司铁(G. J. Ramstedt)、博德贝格(P. A. Boodberg)、方壮猷的反对。对于白鸟博士所解释的匈奴语,人们用其他突厥语、蒙古语解释。

见蒙卡奇:《评白鸟库吉〈匈奴及东胡民族语言考〉》(载Keleti, Szemle,第4卷,1903年);兰司铁:《论楚瓦什语的地位问题》(载《芬—乌戈尔学会学报》第38卷,赫尔辛基,1922—1923年,第35节);博德贝格:《有关中国边疆史的两条札记》(载《哈佛亚洲学报》第2卷第3,4期,1936年,第294页);方壮猷:《匈奴语言考》(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年)。

〔3〕高桥胜之译、伯恩斯塔姆著:《突厥语的起源——问题提出的目的》(载《蒙古》五)。

非突厥语，也非蒙古语，不如说应当是阿尔泰基干语的第三支，甚至可认为是属于与原蒙古语一致的阿尔泰原始语言的一种。)

另一方面，匈人及其裔族不里阿耳人的语言，从克拉普罗特以来始终被认为是芬—乌戈尔语。根据这种看法，白鸟博士的《塞外民族》(昭和10年)〔1〕一文中说："有以西方历史上的匈人为北匈奴向西方迁移者的说法，这是非常错误的。匈人为属于乌拉尔系的乌戈尔人，匈奴则为属于阿尔泰系的蒙古民族，两者的种族关系不同如此。"由于认为匈奴语为阿尔泰语，匈语为乌拉尔语，遂对同族说加以否定。〔2〕 克拉普罗特把匈语断定为乌戈尔语，他根据拜占庭僧人所说"匈牙利人与匈人为同一民族"和匈牙利古书上载有同样说法，又把匈人部族名Ounigour、Outigour、Sarogour等名中可找出Oungri，Ougri(匈牙利)的词根认作匈人为匈牙利族的证据。他认为匈人的固有名词Attila (Etsel)等各与匈牙利语的Atzel(钢)相当。克拉普罗特的芬—乌戈尔说成为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匈奴匈人非同族说的基础。〔3〕 但后来，匈人的语言被认作阿尔泰语系的倾向逐渐加强起来。

在法姆贝吕的《马札儿人的起源》(1882年)〔4〕一书中最早详细述及匈语为突厥语说，他把希腊拉丁语文献中的以希腊拉丁语音译而颇有变化的匈语论证为突厥语，并且不仅从语言上、还根据舍马尔科斯

〔1〕《岩波讲座·东洋思潮》十二。

〔2〕可是正如勒·博(Le Beau)的《下层帝国史》(巴黎1824年版)中的J.圣马丁的注，及P.谢麦诺夫对C.里特尔:《亚洲地理学》俄译本(1850年)的附说所说：匈奴与匈人都被视为芬族，这就又有了另外的问题。但根据现代东洋语言学的研究水平，已经没有匈奴为芬族说成立的余地。

又，L. V.圣马丁的《游牧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的研究》(载《旅行和地理科学消息年鉴》第4卷，1848年)上说："即使匈奴为原始突厥人，匈人为乌拉尔的芬族，但若原始突厥人与芬族最初为一体，可认为它们是同一基干的两个分支，那就有可能把它们视为同一。"但是根据现代语言学，乌拉尔语与阿尔泰语之间的这样的亲缘关系不被承认。伯希和在《词首》(载《亚洲学报》1923年)一文中说："至少在现在的研究阶段上，与芬—乌戈尔语、萨莫耶德语并列，将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包括在内的乌拉尔·阿尔泰语族，是不被承认的。"又，参照索瓦热特(A. Sauvageot)：《乌拉尔—阿尔泰语语汇研究》(巴黎1930年版)；江实：《索瓦热特〈乌拉尔—阿尔泰语语汇研究〉评介》(载《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4号)。

〔3〕见前引克拉普罗特书。克拉普罗特从对中国史料的史实的解释，主张匈人与匈奴并非同族。但他的这一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前引江上波夫书第三节揭示了他的错误。

〔4〕A. Vambery, Ursprung der Magyaren，莱比锡，1882年。

所记载的史实推论匈人应当是突厥族。

此后,匈语 = 突厥语说(以及匈人 = 突厥族说),由于 K. 措伊斯、A. 库尼克、W. 拉德洛夫、W. 托马舍克、M. A. 阿里斯托夫等的支持而得以发展起来。阿里斯托夫的《突厥族及部族人种构成纪要》(1896 年)论及匈人的后裔楚瓦什族的语言受到芬—乌戈尔语的强烈影响,但突厥语仍为其词干的基础。19 世纪的这些研究在前引伊诺斯特朗采夫前引书中都已述及,没有必要再加叙述。其后对匈语的解释又如何了呢? 近年的匈语研究主要从阐明属于匈人语系统的楚瓦什语及研究清楚匈牙利语中的阿尔泰语成分方面进行。

楚瓦什人住在伏尔加河沿岸萨马拉与喀山之间,被认为是匈人的后裔。

J. 布登吉认为匈牙利语中的古代突厥语借用词,从其特殊的音形来看,不可考虑理解为来自楚瓦什语,而可认为是从太古时分出的突厥语种族的一个分支(其残存者为今天的楚瓦什人)的语言,应当称作“古楚瓦什语”处借用的。[1] B. 蒙卡奇的《匈牙利语中的匈语痕迹》(1901 年)[2]认为匈牙利语中有蒙古语成分存在,然而不可认为它直接与蒙古语接触,而可认为是通过具有楚瓦什语型特征的突厥方言的媒介而传入的。而把这个阿尔泰语族的远来的一个分支带给匈牙利人的,不能认为不是匈人。第二年即 1902 年,N. 阿舍马林的《不里阿耳人与楚瓦什人》从文献及语言构造上论证匈人—不里阿耳—楚瓦什的祖孙关系;[3] Y. 魏希曼的《彼尔姆语中的楚瓦什语借词》[4] (1903 年)也作出了同样的论证。Z. 戈姆博茨的《匈牙利语中的不里阿耳—突厥语借词》(1912 年)[5]回顾、检讨了从 18 世纪末乔治 · 普赖开始

---

[1]他的说法修改了把楚瓦什语认作匈语的前人学说,见 Nyklo 上发表的他对法姆贝吕的批评文章。通常我们从后面所揭示的戈姆博茨论著中所引该文的译文概要可窥知该文的要旨。

[2]见蒙卡奇:《匈牙利语中的匈语痕迹》(Keleti Szemle 第 11 卷,布达佩斯,1901 年)。他认为匈牙利语中的源于蒙古语的借词,是通过按照其楚瓦什语的语音特征所附有的性质的突厥方言的中介而传入的。

[3]根据前引伊诺斯特朗采夫书及后引兰司铁书的引文。

[4]载《芬—乌戈尔学会论丛》第 21 卷,1903 年。

[5]载《芬—乌戈尔学会论丛》第 20 卷,赫尔辛基,1912 年。

的有关匈牙利语、楚瓦什语与蒙古语、突厥语结合起来的各项研究的结果后，论证了可萨人及不里阿耳人的语言应当又称为“楚瓦什—匈语”，在匈牙利语中注入古楚瓦什语成分者，曾存在于上述两族中以及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中，而现代楚瓦什语也是这伏尔加河不里阿耳语，甚至是它的一种方言的直接继续。G. J. 兰司铁的《楚瓦什语的位置问题》(1923 年)[1]探讨了这楚瓦什—匈语属于蒙古语系统还是突厥语系统，认为它与雅库特语都是继承突厥语族中的古语形态的特殊语言，并断定这种语言使原突厥语的语法得以发展，而与蒙古语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即没有受到蒙古语的什么影响。然而 N. 鲍培对兰司铁这部著作的批判(1924 年)及其论著《楚瓦什语对突厥语的关系》(1926 年)[2]对这个说法做了订正，认为楚瓦什语由于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不属于蒙古语但也不属于突厥语。他感到楚瓦什语有与突厥语的共同特征，但绝非突厥语的一种方言。他断定这是既不属于蒙古语也不属于突厥语的一种独立语言，为形成阿尔泰语干第三支的语言，甚至应当认为是在各个突厥语言群的特质形成之前时代的残存物。

W. W. 巴托尔德肯定鲍培所断定的说法，认为楚瓦什语不属于原始突厥语，而原始突厥语与楚瓦什语的最古形态却一起属于楚瓦什—突厥原始语，这楚瓦什—突厥语又与原始蒙古语一起属于阿尔泰原始语。他认为这楚瓦什—突厥原始语就是匈奴匈人的语言，它与突厥语及楚瓦什语在西历纪元初分化开来。(r > Z, l > sh)他在《突厥民族史的研究与此后的课题》(1929 年)[3]中认为楚瓦什人为从亚洲侵入欧洲的匈人的子孙，不里阿耳语、可萨语的形成也是这个民族迁移的结果，并推定楚瓦什语与突厥语语型的分化以匈奴的西迁为其原因。总而言之，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内，过去将匈语认作芬—乌戈尔语的学说

---

[1]载《芬—乌戈尔学会学报》第 38 卷，1922—1923 年。

[2]鲍培：《楚瓦什语的语音规律(评兰司铁)》，载《大亚洲学报》第 1 卷，1924 年；《突厥—楚瓦什语比较研究》，载《伊斯兰学》第 1 卷。关于他的《楚瓦什语对突厥语的关系》，根据后引巴托尔德书可知其概要。

[3]载《德国东方学会学报》新集第 8 卷第 83 页，1929 年。又，我们在《伊斯兰百科辞典》第 791 页《楚瓦什》条(čuwash)中也可看到他所发表的同样的意见。

已销声匿迹，匈语被严密地认作楚瓦什—突厥原始语，简称原突厥语。无论如何，达到了把匈人、匈奴的语言一起认为阿尔泰语的一种，这不能不说是匈人、匈奴同族说有了很大的进展。

此外，F. 阿勒泰姆[1]认为匈人、匈奴同样都说突厥语是表明两者同族的一个证据。关于匈奴，从其语言残片就已清楚其为突厥语。至于匈人，也可根据原不里阿耳语碑文的解读与解释知其为突厥语。突厥系多瑙河不里阿耳人为匈人后裔之事，从对他们的君主世系表研究及其他可以证实。根据对原不里阿耳语碑文（9世纪前半期）的大部分的调查结果，可得出这是突厥语卢尼体文字纪念物的进到最西面的一批，这也可作为匈奴、匈人同族的证据。作为最新的研究，这是值得注意的。

此外，E. G. 蒲立本的《古汉语的辅音体系》（《大亚洲学报》第9卷第2分册，1963年）把若干匈奴语汇认作叶尼塞语言的起源，但其所论没有从语言上肯定或否定匈奴、匈人的同族。

16.5 考古学上之诸研究

如上所述，从文献上以及语言上论证匈奴、匈人同族说有显著进展，近时进而在考古学领域内使同族说获得新的证明。夏德早就试图对比匈奴、匈人的遗物以证明两者同族。他在其《论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一文中，曾以匈人及其被征服族阿兰的居住地区中发现中国器物（他曾列举维尔肖发现汉镜[2]作为其一例）作为匈奴西迁的一个证据。其后，匈奴及匈人遗物的大量发现使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显著活跃。

---

[1]前引阿勒泰姆前引书第二章。同书利用了他自己的研究《匈人卢尼体字》（《哈勒专著》第1卷第8篇），这篇题为《匈人卢尼体字》的论文后来进一步增补发展成《匈人史》第1卷11章（匈人和突厥的卢尼体字）（1961年），对过去保尔·基拉吕·德·达达的研究《匈语—斯基泰语研究》（《巴比伦与东方论丛》第7卷，1892—1893年）所提出的疑问解决了许多。又，在该书第4卷中，阿勒泰姆把西方史料中所见匈人人名，例如 Onegesios = on-iyiz（十人长），Edekon. Idico. Aedico = ädgü（善），解释为突厥语，此外将匈语大部分解释为突厥语，得出匈语与古突厥语不是同一种语言，但有密切的亲缘关系的结论。

[2]维尔肖：《关于高加索的文化史地位》（《柏林皇家普鲁士科学院论集》，1985年）。

例如匈牙利科学院塔卡茨(Z. Takacz)的《匈人中的中国艺术》(1916年)、《伊朗—希腊的艺术形式与中国—匈人的艺术形式》(1926年)、《欧亚大陆民族迁移时代的艺术中间的一致》(1935年)等论著[1]证明了匈人文化中中国因素的存在,认为这种情况是匈奴西迁的结果,并把它作为匈奴、匈人同族的证明。其他维尔纳(J. Werner)、阿尔弗尔迪(A. Alföldi)诸学者也作了同样的论证。[2] 可是开始真正全面地用匈奴—中国、匈奴—匈人的文化关系来阐明中国文化(或受其影响的匈奴文物)西传的事实,却应当以江上波夫的论文《匈奴匈人同族论》为最早。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民族研究所纪要》第一册(昭和19年)上,接着收载入江上波夫编著的《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中。其主要内容如下:

> 根据中国文献记载以及北蒙古诺音乌拉匈奴王侯墓的出土物品等可知匈奴在东亚大量接受多种多样汉文物。根据从这些地区[欧洲匈人曾到过的地区]多次发掘到匈奴从中国取得或在东亚自己模仿制作的种种中国风格的器物证明这匈奴从蒙古西迁后作为匈人出现在伏尔加河流域。即:
>
> (一)玉剑,盛行于汉代中国,有汉朝把玉剑赠赐给单于的记载。这种汉制玉剑及其仿制品被发现于克里木半岛的刻赤、高加索的库班以及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所发现的匈人、阿兰遗迹中。这是由匈奴带来的东西,是证明匈奴遗物即是匈人遗物这种关系的东西。
>
> (二)从伏尔加河地区和匈牙利的阿兰、匈人、阿哇尔族遗迹发现了弓端强化的骨器或具有那种骨器的长弓。这与斯基泰系短弓在整个系统上不同。维尔纳根据这不是从阿兰前期以前的古墓中出土的等理由,解释为这是匈奴即匈人从东方带来的东西,他的见解是合理的(但江上波夫的这篇论文认为"维尔纳误认

[1]载《东亚学报》第4卷,1916年,第15卷,1929年,Artibus Asiae 第5卷,1935年。

[2]维尔纳:《卡农通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残弓》(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 Ⅶ,1932年);阿尔弗尔:《青铜铸件和游牧民族艺术》(《斯基泰学》第2卷,布拉格,1929年),《阿哇尔发掘物的历史鉴定》(ESA 第9卷,1934年)。

为这种形式的长弓发源于匈奴本身,但匈奴原来使用斯基泰系短弓,不能不认为这种长弓是匈奴从汉人学来的东西”)。

(三)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及北高加索各地出土了汉代中期以后的日光镜及其他汉镜以及汉镜的仿制品。这又可认作匈奴西迁后作为匈人出现在这些地区的事实的证据。

(四)克里木半岛的刻赤古墓应当被视为3—4世纪之墓,根据将此古墓内发现的绢布与新疆楼兰及诺音乌拉发现的汉绢进行比较及其他理由,可判明其为汉绢,取得与上述汉镜同样判断的资料。

(五)斯基泰式铜鍑与匈人式铜鍑同为煮沸用器,在形式上却有显著不同。因此过去一直难明两者的直接关系。但把绥远出土的匈奴铜鍑结合起来考虑时,其关系就清楚了。这就是:斯基泰式铜鍑经过西伯利亚流传到绥远,在绥远由于受到中国鼎的形式的影响便成了匈奴式铜鍑。显然,随着匈奴的西迁,这匈奴铜鍑又反过来流转到西方,成了匈人式铜鍑。

以上玉剑以下各项事实是匈奴进入欧洲成了匈人的确实证据。

江上波夫除根据许多考古学资料外,还掌握了中国文献里记载的许多年代日期来立论,他是从考古学上确立匈人、匈奴同族论者。(在他那篇论文中,认为匈奴本来用的是短弓,长弓起源于汉人,后来传入匈奴匈人处的论点,想来还留存有若干疑问),[1]然而长弓起源于匈奴也罢,起源于汉人处也罢,这与江上氏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基本上不存在什么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

[1]不应当以霍去病墓前石雕胡人像所持短弓来断定匈奴的弓全都是斯基泰系短弓。《史记》、《汉书》上的“匈奴弯弓”很难说必定指弯曲的短弓。“弯”理解为动词,很难说就错了。匈人使用长弓之事,不只从遗物上.而且从阿波里纳尔·西顿所唱的“匈人武装着大弓、长箭”也可知道。从蒙古、西伯利亚的诺音乌拉、尼吉内伊博尔金斯克、伊尔莫博等地发现的骨端长弓表明,在蒙古地区居住时代匈奴的弓已有长大者(维尔纳:《特朗斯拜卡连的一处汉代匈奴宿营地》,载《中国学》第14卷,法兰克福,1939年;内田吟风:《古代游牧民族的土木建筑技术》,载《东洋史研究》第11卷2号)。不如认为汉人的长弓是从北方民族传入的东西。

16.6 从人种体型看同族论

以上从文献、语言、遗物各方面论证了匈奴与匈人为具有同样的习俗和物质文化、说同样的语言的同一民族。然而同族说也一还残留有若干问题。那主要好像是所谓人种问题吧。以前我在《匈奴与匈人——其人种特征的差异》(昭和23年)[1]一文中曾提出疑问道:"根据《汉书》、《晋书》等中国文献,我们不能不认为东亚的匈奴为深目、高鼻、多髯、白面、青瞳、多发、长身的北欧型人种。[2] 诺音乌拉匈奴王侯墓发现的头盖骨及骨骼,根据P. K.科兹洛夫的报告显示了非蒙古型的伊朗人的体型,[3]汉将霍去病墓前汉代石雕所见匈奴人肖像也显示了完全同样的特征,这就证明了匈奴为北欧型人种。与此相反,对于欧洲的匈人,有阿米安以下全都不得不认作蒙古型的记录存在的事实,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J.维尔纳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位置》(1934年)把匈奴断定为蒙古人种的种族(他把J. C.安达森的与匈奴遗物一起发现的蒙古型骨骼认作匈奴的骨骼),似得出了与诺音乌拉骨骼才公布的人类学调查相反的结论,是不应当肯定的一种说法。其意义似在认为即便诺音乌拉骨骼并非蒙古型,而形成匈奴帝国的游牧种族却以蒙古型人种为主吧。可是由于他没有考虑《汉书》、《晋书》等所见匈奴的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他所说的难说是周到的看法。

---

[1]《学艺》第36辑,考古民俗特辑号。

[2]明斯(E. H. Minns)的《斯基泰人和希腊人》(剑桥1913年版)最早注意到晋代五部匈奴之一为白色,但他未指出其出处。接着,王国维:《西胡考》(1921年)从《晋书·载记》中注意到五胡之乱时代的石氏匈奴深目、高鼻、多须,但他没有进一步对匈奴的人种体型作详细探究。

[3]科兹洛夫的《北蒙古》(1925年)上报告说:"根据头盖骨及骨骼残剩物进行观察,可认为不是蒙古人种,而宁可认为是接近于雅利安人种者。"(此外有否详细的解剖学的测量情况发表,我不知道。但J.维尔纳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位置》(ESA第9卷,1934年)上曾提到"诺音乌拉骨骼还未公布的人种学调查"。)雅利安人种这个名称原为语族名,这里似可认为用于伊朗—阿富汗体型的意义上。

内田吟风《关于匈奴的人种体型》(昭和 27 年,1952 年)[1]对文献记录、肖像(石刻、刺绣)、遗骨进行详细探讨的结果,作出了匈奴统治部族为白面、黄发、青瞳、长身、深目、高鼻、多须、长头型的高加索人种的结论。

与此相反,侵入欧洲的匈人为蒙古人种之事在历史上是显著的。这就是罗马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凯林及哥特史学家约丹尼斯对匈人外貌的记述:

可说是巨大而不精致的头,可说像针孔般大的眼。男孩子一出生后,似乎为后来忍耐困难,就在面部用小刀深深地切开。因此在成年时由于这个切痕就显示出长有胡须的丑恶相貌。背部低矮。

此外,可认为引用了曾会见过著名匈人王阿提拉的拜占庭人普里斯克所记载的约丹尼斯记述道:

阿提拉背低、胸宽、头很大,眼小发黑,鼻平,脸色带黑。

这些记述表明匈人为蒙古型种族。罗马诗人阿波里纳尔·西多尼说:匈人连中等身材也达不到,而且他们故意摁低自己孩子的鼻子,把头磨尖。这种奇习据阿美德·泰埃里推测,似乎是一般民众表示向往统治种族的蒙古型风貌的东西。当然,正如麦高文所指出的,[2]回顾约丹尼斯所记述的匈人小腿毛深长,可知他们也因与印欧系伊朗族混血而不是纯粹的蒙古人种,但匈人基本上为蒙古型想来没有怀疑余地。

对匈人骨骼的解剖学调查结果也与此完全一致。根据 L. 巴尔图茨、E. 库列奇马里克、V. 莱普哲尔塔等各家对匈人、阿哇尔墓发掘骨骼的解剖学调查,匈人极清楚地为蒙古型。L. 巴尔图茨的《尤塔斯和厄斯屈古墓发掘的人类学结果》(1931 年)、《关于莫森和森特雅诺斯古墓发掘的人类学结果》(1929 年)[3]是对许多匈人及阿哇尔墓群进行

---

[1]刊载在《欧亚大陆学会研究报告》,《自然与文化别编·游牧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昭和 27 年,1952 年版)上。《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的同名论文为该文的增订。

[2]麦高文:《中亚的古代帝国》,查佩尔·希尔,1939 年。

[3]载《斯基泰学》第 4 卷、第 2 卷。

调查的结果,在这些墓的遗骨中,发现了两种显著不同的蒙古型遗骨。A 型主要属于匈人的统治种族,B 型主要属于阿哇尔。A 型(与 B 型布拉恰哈里克的纯蒙古人种相反)在多里科以至美索雅哈里克平均指数为男子 75.51,女子 77.04,男子身高平均 164.45 厘米,女子身高平均 153.12 厘米。C. S. 科翁(Coon)的《欧洲诸人种》(1939 年)[1]将巴尔图茨对颇顶部、眉弓、眼窝、鼻骨、齿槽等的调查结果与俄国体质人类学界的各项调查进行对比,注意到 A 型为在现代通古斯族中间可找到者,而且与在贝加尔湖附近发掘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相近。与此相对,B 型与使用蒙古语的民族,尤其是布里亚特人相近。一个坟墓中常有夫妻分别为 A、B 两型并存的情况,性别与体型之间不存在联系,A、B 两型显示为在社会性上有同一性的东西。巴尔图茨推测在侵入匈牙利之前 A、B 两型早就已在东亚开始混合起来了。巴尔图茨上述调查与 P. 格列古斯的匈人毛发调查[2](匈人的毛发又细又直,黑玉色)搞清了匈人的统治种族具有如何的体型而侵入了欧洲。

又,前引 C. S. 科翁前引书对匈人、阿哇尔遗骨群中存在有北欧种体型个体之事解释说:

> 尤塔斯和奇萨德尔的坟墓里找到"亚洲的北欧因素",[3]只不过是从蒙古吸取来的。这种影响仅局部地存在的情况,由于莫森、森特雅诺斯的纯蒙古人种墓群的存在就很清楚,统治阶级人物(他们的墓造得富丽堂皇以显示死者的权势和威力)为蒙古人种型则是不变的。

他推断在蒙古人种的匈人族长们之下有古中亚系统北欧型人种的臣属者。

与这欧洲的匈人统治者保持纯蒙古型相反,东亚的匈奴统治者却为北欧型,这对于匈奴、匈人同族说的成立怎样才能不矛盾呢?以前拙稿《匈奴与匈人》及《关于匈奴的人种体型》所提出的假说:"匈奴在其

---

[1] The Race of Europe,纽约,1939 年版。

[2] 载 Dolgozatok 第 7 卷,布达佩斯,1927 年版(根据前引科恩书)。

[3] 前引巴尔图茨书及莱布策尔特尔(V. Lebzelter)的《蒂萨德尔斯的阿哇尔人》、《莫斯的马加累滕的阿哇尔头盖骨》(《维也纳人类学会通报》,1935 年)。

西迁途中，其统治者北欧型人种的单于族停留在伊塞克湖地区，形成了悦般国，只有其下层种族的蒙古型诸部族到达了欧洲"，不知妥当与否？或许宁可如过去维维安·德·圣马尔丹所提倡的，匈人的蒙古型似应求诸于向西方追匈奴的鲜卑族与匈奴的混血。[1] 这些都是今后还必须研究的问题。而且阐明他们的氏族、种族、部族联合体的性质，进而阐明还不清楚的匈奴、匈人这些名称的含义，[2]并对现在阿尔泰地区残存着的白人种型诸种族、匈奴语中存在的若干伊朗语成分[3]等问题进行考察，似乎都是有必要的。此外，对于与J. 夏尔潘切尔在其

---

〔1〕他认为匈人成为蒙古型的原因是匈人的一部分同蒙古种的鲜卑人混血的结果。他认为"4世纪时名为拓跋和柔然的蒙古种的兴隆使这些蒙古化的匈奴向西方迁移，这新迁来者将蒙古型加给了匈人"(《游牧民族的人种学历史学研究》，1848年)。但是他是主张匈奴、匈人为芬族说的，他为了使这匈人的蒙古型适合于阿米安·马尔凯林的记载，建立了这样的假说，对两族的人种体型根本没有研究。又，关于鲜卑的语言有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中的蒙古语系说，博德贝尔格:《拓跋魏的语言》(《哈佛亚洲学报》第1卷2号，1936年)的突厥语系说，李盖提的鲜卑拓跋语与契丹系蒙古语有联系说(《匈牙利东方丛书》第14卷，1970年)等，关于其人种则尚无正确的解剖学研究。关于文献上以鲜卑为蒙古种型人种，参照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中收载的《乌桓鲜卑的源流与初期社会构成》一文。

〔2〕匈奴果真是一个种族的名称所源自的与种族图腾有关的名称，还是如同突厥与乌古思的关系般地为政治用语，或为人种用语"胡"(拙稿:《关于周代蒙疆》，载《东洋史研究》第4卷3、4号)，与维吾尔语或蒙古语的hun(人)相当吗(克拉普罗特:《亚洲史述》)，与库蛮族有无名称上的关系(马迦特:《关于库蛮族》，伯希和:《库蛮》，《亚洲学报》，1920年)，这些都还没有得出结论。

鉴于从现代音韵学说来看，"匈奴"二字之音难与Hun直接联结，O. 普里察克的《匈奴的族名xwn》(《中亚学报》第5卷，1960年)引用汉帝诏中把匈奴记作荤允等名，认为匈奴本名的语根有荤粥(允)、熏粥、混夷等古代北方民族名中的荤、熏、混之音(kwan. hün)，从荤、熏等音中寻找Hun的原形。O. 曼琴·赫尔芬的《匈奴的古代名》(《中亚学报》第6卷，1961年)说不可用诏敕等的用语(文学的表现)来探求匈奴的原名，反对普里察克说。曼琴·赫尔芬原来在二年前发表的《种族名词匈》(载《研究丛刊》，1959年)中论及将匈奴的奴、荤粥的粥等割裂出来探求族名之无根据。确实如此。但他论证匈奴、匈人非同族所举出的论点(结婚制度，弃发，武器、用具形式等等)却有许多误解和对时代差距无视之处，在论旨上出现矛盾。

前引阿勒泰姆书把"匈"相当于突厥语意谓强力的词语qun，并把后世鲜卑系吐谷浑释作T'u-yü-Hun (tuγ-oq-hun，旗部族匈人)。我也认为进入欧洲的匈人具有匈奴中被征服系部族中浑邪、浑窳、隔昆等qun、hun之名，大概是蒙古种部族，对于我这种过渡性的假说，不用说以后还应当再研究。

〔3〕意谓"天"的匈奴语除"撑黎"外，还有"祁连"之语。根据前引伊诺斯特朗采夫书，P. 雅密诺夫认为"祁连"相当于拉丁语coelum、法语Ciel，意大利语Gielo，列特语Zeltees。又据伯恩什塔姆，N. Y. 马尔将"祁连"相当于德语Donner。此外，劳费尔指出：官名"翕侯"与伊朗语Šaṛhap，Šahrap有关(劳费尔[B. Laufer]:《月氏的语言》，载《通报》，1916年)；江上波夫指出："径路刀"与波斯语akinakes有关(江上波夫:《径路刀与师比》，收载于《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等等。

论著《吐火罗族的民族志学位置》(1927 年)中重新提倡的乌孙族白人说等的关系的考察,似乎当然也是有必要的吧。[1]

(本文原作《本世纪匈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明天的课题》,1950 年,载《民族学研究》第 14 卷第 3 号;又作《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收入《匈奴史研究》,1953 年。

译自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 1975 年版,第 167 ~200 页。)

---

〔1〕不用说,东亚的匈奴与欧洲的匈人之间有几个世纪的差距,即便原来为同系统部族,在时间空间的过程中,由于与异民族、异人种混合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游牧民族中的种族混合的实际情况,从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1962 年版)及 G. 苏赫·巴图尔:《关于匈奴与鲜卑的种族关系问题》(乌兰巴托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会议上的论文,1973 年)中所述匈奴、鲜卑混合的例子似可推测到。因此所谓同族说、非同族说,归根到底应当是从宏观上来论述的吧,甚至作为夏德的匈人、匈奴同族说的根据的《魏书》,其《蠕蠕传》既称柔然为"东胡之余绪",又说柔然为"冒顿之枝叶",既以之为"东胡之苗裔",又书之曰:"匈奴之裔,根本莫寻",存在着如此不明确的表述。只有从宏观上看来,匈人与东亚的游牧民族匈奴为同系统,甚至具有极深的亲缘关系之事,从本文上述诸必要条件上看来,才可认为并无不相符之处。

17 匈奴西迁考

〔日〕内田吟风

17.1 绪论

西历4世纪后叶，耀武扬威地侵入欧洲的匈人，自古有欧洲史学家推定其为汉史上所见所谓北匈奴的后裔，这是根据这两个民族的性格、习俗类似，名称一致，北匈奴西奔时期与匈人出现于欧洲的时期相符合等情况而推定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单方面情况判断所作出的论断。不过，1899年夏德发表的《论伏尔加河匈人和匈奴》(《慕尼黑科学院哲学语文历史学科通报》)开始注意到《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以匈奴之名记述了匈人的史实。这篇论文又进一步以各种史料论证了匈人实际上不外乎是北匈奴的西迁者。此后，许多史学家有信从的，也有怀疑的。[1]

夏德的这篇论文还相当细致地调查了北匈奴受后汉军追击后逃往西方的始末，但是这一点还说不上充分正确精密，对于北匈奴转为

〔1〕夏德这篇论文的日译文刊载在《史学杂志》上(白鸟库吉译:《伏尔加河匈人及匈奴考》，《史学杂志》第11卷第8、9期)。

关于夏德氏以后匈奴匈人同族说的发展、确立，参照江上波夫:《匈奴匈人同族论》，载《民族研究所纪要》第一册，昭和19年，并收入《欧亚大陆古代北方文化》，昭和23年(1948年)；内田吟风:《关于本世纪的匈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今后的课题》，载《民族学研究》第14卷3号，昭和25年(1950年)及《匈奴匈人同族论研究小史》(收入《北亚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版)。

有人说同族论的论据薄弱，还有人说匈人的起源从匈奴以外的东亚游牧民族去寻找吧(参照韩百诗:《阿提拉与匈人》，1972年，有安斋和雄日译本，1973年版；阿勒泰姆:《匈人史》第1卷，1958年)。考虑到由于种族混融等民族性的变化，对于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两个民族，几乎不可能严密地证明其等同。宏观地、综合地看来，全部条件不能不说匈奴与匈人同种，至少不能不说二者有近缘关系。

匈人的经过不免有说得较粗疏之处。[1] 又，清代沈惟贤的《后汉匈奴表》虽也记有北匈奴的事迹，但几乎只限于与后汉朝廷交涉之事，其中并无对其西迁以及匈奴匈人两族之异同可资研究的事。

本论文旨在对北匈奴的西域经略以及其迁移到欧洲的情况了解得比过去更清楚，同时不外乎试图由此增加一些关于匈人匈奴同族说情况判断的证明资料（如上所述，匈奴匈人同族说已有夏德氏立证，我所补充的情况判断的资料不敢说有用）。

17.2 北匈奴西迁年表

[缩略语] 纪（《后汉书》本纪） 南（《后汉书·南匈奴传》） 鲜（《后汉书·鲜卑传》） 超（《班超传》） 勇（《班勇传》） 固（《窦固传》） 宪（《窦宪传》） 秉（《耿秉传》） 恭（《耿恭传》） 夔（《耿夔传》） 彤（《祭彤传》） 苏（《苏章传》） 鲁（《鲁恭传》） 班（《班固传》） 梁（《梁慬传》） 安（《袁安传》） 冯（《冯豹传》）（以上诸人传皆在《后汉书》） 乌（《后汉书·乌桓传》） 西《后汉书·西域传序》） 莎（《后汉书·莎车传》） 疏（《后汉书·疏勒传》） 后（《后汉书·车师后部传》） 于（《后汉书·于阗传》） 志（《后汉书·天文志》） 袁（袁宏《后汉纪》） 司（司马彪《后汉书》）东《东观汉记》） 魏（《魏略》） 裴碑（巴里坤湖附近《裴岑纪功碑》文） 书（《三国志》所引[王沈]《魏书》） 康（《晋书·康居传》 悦（《魏书》、《北史》悦般传） 者（同上者舌传）粟（同上粟特传）

建武二十四年（48 年） 匈奴日逐王比背叛蒲奴[2]单于投降后汉，成为南单于。匈奴自此分裂为南北。（南、纪）

二十八年（52 年） 北匈奴向汉朝遣使，进贡马、裘，请求和亲，又求率领西域诸胡献见。汉朝厚赠以杂缯之类，不许诸胡献见。（南、纪）

[1]夏德说的缺点为不仅其西迁经过的考证粗疏，而且缺少对匈奴匈人两者语言的研究。

[2]袁宏:《后汉纪》作满奴单于。检读《汉书·匈奴传》，匈奴有蒲奴水（丁谦:《汉书匈奴传考证》将此水比定为塔楚河）。可认为单于之名与河名同，则当以蒲奴单于为是。

二十九年(53年)	北匈奴遣使如上年。汉朝以玺书答复,赐以绥缯。(南) 在此前后,乌桓(乌、书)、鲜卑为取得汉朝赏赐,经常侵掠北匈奴。(鲜)
永平二年(59年)	在此前后,龟兹国属于北匈奴,在北匈奴保护下称霸西域北道。(超)
三年(60年)	北匈奴率领龟兹国讨伐莎车国。(莎)
四年(61年)	于阗灭莎车,北匈奴发龟兹、尉黎、焉耆等15国兵3万攻于阗,于阗降。(莎) 此后于阗在北匈奴监护下称霸西域南道。(超)
五年(62年)	北匈奴的一支军队侵犯汉朝的五原、云中,南单于击退这支北匈奴军。(南、纪、志)
六年(63年)	北匈奴向汉朝请求合市,汉朝害怕[其入侵],许之。(南)
八年(65年)	北匈奴欲迎接南匈奴叛[汉朝]者,未能成功,破坏了与汉朝的和平关系。(匈)北匈奴胁迫西域诸国跟从它大举入侵河西。(西、南)
十三年(70年)	在此前后,北匈奴让南呼衍部置屯于伊吾。(袁)

(以上59—70年为北匈奴在西域发展的第一阶段)

永平十六年(73年)	窦固等率领汉军出塞,大举征讨北匈奴。(纪、南、固、超、西、志、秉、彤)窦固击破北匈奴呼衍王于天山、蒲类(纪、袁、司、固、超、大英博物馆所藏唐光启元年文书),留汉兵屯于伊吾。(固、纪)后汉置宜禾都尉于伊吾庐。(西) 北匈奴的一支军队侵掠云中、渔阳。(南、志、纪) 班超经营于阗、鄯善,排除北匈奴势力。(超)

十七年（74 年）	班超将疏勒从北匈奴手中拉到汉朝方面。（超、疏）西域各国向汉朝派遣王子入侍。（纪、西）
	窦固所率汉军在蒲类海上大破北匈奴，收降车师前后两部。（固、恭、秉、纪、苏）
	汉朝设置西域都护（陈睦）、戊校尉（耿恭，车师后部金蒲城）、己校尉（关宠，车师前部柳中）。乌孙归服汉朝。（恭、西、纪、东、司、袁）
十八年（75 年）	北单于为恢复统辖西域，派出左谷蠡王两万骑，并吞车师后部，围攻戊校尉（耿恭，驻屯于金蒲城，后又屯驻于疏勒城旁）（纪、恭、司），又使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纪、超、恭、西、鲁、车）。北匈奴围攻己校尉（关宠，屯驻柳中）。（恭）龟兹又攻班超于疏勒。（超）
建初元年（76 年）	汉朝撤销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迎还戊校尉耿恭（西域都护及己校尉已战殁）。（恭、纪、西）
二年（77 年）	汉朝撤除伊吾的屯兵，放弃西域。（纪、西、超）
	北匈奴屯兵伊吾，西域再次落入北匈奴势力下。（西）
元和元年（84 年）	北匈奴向汉朝请求交易，遣大沮渠莫訾王等携带牛马万余头与汉商贸易。汉朝设立邸舍厚遇之。（南）

（以上 76—84 年为北匈奴在西域发展的第二阶段）

元和二年（85 年）	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众投降汉朝。（南）
章和元年（87 年）	班超收降莎车、疏勒，汉朝威震西域。（莎、超、纪）
	鲜卑大举攻入北匈奴左地，斩北单于优留，收降其众十余万。（袁、南、纪）

在此前后北匈奴遭到鲜卑、丁令、南匈奴侵掠，西域又离叛，北匈奴大乱，且遇饥荒。北匈奴投降汉朝者前后达130余部，大为衰耗。（南）

永元元年（89年）　窦宪等所率汉军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追击至私渠北鞮海，斩名王以下1.3万人。（宪、志、纪、西、南等）日逐王等81部20个余万人投降汉朝。（宪）

二年（90年）　北单于遣使请求朝觐，汉朝派遣班固迎接。（纪、班、东）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攻破北单于庭而还。（南、纪、宪）

汉朝向西域派出副校尉讨伐北匈奴夺回伊吾。（纪、西）

三年（91年）　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于金微山，斩母阏氏以下名王5000。（南、纪、夔）北单于等遂逃走，迁居于乌孙之地（伊犁河一带）。（参照第三节）

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1]率领八部两万余人驻于蒲类海（巴里坤湖）畔，自称北单于。（夔、安、南）

班超降服龟兹、温宿、姑墨等。（超、袁）复置

[1]袁宏:《后汉纪》作“阿修”，似误。关于这一点，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说:“惠栋曰:袁《纪》作阿修。钱大昭曰:疑即於除鞬也。左当作右。黄山曰:安上言: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按:《南匈奴传》章和元年鲜卑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又永元三年，北单于复为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遣使款塞。窦宪上书，立为北单于，朝廷从之。似阿修别为一人。乃优留之弟若於除鞬之兄，是为嗣，单于但逃亡，未尝为二虏杀也。惟袁《纪》谓阿修诛君之子，又与乌丸鲜卑为父兄之仇，则似即为於除鞬，故《通鉴》不更及阿修之名也。”然而阿修与於除鞬似非同一人。根据袁宏:《后汉纪》，由于袁安上奏反对立阿修为北单于，事前使这件事取消了。再检读《后汉书·袁安传》，最初窦宪奏请立左谷蠡王阿修为北单于，由于袁安上奏反对而取消此事，窦宪改为奏请立右谷蠡王於除鞬为北单于，此事得以成功，由此可知阿修为於除鞬以外的另一个人。又，白鸟库吉认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之弟Utsüken（斡惕赤斤）当与匈奴於除鞬同名，似即达斡尔语Učiken，išiken，itsiken（幼小之意）。（《西域史上的新研究》）。

参照拙稿:《关于后汉书北单于於除鞬记事》，载《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籍论丛》，1963年版（昭和38年）。

	西域都护(驻龟兹)、戊校尉(驻车师前部高昌壁)。(西)
	在此前后,鲜卑进入北匈奴故地。北匈奴余种十余万落投降鲜卑,与鲜卑杂居,自称鲜卑兵。(书、鲜)
四年(92 年)	於除鞬在塞上,汉朝授以北单于玺绶,使中郎将持节卫护。(纪、南、东)
五年(93 年)	於除鞬叛,汉兵追斩之,破灭其众。(南、纪)
六年(94 年)	班超率龟兹等 8 国兵 7 万等破焉耆,降服西域五十余国。(西、纪、超)车师后部王涿鞮叛汉,奔北匈奴。汉兵追斩之。(后)
十六年(104 年)	北单于遣使汉廷,求和亲。汉廷[不许,]仅厚赐之,不遣使。(南、纪、袁)
元兴元年(105 年)	北单于遣使至敦煌,请求遣子入侍,汉廷[不答,]唯加赐而已。(南、纪、袁)
延平元年(106 年)	冬,西域叛,围攻都护任尚,汉朝派出援军,迎还任尚等人。(袁、西、纪、勇)
永初元年(107 年)	汉朝撤除西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放弃西域。(西、勇、梁)
	北匈奴再次收服西域诸国,其后与西域各国共同侵犯汉朝边境达十余年。(西、勇)
元初四年(117 年)	南匈奴日逐王逢侯以前曾率领部众叛出塞外,遭到鲜卑抄掠,这时其部众悉归北匈奴。(南)
六年(119 年)	汉朝向西域派出长史索班试图再次经营伊吾屯田,被北单于攻杀。(西、勇)
延光二年(923 年)	在此前后,北匈奴呼衍王经常来往于蒲类(巴里坤湖)、秦海(Pontus Euxinus,黑海)之间,专制西域。(西、袁)(参照第四节第一小节)
	汉朝派遣班勇经营西域。(西、袁)

（以上107—123年为北匈奴在西域发展的第三阶段）

延光三年（124年）	班勇定车师前部，击破北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勇）
四年（125年）	班勇斩车师后部王及北匈奴持节使者，平定全部车师。（后、纪）
永建元年（126年）	班勇击破北匈奴呼衍王（后），捕斩北单于的从兄，收降两万人。（勇）
二年（127年）	北单于亲自率领万余骑进入车师后部。班勇迎击之，斩骨都侯，击走北单于。呼衍王迁居枯梧水上。（勇）
	班勇降服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17国归服汉朝。然而乌孙葱岭以西与汉朝中断关系。（西）
六年（131年）	汉朝恢复伊吾屯田，设置伊吾司马。（西、纪）
阳嘉元年（132年）	汉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盘等兵侵掠于阗，斩首300级。（西）
三年（134年）	汉车师后部司马攻击北匈奴，斩单于之母及季母等，虏获甚多。（后、纪）
四年（135年）	北匈奴呼衍王侵掠车师后部，汉朝不能救援。（后）从此汉朝威势衰落，西域诸国骄放。（西）
永和二年（137年）	敦煌太守裴岑攻斩呼衍王及其部众。（裴、碑）
元嘉元年（151年）	呼衍王侵犯伊吾，杀汉伊吾司马于蒲类海东，进而进攻伊吾屯城。汉朝派出大军援救，北匈奴退走。（后）
二年（152年）	于阗叛汉，杀汉长史王敬于柳中（西、纪、于），汉朝不能惩罚于阗。（于）
永兴元年（153年）	车师后王阿罗多攻击汉屯军失败后逃走。（后、西）
	汉戊校尉阎详怕阿罗多请来北匈奴援兵，迎接

阿罗多恢复王位。(后)

永寿年间(156 年左右) 疏勒、龟兹、莎车、乌孙与北匈奴多次侵犯酒泉,掠走居民。(袁纪李膺传)

延熹初年

(158 年左右) 北匈奴放弃东突厥斯坦,迁往西方康居的北方(吉尔吉斯草原的北部)。(参照第四节)

作为亚速海附近的居民之一,欧洲人开始知道匈人之名。(托勒密书)北匈奴的一部分[老弱者]不能西行,残留于龟兹之北,建立悦般国(单于王国)。(悦)

延熹九年左右

(166 年左右) 鲜卑君长檀石槐兴起,西讨乌孙,尽有北匈奴旧地,与乌孙邻接。(书、鲜)

三国魏初

(230 年左右) 北匈奴仍然留在吉尔吉斯草原上,与其附近的蛮族合并。(魏)(参照第四节)

晋初

(280 年左右) 北匈奴夺取康居的北部(吉尔吉斯草原南部,锡尔河北岸),(悦)康居的中心迁往南方。(康、者)(参照第五节)

北魏建国初年

(350 年左右) 北单于(匈人王)杀又称阿兰的奄蔡君王,夺取其国(在亚速海、高加索之间地区)。(粟)(参照第五节)

建国三十八年

(375 年) 匈人王巴拉米尔(Balamir)率众侵入多瑙河沿岸地区。[俺米安·马尔塞林(Ammianus Marcellinus)]

17.3 关于北匈奴迁居伊犁河地区

永元三年(91 年),北匈奴大败于金微山之后,以往一直认为他们就直接逃走到了康居,即人们对《后汉书》南匈奴传、耿夔传所载“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北单于……逃亡不知所在”,以及《魏书·西域传》所载“北单于度金微,西走康居”无批判地一起考虑,认为“当时北单于远远地逃到了西方康居地区,后汉的人们对他们的行动趋向全然不知,后来在编纂《魏书》前后,根据西方来的报导,中国人才逐渐知道了北单于逃到了康居之事”。德经、夏德、白鸟库吉等许多学者基本上都是这样观察这个问题的。

(只有马迦特认为这北单于逃到康居乃是与前汉时郅支单于迁居康居之事混同而产生的误传。但是他并没有举出证据。没有提出《魏书·西域传》把北单于逃到康居的记事与郅支单于事迹混同起来误记的具体证据。同时,他怀疑这种误传的原因是因他把应比定为吉尔吉斯草原的康居误解为 Sogdiana。因此,这个认为《魏书·西域传》误传的学说基本上似可置之不问。)

然而仔细检读《后汉书》,可知后汉人绝不会永远不知道北单于的行动趋向。又,北单于战败后绝非直接逃到康居,这一点是清楚的。这正如年表上所明确记载。永元三年以后,后汉在西域非常频繁地与北匈奴和北单于发生紧连着的交涉,并且还发现《南匈奴论赞》及《袁安传》明确记载着北单于遁走于乌孙之地(《通典》从之)。而《后汉书》哪里也没有记载北单于迁居康居之事,这并非由于后汉人对北单于的行动趋向全然不知,如后节所述,北匈奴迁居康居是在三国时代末期以至晋代初期,在整个后汉时,北匈奴似基本上占住在乌孙之地即伊犁河上游地区。不这样考虑,似不能了解见于前面年表上的后汉与北匈奴之间在东突厥斯坦的那样频繁的非常紧要的接触、交涉。如果北匈奴在后汉时代已经迁居到像康居(吉尔吉斯草原)那样远的西方之地[从康居方面的情况看来也可知不是那样的(参照后节)],就不会有上述中国西边后汉、北匈奴之间的不断交涉。又,北匈奴的遗种在龟兹

(今库车)之北建立悦般国之事,即在后魏时代在乌孙西北成为拥有20万人口的单于王国的悦般国成立之事,也只有认为北单于迁居于乌孙的这种情况,才得以完全了解。

白鸟库吉《乌孙考》(载《史学杂志》第II卷及《西域史研究》上卷)由于推测北单于逃离鄂尔浑河以西的北单于庭,越过可认为是阿尔泰山脉中的一座山的金微山,走出额尔齐斯河上源地区,经过塔尔巴哈台直接到达康居,对于这种推测与《魏书·悦般传》的记事发生矛盾感到遗憾,便怀疑《悦般传》的一部分记载有误。但从北单于先逃到乌孙并在那里长期居住的情况看来,这就与《魏书·悦般传》的记事并不矛盾,并且可作出极圆满的解释。又,如果悦般国在龟兹之北建国,那么后来一定会受到蒙古高原上勃兴起来的鲜卑檀石槐与柔然的侵犯,但受侵犯的却是乌孙,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过,细读《魏书》之文可知北匈奴残留民的停留处最初在龟兹之北,后来才建国于乌孙西北,这就对悦般不受鲜卑柔然侵犯、乌孙受侵犯之事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了。[1] 又,松田寿男《魏书西域传批判及悦般国的方位》(《大正大学学报》第10卷)的说法想来也还应当作为悦般国当初的位置。还有,前引夏德论文认为北单于通过乌孙直接逃到了康居,也是不恰当的看法。

总而言之,不能不认为北单于被汉军击破后放弃鄂尔浑河以西的单于庭,越过可认为是阿尔泰山脉中的一座山的金微山,迁居到乌孙之地即伊犁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地方,在其后数十年间与后汉对抗、争夺对葱岭以东西域各国的统治权之后,将许多残留者遗留在龟兹以北而西迁,迁移到了遥远的西方吉尔吉斯草原的康居之地。[2]

17.4 关于北匈奴迁居吉尔吉斯草原

呼衍王之进入黑海沿岸 后汉延光二年(123年)前后北匈奴专制

---

[1]关于柔然勃兴时代的乌孙领域,船木胜马的《魏书乌孙国传考》一文(载《史渊》第51卷)有详细考证。

[2]关于北单于庭、金微山、龟兹、康居等地的现代地名比定,参照白鸟库吉:《乌孙考》、《西域史上的新研究》、《康居考》、《粟特国考》,以上诸文收载于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一书中。

西域，即《后汉书·西域传》及袁宏《后汉纪》所记载的延光二年前后“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抄”的情况，不外乎表明这时前后北匈奴已扩张其势力范围达到欧亚二洲边境上。

蒲类海即 Barikul 海，今新疆镇西县巴里坤湖，这一点已成为定说。秦海，据《后汉书》李贤注：“大秦国在西海西，故曰秦海”，当为 Pontus Euxinus，即今黑海，这是极其清楚的事。[1] 只不过当时北匈奴的根据地还在东突厥斯坦，这从此后永寿年间(156 年)北匈奴、后汉的交涉状态，可作出充分的推断，尤其是从阳嘉三年(134 年)后汉军在大破北匈奴的阊吾陆谷曾斩杀单于的季母、母阏氏，虏获甚多的情况看来，那里大概就是单于庭所在地，至少可认为单于庭在那里的附近，从其后与后汉军交战情形看来，单于庭也显然不在遥远的西方。尤其是由于这时(永建二年即 127 年以后)后汉与葱岭以西完全隔绝，这个地方即北匈奴的根据地，毫无疑问是在东突厥斯坦方面。

北匈奴迁居吉尔吉斯草原的年代 北匈奴在金微山战败后并没有直接逃到康居之地即吉尔吉斯草原，数十年间他们将其中心置于东突厥斯坦，这在前节《关于北匈奴迁居伊犁河地区》中已论述过了。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迁居到了康居地区的呢？如前所述，北匈奴于西历 123 年前后已经控制了西起黑海、东至蒲类海的中亚广大地区，可认为从那时起当然已经把势力延伸到了康居。因此这里论及他们迁居康居不可不限定为他们撤离东突厥斯坦、实际占据康居地区之时。如年表所示，北匈奴在永寿年间[后]与后汉中断了交涉关系，他们在东突厥斯坦活跃的事实在汉史上立刻不见记载了。另一方面到这时前后，鲜卑发展显著，鲜卑檀石槐的领土范围西部达到上谷以西敦煌、乌孙，他向西方征讨乌孙，达到与乌孙邻接，完全占有了北匈奴故地，这大致可视为北匈奴西迁的最大原因吧？

《魏书》所说北单于逃往康居即北匈奴放弃对葱岭以东西域各国

---

[1] 大秦国指东罗马已成为定说。因此，秦海即唐李贤注之西海，为东罗马东边之海，无疑即今黑海。只有清代丁谦的《后汉书西域传考证》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却否定李注，将秦海比定为乌鲁木齐西北的阿尔雅泊。但是如果仅来往于新疆中一隅之地的阿尔雅泊、巴里坤湖之间，如何能专制西域诸国呢？不能不说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的统治权,撤离伊犁汉地区迁往西方吉尔吉斯草原,从这些事情看来,可认为考定为如年表所示的延熹初年即西历158年前后最妥当。北魏时代作为悦般国被知道的北匈奴遗种,最初停留在龟兹(库车)之北建国,似也应当认为是延熹初年前后之事。不过,如下文所考察,北匈奴并没有在西历158年时直接袭夺康居国本土,他们似大概在康居附近或边缘地区。

北匈奴迁居于吉尔吉斯草原的地点 北匈奴撤离西域东部迁移到的地方,不能认为最初就在康居本土即锡尔河北岸 Chimkend、突厥斯坦地区。应当相信三国魏景元年间前后(260年前后)以实际知识作为大部分资料所编纂的鱼豢《魏略·西戎传》(《三国志》所引)上明确记载的康居情况:

康居,本国无增损也。

以及同传所载匈奴、丁令、乌孙三者的地理位置:

[匈奴之]北,丁令/在乌孙西。

由此可推知北匈奴最初迁居来到的地方不是康居本土,而可认为是康居北面的边缘地区吉尔吉斯草原北部,即郅支单于曾以其地为临时根据地的坚昆国的北方。[1]

关于西历123年左右以后北匈奴进入黑海沿岸及158年左右迁居吉尔吉斯草原北部之事,在西历170年左右所写的托勒密的地理书把匈奴记作可认为是讹写的 GhRYNATOI 或 ChOYNOI 之名,该书把 ChOYNOI 记载作住在顿河、伏尔加河之间的 Roxolani 的邻人,还记载了巴尔喀什湖以西地方住有 ChRYNATOISChYThAI 之事[2](《地理志》第3卷5.25;第6卷13.3)。又,西历200年左右 Caspi 国境上的诸蛮族部落名为 Scyths, Huns, Caspiani, Albani 者与迪奥尼斯·彼里格特所列举者不相应,这也可加强北匈奴迁移的确实性。东西两方面史料的一致,这是表明匈奴匈人同族的一个证据。

---

[1]参照张鹏一:《魏略辑本序》及附载(补三国魏志鱼豢传)。但《魏略》上的"坚昆、呼得、丁令三国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车师六国五千里"这一段是据《汉书》陈汤传等所得到的汉代坚昆知识误入者,并非魏初情况。

[2]阿勒泰姆:《阿提拉和匈人》,1951年版,第43页;《匈人史》第1卷第一章。

北单于迁居康居本土的年代 那么《魏书·悦般传》所明确记载的北单于迁居康居本土即锡尔河北岸地区应当置于哪年呢？对此应当说还没有判断情况的直接文献资料。因而似应专门求诸于《魏书》编纂以前的康居国情况。对此，只有晋代康居国首都的南迁是完全有关的情况。晋武帝时记载西域事情的《晋书·四夷传》上把过去一直是康居首都的卑阗城（今 Chimk-end，突厥斯坦附近）改掉了，康居首都被记载为遥远南方的苏薤城（今萨赫里·萨布兹）。[1] 康居这一向南退的事实与《魏书·悦般传》北单于迁居康居的事实相对照，再参照曹魏时代康居国领土无增损的情况，就可推定：在吉尔吉斯草原北部培养势力的北匈奴到晋初即西历 280 年前后时，遂势如雪崩般地进入康居本土即锡尔河北岸地区，在郅支单于往昔曾振奋威势的那个地区再次振兴了匈奴的威权，我相信对于缺乏史料的当时情况不会判断不当。

又，《魏书·西域传》在报导北单于迁居康居的同时，还指出了作为康居后身的者舌国的存在："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落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贡，自是不绝。"者舌国大致上无疑是在康居放弃的故土[2]上建立的新国家。它果真是北魏时代北匈奴族的国家呢？还是已成了代替北匈奴的其他民族，例如哌哒那样的民族的国家呢？这里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探讨了。

---

〔1〕卑阗城的位置，应当从大宛的贵山城来推定。白鸟博士：《康居考》把贵山城视为 Kasan，桑原博士：《读藤田君的〈贵山城及监氏城〉》把贵山城比定为 Khojend，看法不一致。然而从卑阗、贵山两城的位置关系上，卑阗城无论如何是在塔什干北面的 Chimkent，甚至在丘尔基斯坦地区，无疑是在康居国的北部，因此康居从卑阗迁都至苏薤，似当表明康居的中心向南远移到了南方。为什么呢？因为采用以苏薤为 Sogd 的音译说也罢，采用根据《唐书》所记以苏薤为 Kesch，Sahr－i-Sabz 说也罢，苏薤都在远离卑阗的南方。又，白鸟博士：《粟特国考》断定苏薤不在 Sogdiana 地区。但无论如何，只要比较《汉书》所记"大宛国，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十一里"与《晋书》所记苏薤，"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就必须认为苏薤在卑阗之南了吧。又，《史记》记载说："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参照上列《汉书》、《晋书》的记载来考虑，可推定为康居起初在《史记》编纂的当时以苏薤之地为都城，其后势力扩大北进，遂以卑阗为都城，到晋时受北匈奴迫击，再次退回到从前的都城苏薤。

〔2〕白鸟博士：《大宛国考》认为者舌国即 Šaš（沙失），相当于今天的塔什干，藤田丰八博士也认为者舌国是《大唐西域记》的赭时国即石国，相当于今天的塔什干。想来康居在北魏时代也丧失了这样的南方地区。

17.5　北匈奴征服奄蔡即匈人征服阿兰

夏德的《论伏尔加河匈人和匈奴》论证匈奴与匈人同族的要点是从分析《魏书·西域传·粟特国》的下列记载得出的。《魏书·西域传·粟特国》记载说：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夏德分析这段记载，得出以下几点：

(1)粟特国古名奄蔡，《后汉书》、《魏略》曰："一名阿兰"，此外其国所临之"大泽"从各种史料上看来与黑海相符，又从代、康居的距离、地势、地理位置等看来，粟特（奄蔡、阿兰）无非是指西史的阿兰族国家。

(2)名叫忽倪的匈奴系粟特国王向北魏派遣使者在西历455—457年时，其三世前匈奴征服奄蔡约在西历355年左右，这与西史所载匈人征服阿兰之事完全一致。

(3)匈奴系粟特国王之名忽倪，汉字古音为Hut-ngiek或hut-nik，从其他许多例子可知中国古代音译法通常以尾音-t翻译外国语的r音，因此忽倪无非是匈人王阿提拉的季子赫尔纳克(Hernac)。

(4)粟特，约丹尼斯史书记作Sadages或Satagari，为阿兰的一个支族所居住的克里木半岛上的速黑答黑地方(Sughdag)。根据约丹尼斯，可认为阿提拉死后，匈人王赫尔纳克寄居于这个地方。

夏德所说受到学术界大部分人的承认，为匈奴与匈人同族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我自己相信这一考证原则上而言应当认为是大体上恰当的。但是他的考证也有若干错误及考证得不够之处。必须补正如下。

奄蔡的名称与阿兰之间的关系　粟特的古名奄蔡的别名为阿兰聊[1]或阿兰(奄蔡改名阿兰聊国[《后汉书》],奄蔡国一名阿兰〔《魏略》])。此阿兰为托勒密所记载的 Alani-Skytae, Alanorsi 等一系列阿兰系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名或全体阿兰民族名的音译,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夏德氏反过来又信从了席甫列赫尔、马迦特的说法,他们俩根据奄蔡的现代音 Jen-tsai- An-tsai,以及中国古代对外国语的尾音-r常音译为带 t、k 或 n 的汉字,并根据现今外国语的始音 ts 与往昔的 s 音相近,将奄蔡比定为 An-tsai-Ar-sai - Aorsi-Alanorsi。[但奄蔡的古音为 Am-ta 或 Jem-ta,因此不能把奄蔡视为 Aorsi 的对音。]马迦特和格罗特认为奄蔡、阿兰的联系不如求诸于以奄蔡 am-sat, am-tsat ~ am-sak, am-tsak 为 Matsjaka(梵语)、Masjaka(awest 语)、Mathijaka(古波斯语)即希罗多德、斯特拉颇所说 Massageten 鱼食者的对音。[2] 但是以奄蔡为 matsjaka 的对音,不得不说是过于牵强了。

另一方面,白鸟库吉博士在其《塞民族考》中认为奄蔡之奄的古音从同类音的厌的广东音、客家音、安南音等类似例子看来,有 yem 和 ap 二音,奄蔡可发音作 ap-čat。又,《汉书·陈汤传》对阖苏这个国名注作:"阖苏即奄蔡也",由于阖苏之古音为 hap-(或 hop-)su,而奄蔡、阖苏都是同一原名的汉字音译,故它们的音分别为 ap-ča (ap-čat)及 hap-su。因此,白鸟博士认为马迦特以奄蔡之古音为 am-čat,将它视为 Mataja-ka(Massageten)的对音有困难,不如把奄蔡、阖苏(ap-ča, hap-su)视为普利尼《自然史》所记载的里海地区的住民 Abzoe 的对音。但是白鸟博士在此之外并未探讨 Abzoe(Abzoae)与 Alan 以至奄蔡、阿兰

---

〔1〕沙畹:《后汉书西域传译注》(载《通报》第2集第8卷,1907年)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奄蔡国近旁有名为柳国之国,认为此阿兰聊为阿兰国及柳国两国,但根据薄弱。如果如此,《后汉书》的记事不得不读作"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与《后汉书·西域传》的一般语气全然相反,并且"居地城"等文属于对柳(聊)国的说明,对奄蔡便完全没有文辞说明,在正史各西域传中是不见同类例子的书法的。必须理解为《后汉书》编者将 Alanorsi 或其别称 Alanoi 译写为阿兰聊国或阿兰。

〔2〕他们认为奄蔡的古音 am-tsát(-sat)只能还原为 MASSAGhETAI 的斯基泰语形态 masja-ga。见马迦特:《伊朗史研究》第2册,1905年,第84~85页、240页;《不里阿耳王公系表中的非斯拉夫词语》(载《通报》第11卷,1910年);格罗特:《基督教以前时代的中国西部地区》,1926年版第16页。

的联系。[1]

然而特加特在其《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939 年版)一书中(他好像不知道有白鸟以奄蔡为 Abzoe 的对音的说法)独立地强调阖苏 Hap-so 为 Abzoae 的正确音译,认为《后汉书》的记载意味着西历 50—55 年或其前后,Abzoae(奄蔡)抛弃他们与伏尔加河彼岸萨尔马泰人的古老关系,成为阿兰同盟国的一员,《魏略》所记载的则表明在 2 世纪末至 3 世纪初震撼整个亚洲大陆的各次革命之后,Abzoae 不再在阿兰之中(退出了阿兰同盟),这与波伊登加古代地图(4 世纪之图)上将 Abzoae(这里被讹记作 Arzoae)与阿兰分别记作顿河、高加索地区的独立部族是相应的。[2]

总而言之,中国史所谓奄蔡即西史 Abzoae 的音译,中国史所称“奄蔡改名阿兰聊国”或“奄蔡一名阿兰”显然应当理解为是就 Abzoae 与 Alan 的分合关系而言的。

对奄蔡所临大泽的解释。J. 格罗特(《基督教以前时代的中国西部地区》1926 年版第 16 页)反对夏德把《史记 · 大宛列传》和《汉书 · 西域传》所记“奄蔡国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中的大泽解释为黑海,他把大泽解释为亚速海及里海北部,这是由于格罗特把康居国局限于撒马尔罕而来推断大泽位置所产生的误解(关于康居的位置,参照白鸟博士《西域史上的新研究》、《康居考》)。此外,他把《史记》的“无崖”这个词语解释为 Keinebergige Ufer,并认为夏德释作 Uferlos 不正确。其实他的解释是错误的,“崖”与“涯”同[3],夏德关于大泽北海所

---

[1]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载《东洋学报》第 7、8,9 卷(大正 6—8 年),此文收于昭和 16 年(1941 年)版《西域史研究》上卷第 463 ~ 628 页,并收入《白鸟库吉全集》第 6 卷。

又,白鸟库吉的《拂林问题的新解释》,《东洋学报》第 19、20 卷,昭和 6、7 年(1931 年、1932 年);《西域史研究》第 531 ~ 787 页;关于 Abzoe 与其前说无关,认为从语音上的类似,奄蔡与《元史》的钦察 Kipčak 有联系,因为此说无文献上的证据,这里应当置之不问。

[2]参照特加特:《罗马与中国》,山崎升日译本,昭和 19 年版(1944 年),第 257 ~ 260 页。榎一雄:《匈奴匈人同族论批判》(载《东洋文化》1)对于认为《魏书 · 粟特国传》的匈奴征服奄蔡的记事为记述匈人征服阿兰之事表示怀疑,他提出的理由为:“根据夏德说、马迦特说和白鸟说,奄蔡的意义都不清楚;如果《粟特国传》的记事记述匈人征服阿兰之事,就应当写上阿兰的名称,不应当使用奄蔡的古名”,这个疑问想来根据特迦特说就可消除了。

[3]《通典 · 边防篇》作“无涯岸”。

说的，是正确的。不可忘掉“奄蔡西与大秦接”（《魏略》）的远在西边的位置。

粟特国之比定为 Sughdak。根据白鸟博士（《粟特国考》）的说法，《后汉书》的粟弋国、《魏略》的属繇国、《晋书》的粟特国显然就是中亚的 Sogdak（撒马尔罕地区的 Sogdiana）。因此，如下《魏书》、《周书》记载中的粟特国无疑也同样都是中亚的 Sogdiana。《魏书》记载说：

>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周书》记载说：

>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盖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献方物。

但是这粟特国：

（1）为古之奄蔡。[1]

（2）居于大泽。

（3）在康居西北。

（4）与北魏代都有 1.6 万里的距离。与此相对，Sogdiana 地区的撒马尔罕即悉万斤国“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尽管这些数字为杜撰的数字，但可知大致的远近）。

（5）匈奴夺其国。

（6）忽倪即阿提拉的季子赫尔纳克，出现在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的王侯世系表的远祖之中，他无疑曾统治过克里木半岛地区，而不是

---

〔1〕指示粟特即奄蔡的史料，并非只有如《北史》、《通典》、《周书》那样的唐代编撰的书，在魏收的原著《魏书》原文（《太平寰宇记》所引）中也是有明文记载的。《通典》记作粟特即奄蔡，并在注中征引了《后魏史》（从其名似可推测为隋魏澹之《魏史》，可知确系根据旧记）。

他统治 Sogdiana 的证据。[1]

(7)据《通志》所记:奄蔡"去代一万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2]可知,此粟特国并非中亚之 Sogdian,而显然是如夏德所考证的克里木半岛的速黑答黑,也即阿提拉王的子孙所占据的速黑答黑。[3]

(8)据夏德推论,克里木半岛的速黑答黑(一作 Sudak,SOYGhSA-IA)这个地名与西史上记载作与匈奴一起活动的、被认作阿兰种或匈人种的 Sadagarier(Sadages, Satagarii)有关,我自己进一步认为此 Sadagarier 在汉代即已作为匈奴单于统治下的一个部族为汉人所知。这就

---

〔1〕前引榎一雄论文从阿米安所记载的"356 年左右,萨珊朝夏普尔二世在最远的国境与最好战的蛮横勇猛的匈尼特人作战,后来与匈尼特人讲和",推测 356 年左右的 Sogdiana 地区一定是在匈尼特即匈奴的统治下。但是以此认为《魏书·粟特国传》匈奴征服奄蔡粟特所记述的是匈人征服 Sogdiana 之事,并认为在 356 年左右的匈尼特王三世之后有以忽倪字音为名的匈尼特王,想来似还有其他证据的必要。

〔2〕《通典》将《后汉书·粟弋传》与《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混在一起记作"粟弋,后汉通焉……一名粟特……在安息北五千里",可认为《通典》、《通志》都是根据记有"粟特国在安息北五千里"的后魏时代某种文献(或即魏收《后魏书·西域传》旧本)记述的。

〔3〕不过江上波夫:《匈奴匈人同族论》(昭和 19 年)认为《魏书·粟特国传》记载的大部分记述匈奴(即匈人)征服阿兰(即 Alani)之事,但传文中有粟特地名的部分即"粟特国在葱岭之西"以及从"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州"以迄传末之文,《魏书》编者记载混乱,有误,粟特国正如白鸟博士所考证为 Sogdiana,不应当如夏特所认为的匈人退居的速黑答黑。总之,江上氏大致以《魏书·粟特国传》中的"古之奄蔡……至王忽倪已三世矣"部分作为匈奴匈人同族论的根本史料,采取了夏德说,对其中有关粟特这个地名的小部分采取了白鸟说,认为这与匈奴匈人完全无关的 Sogdiana 的事是混入的,必须除去

江上氏把粟特认作 Sogdiana 的理由为:①《魏书·西域列传》的粟特国传是夹在 Sogdiana 近旁诸国传中间记载的;②在北魏时代,粟特商人到中国来经商的事迹很多,与其将此粟特视作阿兰的速黑答黑,不如说应当视作以商业国著名的 Sogdiana。但这不一定是决定的论据。为什么呢?第一,《魏书》粟特国传不一定是夹在 Sogdiana 近旁诸国传中间的。例如在粟特前后所记的忸密国(以该国为布哈拉的说法不一定是确定不移的。从其与魏都的距离考虑,它必须在距离悉万斤即撒马尔罕西方约一万里之地)、洛那国、波斯国就难说是 Sogdiana 地区之国。第二,当时西域的商业民有以匈人势力为背景的阿兰族,夏德在《金斯米尔与匈奴》一文的注中根据斯特拉颇的记载及班布里的研究说到这事。又,前引 F. 特加特书在述及 Abzoae、阿兰同盟时也谈到过这事。此外,江上氏只把"古之奄蔡……至王忽倪已三世矣"部分作为匈奴匈人同族论的史料而赞成夏德说,那么一来,忽倪与北魏高宗的关系不明,这就成了时代非常不明的史料,那又该如何处理呢?稍稍留下个难理解之点。

本文初次发表后,发表了把《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看作记述㘓哒占据 Sogdiana 之事的考证论文(前引榎一雄论文,豪西希:《提奥菲拉克特·埃克斯库尔斯》(《拜占庭学》,1953 年),前引阿勒泰姆书。但这些已被本文上述对《魏书·粟特国传》的八条反证、七条旁证所解决,尤其是魏收本来不认为㘓哒为匈奴系,并且对㘓哒征服中亚之事全都明确记载㘓哒之名,因此我认为《魏书·粟特国传》上的匈奴还是匈奴,不能认为是㘓哒。

是后汉杜笃《论都赋》(《后汉书·杜笃传》)中歌颂汉武帝征服匈奴的“燔康居、获昆弥、虏傲侲”之语,傲侲,李贤注作:“诸家并曰傲侲为粟陵,西域国名也,传读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肃特国恐是也。”可推定“虏傲侲”为歌颂汉朝讨灭郅支单于时将他统治下的阖苏(即奄蔡,即肃特,也即《魏书》之粟特)当做俘虏之事(此肃特国,《通鉴汉纪注》注作“杜佑曰:奄蔡后为肃特国”)。从汉武帝并未征讨 Sagdiana 之事可见此傲侲即粟陵系指肃特 = 奄蔡,即《魏书》所说的克里木半岛的粟特,也就是与速黑答黑有关的种族 Sadagarii,这大概没有疑问了。

上述 8 个反证证明了《魏书》的粟特国并非 Sogdiana,汉代的傲侲即奄蔡的后身,其位置在克里木半岛上。

而作为《魏书·粟特国传》的记事并非对中亚 Sogdiana 的误记的理由如下:

(1)《魏书·西域传》魏收的原著面貌大致被残留下来,其记述有可信赖的性质。[1]

(2)检读《魏书》本纪、《宋书》、《周书》等可知粟特国先后到魏朝来朝贡九次,其使者到中国来朝觐,直到北周时还有来朝贡者,尤其是从该国许多商人(阿兰人为作为贸易商人活跃的民族,他们有许多人

---

[1]船木胜马:《魏书西域传考》(载《东洋史学》第 2 卷第 5 号)。但是这篇论文认为现行本《魏书·西域传》中与《周书》、《隋书》文字相同部分全都是后人从《周书》、《隋书》中转录增补人今本《魏书》,断定并非魏收《魏书》原文的看法,还有探考余地。例如,《北史》及现行本《魏书》西域传中的“在葱岭北,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这一段与《周书》文字相同,他干脆认为全部都不是魏收的原文,但由于他说的“《周书·西域传》并非全然袭用魏收原著《魏书》的记事”并无确证,这就不能断定。诚然,“在葱岭西……在康居西北”这一段中,“在葱岭之西”如船木胜马所注意到的显示了《周书》所特有的记述法,《北史》编者从魏收《魏书》、《周书》等摘出句段编纂《北史》时,可认为这一段是从《周书》采用的,但不能断定当时魏收原著中不存在大致相同意义的字句。尤其是如“一名温那沙”以下部分不能认作不是《魏书》旧文的证据。《北史》编者编写成《北史》粟特传时从其前后文章的体裁看来,可认为他首先采用《魏书》之文,其次才从《周书》采用。又,《通志》记载说:奄蔡后魏时称为粟特国,“国人云其国见居葱岭之西,故奄蔡地也,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引号内文字可考虑似为魏收《魏书》原文而似非根据引用《魏书》的某种书上采用来的。总之,现行本《魏书·粟特国传》最初一节与《周书》文字相同。同时,想来似可认为《周书》的这段文字与魏收原书之文大致上为性质相同的东西。

又,关于现行本《魏书·西域传》与魏收原著的关系,可参阅在本文初次刊载后发表的《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载《东洋史研究》第 29 卷 1 号,30 卷 1、2 号,31 卷 3 号)。

来中国经商并非不可思议的事)[1]被北魏俘虏、居住下来的事看来,当时中国人不会对粟特国的知识有那样的错误。

据《洛阳伽蓝记》所记,在北魏的京都洛阳除粟特人外还有许多西域人居住着,《通鉴》卷147也记载说:"魏主专尚释氏……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由此可推知,当时中国人似不会对粟特国发生大的误解。

(3)《魏书·西域传》在粟特国之外另外立有悉万斤(撒马尔罕)国传记述 Sogdiana。

悉万斤在延兴、大和、正始、景明、永平、皇兴年间极为频繁地来北魏朝觐,应当认为北魏人对该国的知识是有很高正确程度的(余按:依时间先后,上述年号应依次为皇兴、延兴、大和、正始、景明、正始、永平)。

(4)《魏书》本纪太和三年西域诸国人贡条所记"吐谷浑……粟特、州逸……悉万斤等国各遣使朝贡"中也将粟特与悉万斤分别记载。

(5)如果粟特为撒马尔罕地区的 Sogd,那么当太和三年以后邻近 Sogd 的其他各国继续向中国人贡时,怎么会只有粟特国中断了朝贡呢?(似也可假设 Sogd 国的中心于太和三年左右从别处迁都到了悉万斤国,那样一来作为小名称的悉万斤便取消了,而作为大名称的粟特就被用起来了。并且还可认为北周保定四年粟特之名再次出现后,因其地极远就永远断绝了朝贡。)

(6)如果粟特就是 Sogdiana,那就应当记作粟特被哌哒袭夺(因为 Sogdiana 曾被哌哒占领),而不应该记作匈奴侵入。(当时中国人对哌哒有相当的知识和交涉,不会把哌哒与匈奴搞错,尤其是中国人对粟特知道其国王之名,并有接受赎取该族商人的恳请的那种程度的关系,因此发生那样的误记是不可想象的。)

(7)《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十三州志》记载说:"奄蔡、粟特各有君长",这并不表明粟特在撒马尔罕地区,而却可理解为表明粟特与奄蔡即顿河地区的阿兰族邻接,住在克里木半岛地区,阿兰、速黑答黑当

---

[1]《魏书·粟特国传》记载了大部分匈奴征服阿兰之事。

时分别推戴各自的君长。

以上共列举了7条理由。

根据前引《魏书》、《周书》、《通志》、《论都赋》上的八项记事以及这七条反证旁证，就清楚地知道《魏书》、《周书》的粟特并非 Sogd(Sogdiana 地区)，而是克里木半岛速黑答黑，《魏书》、《周书》粟特传的记载没有错误，而是正确的。因此我赞成夏德以《魏书·粟特传》为主要资料，将粟特比定为速黑答黑、匈奴忽倪王比定为赫尔纳克，进而将《魏书·粟特国传》中匈奴征服奄蔡的记事认作记述匈人征服阿兰之事，最后得出北匈奴即匈人的结论考证。

17.6 结论

以上，本文搞清了迄今还有点暧昧不清的北匈奴西迁经过、从蒙古地区撤退后北匈奴在东突厥斯坦的活跃情况，以及他们进入欧洲前夕的情况，并且还论证了夏德教授所考订的《魏书》、《周书》上所见之粟特为克里木半岛之速黑答黑的说法不存在什么障碍不通之点。本文对夏德教授论证的伏尔加河匈人与北匈奴为同族说，附以比以往更明确、适当的判断情况的说明资料，并相信《魏书》、《周书》粟特国传的记载并无错误的说法，相信夏德论文的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同族说的论证根据可认为是正确的。

附记：在第二节北匈奴年表中，附加了几条与北匈奴无直接关系的事，这无非是由于也可将它利用作后汉西域经营史略年表的考虑。

（本文最初作《匈奴西迁表》，载《东洋史研究》第2卷第2号，1936年。译自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版，第115～141页。）

18 匈奴与东胡

〔前苏联〕姆·伊·里日斯基

公元前1000年代末，在蒙古草原上和外贝加尔湖地区，方形墓突然消失了，代替它的是新的遗迹——匈奴人的遗迹。19世纪末，尤·德·塔勒科—格伦采维奇最先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现了这些遗迹，并确定了它们是属于哪个种族的。关于伊勒姆山谷等地的发掘，他写道："埋葬在木椁里的难道不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匈奴国家的那些突厥部落吗？"[1]

与匈奴人同时代的司马迁生动地描述了匈奴人的生活。据司马迁说，匈奴人生活的最大的特点是经营畜牧业，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迁徙……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2]

据文字资料上的记载，匈奴人以干酪和牛奶为饮食，这显然也是所有的晚期游牧民的基本饮食物。关于匈奴人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的记载，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在发现有动物骨头的伊勒姆山谷的20座墓中，19座墓里有家养牛骨，13座墓里有绵羊骨，8座墓里有山羊骨，3座墓里有狗骨，只有两座墓里有稀有的鹿骨。

有一颗牛的颅骨接近于家牛和牦牛交配成的杂种牛的颅骨。诺音乌拉和都连出土的制作品上的一系列牦牛和牦牛头绘像证实了匈

〔1〕尤·德·塔勒科—格伦采维奇：《伊勒姆山谷的史前时期肃慎墓》，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地区分会特罗茨科萨夫—恰克图支会集刊》1898年第1卷第1分册，第7~8页。

〔2〕恩·雅·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39~40页。（这段引文出自《史记·匈奴列传》——译者注。）

奴人除繁育当地品种的普通牛外，还繁育牦牛和各种杂种牛。[1]

马骨在墓里较少见，但马具如嚼环等的残余物则相当多。所有的人都骑马。铁的马嚼环在男、女、幼儿的墓葬中都有发现。马大概不仅被骑用，还被套在大车上用作役畜。牛的用途也相同。

在匈奴人的经济中，狩猎与捕鱼具有辅助意义，这一点也与司马迁的记载是一致的："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2]在匈奴人的墓地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居留地遗址上，发现的野兽骨头有野猪骨、羚羊骨、骞驴骨、野鹿骨、野羊骨、狍骨、兔骨和狐骨。

在匈奴地区有过农业，尽管匈奴人的基本群众是牧畜者。例如，文献资料上说："北方土地上严寒来得早，尽管不宜于种黍，但匈奴人的土地上还是播种了。"同处还引用了一段记载说，有一次由于冬季严寒，牧畜倒毙，人们中间传播着流行病，"田野里的谷物未能成熟"。[3]

考古材料证实了这些记载。早在1928—1929年发掘伊勒姆山谷的墓地遗址时，格·普·索斯诺夫斯基就曾在墓地上找到过黍粒。后来，在发掘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时发现了证实匈奴人有农业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在这里不仅找到了黍粒，而且还找到了一系列农具如铁铧、铁镰刀，此外还有石碾，还有保存谷物的窖。在都连地区偶然发现到的东西中也有与古城遗址中所发现的铧相类似的，还发现有熔铸铧用的陶范。

除有关农业的材料外，外贝加尔湖地区的考古材料还提供了证实匈奴人在利用当地铜铁矿的基础上对铜和青铜进行加工精制的一系列证据。

在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废墟中发现了保存得很好的熔炼铁用的生吹炉、熟铁块残片、炉渣。铧和铧的铸模的经常发现也说明了是当地生产的。在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中发现有青铜熔渣块，证明这里也制造青铜器。因此可以推测到，尼日涅—伊伏勒金斯

[1]格·普·索斯诺夫斯基：《论奇卡河流域匈奴时代的居民点》，载《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简报》，第14册，1947年，第38页。

[2]伸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40页（见《史记·匈奴列传》）。

[3]伸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76页。

克居民点是匈奴人当时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手工业中心。

除铁和青铜的加工精制外,还应当指出也获得广泛发展的陶器业。在匈奴人的居住地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有各种大小和形制的器皿:有高1米多的储藏食物的大缸,煮食物用的釜和陶盆,以及代替大碗用的较矮的陶器。所有这些优质器皿都是陶器业制品,带有光泽,饰以图案花纹。最有特征的图案花纹内容为:波纹线、网格线以及镶上的小把。

椁葬仪式也是至少有一部分匈奴人实行某种程度的定居的间接证明。它表明蒙古地区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熟悉木房的建筑艺术。这些木椁可以提供有关住房的概念。可作为特征的是,甚至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普通墓葬中的椁圆木和钉成棺的木板,都削得很平很光,合缝很严密。在诺音乌拉墓室中,顶部用有基础、有柱头的木柱支持着。

在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和都连地区发现了定居的匈奴人固定的冬季住所的遗迹。这是座半土屋,屋里的地也是土的。滑秸泥的墙或由土坯垒成的墙,外面涂以混有切碎的麦秸的泥土。为了使墙得以加固,沿着墙立有一些木柱。房顶由长方梁木及圆椽木构成,上面覆盖着桦树皮和草根土。

至于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住房的内部结构,值得指出的是为严冬地区所特有的独特的取暖系统,炉灶的烟在墙下部水平地专门敷设的烟道通过,由此被用来取暖,最后通过直立的烟道流出。烟道上面筑有火坑或铺板,从下面被烤热。

大部分匈奴游牧民大概都住在毡帐里。在诺音乌拉墓葬中发现了许多当地生产的破残的毛毯碎块,其中包括一些毡毯。毛毯上饰有斗兽或神奇的动物形象。毛毯是帐庐中的普通装饰物,尤其在贵族的帐庐中更是如此。

考古材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到匈奴人日常生活的若干其他特点。普通匈奴人的衣服用皮子、毛皮制成,也用粗糙的丝织品制成。这种织物在墓葬中发现过。陶质纺轮的发现(例如,在尼日涅—伊伏勒金斯

克古城遗址上)证明了纺织的存在。简陋的毛织物和毡子在当地制成和染色。但是较富有的匈奴人不满足于这些东西,他们穿的衣服是用贵重的外来织物,如各色呢绒、绸缎、布帛等制成的,常常很精致地绣上花。富有的死者的棺,也罩以这种奢华的织物。

匈奴人的衣服包括长袍和裤。冬季穿的暖服用毡子衬里缝制成,或缀以絮、毛皮。长袍束以织物或皮革制成的宽腰带。匈奴富人的腰带上饰以金、银或青铜的牌子和扣子。[1]

匈奴人特别注重战争、武器和军事操练。史籍上记载道:"急则人习战攻……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骑兵是匈奴人的主要军种。其战术与此相应,史籍上描述如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3]"善为诱兵……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4]

匈奴人不仅会以移动快速的体制作战,他们还架桥、建立渡口;用堑壕和土城加固屯驻地,例如,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就是如此。

外贝加尔湖地区和蒙古地区的发掘,发现了史籍上所载匈奴人的上述所有各种武器。战弓是复合组成的,带有骨质或角质的扣环,因此使它具有很大的坚固性和弹力。每张战弓长达 1.5 米,看来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所用的箭,带有骨质或铁质的箭头,青铜的箭头则很少见。铁或青铜的箭头大部分为三棱形并带有铤。[5] 发掘中常常遇到所谓"鸣镝"——固结在箭头,安入部分的骨质瓒孔小球,飞行时能发出使人害怕的啸声。弓装在专门的套内,背在左边,箭装在右背上的箭筒里。

---

[1]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 2 卷,列宁格勒,1926 年,第 88 页;斯·伊·鲁坚科:《匈奴人的文化和诺音乌拉古基》,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 年,第 38 ~ 48 页。

[2]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 40 页(见《史记·匈奴列传》)。

[3]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 40 页。

[4]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 50 页。(见《史记·匈奴列传》)。

[5]格·普·索斯诺夫斯基:《伊勒姆山谷的发掘》,载《苏联考古学》,第 8 卷,1946 年,第 62 ~ 63 页。

父家长氏族关系的特征在匈奴社会里是很强烈的。司马迁的简短记载中指出:"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1]所谓"寡妇内嫁制"的这种风俗习惯,是氏族制度所特有的;其目的在于将子孙和财产保持在氏族内。匈奴人的家族是父家长制的,但是妇女并未处于屈辱的地位。[2]

匈奴社会的内部组织也留有氏族制度的痕迹。据文献资料上记载,匈奴人分为24个氏族。一族之首为"族长",即氏族长老。保留有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之类的氏族制度机构。例如,史籍上记载道,"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3]

有时,长老会议举行特别会议来决定某种重要问题(例如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确定单于死后的嗣位者。

与此同时,氏族制度已经有了裂痕,新的社会关系特征在它的内部成熟起来。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这一分解过程的基础。

交换的扩大是引起古代氏族关系瓦解的原因之一。考古发现物是这个过程的直接证明。考古学家不仅在蒙古地区匈奴单于的陵墓里,而且也在外贝加尔湖地区的许多墓地里,发现过金银首饰、锦缎和丝织物的残余物——所有这一切无疑说明了生活需求的增长以及匈奴社会上层人物奢华习尚的普遍化。大家知道,"匈奴好汉缯絮、食物",[4]其中最喜爱的食物是大米和酒。因此有趣的是,不仅在诺音乌拉陵墓发现过吃米饭用的骨筷,而且在外贝加尔湖地区也发现过。

匈奴人所喜爱的这些东西通过各种途径落到他们那里。史籍上提到的"赐礼"——这是贡赋的隐蔽形式,是汉廷企图收买匈奴单于以取得和平休战时间所给予的贡赋。中国皇帝试图"拉拢"个别匈奴贵族代表人物,例如赐予他们尊号,赐予他们礼服、仪伞、印章,并附以一定的"赐礼"。但首先,这些礼物不是经常有的。其次,这些礼物主要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58页(见《史记·匈奴列传》)。
[2]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87页。
[3]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119页(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4]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57页(见《汉书·匈奴传》)。

是送给单于及其近臣们。

只有通过同邻国进行有组织的贸易才能使匈奴社会的新的需求得到经常满足。正跟中国人一样，匈奴人无疑对这种贸易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一再在边境地区开设特别场所或集市，牧民都来到那里用畜牧业产品或毛皮进行交换，“取走许多中国的产物”。[1] 同时，编年史家也提到，这样就使“匈奴人很满意”。

匈奴人从事战争的主要动机是贪婪财富。“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2]

匈奴人举行侵袭时，便进行抢劫、将俘虏驱掠走，把人们降为奴隶，掠夺财产。战利品中较好的一大部分当然为匈奴人的社会上层分子所获得。因此，交换的发展和掠夺性侵袭加剧了匈奴社会内部的财产分化。

诺音乌拉的材料描绘了匈奴贵族的富有和强大，埋藏在这些墓里的全部东西（其中考古学家只得到极少的一点残余物——奢华的地毯、织物、锦缎和丝绸的残片，金器的碎片）当然只是死者生前所占有的财产的一小部分。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发掘证明：匈奴人的财产分化已深入到居民的各个广大阶层。一些墓里只有少量铁器、骨头和普通的陶器，另一些墓里找到了金饰物、丝绸的残片、中国钱币，带有野兽形象的金片、镀金片和青铜片。

匈奴社会里有奴隶。文献资料上常常提到把战俘和被统治地区的居民充做奴隶，在某些情况下，匈奴人甚至从邻近各部买来奴隶。匈奴人也有债务奴隶，犯了某种罪（例如偷盗）便将罪犯的家庭成员罚做奴隶。奴隶在家庭经济中被用作仆役，还在生产上用作畜群的放牧者、工匠、耕作者。

匈奴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带有充分确定的国家组织印痕的新的政权形式。匈奴社会以最高领袖——单于为首。单于独揽大权，单于政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63页。

[2]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56页（见《汉书·匈奴传》）。

权是独裁和世袭的。通常单于把大位传给长子或弟弟，或传给家族的其他成员。由长老会议确认新的统治者，但单于和统治集团不经这种确认也行。[1] 单于根本不认为自己必须履行长老会议的决议。他常常在听了会议的意见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长老与单于意见不合时，常被诛杀。例如，冒顿"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2]

有一套相当复杂的行政机构听命于单于。文献资料上说，冒顿时匈奴人已有了"国家官号"系统。

单于族成员据有最高的国家职位。除职位外，各按其与单于族的亲疏程度获得大小不等的份地归其统辖。

除单于氏族("挛鞮氏")成员外，还有3个"贵显"氏族，即与单于族建立婚姻关系(单于照例从这3个氏族娶妻)的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占有特权地位。

因此，匈奴强国的最高衔位实质上是少数"贵显家族"的世袭特权。"诸大臣皆世官。"

史籍上有为数不多、但非常珍贵的统治阶层剥削匈奴下层群众的赋税资料。

冒顿的嗣位者老上单于时，在他的亲信谋士中行说的建议下，举行了征税调查——普查登记人口、牲畜和财产，在此基础上向单于统治下的居民征收赋税。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3]

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新的形势迫切要求使用文字：文字在外交上需要，为行政国库的目的也需要文字，单于的左右近臣必须赶紧"坐下来学习"和掌握文字。史籍上还记载道，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中国宫廷的诏书用象形文字写在同样的犊上。

当然，事情不只在于机智的中行说或其他谋士们的建议。粗具规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84页。
[2]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47页。
[3]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49页。

模的官僚机构和赋税的出现，以及文字的推行，都标志着匈奴人过渡到新的阶段——阶级社会和国家。

长达4个世纪多的匈奴同中国的斗争是匈奴人的国家产生的附加的动因。紧挨着中国的邻居匈奴人，抗拒汉朝中国控制他们的企图，捍卫着自己的独立和草原上的自由生活。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削弱时，匈奴人便转为进攻。

公元前8—前3世纪，中国处于衰落和分裂时期。周朝崩溃后，统一的中国分裂成许多个独立的诸侯国，相互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并且每一个诸侯国力图征服自己的邻国，靠牺牲邻国使自己强大起来。内讧战争不仅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而且也削弱了它的军事潜力。中国的邻居——好战的游牧人利用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草原居民的频繁的侵袭，促使北中国的一些诸侯国的君主着手建造防御工事——土城、墙和堡垒等，借以预防游牧者骑兵的突然袭击。

公元前256(按:应为公元前221年)，过去的一个诸侯国的君主秦王嬴政重新统一了中国，后来他采用了全中国皇帝的尊号——秦始皇。秦始皇多次出兵征讨北方游牧者。他把匈奴人赶出鄂尔多斯，匈奴人以头曼为首退往北方喀尔喀地区。他们所遭到的损失，使他们大为削弱，在某一段时期，匈奴人被迫向自己的邻居——东胡称臣纳贡。同时，秦始皇重新开始建造包括已有线路在内的防御体系。中国的这座长达4000公里的长城，本应保障秦国北方地区的安全，使之免受游牧部落，首先是匈奴人的侵犯。但是它辜负了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劳动和牺牲，辜负了对它所寄托的希望。这是座不可指靠的防御物。此外，秦始皇的成就促使匈奴各部落团结起来，它们合并到一起，发展成为对中国的威胁性的危险。匈奴上层分子向往重新开始有利于他们的对邻邦人民的侵袭，因此对各部落的团结发生兴趣。当时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把匈奴各部落的力量联合起来同邻邦作斗争，同时能支持和加强贵族对普通民族成员的威信的强大的中央政权。

由于这些原因，公元前3世纪末在中央亚细亚草原上形成了第一个国家类型的庞大的匈奴部落联盟。匈奴史上的这个转折与冒顿单

于的名字相联系。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和兄弟——第二个王位觊觎者,踏着自己亲人的尸体夺取了政权。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24个民族承认冒顿为君主。起初有一部分贵族反抗这位篡位者,但冒顿以诛杀、惩罚把反对派镇压了下去。接着当匈奴人在冒顿的统率下对邻邦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匈奴氏族贵族便完全倒向他这方面。"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1]

取得政权后,冒顿按马的毛色:黑、白、枣骝、铁青,将匈奴军队分为四个骑兵军团。

在冒顿在位的初期,对邻族人民举行了多次远征。公元前206年,在东方击溃了不久前匈奴人曾向之纳贡的东胡人。匈奴人占取了东胡的土地、牲畜、财产。战败的东胡残部逃往满洲、蒙古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南部。

在西方,冒顿出兵征讨了月氏部。在南方,匈奴人使中国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中国在这个时期秦朝覆灭了(公元前207年)。经过5年激烈的内战,汉王朝建立了起来。被削弱的中国没有立即聚集起力量来,不能强硬地对抗敌人。公元前204年,匈奴人重新占领了鄂尔多斯。公元前198年,在军事上遭到一系列失败后,中国皇帝高祖被迫与冒顿订立"和亲"条约,将中国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此外每年还必须送去规定数额的贡金。

匈奴单于的势力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致公元前192年当中国皇帝去世后不久,冒顿送去一封信给皇太后高后(按:即吕太后),询请嫁给他。出于自负强大,这封信毫不掩饰地极端无礼,司马迁(按:应为班固)全文引用了这封信连同太后的回答。信中写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2]

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清楚。冒顿公然表示想要取得中华帝国作为

---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50页。

[2]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53页(见《史记·匈奴列传》)。(按:应为《汉书·匈奴传》。)

太后的嫁妆。

据史籍上记载，太后"大怒"，但却以谦逊的调子作了答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髪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1]

送去了珍贵的礼物——御车二乘、马二驷作为回绝来意的赔礼。重新确认了过去签订的匈奴和中国之间的"和亲"条约。

但是后来在冒顿在位时以及他死后嗣主们在位时，匈奴人多次进攻中国。公元前162年，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在位时，仍然按照中国皇帝的倡议，签订了另一次和约，尽管按照和约，承认"汉与匈奴为平等的邻国"，但同时却重新约定了每年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黍、大米、丝绸、锦缎、布帛等。这实质上是隐蔽形式的贡赋。

在匈奴人的这段极盛时期里，整个蒙古地区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南部都处在他们的统治下。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的外贝加尔湖地区最北面的匈奴文化遗迹是前已屡述过的伊伏勒嘎河口附近，色楞格河上的古代壁垒——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城遗址。[2] 古城遗址所占面积超过7.5万平方米。在这个区域内发现了80多所住房的遗迹。发掘后表明，古城遗址围有很坚强的总宽度达26米的防御工事体系。防御工事体系由四重高为1.5～2米的土墙和四道深约1.25米的壕沟组成。因此，掩体的总深度达2.5～3米。它充当抵挡箭、矛以及敌人骑兵突然袭击的防御物。但是不管土墙也罢，壕沟也罢，都不能帮助居民坚守住城堡，不被敌人占领，住在城堡里的人们死掉或惊慌地抛掉自己的财产，包括珍贵的东西逃走。发掘时到处都发现有烧焦的圆木和建筑物上其他木头部分。到处是火灾的痕迹，大火毁掉了匈奴强国极北边陲上的这座匈奴人的壁垒。

---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53页。（见《史记·匈奴列传》）——"弊邑"太后自称。（按：应见《汉书·匈奴传》。）

[2]格·普·索斯诺夫斯基：《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载《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7～8期，1935年，第150～156页；阿·符·达维多夫：《伊伏勒金斯克古城遗址》，载《苏联考古学》第25卷，1950年，第260～299页。

尼日涅—伊伏勒金斯克古城毁灭于公元1世纪。看来这是匈奴强国总崩溃史上的一段插曲。为同周围各民族的斗争所削弱,为内部矛盾所分裂,匈奴联盟于公元1世纪中叶分裂成两部分。南匈奴人不久归附于中国。北匈奴又支持了半个世纪,它遭到中国从南面来的攻击,强大起来的鲜卑部落联盟从东面来的攻击,外贝加尔湖地区各部落从北面来的攻击。公元1世纪80—90年代,基本上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鲜卑人同匈奴人的斗争,以鲜卑人全胜告终。公元93年,匈奴人被击溃。在这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匈奴人于公元1世纪末开始西迁,他们征服了一些部落,驱逐了另一些部落,又将另外一些部落吸收到自己的联盟中。这个运动共延续达3个多世纪之久,直到公元4世纪前叶时匈奴汗国出现于东欧草原上为止。

剩留在蒙古地区的匈奴人,有10万帐落归附于鲜卑部落联盟,与鲜卑人融合在一起,采用了鲜卑人的名号。鲜卑人的祖先与他们的近支部落乌桓人被视为东胡。他们的土地西抵今张家口,北到兴安岭,东面包括辽河流域。

匈奴人的征服使东胡处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必须向匈奴人纳贡。如果贡金没能及时送交来,债权人就将他们的妻子、儿女夺走,充作匈奴人的奴隶。这些压迫激起东胡与匈奴人的冲突,以及很自然地产生摆脱匈奴人的统治的愿望。东胡对匈奴人经常进行斗争,持“分而治之”政策的中国政府支持了这个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这个斗争的展开。很大一部分东胡,想保持自由,便迁往北方。他们占据了鄂嫩、克鲁伦、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邻近地区。这些迁移者是后来形成北方蒙古诸部的基础。

公元最初8个世纪,中国编年史开始把东胡称作“乌桓”和“鲜卑”。[1] 这两个名称的含义是“住在鲜卑山和乌桓山的部落”。乌桓人和一部分从北面靠近他们的鲜卑人构成南部集团,他们同匈奴人作战后占据了靠近兴安岭南支的辽河上游地区,在东面则分布在松花江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142~143、149页。

上游地区。[1] 乌桓人同匈奴人和汉帝国进行斗争；公元3世纪初，他们被击溃，并作为一个独立的种族集团被消灭。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中国史家把北方的部落称作"鲜卑"。这些部落的基本经济是游牧畜牧业。他们整年用牧草豢养牲口，将牲口从一处牧场赶到另一处。他们的畜群（马、牛、羊）提供他们以基本生活资料。他们以乳类和肉为食，用羊毛、兽皮做成衣服。用羊毛擀制各种厚度的毡子，搓绳子。他们的住房是帐庐。帐庐的门朝东开。帐庐里的炉灶上放着煮食物用的金属锅，周围用毡子遮起来，侧壁旁叠放着用毡子和羊皮做成的被褥和衣服。靠近门的地方放着马具、简单的家庭手工业品、储存冬季食物的皮口袋、制马奶酒用的木桶。他们"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根据俾丘林所译史料的注："从长老到最微末的部属各自放牧自己的牲畜，关心自己的财产，谁也不伺候谁"，可见牲畜是各个家庭的所有物。大概人们以氏族公社共同游牧。编年史家指出，乌桓人按"邑落"居住，每个公社包括100个到1000个帐庐，邑落各有小帅，即长老。

公社成员的财产和法律地位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时是平等的。长老是推举产生的，编年史家言简意赅地记载道"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尽管男子占据公社和部落长老的地位，但不能由此断言：乌桓和鲜卑公社在公元初是父家长制的。一方面，史籍上记载说："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另一方面，又说："其姓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2]

存在有另一些母系民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姑娘在选择未婚夫时享有自由："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3]女婿在规定的时间里在新娘家里服役后，新娘的亲人便分给他一份嫁妆。除军事外，妇女在部落生活的一切事

---

[1]勒·勒·维克托罗娃：《论远东地区蒙古各部落的分布问题》，载《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1958年，第259期，第45～46页。

[2]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142页（见《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3]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143页。

情上享有很大的权威:“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1]

政治机构更不复杂:每个邑落(即氏族公社)各有长老,长老的权力遍及到整个公社。若干氏族公社联合成一个部落,部落的权力属于推举出来的长老。长老从年长但尚未衰老、完全成熟和强壮的氏族成员中推选出来。这一点从史籍上直接表明的情况可知:“贵少而贱老。”“常推荐和征集勇健者。”长老有权处罚犯罪者,处理由于抢夺别人财产、违犯一般法律而引起的争讼。长老的权力建立在社会信任的基础上,长老的命令不能不服从。

公元2世纪后半期,所有鲜卑各部落某个时期在檀石槐的统治下联合了起来,其领地西面几乎达到乌拉尔山,东面到乌苏里江。北面到萨彦岭和黑龙江上游,南面与中国接壤。征服了过去匈奴人的地面后,自然使这些部落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地位得以巩固,也使那些在异乡住不惯的人有可能迁徙到氏族故地。鲜卑部落之一——拓跋部——向南方推进,后来征服了北中国,建立了拓跋魏王朝。

檀石槐死后,昙花一现的鲜卑联盟瓦解了。公元7—8世纪时,蒙古诸部以“契丹”的名称重新登上历史舞台,但那时已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译自阿·普·奥克拉德尼科夫等编《西伯利亚史》第1卷第五章,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42~252页。)

[1]俾丘林:《中亚古代各族资料汇编》,第一编,第143页。

19　柔然阿哇尔同族论考

〔日〕内田吟风

19.1

西历5世纪初，勃兴于蒙古地区，向西扩展势力到中亚，向南使北魏受到压力的游牧民族柔然（蠕蠕），约长达一个世纪半在蒙古地区繁荣，统治着各民族。但6世纪中叶时，由于曾为柔然奴隶部族的突厥的叛乱，以如此强大的武力夸耀的柔然大可汗国忽然土崩瓦解了。接着，一部分柔然人逃去投降中国（西魏），这些逃去投降者后来全部被西魏斩杀或充当了奴隶。另一方面，残留于蒙古地区的柔然诸部不久后也完全走散消失了。

事情的经过详细记载在《周书》、《北史》、《隋书》等中国正史上，这是众所周知的北亚游牧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1]

再看恰好与此柔然势力瓦解同时的拜占庭的历史。在东方，曾为斯基泰所有各族中最强大的部族以阿哇尔（Abares，Abaroi，Avari，Avares）之名著名的游牧骑马民族，到6世纪中叶时被突厥人击灭，其一部分避难逃入拜占庭帝国领土内的事见于记载。

接着，这些逃亡的阿哇尔人的残部于557年向查士丁尼一世要求住在今匈牙利西部，获准。其后，他们逐渐扩大势力，征服格皮多·朗戈巴尔特，566年击破法兰克王西吉贝特，以多瑙河为中心将东起黑海，西迄易北河，北至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置于其统治下。直到790年

---

〔1〕有关柔然族历史的事件，见内田吟风：《后魏柔然族表》（《东洋史研究》第8、9卷）、《柔然族史序说》，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收入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柔然资料辑录》（1962年）。

至796年之间被丕平和查理大帝征服之前,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和西日耳曼族的最大威胁,这是欧洲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1]

最早把进入欧洲的这个游牧骑马民族阿哇尔族推定为兴起于蒙古地区的柔然族西迁的一支的是德经(Joseph De Guignes)。他的《匈人、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1756年版)并非专门论证柔然阿哇尔同族的论文,其中主要论述了:(1)柔然在被突厥击破之前为北狄的第一强者,这是中国正史明确记载着的,而在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ktus Simocatta)的记载中,阿哇尔在被突厥击破之前为所有斯基泰人即东方游牧民族中的最强者。(2)还有,柔然被突厥击破后,其一部分逃入西魏,而提奥菲拉克特记载说:"阿哇尔被突厥击破后,其一部分逃入Taugas国。"此Taugas根据前后文所记,不能不是指中国,那时除柔然之外不存在逃入中国的强大游牧民族,这是表明柔然即阿哇尔的无可怀疑的明证。(3)此外,还以阿哇尔君主使用柔然可汗社仑所采用的"可汗"之号等事作为旁证,断定柔然即阿哇尔,对柔然、阿哇尔贯串起来叙述了其通史。

提奥菲拉克特记载说:

> 阿哇尔被突厥击破后,其一部分逃往Taugas人的城市,另一部分逃到邻接Taugs的勇敢的Mukri族之下。

这段记载中虽然没有直接举出"中国"之名,但根据提奥菲拉克特的如下前后文的叙述,可明确推定Taugas是指中国:

> Taugas的君主被称为相当于希腊语"神之子"的Taishiyan。其人民崇拜偶像,但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满思虑。
>
> Taugas的领土被一条河分为两部分,过了这条河就是交战中的两大国的边界线。这两大国以所穿服装的颜色区分。一穿黑

---

[1]阿哇尔帝国的领域多次变动,其中心地区常在今匈牙利。作为编年史的考证,有霍渥斯(H. H. Howorth)的《阿哇尔人》,载《亚洲学报》1889年。有关其社会、法制、文化,有阿勒弗尔迪(A. Alföldi)的《关于阿哇尔发掘物的历史鉴定》,E. S. A. 9;科劳茨(A. Kollautz)的《阿哇尔人》,Saeculum第2卷;等等。又,本文最初发表后出版的科劳茨、宫川(H. Miyakawa)的《民族迁徙时代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克拉根富特1970年版,此书对柔然、阿哇尔二者历史的极详细的考察应予重视。

衣,一穿红衣。在我们的时代,黑衣国过河进攻红衣国,灭掉红衣国,把领土统一起来。

以 Taugas 为中国,早就有克拉普罗特[1]加以比定。这一比定如下所述,后来被进一步确实地论证,这就是桑原博士的谨严详细的考证《关于指中国人的 Taugas 或 Tamgaj 名称》。他考定了所谓黑衣、赤衣等事是指长江南北北周、陈的对立,以及隋平定江南(陈)。又,所谓"其君主被称为意为'神之子'的 Taishiyan",当是指汉语"天子",只是如何音译成 Taishiyan 未能作妥当的解释。但我在过去写的《柔然札记》[2]中曾论及 Taishiyan 为"太上"之对音。这就是中国南北朝时威名远驰于塞外民族中的北魏献文帝、北齐武成帝,他们早就将帝位让给皇太子,自称太上皇,而奇特地掌握实权,这就使当时塞外民族对中国的天子有称为太上皇的误解。

Taugas 的称呼,正如沙畹[3]所指出的,8 世纪的突厥人在其自己的碑文《突厥碑文》中将中国人之事刻作 Tabghač,又 13 世纪西域人称中国为桃花石,11 世纪至 14 世纪的阿拉伯人比鲁尼及阿布尔费达(Aboulfeda)等的地理书中使用 Tamghaj、Tomghaj、Toughaj 的语词作为指中国的名称,由此可见 Taugas 指中国是不容怀疑的。

关于其语源,从来有若干不同说法。现在,认为由于鲜卑民族的勃兴后侵入中国,建立北魏帝国,在塞外各民族中威名远扬,Taugas 即从"拓跋"之名而来的看法几乎已成为定说。

拓跋的原音(原名)为古突厥语 Tab-ghač(tab 土地 + ghač 所有者、主),《魏书·序纪》关于北魏王朝拓跋氏之名的由来曾说:"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把 Tab-ghač 写作托跋(Taqbač),被认为是辅音易位。[4]

总之,提奥菲拉克特所说:"阿哇尔被突厥击破后逃到 Taugas"与

---

[1]克拉普罗特:《亚洲论丛》第 3 卷,第 261~264 页。

[2]内田吟风:《柔然札记》,载《N. 鲍培阿尔泰学纪念文集》,德国威斯巴登,1957 年版。

[3]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230 页。

[4]见博德贝尔格:《拓跋魏的语言》,载《哈佛亚洲学报》第 1 卷 2 号;巴津《拓跋语研究》,载《通报》第 39 卷。

“柔然被突厥击破后逃到中国(西魏)之事”相符合,这就表明了柔然即是阿哇尔。

19.2

德经的著作发表以来,柔然阿哇尔同族说此后可视为如同达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

圣马丁在勒博《下层帝国史》(巴黎1826年版)的注释中转述了此说。马迦特在其所著 Eranšā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柏林1901年版)中使同族论进一步确立。马迦特论述了阿哇尔族的君主尊号 Xāgān 相当于柔然君长社仑采用的可汗尊号,并详细论述说:

> 柔然无疑与真正的阿哇尔人为同一民族。由于中国史籍所记载的柔然为突厥木杆可汗所灭之事,与提奥菲拉克特所记载的 Abaroi 战败后逃入 Tabghač(即中国人)及 Mukri(即蔑儿乞惕族)处相一致,这就不留下怀疑的余地。在突厥碑文上记有这 Apar(Aparym)参加突厥的最初的可汗 Bumyn(中国史料所见之土门可汗)的葬仪、其兄弟 Istämi 可汗(拜占庭史料所见之 SIZABOYLOS)的葬仪,其后,这个名称完全从历史上消失。突厥碑文所记这段事也与柔然阿哇尔同族相一致。
>
> 五代胡峤所著残存的《陷虏记》有不可不理解为居住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妪厥律的记事,此妪厥律与柔然可汗的姓郁久闾相符合,这与提奥菲拉克特所记载的阿哇尔的一部分逃往 Mukri 之事相符。此 Mukri 应当相当于蒙古部还是相当于蔑儿乞惕部则不能确定。

阿哇尔诸君长称为 Gaganos, Khaghan 之事散见于拜占庭史料中。当然,这尊号相当于柔然勃兴于蒙古地区时其首长社仑采用以来、柔然君长们所采用的尊号可汗。在社仑之前,尽管鲜卑系诸部落中的酋

长们也有使用可汗或汗的称号的形迹,[1]但在社仑之前,匈奴以来的尊号单于是被广泛喜用的最高尊号。可汗的称号正式用作大君长的尊号应当说实际上是从柔然开始的,Gagan,Khaghan 作为阿哇尔君长的称号被记载下来之事,使“柔然即阿哇尔”得到了充分的旁证。

又,与柔然的可汗姓(郁久闾)同名的妪厥律部族残存于五代之事,似可看做柔然余众逃往中国以外、邻接中国的民族(提奥菲拉克特之所谓 Mukri 族)处残存下来的证据,但是马迦特不顾此 Mukri 存在于6世纪之事,将它比定为遥远后代的蔑儿乞惕(或蒙古部),却是不妥当的。

于是,沙畹认为此 Mukri 相当于柔然散灭时东蒙古强大的勿吉(靺鞨)族(《西突厥史料》,圣彼得堡 1903 年版)。原来,柔然余众逃入西魏者为极少数,此外大多数人当散入当时蒙古地区各民族中间,这从前后事情来理解是无可怀疑的。[2] 中国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他们逃亡到什么民族中间,但是 Mukri 与勿吉名称相似。提奥菲拉克特把 Mukri 记述为邻近 Taugas(中国)的极为勇武的民族,而《北史·勿吉传》说:

> 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

这与当时蒙古地区的勿吉成为对抗突厥的一大势力之事极相符,因此被突厥击破的柔然余众逃亡入勿吉是极其可能的。

沙畹更进一步根据阿哇尔、柔然都有与虫相关的种族名试图进一步加强阿哇尔、柔然同族说,他论述道:

> 提奥凡编年史记载了住在阿哇尔民族中的 Hermichion 国的君王 Askel 563 年向拜占庭遣使之事,过去把这 Hermichion 视为突厥,这是不恰当的。此族据提奥凡·德·拜占切记载在 Tanais 以

[1]内田吟风:《柔然族史序说》、《柔然札记》(《N. 鲍培阿尔泰学纪念文集》,1957 年版)、《关于柔然族的研究》(收载于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2]见内田吟风:《丁令柔然史二考》(载《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妪厥律相当于辽代的乌古之事,早就被考定了(见《满鲜历史地理报告》2)。近年又有 H. 弗朗克的《论辽帝国的语言情况》(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 3 卷,1969 年)论及妪厥律与于骨里·乌古同音。因此乌古为逃往 Mukri(即勿吉)的柔然郁久闾氏的后裔的可能性极大。

东，波斯人在波斯语中把古代马萨革泰的称谓草率地读作 Kermichion，从而把它误解为突厥人。此 Kermichions (Hermichions) 不是真正的阿哇尔人，而是当时冒称阿哇尔的所谓伪阿哇尔，由于真正阿哇尔人(柔然)拥有与虫相关的族名蠕蠕，他们也被波斯人称为 Kerm(虫)之名。[1]

阿哇尔、柔然正如下文所述，除其种族名都与虫有关外，还有若干共同点，这不能看成是偶然的。

根据舍德尔(Schaeder)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的考证可认为，阿哇尔种族名的词根为意为蛇或蛇的蒙古语 abarga(刘茂才《东突厥史汉文史料》，1958 年)。

关于北魏的中国人给以柔然以蠕蠕的别名(不如说是对柔然的另一异字音译)之事，《魏书·蠕蠕传》上说：

> 后[北魏]世祖(太武帝，423—452 年)以其(指柔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可见不只由于柔然为无知的蛮族。这是因为柔然的本来的族名与 abarga(蛇)有关，而非特意加以带有恶意的异字音译[正如《柔然族史序说》所论述的，应当认为：柔然这个名称不是族名，建国后被作为国名。柔然这个名称的原语、语义现在不清楚，从其本身的国书及石碑等记作大茹茹国(茹茹为柔然的异译)的例子看来，柔然、茹茹的原音无疑为带有美好意义的语词。[2] 北魏世祖似乎嫌柔然人使用这种带有美好意义的名称柔然，就用与柔然同音、并且与他们的族名 abarga 蛇或图腾名 qurt(虫、狼)相关的“蠕蠕”两字代替之]。豪西希(H. W. Haussig)的《提奥菲拉克特·埃克斯库尔论斯基泰民族》(载《拜占庭》第 13 卷，1953 年)注意到柔然可汗的姓郁久间氏、其始祖之名木骨间

---

[1]但豪西希的《有关欧洲阿哇尔人的中亚血统的材料》(载《中亚学报》第 2 卷 2 号)根据 Kerm 确实是中期波斯语指虫的一个词，Kermichion 则应释作波斯人指住在阿姆河北面的阿尔泰系各族，认为不能以此作为直接证明柔然、阿哇尔同族的材料。然而至少阿姆河北面的阿尔泰系各族等于阿哇尔，或许上述 Askel 事件并不表示效仿阿哇尔以虫为种族名之事。

[2]关于阿哇尔的可汗、可敦称号，见前引科劳茨论文第 1 节《可汗》。从《魏书·蠕蠕传》所记丑奴可汗将女巫地万“纳为可贺敦”之事可知柔然的王妃称为可敦(可贺敦)。

都有词根同音的久间、骨间，在这里可找到古突厥语、蒙古语意为“蠕动（虫）”、“蛇盘绕卷起”的 qur，purt，并且注意到这 pur 另一方面也是指狼的一个词。柔然的种族图腾与许多阿尔泰系民族一样，也有狼，但是可推知有以狼的隐语虫 pur 表现狼的种族，魏太武帝称他们为蠕蠕，应当注意到能理解为将其图腾兽（狼）所带有的坏的意义（虫）加到了仇敌的名称上。

我们能找出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purt 的例子，例如提奥凡编年史中有个阿尔泰系民族的君王名叫 CHORDAS（GHORDAS），不里阿耳王侯表中有 Kourzt，等等。同样，原不里阿耳王的名字 KROBATOS 也可还原为蒙古语 Qoro-batu（虫的王侯）（前引豪西希论文，第 355、430 页）。

总而言之，东亚的柔然与进入欧洲的阿哇尔的名称中都带有虫、蛇之意，不能认为只不过是偶然一致。正如 O. 弗朗克《中国史》第 3 卷中所说，突厥可汗向东罗马人说到阿哇尔人的言词中，常用意为虫的词语表现他们，如：“在地上扭动的东西”、“逃到地中最深处的东西”、“应当像对待虫一样地给予践踏的东西”等等（米南德·普罗特克托尔《片断》），这也是强有力地表明阿哇尔为柔然裔的证据。

19.3

在阿哇尔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关系史上出现的有关阿哇尔以骑马游牧为基础的种种生活样式、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方面的记述，都表明阿哇尔起源于东亚。科劳茨的《阿哇尔人》（Saecul-um 第 2 卷）以及科劳茨、宫川（H. Miyakawa）的《民族迁徙时代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第 2 卷（1970 年）对阿哇尔有详细记述。又，前引科劳茨、阿勒弗尔迪的论著以及费提希的《建立国家后的匈牙利的金属艺术》等许多著作中详述了阿哇尔青铜器与北亚青铜器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这些论著中从来没给予决定的考察的有关官名、辫发、魔术等事上看来，似可认为接触到了两者的相同处。

风俗习惯的一致尽管不是绝对证明其为同族的证据，但是作为次要的辅助证据是不能忽视的。拜占庭史料中所见阿哇尔的习俗，以有

关提奥菲拉克特称为伪阿哇尔人的事为多,伪阿哇尔的风俗似可与作为阿哇尔的风俗放在一起观察。因为原来这伪阿哇尔族是被邻近各族当作真正阿哇尔族感到害怕的部族。他们也自称阿哇尔,并且据提奥菲拉克特记载构成这伪阿哇尔族的种族为 War(即阿哇尔)和 Qunni(似为浑族)。因此,由于这被称为伪阿哇尔的种族被理解为柔然(阿哇尔)的一部分西迁时与其他种族合并而成的部族联合体,拜占庭史料中所见这伪阿哇尔的风俗习惯与柔然的风俗习惯极为相似之事,也就得以成为柔然阿哇尔同族论提供一个佐证之事。

"被称为阿哇尔的人们尊称他们的首长为可汗","俘获法兰克王西吉贝特的阿哇尔首长伯颜被称为可汗",以上记载表明柔然在蒙古地区勃兴以来用作最高君长尊号的可汗之号也被阿哇尔使用。据《魏书·蠕蠕传》所载女巫地万成为丑奴可汗的可贺敦之事可知可汗之妻称为可贺敦,而根据有关丕平击破阿哇尔的诗中有"Catuna(可敦)mulier"之语,可知阿哇尔可汗之妻也有同样的称号。

统辖 Utigur 族的阿哇尔君长为 Anagaios。这个名字与柔然可汗阿那瓌相同。[1] 击破法兰克,夺占格皮多,向拜占庭帝国请求给予该地区的阿哇尔君王 Baianos 显然就是自古以来蒙古地区居民常用的人名伯颜(又作伯夭、百眼)。米南德所记载的这位阿哇尔君长派往拜占庭的使节团团长名为 Targitios(-ios 为语缀),其原形可认为是 Targyt/Targüt,不能不是原为匈奴元首的尊号、当时已降格的称号"单于"。[2] 可认为这个人是与柔然合并的匈奴(匈人)系统的一个酋长。又,795 年降顺法兰克、皈依基督教的一个阿哇尔首长 Tudun,相当于乌丸、突厥官名蹋顿、吐屯。[3] 796 年,阿哇尔的新可汗 Kaia(Kaiam)随同他的

---

[1]关于阿那瓌,见前引沙畹书第 240 页;关于伯颜,见伯希和:《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载《通报》1915 年)。

[2]见前引豪西希论文及内田吟风:《关于单于的称号及单于庭的位置》(载《东方学》第 11 辑,又收入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这个 Targitios 为柔然(阿哇尔)统辖下的亚速海、顿河地区匈人(匈奴后裔)的酋长,与指一位单于之事相符合。

[3]《三国志·乌丸鲜卑传》所见乌丸大人蹋顿,《隋书》、《唐书》所见突厥官名吐屯,可理解为北狄官名 tudun。前引豪西希书以 tudun 为中国官名"都统",然"都统"为近世之官名,其说似需再加考证。

Terkhan 们一起投降了查理大帝，此处 Terkhan 几乎无可怀疑的是柔然及鲜卑拓跋部（北魏）的高官名称 Tarkhan（塔寒、达官、达干）。[1]

阿哇尔有夏、冬营地，这也与住在东亚时的柔然的"冬则徒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的风俗完全相同。

柔然、阿哇尔都是有辫发的部族，这一点也应当重视。关于柔然有辫发之事，根据《南齐书·芮芮传》所记芮芮"编发"，《梁书》、《南史》记作"辫发"，《魏书》记作"旄头之众"、"漠北辫发之虏"，事情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关于阿哇尔也有"阿哇尔的大使 Kandikh 一行背上垂着长长的辫发"、"蛇般的肮脏的毛发"、"长发的阿哇尔军队"、"其肮脏的辫发"、"称为 Abaroi 的有长长的毛发者们"等记载残留下来。

据记载，阿哇尔使节团谒见东罗马皇帝时屈膝 3 次、以头部叩地 3 次，这不外乎是后世满洲等族的"三跪九叩头之礼"。

又，566 年与西吉贝特所率领的法兰克军队作战的阿哇尔军队，擅长行使魔法，在战线上出现了各种妖怪，于是把法兰克军队完全击溃。这与《南史》卷 79《北狄传》对柔然（蠕蠕）的特性所作的记述极其一致：

> 蠕蠕，其国能以术祭天，而致风雪。前对皎日，后则泥潦横流。故其战败，莫能追及。

根据提奥菲拉克特记有阿哇尔的行咒术者名叫 Böqalabras，可见阿哇尔有萨满教。Böqalabras 之名被认为应当求诸古代阿尔泰语 bögü－qulavuz（巫者之长）。[2] 根据许多事例，尤其是丑奴可汗信奉女巫地万之例，可见柔然有热心的萨满教徒。

阿哇尔人用高 20 英尺、长 20 英尺的二重拒马筑成的土堤围起来

---

〔1〕关于阿哇尔、突厥中间所用的官名 Tarqan，见居拉·莫拉甫奇（Gyula Moravcsi）：《拜占庭突厥学》第 2 卷，第 299～300 页。根据北魏世宗（按：应为恭宗）景穆帝之孙的墓志中所见"侍中、内都大达官"的衔号可知 Tarqan 为 5 世纪鲜卑族的官号。

〔2〕豪西希：《提奥菲拉克特·埃克斯库尔论斯基泰民族》，第 359 页。阿哇尔人称巫为通常的 kam，雅库特·布里亚特人称男巫 bö（G. Nioradze）。

的宿营地被法兰克称为围营,其构造被详细记载下来,[1]这种围营与匈奴国境线上所设置的“瓯脱”(其遗址被发现于贝加尔湖畔[2])有惊人的一致性。这种围营据匈法勒维(Hunfalvy)考察,被设置在各个阿哇尔部族的边界上。这也与瓯脱完全一样。

匈牙利的阿哇尔墓出土的人骨的蒙古族性格的优势[3]以及阿哇尔语言被说成显然是阿尔泰系语言的人类学、语言学[4]上的研究结果也可说果真对阿哇尔柔然同族说的成立有重要的作用。

19.4

由于视为对柔然阿哇尔同族论有决定性意义,还有一两个问题必须予以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柔然被突厥人追逐,其一支直接逃入欧洲,实际上作为阿哇尔活跃于西方、不断扩展的问题。帕克尔(E. H.

---

〔1〕见前引霍渥斯论文,前引科劳茨论文第4节《阿哇尔围营》。豪西希:《有关欧洲阿哇尔人的中亚血统的材料》注意到法兰克人对阿哇尔王和贵族在此围营中集会的记载,将此围营比定为匈奴祭天的地方龙城,关于阿哇尔的风俗文化参照前引科劳茨论文。

〔2〕内田吟风:《关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土木建筑技术》(载《东洋史研究》第11卷2号),《匈奴的建筑物》(收入内田吟风:《匈奴史研究》及《北亚史研究·匈奴篇》)。

〔3〕关于阿哇尔人骨的调查结果有许多报告,以下列举仅以乎头所见为限:巴尔图奇(L. Bartucz):《关于莫宗·森特·雅诺斯发掘物的人类学调查结果,尤塔斯和厄斯屈的发掘物的人类学调查结果》(《斯基泰学》第2卷);《匈牙利种族史概要》(载《种族学》杂志第1卷3号);L. 尼舍尔—法尔肯霍夫:《莫斯的马尔加雷藤的阿哇尔坟墓发掘物》(载《维也纳人类学会通报》第65卷);V. 莱布策尔特尔:《马尔加雷藤的阿哇尔头骨》(载《维也纳人类学会通报》,1935年);R. 楼蒂尔:《在东方的阿哇尔》。

又,A. 科劳茨的《有关阿哇尔时代的历史学、考古学出版物书目》(《克尔恩特内尔博物馆文献》第38卷)中列举了1956年以来的有关主要论文。

〔4〕关于柔然、阿哇尔语,想来还没作出确定的研究。除藤田丰八博士:《关于蠕蠕的国号及可汗号》认为柔然的语言为蒙古语,由于寡闻陋知没听到此外有关柔然语问题的研究论著。关于阿哇尔的语言,伯希和在分类时将它列作蒙古语,I. 内密特、Z. 戈姆博茨(Gombocz)认为是古突厥语。今后有待研究之事尚多。但早就无可怀疑的是,柔然、阿哇尔语大体上为阿尔泰语,可认为在现代语言学上找不出否定柔然、阿哇尔语为阿尔泰语的充足材料。阿哇尔经过亚速海、顿河地区时与匈人合并。匈人使用古突厥语之事近来基本上已成为定说(内田:《匈奴史研究》第207~211页)。本来使用蒙古语的民族柔然(阿哇尔)在西迁过程中由于征服、合并匈人,不难推察出它受到相当的突厥语变化。关于合并了阿哇尔人的匈人,见F. 阿勒泰姆:《匈人史》第一册第4页。又,科劳茨、宫川(H. Miyakawa):《民族迁徙时代的一个游牧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克拉根富特1970年版)详述了阿哇尔在高加索以西合并异民族等的活跃情况。

Parker)在其《韃靼千年史》第2版第121页上说：

> 认为柔然的西境与此同一是有十分合理性的。连在柔然的英主社崙可汗时，柔然的西境也只达到焉耆。他不仅没有去过里海以西，甚至连伊塞克湖以西也没有去过。柔然除与哌哒及伊犁西北的种族的来往关系外，与西方完全没有来往关系。

他认为"不能如沙畹那样，只根据他们的散亡现象，把他们(柔然)与出现在匈牙利的阿哇尔视为同一"。但实际上，柔然的势力绝非以焉耆为终点。434年前后，业已进入今阿富汗的柔然西进部队连续进攻寄多罗王朝统治下的贵霜王国(Kidara Kušan，《魏书》所说的大月氏国寄多罗王)，寄多罗贵霜不得不舍弃其在今巴尔赫的首都。(见马卡尔特内(C. A. Macartney)《关于突厥史的希腊史料》，载《东方学院学报》第11卷2号，1954年。内田吟风《关于柔然入侵寄多罗月氏领土缚喝地方》，载《东洋史研究》第18卷2号，又收入《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阿哇尔实为柔然进入西方的一支(可称为西部柔然)，可认为由于蒙古地区本族的根据地可汗庭被突厥摧毁，并且如下所述他们本身被室点密叶护的突厥西征军追逐的结果，就使他们不得不逃入欧洲。[1]

第二个问题是豪西希在其《有关欧洲阿哇尔人的中亚血统的材料》一文[2]中述及的。他注意到470年前后写成的普里斯克的历史著作上记载说：

> 过去住在高加索以北的撒刺忽儿、乌鲁黑、斡那忽儿及撒必儿等阿尔泰系各族，被Abaroi(即阿哇尔)从其居住的地方逐出，而阿哇尔本身也是被其他民族驱逐出来的。

他还注意到记述550年前后的情况的叙利亚史料札察里教会史上所述

---

[1]关于应当称做第四贵霜王朝的寄多罗王朝的历史事实，见吉尔施曼(R. Girshman)：《匈尼特—哌哒人》，萨莫林(W. Samolin)：《关于寄多罗和寄多罗王朝的一条札记》(《中亚学报》第2卷)，榎一雄：《关于寄多罗王朝的年代》(载《东洋学报》第41卷3号)以及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有关各篇。

[2]前引豪西希论文(《中亚学报》第2卷)为包含有非常多重要论据的好论文。但他如果对柔然早就进入阿富汗的史实及阿哇尔(柔然)逃入中国只是该族一部分人的情况加以重视，可推测他的否定同族论的结论似会有相当大的改变。

阿哇尔到那时前后已成为住在高加索以北的各民族之一。于是,他认为"这是否定柔然阿哇尔同族说成立的证据。因为柔然在555年才开始为突厥所破",提出了这个问题

可是假如考虑到如前所述,434年前后柔然的一部分已经达到南渡阿姆河、侵入阿富汗这种程度的西进状态,那么普里斯克所列举的高加索以北的阿哇尔之名被认作柔然并非不可思议的事。又,普里斯克所说的阿哇尔本身也是被某一民族从其居住的地区驱逐出来的事,可理解为458年、470年时由于北魏大举征讨柔然,柔然一下子脱离蒙古地区而向西迁徙。[1]

总而言之,柔然早在555年很久以前,就已曾进入西方。

19.5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史料所记载的突厥击灭柔然之事,与拜占庭史料上对突厥击灭阿哇尔的记载,能否相一致的问题。

根据中国正史的记载,邓叔子可汗所统率的柔然于555年为突厥木杆可汗所灭。可是拜占庭史料在此之后好几年后,继续二次记载阿哇尔为突厥攻破之事。这也是以往反对柔然阿哇尔同族说者所举出的一个理由。

---

[1]关于大安四年(458年)、皇兴四年(470年)柔然西走,参照内田吟风:《后魏柔然年表》(《东洋史研究》第8卷5、6号)(又见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

有关阿哇尔的最早的西方史料普里斯科斯的报告记载说,在此以前在高加索以北居住着Saragur, Urugh, Onogur及Sabir等族,那时(461—465年)被称为Abar的民族夺取了他们的居住地区,这个Abar族由于本身被其他民族从他们以往的居住地区逐出,便压迫上述各民族。Saragur这个族名可解读为蒙古语sara(月)加阿尔泰语集合名词后缀—gur,即月氏,普里斯科斯的记载显然为上述柔然压迫寄多罗大月氏之事,可认为表明458—470年间北魏征讨柔然时,柔然曾暂时放弃蒙古地区、远遁西方的记载。豪西希的《有关欧洲阿哇尔人的中亚血统的材料》(《中亚学报》第2卷)反驳同族论说,如果西史所见之阿哇尔为柔然后裔,它的名称应当在柔然被突厥所破、逃出蒙古地区的555年以后初见于西史上。虽说如此,但470年写成的普里斯科斯的报告(上引)却已见到了阿哇尔之名,又,述及550年时情况的札察里阿斯·米蒂雷乃奥斯:《基督教会史》也将Abar列为住在高加索以北的各民族之一,这些都是柔然与阿哇尔并非同族的证据。可是这个反驳,只要考虑到如上所述柔然于5世纪进入西方的实际情况,似应理解到它是完全不恰当的。

但是这条资料所述以邓叔子为中心的蒙古地区的一部分柔然被木杆可汗击灭后，可用西突厥叶护（室点密、达头）征讨不肯归顺突厥的中亚的柔然余众的记载来解释。以下想追寻出其经过。

根据米南德的记载，562 年西突厥的 Silzibul 可汗得知阿哇尔人逃走后大怒，宣称完成对哌哒的战事后马上就去征讨阿哇尔，于是向哌哒出征了。同一个米南德还记载说："568 年突厥可汗 Dizabulus 的使者马尼阿黑来到拜占庭通知说：'突厥如今有四个可汗，Dizabulus 对全国人民有最高权威，他让哌哒负担纳贡义务服从他。'查士丁皇帝问道：'脱离突厥统治的阿哇尔人有多少，留在突厥可汗处的阿哇尔人还有吗？'使者回答说：'愿意处在我们统治下的（阿哇尔人）也有，从我们处逃走的（阿哇尔人）估计约二万人。'"

这个 Dizabulus 可汗与前文 562 年预先宣告要击灭哌哒、阿哇尔的 Silzibul 可汗为同一人已成为定说，那么他究竟是中国正史上所记载的哪一位可汗呢。如果完全接受马尼阿黑所说的 Dizabulus 为四可汗中的最高可汗的话，Dizabulus 就成了中国正史所记载的征服柔然、哌哒的最高可汗，即东突厥的木杆可汗。可是检读拜占庭史料所见 Dizabulus 的子孙关系，就立即知道实际上 Dizabulus 是成了《旧唐书》上记作应当说是突厥的西方总督地位的叶护官的室点密（《唐书》又作瑟帝米，与突厥碑文记作 Istämi 之音的人物为同名异人）。这是正如沙畹所已考证过的。[1]

---

〔1〕关于拜占庭史料中的 Silzibul, Dizabul(us)与阿拉伯史料中所见之突厥可汗 Sindjibou 为同一人，其原形为 Sin(Sil) Yabgu，并与中国正史上的西突厥可汗室点密 Istämi 相当的考证，参照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226 页。关于 Sil (Sin) Yabgu 意为"锡尔河叶护"，参照前引豪西希论文第 334 页。他死后，子达头（Tardu）、孙都六（Turxanth）嗣位之事，根据《唐书》所载"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隋书》所载"射匮可汗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是很清楚的。米南德以 Turxanth（即都六）为 Tardu（达头）之异母弟，可认为是误解。兹图示如下：

吐务——土门伊利可汗——科罗乙息记可汗

木杆可汗——他钵可汗——沙钵略可汗——处罗侯可汗——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

室点密——达头——都六——射匮可汗

详见拙稿《西突厥初世史研究》第 1 卷（《研究》33，1964 年）（又收载于《北亚史研究 · 鲜卑柔然突厥篇》）。

因此，马尼阿黑所说 Dizabulus 为四可汗的最高者应当理解为存在有“西方有四个可汗，Dizabulus 为其最高掌权者”的事实（中国正史记有突厥有群小可汗之事）。又，中国正史把攻击㕦哒归功于木杆之事，似应理解为由于木杆作为突厥的最高大可汗，因此把当时突厥的全部功绩都归功于他了。关于这个可汗、室点密（Istämi，与突厥始祖 Istäi 同名异人）可汗，在《旧唐书》上记载说：

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余按：此段史料中所述“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者实为阿史那弥射，乃室点密五世孙）。

可以说是突厥的西域统辖者。考虑到这件事，在 555 年木杆可汗攻灭邓叔子系柔然之后，有米南德所记载的 563—568 年 Dizabulus 征讨阿哇尔之事，就丝毫不是不可思议的事了。因为尽管有 555 年突厥木杆可汗在东方击灭了邓叔子一系的柔然，但在中亚，西部柔然即阿哇尔并未完全臣属于突厥（568 年时仍有两万阿哇尔叛逃者存在的事实是应当注意到的），这就可理解上述米南德所记 563—568 年 Dizabulus 征讨阿哇尔之事。

把 555 年柔然可汗邓叔子等千余家溃灭之事立即断定为柔然灭亡的错误，已在拙稿《丁令柔然史二考》中《柔然的灭亡之年》收入《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详细论述过。直到北周末年还有菴罗辰系的柔然与北齐在蒙古地区交战之事，那么西方柔然的一部分在 555 年以后与西突厥互相攻战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提奥菲拉克特记载说：598 年“突厥可汗致书毛里基奥斯皇帝说：可汗征服 Habdäl（提奥菲拉克特注曰：即㕦哒），然后与 Stembis 可汗同盟，夸耀打败阿哇尔之战绩”。这段记载过去一直认为可疑，它似乎是混淆不清地把 40 年前 Dizabulus 可汗的功业重新加以记载，有人进而把存在这种可疑的记载视为提奥菲拉克特所记载的事可靠性薄弱的

证据。[1] 仿佛如果这样的话，以提奥菲拉克特的记载（以阿哇尔人逃入 Taugas 为中心的记载）为主要根据的柔然阿哇尔同族论就不可靠了。

可是如今详细考察中国史籍所记载的当时突厥的情况，提奥菲拉克特的这段记载就没什么可怀疑了。还是应当重新认识这段记载的正确性。这段记载可认为是说明如下事件的。

598 年致书毛里基奥斯皇帝的突厥可汗为在室点密可汗（死于 576 年）死后，继承父亲担任西域总督的 Tardu 可汗（中国史籍之达头可汗，名玷厥），这一点已经由沙畹考证过。根据米南德的记载，这个 Tardu 可汗，曾被蒂贝里乌斯皇帝的使者拜谒过，他对拜占庭帝国为阿哇尔人提供避难所提出责难，是抛弃其亡父以来（对拜占庭帝国）的友好政策，攻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等地的一位果敢、勇武的可汗。事实上，《隋书》记载达头比大可汗沙钵略拥有更强大的兵力，他还曾出兵中国方面。

《隋书·突厥传》所载开皇三年（583 年）文帝的诏书上记载说：

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悒怛三国一时即叛。

这件事与《周书》本纪及《隋书·天文志》所载"宣政元年（578 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围酒泉，杀掠吏民"之事相当，由此可见，早在 Tardu（达头）可汗嗣位之后二年的 578 年时就已开始侵略中国。接着，开皇二年（582 年）五月，他与沙钵略可汗一起侵入隋的兰州，同年十二月沙钵略可汗重新南下时，达头却急忙西归（见《隋书·长孙晟传》及《资治通鉴》）。

他的西归显然可认为是由于前引隋文帝诏书所说于闻、波斯、悒怛（哌哒）乘他东征不在西域之机起而叛之。据《隋书》本纪记载，达头可汗于开皇四年（584 年）二月与隋朝单独缔结了和约。这表明镇压哌哒、波斯的叛乱有困难，同时也给过去被西突厥室点密所消灭的西部柔然的残余阿哇尔造成了报宿仇的绝好机会。果然，《隋书·突厥传》

---

[1]马卡尔特内伊（C. A. Macartney）：《关于突厥史的希腊文史料》（载《东方学院学报》第 11 卷 2 号），O. 弗朗克：《中国史》第 3 卷。

及《隋书·李徹传》记载了翌年五年(585 年)阿拔国举兵,掠夺突厥大可汗沙钵略的部落,隋朝派出援军一万帮助沙钵略,阿拔军才退走之事。阿拔显然为阿哇尔的音译[1] 3,可见他们已放弃以往的国号柔然(蠕蠕),恢复原来的种族名 Abar(Abarga),(又,关于这阿拔国(Abar)此后的活动情况,中国史上中断了记载,那时西突厥征讨波斯失败(588—589))。

我们可以推测着补充提奥菲拉克特的记载:达头可汗不会长久对悒怛等 3 国及阿拔的叛乱置之不顾。据《隋书》记载,开皇十六年(596 年)他与关系从来不好的东突厥大可汗都蓝施多那[2]和解。这与镇压叛乱的目的是相符的,又,前引他给毛里基奥斯皇帝的书信所说的"与 Stembis 可汗同盟"也与指他与施多那可汗和解之事相符。

于是,他平定了悒怛、阿拔的叛乱后,很快地在 598 年便将击破 Habdäl(悒怛)、Abar(阿拔)之事向东罗马夸耀。不过这里附带说一下,被达头镇压下去的阿哇尔过了几年又举起了叛旗。这是根据《隋书·长孙晟传》的记载获悉的:

> 仁寿三年(603 年),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斜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达头众大溃。

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提奥菲拉克特所记载的 598 年达头可汗给东罗马的信所记并没有什么混乱误记之处。倒可以认为这也是有助于柔然阿哇尔同族论成立的旁证,而绝非有碍于此的史料。

兹将柔然、阿哇尔的事迹列成如下年表:

554 年　柔然菴罗辰可汗与北齐多次交战。

555 年　突厥击破柔然邓叔子的部族。邓叔子系柔然残余千余家逃入西魏,在突厥追索下,被西魏杀死或充当了奴隶。(《北史》蠕蠕、突厥传,《周书》、《隋书》突厥、李弼传)

557 年　阿哇尔(柔然的西部残余)逃入拜占庭帝国领土内,在查

---

[1]古代中国人常将外国音 r 写作 t 音,如:Tardu 作达头、Dharma 作达摩、Tarkhan 作达干。

[2]"那"字,房六切,音伏(《康熙字典》补遗),除普通的 na 音外,可知又有作"伏"音者。"伏"之古音作 biek。

士丁尼一世许可下住在潘诺尼亚。

残存在蒙古地区的柔然(可称为东部柔然)这时可认为逃入勿吉(靺鞨)即提奥菲拉克特所说的 Mukri 族中。

558 年　恺怛向北周入贡。此后入贡中断。(《周书·西域传》)

562 年　突厥可汗 Dizabul(us)(即室点密叶护)得知阿哇尔(即柔然的西部残余)西逃,宣称"击灭恺怛后,当讨伐阿哇尔",遂出征恺怛。(米南德书)

当时室点密灭掉恺怛后,与波斯瓜分了它的国土(塔巴里书、米尔洪德书)。《隋书》有"木杆可汗西破恺怛"的记载,只不过把这件事记成了作为大可汗的木杆的伟业,但实际作战者必须认为是担任叶护的室点密。

568 年　室点密的使者通知查士丁皇帝:突厥已讨灭了恺怛,阿哇尔(柔然西部残余)两万人逃走,其残留者成为突厥的臣属者。(米南德书)

576 年　西突厥室点密死,达头嗣位。可认为达头得知柔然西部残余阿哇尔被准予住在拜占庭帝国领土内。

[拜占庭皇帝]蒂贝里乌斯的使者瓦伦廷出使西突厥,谒见 Turxanth(都六)。[西突厥]指责拜占庭帝国给与阿哇尔居住地。[瓦伦廷]参加室点密葬仪后,谒见西突厥首长达头。

578 年　西突厥达头围攻中国(北周)的酒泉。于阗、波斯、恺怛 3 国乘机一时俱叛。(《周书》本纪宣政元年,《隋书》天文志、突厥传文帝诏)

580 年　据中国文献上说:蒙古地区的柔然散亡于此时前后(北周末)。(《通志·姓氏略》)

582 年　达头与大可汗沙钵略一起侵入中国(隋朝)。达头独自急忙停止出征率军西归(《隋书·突厥传》、《通鉴》等)。可认为是为了镇压恺怛等的叛乱。

584 年　达头与隋朝媾和(《隋书》本纪)。想必是为了专心镇压

悒怛等。

585 年　阿拔国(阿哇尔)的部落攻击突厥。(此阿拔是指西迁至拜占庭领土内的柔然残余,还是指西突厥境内的残留、臣属者,不清楚)。阿拔袭击大可汗沙钵略的部落。隋将李徹以1万精骑救沙钵略,阿拔退走。(《隋书》突厥、李徹传)

595 年　达头可汗与大可汗都蓝颉伽施多那和好(《隋书·突厥传》)。可认为在这时前后,达头即 Tardu 镇压了悒怛、阿拔的叛乱。

598 年　西突厥可汗达头致书毛里基奥斯皇帝,通知说:已征服 Abdäl 即嚈哒(镇压了578年以来悒怛的叛乱)、与 stembis 可汗(施多那都蓝可汗)同盟,并讨平了阿哇尔(585年以来的阿拔的叛乱)。(提奥菲拉克特)

603 年　阿拔(阿哇尔)与仆骨、思结等铁勒诸部一起背叛达头。(《隋书·长孙晟传》)

19.6

以上数节检讨了对于柔然阿哇尔同族论成立的各个重要问题,论证了同族论的能够成立。[1]

此外,不久以前萨莫林发表的《阿哇尔问题札记》(《中亚学报》第3卷1号)论证了同族论的能够成立,尤其是他引用门格斯(K. H. Menges)的《最古老的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词汇中的东方成分》中所发表的阿尔泰语词汇调查结果[2]进行考察,看到在古代俄罗斯口碑中有被阿哇尔族导入的古阿尔泰语成分,遂以此作为同族论的

[1]由于经过一定时期,某一民族的特质性格总会有些变化,在论及不同时代的两个民族为同一族时,从细微处而言会有相当大的差异,绝对的相同当然不会有。"宏观"而言,这同一系民族应当不算是异民族。宏观地看许多情况,应当说柔然与阿哇尔表现为同一族。

[2]44个词中,检出了41个东方语词,其中21个突厥语词,20个非突厥语词。这20个非突厥语词中有10个为阿尔泰语词,10个为阿尔泰语以外的语词。

一个证据。

（本文原作《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发展》，载《史泉》23、24，又作《有关柔然阿哇尔同族论的各个问题》，载《东洋史研究》第20卷1号，1962年。

译自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版，第397～421页。）

20　突厥蒙古诸民族史[1]

〔俄〕瓦·符·巴托尔德

20.1

突厥蒙古游牧民属于占据东亚和西亚的各悠久文明国的北方地区以及东欧草原的民族之列。这些民族以带弓箭的骑士出现，袭击了各文明国。适于牧马和一般而言适于畜牧业地区的东部边界为满洲的兴安岭，西部边界则为匈牙利草原。在这个疆域上，除南下侵袭各文明国外，大部分游牧民族进行了自东向西的迁徙。在中国边境建立了游牧帝国的最早的一个民族—匈奴人，后来定居于匈牙利；希腊人称做斯基泰人的更早的游牧民也到达过匈牙利，斯基泰人的一支雅兹吉人[2]定居于匈牙利；公元10世纪时定居匈牙利的现代匈牙利居民，[3]在其语言中保存了远东文化对其祖先影响的痕迹：在匈牙利语中"写"的概念用一个词根为汉语的词来表示。[4] 关于东西方游牧养马业起

---

〔1〕本文为作者1926—1927学年在喀山师范学院的讲课提纲，1928年出版于塔什干——译者注。

〔2〕［雅兹吉人为公元？世纪时定居到庞诺尼亚的萨尔马特诸部落之一。］（页下注中带方括号的注文均为《巴托尔德文集》编者所加，以下同——译者注）。

〔3〕［马札儿部落迁人庞诺尼亚在公元895年。］

〔4〕［有关匈牙利人古代史的基本文献概述，见D.西诺尔：《欧亚腹地研究绪论》，威斯巴登，1963年。］

源问题与马的起源问题是紧密联系的。[1] 马起源于北方现在已可认为得到了证实,但它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则尚未查明。法尔马科夫斯基的文章[2]里注意到了古斯泰斯花瓶上的马像同仅保留于东方、被称做"普尔热瓦利斯基马"的野马种的相似处。

我们认为中国史学家(其中如最早的中国史学家,公元前99年完成《史记》一书的司马迁)最早记载了东方的游牧国家和游牧民自东向西的运动。司马迁和他以后的史学家记载了公元前3世纪在蒙古地区建立的匈奴国。[3] 公元1世纪末,蒙古地区的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民族处。匈奴人的西迁运动开始得较早,但直到4世纪后半期时他们才出现于东欧。一部分匈奴人后来也仍留在东方;5世纪时东突厥斯坦和中国有一些匈奴诸侯国。[4] 中国人记载了有关匈奴人的风俗习惯和国家制度的若干资料;奇妙的是,这个制度的某些特征重复出现在中亚的现代历史中;在匈奴政治生活中24这个数字具有特殊意义("二十四长"),[5]在中亚历史上的最近的独立游牧公社密尔甫的土库曼公社(在两个主要的特勤部落,即托赫塔米什部和奥塔米什部处各有24个长老)生活中也是如此。[6] 游牧民和定居文化民族间的关系到处都

---

〔1〕[在近东和幼发拉底河草原地带,马的驯养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代到2000年代初。考古学家证实了骑马之出现于东欧草原、伏尔加河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草原是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见季雅科诺夫:《米底史》第122~125页;维特:《帕兹雷克古墓的马》;斯米尔诺夫:《古代的骑马者》;博戈留勃斯基:《家畜的起源和改良》第473~495页;汉哈尔:《马》;朱内尔:《家畜史》第299~337页。但是游牧养马业和游牧畜牧业的产生是在公元前1000年代最初几个世纪,见格里亚兹诺夫:《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早期游牧社会形成和发展史的若干问题》(载《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简报》第24分册,1955年,第19~29页);契尔尼科夫:《关于"早期游牧民"一词》(载《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报告和野外调查简报》第80分册,1960年,第17~21页);K.斯米尔诺夫:《早期萨尔马特人的经济》。]

〔2〕戈里特,第40页。

〔3〕[有关匈奴的汉文资料及其欧洲语译本,见《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409~418页《有关匈奴的汉文史料》。]

〔4〕[关于公元308—460年中国境内的晚期匈奴国,见H.科迪尔:《中国通史》(第1~4卷,巴黎,1920年),第1卷,第340~384页;O.弗朗克:《中国史》(二卷,柏林,1936—1937年)第2卷,第117~250页。]

〔5〕[参阅O.普里察克:《二十四大臣》,载德文《远东》杂志第1卷,1954年,第178~202页。]

〔6〕[关于匈奴、土库曼和中亚其他突厥语民族的24个氏族(部落)分支,参阅托勒斯托夫:《匈奴人的城市》(载《苏联民族学》,1946年第2期,第55~102页)第78~99页。]

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性;任何地方的游牧民都很需要文明民族的货物,主要是织物;与此相反,他们不等文明国的商人到他们的草原上来,便把畜群赶向文明国边境去。在有利的场合,游牧民不通过贸易来购买货物,而使用武力来夺得这些货物;和平贸易关系让位于侵袭和征服性出征。为了防御游牧民以及一切蛮人的侵袭,各文明民族在从满洲起直到大不列颠的地域上修筑了漫长的城墙;中国的长城只是这样的建筑之一,并且还不是最古老的;[1]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就曾建造了阻挡游牧民的木鹿地区的长城。[2] 为免遭游牧民的侵袭,商路也筑墙保护;但同时,随着国家制度在草原上的巩固,商人们发现把货物运到草原上游牧民处去是有利的,商路遂通向了更北面。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初几个世纪时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有相当大的发展。[3]

在汉文史料以及一般而言的外国史料中,与游牧国家的建立有关的事件,仅与个别人物的行动相联系被叙及。只有当我们拥有游牧民有关自身的记述时,如关于7世纪突厥国家的灭亡和复兴的记述,以及特别如关于13世纪蒙古国家产生的记述时,我们才能对像阶层斗争这样的因素在游牧民的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有所认识。只有从13世纪蒙古传说中,我们才了解到游牧民和狩猎民之间的关系,其中在狩猎民看来游牧民的生活简直是不可忍受的奴役,正如游牧民把定居农民的生活看作不可忍受的奴役那样。就是那些蒙古传说指出:游牧民的宗教—萨满教—是狩猎时代的遗产;蒙古狩猎民的萨满当时还被当做最高明的萨满。

迄今未能搞清楚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特点与族源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本身是:历史上最早提到的各个游牧民族属于什么民族、什么语族,

---

〔1〕[关于中国万里长城的战略和政治因素,见伯恩斯坦:《匈奴史略述》(载《苏联东方学》第1卷,1940年,第65~75页)第55~56页;彼列洛莫夫:《秦帝国——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1962年版,第169~171页。]

〔2〕[关于木麓的城墙,见维亚齐金:《古代马尔吉阿纳周围的安提奥哈·索铁剌城墙》(载《南土库曼考古综合调查团汇刊》第1卷,阿什哈巴德1964年版,第26~275页)。]

〔3〕[巴托尔德指的是诺音乌拉的发掘成果,见《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458页。]

其中哪些是突厥人、蒙古人或通古斯人,仍然是有争议的。[1] 企图根据以汉文译写留传下来的个别的词和大部分的名字、衔号来确定一个民族的语言性质,是极有疑问的。伯希和教授在列宁格勒讲课时,提到在汉籍中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较可靠的材料,即中国人编写的几种异民族语言的词典,其中如鲜卑语词典,并且据伯希和说,这部词典清楚地证明了鲜卑人是突厥人。[2] 对于鲜卑人的先驱者和西邻匈奴人,正如6世纪突厥人崛起之前5世纪时在草原占有优势的,中国人称人柔然而欧洲人称作阿哇尔人的那个民族,伯希和倾向于认为是蒙古人。伯希和关于蒙古人早就出现于西方以及突厥人起初住在蒙古人东面的见解,与最近在科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伯希和所根据的材料,迄今没有公布,没有供人们研究;在这些材料公布之前最好不去解决匈奴、鲜卑以及6世纪以前其他游牧民族的族源问题。

供判断过去游牧民族的某些材料,正如其他各种材料一样,提供了语文学事实。当突厥语言的特点还没有搞清楚时,鲍培教授对当时形成的一种语言楚瓦什语的研究在这方面是特别重要的。[3] 当真正的突厥人即6世纪的突厥人来到欧洲之前,楚瓦什的祖先来到了欧洲。在此情况下,匈奴语(与伯希和的见解相反,不是蒙古语)可能是楚瓦什语所源自的语言。匈牙利语中的突厥成分与楚瓦什语的类似是有利于这一见解的。[4]

---

〔1〕[关于这一问题的现状,参阅L.巴赞:《公元四五世纪中国北方的阿尔泰侵略者的语言系族》,载《世界史札记》卷1,1953年第1期,第129～138页;G.克劳森:《突厥、蒙古、通古斯人》,载《大亚细亚》新集第8卷,1960年第1分册,第105～123页。]

〔2〕[L.巴赞在《拓跋语探究》(载《通报》第39卷,1950年,第228～329页)中研究了鲜卑诸部之一的拓跋部的语言的汉文译写。但不能认为所获的结果和鲜卑人操突厥语的结论是完全可靠的。]

〔3〕[鲍培:《楚瓦什语及其与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关系》(载《俄国科学院通报》第18卷,1924年,第289～314页;第19卷,1925年,第1～5期,第23～42页,第9～11期,第405～426页。)]

〔4〕[关于匈牙利语中的突厥借词,见I.戈姆博奇:《匈牙利语的不里阿耳突厥借词》,赫尔辛基,1912年;鲍培:《论匈牙利语中的几个阿尔泰语借词》,载《美国乌拉尔语言学研究》,布卢明通1960年版,第139～149页;李格提:《关于匈牙利语中的"阿尔泰"成分》,《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报》卷11,1961年,第15～42页。]

20.2

6—7世纪的突厥人是在8世纪的所谓鄂尔浑碑铭中用本民族语言把关于自身的资料留给我们的第一个游牧民族，碑铭的语言形式正如我们根据语言学原理所应推测的，据鲍培说，与突厥原始语完全相同。[1] 不能由此得出：突厥语到这时才形成。在鄂尔浑碑铭时代，已经有了几种突厥方言，其一保持了最古老的形式。[2]

碑上的字母跟突厥人后来所用的字母一样是从西方传来的，但非常好地适合于突厥语，尤其是适合于元音和谐律，在这方面比代替它的维吾尔和阿拉伯字母要完善得多。这种字母根据蒙古地区和叶尼塞河上发现的碑铭（按照字母形式，叶尼塞碑铭被认为较古老，字母来源于西方证实了这点）和吐鲁番附近发现的若干原文为我们所知。这种字母大概是突厥人从中亚伊朗人处借用的，但借用的时间和地点仍有争议。[3] 正如希腊人和印度人采用闪语字母一样，这里借用字母也是贸易往来的结果，而不像后来突厥人采用回纥字母（回纥人又得自粟特人）和阿拉伯字母是宗教宣传的结果。叶尼塞河上几乎只保存有没有历史兴味的墓志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述只见于蒙古地区的碑铭上。

科学界应感谢不久前去世的丹麦语言学者汤姆生对碑铭字母的分析，迄今为止对碑铭的翻译的最新尝试也是他做出的。尽管译文有其全部优点，但还不能认为尽善尽美，在有些地方，过去的译文之一拉德洛夫的译文应认为是较成功的。例如，汤姆生把同一个词一会儿读

---

〔1〕[所指的只是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某些形式比较古老，而绝非这些形式的所有体系；参阅：鲍培：《楚瓦什语……》，《俄国科学院通报》1924年，第307～308页；1925年，第408页。把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确定为古突厥语只指出了碑的年代，而并非指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系统的古老性。例如，参阅鲍培：《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维斯巴登1965年版，第56～60页。关于古突厥碑语言在其他突厥语言中的地位，参阅马洛夫：《古突厥文碑》，1951年，莫斯科版，第5～7页；巴斯卡科夫：《突厥语研究绪论》，1962年，莫斯科，第123～131、275～277，311页；巴特马诺夫等：《现代和古代的叶尼塞卡》，伏龙芝，1962年。]

〔2〕同上。

〔3〕[关于卢尼体古突厥文的起源，参阅《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5页。]

作意为“死、灭亡”的olmak，一会儿又读作意为“被分开、分为……”的ulmak，拉德洛夫在所有各处都采用了前一含义，它完全适用于所有各处。[1]

碑铭只用很简短的几个词说到了6世纪时突厥游牧帝国的建立及其命运。在这方面我们依旧必须满足于中国、波斯和希腊史料的记载。从希腊史料上我们获悉，早在6世纪时突厥人就已来到东欧，围攻了刻赤海峡附近的拜占庭博斯波尔城。从阿拉伯文记叙的波斯史料上，我们得知，突厥人从波斯人处夺取了里海东南戈尔甘河地区，他们在那里屈从了波斯人的影响，甚至采用了他们的语言和宗教。

碑铭上所详述的只有经过50年中国的压迫后从7世纪80年代在蒙古地区恢复统治起的东部事件以及东部诸汗远征西部的事。除突厥族外，诸汗把乌古思称作自己的属民（可遇到脱古思乌古思的名称，即“九（姓）乌古思”，“九”为乌古思氏族数）；很可能，这两个名词属于同一个民族。看来，当时西面各族已强大起来。复兴的突厥国的最初两个汗不得不同两个联盟打交道，第一个早在7世纪80年代时，第二个约710年左右。第一次，敌人从南面（中国人）、北面（与新汗敌对的乌古思人）、东面（契丹——如我们所已看到的，为蒙古族源的民族）进攻突厥人；第二次没提到北面和东面的敌人，却提到了两个西面的敌人：突骑施（从汉文记载获知，也出自突厥—乌古思人之中）和黠戛斯（吉尔吉斯）。叶尼塞河上的黠戛斯人，早在公元前201年匈奴时代，汉籍上就提到过，古汉语把黠戛斯转写为坚昆；按照伯希和的见解，它表达的是蒙语单数形Kyirkun（这一见解，当然与同一学者把匈奴人看作蒙古人的见解相联系）。7世纪时用汉文黠戛斯表示吉尔吉斯，在这一写法的影响下，现代叶尼塞突厥人在革命后采用了哈卡斯的名称。关于吉尔吉斯人在古代说何种语言的资料，我们没有；7世纪时，他们按照语言分类无疑是突厥人，但按照体型（棕黄发、红脸、蓝眼）分类却

[1]［参阅《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2页。］

显著不同于其他突厥人。[1] 西面各族意义的加强大概与东西方商队贸易的发展有关。早在波斯萨珊王朝(3—7 世纪)时,这种贸易就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突厥人统治时,从 6 世纪起,中亚伊朗人、粟特人的商业作用增加了,7 世纪和 8 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和突厥斯坦后,贸易往来更为活跃。蒙古地区的突厥人在同第二个联盟作斗争时到达了粟特人之国;可能记述这些事件的某些细节应当属于突厥人与阿拉伯人的斗争。

突厥—乌古思人丝毫没有注意到当时从北方进攻他们的回纥人;"回纥"一词在碑铭上只见到一次,然而仅过几年,740 年后,回纥人就灭掉了突厥—乌古思国,在蒙古地区占了优先地位。较多被提及的为葛逻禄人,就在 8 世纪时西面楚河流域的统治从突骑施人处转到了葛逻禄人手中;阿拉伯人的胜利促成了突骑施国的灭亡。回纥人同黠戛斯人进行了比他们之前突厥——乌古思人对黠戛斯人进行的更残酷的斗争。按照汉文记载,回纥人于 758 年征服了黠戛斯国,此后黠戛斯同中国人的直接来往关系中断了;9 世纪时黠戛斯人利用回纥国的衰弱重新开始斗争,他们不仅恢复了独立,而且在 840 年左右经过 12 年斗争之后排除了回纥人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从回纥汗碑铭(其中一块用鄂尔浑字母突厥文刻写,成于 750 年;另一块用汉文刻写,属于 803—821 年在位之汗的年代)[2]上,我们看到斗争是长期的。在第一座碑上谈到了 750 年的战事,第二座碑谈到当时继续对黠戛斯作战,并灭掉了他们的国家。黠戛斯仿佛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共有 40 万人(中国人确定黠戛斯军队总数为 8 万人)。如果在回纥国灭亡(约 840 年)前斗争继续了 20 年,那么回纥人几乎没有时间来完全征服黠戛斯人。

中国史学家和汉文回纥汗碑铭上都谈到了 762 年回纥人信奉了摩尼教,摩尼教于 3 世纪时产生于波斯,是波斯国教拜火教同基督教,特

---

〔1〕[有关叶尼塞河黠戛斯人记载的分析,参阅《巴托尔德文集》卷 2,第 1 分册,第 474 ~ 510 页。]

〔2〕[色楞格碑铭和哈剌巴剌合孙碑铭;参看《巴托尔德文集》卷 5,第 51 页,注 18。]

别是佛教结合而成的。摩尼教在中亚、尤其在粟特人中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粟特人把它传到了中国,回纥人在一次侵袭时在中国认识了摩尼教。在叙及这一事件的汉碑所在地,还保留了一座粟特文碑;不久后突厥语也采用了粟特字母,这种粟特字母后来被称为"回纥"字母,在突厥、蒙古各民族中间获得了广泛的传播。除摩尼教外,基督教和佛教也流行于粟特人中间;这些宗教也流行于突厥人中间,但没有有关任何一个突厥国信奉这些宗教的记载。

突厥—乌古思人和回鹘(回纥)人先后被赶出蒙古地区的结果是突厥成分在东突厥斯坦的加强。中国人称作沙陀的一个部落住在吐鲁番和古城附近;这个突厥沙陀部出自突厥人即乌古思人。8 世纪末和 9 世纪初,他们从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被赶出来,向东远走到中国本土,参加了中国的政治内讧,并于 10 世纪建立了几个王朝。阿拉伯人把这些突厥人称做秃古思人,即脱古思乌古思人。9 世纪时,回鹘人把吐蕃人从东突厥斯坦赶出,建立两个王国,一个在吐鲁番和库车附近地区,另一个在甘州;阿拉伯人把第一个王国继续称为秃古思古思;回鹘(维吾尔)一词不见于 11 世纪以前的阿拉伯史料上。据阿拉伯人说,秃古思古思人是摩尼教徒,摩尼教可能不仅被回鹘人从蒙古地区传到这里,而且在他们到来之前早就存在于这里。

黠戛斯人战胜回鹘后成了蒙古地区和中亚的优胜游牧民族,但他们没有同其他强国进行战争,他们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保持了和平贸易关系;但是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流传于他们中间。10 世纪初,他们被契丹人赶出了蒙古地区,现在看来契丹人是源自蒙古族的民族;据伯希和教授说,汉籍中有契丹语词典。契丹人侵占了中国北方,并占领到 12 世纪为止;中国北方获得了"契丹"的名称,这个名称迄今为蒙古人、俄国人以及一部分伊斯兰教徒所使用;中世纪时西欧人也曾使用这个名称。黠戛斯人回到了叶尼塞河上;胜利者让回纥人从甘州回到蒙古地区来,但他们已习惯于农业和城市生活条件,不想采用这个提议,突厥各族在蒙古地区所占的地方后来为蒙古诸部所占据,在蒙古地区迄今还把统治蒙古地区的最后一个突厥族黠戛斯人保

留在记忆中:一切古墓都被称为黠戛斯墓,甚至连实际上属于黠戛斯先驱者回纥的墓也包括在内。

突厥人接受伊斯兰教文化是他们从蒙古地区被赶走的结果之一;我们主要从伊斯兰教史料上找到有关他们此后命运的记载。

20.3

编写了为古希腊罗马地理学家的著作无法相比的浩繁的地理文献是伊斯兰教徒的一个主要的文化功绩。但是由于其不切实际的性质,这些文献在使用上有困难。各个作家从书本上摘抄前人的话,多半不引征史料、断章取义,所摘抄的话都属于较早的时代。这种情况不仅属于伊斯兰教地理科学衰落的时代(直到 17 世纪时还不加批判地重复 10 世纪作家的话),而且甚至连 9—10 世纪古典时代的地理学家也有这种情况。例如,留给我们有关中亚最详细记载的一位波斯无名氏地理学家(982 年写成所谓《图曼手稿》的作者),把甘州城称做中国中央王朝和吐蕃争执的目标;实际上这是 9 世纪 40 年代回鹘人征服甘州以前的情况。

当时最西面的突厥族为佩契涅格人,他们起初住在伏尔加河以东,后来,如我们从拜占庭史料上获悉的,他们于 9 世纪末迁到了南俄罗斯;10 世纪时的著作家知道他们在那里(尽管有些 11 世纪的著作家仍说他们在过去的故土上)。伏尔加河中下游为不里阿耳人和可萨人所占据;他们说的是突厥人和芬兰人都不懂的同一种语言;很可能是指现在仅保留于楚瓦什人处的那种语言。从伏尔加河向东直到中国边境,从西到东住着乌古思人(其中心在锡尔河下游)、割禄(其中心在楚河上)和秃古思古思(其中心在吐鲁番和古城地区,在今杰蒂苏地区)[1]。除割禄外,某些著作家还提到了分为秃黑昔和阿思两支的突骑施残部,此外,还有伊塞克湖北面的赤吉里部和纳伦河南面的牙黑马人。秃古思古思人的北面住有黠戛斯人,其中心在叶尼塞河上。黠

[1] [谢米列契地区。]

戛斯人被说成有较早的汉籍上所说的同样的人类学特征(11 世纪著作家葛尔迪齐:“红发白肤”)。在图曼手稿上保存了黠戛斯人的统治远及于西南方的记载,大概这是黠戛斯称霸时代的事;该书谈到了黠戛斯人占领位于今乌奇土尔番地方的片楚勒城(这个城名音读并未完全搞清楚);喀什噶尔位于黠戛斯、藏人、汉人和牙黑马人领土的边境地带上。黠戛斯人的西邻为乞马克人;汉籍和鄂尔浑碑铭上都没有提到乞马克人,他们何时从何地来到西面.没有任何记载。乞马克人的西支为佩契涅格人的邻部钦察人,后来他们分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

地理文献上没有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间传播的记载;史学家谈到一个人数众多的突厥民族于 960 年皈依伊斯兰教;这个情况仅见于巴格达编年史上,并且没有记载任何详情,既没有记载这个民族的名称,又没有记载他们的住处。很可能这是建立第一个伊斯兰教突厥王朝——哈剌罕王朝的那些突厥人,哈剌罕王朝统治了喀什噶尔,并于 11 世纪末征服了寻思干(撒马尔罕)和捕喝(布哈拉)。另一个人数较少的突厥民族于 1043 年皈依伊斯兰教;这次还是没有提到这个民族的名称,但却指出了他们的住处:这些突厥人夏天邻近(伏尔加河)不里阿耳地区游牧,冬天则在八剌撒衮(楚河地区的首邑)附近,即杰蒂苏地区西部。

喀什噶尔人马合木论述突厥语的著作属于哈剌罕王朝时代,即 11 世纪后半期,这部著作用阿拉伯文写成于巴格达,但作者按其出身为突厥人,很熟悉中亚,尤其是包括到伊犁河流域为止的中亚南部,很熟悉突厥方言。该书为留传至今的不根据书本、而根据作者对当地的直接了解写成的论述中亚的几乎唯一的阿拉伯文著作。例如,我们从该书上找到了“维吾尔”的名称,而不是“秃古思古思”的名称。

喀什噶尔的马合木从广义上把(据他说)说别种语言但也懂得突厥语的那些民族也算作突厥人。全部突厥人分为南北两群,每群有 10 个部族;据作者说,每群部族自西向东列出。北群为:佩契涅格、钦察、乌古思、叶麦克、巴失忽儿惕、巴思米里、合亦、牙巴忽、鞑靼和黠戛斯;南群为:赤吉里、秃黑昔、牙黑马、亦黑剌乞、察鲁乞、主木里、回鹘(维

吾尔)、唐古惕[1]、契丹、塔卜合赤。南群部族的列举次序无可置疑。鄂尔浑碑铭上所见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古突厥名称“塔卜合赤”,保留下来用于宋朝(从960年起)统治下的南中国。这就是摩秦或“上秦”(中国的波斯名称“秦”的阿拉伯文转写),“中秦”则为契丹国,即北中国,“下秦”为喀什噶尔的哈剌罕王朝领地。唐古惕人源于藏民族,11世纪时从回鹘人处夺取了甘州王国,并建立了在中国史上以“夏国”著称的王国。回鹘照旧统治着吐鲁番和古城附近地区。在这个地区西面就开始了哈剌罕伊斯兰教王朝的领地,东突厥斯坦北部的库车和轮台以及南部的且末都在边境上。再往西为巴尔楚克城居民察鲁乞人地区,即今玛喇尔巴什。秃黑昔、牙黑马和一部分赤吉里人在楚河流域,另一些赤吉里人住在喀什噶尔附近的村落和塔拉斯(敖里耶阿塔)[2]附近的赤吉里小城堡里。这个城堡邻近乌古思人地区,过去经常受到乌古思人的围攻,因此乌古思人有时把除自己以外的从阿姆河起到中国为止的疆域上的全部突厥人称做赤吉里人。

北群部族的列举次序很少符合于实际上的地理位置次序。无论在这里或其他地方都根本没有提到乞马克人,在额尔齐斯河上代替他们列出了较早的史料上作为乞马克人的一个分支提到的叶麦克人;喀什噶尔之马合木称他们为钦察人的分支。巴失忽儿惕人或巴什基尔人始终住在西得多的额尔齐斯河上:伊宾·法德兰10世纪时在到(伏尔加河)不里阿耳地区去的路上行经了他们的地区,因此,巴什基尔人当时大致住在现在所住的地区。“乌古思国”指的是锡尔河上他们过去的故土,无论当时他们已向西南,即前亚进行的征服活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塞尔柱朝帝国)或他们向西通过俄罗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活动都未被考虑到。除赤吉里人外,乌古思人的邻部为这份名单上未列举出,而在他处多次提及的噶逻蛮人。喀什噶尔之马合木不仅把乌古思人称做突厥蛮,而且像其他作家那样,把噶逻蛮人也称作突厥蛮。该书引用了有关“突厥蛮”一词起源的传说,由此可见,当时就已存在有

[1][第一版上漏掉了“唐古惕”一词;参照《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586页。]

[2][今江布尔。]

波斯词法,按照它"突厥蛮"意为"类突厥者",该书还列举了突厥蛮与真正突厥人即较东面的突厥人的区别。喀什噶尔的马合木所说的词大概应按这个意义来理解,因为他研究了乌古思、赤吉里、突厥蛮和突厥方言;此外还要加上牙黑马、黠戛斯,这里所列举的大概都是地域上互相隔离的部族名称。作者对黠戛斯国没有清晰的概念,他没有提到叶尼塞河。与10世纪的地理学家一样,黠戛斯被置于最东面;按照另一个较确切的记载,合亦人住在他们的东面。看来,合亦人属于鞑靼人,从喀什噶尔的马合木的记载中可以推断:郁督军地方属于鞑靼(从鄂尔浑碑铭可知,这是蒙古地区鄂尔浑河附近的山名)。黠戛斯的西面住着牙巴忽人。11世纪时,牙巴忽人与阿儿思兰的斤统率下的伊斯兰教徒发生了战争(喀什噶尔的马合木还没有看到参加这次战争的人数);伊斯兰教徒共4万人,不花不忒剌只统率下的异教徒为7万人,巴思米里人和主木里人为牙巴忽人的同盟者。伊斯兰教徒征讨异教徒时先渡过伊犁河,后又渡过牙马尔大河,把敌人完全打败了。关于牙马尔河别处也谈到过,是作为牙巴忽草原上的一条大河谈到的;看来,指的是一条可以坐船渡过的大河;在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没有这样一条河;可能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用了这个名字。

作者把黠戛斯、钦察、乌古思、秃黑昔、牙黑马、赤吉里、亦黑剌乞、察鲁乞人称为纯突厥人;其余的部族主木里、巴思米里、合亦、牙巴忽和鞑靼人不说突厥语。鄂尔浑碑铭上就已提到了鞑靼;13世纪时蒙古人的民族名称就是如此;很可能,以前把蒙古语族的部族称为鞑靼。如果牙巴忽人的族源也是这样,那当时蒙古诸部落的人们已远远地深入到西面。若干其他部族可能是突厥以前时代东突厥斯坦居民的残余。"巴思米里"一词被收在中世纪希腊[1]语词典中意为"混合来源的人"。鄂尔浑碑铭上已提到了巴思米里人;当时,别失八里城(在今古城附近)是属于他们的,后来,脱古思乌古思人和回鹘人住在那里;十分自然,这些几乎是最早的定居突厥人是由突厥人和以往的定居居民混合产生的。绝妙的是,巴思米里君主已冠有后来同一地区回鹘君主

[1][第一版上误作"拉丁",参照《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76页和第580页。]

的同样尊号(亦都护)。喀什噶尔的马合木甚至还讲到了回鹘人,说他们除讲纯突厥语外,还互相讲另一种语言。当时也跟现在一样,突厥化的定居居民的语言在发音特点上不同于纯突厥人的语言。喀什噶尔突厥化的农村居民当时被称为"坚者克";.这个名称不见于任何其他史料上。可以看到从赛蓝起直到八剌撒衮为止的阿尔忽地区的若干语言特点。这个地区城镇村落的建立者为粟特人(喀什噶尔的马合木和鄂尔浑碑铭都称作速格达克人);这些粟特人当时还没有完全忘掉自己的语言;甚至在八剌撒衮人们不仅说突厥语,而且也说粟特语。

喀什噶尔的马合木数次提到了亦的勒河(伏尔加河),甚至引用了描写亦的勒河的诗句,但他对伏尔加河流域各部族的记载都很贫乏。可萨人完全没有被提到,从其他史料上可知,10 世纪时可萨王国在敌人的攻击下衰落了,到 11 世纪初时便完全灭亡了。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人保持自己的地位直到蒙古人侵为止。喀什噶尔的马合木认为他们是突厥人,其语言与佩契涅格人相近。同不里阿耳人一起还提到了不里阿耳人的分支苏瓦尔人;与"不里阿耳"一词相似,"苏瓦尔"一词既是部族名又同时为城名;众所周知,在不里阿耳城墟五十俄里外迄今保留有苏瓦尔城墟。有一种见解认为,"楚瓦什"一词为"苏瓦尔"一词语言学上有规则的异读。[1] 据喀什噶尔之马合木说,苏瓦尔城又名撒克辛;这一记载十分孤立,根据较晚的史料,撒克辛的位置要靠南得多,一定是在伏尔加河口上。[2]

喀什噶尔之马合木引用了相当多的各种突厥方言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可知,当时已存在有拉德洛夫院士称作西群的以哈萨克人为主要民族的那些突厥民族所特有的语言学特点。讲到了乌古思和钦察

---

〔1〕[参照科瓦列夫斯基:《阿赫默德·伊赛法德兰资料中的楚瓦什人和不里阿耳人》,契博克萨里 1954 年版,第 13~14、20~21、49 页;卡霍夫斯基:《楚瓦什人的起源·种族史的基本阶段》,契博克萨里 1965 年版,第 365~366 页。]

〔2〕[见《巴托尔德文集》卷 5,第 601 页;卷 2,第 1 分册,第 588~589、706 页。关于撒克辛的位置和名称,又见雅库博夫斯基:《关于 9、10 世纪亦的勒和不里阿耳的历史地形学问题》(载《苏联考古学》,1948 年,卷 10,第 255~270 页)第 255~257 页;V. 米诺尔斯基注译、忽都德阿拉木撰:《世界地域志》(公元 982 年撰),伦敦 1937 年,吉布丛书新集 V 第 11 卷,第 453 页(注);M. И. 阿尔塔莫诺夫:《可萨史》,列宁格勒 1962 年版,第 445 页。]

人处词首以 dzh 代替 j，牙黑马、秃黑昔、钦察和牙巴忽人处以 sh 代替 ch。现在构成南群（土库曼和前亚部族）方言特点的那些发音特征被认为是乌古思和钦察人的：M 为 Б 所代替，T 为 Д 所代替。在乌古思、钦察人，尤其是哈剌扎人（过去的另一个突厥民族，不晚于 10 世纪初，渡过阿姆河进入伊朗境内）处，可以看到 k 为 kh 所代表，这是现在阿塞拜疆方言的特点。[1]

在非伊斯兰教徒突厥人中，当时组成了政治整体的看来只有回鹘人。喀什噶尔之马合木列举了回鹘汗的尊号，但并非回鹘汗当时的尊号（在过去式中谈到了回鹘汗）。我们看到，喀什噶尔之马合木还没有谈到当时无疑已发生的看来曾占领了广大疆土的钦察人的运动。他把乌古思人放在锡尔河上，并把速格纳克城（今苏纳克丘冈废墟）称为乌古思人之城，[2]后来 12 世纪时，我们在此看到了钦察人，与钦察人一起被提到还有康里人；在喀什噶尔马合木书上没有把"康里"一词用作民族名称；据他说，"康里"一词"为钦察人的大人物之名（可能是尊号）"。[3] 在西面，众所周知在俄罗斯编年史上称作"波罗维茨人"的钦察人，把佩契涅格人和乌古思人从南俄罗斯完全赶走。据我们所知，在进行这些迁徙时，钦察人不像乌古思人征服前亚建立塞尔柱帝国时和蒙古人建立成吉思汗帝国时那样，他们没有处于强大王朝的统治之下。有过钦察各部的各个汗，但从未有过全体钦察人的汗。

甚至在锡尔河上与花剌子模为邻，钦察人直到 12 世纪末还不是伊斯兰教徒；一般说来在蒙古人侵之前，伊斯兰教还不是多数突厥人的宗教，它很少在哈剌罕王朝和塞尔柱王朝国境以外传播。

在哈剌罕王朝国内，回纥字母只是逐渐地为阿拉伯字母所排挤

---

[1][所引喀什噶尔之马合木书上的原文的译文和分析，参阅伊布拉吉莫夫等：《哈萨克语形成史资料》，载《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报》，历史、考古、民族学类 1959 年，第 2(10)期，第 94～100 页。]

[2][关于速格纳克城的位置及其废墟，见阿格耶娃等：《南哈萨克斯坦村落城镇史略述》（载《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学、民族学汇刊》第 5 卷（考古学），1958 年，第 3～215 页）第 72～73 页。]

[3][关于族名"康里"，参阅克留什托尔内伊：《鄂尔浑碑文中的康居族名、地名》，载《苏联民族学》1951 年第 3 期，第 54～63 页。]

(喀什噶尔之马合木已经丝毫不知道有鄂尔浑字母了)。从喀什噶尔之马合木我们得知,当时的突厥伊斯兰教徒已经有了本民族语言写成的出色的诗篇,但后来这些诗篇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哈剌罕王朝的京城可失哈耳是主要的文学中心,没有一种史料(喀什噶尔之马合木也不例外)讲到这个王朝出自哪一个突厥民族,所有地方都只是把哈剌罕王朝及其人民称作突厥。[1] 塞尔柱王族较多意识到他们同乌古思或突厥蛮人的关系,但文化方面的突厥传统对他们的意义更小,除阿拉伯字母外,在他们国内没有使用别种字母的丝毫痕迹;在其全部国境内,只有12世纪时由塞尔柱朝都督建立了特殊的花剌子模沙突厥王朝的锡尔河地区的花剌子模,产生过突厥语的文学活动。

佛教和基督教是突厥人中间伊斯兰教的竞争者(我们没有足以证明喀什噶尔之马合木时代还有摩尼教的明显证据)。除伊斯兰教文化外,钦察人还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早在14世纪时人们就曾提到南俄罗斯钦察人中间的基督教。看来,在回鹘人中间佛教占优势,但也有基督教徒。12世纪1125年左右,华北的契丹国或突厥伊斯兰教徒所谓的哈剌契丹国被起源于北方的女真人所灭掉,一部分契丹人西奔,1141年他们在寻思干附近打败了塞尔柱朝君主散札儿算端,建立了从回鹘国起直到里海为止的一个帝国。我们没有有关契丹人宗教信仰的确切资料;无论如何他们没有信奉伊斯兰教。看来,这次西进无论在民族学和文化方面并无蒙古因素和中国文化的实际影响;伊兰斯教文化保持了它的优势。契丹最后一位君主的一个大臣是一伊斯兰教商人。突厥斯坦发生的受花剌子模王支持的伊斯兰教徒反对异教徒统治的起义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当时由于成吉思汗获胜而被赶出蒙古地区的另一蒙古族乃蛮人利用了契丹人的失败。乃蛮首领屈出律是个基督教徒,后来走上了信奉偶像教(大概是佛教)的歧途;他在可失哈耳开始排挤伊斯兰教,并且竭力迫使伊斯兰教徒改信佛教或基督教。1218年成吉思汗灭掉了屈出律之国才使这一排挤告终。

一般而言,当时可能在回鹘人参与下,基督教在蒙古地区获得了

---

〔1〕[参看《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100页。]

广泛的传播，除西蒙古人即乃蛮人外，土剌河上的客列亦惕人以及甚至于中国长城边上的南蒙古人即汪古惕人都是基督教徒。无疑地，伊斯兰教徒是蒙古人中间贸易的主要代表和文化的传播者；早在成吉思汗从东蒙古崛起之前，他的营帐里就有伊斯兰教商人，但无论在中国或蒙古地区，当时伊斯兰教贸易和文化的成就都与伊斯兰教宗教宣传的成就无关。

20.4

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诸国统一在一个王朝的政权之下是空前绝后的。对蒙古族本身来说，这些征服是根本不需要的，她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利益。大多数蒙古人返回了蒙古地区，留在被征服国的蒙古人很快就失掉了自己的民族性。无论在成吉思汗远征之前或现在，叶尼塞河上源地区是蒙古成分同突厥人发生冲突的地区。阿富汗境内的少数蒙古人[1]是迄今保持自己语言的成吉思汗蒙古人仅存的后裔；卡尔梅克或卫拉特人的运动发生得要晚得多，与蒙古帝国没有任何关系。

蒙古人的征服对突厥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比对蒙古人的命运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蒙古人在蒙古地区以西建立的一些国家的语言逐渐变成了突厥语。除去各个小王国外，在中亚、南俄罗斯和波斯有三大强国处于成吉思汗王朝统治下；在蒙古时代到处可以看到突厥成分的加强；由于王朝及其周围的军队起源于蒙古的结果，形成了带有蒙古名称的突厥氏族、部落和整个民族。“蒙古”或“莫戈儿”（在中亚始终把“蒙古”一词念作“莫戈儿”，迄今阿富汗蒙古人还自称为莫戈儿人）的名称在中亚保持得最久，在中亚，几经波折，国家的优胜地位仍

[1][关于阿富汗的蒙古（莫戈儿）诸部落及其语言，参阅李格提：《论阿富汗的蒙古、突厥语言和方言》，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卷4，1955年，第93～117页；彼特鲁舍夫斯基：《13—14世纪伊朗的农业与土地关系》，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年版；马松、罗莫金：《阿富汗史》第1、2卷，莫斯科1964—1965年版；H. F舒曼：《阿富汗的蒙古人》，1962年版；K. 费尔迪南：《哈札剌文化初释（1953—1955年赴阿富汗的丹麦科学代表团的科学访问）》，1959年哥本哈根版。]

归于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的后裔。察合台国分为东西两部分,察合台之名留给了突厥成分占优势的西半部,中亚形成的突厥文学语言开始称为察合台语,尽管当时14世纪时和此后,国家政权已经不属于察合台后裔所有。"莫戈儿"之名则留给了东半部游牧居民,该地区称为莫戈儿斯坦,尽管实际上的或虚构的察合台后裔诸汗仍留在那里。当这个地区已经没有蒙古语的丝毫痕迹时,莫戈儿或莫戈儿斯坦的名称仍继续使用,直到17世纪末蒙古王朝灭亡后这两个名称才消逝。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统治下的南俄罗斯或金帐汗国,蒙古人的突厥化发生得较早:形成了几个以蒙古汗的名字—月即别(在月即别时代伊斯兰教在蒙古帝国的这一部分完全巩固下来了)和那海命名的突厥民族。"月即别(乌兹别克)"一词作为民族名称到15世纪时不再使用于南俄罗斯,而留下给中心在锡尔河上的中亚的一个地区,尽管这个地区的汗并非出自月即别汗的后裔。在帖木儿时代(1370—1405年)达到极盛的察合台国,在帖木儿后裔时代被月即别人所征服;从突厥斯坦赶出来的帖木儿后裔在印度建立了新的国家,"察合台"一词也搬到了那里。这以后,巴尔喀什湖就被认为是"月即别斯坦"和"莫戈儿斯坦"之间的边界。就在15世纪,起义反抗阿不勒海儿汗而得名的哈萨克人从月即别人(乌兹别克人)中分了出来。当时被称做哈萨克的是从自己的氏族和部落分出来的人,其中也包括争夺王位失败而不放弃自己权利的王族成员,他们率领一帮跟随者随时伺机向自己幸运的竞争者进攻。尽管起源如此,哈萨克人也跟月即别人(乌兹别克人)那样有自己的出自成吉思汗氏族的汗;尽管哈萨克人与乌兹别克人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到16世纪初时,他们之间已出现残酷的敌对关系。

作为民族名称的"那海"一词最初仅见于俄罗斯史料上;在东方史料上那海人称为满吉惕人,这是根据从前在东亚的一个蒙古部族的名字来称呼的。16世纪时,牙亦黑河或乌拉尔河下游地区为那海人或满吉惕人的中心;后来我们在克里木半岛北部,高加索以北和突厥斯坦看到他们。如今,哈萨人和乌兹别克人把那海人称为伏尔加鞑靼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海"一词如此使用的。"鞑靼"之名过去在中国、

在伊斯兰教世界和俄国都同样地用来称呼所有的蒙古人，后被保留于俄国用来表示克里木、伏尔加河附近地区和西伯利亚（托博尔边区）的突厥居民。据我们所知，只有克里木突厥人自称为鞑靼，他们后来比别人更坚决地放弃了这个名称。现在，伏尔加河附近的突厥人几经犹豫之后，正式采用了这个名称。我们不知道，能否搞清楚与其他突厥民族相比的鞑靼民族的语言或民族学的一般特征。

看来，伊朗蒙古人的突厥化发生得最慢；波斯蒙古国是唯一试图建立蒙语翻译文学的国家。除了在东南面阿富汗迄今保存着自己语言的蒙古人外，西北面长期也有蒙古人，据说，如今说列兹金语的达格斯坦开塔克人17世纪时还说蒙古语。[1] 但是这里在蒙古统治时代，突厥成分也加强了。如今只有阿塞拜疆和阿塞拜疆以北到高加索的地区完全成了突厥区；例如，在蒙古以前时代，打耳班没听说有突厥语，阿拉伯居民长期留在那里。突厥人不仅从南面，也从北面接近高加索。除那海人外，突厥化的列兹金人形成了库梅克族。除形成于蒙古以后时期的这些民族外，还有另一些民族如巴勒喀尔人和喀剌察耶维茨人，他们的语言露出了较古老的起源痕迹，并与钦察语相近。作为民族名称的"钦察"一词已完全消逝了，但它保留于许多新的突厥族（其中包括以钦察人为核心的哈萨克人）的名称中。

与突厥族的胜利同时发生的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胜利。14世纪时，在从南俄罗斯起以迄蒙古地区和中国边境的被蒙古人征服的全部疆域上，伊斯兰教已成为国教。后来，南俄的克里木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国以及中亚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汗国的所有国家教育都是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在伏尔加河和牙亦黑河上是如此的巩固，以致后来它能从南北两方面传播到今天的吉尔吉斯草原（或哈萨克草原）。在伊斯兰教传播范围之外的，除语言方面占有特殊地位的楚瓦什和雅库特人外，只有阿尔泰地区和叶尼塞河流域的各族，在那里萨莫耶德人的突厥化过程迄今尚未完全完成。

在有关16世纪初哈萨克、乌兹别克和蒙古人之间战争的记载中，

---

[1]见《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369～375页。

吉尔吉斯人在杰蒂苏[1]地区最早被提到(如果不算《图曼手稿》上关于吉尔吉斯人在北喀什噶尔的行动的记载的话)。被乌兹别克人打败的莫戈儿阿赫默德汗于1503—1504年冬天死于阿克苏;他的一个儿子哈利勒苏丹逃到了吉尔吉斯人处,吉尔吉斯人把他立为自己民族的首领。他只统治了几年,此后吉尔吉斯人先听命于长期(1480—1514年)统治喀什噶尔的都黑剌惕族(都黑剌惕为蒙古族源的民族,后来其残余加入到蒙古人、察合台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之中)的阿布·别克尔,后又屈服于征服喀什噶尔的哈利勒苏丹之弟莫戈儿赛义德汗苏丹,其后又屈服于1524年来到杰蒂苏地区南部的哈萨克塔希尔汗。没来得及归附塔希尔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被莫戈儿人带到了阿特巴什;1526年莫戈儿人离开杰蒂苏地区,带走了10万只吉尔吉斯的羊,因此这次远征得名为"赶羊的远征",正如19世纪时把1866年4月5日的战役称作"夺羊战役",当时罗曼诺夫斯基将军夺得的羊群作了他战胜布哈拉王公军队的证明。1527年春,塔希尔来到阿特巴什,从那里把吉尔吉斯人连同赛义德汗苏丹留下的马群一起带走了。这就为吉尔吉斯人同哈萨克斯人共约30年的政治联合奠定了基础。[2]

当时的史学家都黑剌惕人穆罕默德·海德尔丝毫没有谈到吉尔吉斯人何时从何地来到16世纪初他们所住的地方。据他说,吉尔吉斯人与莫戈儿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莫戈儿人皈依了伊兰斯教,而吉尔吉斯人仍为异教徒。单是这一情况就使人怀疑:吉尔吉斯人能否从《图曼手稿》所记载的时代起一直住在杰蒂苏地区。在死于1416年的穆罕默德汗时代,伊兰斯教在莫戈人中间完全巩固了下来;该汗强迫自己的臣民缠头巾;不服从者就用钉子钉到他的脑袋上。穆罕默德汗也在杰蒂苏地区南部采取行动,他在那里建造了有名的塔什巴特建筑物。很难设想,如果吉尔吉斯人当时已住在这个地区的话,他们竟能躲开皈依伊斯兰教。14世纪末帖木儿远征杰蒂苏地区和他的孙子兀鲁伯1425年远征该地区的详细记载留传了下来;这些记

〔1〕[谢米列契。]

〔2〕[较详细的情况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15~517页。]

载中只字没有提到吉尔吉斯人，由此可见他们来到该地区一定属于较晚的时代。可能一部分吉尔吉斯人从叶尼塞河沿岸迁到杰蒂苏地区南部与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第一次西进有关（卡尔梅克或卡尔马克一词不管其起源如何，被伊斯兰教著作家使用在比卫拉特一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卫拉特人最初住在叶尼塞河上流附近，因此他们是吉尔吉斯人的近邻；15 世纪 20 年代他们开始远征莫戈儿斯坦，15 世纪 70 年代时当他们清洗了莫戈儿斯坦返回本土才中止了这一远征。可能参加这次远征的吉尔吉斯人当时在莫戈儿斯坦南部天山地区住了下来。[1]

与穆罕默德·海德尔所说相反，完全不信伊斯兰教的吉尔吉斯人，在 16 世纪初就已经没有了；把赛义德汗苏丹立为吉尔吉斯族首领的一个吉尔吉斯人名为穆罕默德。与哈萨克人接近一定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巩固；但是描述 1582 年的中亚情况的奥斯曼作家塞伊非却说吉尔吉斯人“既非异教徒，也非伊斯兰教徒”。[2] 甚至连 1635—1636 年冬来到喀拉特金的吉尔吉斯人，据记述这件事的史学家说，也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的酋长后来才皈依了伊斯兰教。众所周知，19 世纪时吉尔吉斯只是名义上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几乎完全不懂伊斯兰教仪式。[3]

莫戈儿人同哈萨克人争夺杰蒂苏地区南部的斗争互有胜负。乌兹别克人常为莫戈儿人的同盟者。1537 或 1538 年，哈萨克人失败得特别惨，37 个苏丹连同塔希尔的兄弟杜古木汗都阵亡了；写作于 1543 或 1544 年的穆罕默德·海德尔，说哈萨克族完全毁灭了。这以后不久

〔1〕[对穆罕默德·海德尔记载的另一种解释以及对莫戈儿同吉尔吉斯人的种族关系的评述，参看尤金：《论莫戈儿斯坦和莫戈里亚莫戈儿人的氏族部落成分及其与哈萨克等邻族的种族关系》（载《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1965 年第 3 期，第 52～65 页）第 57～61 页。]

〔2〕[布哈拉人阿卜达客里木撰：《1740—1818 年中亚史（阿富汗、布哈拉、希瓦、浩罕）》第 1 卷波斯原文，第 2 卷舍费尔法译本，巴黎 1876 年版附录，第 302～303 页；参照《巴托尔德文集》卷 2，第 1 分册，第 517 页。]

〔3〕[伊斯兰教圣徒行传著作中关于吉尔吉斯异教徒及其信仰性质的记载，见沃罗热伊金：《16 世纪伊斯兰教以前的吉尔吉斯人的信仰》，载《苏联和东方各国语言学、历史问题》文集，莫斯科，1961 年，第 182～189 页。]

（没有记载确切的年代），谈到了莫戈儿与“哈萨克与吉尔吉斯人之汗”哈克纳札尔作战时失败，后来同一哈克纳札尔汗与莫戈儿人作战时阵亡，同时我们在不同史料上找到了有关这次战役的完全相反的记载。根据两种史料，哈萨克首领为哈克纳札尔汗，但是一种史料，作战地点为喀什噶尔的阿尔蒂什村，另一种史料却为杰蒂苏地区北部的额米勒河。在第三种史料上，作战地点为伊塞克湖沿岸，哈萨克首领为塔希尔的兄弟布伊达什；还有一种史料，布伊达什死于1559年或1560年入侵突厥斯坦之时。几种史料一致地认为，在以哈克纳札尔汗阵亡告终的战役中，哈萨克人失掉了几面旗，从此他们作战时就再也不用旗帜了。

看来，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没有由于这次失败而长久衰落；据1558年在突厥斯坦的英国人詹金森说，当时哈萨克人重新威胁到塔什干，吉尔吉斯人重新威胁到喀什噶尔。由此可以推断，自从哈克纳札尔汗死后，吉尔吉斯人同哈萨克人的政治联盟中止了；看来，这个联盟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塞伊非把吉尔吉斯人说成是一个住在崎岖难行的山里的单独的民族；在进攻敌人时他们离开深山里的家庭，并且自己防守山隘。吉尔吉斯人没有王（汗），只有被称为卡什卡[1]的伯克；我们后来从卡尔梅克人处见到了同一衔号。无论在詹金森时代或此后，哈萨克人主要同乌兹别克人作战，吉尔吉斯人主要同莫戈儿人作战。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两者都被再次西进、建立了以伊犁河流为中心的中亚史上最后一个游牧强国的卡尔梅克或卫拉特人所击败。卡尔梅克是同时同吉尔吉斯族两个分支（叶尼塞和天山分支）打交道的唯一民族；并无卡尔梅克人本身或来到他们国土上的人们提到吉尔吉斯人分为两支并对这两支进行比较的文献。无论在南西伯利亚或突厥斯坦，卡尔梅克人都同俄国发生了利害冲突；因此我们在俄罗斯史料上找到了有关叶尼塞吉尔吉斯、哈萨克，后来又有关于天山吉尔吉斯的若干资料。

---

〔1〕[布哈拉人阿卜达客里木撰：《中亚史》附录，第302～303页；关于“卡什卡”一词，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17页，注12。]

20.5

在叶尼塞乞儿吉思人(黠戛斯人)失掉了强国地位若干时期后,乞儿吉思人的政治统一也不复存在了;蒙古征服者已经碰不到乞儿吉思汗了。1218年,乞儿吉思人被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彻底征服;术赤的封土西迁后,乞儿吉思地区成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后裔(他们的驻地起初在鄂尔浑河上,后来则在北京)的封土的一部分。当时还有商人和工匠到乞儿吉思地区来;其文化状况高于黠戛斯强国时代;有许多城镇和村落。看来,没有有关十五六世纪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生活的任何记载,[1]到17世纪时由于俄国人在南西伯利亚的行动,吉尔吉斯人才重新被提到。[2] 1604年创建了托木斯克城:1606年时吉尔吉斯人的代表就已来到该城同俄国人谈判。俄国人已看不到叶尼塞河上有任何定居文化;甚至没有农业;只靠狩猎和畜牧业来取得生活资料。有四个吉尔吉斯王国,即:图巴王国(在图巴河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以及沿叶尼塞河左面直到阿巴坎)、叶泽尔王国(沿叶尼塞河左岸从阿巴坎到巴捷涅夫山岭)、阿勒蒂尔王国(从叶泽尔王国向西、向西南),阿勒蒂萨尔王国(从叶泽尔王国向东、向东北)。最早的俄国的记载把其中一个王公说成是整个吉尔吉斯地区的首领,看来,这是阿勒蒂尔王公。图巴王国的生活水平最低;图巴人没有牛羊,只有马和鹿。

除吉尔吉斯人外,俄国人在叶尼塞河上同首领称作阿勒坦汗的西蒙古土默特人打交道,后来又同卡尔梅克人打交道;吉尔吉斯人根据形势一会儿倒向某个民族方面,一会又倒向另一个民族方面。在最初几次同俄国人谈判不成功后,由于俄国督军的贪婪和贪图,吉尔吉斯人屈服于阿勒坦汗;但1616年时阿勒坦汗本身同俄国人建立了联系,他拒绝了吉尔吉斯人提出的求援,甚至在俄国人面前承担了镇压不驯服的吉尔吉斯人的责任。1620年,吉尔吉斯人的使臣带着礼物同阿勒

[1][参看《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09~510页。]

[2][有关17世纪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的文献资料,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20页,注1;又见阿勃迪卡雷科夫:《论17世纪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的分布和成分》。]

坦汗的使臣一起来到托博尔斯克(当时为西伯利亚首邑),又从那里来到了莫斯科。1620年,阿勒坦汗由于战胜卡尔梅克人,他的地位巩固了;他中断了对俄国人的谈判,同意接受吉尔吉斯人为其臣民;吉尔吉斯人得以恢复对俄国境土侵袭。17世纪30年代,在阿勒坦汗与卡尔梅克人之间的斗争中,卡尔梅克人获胜;1634年,阿勒坦汗亲自越过萨彦岭来到叶尼塞河和阿巴坎,在那里加入了俄国籍。一部分吉尔吉斯人归附了卡尔梅克人;17世纪40年代初,有鸿台吉衔号的卡尔梅克首领巴图尔把吉尔吉斯人称做自己的臣民;不久,恢复了元气的阿勒坦汗又向吉尔吉斯人征收贡税,并于1652年出兵征讨他们;这一次吉尔吉斯人向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俄国人求援。17世纪60年代出现了对俄国人最有利的形势;1666年,鸿台吉僧格加入了俄国籍;但不久形势变得有利于卡尔梅克人,他们战胜并俘虏了阿勒坦汗的儿子和继位人罗藏。吉尔吉斯人屈服于卡尔梅克人,先屈服于僧格,后又屈服于他的兄弟和继位人噶尔丹。

17世纪60年代,在吉尔吉斯本民族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了一个坚强的人,即阿勒蒂萨王族中的伊列纳克。据俄国史学家、《哈卡斯人》一书的作者科兹明教授说,伊列纳克“威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钦斯克、库兹涅次克、托木斯克、坎斯克,以及叶尼塞斯克和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达20多年(他死于17世纪80年代中叶或后叶)”。[1]他未能独立行动,他起初被认为是罗藏的臣属,后来则被认为是卡尔梅克的臣属,噶尔丹竭力想造成这样的局面,即:既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丘明的俄国督军不打扰吉尔吉斯人又使吉尔吉斯人不侵袭俄国境土,但没有成功。伊列纳克同俄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他派人去莫斯科并直接接纳俄国使团。吉尔吉斯没有自己的文字,伊列纳克写公文用卡尔梅克文,尽管卡尔梅克人仿照俄国人,有时使用鞑靼文,有时甚至使用波斯文。1696年,俄国人在同卡尔梅克人通信时首次使用卡尔梅克文代替鞑靼文。

---

〔1〕[《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第5卷,1963年第3期(历史),第65~75页。]

据18世纪俄国史学家Г.Ф.米勒尔说:"不管从俄国方面使多大劲,也不能把吉尔吉斯人完全征服。"卡尔梅克人使俄国人摆脱了吉尔吉斯人的麻烦;1703年秋,有消息传到俄国人处说,"两千五百个卡尔梅克人来到吉尔吉斯人境内,把吉尔吉斯人全部赶到了自己方面,如今吉尔吉斯境内一个吉尔吉斯人也没有了"。Г.Ф.米勒尔认为,当时吉尔吉斯人"全都离开了西伯利亚"。有人发表见解说,实际上只是连同王公贵族一起带走的一小部分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都回去了,结果居民的成分并未改变,所消失的只不过是"吉尔吉斯"这个名称而已。但在居民本身有关吉尔吉斯人的传说中,却说成一个强大民族的消逝。当地的一位研究者、已故的С.Д.迈纳葛舍夫在自己的家乡记下的一首诗中说:"在四十处驰名的凹地中,哪一处没有吉尔吉斯人的骨头?在四十棵长在山上的白桦树上,哪一棵与吉尔吉斯人的斧无关?"

关于被卡尔梅克人带走的吉尔吉斯人的命运,没有确切的资料。过去认为,天山吉尔吉斯人是他们的后裔;但现在我们知道,吉尔吉斯人老早就住在天山附近。认为卡尔梅克人把从叶尼塞河上带走的吉尔吉斯人迁居到他们同族人境内,则是毫无根据的。1746年,一部分过去的叶尼塞吉尔吉斯出现于额尔齐斯河俄国乌斯齐卡麦诺戈尔斯克边堡附近。

在天山吉尔吉斯和叶尼塞吉尔吉斯领地之间的地区当时为哈萨克人所占有。因此,同吉尔吉斯人来往比同哈萨克人来往要早一些的卡尔梅克人,过去曾把吉尔吉斯称作布鲁特人,后来又把哈萨克人也称作布鲁克人,并创造了"哈萨克—布鲁克"一词,在俄文中则译作"哈萨克—吉尔吉斯"或"吉尔吉斯—哈萨克"。通常认为这种把吉尔吉斯的名称挪到哈萨克身上的情况是俄国人造成的;Г.Ф.米勒尔说,这种情况最早见于1734年的《圣彼得堡公报》上;其实"吉尔吉斯—哈萨克"一词在1721年9月7日卡尔梅克使臣博罗库尔甘给大臣戈洛甫金伯爵的报告译文中早就有了。俄国人认识哈萨克人比吉尔吉斯人要早得多,因此他们自己首倡地称哈萨克人为吉尔吉斯人的可能性是很

小的。比较近乎情理的是,这是在卡尔梅克人的影响下造成的。

俄国人同哈萨克人的来往是在俄国人征服西伯利亚后立即就开始的。[1] 当时乌兹别克人同哈萨克人继续作战;16世纪时乌兹别克人在突厥斯坦建立了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花剌子模汗国(或乌尔根齐汗国,后来又称希瓦汗国)。乌兹别克人的强大于16世纪后半期布哈拉阿布都拉汗在位时达到了最高峰,阿布都拉汗征服了花剌子模,建立了一个把霍腊散并吞在内的强大国家。[2] 阿布都拉汗数次北征哈萨克人,并远达乌鲁格塔葛(今阿克莫林州乌鲁塔夫斯克城附近的乌鲁陶山);这些次远征伴以可怖的血腥屠杀,1571或1572年[3]的一次远征之后在吉札克[4]峡谷里所刻的岩壁题铭上谈到了这些血腥屠杀。但是哈萨克人的力量并未被摧毁,阿布都拉汗死前,哈萨克汗特维喀勒曾进犯乌兹别克人之国,抵达撒马尔罕。该汗于1594年派遣使臣到莫斯科,请求臣属于沙皇费多尔;在这件事里,特维喀勒被称为"哈萨克和卡尔梅克王",由此可见,一些卡尔梅克氏族曾屈服于他。

阿布都拉汗死(1598年)后不久,突厥斯坦最早的乌兹别克征服者们、阿布勒海尔子孙们王朝的统治就中止了;此后统治布哈拉的王朝(章王朝或阿什塔尔汗王朝)所拥有的力量就小得多,更难于坚持对哈萨克人的斗争。塔什干等锡尔河中游和费尔干纳的城市大部分落在哈萨克汗手中;有时这些哈萨克领地名义上承认为乌兹别克汗的藩属。17世纪初,哈萨克人已被分为大(东)、中、小(西)3个斡耳朵;这3个斡耳朵统一于佳夫卡汗的统治之下,该汗被认为是本民族的立法者,在每个斡耳朵里都有自己的代理人。[5] 1694年,佳夫卡在突厥斯坦城里接见了俄国外交代表团,1698年,他接见了卡尔梅克外交代表

---

[1][阐明哈萨克—俄国最初阶段的俄国档案材料,现已出版;见《16—18世纪哈萨克—俄罗斯关系(公文、材料集)》,阿拉木图,1961年。]

[2][关于阿布都拉汗,参阅《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2分册,第487~488页。]

[3][吉兰乌金。]

[4][年代有误:这次远征是在1582年前半年。]

[5][关于佳夫卡汗及其所订立的法典《佳夫卡法典》,见库尔捷列耶夫:《哈萨克人的一般刑法(从哈萨克斯坦并人俄国起到苏维埃政权成立止)》,阿拉木图,1955年,第87~91页;阿波勒洛娃:《18世纪30年代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阿拉木图,1948年,第115~129页。]

团。1717年，关于3个斡耳朵归附彼得大帝的谈判进行得不成功。1723年，攻占赛蓝、塔什干、突厥斯坦诸城的卡尔梅克人使哈萨克人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这以后，先发生了全体哈萨克人在小斡耳朵汗阿布勒海尔的政权下联合的事，接着阿布勒海尔和全体哈萨克人都加入了俄国籍；但这两件事都没有现实意义。[1]

稍后，1721年，在受到中国康熙皇帝（1662—1722年）威胁的影响下，卡尔梅克人自己向俄国政府请求臣属；但康熙死后，这一危险被认为是消除了；有关臣属的谈判停止了，卡尔梅克人的强大在中亚达到了极盛。[2] 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被从杰蒂苏地区赶走了。最后的莫戈儿君主之一喀什噶尔之阿卜都拉汗（1638—1670年）在其即位之初曾在杰蒂苏地区南部同吉尔吉斯人打过交道；但在他后来出征阿塔巴什和阿克赛的记载中却只提到卡尔梅克人，而不再提到吉尔吉斯人了。1722年被彼得大帝派遣担任使臣到伊犁河卡尔梅克人处去、1723年从那里到了丘普和札尔葛兰的卡皮坦·温科夫斯基说，"布鲁特人"在伊塞克湖附近游牧，"与哈萨克斡耳朵邻接"。但在所谓的列纳特地图（如现今所证实，实际上这是瑞典俘虏列纳特从卡尔梅克人处得到的地图的复制本，列纳特从1716—1733年曾在卡尔梅克人处）上，布鲁特人被置于锡尔河以南的费尔干；[3] 从其他史料上可知，一部分吉尔吉斯人跑到了喀什噶尔。

1756—1758年，卡尔梅克国被中国人灭掉后形势变了。杰蒂苏地区重新被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占据；绝妙的是，吉尔吉斯人只保留了关于从费尔干进入这一地区的回忆；人民完全想不起，这只不过是重返故地，总之想不起较早的迁移，认为费尔干是自己的故乡。杰蒂苏

---

〔1〕[关于阿布勒海尔汗的事业及其同俄国政府进行的谈判见阿波勒洛娃同上书，第129～147页。]

〔2〕[关于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及其18世纪的迁移，参阅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年）》，莫斯科，1964年。]

〔3〕[关于巴托尔德对列纳特地图资料的注释，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I分册，第52页，注3；关于列纳特及其地图的较详情况，见A.马克舍耶夫：《瑞典人列纳特在其1716—1733年在卡尔梅克人处当俘虏时所绘制的准噶尔地图》，《帝俄地理学会集刊》卷11，1888年，第105～145页。]

和另一些地区成了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争执对象,后来两国在显然有利于俄国的条件下互分了整个中亚。这两大强国不可能有竞争者。稍后,1740 年,出身于波斯的最后的大征服者纳迪尔沙在突厥斯坦掌握了最高政权,但他死(1747 年)后,就谈不上恢复波斯的强盛了。看来,纳迪尔沙的数次远征的意义只在于使中亚人、尤其是乌兹别克人熟悉了西方的兵法,从而促进了乌兹别克国家组织的强化。

20.6

17 世纪初,从里海起直到中国边境为止的全部疆土上的国家政权还在相互交战的各突厥民族手中;只是在最西面土库曼尼亚[1]和花剌子模,不得不承认当时强大起来的波斯塞费甫王朝的统治欲望。第一次外来的较大的致命性打击是从东方卡尔梅克人方面来的;喀什噶尔及与其邻近的草原先转归卡尔梅克人统治,后又归中国人统治。从 17 世纪末起,在彼得大帝在位时,俄国开始执行贯彻始终的政策,尽管起初并不特别成功。甚至在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边界上.俄国在 18 世纪时只限于从牙亦黑河口起沿河上溯,由此到托博尔河、伊什木河、额尔齐斯河,并沿额尔齐斯河上溯到乌斯齐卡麦诺戈尔斯克修筑了一条工事线。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时就谈到了进一步改进这条草原上的边防线。让乌兹别克诸汗国加入俄国的试图没有成功,尽管这些汗国当时政治上极端衰弱。与 16 世纪时阿卜都拉汗靠极端残暴的手段建立的强大政权相反,我们从 17 世纪起看到损害了汗政权的乌兹别克氏族贵族政治的加强;各氏族酋长成为独立的、有时世袭的各地区的长官,只在名义上承认布哈拉的汗政权。18 世纪的花剌子模汗政权失掉了一切作用;除少数例外,汗只是个傀儡人物。握有实际权力的非汗氏族的人,为了满足形式上的合法性要求,需要在自己身边有一个虚构的成吉思汗后裔的汗。这种人物有时从草原上请来,通常只短期地占据王位就被打发回去(有时是他们自己跑掉的),并换上别的人。

[1][第一版作"突厥斯坦",显讹。]

乌兹别克的氏族划分并无固定数量。起初不论在布哈拉汗国或希瓦汗国都被认为共有32个氏族;通常认为其中主要的氏族为4个,有时只有3个,并且在不同的史料上列举了不同的名称。如"也提·乌鲁克"("七氏族")、"翁"与"索勒"("右"与"左")等名称所表明的,也有新形成的氏族。各氏族酋长得以长期在各地区内掌握政权;沙赫里夏勃兹的克涅格斯氏族以及尤其是阿富汗北部的喀塔甘氏族就是如此。19世纪30和40年代,喀塔甘氏族的穆拉德伯克从昆都兹管理包括阿姆河两岸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喀塔甘"迄今保留下来作为阿富汗的一个省的名称。氏族划分逐渐愈划愈小,氏族数则增多了;从18世纪后半期起,正式的氏族数已不是32个,而是92个。我们可以大致确定这个变化发生于何时。1756年,满吉特王朝的第一代汗穆罕默德拉希木在布哈拉即位时,还只有32个氏族;而到1781年时,穆罕默德拉希木的继位者阿塔里克(他没有称汗)达尼雅勒毕伊已对俄国使者别克楚林谈到了92个氏族。

18世纪时由于下列原因使突厥斯坦的富庶状况遭到了破坏:首先是乌兹别克各氏族之间的内讧。其中满吉特人和洪格拉特人之间的斗争具有特殊意义,满吉特人在布哈拉占优势,洪格拉特人在希瓦占优势,由此产生了两个汗王朝;其次是乌兹别克人与形成了乌兹别克的一个统治时期的被认为先知后裔的和卓们的与外界隔绝的贵族政治之间的斗争。除喀什噶尔的和卓王朝长期统治外,和卓们得以在短期内从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处夺取了突厥斯坦的费尔干和塔什干等地的政权。和卓们认为自己既非乌兹别克人,又非塔吉克人和萨尔特人。在乌兹别克以前时期,"萨尔特"一词与"突厥"一词相反,被用作伊朗人的名称;在乌兹别克时代,"萨尔特"一词与"乌兹别克"相反,先在希瓦,后来又在乌兹别克人同和卓们作斗争建立了新的汗王朝的所在地费尔干,开始被用来称呼过去被乌兹别克人征服地区的定居居民。在希瓦,居民被分为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具有政治意义;在费尔干,19世纪时萨尔特人的政治敌人为被认为是乌兹别克氏族之一的钦察人,但他们中间一定有哈萨克人,后来他们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

人的关系比对乌兹别克人要更为密切。随着乌兹别克人转向定居,萨尔特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日常生活区别失去了意义,在这一方面萨尔特更多地与哈萨克人相对立。

最后,在18世纪时,文明地区由于国家政权的衰弱,开始遭到游牧民、特别是哈萨克人和土库曼人的侵袭而破坏。在花剌子模地区,甚至连首都希瓦城也完全遭到了破坏;布哈拉汗国的京城安然无恙;但是撒马尔罕却遭到了彻底破坏,在若干时期内它甚至不复存在了。

19世纪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情况则完全不同。希瓦的洪格拉特人、布哈拉的满吉特人和浩罕的明格人建立了较强大的国家政权,并且一般说来不论同乌兹别克氏族贵族政治或邻近的游牧民进行的斗争都很成功。为使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屈服,并向他们征收贡税,希瓦人和浩罕人在草原上建造了城堡。这样一来,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在乌兹别克的各个汗国同俄国作斗争时站到了俄国方面,他们利用俄国人的胜利来摧毁希瓦人和浩罕人的城堡。

在彼得大帝及其以后时代俄国人同游牧民签订的臣属条约,大部分只是旨在保障俄国商业的利益。在彼得大帝时所签订的条约中,也有同其历史迄今很不清楚的民族喀拉卡勒帕克人[1]签订的条约。记载了贵族维尔什宁到喀拉卡勒帕克汗的帐营里去,并于1722年9月在那里签订了条约;但同时却没有记载任何地理方面的详情。我们完全不知道,可否将现代喀拉卡勒帕克人与中世纪俄国编年史上的"黑克洛布克"相比拟。看来,18世纪初,喀拉卡勒帕克人住得比现在要靠西,当时记载了他们同巴什基尔人订立了协定以及他们同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为了牧场而敌对。17世纪时,在有关俄罗斯人同哈萨克汗佳夫卡来往的记载中也提到了喀拉卡勒帕克人。卡尔梅克人在同俄罗

---

〔1〕[如今可参阅伊万诺夫:《喀拉卡勒帕克人》,载《苏联民族学》卷4,1940年,第23~54页;他的《关于喀拉卡勒帕克人的新材料》,载《苏联东方学》,1945年卷3,第59~79页;《喀拉卡勒帕克人历史资料》,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东方学研究所汇刊》卷7);日丹科:《喀拉卡勒帕克人历史民族学概述:19世纪初氏族部落结构和分布情况》,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民族学研究所汇刊》新集第9卷);《喀拉卡勒帕克自治共和国史纲》,卷1(从远古时代到1917年),卷2(1917—1963年),塔什干,1964年。]

斯人来往时还把那海人称做满吉特人。绝妙的是1745—1746年同表示愿意加入俄国籍的土库曼人进行的谈判，实现这一请求被认为不适合时机。土库曼人被给予答复说，他们应“通过不得罪人地同阿斯特拉罕商人进行贸易，通过给从满吉什拉克带着货物到希瓦和布哈拉来的人让路并给予物资补助，通过经常遣返俄国俘虏”来博得这个恩典。众所周知，由于土库曼人和哈萨克人的袭击和将一些人抢走，俄国俘虏落到了中亚奴隶市场上。

从牙亦黑河起直到额齐斯河为止的境土上的邻族对俄国同哈萨克人来往都是最重要的。18世纪时，统治整个这片境土的汗已经没有了，但有握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的各地的汗；18世纪时最强大的汗是袭击过吉尔吉斯人的中斡耳朵汗阿卜赖（1771—1781年）。[1] 俄国人同草原进行贸易往来的中心，除18世纪40年代建成的奥连堡外，为额尔齐斯河上的几座城市，尤其是谢米帕拉金斯克。

俄国人起初竭力使诸汗成为自己政策的工具，后来则促使草原上汗政权的消灭。[2] 1822年颁布了哈萨克人归顺俄国的公文《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大家知道，直到不久以前，哈萨克人一直被称为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但是该条例把行政管理保留在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哈萨克贵族——苏丹们手中。同时试图执行关于当时被俄国人称为“生蛮”的真正吉尔吉斯人或喀拉吉尔吉斯人的条例。这些吉尔吉斯人同俄国人的来往开始得还要稍早些；1814年，在伊塞克湖附近游牧的“伯克”什拉里之子吉尔吉斯人科伊齐伯克在西伯利亚督军格拉泽纳普处（大概是在托博尔斯克），获得了“大尉的军衔和金质奖章，以及当商队通过时佩带的马刀”。这样的奖励是在1824—1825年关于将1822年条例应用到吉尔吉斯人处去的谈判进行之后授予某些吉尔吉斯人的。在此场合下，商业目的多于政治目的；谈判时俄国人与吉尔吉斯之间的调停人之一为谢米帕拉金斯克商人波波夫的

[1] [关于18世纪的哈萨克斯坦，见维亚特金：《Batyir, Sryim》，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

[2] [关于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见阿波勒洛娃：《18世纪30年代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阿拉木图，1948年；别克马哈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莫斯科，1957年。]

伙计喀山鞑靼人法伊祖拉·塞弗林。1825年,俄国哥萨克部队把吉尔吉斯使者带到了伊塞克湖,在这支哥萨克部队中有个兹别尔什坦医士,他后来写了一部饶有兴味的《吉尔吉斯生蛮志》;我不知道,这部书是否出版过,如果没有出版,它的手稿是否保存了下来。[1]

在留传下来的材料中,关于"马纳普",什么也没有谈到。不同于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没有汗(按照吉尔吉斯传说,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是吉尔吉斯人的第一个汗也是最后一个汗,仿佛他还是个孩子时落到了一种野驴群中间)。据我所知,在关于吉尔吉斯杀死进行叛乱的哈萨克苏丹克尼萨拉·喀西莫夫的1847年事件的记载中,最早提到了作为吉尔吉斯各氏族、部落首领的"马纳普"。据俄国人后来收集到的资料,早在18世纪时,先在伊塞克湖西岸的萨雷巴吉沙诸部落处,后来又在其他吉尔吉斯人处,就都已有了"马纳普"。这是所谓"出自伯克系统的"人们,"以勇敢和慷慨"而出众;"他们未经选举,但如果选举的话,人们一定推选他们"。这里所谈的只是马纳普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实际上不管马纳普的出身如何,他们成了与吉尔吉斯人处的苏丹或卡尔梅克人处的宰桑那样的贵族阶层,人民群众["布哈拉",即阿拉伯语"法基尔"(穷人)的复数"弗卡拉";与城名"布哈拉"无关]完全依附于他们。[2]

从19世纪30年代起到60年代,由于俄国人南下的军事行动,先占领了谢米列契边区,后来又占据了札伊里亚边区,吉尔吉斯人逐渐归附了俄国人。在谢米列契边区,俄国人已经不是同吉尔吉斯人打交道,而是同大斡耳朵哈萨克人打交道了;"谢米列契(七河地区)"一词是突厥语"杰蒂苏"的翻译,但当时这个名称并未普及于后来获得了这个名称的整个地区,当时仅使用于伊犁河以北的部分。造成这个地名的7条河,有各种说法;伊犁河有时被包括在内,有时又不在内;甚至有人发表过这样一种见解,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把"关于某个有7条

[1][如今可参阅:经维亚特金编辑刊布的《兹别尔什坦医士游记》,见《历史档案》第1卷,莫斯科1936年,第223~258页。]

[2][关于此词的语源及其社会含义,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30~532页。]

河流过的安乐之邦的概念”搬到了这个地方。[1]

俄国人占领札伊里亚边区后才获得了有关真正的吉尔吉斯人或吉尔吉斯生蛮的较详细材料，关于他们分为各部落和氏族，以及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条件的较详细材料。氏族制度对于吉尔吉斯人还有比哈萨克人更大的意义；吉尔吉斯人还以没有瓦解的完整的氏族生活着，这种氏族也跟哈萨克人那样地分为各个不大的阿乌勒。军事传统具有重大意义；每个帐幕面前立着一支矛。同样的原因，吉尔吉斯是除那海人以外的创造了本民族史诗的唯一的突厥民族；可能，吉尔吉斯人的史诗是在那海人的影响下产生的；吉尔吉斯史诗中的主要英雄玛纳斯被说成是起源于那海人的史诗。[2] 俄国人碰到了还在发展阶段的吉尔吉斯史诗；史诗还没有取得完成的形态，在各个诗篇中，根据不同听众进行过补充和修改。尽管保存了游牧传统，吉尔吉斯人对农业并不陌生；与一份俄国官方报告中所说的“在边区归附俄国当局以前，几乎不从事农业”相反，拉德洛夫院士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处都看到了人工灌溉的耕地，并且吉尔吉斯人的灌溉作业做得更精细。

牧场的减少与居民被迫转为定居是俄国人征服的结果。为了俄国的殖民利益，有时从牧民处夺取了土地，甚至夺取了灌溉的土地；也有强迫居民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情况。某些地方称作“俄国镰刀”（乌鲁斯·乌拉克）的长柄大镰刀的使用，是俄国殖民活动给草原上带来的有益新措施。在社会生活中，俄国的行政管理造成了苏丹地位的没落和氏族制度的瓦解。为乌拉尔、图尔盖、阿克莫拉、谢米帕拉塔诸州制定的1868年条例，以及1886年土库曼边区行政管理条例，都有这种性质。

在乌兹别克汗国，由于宗教占优势，宗教方面对俄国人的反抗更甚于民族方面的反抗。俄国的行政管理在这里除发展城市生活外，还促使建立了一些比较民主的制度。[3] 早在汗的行政管理时就已减少

[1] [关于“谢米列契”这个名称，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320页，注3。]

[2] [关于吉尔吉斯史诗中的英雄玛纳斯以及这部史诗同那海人的史诗的关系，见《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1分册，第541页，注55；第542页，注56。]

[3] [巴托尔德是指对当地统治者专制政权的限制。]

的贵族阶级的作用更加衰落；大土地所有制无论是世俗的（官僚贵族的领地）或僧侣的（所谓寺庙领地）都几乎没有了。

土库曼人的生活在俄国征服时代具有较独特的民族性。某些土库曼传说和名称表明他们过去与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有某种关系，但是没有保留下关于这种关系的清晰回忆。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组织，土库曼人在名义上一会儿服从波斯王，一会儿服从希瓦汗，一会儿又服从布哈拉异密；一旦这个臣属关系有了较现实的性质，土库曼人就成了这些国家最不安分的臣民，在俄国统治时代，希瓦汗和布哈拉异密在俄国军队帮助下镇压了自己的臣民。除掠夺性袭击外，他们靠畜牧业、农业取得生活资料；在土库曼人占领的地区，城市生活完全消失了，甚至由俄国人恢复了城市生活后，土库曼人也几乎不住进城里去。众所周知，现在[1]土库曼人占全部土库曼斯坦居民的绝大多数（不少于90%），在城市居民中的比例则微不足道。尽管土库曼人有汗（更正确些说是自称为汗的各个酋长），土库曼人没有贵族，没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制度。尽管在土库曼各部落间、甚至同一部落的各氏族间经常作战，土库曼人在宗教方面组成了一个整体；模拟而成的、但毕竟有独特风格的史诗是全民族的财产，诗人马赫图木库里是全体土库曼人（包括过去脱离本族人、地理上完全隔离开的斯塔夫彼尔的土库曼人）的民族诗人。

他们借以比其他突厥斯坦居民更长久地抵御俄国征服者的堡寨也是他们的一个独特的特点。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游牧民一般而言会不会都有堡寨。通常游牧民利用其疆域的辽阔和迁移的迅速来抵御强大敌人的进攻；任何堡寨都不可能掩护游牧民的主要财富——畜群。草原上的堡寨通常是文明的征服者（例如乌兹别克人和俄国人）建造的；此外，乌兹别克堡寨由各氏族酋长为保卫自己的政权和夺取灌溉耕田所需的水而建造。在土库曼堡寨中也有为希瓦人建造的。后来以土库曼酋长科乌舒特汗命名、其后成为俄国密尔甫城核心的一座堡寨是希瓦人建造成的。有时土库曼人为防御目的利用了旧的城堡，

[1][1928年。]

例如密尔甫附近的拜拉木阿里。同俄国人打交道的那些大的堡寨则是土库曼人所建造的。

在西突厥斯坦转归俄国统治的同时,东突厥斯坦(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得以暂时摆脱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突厥人的国家组织。对于居民本身这并非幸运的事;在与中国人进行流血斗争的同时,发生了各伊斯兰教民族、酋长和野心家之间的流血斗争。[1] 伊斯兰教世界离欧洲文化最远的地区喀什噶尔的文化落后状态,造成了根本不可能建立就经济、宗教生活条件而言满足现代要求的国家组织。当地史学家所说的居民对于1877年恢复了中国的统治感到高兴,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大家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们觉得好像恢复了他们已故亲属和祖先时的生活。"斗争只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没有民族自觉心;居民按照自己所在的城市称呼自己:喀什噶尔里克、吐鲁番里克等;此外,有"塔兰齐"(即农民,是对18世纪时被中国人从喀什噶尔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垦殖者的称呼)和"东干"(大概是突厥族源的伊斯兰教徒,但说汉语)这两个名词。起义被镇压后,一部分喀什噶尔里克、塔兰齐和东干人逃到了俄国;在俄国,他们自称为维吾尔人:历史上中世纪的维吾尔人从未向西走得那么远;此外,现在也有住在中国境内甘州和肃州城附近的维吾尔人,他们跟中世纪维吾尔人一样,不信伊斯兰教,而信奉佛教,只是在18世纪时才用藏文代替维吾尔文。

不论在统一、独立的突厥国土耳其,或在俄国(今苏联)的突厥各民族中间,都提出了吸收欧洲文化,创办欧式大、中、小学的任务。在革命前的俄国,只提出过吸收当地青年进入俄国学校的问题;最早的俄国事业家觉得似乎培养文化程度较高的定居居民较游牧民要好些;生活驳倒了这个假设;哈萨克人进入俄国学校的比"萨尔特人"要多得多。当革命后提出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学校教育时,最初觉得似乎只有所谓"突厥"文学语言,即在生动的方言的影响下稍有改变的察合台语才可以这样。后来与学校里准许使用大量语言和方言相联系的按民族划界的原则取得了胜利。在土耳其和某些苏维埃共和国(在阿塞拜

〔1〕[见《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192页。]

疆共和国和鞑靼共和国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认为可以在高等学校里过渡到用本地语言进行教学;但苏联的大部分突厥民族,至少在高等学校里,还必须长期使用俄语进行教学。[1]

(译自《巴托尔德文集》,前苏联,1968 年版,第 5 卷,第 195 ~ 229 页。)

〔1〕关于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民族文化和知识分子,参看葛弗罗夫:《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问题》,载《苏联共产主义建设问题》一书,莫斯科 1959 年,第 88 ~ 104 页。

21 俾丘林《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对汉文史料所作注释摘录

〔俄〕俾丘林

21.1 匈奴

Ⅰ.从匈奴王朝的古代到公元前209年匈奴崛起之前[《史记·匈奴列传》]

[1950年版俄文本,第39页脚注1]匈奴——匈奴是蒙古人的古代族名。

[第39页脚注4]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也就是说荤粥、猃狁和匈奴是同一民族的三个不同名称,如今则以蒙古人这个名称为大家所知。

[第43页脚注3]此处略译了《毛诗》上的五句诗["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由这5句诗可知:蒙古人从黄河被北驱到鄂尔多斯。

[第43页脚注5]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貘之戎——这三族居住在巩昌府和兰州府,属于蒙古—唐兀惕混合种。

[第43~44页夹注]山戎,是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一个蒙古族的名称,居住在今敖汉、奈曼、科尔沁诸爱马克所据之地。北戎也是蒙古族。在山戎、北戎西面直到察哈尔为止,居住着东胡。古代中国历史将"戎"、"胡"的字眼加给住在北中国的部落时,都指的是蒙古人;而当将这些名称赋予西中国的部族时,"戎"字指青海唐兀惕人,"胡"字指突厥和波斯系部落。而下引游牧于今中国甘肃省的戎夷、昆夷等族,则由与唐兀人相混的蒙古人构成;因此在西藏和青海史上,这些族都被认

为是唐兀惕。但在此处,因为下面在其他各族中蒙古人构成了主要力量,因此历史把他们列入了蒙古部族的组成中。他们从黄河向北逃到鄂尔多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他们之中有蒙古人,因为当时蒙古人的主力是在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以东。反之,被中国人击败的唐兀惕族总是向青海退去,那里是他们的力量集中地。

Ⅱ. 从公元前209年匈奴王朝勃兴到公元前57年匈奴归附中国为止,凡152年、8个汗[《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上]

[第46页脚注2]头曼——头曼接近于蒙古词 timyin(万),卡尔梅克语读作 tiumien。

[第46页脚注3]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头曼不胜秦,北徙——由此处显然可知:匈奴王朝在南蒙古据有张家口以西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疆土,而在北蒙古,从喀尔喀地区向西属于匈奴王朝。

[第46页脚注4]冒顿……——冒顿接近于蒙古词 modo(树木)。

(Ⅰ)冒顿单于

[第47页脚注3][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张家口西南的蒙古沙漠。

[第49页脚注3]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蒙古地区从东向西被划分为三部分。后来,蒙古地区长期遵循了这样的政治划分。

[第49页脚注4]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由此可见,匈奴王室成员没有分作世袭领地的世袭封邑,而封邑,赐予具有与王室的亲属关系程度相应的爵位的每一个人;受赐封邑者死后,其封邑即转给按照亲属关系程度应获该爵位的人。

[第49页脚注5]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现今蒙古王公也同样的有权自置官吏,只不过协理台吉是由皇帝批准任命的。

[第50页脚注3]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人——这是东亚古代显示葬仪奢华的风俗;但在现今中国很少遇到,只在皇室宗亲陪葬时

才偶一见之。

[第50页脚注5]丁灵——匈奴别部丁灵据有叶尼塞河以东到贝加尔湖、安加拉河左面的土地。

[第54页脚注2][孝文帝四年]单于遗汉书曰……——蒙古人无文字,以所俘汉人充任汗的文书官。

[第55页脚注1]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此处"小吏"指[匈奴的]臣属者。

[第55页脚注2]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皆以为匈奴——这里谈到的是公元前177年[孝文帝三年]向西征服东突厥斯坦和中亚细亚,直到里海为止。

[第56页脚注2]赤绨、绿缯各40匹——赤、绿是现今蒙古人所喜爱的颜色。

[第56~57页夹注]冒顿在亚洲史上以哈剌汗的儿子乌古思汗这个响亮的名字为大家所知。洪德米尔写道:游牧于哈剌和林[脚注4]的哈剌汗,得知他的儿子崇拜新的宗教神后,便去攻打他,想把他杀死,但是乌古思汗的笃敬宗教的妻子立即将这件事通知了他。哈剌汗战死,乌古思汗便登上了王位,他在位73年[余按:此处年头有误,乌古思汗(冒顿)据《史记》记载于公元前209年即单于位,公元前174年去世,在位36年]内征服了整个突厥斯坦——阿不勒哈齐汗在其突厥诸部史中也把乌古思汗描写成笃敬宗教的模范。他写道:乌古思汗的父亲哈剌汗由于自己的儿子树立新的宗教,便着手去杀害他。当乌古思汗正在打猎时,他的父亲率领着大军前来讨伐他,尽管他的父亲战胜了,但却在奔跑时中箭而死。乌古思汗称汗后,首先出征游牧于中国边境上的鞑靼汗[东胡],战胜了他;接着征服了中国、女真城和唐兀惕国;此后又征服了从蒙古地区向南直到印度、向西直到里海的全部领地——尽管名字不同,但是采用了乌古思汗这个名字的冒顿单于的概略历史和主要事件的时间顺序是相当可靠的,特别是阿不勒哈齐汗所叙述的。根据中国历史,冒顿征服了东蒙古人;接着使中国和唐兀惕臣属于自己,此后又征服了从哈密直到里海的整个突厥斯坦。

[第50页脚注4]哈剌忽木在杭爱山麓鄂尔浑河左岸,成吉思汗曾以此为驻地。匈奴人由于从南向北迁移到这里也有主要的驻地,这一点由中国人对汗庭举行的远征显然可见。大概,哈剌忽木和哈剌和林是同一处地方的两种名称:前者是突厥语名称,意为黑沙;后者是蒙古语,意为黑二十。成吉思汗的京城即根据后者,成为哈剌和林。

(Ⅱ)老上稽粥单于

(Ⅲ)军臣单于

(Ⅳ)伊稚斜单于

(Ⅴ)乌维单于

(Ⅵ)儿单于乌师庐

[第71页脚注6]右贤王呴犁湖——呴犁湖是他的名字,又作khi-uilikhu,见《通鉴纲目》。由此可见,南、北蒙古在古代即已存在着若干字母[子音]发音上的差别。

(Ⅶ)呴犁湖单于

(Ⅷ)且鞮侯单于

[第73页夹注]……李陵[降匈奴后]留在匈奴人处,获得了黠戛斯领地,其后裔统治着那里,几乎直到成吉思汗时。

以上各节正文摘译自《史记·匈奴列传》,间有取《汉书·匈奴传》补充者。以下各节应摘自《汉书·匈奴传》上。

(Ⅸ)狐鹿姑单于

(Ⅹ)壶衍鞮单于

(Ⅺ)虚闾权渠单于

(Ⅻ)握衍朐鞮单于

Ⅲ.从公元前57年匈奴归附中国到公元25年分裂为南、北匈奴,凡81年、七汗[《汉书·匈奴传》下]

(ⅩⅢ)呼韩邪单于

[第94页脚夹2]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侯应不明喀尔喀的真实情况,喀尔喀多草木,沙漠迄今很少。到处是极细的沙砾的土壤。

(XⅣ)复株累若鞮单于

(XⅥ)搜谐若鞮单于

(XⅥ)车牙若鞮单于

(XⅦ)乌珠留若鞮单于

(XⅧ)乌累若鞮单于咸

(XⅨ)单于舆

Ⅵ.从公元25年南匈奴崛起到215年南匈奴衰落,凡189年、二十汗[《后汉书·南匈奴传》]

(Ⅷ)单于屯屠何

[第129页脚注1][永元]五年[公元93年],[北单于]於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众——至此北匈奴王朝的统治告终。其后裔在蒙古西北境犹有小片分地。著名的突厥王朝即出自其后裔。

21.2 乌桓

[《后汉书·乌桓传》]

[第142页夹注]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在乌桓王朝起源的简述中说得很明白:乌桓王朝是鞑靼汗王朝、东胡王朝的直系延续;鲜卑王朝则是其支系。乌桓人于公元前80年开始强大起来,到公元206年时被中国人彻底打败。

[第142页脚注1]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大人,即氏族首领。

[第142页脚注2]数百千落(yurt)自为一部(obščina)——obščina汉文"部",蒙文aimak。

[第143页脚注1]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氏姓,必须理解为公社或氏族名称。这是蒙古地区自古到今的一般习惯。

[第143页脚注4]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在蒙古地区,现今家庭经济仍交给妇女管理,男子只从事战事。

[第 143 页脚注 6]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东南蒙古人自古到今局部地从事耕作。

[第 144 页脚注 1]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据此,赤山在黑龙江河口附近;但其确切位置不详。

[第 144 页脚注 5]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根据所描述情形,这是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沙漠。

[第 146 页脚注 1][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向伊尔库茨克省西半部北徙。

21.3 鲜卑

[《后汉书·鲜卑传》]

[149 页夹注]东胡人溃散后,鲜卑人居住在东蒙古当时汉语称做饶乐水的西拉木伦河南面,现今不大的敖汉、奈曼、喀尔喀爱马克所占据的土地上。他们从公元 93 年开始强大起来,到公元 181 年衰亡。

[第 151 页注 1]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匈奴王朝,在蒙古的统治到此中断。鲜卑王朝暂时代替了它,以前称作匈奴人的蒙古人,采取了鲜卑的族名。

[第 155 页注 1]檀石槐乃自分其地为 3 部(aimak),从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貊涉 20 余邑(род)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 20 余邑为西部——这是冒顿汗所奠定的古代蒙古地区的区划。

Ⅰ. 慕容王朝[《通鉴纲目》]

Ⅱ. 拓跋王朝[《通鉴纲目》]

[第 167 页夹注]鲜卑别部拓跋远处于其他诸部之北。从他们的迁徙可知:拓跋[部]占据着俄国兴安岭鄂嫩河沿岸一带。他们在 3 世纪内繁衍到包括 99 大姓的 36 爱马克,最后,开始返回自己古老的故乡,到自己的同族鲜卑人处来。汗推寅第一个南迁大泽。

我以前认为:这次迁移是从兴安岭迁往呼伦池,也即蒙古语的达赖淖尔,意即大泽。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这一推测看来很有可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汉籍《一统志》第 407 卷上说:拓跋部晋时游牧于今阿巴噶部、阿巴哈纳尔部所在之地。由此可见:拓跋人从兴安岭出来后,没有迁移到呼伦池,而是迁移到了达里诺尔,他们沿着从尼布楚向南直接通往那里的道路南迁。再过六代后,汗诘汾迁居位于张家口和鄂尔多斯之间的匈奴故地。他的继位者力微迁居盛乐;那里有优良的牧场,自古以来是强大蒙古汗的驻地,即今呼和浩特城(汉语归化城)所在之地。应当认为:现今的阿巴噶、阿巴哈纳尔之地,当拓跋部在晋朝(始自公元 265 年)以前迁往别的匈奴地域时,仍属拓跋部领有。因此说:拓跋部晋时游牧于今阿巴噶、阿巴哈纳尔之地……

21.4 柔然

[《北史·蠕蠕传》]

[第 187 页脚注 1]頞根河——与从杭爱山南麓流出的翁金河音相近。

Ⅰ.豆代可汗社仑

[第 187 页脚注 6]"豆代"犹魏言驾驭开张也——魏言即蒙古语,因北魏朝的创始人是鲜卑人拓跋珪。

Ⅷ.伏古敦可汗豆仑

[第 195 页脚注 3][太和十六年]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西走,自立为主——这是回纥人从色楞格河迁往额尔齐斯河诸山峰。

[第 195 页脚注 4]豆仑与叔父那盖——那盖与 Ногай[蒙古语:狗]词相近。

Ⅹ.他汗可汗伏图

[第 196 页脚注 5]永平元年,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函书应是以汉文写成。

21.5 回纥[高车]

[《北史·高车传》]

[第215页脚注1]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蒙古人迄今犹好悲声长歌。

21.6 突厥

[《旧唐书·突厥传》][《北史·突厥传》]

[第220页夹注]突厥,如下文所见,蒙古语作及 Дулга。西欧东方学家轻视中国史,却注意到突厥与 Тюрки 谐音,以此为根据,认为以 Дулга 的族名为大家所知的蒙古人是 Тюрки;Дулга 王朝的祖先既起源于匈奴王朝,故匈奴人是 Тюрки 部人。将蒙古人与突厥人混为一谈,使西欧学者得出了有关居住古代中亚细亚蒙古各部人民的相反概念。

[第221页脚注1]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指阿尔泰山中央,楚河流经阿尔泰山西北面。

[第222～227页夹注]关于从来住在中亚细亚不同部落的报道,大概是在各族间开始贸易往来时传到欧洲来的。直到晚近,亚洲史学家才把有关突厥、蒙古人起源的传说报导给我们;但这些传说取材于暧昧的民间传说,因此亚洲史学家的记载既有历史根据,又混杂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可靠性的杜撰之说。

雅菲特(Иафет)之子突厥被认为是住在里海直到高丽湾为止的中亚细亚各部的始祖,但是这一传说大概被用来延长挪亚之前统治的诸王朝的系谱。到突厥的第七代时,生了一对双生子:鞑靼和蒙古,他们的父亲伊利汗将突厥斯坦分给他们:鞑靼分得东半部,蒙古分得西半部。但这看来是想将名字和起源赋予统治东、西蒙古地区的两个王朝的杜撰之说。到蒙古的第三代时,中亚细亚头一个古代的伟大征服者蒙古之子哈剌汗的儿子乌古思汗出世。

波斯史学家洪德米尔[格里戈利耶夫译自波斯文的蒙古史]写道：游牧于哈剌和林的哈剌汗，得知他的儿子崇拜新的宗教的神后，便去攻打他，想把他杀死，但是乌古思汗的笃敬宗教的妻子立即将这件事通知了他。哈剌汗战死，乌古思汗便登上了王位，他在位73年（按：应为36年）内征服了整个突厥鞑靼，并为大部分蒙古部落起了名字，后来它们遂以这些名字为世人所知。阿不勒哈齐汗在自己的突厥诸部史中也把乌古思汗描写成笃敬宗教和英雄人物的典范，但写得详细得多。他写道：乌古思汗的父亲哈剌汗由于自己的儿子树立新的宗教，便着手去杀害他。当乌古思汗正在打猎时，他的父亲率领着大军前来讨伐他，尽管他的父亲战胜了，但却在逃奔时中箭而死。乌古思汗称汗后，首先出征游牧于中国边境上的鞑靼汗，战胜了他；接着征服了中国、女真城和唐兀惕国；此后又征服了从蒙古地区向南直到印度、向西直到里海的全部领地（以上所述大部分与中国史上的记载相近）。洪德米尔接着又说：乌古思汗的六世孙伊利汗被与鞑靼汗修云泽汗联合的河中汗图尔打败，结果全部蒙古人只剩伊利汗的儿子合颜夫妇、合颜的堂兄弟帖古思夫妇4个人活下来。他们在战败后躲在尸堆里，夜幕降临时开始逃跑，到黎明时逃到了群山环绕的悬崖上。他们攀登上山巅，从山巅上向下看到一片丰饶的谷地，他们便走下山巅，一直留在那里。这个地方突厥语称作额儿古捏昆，意即悬崖。天长日久，从上面所说的4个人中产生了许许多多部落。合颜的后裔被称为乞牙惕，帖古思的后裔被称为迭儿林格。后来，由乞牙惕和迭儿林格人繁衍的结果，额儿古捏昆住不下了，他们便离开那里到蒙古地区来。他们同蒙古地区的占有者作战，战胜了他们。此后，起源于合颜的额勒都思便统治了蒙古地区。阿不勒哈齐汗所叙述的乌古思汗王朝的覆亡和复兴，稍不同于以上所述。据他说：伊利汗和昔温赤汗同时执政。伊利汗是蒙兀汗的后裔，昔温赤汗出自鞑靼汗一族。这两个君主不停地交战，但伊利汗总是打胜仗。最后昔温赤汗与黠戛斯汗联合起来彻底打败了伊利汗，灭掉了蒙兀汗王朝帝国。虽然伊利汗有许多儿子，但他们除合颜和他的侄儿纳豁思以及他俩的妻子外，全都战死了。这两位王子当了俘

虏，但过了10天后，他们得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考虑到住在那里没有危险，他们便将剩下的牲畜赶进了山。翻山越岭，他们最后来到了一座高山上，沿着羊肠小道翻过山，他们发现了一处野果丰富的谷地。他们很中意这个地方，这里有险峻的群山环绕，使他们得以免受追踪的威胁。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作额儿古捏昆。“额儿古捏”是蒙语山谷的意思，“昆”是险峰的意思。合颜和纳豁思的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合颜把自己的子孙叫做合牙惕；纳豁思把自己的一部分子孙叫做纳豁思列儿，另一部分叫做都儿剌干。这些部落在那里生活了四百多年；后来人多地窄，他们才开始返回自己祖先的故土上来，他们是根据传说知道自己故土的辽阔广大的。但是昔日的羊肠小道已经没有了，他们找不到出山之路。一个铁匠发现某处的一座山不很厚，那里是由铁块构成的，他建议将许多树木和炭搬到那座山下，点起火来，那山果然化开了一点，开出了一条可以通过载驮骆驼的宽敞通道，就这样，蒙古人出了额儿古 捏昆。那时管辖蒙古人的是孛儿帖赤那汗。出自鞑靼汗后裔的君 主得知蒙古人出来后，立即武装了起来，但孛儿帖赤那汗彻底击溃了他们，这正是伊利汗战败后，蒙兀这个名称湮没了450年的那一年。

上面这两个传说是有历史根据的，我们根据中国史籍不难从荒谬不经的传说中发现事实真相。乌古思汗即是匈奴王朝的冒顿或冒顿汗。他的父亲头曼，即亚洲史学家所说的哈剌汗，于公元前220年被中国人赶出鄂尔多斯，退到喀尔喀，住在杭爱山下后来所有强大的汗建帐之地，从成吉思汗时代起那里便以哈剌和林的蒙古名著称，而亚洲史家则称之为哈剌忽木。冒顿是王位的唯一合法的继承者；但后来头曼的一个宠爱的妃子又为他生了另一个儿子。头曼想把王位传给幼子，便把冒顿交给月氏汗作质，接着又向月氏进攻。冒顿见自己处境极端危险，便从汗那里偷了几匹好马，逃回到了父亲处。头曼给他一片分地和1万匹马，嘉奖他的勇敢行为。冒顿训练自己的臣民绝对地服从自己。东蒙古汗（即亚洲史家所说的鞑靼汗后裔，中国史籍没有指出他的名字）轻视南方的冒顿，对他进行各种侮辱。冒顿以出其不意的

奇袭打败了东方的汗，占领了他的土地。接着他疾趋西方，打败了月氏汗，征服了青海唐兀惕人。此后冒顿又面对中国，夺回了中国人从他父亲那里夺走的土地。成为整个辽阔的蒙古地区的统治者后，公元前200年他越过长城进入中国境内，没有打仗就迫使皇帝以送礼物的名义纳贡，公元前198年又再次订立了书面条约。公元前176年，冒顿亲自写信给汉廷说：他征服了东突厥斯坦、准噶尔和河中（余按：所述地区应即《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述及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也就是说征服了从Pičan直到波斯的全部定居地区。公元前174年，冒顿去世。亚洲史家所记载的乌古思汗的业绩甚至在时间顺序上与中国历史相近。剩下困惑莫解的是：鞑靼汗是谁？他是东蒙古汗还是月氏汗？东蒙古汗和月氏汗都游牧于中国边境；前者占有直隶省边外的土地；后者游牧于中国西北角的土地上。但这一困惑莫解之点从蒙古地区划分东西二半部获得了解释：东半部归鞑靼人所有，西半部归蒙古人所有，各部族即由此得名。

中国在复仇的热潮中同匈奴人连续不断地打了一百多年仗，匈奴人逐渐丧失了南蒙古和喀尔喀。公元92年，匈奴人在今天的塔尔巴哈台被中国人彻底打败；同年，鲜卑人（鞑靼汗的后裔）占据了匈奴人在北蒙古的土地和人民。战败后，匈奴王朝只剩下了阿史那氏的一个支系；他们退到阿尔泰山麓，以突厥的族名处于鲜卑人以及后来的柔然人的羁縻下，为诸汗采铁代替贡物。天长日久，这个支系重新强大了起来，552年时，突厥君主土门推翻了柔然王朝的统治，自称伊利汗。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匈奴王朝覆亡于92年，而突厥部再起于552年；也就是匈奴灭亡后460年，突厥部再起；阿不勒哈齐汗推算得相当正确。

阿史那部游牧所在的阿尔泰山，是著名的阿尔泰山脉的最高点。它形成一个圆形的窄鲤鱼钩，山里有广阔的深谷，就像一个翻转朝下的头盔。头盔在蒙古语中叫突厥，阿史那便为自己的部落起了这个名字。亚洲史家把阿尔泰山的这一部分称作额儿古捏昆。阿尔泰山的自然形势和突厥部为诸汗开采铁的义务是他们的神话般出山传说的根据。

在亚洲史家的荒诞不经的传说中隐藏着任何一个欧洲史家所未曾觉察出的重要情况。波斯史家把突厥尊为统治蒙古地区的鞑靼、蒙古二王朝的首领,把蒙古地区称作突厥斯坦(参阅 Г. 格里戈利耶夫译自波斯文的蒙古史,第 2 页)。突厥史家阿不勒哈齐汗虽然认为蒙古人出自突厥人,但是却认为现今讲鞑靼语的突厥部落却并不跟蒙古人是同一部落(见《鞑靼史》第 2 篇,第 2 章,第 52 页)。他把蒙古地区称作蒙古强国,而突厥斯坦却指的是浩罕等中亚细亚定居地区(见第 3 篇,第 1 章,第 421 页起)。奇怪的是,蒙古语里没有"突厥"这个词;波斯史家认为蒙古统治者出自突厥,并把他们的领地称作突厥斯坦,但没把蒙古人称作突厥人,而按照伊利汗所生的一对双生子的名字,把他们分为鞑靼人和蒙古人。根据这一划分,亚洲史家把东蒙古人称作鞑靼,北蒙古人称作蒙古人(见《鞑靼史》,第 2 篇,第 2 章,第 92 页)。我们在这里可以指出:双生子鞑靼和蒙古的支系直到公元 11 世纪起才稍稍开始出名。还应指出:匈奴人在公元 92 年时被伊利汗分给他儿子鞑靼的分地[蒙古地区]东半部的蒙古人最后打败。当时统治东蒙古的鲜卑王朝虽与匈奴王朝是同族,却并非出自同源。

I. 伊利[可]汗土门[伊利汗即人民的统治者]

[第 228 页脚注 1]时铁勒将伐蠕蠕,土门率所部邀击——维吾尔人从西向东来,突厥人从阿尔泰山北面邀击蠕蠕。

Ⅲ. 木杆[可]汗俟斤

[第 229 页脚注 2]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即远出贝加尔湖以北到北冰洋。

[第 231 页脚注 1]其书字类胡——前云"无文字",即突厥人不使用汉文,此处云"其书字类胡",暗示了回纥文,也即古蒙古文的起源。汉字"胡"既是突厥,也间接地指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

[第 231 页脚注 3]歌呼相对——现今在蒙古地区和西藏也这样地歌唱。在西藏,人们互相拉着手、跺着脚歌唱。

[第 231 页脚注 4]敬鬼神,信巫——此处汉字"巫"意即巫师、萨满,而唐兀惕语 šaman 一词兼有萨满、祭师、学者、医师之意。

Ⅳ. 他钵[可]汗

[第 234 页脚注 I]他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这是现今西藏和蒙古喇嘛的仪式。

21.7 回纥

[《新唐书·回鹘传》]

[第 301 页脚注 1]回纥,其先匈奴也——即回纥统治王族出自匈奴王族。

[第 301 页脚注 2]其部落曰……凡十有五种,皆散处碛北——碛北,即准噶尔和喀尔喀。

附:Ⅰ. 薛延陀[《新唐书·薛延陀传》]

[第 339 页脚注 2]郁督军山——色楞格河所源自的杭爱山北支。

Ⅱ. 拔野古

[第 344 页脚注 1]拔野古部占有仆骨以东的广大地带;东接靺鞨。靺鞨部占有今吉林省以及黑龙江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拔野古部住在今车臣汗部东北部及尼布楚州东南部……

Ⅳ. 同罗

[第 345 页脚注 2]同罗南邻薛延陀,西接多览葛,由此可见,同罗在土谢图汗领地从鄂尔浑河到土剌河的中心部分。

Ⅴ. 浑

[第 345 页脚注 3]浑部大概游牧于呼伦贝勒齐尔地区和翁金河沿岸。

Ⅸ. 葛逻禄

[第 347 页脚注 1]显然葛逻禄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及额尔齐斯河沿岸……

Ⅸ. 都播

[第 348 页脚注 2]都播南邻回纥、西接黠戛斯,由此可见,都播游牧于库苏古尔湖沿岸。

Ⅻ. 骨利干

[第 348 页脚注 4]骨利干游牧于都播东面贝加尔湖沿岸……

XⅣ.斛薛

[第 349 页脚注 3]斛薛游牧于希洛克河和奇科伊河沿岸,在多览葛北面。

[第 350 页脚注 1]乌罗浑在额尔古纳河右岸。

[第 350 页脚注 3]驳马大概是现今雅库特人的祖先。

又附,Ⅰ.黠戛斯

[第 351 页脚注 1]丁令是蒙古族。他们占据着伊尔库茨克省南部从贝加尔湖直到叶尼塞河……

[第 351 页脚注 2]李陵被立为黠戛斯人的国王。灭掉回纥帝国的即是李陵后裔。

[第 351 页脚注 4]众数 10 万,胜兵 8 万,直回纥西北 3000 里,南依贪漫山——在杭爱山麓鄂尔浑河附近。

[第 351 页脚注 5]贪漫山——"贪漫"与"唐努"音相近,唐努山为现今从阿尔泰向东延伸到库苏古尔湖的山脉名,是古代黠戛斯的南界。

[第 351 页脚注 6]赤发、皙面、绿瞳——今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的鞑靼人中间有相当多的淡黄发的人。黠戛斯占据着托木斯克省和叶尼塞省南境。

[第 353 页脚注 2]其文字语言与回鹘正同——黠戛斯按照其原始成分应是蒙古——"突厥"国家,由"突厥"、蒙古二族组成。"突厥"或鞑靼是基本居民;而蒙古人是他们的统治者,过去以匈奴之名著称,当时则称为回纥人。在黠戛斯宫廷里与中国使团举行谈判时,大概使用中国人所知的、作为统治民族语言的回纥语,因此使者写道:黠戛斯人说回纥语。实际上,黠戛斯人说的是鞑靼语,Ай(月)、Бэй(大臣称号)等词证明了此点。至于回纥文,大概在 9 世纪时已经流行于蒙古地区,从名称判断,这种文字是蒙古人自己制定的;因为过去在蒙古地区统治着回纥人的突厥人,也有自己的文字。

21.8 契丹

附:奚[《新唐书·奚传》]

[第 370 页脚注 2]奚,亦东胡种——据《新唐书》,奚、契丹、室韦按其统治者的起源,都是蒙古部;但其属民由于东、北两方面紧挨着通古斯人,大概自古以来便与通古斯人杂居,吸取了许多通古斯人的风俗习惯,因此《新唐书》把上述三部都算作通古斯部,只是没说它们按照起源属于通古斯部。

[第 370 页下注③]白狼河——老哈河。

[第 371 页下注⑦]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东夷,即通古斯诸部。

在对其他中亚诸国的联系中对蒙古地区的总的看法

[第 375 ~ 376 页]古代中亚细亚各族人民的历史,尽管不能确定地说它存在了多久,也不能确定其起源,但蒙古人在风俗习惯和语言的语法形态上同通古斯人、突厥人的若干相似之处却充分地显示出上述 3 族同源,但是它们分为 3 个支系,即 3 个部落,无疑发生在很遥远的时代;因为几乎在公元前 2500 年时,蒙古人和通古斯人已经在中国历史上以两个独立的部落出现。只有"突厥"人,由于住得很遥远,稍晚才为中国居民所知。

地理学家将亚洲分为两半部:东亚和西亚;而大自然本身又将东亚分成两部分:南亚和中亚。从朝鲜湾起西到帕米尔高原的各种名称的原生山岭,仿佛构成了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天然界线。这条界线的西南面居住着印度族的各种部族,其容貌、语言、风俗习惯皆有别于中亚细亚人;北面居住着中亚细亚诸部落。在这些中亚部落中,通古斯人自古以来占据着从朝鲜起北到大兴安岭的东部沿海地区;接着从雅卜隆岭起向北沿着维季姆、奥列克马、勒拿、伊利姆还有两种通古斯人;西面到吉林乌拉、嫩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草原;从勒拿河起则没有远达叶尼塞河。蒙古人帐幕的分布地区:从辽河和额尔古纳河起,西到特穆尔图诺尔和洪霍图诺尔,西北沿着安加拉河直到叶尼塞河,他们占据着蒙古草原和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沙漠地区;向西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突厥"人分布在从喀尔喀直到喀什噶尔和突厥斯坦的南山[昆仑山]、天山之间的丰饶谷地;远出帕米尔高原向西,他们占据了阿

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广阔沙漠地区;接着,从平坦的咸海和里海沿岸地区北转,沿着乌拉尔山绕过广大地区直接向东,沿着阿尔泰山北面直到叶尼塞河。这就是古代3个中亚部族所占据的地区的大致情况。蒙古部在公历纪元前后迅速地强大起来,长时期地侵扰中国。最后,9世纪中叶时,黠戛斯人打倒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回纥王朝势力,起来复仇的中国消灭了躲避在长城下的回纥残余;回纥残部从杭爱山西奔伊犁、塔尔巴哈台。这时,东胡王朝的最后分支契丹王朝替代了回纥人的地位。随着契丹人的崛起,在黑龙江上出现了以鞑靼为族名的黑水靺鞨。利用当时蒙古人的一蹶不振,他们安然通过蒙古边境向西,沿着西南山坡来到察哈尔,最后居住在空旷的阴山北坡。蒙古人从这些黑水靺鞨处获得了现今的族名:蒙古,欧洲史家遂以这个名称来代替蒙古人从古代统治王族处获得的古代族名。这样,蒙古帝国的创建者不是原来的蒙古人,而是从黑龙江来到南蒙古的通古斯人,从下面摘自中国编年史《通鉴纲目》的片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32~33页,第1编《绪论》摘译]……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当匈奴人引起中国震惊时,中国人知道:不久以前的蒙古人处在两个同族的王朝,匈奴王朝和东胡王朝的最高政权之下。亚洲史家所谓蒙兀汗王朝的匈奴人统治着蒙古西半部;牙帐在杭爱山麓(鄂尔浑河附近);它的领地从张家口起,北到贝加尔湖以南,西到塔尔巴哈台山。亚洲史家所谓鞑靼汗王朝的东胡,统治着东蒙古,牙帐在东蒙古的中心(科尔沁);它的领地西到张家口,北到兴安岭。东胡所占据的领土处于有利地位,力量强于匈奴,但由于过于自矜,于公元前206年在匈奴人的强大打击下出乎意料地灭亡了。这两个王族的后裔彼此兴衰更迭,轮流统治了蒙古地区1300年。在这一时期内,出自匈奴王族的为柔然、突厥、回纥;而乌桓、鲜卑、契丹、慕容、拓跋则被认为是东胡王族的支系……

蒙元史编



22 蒙古人的历史

[意]普兰·迦儿宾　原著

[俄]马列英　译自拉丁文

[前苏联]沙斯契娜　注

22.1 俄文译序

13世纪在欧亚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是一个发生巨大震荡及重大事件的世纪,它给各族人民的命运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欧洲在这一世纪中随着封建割据的消灭,一些大的封建国家开始形成。十字军远征继续进行,但十字军骑士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这对加速欧洲封建割据的消灭具有一定影响。

13世纪时,亚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早期封建主义蒙古帝国,在这个帝国侵略的打击下,亚洲与东欧的许多国家崩溃了。蒙古人的远征以其侵略范围之广大及可怖性震撼了全世界各个地区。"1219—1221年蒙古人侵略中亚以及哲别、速不台远征伊朗北部、高加索和东南欧(1222—1224年),对当时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在中亚、北非与欧洲的所有国家中,人们谈到13世纪20~30年代蒙古鞑靼的入侵时,把它看作当时世界上遭受到的最大灾难"。[1] 中世纪编年史家的忠实记录证实了关于蒙古人的胜利及被侵略与征服地区的人民残酷地被灭绝的消息传到欧洲国家时,引起欧洲居民恐慌的事实。其中最早的记录,当数"三喷泉"修道院的阿尔别里克所撰编年史

[1]格列科夫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52页。

中有关蒙古人的简短报导。这位编年史家将1219年迪阿密塔失陷的消息认做蒙古人中断1219—1224年远征的原因,这一点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因为当时蒙古人仍在继续远征。他还认为蒙古人的远征以大卫王或长老约翰为首,结束于1222年。诸如此类的记载证明了如下事实:欧洲对于1219—1224年河中、花剌子模的繁荣国家在成吉思汗军队的打击下崩溃时中亚发生的真实事件十分模糊。欧洲编年史家的此类报导,只不过是流传在欧洲的道听途说的关于蒙古人的传闻的反映;在欧洲,杜撰的幻想同真实的报道离奇地交错在一起。

那位"三喷泉"修道院的阿尔别里克根据目击者所说,对蒙古人的外貌描述如下:"他们头大,颈短,胸宽,手大,足小,他们有惊人的力气。他们不信宗教,他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信仰、崇拜,他们的王自称为万王之王。"[1]

13世纪最有学问的史学家之一巴黎的马修(卒于1259年)在著名的《大编年史》中记载了关于蒙古人的另一些报道,当他谈到由于1237年拔都远征欧洲引起的灾祸时,他报道说,甚至连在遥远的英吉利彼岸的每年的鲱鱼贸易都中断了,因为戈特兰岛与弗里斯兰特岛的商人害怕蒙古军队的可能出现,不敢到雅尔穆特来。这位编年史家说,鲱鱼史无前例地落价了。

从匈牙利与波希米亚逃出来的居民传来的关于蒙古侵略的消息,引起了欧洲国家统治阶级及人民群众的恐慌。

1238年亦思马因使团之来到法国与英国,也帮助了令人惊慌的消息的传播。亦思马因强大教派的首领之一,威名震慑伊斯兰教徒居民的一位近东大领主向法国国王及英王亨利三世求援,出兵抵抗蒙古军。从亦思马因使节处获得的报道中,蒙古侵略者的形象描述得极为阴森。这个报导也被巴黎的马修记载在他的编年史1240年下面:"他们(蒙古人)就像蝗虫般地沿着地面飞开来,给东方带来了可怕的破坏,用火和剑毁灭着东方。当他们通过萨拉森地面时,彻底破坏了城市,斫掉森林,摧毁堡寨,毁掉葡萄园和花园,并对市民与农民进行屠

---

[1]《鲁布鲁克东方行纪》,柔克义校订,伦敦,1900年,第13页。

杀。”(巴黎的马修:《英国史详编》)

在亦思马因使团来到欧洲后不久,蒙古人侵入东欧的可惊消息传到了法国。

众所周知,蒙古人于1235年召开宗亲大会(忽里勒台)后举行了第二次西征。当时由成吉思汗的孙子——他的长子术赤之子拔都(意为“坚强”)主持远征。成吉思汗的战友、最有将才的一员蒙古大将速不台将军担任拔都的副将。在当时说来一支人数颇大的军队从蒙古出征了,他们在数年内完成了忽里勒台(大会)上拟定的侵略计划。1236—1237年,他们占领了辽阔的钦察草原,还占领了不里阿耳、克里木与高加索。1238年开始侵略斡罗思诸公国——也烈赞、弗拉基米尔等许多城市都陷落了。1240年,乞瓦(基辅)城——乞瓦斡罗思的美丽与骄傲,被占领并遭到破坏。

蒙古军征服并破坏了斡罗思诸公国后,便入侵波兰、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连着战胜了许多企图进行抵抗的封建领主。蒙古人在里格尼茨大战中击溃西里西亚公爵军队的消息、匈牙利国王别拉四世在佩什被击溃后的求援书,以及此类报导无法不使法国和英国国王腓特烈二世皇帝与罗马教皇格里戈利九世产生恐慌。在他们之间甚至展开了某种关于组织起来抵抗蒙古人的谈判。教会也开始宣传新的十字军远征,但这次十字军远征是向蒙古人进军,而不是向萨拉森人进军了。但是谈判举行后,却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这是由于受到欧洲国家最大的统治者之间的封建内讧的阻碍所致。真不知道,如果蒙古人自己不停止1236—1242年的远征,欧洲将会成个什么样子。蒙古军蹂躏了匈牙利、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后,一直打到了亚得利亚,但这时他们突然停住了,他们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急急忙忙地退回去了。

有不少研究专门解释蒙古人中断自己的侵略及拔都统率下的蒙古军不能保住东欧被征服地区的原因。某些欧洲作家认为,蒙古人受到了骑士军的反击,他们害怕穿戴恺甲的骑士们。但我们如果仔细分析蒙古人远征欧洲的过程,就很容易了解到,骑士军曾屡次被蒙古人彻底粉碎。蒙古人的军事技术比之当时欧洲技术并不逊色。

现代大东方学家之一巴托尔德院士根据伊朗著述家及伊朗语著述家所提供的许多证据得出结论说:蒙古人突然退出东欧的原因有二,第一,在蒙古将领之间、特别是成吉思汗系宗王贵由、不里同远征首领拔都及速不台,发生了争吵;第二,窝阔台汗去世、大汗驾崩讣告的传来。[1]

无疑的,这些事实对于蒙古人具有一定意义。但是不要忘掉苏联科学院已故通讯院士 A. Ю. 雅库博夫斯基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他曾注意到如下事实,即:蒙古军在同斡罗思诸公国进行斗争时力量大为削弱。还有,在拔都西征时蒙古军队的后方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的不里阿耳人、波罗维赤人及住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其他部族曾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反抗。[2] 为了镇压起义就必须派出一部分蒙古军回到伏尔加河上去。上述所有事实,就是迫使蒙古人退出欧洲并中断使欧洲人民如此恐惧不安的远征的全部原因。

蒙古人从欧洲退走了,但对于他们的恐惧、对于可能发生的新的侵入的恐惧却依然存在着。欧洲对蒙古人统治世界的野心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人怀疑蒙古人会实现这样的企图。宣传发起对蒙古人举行十字军远征没有什么结果,虽然代替死去的格里戈利九世于 1243 年当选的新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支持这样的宣传。刚强的英诺森四世还采取了另一些措施来查明蒙古人是否在重新集合起来举行远征。在这一目的之下,他派遣传教士带着劝蒙古汗皈依基督教的正式使命到蒙古人那里去。关于亚洲有一个长老约翰或伊万教皇统治着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的流行传说,大大地助长了这种从现实可能性与蒙古的实际情况看来十分奇怪的意图。

关于长老约翰的传说显然起源于有关中央亚细亚有聂思脱里教徒的消息,这个传说在中世纪文献中流传很广。12 世纪的编年史在 1145 年下面头一次提到长老约翰;这个加强了罗马教廷想让遥远的亚洲游牧民皈依基督教的意图的传说,业已存在了 100 多年。

---

〔1〕巴托尔德撰:《拔都汗》,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699 页。

〔2〕格列科夫与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第 58~59 页。

因此,这个传教使团负有双重任务——侦察任务与传教任务。后一任务决定了传教使团的组成,传教使团的成员完全从特别杰出的传教者小兄弟会教士中挑选组成。由声望素著的小兄弟会教士普兰·迦儿宾率领下的传教使团奉使往蒙古汗处去了。两年后,又派去了以多明我会教士阿斯采林为首的另一个传教使团,但该传教使团只到达伊朗蒙古统将拜住那里。

这些传教使团的报告特别有价值,因为其中包含着欧洲国家以前很少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的国土的新的报导。普兰·迦儿宾的报导尤其值得注意。以13世纪时的若干手抄本留传至今的他的著作,不仅是蒙古史方面的有价值史料,而且也是苏联史方面的有价值史料,因为作者是斡罗思及伏尔加河地区各族人民在蒙古人侵略下家破人亡、蒙受灾难的见证人。

普兰·迦儿宾是意大利人,出生于彼鲁治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他的意大利文名字是治奥万尼·德尔·皮扬诺·迦儿宾,但是在历史文献上却采用他的名字的拉丁文形式:普兰·迦儿宾。他是小兄弟会(即方济各会)的创建人之一,并是方济各本人的密友。普兰·迦儿宾在罗马教会中据有相当显要的职位,他受教会的委托驻在德国及西班牙;因此怪不得英诺森四世选中了他。普兰·迦儿宾不是独自走上遥远的旅程的。传教使团中还包括两个小兄弟会教士:波兰人别涅迪克特与波希米亚人斯捷潘。斯捷潘只走到乞瓦斡罗思就从半路上回来了。别涅迪克特一直陪着普兰·迦儿宾到处走,但他没有写下行纪。传教使团的一位僧侣西蒙·德·圣肯廷记下了别涅迪克特在蒙古旅行的简短叙述,但他只是根据外号叫博维先生的博维人文森特的口述记下了一份简短的报导。

普兰·迦儿宾的传教使团带着英诺森四世给蒙古汗的敕命于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出发。他在两年内经历了许多地区与不同国家。对他的报告进行仔细阅读,并竭力准确地考证他所列举的名称(必须指出,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可以将普兰·迦儿宾的旅行路线大致还原过来。普兰·迦儿宾到达伏尔加河后,来到了拔都帐幕里,想

将罗马教皇的信交给这位蒙古宗王,但拔都没有收下这封写给大汗的信,而让传教使团继续远行,向蒙古进发。普兰·迦儿宾与别涅迪克特被迫完成了经过花剌子模、谢米列契与塔尔巴哈台(Тарбагатай)到中央蒙古去的漫长而劳累的旅程,他们在蒙古无意中成了大汗贵由御极这一千载难逢的有趣事件的见证人。他们在贵由的帐幕里几乎住了4个月,1246年11月13日开始返回。在归途中经过了半年,他们才从蒙古回到乞瓦,到1247年秋天,普兰·迦儿宾来到里昂,向教皇英诺森四世提呈了蒙古汗贵由的答复及自己这次旅行的详细报告。普兰·迦儿宾的这份报告系用拉丁文写成,是一册被他称作《小史》的书,留传至今有好几种版本。

普兰·迦儿宾在英诺森四世宫里住了3个月,取得了大主教的荣位,他被委派在安梯瓦里城,后来显然就在那里去世了。他去世的准确年代不知——但他的去世不会早于1248年或晚于1252年。普兰·迦儿宾完全胜任了交给他的侦察任务。他足够详细地描述了蒙古人的装备、军队以及他们作战的策略。

1247年11月曾在罗马教皇宫内见过普兰·迦儿宾的一位意大利编年史家对他作了简短的描写。他对普兰·迦儿宾描写如下:“这是一位可尊敬的、机智、有教养、擅长辞令、做各式各样事情都有才干的人;他把他在鞑靼人处及其他地方看到的精彩事情写成了一厚本书。当他被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问得厌倦时,他便向人们朗读这本书,我自己也看见并听过他多次读这本书。”[1]

普兰·迦儿宾的著作有好几种版本留传下来。早在13世纪时,此书就已一再被传抄;因为当时有教养的人们对此书一直有很浓的兴趣。其中有两种版本为作者本人所确证(一种较简略,另一种较详,作者在留传至今的13世纪的一种手抄本中说,他曾亲自允许从自己没有完全写成的著作抄出过几个副本),他写道:“因此,当有人见到这个手抄本比其他诸抄本详细、修改较多,谁也不用奇怪,因为从那时以后我

[1]达维札克:《蒙古人或鞑靼同普兰·迦儿宾同伴的关系》,巴黎,1839年,第598页。

一有空暇，就补充、修改，对不完备的部分进行润色。”[1]

虽然普兰·迦儿宾的著作在13世纪时流传很广，曾有许多转抄的手抄本，但留传至今者只有五种。其中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抄写的莱敦抄本被视为一种善本。这个手抄本被1839年普兰·迦儿宾书的法国研究者达维札克出版该书时用作底本。但是19世纪末时，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来源更早、修改更多的本子。这个手抄本曾被必兹里所利用[2]，必兹里对这个手抄本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巴黎国立图书馆也有两个普兰·迦儿宾书的手抄本，还有一个抄本藏在大英博物馆里。有名的《小史》的手抄本就限于这五个手抄本。伊尔库茨克国立日丹诺夫大学科学图书馆藏普兰·迦儿宾手抄本残叶的发现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消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M. П. 阿列克塞耶夫对发现的这些残叶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图书馆里藏有一本用皮子装帧的书，皮子里粘了一张羊皮纸，是某个与此书毫不相干的手抄本上的一页。这本书是从收藏古书颇丰的过去的伊尔库茨克宗教学校里转到大学图书馆来的。它可能是在18世纪当学校图书馆充实图书时，从波兰或西南俄罗斯得到的。

对这页用清晰的14世纪哥特体字写成的手抄本残叶经过研究后，弄清楚了这是13世纪著名编纂者博维的文森特(1264年卒)版普兰·迦儿宾书第七、八章及第九章的一部分。博维的文森特编纂过当时享有盛誉的十大卷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称作《Speculum Majoris》，即《大鉴》；分四部，即四部“鉴”(这个名称在中世纪文献上经常是对百科全书性质的各种著作汇编的统称)，每部“鉴”各附以与各部分内容相符的修饰语，即自然鉴、学鉴、道德鉴、史鉴。《史鉴》是这部百科全书的第四部，是历史著作的汇编，分4大卷。普兰·迦儿宾书就收在第四部内，但却由百科全书编者文森特重新编写过了，他改动了章节顺序，对原文稍加简缩，并补充了他从西蒙·德·圣肯廷叙述中取来的若干

[1]《达维札克书》，445页。

[2]必兹里：《前未发现的普兰·迦儿宾书抄本》，载《地学杂志》，1902年12月，第20卷，第6期，第646～647页。

细节。将文森特重写的原文同发现的残叶进行校对后,M. П. 阿列克塞耶夫确定,这是百科全书《大鉴》手抄本上的残叶。同时,值得指出的发现的残叶不是从刊本《大鉴》(印刷术发明后,《大鉴》曾在15与16世纪多次印行。前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有一部保存得极好的15世纪末威尼斯版《大鉴》)上抄写下来的,而是从手抄本上转抄的,根据M. П. 阿列克塞耶夫的意见,它的写成不会晚于14世纪,并包含了几种异文。残叶的原文不同于普兰·迦儿宾书手抄本原文。我们认为有必要将M. П. 阿列克塞耶夫发表的这些残叶的译文[1]做成相应各页上的注译,因为其中包含了对研究中亚历史地理有兴趣的异文。

普兰·迦儿宾书曾被译成多种语言。法译本(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自由译法)于16世纪时头一次发表在彼尔·别日隆有名的书《12、13、14与15世纪在亚洲进行的重大旅行》(巴黎,1634年;1723与1735年两次重版)。英译本早在16世纪时即由赫克雷特发表在他的著名的行纪汇编《主要的航行》(Principal Navigations)(1598年)中,还由彼尔基斯(Purchas)刊在他的也很著名的《行纪录》(His Pilgrims)上(1625年)。

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上早在18世纪末普兰·迦儿宾书就介绍过来了,此书的头一个俄译本是从别日隆的法文本译出的。这个译本印了两版(第一版1795年,第二版1800年),证明这本引人入胜的书是读者们爱读的。译者显然是阿列克塞·马林诺夫斯基,但他只签署了他的姓名的头一个字母。

二十多年后出现了普兰·迦儿宾书的学术性的俄译本,被收在Д. И. 雅治科夫的《鞑靼地域行纪汇刊》第一卷中。虽然这个本子问世已有125年,但是单是由于出版者把拉丁文与俄译同时发表,就使得这个本子迄今还有一定价值。此外,雅治科夫所作的注在当时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今天看来在某些方面也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Д. И. 雅治科夫拟定了出版一整套13—15世纪蒙古地域行纪的原

[1]阿列克塞耶夫:《西欧旅行家和作家报导下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1941年,第550~551页。

文及译文的庞大计划,但他只出版了头一卷,其中收辑了普兰·迦儿宾书与阿斯采林书。雅治科夫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的意义与目的有很清晰的了解。他在序言中写道:"蒙古地域行纪对研究我国历史是必需的。"[1]雅治科夫本的缺点为:他对普兰·迦儿宾书的各章作了重新配置,并加进了博维的文森特在重写时插入的西蒙·德·圣肯廷的叙述。

亚·犹.马列英完成了他在1911年刊印的从拉丁文译出的最好的俄译本。这个译本出自精通拉丁文的专家之手,直到如今仍没有失掉它的意义。

普兰·迦儿宾书不只是专家们的财产,在一些普及的出版物中也谈到它;在我国近年出版的书籍、文章中,我们可以指出A.舍尔乌德的《昔时去中国的道路》一书的译本(莫斯科,1931年)与M.阿达莫维奇在《祖国》杂志(1940年第10期)上发表的文章。

在汗牛充栋的普兰·迦儿宾书外文版本中,达维札克在1839年完成的原文及译文合刊的法文本[2]和必兹里在1903年完成的英文本[3]是值得注意的。

必兹里对普兰·迦儿宾书的所有抄本及初刊本原文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并补充了有价值的评注。还须指出A.万澄芬加尔于1929年出版的本子,[4]该书收集了从普兰·迦儿宾开始的10种东方行纪。

不要以为普兰·迦儿宾书的版本只有这几种。新的本子出得不少,但是根本不是所有的本子都值得一提,因为与旧本相比缺乏新东西,又往往不顾新的研究,把过了时的注释重复不已。例如,腓特烈·里什博士于1930年所出的德文本就是这样。[5] 他加了许多注,但遗憾的是,他所根据的材料很多已经失掉了价值。在现代,当历史科学与

---

[1]《鞑靼及东方其他各族地域行纪汇刊》,卷1,圣彼得堡,1825年,第9页。

[2]达维札克:《蒙古人或鞑靼同普兰·迦儿宾同伴的关系》,巴黎,1839年(《地理学会刊布的旅行记及回忆录汇刊》,第4卷,第2册)。

[3]必兹里:《普兰·迦儿宾及威廉·鲁布鲁克书原文及译文》,伦敦,1903年。

[4]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Jirenze. 1929 (Siniča Franciscana, Vol I).

[5]里什:《普兰·迦儿宾〈蒙古史及1245—1747年旅行记〉》,莱比锡,1930年。

东方学突飞猛进,许多东方语的新史料发掘出来得到研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研究时,每版普兰·迦儿宾行纪必须利用上对早就知道的正文能更好地进行注释的最近的学术成就。从这个观点看来,里什的著作不值一评。

不久前出版的《出使蒙古记》中所收的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行纪的最近的译本,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言。此书系克里斯托非尔·道森所编,1955年出版于英国,是新译的普兰·迦儿宾、鲁布鲁克、蒙帖·科尔维诺、波兰人别涅迪克特、彼鲁支人安德烈的行纪的汇编。在这个汇编中还附有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两道敕命的译文,以及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书的译文。从拉丁文译出的译文是由斯坦布鲁克修道院的一个女修道士译成的,但是她的名字不论在扉页或序言中都没有提到。这本新书的唯一价值是将这些行纪收集到了一起。此书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只作了最低限度的注释,并且有许多条重复了柔克义的材料。K.道森的序文首先谈到了13世纪与14世纪的东西关系史,其次又谈到了当时在蒙古人中间进行的基督教宣传。不论是序文也好,新的译文也好,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它们无法同柔克义书、必兹里本以及马列英译本相比。但此书的出版证明广大外国读者对精彩的古代旅行记具有一定兴趣。

从普兰·迦儿宾书产生了不少专门解释他所使用的名词或阐明书中晦涩之处的论文。在喀山大学教授蒙古语、后来又在彼得格勒大学教授蒙古语的布里雅特喇嘛学者加尔山·贡布耶夫的著作特别重要。加尔山·贡布耶夫(1820—1863年)是非常熟悉蒙古人生活的专家。他所写的《论普兰·迦儿宾所描写的古代蒙古人的风俗和迷信》,[1]直到今天还没有失掉价值。

还须指出卓越的法国汉学家与蒙古学家伯希和篇幅不大、但十分有价值的著作《蒙古人与教廷》,此书第一章讨论了由普兰·迦儿宾带给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书信。此信曾被认为已经丢失,关于此信只能从若干片

[1]《帝国(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859年,第7册,第236~256页;还可参阅《亚洲丛刊》所载《评普兰·迦儿宾行纪》一文,1856年,第2本,第650~666页。

言只语及13世纪中世纪作家亚当·萨利姆宾的《编年史》上保存下来的拉丁语译文中获知。但是在1920年,信的波斯文原本在梵蒂冈圣安格尔堡档案库中发现。伯希和书对此信进行了研究。在伯希和的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有关普兰·迦儿宾《蒙古人的历史》的有价值评语。

……[俄译本原序中有关鲁布鲁克《行纪》的文字,从略。]

亚历山大·犹斯廷诺维奇·马列英(1869—1938年)是学识渊博的拉丁语专家,对中世纪拉丁文献极为精通。马列英从彼得堡历史哲学学院毕业后,在该学院任教将近30年。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罗马诗人马尔采亚尔;博士论文研究中世纪作家英国主教阿尔德格尔姆著作中所包含的难解的原文。在历史哲学学院任教的同时,马列英还在圣彼得堡大学讲课,并在科学院图书学会从事活跃的学术活动。十月革命后,马列英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教授及苏联科学院书籍、文札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马列英从事并实现了外国旅行家的俄罗斯行纪译注本的出版工作,对苏联各族人民历史的研究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出版过约翰·戈特里布·科尔布的日记《莫斯科行纪》(圣彼得堡,1906年)、西吉兹蒙德·格尔别什金的《莫斯科见闻录》、巴甫诺维·诺沃科姆斯基的《关于莫斯科使节团之书》(圣彼得堡,1908年)及现今再版的普兰·迦儿宾《蒙古人的历史》、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圣彼得堡,1911年)等书的优秀译本。其中,鲁布鲁克行纪是初次译为俄文,其余诸书是在仔细研究上述诸书抄本原文基础上重新译出的。当时,这些书的出版真是马列英对所有俄罗斯历史研究者作出的难能可贵的贡献。由于马列英精通中世纪拉丁文的精微之处,遂使他的译文达到了高度的准确性,而他的科学认真态度使我们永远可以信赖他的译笔。[1]

马列英的学术遗产包括近300种付印的著作。[2]

---

〔1〕参阅《马列英讣闻》,载《古代史通报》1938年第4期,第270页。

〔2〕马列英的不完全的著作表曾屡次发表。其中以《Sertum Bibliologicum(图书学花环)》(彼得堡,国家图书出版社,1922年)所收的表为最好。这册以华丽的拉丁文《图书学花环》为名的书是为纪念马列英学术活动30周年而出版的,是马列英的学生及图书学会的同事们献给他的纪念品。

本版完全据1911年圣彼得堡苏沃林版普兰·迦儿宾《蒙古人的历史》及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马列英译本翻印，并保留了受拉丁文原文所决定的人名及专有名词的拼写特点。例如，在译本中行纪作者的名字采用拉丁文形式。从马列英发表其译本起，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在这些年内，蒙古学取得了巨大成就，马列英的注释有许多需要修改与补充。我们根据东方学大家关于鲁布鲁克及普兰·迦儿宾行纪的著作，竭力补充了一些新的论述。在伯希和、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中包含有特别多关于最早的欧洲旅行家所提供材料的有益见解。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的记载被许多研究古俄罗斯、花剌子模、钦察草原及这些中世纪旅行家路过的其他地方的苏联史学家的著作所利用。我们竭力用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托尔斯托夫、阿尔塔莫诺夫、纳索诺夫、吉谢列夫等的最新研究资料来进行补注。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6—1951年出版的拉施特丁《史集》第一卷及第三卷新版本也十分有用。

本版的插图复制了有关蒙古人的古代（13—17世纪）东方绘画与小型工笔画。部分插图的来源较晚，是18世纪法国专家所绘、彼尔·别日隆著名的《12、13、14与15世纪在亚洲进行的重大旅行》第三版上的插图。这些画距实际情况相当远，但作为根据18世纪的法国人对蒙古人与蒙古的观念进行绘画的尝试却是有趣的。必须指出，按照绘画的性质及书法，这些插图在某种程度上与东方学家所熟悉的18世纪刻于巴黎的耶稣会画家的绘画相似。

本版所附地图基本上按照卡津所制、刊于格烈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1950年版）上的地图复制而成。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的旅行路线根据柔克义的材料画出，但据最新资料略有变动。

H. 沙斯契娜

22.2 引言

现在开始讲被我们称为鞑靼[1]的蒙古人[2]的历史：

约翰·德·普兰·迦儿宾，小兄弟会教士，[3]教廷的教皇使节[4]，奉使鞑靼及其他东方人民的使者，[祝]一切读到此书、信仰基督教义之人，获得今世神恩，未来荣耀，战胜上帝与我主耶稣基督的敌人。

致意已毕，引言开始：

(1)当我们奉教廷之命到鞑靼及其他东方人民那里去，并获悉了教皇陛下及尊贵的红衣主教们的意向后，便事先选择了到鞑靼人那里去的旅途。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很快就会威胁到上帝的教会。虽然我们担心鞑靼人与其他族人民会杀死我们，或使我们永远成为俘虏，挨饿、挨渴、挨冻、受酷热、遭遇到过分的凌辱与劳苦，并据人说，会受到异乎寻常的磨难（除了死与永久成为俘虏外，我们后来确乎经历了多次比我们过去所能想像的严重得多的所有这些磨难），但为了能够按照教皇陛下的托付执行上帝的意志，为基督教徒谋福利，至少我们在获知了鞑靼人的真正愿望与意图后，就有可能告诉给基督教徒们，以使鞑靼人的偶然与突然的袭击不至于像由于人类的罪恶所发生的灾祸那样地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他们头上，也不至于使基督教人民造成大的

---

[1]鞑靼：这是通用于俄罗斯史籍与西欧文献中的蒙古人的名称，虽然事实上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蒙古诸部落中游牧于捕鱼儿海子（贝尔湖）与怯绿连（克鲁伦）河流域的一个蒙古部的名称。在中国编年史中作鞑靼（塔塔儿）。中国人还用这个名称作为住在中国东北北部与东蒙古地区的所有游牧民的总称。靠着哈剌契丹，这一名称得以西传。后来，它在金帐汗国中保留了下来，金帐汗国崩溃后又被使用在构成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与克里木汗国的民族身上。

"鞑靼"这个名称的语源，迄今还没有搞清楚。

[2]mongal：达维札克、必兹利、柔克义与马列英都正确地认为这是普兰·迦儿宾所采用的"蒙古"(mongol)这个名称的斯拉夫语形态，并解释为：普兰·迦儿宾在其波兰译员别涅迪克特及斡罗思译员的影响下采用了这个词。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为止，在17世纪与18世纪前叶的档案记载中，俄语"蒙古"均作mungal或mugal。在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上，通常把蒙古称作鞑靼。必须指出，还有一个比现代的"mongol"一词更古老的蒙语"mogal"一词；保留于今天的阿富汗蒙古人的"mogol"一词中。可以设想，普兰·迦儿宾所采用的词源出于这个古蒙古语。

[3]天主教会，是方济各会（小兄弟会）的一个分支。

[4]基督教会罗马教皇的全权使臣称作教皇使节。在较远的国家中，教皇使节行使副主教的职权，可管理该地区教会的一切事务。

流血，由于这样，我们对于自己也就无所顾惜了。

（2）因此，我们为你们的利益和防患于未然所写的一切，你们应放心相信，因为我们在他们那里和他们一起旅行了一年又4个月，并居留在他们中间，这一切或为我们所亲眼看到，或为我们从被他们所俘并为我们所认为值得信任的基督教徒那里所听得。正因为我们受了教皇的托付，我们对所有的事都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仔细地观察了每一个细节。小心翼翼地执行这一使命的人，除去我们外，还有同会教士别涅迪克特，他是我们的难友和翻译。

（3）但若我们向读者报道了一些你们国内所不知悉的事，你们不应该因此认为我们说假话，我们告诉你们的事，全是亲眼看到的或从十分可靠的人那里听到的。反之，如果有人做了好事，却遭到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耻辱，那就未免太残酷了。

本书各章中的内容：

我们在写有关鞑靼人的事情时，为便于读者了解起见，写成如下数章：第一章讲他们的土地；第二章——人民；第三章——风俗；第四章——习惯；第五章——鞑靼强国；第六章——战争；第七章——受他们统治的国家；第八章——怎样与他们作战；最后一章——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皇帝的宫廷及曾在鞑靼国中见到我们的见证人。

22.3 鞑靼地域的位置，土地的性质，气候（第一章）

关于他们的土地，我们预定为如下内容：首先，我们谈地理位置，其次谈土地性质，次之谈气候。

22.3.1 地理位置

鞑靼地域位于东方与北方交界部分。东面是中国人及肃良合人[1]

[1]肃良合：蒙古语 Solongghos——高丽人。中世纪伊朗作家使用这个名词时泛指中国东北东部的居民与朝鲜的居民。

的土地，南面是萨拉森人[1]的土地，西南为畏吾儿人[2]的土地，西为乃蛮地区[3]，鞑靼地域的北面则环绕着海洋。在某些部分多高山峻岭，而另一部分则为平原，几乎全部土地遍布石砾，土壤很少，大部分地方是沙漠。

22.3.2 论土地的性质

在部分土地上覆盖有不大的森林，其余土地上则完全没有树木。皇帝、大臣及所有其他的人都坐在燃牛粪、马粪的火堆旁[取暖]、煮食。可种植的土地甚至不及百分之一，倘若不用河水灌溉，甚至连这些土地也不会有收成。但水和溪流本很少，河流又不多，因此这里没有村

---

〔1〕萨拉森：最初古代作家用这个名称称呼住在阿拉伯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这个名称推广应用于所有阿拉伯部落，到了十字军东征时代则被用于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民。其字源所出不详。

〔2〕畏吾儿（维吾尔）人，这是居住在杭爱、阿尔泰两山之间的突厥族人民。8—9世纪的回鹘国后为叶尼塞河上的黠戛斯人所灭。回鹘人被黠戛斯人击溃后，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突厥斯坦，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别失八里（其废墟在古城附近）为首都的汗国。畏吾儿汗国的首领，是戴有亦都护称号的统治者。"维吾尔"，这个称号迄今未获完满解释。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见解（参阅《道尔济·班札罗夫文集》，莫斯科，1955年，第180～186页；布达戈夫：《突厥—鞑靼方言比较辞典》第一部），"维吾尔"这个词源出于蒙古语"维"（意即森林）与"吾尔"（意即人民），是"森林民"的意思。但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假设经受不起批评，因为这里忽略了蒙古语发音学规则。维吾尔这个名称很古。关于维吾尔人起源的种种细节与理论可参阅布列什奈德：《中古史研究》，卷1，第236～263页；拉德洛夫：《维吾尔人问题》，圣彼得堡，1893年。畏吾儿人是文化相当发达的人民，具有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自己的文字。蒙古人的文字就是从畏吾儿人处借用来的。聂思脱里教在畏吾儿人中间很流行。

〔3〕乃蛮：最大的蒙古部落之一，在杭爱与阿尔泰山脉之间、黑额尔齐斯与齐桑湖流域的广大领域上游牧。乃蛮的统治者为太阳汗，于1204年为成吉思汗所征服。"乃蛮"这个名称表示"八"。可以推想，在某一时期乃蛮由八个部落或氏族组成，合八部或八族而成乃蛮部。在蒙古人处可遇到类似的部落数目称号。乃蛮人是蒙古诸部中文化最高的部落。他们头一个袭用了畏吾儿文，使之适应于蒙古语。由于与东突厥斯坦邻接，乃蛮人也利用了其他文化成就。乃蛮人的阶级分化已达相当程度，乃蛮贵族控制了其余游牧居民的大部分人。拉施特丁：《史集》上有关于乃蛮人的有兴趣的记载（卷1，第1册，第135～140页，列宁格勒，1952年）

落，也没有城市，只有那座十分出名的称作哈剌和林[1]的城市是唯一例外，但我们没见到这座城市，我们只到过他们的皇帝的主要行宫昔剌斡耳朵，[2]那里离那座城市大约有半天的路程。虽然土地贫瘠，但对于牧畜，即使不是特别适宜，倒也还适宜。

22.3.3 气候[3]

这里气候异常。夏天，当别的地方炎热非常时，这里有剧烈的雷电，许多人常被雷电击死。同时就在夏天这里也常下雪。这个地方还

---

〔1〕原文 karakaron，即蒙古帝国的京城 karakorum（哈剌和林），位于鄂尔浑河流域。karakorum 是蒙古语"khorum"的突厥语形态，在蒙文资料中仅于城墟的铭刻上见过一次。汉语名称为和林。根据哈剌和林废墟中的汉蒙文题铭以及汉文编年史上的记载，哈剌和林为成吉思汗于1220年所建（伯希和：《哈剌和林札记》，载《亚洲报》206卷，1925年第372页）。窝阔台时代，哈剌和林进行了巨大的改修与兴建（1235年），建起了一座壮丽的汗宫，全城围筑了城墙。因此蒙古学文献中常常不正确地断言窝阔台为哈剌和林的奠基者，其实，窝阔台只对城市进行了改建。后来哈剌和林屡经重建。例如，1256年蒙哥汗降旨兴建长300步的五层大佛塔，这座塔附有寺院，寺内有许多大佛殿。这些附建的寺院于1311年进行了修建，1342年哈剌和林又进行了一次历时4年的重建，重建完毕后立了一座刻有汉蒙文铭题的石碑，石碑上对于蒙古故都的历史作了简略的叙述，见柯立甫（Cleaves）：《1346年的汉蒙文碑铭》，《哈佛亚洲学报》，卷15，1952年，第1～2期，第1～123页。威廉·鲁布鲁克对哈剌和林作了最详尽的描述，他于城的全盛时期访问了这座城。忽必烈即位后将国都迁到了中国境内，哈剌和林的意义遂大为降低。哈剌和林于元代成为行省首府，其长官通常是汗位的继承者。元亡后，由于中国明朝皇帝与蒙古汗们进行战争的结果，1380年哈剌和林为中国军队所毁。200年后，在哈剌和林遗址附近建起了一座有名的额尔德尼佛寺。

蒙古古代首都地点的确定及其遗址的发现，于1889年为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所完成。遗址发现后，在著名突厥学家拉德洛夫领导下的第一个科学院考古调查团来到了蒙古。考古调查团对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并第一次画下了哈剌和林的图样。经多年中断后，苏蒙学者又顺利地进行了废墟的考古研究。1947—1949年，在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吉谢列夫领导下的一个专门的考古调查团对遗址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发现了窝阔台宫廷的遗址，发现了许多上釉器物的样品，制作这些釉器的作坊也被发现了。对哈剌和林手工业区进行研究的结果发现了那里过去的锻铁和铁加工作坊。如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继续对古代蒙古首都的遗址进行着研究。

〔2〕昔剌斡耳朵，蒙语作"Sira－Ordu"，是黄帐或黄宫的意思。已经知道，除哈剌和林外，蒙古大汗们还有一些夏令驻牧的行宫，这些行宫名为昔剌斡耳朵，阿勒坛斡耳朵。其中一座，可能就是昔剌斡耳朵，曾被普兰·迦儿宾访问过，位于额德尔河流域。这所行宫的遗址今天已被蒙古科学委员会工作人员纳姆难多尔济发现。在废址上发现了刻有两种文字的题铭的石碑，题铭日期为1256年。根据对题铭所作的初步解释，这座石碑是蒙哥汗的驸马巴儿思·秃黑为他立的。石碑上的题铭是蒙古文的最早样本之一。

〔3〕在这一节中普兰·迦儿宾对蒙古的气候特征作了十分清晰的描述。普兰·迦儿宾说，那里有时猛下雹子，雹子融化时造成许多人的死亡，这一情况与事实相去不远。在蒙古可看到类似的现象，当地有时由于山里盛下雨雪，山洪暴发，洪水沿路冲下来，就把牲口冲走了。

常有强烈的暴风雨,冷风卷刮着,人们几乎难以骑马前进。因此,当我们在斡耳朵(他们把皇帝及大臣们的帐营称作斡耳朵)里时,狂风卷地,飞沙猛袭,连眼也睁不开。这里冬天从来不下雨,夏天常常下雨,但每次下得很少,仅足以湿润一下尘土及草根。这里也常下很大的雹子。就在推举皇帝即位的那一次(那时我们也在宫里),降下了巨雹,由于雹子突然融化,据我们所确实知道的,有160多人淹死在宫中,财产、帐幕被冲掉的更多。这里夏天常突然酷热非常,又常有突如其来的严寒。冬天,有些地方下大雪,另有些地方积雪很浅。

要让我们对这个地区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个地区很大,但根据我们亲眼所见(因为我们在这里到处周游,历时五个半月之久),它在许多方面比我们所能讲的还要糟得多。

22.4 形貌,婚嫁,服装,住所与他们的产业(第二章)

谈完了土地,现在来谈人民:首先,我们来描写一下他们的形貌,其次谈婚嫁,次之谈服装,次之谈住所,次之谈他们的产业。

22.4.1 形貌

形貌与所有其他族人民不同。二目之间与面颊之间比其他族人民阔,颧骨隆起;鼻低平且不大,眼小,睫毛与眉相连。除少数人外,他们一般而言腰都很窄,个儿几乎都不高,胡须几乎都长得不多,但有些人终究在上唇及须部有些须毛,且从不剪掉。他们头顶上的发留得跟僧侣一样,在囟门上剪掉一圈,所有的人在两耳之间全都剃去三指之宽,剃去的这块地方与上述头顶上剪掉一圈处相连,前额也同样地剃去二指的宽度,头顶上剪掉一圈处与上述剃去处之间的头发留着长到眉毛处,而额的两侧剪去大半,留下长发;其余的头发像妇女一般地全

都留着长起。他们用这些头发编成两根辫子,垂在耳边。[1] 他们的腿也不长。

22.4.2 婚娶

每人娶妻数目,视其赡养能力而异:有人娶妻100,有人娶50,有人娶10,多少不定。他们可婚娶除母亲、女儿及同母所生的姊妹而外的任何亲属。可娶父亲所生的异母姊妹,父亲死后也可娶父亲的妻妾。兄死之后,其弟或同族之弟甚至必须娶其嫂。此外,他们可不加任何区别地娶一切妇女为妻,从女方的双亲处以重金将她们买来。丈夫死后,妻子难得再嫁,除非有人愿娶其后母为妻。

22.4.3 服装

男、女服装缝制成一个式样。他们没有斗篷、帽、毡帽与皮袄。他们所穿的男长衣用布卡兰、[2]普普尔[3]或巴达金,[4]按如下方式缝制而成。从上到下裁开,交叠于前胸;左侧扣一个扣子,右侧有3个扣子,左侧裁开到袖处。短皮袄,不管哪一种都用同样方法缝制成,外袄上的毛露在外面,从背后开口,皮袄下端拖出一块至膝盖处。已嫁的妇女穿一种宽长衣,长衣正前面直拖到地。她们头戴一种圆形冠饰,[5]用树枝或树皮制成,有一肘长,冠顶作四角形,这种冠饰自下往上渐宽,在上部插有一根细长的用金银、木条或羽毛制成的枝条;冠饰与一直拖到肩部的帽儿缝在一起。帽儿与冠饰都覆以布卡兰、普普尔、巴达金。她们没有戴上这种冠饰,决不出现在人前,因此只要根据这种冠饰就能

---

[1]普兰·迦儿宾这里所描述的男子的发式是很确切的。这一点为14世纪替元朝皇帝绘像的画家们所证实。束发的位置从妥懽贴睦尔的像上看得相当清晰。

[2]布卡兰:据裘坎日(《拉丁语详解辞典》)的解释,此即细麻,即法语 bougran(马列英注)。这个词的准确的意义尚未确定。但波梯叶认为,这是一种毛织物,而不是麻。

[3]普普尔:一种染以紫红色特殊染料的贵重织物。这种染料是从一种特殊的蜗牛里提取出来的,价很高,用来染贵重的服装、长袍。

[4]巴达金:据裘坎日在同书中解释说,这是一种用金丝与丝线织成的有花纹的贵重织物。这个词从中世纪时巴比伦的名称巴达克传来。参照法语 baudequin(马列英注)。

[5]普兰·迦儿宾详细而确切地描述了妇女头上戴的名为孛黑塔的饰物。这种饰物见诸元朝皇后的像上。像的原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曾由蒙文出版社翻印过。像用现实主义风格绘制而成,准确地记录了元朝的发式与服装(参阅田清波:《关于几幅蒙古皇帝像》,《大亚细亚》第4卷,1927年)。

辨认他们的妇女。少女或青年妇女很难与男子区别开,因为她们穿得完全与男子一样。他们所戴的小帽与别族人民不同;关于那种小帽的式样,我说不上来。

22.4.4 住房

他们那里的帐幕作圆形,[1]跟帐篷相似,用树枝与细木条搭成。帐幕中央有圆天窗,可让阳光射入,或作烟的出口,因为帐幕中央常有火堆。四壁与幕顶用毛毡覆盖,门也用毛毡制成。按照人的高贵、贫贱不等,有的帐幕很大,有的却较小。有的可以很快地拆卸下来驮在牲畜上搬走,有的却不能拆卸,需载在车上搬走。小的帐幕用车搬运时,只消一头牛就够了,大的按照车的大小不等需用三四头牛,或更多的牛。他们不论到哪里去,不论是上战场或迁居,都随身携带着帐幕。

22.4.5 产业

他们富有各种牲畜:骆驼、乳牛、绵羊、山羊与马。据我看来: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他们那样多的驮用牲口;猪及其他动物则根本没有。

22.5 宗教,他们认为有罪的事,占卜、祓除式与葬仪(第三章)

谈完了人民,现在来谈他们的仪式,内容预定如下:首先谈宗教,其次谈他们所认为有罪的事,次之谈占卜与祓除式,次之谈葬仪。

---

[1]普兰·迦儿宾将蒙古包称作帐幕,他在这里详细地描写了为后来弃而不用的那种装在特种敞车上搬运的不能拆卸的蒙古包。蒙古包的结构,在改造为轻便的能拆卸的形式之前,曾经过一系列改变,普兰·迦儿宾所描述的那种蒙古包便是改变中的形式之一。根据他的描述,18世纪一位不知名的画家想将不可拆卸的蒙古包画出来,但显然画得距实际相当远。这位画家的画做了普兰·迦儿宾《蒙古人的历史》的插图,收于贝热隆著名的《12、13、14、15世纪在亚洲进行的重大旅行》第1卷[1735年]中。勒拿河上有一些粗陋地画有不可拆卸的蒙古包的图画也提供了很大兴趣。这些图画的发现者与研究者是奥克拉德尼科夫,见其《关于蒙古人出现于贝加尔湖沿岸问题》一文。

22.5.1 鞑靼人的宗教

(1)他们信仰唯一的神,[1]神被认为是一切可见与不可见物的创造者,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祸福的主宰者,但他们不用祈祷、祝颂或任何仪式对神表示尊崇。他们那里照着人的模样用毛毡制成偶像,[2]他们将偶像摆在帐幕门的两边,并用毛毡制成乳房的样子插在偶像上,他们将这种偶像看做畜群的保护者,能使他们多获奶类、牲畜旺盛。另一种用丝织物做成的偶像,受到他们的极端崇拜,有些人将这种偶像放在帐幕门外漂亮的有棚大车上,倘若有人从大车里偷走了些什么,他们将毫不怜悯地杀死他。而当他们想制作偶像时,住在这些帐幕内的所有的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虔诚地动手来做,在制作时将一头羊宰来吃了,羊骨用火烧掉。当有孩子生病时,他们用上述方法制一偶像,挂在床头。在首领、千户长、百户长的帐幕中央常有一只山羊形状的偶像。供奉上述偶像最常用的是各种牲畜(普通牲畜或驮用牲畜)的乳。当他们开始饮食之前,每次都要将一部分饮食拿去供奉偶像。每次,他们屠宰了兽类后,就将它们的心脏盛在碟子里供奉大车上的偶像。到次日早晨,他们才将心取走煮吃。

(2)首先,他们还为头一个皇帝(指成吉思汗——中译者注)立一

---

[1]普兰·迦儿宾与另一些中世纪作家(鲁布鲁克、马可波罗、阿美尼亚的海顿、拉施特丁、志费尼等)都认为,蒙古人具有唯一的神,在他们那里腾格里神或天跟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这个词一样地受到尊敬。事实上,蒙古人于13世纪时是萨满教徒,在腾格里的名义下将天当作自然的一部分来尊敬。1240年的蒙古编年史《蒙古秘史》屡次提到了"长生青天";业经保存下来的13—14世纪题铭资料中总是用"Möngke küke tengri-iin kücün-dür"(长生青天气力里)开头。影响人类命运的那种力量与作用也被认为属于天所有。蒙古人对天的崇拜与"腾格里"这个名词的意义在道·班札罗夫的著作《蒙古人的黑教或萨满教》中获得了很好的阐明与分析。还可参阅鲁绵采夫:《论道尔济·班札罗夫撰〈蒙古人的黑教或萨满教〉》一文。作者在文中对班札罗夫的观念进行了分析。

[2]蒙古萨满教徒不仅尊崇天、地、火,还尊崇许多其他的次级神,其中包括地方、山河的守护神,牲畜的保护神等。蒙古人所尊崇的这些神中,有些神像用毡子粗糙地制成人的模样,或更简单地用动物毛皮做成。他们十分尊崇"咱牙哈赤",即幸福、命运的守护神。这座像被供在帐幕中受尊敬的地位上。门旁供着"额蔑格勒只"——牲畜保护神,神像用山羊皮制成。蒙古人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神,在萨满教徒中间对于这些神的崇拜,一直保持到20世纪。

关于各种神的萨满教崇拜,有着大量论著,如:道·班札罗夫:《黑教》;贡布耶夫:《普兰·迦儿宾所描写的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与迷信》;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席列宁:《西伯利亚的翁衮崇拜》、《西伯利亚萨满教观念形态》,等等。

偶像，他们虔诚地将此偶像立在大帐幕前的大车上，这样的偶像我们在当今皇帝的行宫前就曾看到过，人们将许多敬物献给它。作为献礼的马，[1]一直到死掉为止，任何人也不敢骑乘。也常献以其他动物。这些动物若宰来吃时，必须让一根骨头也不毁坏，用火烧掉。中午时，他们像拜神那样地拜它，并叫屈服于他们的各国贵人们也来拜。因此，不久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斡罗思的一位大公米海尔，[2]前来觐见拔都时，[3]他们先叫他从两个火堆中间通过，又告诉他，要他在中午时向成吉思汗像下拜。他回答说，他愿向拔都甚至他的奴隶下拜，但不向亡人的像下拜，因为基督教徒不能这样做。几次令他下拜，他都不愿，拔都就让雅罗斯拉夫之子转告他说，若不下拜，就要杀死他。他回答说，宁死也不做他所不该做的事。拔都就派了一名力士，对准他的心口、腹部踢去，一直把他踢死。当时有他的一个武士在场，从旁鼓励他说："坚强一些，你不会受多久痛苦的，永恒的快乐马上就要到来。"人们斩了他的头，也斩了那武士的头。

(3)此外，他们也虔诚地崇拜太阳、月亮和火，还有水和土地，每天，主要是在早晨饮食以前，向它们献一点食物和饮料。由于他们不遵

---

〔1〕这个习惯在蒙古人那里保持得很久。献给翁衮的马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即翁衮·抹邻，马鬣上连了一长段织物，这种马禁止人们乘骑。

〔2〕普兰·迦儿宾所述的情况，在斡罗思编年史上有记载，这是1246年斡罗思王公契尔尼戈夫的米海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及其大臣菲奥多尔在拔都汗帐幕中所发生的事件，由于他们拒绝从两个火堆中间通过，结果丧了命。这一事件屡见于斡罗思编年史上。《伊帕齐耶夫编年史》(1871年版)1250年下写道："契尔尼戈夫的米海尔不向矮树林下拜，与其大臣菲奥多尔同在刀下丧命。"还有一本专写这一事件的书《殉教的圣者契尔尼戈夫的米海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大公及其大臣殉难纪》中写到，米海尔大公后来被尊为圣者，他的神龛在莫斯科阿尔罕格尔大教堂里。

普兰·迦儿宾显然是从斡罗思人处获得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的，因为他与契尔尼戈夫王公的斡罗思使臣一起从蒙古到拔都汗的斡耳朵来时，几乎已是米海尔被处死8个月以后，米海尔是在1246年11月20日被处死的。

〔3〕拔都(1208—1256年)：是术赤的次子，成吉思汗之孙。他曾担任远征东南欧的统帅。他的军队于1240年占领乞瓦(基辅)，征服了斡罗思诸公国。接着又向波兰、匈牙利、达尔马提亚进军，但他无法占据这些国家，因为斡罗思诸公国仍在他的军队的后方，对他们进行扰乱，在长期斗争中削弱了他们。同时在伏尔加河有不里阿耳人的起义，在南方有波罗维赤人起义。因此，拔都在接到大汗窝阔台的讣告后，便中断西征，回到了蒙古。取得了父亲术赤的土地作为封地后，拔都建立了被称为金帐汗国的蒙古新国家，汗国的都城是伏尔加河下游的撒莱城。拔都在蒙古诸王中声望很高，他在推举大汗时起着重大作用，他曾积极地参与了1251年政变，当时拖雷系在他的支持下抬头，蒙哥当了第四代大汗。

守任何宗教法规,所以据我们所知他们也不强迫任何人放弃自己的信仰与法规;上述米海尔却是个例外。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往后会怎样做,有人推测说,如果鞑靼独揽了大权——但愿上帝不让事情成为这样吧——他们就要迫使所有的人向这座偶像下拜。前不久当我们还在他们那里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斡罗思契尔尼戈夫王公[1]安德烈被控于拔都,说他牵走了鞑靼人的马,转卖到了别的地方,虽然这件事没被证实,他还是被杀死了。他的弟弟知道后,同死者的妻子一起来见拔都,想求他不要夺去他们的土地。拔都让他娶他哥哥的妻子为妻,并让女的按照鞑靼习惯以他为夫。他回答说,要他干非礼的事,他宁可被杀死。可是拔都硬把她配给他,虽然二人竭力拒绝,但人们却把他们二人带到床上,把又哭又叫的少年推到她的身上,强迫他们做了名符其实的夫妻。

22.5.2 他们认为有罪的事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关于公正行为或防止罪恶的法律,但是他们仍有由他们的先人及他们自己所臆想出来的被称为罪恶之事的某些传说。将刀子刺入火中,或用任何方式以刀子触及火,[2]以及用刀子从锅中取肉,或用斧子在火旁边劈斫,都被认为有罪,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斫"火"的脑袋;倚靠在赶马用的鞭子(他们不使用马刺)上,用鞭子触及箭,捕捉、虐杀幼雀,用马勒打马,用一块骨头敲碎另一块骨头,也都有罪,将奶类或其他饮料倾在地上,在帐幕里撒尿,也有罪,谁若故意这样做,就要被杀死;若有情可原,则必须向巫师缴纳许多钱,让他来为

---

〔1〕"在一册编年史(《卡拉姆津书》卷4,注62)中,于1245年下提到了安德烈·姆斯捷斯拉维奇被拔都所害;他就是普兰·迦儿宾所说的契尔尼戈夫王公。"——索洛维耶夫:《俄罗斯史》,第一册,第876页(马列英注)。

〔2〕普兰·迦儿宾相当确切地描写了与蒙古人敬火有关的禁忌。火的崇拜一般而言起源很古,它以各种形态存在于所有各族人民中间,这是与原始人获得了火并经常在经济生活中使用火相联系着的。蒙古人尊崇火的精灵"斡惕",怕对它有所渎犯,遂订出了普兰·迦儿宾所说的一系列禁忌。这些禁忌有许多条直到近年还存在于蒙古人中间:例如,不得将不净之物抛入火中,不得将痰吐入火中,不得跨过火堆等。成吉思汗扎撒中专门载有一条有关渎火的禁条,违者处死。

他们涤罪,并使帐幕和帐幕中所有之物从两个火堆之间通过,[1]在为帐幕进行祓除之前,谁也不敢入内取任何东西;如果有东西鲠在某人喉里,他若不能咽下或吐出它,这个人就有罪,人们就在帐幕上挖一个孔,将他拉出杀死,决不宽恕;谁若践踏首领帐幕的门槛,也有罪,可用同样方法杀死他。他们那里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规矩,说起来话就长了。但是,杀人、侵犯他人的土地及使用其他一切不正当手段掠夺财产、甘心坠落、欺凌他人、不顾上帝的禁令戒律胡作非为,却绝不被认为有罪。他们对永生与永久裁判全然不知;但却相信,死后生活在另一世界中时,将倍增自己的畜群,吃、喝,及做现世中人们所做的其他事情。

22.5.3 占卜与祓除式

(1)他们对根据鸟的飞行及动物的内脏进行占卜以及魔法、巫术之类,极为倾心。当恶魔回答他们时,他们就相信这是神在向他们说

---

〔1〕我国编年史上关于用火祓除不祥的记载如下:"汗与拔都还有如下习惯:当有人欲觐见时,他并不下令将那人领来觐见;他吩咐巫师领着通过火间,向矮树丛、火及偶像行拜礼;又从献给王的全部礼物中取一部分投入火中,礼物拿走后才被容许去觐见王。"(《罗斯托夫编年史》,见《卡拉姆津书》,卷4,注41)。"……命巫师置两火堆,领着全体斡罗思王公及贵族们通过火堆;向矮树丛、偶像、火行拜礼;带给皇帝的礼物,一部分投入火中,就这样将他们领到了皇帝处……他们来到的地方,两边各置一火堆,许多斡罗思王公及贵族们走过火堆,向太阳、火及偶像行拜礼。"(《尼康诺甫编年史》,第3卷,第20页)。头一次提及这个习惯为公元569年。参阅《贡布耶夫书》,第661页以下(A. И. 马列英注)。

与火的崇拜相联系着,蒙古萨满教徒还信仰火具有特殊的祓除不祥之力。蒙古人认为火不仅对物件具有祓除不祥的力量,而且还能将人们的恶念去除。种种风俗习惯与礼仪,包括从两堆火中间通过在内,都与这一信仰联系在一起。道·班札罗夫头一个阐明了这一古老的风俗,他写道:"我们知道,在蒙古人处,外国使臣想到蒙古汗那里去时,须从两堆火中间通过,因为他们认为:火会打消人们干恶事的可能性;而当时蒙古人认为,使臣们到汗那里去时有可能怀有恶念。这些风俗有许多迄今还保留在蒙古人民中间。"(《道尔济·班札罗夫文集》第74页;莫斯科1955年版。)

话。他们的神作做亦脱合,[1]而库蛮人[2]则称之为哈木,[3]他们对他极端崇敬与畏惧,向他献祭许多物品及饮食的头一部分,并完全遵照他的回答来行事。当他们打算做一件新事总是在月初或月半开始,因此他们称月亮为月皇,向它跪拜祈祷。他们称太阳为月亮的母亲,因为月亮的光芒是从太阳处获得的。

(2)简而言之,他们相信,一切皆能为火所涤净;因此当使臣、大臣或不管什么人到他们那里来时,他们自己及向他们呈献礼物的人都必须从两个火堆中间通过,以受火净,以免他们带来任何毒害,造成任何祸患。正因为如此,若有雷火从天上袭击了畜群或人众(这是那里常有的事),或有类似情况发生,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净洁的或倒霉的,必须请巫师用如上方法进行袚除;据说,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巫师之类的身上。

(3)当某人患重病将死时,他的帐幕上立一杆矛,[4]矛上缠以黑毡;从那时起任何外人不敢进入帐幕四周之地;当病人快断气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他,因为谁若于病人断气时在他的身旁,这个月内就不能进诸王或皇帝的斡耳朵里去。某人死后,如果他原是一个贵人,就

---

[1]亦脱合,蒙古大地女神额禿坚一名的音讹。大地在蒙古萨满教徒那里被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加以尊崇,是他们的主神之一。土地被认为具有繁殖与多产的特殊属性。人们用乳类、酸马奶与茶奠祭土地。地有一爱称"额禿坚额客",意即额禿坚母(可与俄语大地母亲比较之)。额禿坚之名也见于地名中,显然,这与那个地方的特殊崇拜、那个地方曾于某时献给大地女神有关。

道·班札罗夫首次解释了普兰·迦儿宾所使用的"亦脱合"一语(参阅《班札罗夫文集》第67页,《黑教》一文)。伯希和的研究证实了他的解释的正确性(见《通报》,1929年,第26卷,第219页)。

[2]即钦察人,是11—15世纪居住在南俄草原上的突厥系人民。拜占庭作家与使用拉丁文写作的作家们,把钦察人称做库蛮。在俄罗斯编年史上则称作波罗维赤人。

[3]普兰·迦儿宾不懂蒙古语,他将大地女神额禿坚之名与意为"女萨满"的"兀答罕"或"亦朵罕"等词混淆在一起,因此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写道:"他们将这个神称作亦朵罕,而库蛮人则称作哈木。"事实上这里涉及了两个概念:①女神额禿坚;②意为"萨满"的突厥语哈木。在后文中,普兰·迦儿宾又将"哈木"与蒙古语"汗"这个名词混淆起来了,硬将汗的属性派给了萨满。道·班札罗夫首次解释了普兰·迦儿宾行文中的这个晦涩之点(见《班札罗夫文集》,第65~66页)。

[4]几乎直到近年,蒙古人还遵守着类似的风俗,但形式稍有变更。帐幕里有了病人,帐幕前面的地上就立一根棍子,棍上缚一根绳子,绳子另一端缚到帐幕上。这种风俗称做"薛迭儿",意即"忌讳"或"禁忌"。按照这个风俗,任何外人不得进入天幕内,以免有害于病人。贡布耶夫(见他的著作,第250~251页)对这种禁忌的细节进行了解释。

被秘密地葬在他所指定的地点，他的帐幕与他一起入葬，让他坐在帐幕中央，在他面前摆上桌子、满槽的肉与一杯马奶，与他一起埋葬的还有怀驹的母马，配有马勒、马鞍的公马，[1]还另将一头马宰食后，在马皮里填满麦秆，让它高高地立起在两根或4根大木头上，这样，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就有帐幕可住，有母马挤取马奶，可繁育小马，还有公马可供乘骑，为了安宁死者的灵魂，他们用火将宰食的马骨烧掉，妇女们也常聚在一起焚烧骨头，奠祭死者，这样的事为我们亲眼所见，别人也曾告诉过我们。我们还看到，当今皇帝的父亲窝阔台汗[2]种了一片矮树林来安宁自己的灵魂，[3]他降旨道，任何人不得在那里砍树，若有人砍折树枝，就要遭到鞭打，被剥掉衣服痛打，他们曾亲眼见到有人为此挨打。因此，有一次我们虽然非常需要折一些树枝赶马，但我们不敢砍折树枝。还同样地将金银与他葬在一起。他所乘坐的大车与他的帐幕也都加以拆毁；一直到第三代为止，任何人不敢称呼死者的名字。

---

[1]普兰·迦儿宾所述的关于蒙古人埋葬的野蛮性质的记述为其他文献资料所证实。例如，术思札尼于记述1256年拔都下葬时写道："拔都按照蒙古仪礼落葬。按照这里人的习惯，有人死后，就按照死者的地位，在地下盖一所像屋子或壁龛般的处所。将卧床、毛毡、器皿、什物布置在那里，将他连同他的武器及全部财产一起入葬。与他一起葬在那里的还有几名妃子、侍从……"《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二卷[波斯文资料选辑，蒂森豪森编，罗马斯凯维奇与沃林修订]第116页，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1年版。

马可波罗谈到了埋葬蒙古大汗时的更为野蛮的风俗："国王死后，他们将好马一齐杀光，好让他把这些马带到彼土去。据传蒙哥汗死时，在运柩出葬时杀死了一路上遇到的二万多人。"（米纳耶夫译：《马可波罗行纪》，第87页；俄罗斯地理学会出版，巴托尔德院士编，圣彼得堡。）最近30~35年内进行的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材料告诉我们，类似的埋葬方式是中亚许多民族所固有的。参阅《诺音乌拉冢的发掘资料》、《北蒙古研究考察团据科兹洛夫蒙古—西藏考察团发表的简报》（列宁格勒，1925年）与阿尔泰山进行的发掘资料（格略兹诺夫：《帕哲雷克一号冢》，列宁格勒，1950年）。

在下一章"关于葬仪"中，普兰·迦儿宾所报道的有关蒙古人竭力掩蔽自己的汗们的埋葬地点的资料，与马可波罗、术思札尼及其他作家的记载是一致的。

[2]窝阔台汗（1187—1241年），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与他的嗣位者，1229年诸王举行忽里勒台后，他成了蒙古大汗。在窝阔台时代，蒙古人的侵略继续进行，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北中国的征服与1236—1243年拔都与速不台占领东南欧。13世纪一位不知名中国画匠为窝阔台画过一张像，此像曾由田清波影印刊布于世（田清波：《关于几幅蒙古皇帝像》）。

[3]蒙古萨满教徒有对于被他们认做神灵寄居之所的树木的崇拜。他们不仅崇拜某几棵树，而且崇拜一整片神圣的树丛，那里禁止打猎，也不准人们进入。关于蒙古人对矮树林的崇拜，在斡罗思编年史中有所记载。

22.5.4 葬仪

(1)埋葬贵人还有另外的方式。他们悄悄地来到田野里,将青草连根拔掉,在那里挖一个大坑,从这个坑里的侧面在地下再掘出一个洞穴,死者所宠爱的奴隶被埋在他的身底下。奴隶埋在那里,到几乎要断气时,才将他拉出来让他呼吸一下,这样一共做3次,这时如果他还活着,那么他就获得自由了,他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去,从此他在帐幕中、在死者的亲族中间被认作是了不起的人。死者埋葬在从大坑侧面掘出的那个洞穴内,上述东西同死者一起埋葬,而后将大坑也埋上,覆上青草,恢复原状,以使后人无法找到这个地方。另一些坟墓他们也按同法做成,但死者的帐幕却露出在田野里。田野里共有两处坟地。一处是埋葬皇帝、诸王及其一切大臣的墓地,他们不管死在何处,只要办得到的话,就都运到这里来,连同许多金银一起埋葬。另一处墓地,埋葬阵亡在匈牙利的人,在那里阵亡的人可真不少。除了在墓地上担任警卫的守坟人外,任何人不敢走近那块墓地,谁若走近去被抓住时,就要被剥掉衣服,用鞭子痛打一顿。一次我们出于不知走进了匈牙利阵亡者的坟地内,守坟人便向我们走来,要射杀我们,但因为我们是使臣,不懂本地规矩,这才放我们走了。

(2)死者的亲人及住在他的帐幕内的所有人,都须进行火净。火净按如下方式进行。安置好两堆火,火旁立两杆矛,矛尖用绳子连起来,绳上拴一块布片;人与牲畜、帐幕皆从绳与布片下,从两堆火之间通过。有两个妇女,一个从这头走来,另一个从那头走来,泼着水,念着咒语;倘若恰有大车折裂,或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这些东西就归巫师所有;倘若有谁被雷击毙,那么住在那座帐幕里的所有的人,都必须按上述方式从火堆间通过。帐幕、床、大车、毡子及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一概不得触动,而为一切人当作不祥之物抛掉。

22.6 鞑靼人好的风尚与恶习，他们的食物与风俗（第四章）

仪式谈毕，现在来谈他们的习俗。内容预定如下：首先谈好风尚，第二谈恶习，第三谈食物，第四谈风俗。

22.6.1 好的风尚

上述鞑靼人最服从的是他们的统治者，至于对其他的人，不管对教界或俗界的人，都及不上他们对统治者那样的服从，他们最尊敬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面前不轻易说假话。他们很少争吵，甚或从来不争吵；从不打架；殴斗、吵嘴、伤人、杀人也从未发生过。那里也找不到抢劫、偷盗重要物品的人；因此他们用来保藏自己财物的帐幕、大车全不上门闩或锁。若有牲口走失时，找到它的人，或把它放走，或把它送到某些人那里看管起来，丢失牲口的人会很容易地从看管牲口的那些人那里将牲口领回。他们互相间相当尊重，十分友好；即使食物不多时，他们也愿意分开来大家吃。他们富有刻苦耐劳精神，饿上一二天什么也不吃，决无难色，依然唱歌游戏，仿佛他们吃得很好。在骑马奔驰时他们得忍受严寒，有时得忍受酷热。这些人中间没有弱不禁风的人。他们之间看来从不相互嫉妒，几乎也无争讼，任何人不轻视别人，而都竭力帮助别人、扶助别人。妇女都很贞洁，从未听到有丑事发生；但有些人在开玩笑时也说些十分难听与秽亵的话。他们很少争吵，甚至从不争吵，即使酩酊大醉时，也决不吵嘴、打架。

22.6.2 恶习

上面谈完了好的风尚，现在来谈他们的若干恶习。与别族人民比起来，他们显得十分高傲，他们目空一切，并且据说对待别族不管是贵族或平民，他们全都瞧不上眼。我们在皇帝的宫廷里见到了尊贵的斡

罗思大公雅罗斯拉夫,[1]见到了谷儿只(格鲁吉亚)的国王与女王之子,[2]也见到了许多伟大的算端与肃良合人的王公,但他们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而指定接待他们的鞑靼人,不管地位多么低卑,却走在他们前头,并常占有首席,反之,他们则只得坐在后面。与其他族人民相比,他们显得十分暴躁易怒。比起其他族人民来,他们最会行使诈术,在他们中间几乎找不到任何真理;当然,最初他们向你逢迎,但后来却像蝎子般地螫人。他们狡猾欺诈,尽力行使一切诡计。他们在饮食与其他方面,都很肮脏。他们想对其他人做坏事时就用巧妙的手段加以掩盖,使人们无法维护自己或设法对付他们的诡计。醉酒被他们认做光彩的事,有人喝得大醉,呕吐狼藉,但并不因此止饮。他们很贪婪、吝啬,惯于向别人索取东西,而自己却一毛不拔。杀害别族人民,他们认为算不了一回事。简而言之,他们的恶习,真是说也说不尽。

22.6.3 食物

(1)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可以充作他们的食物,他们吃狗、狼、狐、马,必要时还吃人肉。当他们去进攻中国皇帝所在的某城时,由于围城很久,鞑靼人的口粮断绝了,这时他们什么东西也吃不上了,便从10个人中抽一人让大家分食。他们还吃母马产驹时连同马驹一起产下之秽物。我们甚至看见过他们将虱子捉来吃,他们说:"这东西吃我儿子的肉,喝他的血,难道就吃它不得?"我们还见过他们吃老鼠。他们不用桌布、餐巾。除去肉类外,他们没有面包,也没有蔬菜等等;他们每次所食的肉也不多,别族人民很难只靠这点肉过活。

---

〔1〕斡罗思大公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1190—1246年),原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后来成了[全斡罗思]大公,他曾多次来到汗帐中。1243年经拔都批准为[全斡罗思]大公。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关于这件事有如下记载:"雅罗斯拉夫大公到鞑靼人那里见了拔都,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康诺夫。拔都让雅罗斯拉夫大公及其侍从们荣耀而归,并对他说:雅罗斯拉夫,你将是所有王公之长。雅罗斯拉夫带着极大的荣耀回到了本国。"(《诺夫哥罗德编年史》1888年版,第4778页。但蒙古汗对于康斯坦丁来和林朝觐并不满足,他要求雅罗斯拉夫大公亲自来朝见,普兰·迦儿宾就在汗帐内遇见了他。据斡罗思编年史记载,雅罗斯拉夫是在汗帐中被毒害的,他离开汗帐后过了一星期于1246年9月30日死去了。在《普兰·迦儿宾行纪》的最后一章中也证实了,雅罗斯拉夫是在贵由汗的帐幕中被毒害的。

〔2〕王子大卫是死于1238年的谷儿只王拉申·乔治四世之子,他的堂兄弟、鲁苏达娜女王之子也名大卫)(参阅第341页注〔2〕)。

(2)他们手上满是肉类的油腻,进食时将油腻擦在自己的皮靴上或草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上;他们之中较高尚的人则通常有一小块呢子,吃完肉用来擦手。他们之中有一人分割食物,另一人用刀尖取食物分给每个人,按着对每个人的尊敬程度不同,所分给的食物,块儿有大有小。所用器皿不洗,有时用稀汤洗一下后,将稀汤带肉一起重新倒进瓦罐内。洗瓦罐、勺子及其他器皿时,也用这种方法。用任何方式糟蹋不管什么饮料或食物,概被他们认为罪大恶极;因此绝不允许将没有把骨髓吸尽的骨头扔给狗吃。他们不洗衣服,也不许人们洗衣服;尤其是开始响雷直到停止的时候。

(3)只要他们有的话,他们就大量饮用马奶,他们也饮用羊奶、牛奶与骆驼奶。他们没有酒、麦酒与蜜,除非由别族人民将这些饮料运来赠给他们。一般不很富有的人,冬天甚至连马奶也喝不上。他们还将黍子放在水里熬成只能饮用的稀粥。每个人早上喝一至两碗,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什么了,晚上每人再分给少量肉,喝些肉汤。夏天有充足的马奶时,他们很少吃肉,除非偶尔有人赠给他们肉吃,或猎得禽兽时才有肉吃。

22.6.4 法律与风俗

(1)此外,他们那里有如下法律与风俗:被发现有明显通奸行为的男女,予以杀死;少女若与某人有淫乱行为时,男女都予杀死。发现有人在他们的领土上进行抢劫或明显的偷盗行为时,毫不容情地予以杀死。若有人泄露了他们的秘密,尤其是当他们将去作战时,那个人就要被重打 100 下屁股(就像庄稼汉用大棒打的那样重)。幼者若侮辱了他人,他们的长辈决不饶恕他们,重重地加以鞭打。妾所出之子与正妻之子没有任何不同,父亲按照自己所愿将东西分给每个儿子,如果是王公的后裔,妾所出之子与正妻之子有同样的权利来继任。若一个鞑靼人有许多妻子,那么每个妻子各自都有自己的帐幕与家庭;他一天在一个妻子处吃、喝、睡,另一天则在另一妻子那里;其中有一个算做长妻,他与她在一起的日子比别的妻子要多;虽然妻妾众多,但她们相互间很少发生争吵。

(2)男子除制箭及照管一部分牲畜外,什么事也不管;他们出去打猎,练习射箭,他们不论长幼都是优秀的射手,他们的孩子到两三岁,就开始骑马,驾驭马、纵身上马,还按照孩子们的年龄不同发给大大小小的弓,让他们学习射箭,他们既灵巧,又勇敢。

(3)姑娘们与妇女们也跟男子一样地骑马、灵便地骑在马上疾驰。我们还看到过她们身上佩带着箭筒与弓。男女都能长时间坚强地骑在马上。他们那里的马镫很短,他们对马很爱护,此外他们也尽力保护一切财产。他们的妻子制作各种东西:短皮袄、衣服、鞋、靴与各种皮制品,她们还管理与修理大车,为骆驼装驮包,她们做事都很敏捷。妇女们全都穿裤,有些妇女也跟男子般地射箭。

22.7 鞑靼强国的起源,他们的诸王,皇帝与诸王的权力(第五章)

习俗谈毕,现在再来谈鞑靼强国,首先谈它的起源,第二谈它的诸王,第三谈皇帝与诸王的权力。

22.7.1 鞑靼强国的起源

(1)东方有一片土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作蒙古。这个地方在某一时期有四部人民:其一称做也可蒙

古，[1]即大蒙古；第二个称作速蒙古，[2]即水蒙古，他们又由于一条流经他们那里的鞑靼河自称为鞑靼，[3]第三部称作蔑儿乞，[4]第四部为蔑克里，[5]这四部人民虽然分居于不同地区，各有其主，而形貌与语言却相同。

(2)在也可蒙古人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成吉思的人，[6]他开始成为上帝面前的一个强悍的猎人，因为他教会人们去窃取和抢劫。后来，他跑到别的土地上俘掠人民，并尽可能地把人们并吞过来，他让本族人民服从自己，他们把他当作领袖，跟着他干种种坏事。后来，他与速

---

〔1〕蒙古语"也可蒙古"，意即大蒙古。蒙古人于成吉思汗时将蒙古诸部联合起来，建立了蒙古国家后就自称为也可蒙古。拉施特丁将蒙古部落分为两种（见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1册，第152页）：迭儿列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与尼伦蒙古人（即以阿兰豁阿为祖先的贵族氏族，其中也包括成吉思汗氏族）。显然，拉施特丁所说的两种蒙古人之一与"也可蒙古"这个名词相当。这个名词屡见于1240年的蒙古编年史《蒙古秘史》中。

〔2〕普兰·迦儿宾所使用的"速蒙古"一语，现在未必能获完满的解释，因为其字源所出无从阐明。这个用拉丁文记录下来的名词，仅见于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行纪中，无疑地，这是这个名词曾用于13世纪时的证据。但在蒙古史料中"速蒙古"一语未曾遇见，在汉文编年史中也仅有"速达达"[原文如此，应为"水达达"——余注]一语。拉施特哀丁书中也无此语。对这个名词的解释可作二种假设：

(1)"速蒙古"这个名称是由突厥字"速"（水），加上部落名称"蒙古"而成，正如马列英所译的那样，可译作"水蒙古"，但这个名词的含义仍未阐明，因为我们不知道水蒙古是什么意思。

(2)"速蒙古"这个名称源于蒙古语"sü"（速）（意为"幸福伟大者"或"至尊"）。"sü"这个字没有确切的译法，不同的蒙古学著述家有种种译法，因为它的意义没有查明。这个字通常使用在汗或皇帝身上，例如速秃成吉思意即至尊的成吉思汗。

可以设想，"速蒙古"一语可能意为"从属于至尊者的蒙古人"，也即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蒙古人。普兰·迦儿宾将此语用于塔塔儿人身上，塔塔儿人是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蒙古部落之一。

〔3〕中世纪西欧史家常用"鞑靼"这一名词表示蒙古人，这个名词是由"塔儿塔儿"——地狱一字转来的。这样的改称大致可解释为由于西欧对蒙古人侵东南欧所产生的恐怖所致。

〔4〕蔑儿乞：蒙古大部落之一，居住在色楞格河流域上。蔑儿乞部以好战著称，这一点在《蒙古秘史》中屡有提及，《秘史》中谈到蔑儿乞部侵袭了成吉思汗的牧地（见《秘史》第100～102节）。

拉施特丁谈到蔑儿乞人时有如下记载："蔑儿乞部。他们也被称为兀都亦惕部，虽然某些蒙古人将蔑儿乞人称做蔑克里人，但这两个名称的意义完全相同"（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1册，第114页）。由此可见，普兰·迦儿宾误将同一部落当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

〔5〕"巴儿忽国，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居住着蔑儿乞人或蔑克里人"（《巴托尔德书》，第92页，注3，马列英注）。

〔6〕成吉思汗（1155—1227年）是著名的蒙古汗与统帅，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他原名铁木真。铁木真于1206年宣称最高的汗时，获得了成吉思汗的尊号，这个尊号的确切意义，迄今还未确定。但有名的芬兰蒙古学家兰斯铁所作的假设可认为是最有力的解释，他认为这个尊号意为"海洋汗"或即"伟大的汗"。

蒙古人,即鞑靼人作战,使许多人屈服,并杀死了他们的领袖,让他们当了奴隶。接着,他又率众与鞑靼人毗邻的蔑儿乞人作战,也将他们征服了。从那里出发,他又去讨伐蔑克里人,征服了他们。

(3)乃蛮人得知成吉思汗崛起后,大为恼怒,因为乃蛮过去曾有一个十分勇敢的皇帝,上述所有的各部人民全都向他纳贡。

当他死去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但他们年幼愚拙,不善把握人民,他们相互间又争吵不休;当成吉思汗崛起时,他们又对上述土地发起了侵袭,杀死了男女、孩子们,并进行了抢劫。成吉思汗得知后,便将受自己统治的人民集合了起来;乃蛮与哈剌契丹[1](即黑契丹)也将大队人马集合在我们奉使途中经过的两山之间的一个山谷里应战;厮杀一阵后,乃蛮与哈剌契丹被蒙古人所战胜,大部分人被杀,而其余没能逃脱的人被俘为奴隶。

在上述哈剌契丹地面上,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即位后建立了一座名为斡密立[2]的城市,靠近该城南面的地方,是一片大沙漠,据人们确实可靠地告诉我们,那里居住着一些森林民,[3]他们不说话,没有膝关节,跌倒后没有扶一把就再也起不来;但他们颇有头脑,他们用骆驼毛制成毡子披穿,并用这种毡子挡风;当鞑靼人向他们袭来,用箭射伤他们时,他们便拔取几根草将伤口塞住,飞快地逃走了。

(4)蒙古人回到本国后,准备出征汉地,他们拔营出发,侵入了汉

---

〔1〕哈剌契丹,即有别于契丹(北中国)原义的"黑契丹"。显然,居住在中国东北南部的蒙古系人民称为哈剌契丹。中国编年史上将哈剌契丹称作契丹。12世纪时哈剌契丹人被女真人从中国东北逐走,西迁到了今塔城地区。其后哈剌契丹人征服了突厥康里人与哈剌鲁人,征服了东突厥斯坦,还征服了花剌子模,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哈剌契丹国(巴托尔德:《谢米列契历史概要》,伏龙芝,1943年版,第32、33页)。

〔2〕斡密立:普兰·迦儿宾关于窝阔台汗在漠北建立斡密立城的记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蒙古游牧民显然曾于蒙古帝国时代建有若干城市,但关于这些城市迄今我们还知道得不多。普兰·迦儿宾所说的斡密立,可认为即是位于塔城以南基集尔巴什湖稍西面的叶密立城。这个城市是哈剌契丹人于1125年左右建立的。哈剌契丹被蒙古人占领后,叶密立显然由窝阔台进行了重建。

〔3〕在游牧民的想像中沙漠里居住着某些幻想的居民,普兰·迦儿宾会轻易地相信这些幻想的居民的存在,因为中世纪地理学家传播了不少关于胸上长眼睛的人、独脚人之类的奇谈。在蒙古的一些穷乡僻壤里,今天还流传着所谓洪霍罗哈的沙漠人的奇谈。关于居住在沙漠里的沙蟒蛇是这些奇谈的根据。普兰·迦儿宾复述了13世纪的这些奇谈之一。

地;汉地皇帝得知他们来侵后,便率领军队出战;一场艰巨的战斗发生了,蒙古人在战斗中被击溃,从征的蒙古大臣大部被杀,只剩下了7个人;因此后来当有人恫吓他们说:"如果你们去进攻那个国家,你们准会覆灭,因为那里人数既多,又全是能征惯战之辈。"他们就答道:"我们不怕,我们曾经全军覆灭,只剩下7个人,但现在我们又成长壮大起来了。"成吉思汗与残剩的那几个人逃回了本国。

(5)稍事休整后,成吉思汗又准备战斗,出征畏吾儿地区;畏吾儿人是聂思脱里邪派基督教徒;他征服了他们,鞑靼人采用了他们的文字,因为在此以前鞑靼人还没有任何文字;现在这种文字被称为蒙古文。[1] 从那里他们向撒里畏吾儿,[2]向哈剌尼惕[3]地区进军,向斡亦剌[4]地区进军,向库蛮地区进军;成吉思汗将这些地方全部征服后,返回了本国。

(6)休息了一段时期后,他又召集了自己的全体人民,向汉地进军,[5]与汉人进行了长时期的战斗后,他们征服了汉地的大部分土地,

---

〔1〕我们知道,蒙古人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使用畏吾儿字母蒙古文。显然,畏吾儿文字是通过乃蛮人传到蒙古人中间来的。有这样一个传说,铁木真于1204年击溃乃蛮人时,俘获了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畏吾儿人,这个人是乃蛮太阳汗的臣下。从这个俘虏处发现了一颗乃蛮人的国玺,由此可见他是一个高级官员。根据保存在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纲》)中的传说,正是通过这个畏吾儿人,适应于蒙古新国家的需要采用了文字。以畏吾儿文为基础的这种蒙古文的最古老的样本,是所谓"成吉思汗石",其上的题铭日期为1219年。

〔2〕撒里畏吾儿:即黄畏吾儿,是住在西藏地区北部青海附近的畏吾儿部的分支(《布列什奈德书》,卷1,第263页;卷2;第205页)。(马列英注)

〔3〕哈剌尼惕:普兰·迦儿宾可能是指蒙古"哈剌讷惕"部,关于这个部落,拉施特丁记载道,该部是蒙古史上有名的蒙古"弘吉剌"部的分部(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1册,第164页)。

〔4〕系指蒙古族源的斡亦剌部,据拉施特丁提供的证据,该部最初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1册,第118页)。

〔5〕这里所说的是女真族金朝统治下的北中国。成吉思汗对金用兵多年;蒙古军队于1215年深入北中国境,占领了它的京城中都城(今北京)。夺得了大量战利品,掠走了许多俘虏后,成吉思汗退出了北中国,北中国的征服是由窝阔台汗完成的。南中国当时处于中国宋朝的政权之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死后过了50年才占领了那里。

把汉皇帝围困在他的京城里。[1] 他们围城很久,军队的口粮断绝了,这时他们什么东西也吃不上了,成吉思汗便下令从10个人中间抽出一人让大家分食。城里的居民用炮和箭勇敢地进行抵抗,石头没有了时,就用银子、主要是银汁代替石头抛下来,因为这个城里财宝很多。攻城很久,城还是没有攻下来,鞑靼人便在地下挖一大坑道直通到城中央,然后突然地挖开地面,突如其来地冲了出来,在城中央与城里居民进行厮杀,城外的人继续攻城;攻破了城门,冲进了城内;皇帝与许多人民都被杀死了,城被占领了,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然后在上述汉地上安置了自己人做领导者后,[2]便回到本国去了。从那时起,当成吉思汗战胜了汉皇帝后,才第一次当了皇帝。但是汉地的某些土地,如位于海上的地方,他们不管怎样始终还没能占领。上述汉人是偶像教徒,他们有特有的文字,据说他们那里也有新旧约,也有神父传教;还有修士以及像教堂那样供祈祷的屋子;据说,他们中有若干圣徒。他们崇敬惟一的上帝,敬主耶稣,信仰永生,但他们从来也不行洗礼,他们敬重我们的圣经,敬爱基督教徒,施舍甚多,他们是一些温文知礼的人。他们不留胡子,面貌与蒙古人很相似,但脸庞没有那么阔,他们具有独特的语言;这里有日常生活各行各业中最好的工匠。在他们的土地上,粮食、酒、金银、丝以及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很富足。

(7)稍事休整后,他又派遣军队出征。他派遣他的一个名叫术

---

〔1〕即金朝皇帝吾睹补(金宣宗珣——余注),蒙古人还称他为阿勒坛可汗(这是汉语金这个字的准确译语,意为金可汗),他后来逃到了南部的一个城市(南京[今河南开封——余注]),将中都留交给他的一个将官守卫。蒙古人围住了中都(1215年),城民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储粮的缺乏如此严重,结果"那里的居民由于过度饥饿而死亡,并吃起人肉来"(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2册,第174页)。后来忽必烈在中都这个地方建造了自己的新都大都(马可波罗作汗八里),这个鞑靼城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2〕成吉思汗从中国退走后,将自己的总督、他最亲密的9个战友(九乌尔鲁克)之长木华黎那颜留在那里,并封他为国王。木华黎是札剌亦儿族人,死于1223年。国王的封号源于汉语。

赤[1](人们也把他称作汗,[2]即皇帝之意)的儿子带着军队去征讨库蛮人,[3]经过长期战斗,战胜了库蛮人后,术赤返回了本国。他又派遣另一个儿子带着军队去征略印度,[4]征服了小印度,[5]小印度住着称作埃塞俄比亚的黑萨拉森人。这支军队又去征讨大印度的基督教徒。那个国家的国王,被人民称作长老约翰,[6]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便出动联军来抵御他们。他们制了一些铜人像,置在马鞍上,从铜像内部点起火来,铜像后面有一些人带着风箱骑在马上,铜像与马都有许许多多,这样准备就绪,他们便对上述鞑靼人开战;当他们进入战场后,就将这些马并排地驱之而前;后面的战士将一把东西放到上述铜像内的火中,并开始用力拉风箱扇风。这样,烈火燎烧着人和马,空气被烟熏黑了,这时他们向鞑靼人射箭,射死射伤了许多人,在混乱中他们将鞑靼人驱逐了出去,此后我们就再也没听到鞑靼人再去侵犯他们了。

(8)在他们通过沙漠回来的途中,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当我们到皇帝宫廷那里去时,有一些忠实可靠的斡罗思神甫与另一些长期生活

---

〔1〕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1184?—1224年),他的封地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以西地面,即整个北花剌子模、阿母河和锡尔河下游地区及钦察草原,也就是也儿的石河以西蒙古铁蹄踏到的全部地面。术赤的帐幕位于也儿的石河流域。由于普兰·迦儿宾周围有突厥人有斯拉夫人又有蒙古人,故他听到人们把术赤称作 Tosi,Tuši 或 Tossu-can。Toc-cyk 是术赤这个名字的突厥语形态。

〔2〕"汗"为广泛流行的突厥蒙古字源的尊号。这个字的最初形态,显然是可汗。这一尊号曾见于鄂尔浑碑铭上,中国编年史上谈到游牧民族的部酋时,也使用这一称号。在父系原始公社制度之下,部落领袖拥有这一称号;可以肯定地说,"汗"这个字最初是氏族领袖的意思,它在字源上与突厥字"gon"(血)有关。后来可汗的尊号用来表示皇帝,汗的尊号则表示一地(权力有限)的国王

〔3〕对钦察(库蛮)人进行的侵略是由术赤的儿子拔都完成的。

〔4〕显然,普兰·迦儿宾指的是出征札兰丁算端,在蒙古人的攻打下札兰丁逃到了印度河上,在印度河上他被彻底地击溃了。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随着父亲积极地参加了这次远征,三子窝阔台也参加了这次远征。

〔5〕小印度大概是印度河西岸的一些国家。

〔6〕关于中央亚细亚有一个强大的长老约翰统治着某个基督教国家的传说,在中世纪的史地文献中十分流行。有相当多的各种著作,研究传说中的长老伊万(或伊万神甫、伊万皇帝)究竟是谁。巴托尔德认为,关于戴有王汗称号的克烈汗的轶事乃是这一传说的依据,王汗在蒙古语中念做 ong-khan,在某种程度上与约翰这个名字相近。此外,在克烈人中还流行着聂思脱里教(巴托尔德:《马可波罗行纪注》圣彼得堡,地理学会出版,第82页注2)。克烈部是蒙古部落之一,在蒙古形成了一个早期封建国家。克烈人的蒙古族源遭到某些研究者的怀疑。

在他们中间的人们告诉我说,鞑靼人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女怪。[1] 他们通过译员问这些女怪,这里的男子哪里去了,女怪们答道,当地只有女人生下来时是人形,而男的全是狗形的。[2] 当他们驻扎在那里时,河的彼岸聚拢了许多只狗,时当隆冬,狗男们一齐跃人水中,然后出来在冰硬的地上打滚,这时尘土混合着水冻结在他们身上。重复做了几次后,他们身上结了一层厚冰,于是他们聚起来向鞑靼人猛冲过来。鞑靼人将箭射去,但箭像射在石头上似地蹦了回来,鞑靼人不管用什么武器都不能伤害他们。于是群狗向他们扑来,咬死咬伤了许多人,将他们赶了出去。因此今天在他们那里流传有这么一句谚语:"你们父兄是狗杀的。"鞑靼人俘掠了一些女人带回了本国,她们在那里一直到老死为止。

(9)这支蒙古军队在归来途中到了波黎吐蕃[3]地区,打败了波黎吐蕃人。波黎吐蕃人是偶像教徒;他们具有奇怪的、更正确些说令人十分遗憾的习惯,当父亲死后,儿子便召集全体亲属,分吃了他,这一点是别人确实可靠地告诉我们的。他们不留胡须,他们手戴一种铁的东西,据我们看来如果偶有胡须长出他们就将其拔掉,他们全都很丑。这支军队从那里回到了本国。

(10)在派遣这支军队出征之时,成吉思汗经由撒耳柯思[4]地区向东方国家进军,撒耳柯思地区没被他征服;据说,他来到了卡斯庇安山

---

[1]普兰·迦儿宾转述了他所听到的故事,从故事中可以看到蒙古人中间的关于神话的女儿国传说的某些模糊观念。蒙古编年史中有若干资料[参阅编年史《沙剌·图吉》(《黄史》),《刚噶因·兀鲁思合勒》,即《恒河之流》等]涉及有关女儿国神话在蒙古人中间的传播。

[2]也是传到蒙古人那里的中世纪的传说之一。

[3]波黎吐蕃,即土蕃(西藏)人。普兰·迦儿宾关于成吉思汗进占土蕃的记述没有被其他史料证实。1223年成吉思汗在印度河上时,想通过印度与土蕃回到蒙古。但是后来由于翻山越岭、跋涉艰难,使他改变了这个意图。从成吉思汗取消这个意图这件事上面,后来产生了一个奇异的传说:据说成吉思汗改变决定的原因是由于遇见了一头奇兽,这头奇兽跪在他面前,警告他不要去占领神圣的印度与土蕃国。这个传说是较晚才从喇嘛那里传出来的,大概是在16世纪以后、当喇嘛教在蒙古传播开来与巩固下来时才产生的。这个传说的要旨是:喇嘛想证明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佛教就同蒙古人发生了关系。

[4]即太和岭(高加索山)的撒耳柯思人,撒耳柯思人于1227年为蒙古人所征服;乞儿吉思人则早在1207年就被打败了(马列英注)。

(高加索山),[1]山这一边是由磁石构成的,因此将他们的箭与铁制的武器全都吸去了。卡斯庇安山里的人,正如传说的那样,风闻军队呐喊前来,便动手来开山,当十年后鞑靼人返回那里时,他们发现那座山已经折裂开了,而鞑靼人想走进去,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们面前弥漫着一片云雾,他们无法通过这片云雾,只要一接近云雾,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反之,山里的人见鞑靼人不敢接近他们,便想出击,但当他们走近云雾时,同样地也无法继续前进了。鞑靼人在到达这座山之前,他们在大沙漠里走了一个多月。他们全体又从那里向东方走了一个多月的路,才沿着大草原来到了一个地方,据人们确实可靠地告诉我们,在那里他们看见前面有一条路,但路上却一个人也找不见;他们努力搜索了一番后,找见了夫妻二人,便把他们带到了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问道:这个地方的人在哪里?他们答道:在山底下的地里头。成吉思汗便扣住妻子,让男的带着自己的使者,去把那些人召来。那人到了他们那边,告诉那些人说,成吉思汗命他们全体前去。那些人答应说,当天就遵命前去,但同时却在地下将许多秘密坑道联了起来,并投入战斗,突然出击,杀死了许多人。成吉思汗与他的部下一无所获,却很快地丧失了好多自己人(同时他们忍受不了一种太阳所发出的嘈杂声,当太阳一升起时,他们就必须把一只耳朵紧贴在地上,另一只耳朵紧紧堵住,才能避免听到这种可怕的嘈杂声,他们无法进行防御,结果许多人就被杀死了),于是他们逃跑,逃出了这个地方;而那对夫妻则被他们带走,老死在鞑靼人的土地上。至于那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住在地底下呢,据那对夫妻说,那里每年有一段时间,太阳一升起时,就发出

---

[1]普兰·迦儿宾在这里转述了一个中世纪的传说,他将这个传说与蒙古人远征通过高加索山一事联系了起来。这个传说原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的传说。从普利尼的著作中(《自然史》第7册23节)及《系年纪事录》作者的叙述中,证明了这个传说流传的广泛性。在后一书中并曾引用拜占庭史料(《帕特拉人密佛迪文集》)(见《系年纪事录》卷1,第369页)。

这个传说原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在远征东方国家时期遇到了一些肮脏的雅非特部落的人,他追赶他们追进了一座禁闭的、只留一条狭道的山里,山的狭道已经用铁门或铜门关起来了。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曾企图通过高加索山,通过打耳班(意为"铁门")隘道。

剧烈的嘈杂声，[1]那里的人也像鞑靼人那样，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种嘈杂声；他们甚至在那时敲起板鼓、羯鼓和其他乐器来，以免听到这种嘈杂声。当成吉思汗从那里回来时，他们粮食用竭，感到强烈的饥饿，当时他们找到了一副动物的新鲜内脏，将粪便取出，将内脏煮了，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便同自己的部下一起分吃了；从此成吉思汗规定，除掉粪便外，不许扔掉野兽的任何部分，无论是血、内脏及其他可食部分。

(11)从那里回到本国后，他颁布了许多鞑靼人所不得违犯的法律与规定，[2]我们只提一下其中的两条。有一条是：无论是谁，如果骄傲自大，想不经宗王们推选而运用自己的权力做皇帝，就毫不容情地杀死他。因此，在推选皇帝贵由汗[3]之前，一个宗王，成吉思汗之孙，想

---

〔1〕亚洲有一种有趣的迷信说法，认为日出日落时会产生可怕的嚣声。除普兰·迦儿宾在本书中谈到了这种迷信外，15世纪的一册汉文书籍中还有一张题字的图画。上面画的是日落时锣、鼓、号角齐鸣。旁题："每至晚日入，声若雷霆。国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鸣锣、击鼓，混杂日声。不然则人皆惊死。"[见元周致中：《异域志》——余注]。看来，这种迷信是由于出现在沙漠上的名为"鸣沙"的那种罕见奇观引起的。这种奇观是由于炎热的夏天里太阳落山时，沙子冷却时产生了发出某些响声的移动。类似的罕见现象于1931年曾有记录，并曾引起两位英国亚洲研究者：斯坦因与寇松勋爵的一场小小的学术争论。

〔2〕即所谓札撒，是集成吉思汗法律、规章之大成的法典。拉施特丁与志费尼认为1206年忽里勒台为札撒的制定日期。后来，当蒙古国家变为蒙古帝国时，可能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条文。显然，札撒曾用文字记录下来过，因为志费尼肯定地说，札撒被保存在金匮中。札撒的全文没有保留下来，只是在埃及史家马克里纪(1364—1442年)的年代纪中保留下了一小部分；保存在报达图书馆中的札撒副本曾为马克里纪所利用。几乎所有的波斯史家都提到过札撒；阿美尼亚史家马迦基亚与瓦儿丹也有关于札撒的简短记载。普兰·迦儿宾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中关于律令的记载，无疑也是札撒中的条文。

札撒的律令极为严峻，只要不加遵守、稍有违犯，就常常判处犯罪者以死刑。札撒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对蒙古人民的奴役。根据札撒，在和平时期所有的游牧民必须为汗及那颜担负各种劳役。

梁赞诺夫斯基对马克里纪编年史中引用的资料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札撒是蒙古习惯法的法典编纂。维尔纳德斯基认真地研究了保存在各个作家著作中的全部札撒断片后，认为成吉思汗想建立一套体现了国家君主观念、较习惯法为新的法律体系。

〔3〕即窝阔台的长子、汗位的嗣承者贵由汗(1205—1248年)。大汗的推选是1246年在忽里勒台上举行的，普兰·迦儿宾对这次忽里勒台作了很有价值的描写。贵由于汗位虚悬六年后才登上汗位。在汗位虚悬期间由窝阔台孀后脱列哥那摄政，根据这个执政的妇女的名字进行判断，她当是一个突厥人。在推选贵由时意见很不一致。尤其是拔都，他表示了对抗态度，不承认新的大汗，不向大汗宣誓。贵由当了大汗后，甚至要去远征拔都，但1248年时他在半路上走到别失八里时死去了。

不经推选登上宝座,就被杀死了。另一条是,只要他们还没有临到灭亡之日,他们就要去征服一切土地,如果其他族人民不屈服的话,决不准许他们求和。就这样,他们厮杀了 42 年,并据预言还要统治 18 年。据说,根据预言他们将被某一不知其名的种族所战胜,而据说那些能逃脱劫数的人,将遵守战胜他们的人们所遵守的法律。他还规定说,他们的军队应分配给千夫长、[1]百夫长、十夫长、万夫长统辖。他还规定了许多别的条文,但说起来话就长了,而我们也不是全部都知道。当他订出了许多命令与法规后,他为雷电所击而死。[2]

22.7.2 鞑靼诸王

(1)他有 4 个儿子:[3]一个名为窝阔台,另一个名术赤汗,第三个

[1]成吉思汗在军政合一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全部蒙古居民被划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分设若干"万户","万户"由一万户组成,由万户[长]统辖,每千户则置一千户[长]统辖,每百户置一百户[长],等等。大的划分单位(万户、千户)由游牧贵族的代表与黄金氏族(即成吉思汗氏族)的成员统辖之。成吉思汗总共组织了九十五千户。

[2]大概,普兰·迦儿宾的这一记述反映了有关成吉思汗之死的某种传说,但这个传说却没有为其他资料所证实。成吉思汗是于 1227 年 8 月 28 日出征唐兀惕时期"由于疾病缠身"而死去的(拉施特丁《史集》,卷 1,第 2 册,第 258 页)。

[3]成吉思汗长后孛儿台旭真哈敦所出之子有四,即:术赤[1185(4?)—1224 年]、窝阔台(1186—1241 年)、察合台(1190? —1242?)与拖雷(1192—1232 年)。此外,他还有由次后忽兰哈敦所出的一个儿子阔列坚,阔列坚是在出征斡罗思诸公国时期攻打一座城市时战死的。(余按:以上成吉思汗四子排行次序及生卒年有误,今结合相关史料记载订正如下:术赤(1180—约 1224 或 1225 年)、察合台(约 1183—约 1242 年)、窝阔台(1186—1241)、拖雷(约 1190—1233))。

拉施特丁记载道:"成吉思汗这四个儿子,智慧、勇敢、英武,完璧无瑕,为他们的父亲、军队与人民所珍视。他们是成吉思汗国家的四根台柱。成吉思汗为他们四人每人建立了一个国家,称他们为四'曲律','曲律'是他们对于卓尔不群、出人头地的人杰、骏马等等的称呼。"(拉施特丁:《史集》,卷 1,第 2 册,第 69~70 页)。

名察合台(xbiалай),[1]第四个的名字,我们不知道。[2] 蒙古人的首领们全都是这四人所出。长子窝阔台之子如下:[3]长子贵由为当今皇帝;阔端与希列年;他是否还有别的儿子,我们就不知道了。术赤之子为:[4]拔都,除皇帝外就数他最富有最强大了;斡鲁朵,他在全体首领中间居长;昔班,不剌,别儿哥,唐兀惕;术赤其余诸子的名字,我们就不知道了。察合台之子为不里及合丹[5],其余诸子之名,我们不知。成吉思汗另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儿子[6]之子如下:一个名叫蒙哥,[7]他

---

〔1〕原文为察合台这个名字的俄罗斯语音讹。据波斯史家说,他的领地从畏吾儿国起直到阿姆河止(马列英注)。

〔2〕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是拖雷,按照古代蒙古风俗幼子是家灶的守护者,戴有"斡赤斤",即"火王"的尊称及"也可那颜"(大官人)與"额毡"(主人)的称号(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第54页)。幼子照例跟在父亲身边,继承他的主要产业("禹儿惕")。因此拖雷除获得了成吉思汗生前授予的采邑外,还取得了主要的采邑——汗父的兀鲁思以及他的私产:军队。正因为如此,拖雷于成吉思汗死后几乎继承了他的全部军队——从129个千夫队中继承101个千夫队(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2册,第266页)。拖雷享受到极大尊敬,威信极高,他死后作为元朝帝王的始祖,成为特殊的崇拜对象。在内蒙古迄今还保存着一座被认为是拖雷陵地的古庙。关于拖雷之死,《蒙古秘史》中谈到了一个显然带有传奇性的故事,据说拖雷是喝了有病的窝阔台服用的药死去的。

〔3〕窝阔台有7个儿子,即贵由汗(1205—1248年)、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合丹与灭里。

〔4〕术赤有7个儿子。长子是斡鲁朵·亦禅,次子是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死于1256年),三子为别儿哥,嗣拔都为"金帐"汗,四子为别儿哥彻儿,五子为昔班,六子为唐兀惕,七子孛阿勒为斡罗思编年史上有名的那海的父亲。

〔5〕察合台之子为莫秃坚(一作木阿秃坚,死于范延的围城战中)、拜答儿与也速蒙哥。不里是察合台之孙,而合丹是他的侄子。

〔6〕指拖雷而言,拖雷有9子,其中蒙哥与忽必烈二子后为大汗,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伊利汗朝,阿里不哥曾与忽必烈进行竞争(按:据《元史·宗室世系表》拖雷本有11子,其中二子失其名)。

〔7〕拖雷的长子蒙哥汗(1209—1259年),后为第四代大汗(1251—1259年),他在封建斗争的情况下在其堂兄强大的拔都的扶持下取得了汗位。

的母亲唆鲁和帖尼[1]在全体鞑靼人中间，除皇帝的母亲外，最受人尊敬，蒙哥是除拔都外最强大的一个首领；另一个名为拨绰。[2] 他还有好几个儿子，但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

(2)首领们之名如下：斡鲁朵，[3]他曾到过波兰与匈牙利；拔都、合丹、昔班、[4]不里[5]与拨绰，他们都到过匈牙利；希儿罗端，[6]他迄今还在海那边征讨萨拉森土地上的某算端及其他国家。其余的首领都

---

[1]系拖雷孀妃之名。当时的著述家对于她的名字有多种写法。在《秘史》中她被称做莎儿合黑塔泥别吉，在《元史》上为唆鲁和帖尼，谷儿只史家斯捷潘·奥尔别里安尼，把她称作速剌黑惕合木别克，志费尼写作唆儿希牙台·别乞或别乞·唆儿希台，拉施特丁写作唆儿忽黑丹尼·别吉等等。正确的写法：莎儿合黑塔泥别吉，是经伯希和还原而得的［伯希和：《Seroctan 的真实名字》，载《通报》1932 年第 29 卷；(余按：中译本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根据他的分析，确定了这个字包含莎儿合黑、塔泥与别吉三部分。莎儿合黑是胎记的意思，塔泥是阴性接尾部的古语形态，别吉是意为"王妃"的妇女尊号。

莎儿合黑塔泥别吉，克烈部人，是克烈部王汗弟扎阿绀孛之女，王汗被征服后，成吉思汗将她给幼子拖雷做了妻子。她在蒙古王子中间享有巨大尊敬与威信。拉施特丁记载道："她是产生四颗大珍珠的纯水里的贝壳，是四个荣耀的儿子的母亲。"(《史集》，卷 1，第 2 册，第 72 页)这 4 个儿子就是蒙哥汗，阿里不哥、旭烈兀与忽必烈。莎儿合黑塔泥别吉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死于 1252 年。

[2]东方史家把他称作 Bujek, Buygek 或 Buchek，中国史家称他为拨绰(马列英注)。拨绰是拖雷的儿子。

[3]斡鲁朵·亦禅是术赤的长子，参加过远征斡罗思诸公国、波兰与匈牙利。是"白帐汗国"的建立者。

[4]昔班，术赤的第五子，1235—1236 年远征斡罗思诸公国、波兰、匈牙利的参加者。伯希和分析了东方作家们对昔班这个名字的所有写法后，提出假设，认为这个名字是基督教名字，也就是斯捷潘这个名字的蒙古语形态。

[5]察合台的孙子不里。不里是 1235—1236 年远征斡罗思诸公国及西南欧的参加者。

[6]即绰儿马罕，1229—1231 年作战于西南亚，死于 1241 年(马列英注)。绰儿马罕是蒙古大将，积极地参加了成吉思汗对中亚进行的远征，是 1232—1233 年谷儿只与阿美尼亚的征服者，后来成为那里的总督。《秘史》中对绰儿马罕屡有提及。

在国内,他们是:蒙哥,[1]阔端,希列年,[2]忽必烈,[3]失烈门,胜那忽儿,法铁木儿,合剌海,被他们称为勇士的速不台老人,[4]不剌,别儿哥,[5]马兀赤;[6]阔连察[7]是他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其他首领还有好多,但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不知道了。

---

〔1〕见第324页注〔6〕。

〔2〕即失烈门,贵由汗之子,系正后斡兀立海迷失所出。关于失烈门之名,伯希和提出假设,认为他是基督教名字什列蒙或所罗门的突厥语或蒙古语形态,这个名字在蒙古聂思脱里教徒处很流行(按:原作者误将希列年与失烈门作二人;失烈门(即昔列门)为太宗三子阔出之子,且海迷失应为贵由三皇后)。

〔3〕忽必烈(1216—1294),成吉思汗之孙,后为著名的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在位时蒙古帝国事实上已分裂了。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夺取了帝位,当时他的兄弟阿里不哥对帝位也有觊觎之心。没等到召集忽里勒台,忽必烈即宣布称帝,1260年他在他所建立的开平城中召集了自己的党羽。忽必烈时代结束了对宋斗争,征服了整个南中国,这样就完成了自成吉思汗以来对整个中国的侵略。忽必烈建造了一座新都(差不多就在金之京城中都的原址上),名曰大都(大都即京都之意,后更名为北京)。蒙古人的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是与忽必烈的名字相联系着的。他在中国建立了统治了将近百年(到1368年为止)的蒙古元朝。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时代的元帝国有详细的描写。中国编年史《元史》记载了有元一代的历史,它包含了有关蒙古史的丰富资料。

〔4〕速不台,Sobodai、Subutai或Subudai,蒙古最伟大的首领之一;勇士一语,系普兰·迦儿宾用以译"拔都儿"一语者(马列英注)。

速不台拔都儿是成吉思汗最有才干的大将之一,他曾统率军队远征钦察人,在阿里吉河上击溃了斡罗思与波罗维赤部队。他是兀良合族人,是成吉思汗最亲密的战友,为九乌尔鲁克之一。成吉思汗对速不台等最亲密的战友,有如下评语:"[忽必来]与者勒蔑、者别、速别额台[速不台]四个如猛狗一般。凡教去处,将坚石撞碎,崖子冲破,深水横断。所以厮杀时,教您四人做先锋。"(《蒙古秘史》209节)

速不台拔都儿,也即"勇士"之称。

〔5〕别儿哥:别见哥对斡罗思人的压迫特别沉重,以致在俄国编年史上指出,此汗死后,"斡罗思国才松了一口气"(马列英注)

别儿哥为术赤子、拔都弟,拔都死后以别儿哥汗(1256—1266年在位)之名嗣金帐汗之位。别儿哥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十分关注。用他的名字、以"撒莱·别儿哥"为世人所知的金帐汗国第二个都城就是他所建造的。在历史文献上这座城常常还称作新撒莱。城的遗址距今斯大林格勒不远,位于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勃河上,今为列宁斯克城。

别儿哥汗显然出于政治打算,信奉了伊斯兰教。"别儿哥"这个名字按蒙古语有"困难的,费力的"之意,据米诺尔斯基确定,在突厥语中则为"人质"之意。

〔6〕马兀赤:察合台的次子(马列英注)。察合台有一个儿子名莫秃坚。

〔7〕阔连察:普兰·迦儿宾又将这位宗王称作Curomza。大概这是术赤孙、斡鲁朵的第三子忽鲁迷失。成吉思汗的子孙中有好几个忽鲁迷失。但普兰·迦儿宾所提到的忽鲁迷失应是斡鲁朵之子、拔都之侄。拔都派遣自己的侄儿统率军队到第聂伯河上去是十分自然的。在斡罗思编年史上,提到忽鲁迷失时写作忽列木失。

22.7.3 皇帝与诸王的权力

(1)鞑靼人的皇帝对于全体人民具有了不起的权力。[1] 不经皇帝指定,不论是谁也不敢驻扎在任何地方。由皇帝亲自指定首领们驻扎的地方,首领们则指定千户(长),千户(长)指定百户(长),百户(长)指定十户(长)。此外,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布了命令,无论让他们去打仗或让他们去死,他们都得毫不违抗地服从。他若要将某人的女儿或姊妹纳入后宫,谁也不敢违背;每年或每隔几年他都从鞑靼境内选一些宫女,看中意的,他就自己留下,另外一些则随心所欲地赐给自己的臣下。不管皇帝派出什么样的使者,[2] 多少使者,不管他将使者派到哪里去,他们必须毫不怠慢地供给大车、祇应;也不问贡使或使者来自何方,他们必须一律给予车马、祇应。但是从别的国家来的使臣无论在饮食与衣服上都得忍受很大的苦难,因为给予他们的费用极微薄、极少,尤其是当他们到首领那里去、而且必须在那里停留一个时期之时。发给10个人的费用,刚够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在首领的宫帐中及旅途中,每天只吃一次,而且只给吃很少一点儿,正因为他们即使受了委屈,也无处申诉,因此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地忍受。

(2)此外,无论是首领或其他人,无论是贵族或普通人都向使臣索取礼物,如果索取不到礼物,就瞧不起他们,此外,认为他们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使臣是由大人物处派遣来的,他们就不愿收受较少的礼物,而问道:"你是从大人物处来的,何以只给那么一点儿?"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拿,如果使臣想把事情办妥,就得大大破费。因此我们由于没有东西做礼物,只得将敬神的施主们施舍给我们作为粮食的大部分食物给了他们。还须知道,一切东西都属皇帝所有,没有人敢说"这是我的"或"这是他的",财产、驮用牲口、人,一切都归皇帝所有,关于这一

[1]普兰·迦儿宾确凿地描述了蒙古帝国中大汗的权力。大汗不仅握有充分权力,而且还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与自己臣民生活的全权主宰者。普兰·迦儿宾在这一部分中显然阐述了有关大汗权力的扎撒条文。

[2]1235年在蒙古帝国建立了为整个统治机构系统服务的驿运组织,专门载送使臣,急行使者及一切官吏。当时所设置的驿站上置有20名兀剌赤(马夫)与健壮的马群,还有供来往人员食用的羊群。供应驿站的需索及交通工具"兀剌",是居民身上担负的沉重赋役。

点，皇帝在不久前曾降过圣旨。

(3)一切首领对于自己的属民，也即分配给首领的鞑靼人及其他各部人民都有这样的权力。首领的使臣无论被派到哪里去，皇帝的臣民及所有的人都必须供给大车、祇应，并毫无异议地提供照管马匹、侍奉使臣的人。首领等等必须向皇帝进献母马，让他从马身上挤取马奶一年、两年以至三年，首领的属民则同样地须对其领主提供母马，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简言之，皇帝与首领们可以随意取用臣民的财产，愿取什么取什么，愿取多少就多少。甚至他们的人身也完全受皇帝与首领们随心所欲地支配。

(4)如上所述，皇帝死后，首领们会聚在一起，推选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当了皇帝。他召集诸王举行了会议，把军队分配给他的子侄辈拔都，命他去征讨大算端的土地及木速蛮地区，[1]木速蛮是萨拉森，但说库蛮话。进入他们的土地上时，厮杀一阵后，将他们征服了。但有一个名叫巴耳赤邗[2]的城长期地抵抗他们，城内居民在城的周围挖了许多大坑，坑上面加以遮盖，当鞑靼鞑人向该城冲过来时，就掉进坑里去了。因此他们必须先将这些坑填满，然后才能进占这个城市。另一个名为养吉干[3]的城市，居民听到大军前来，便出城迎降，自愿将城交出，因此，这个城没有遭受破坏，但他们仍将许多人杀死了，其余的人则被遣送走，城市遭受抢劫之后，住上了别地方的人。他们又去征讨斡儿

---

[1]1229年忽里勒台上决定了如下军事远征：①征讨从印度回来后将自己过去领地的一部分夺了回来的花剌子模札兰丁算端。这一远征由绰儿马罕统率，而非如普兰·迦儿宾所说的，由拔都统率。②在拔都参加下，远征钦察人。普兰·迦儿宾所说的木速蛮正是指钦察人而言。

[2]大概是在锡尔河上(马列英注)。巴耳赤邗城位于锡尔河流域上。

[3]养吉干城，位于锡尔河下游，城的废墟今名詹内干。

纳思城。[1] 这座城人口众多，那里既有很多基督教徒，即可萨人、[2]斡罗思人、阿兰人[3]等，又有萨拉森。这座城的政权为萨拉森所掌握。[4] 这座城财富极为充裕，因为它正位于流经养吉干及木速蛮国并流注入海的那条河上，因此这座城成了一个港口，其他地方的萨拉森在此设有大的市场。由于他们攻不下这座城，他们便决开流经此城的

---

〔1〕据普兰·迦儿宾对该城所作的描写判断来看，这个名称应该是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龙杰赤，围攻此城时曾使用河水灌城。关于这一点，波斯史家（伊宾·阿昔儿、志费尼）曾有过报导。必须指出，在《普兰·迦儿宾行纪》的各种手写稿中这个城的名称有多种写法。布列什奈德认为其中一种写法与讹答剌相当。普兰·迦儿宾明确地说过，斡儿纳思位于流经养吉干的一条河上，可作为这一论点的证明。但是虽有这一论据，现代学者还是认为斡儿纳思必须理解为玉龙杰赤，因为普兰·迦儿宾的描述正与玉龙杰赤相合（参阅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雅库博夫斯基：《玉龙杰赤废墟》）同时，托尔斯托夫还认为，普兰·迦儿宾将河名搞错了，这一点是十分可能的。有一条路恰好从南俄草原通往玉龙杰赤，而从玉龙杰赤可通往法剌不（即后来之讹答剌），由此开始了通往中国与蒙古的著名丝道。玉龙杰赤是一座热闹的大城，虽曾遭遇到蒙古人的残酷破坏，但到了 13 世纪时它已恢复了蒙古以前时代的商业与文化意义。伊宾·阿昔儿描绘了玉龙龙赤受破坏的阴暗图画后指出："河中地区重新建设起来了，他们（鞑靼人）在花剌子模城（即玉龙杰赤）附近建造了一座大城"（引自雅库博夫斯基：《玉龙杰赤废墟》，第 13 页）。玉龙杰赤迅速地建设起来了，成为从东欧通向蒙古的商道上的一个枢纽点。大概，1246 年普兰·迦儿宾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参阅雅库博夫斯基：《玉龙杰赤废墟》，第 15 页）。玉龙杰赤废墟位于今库尼亚·乌尔根奇之地，已由雅库博夫斯基进行了彻底研究。普兰·迦儿宾的斡儿纳思这个名称可能由于将玉龙杰赤与阿失纳思两名混淆所致；阿失纳思也是花剌子模的一座城市，位于锡尔河下游。

〔2〕可萨人，突厥系民族，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及伏尔加—顿河草原上。7 世纪时可萨人建立了可萨汗国，这是一个压迫各族人民的军事行政联合体。可萨汗国存在到 10 世纪，在斡罗思大公从西而来及别彻涅格人与钦察人从东而来的打击下崩溃。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最后完全击溃了可萨人。但可萨的城市——伏尔加河上的首都亦的勒城及顿河上的撒耳怯勒或白维查城，后来为其他族人民据有，在汗国崩溃后继续存在着。后来，可萨人作为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甚至也丧失了自己的人种类型后灭亡了。最重要的可萨文文献是对苏联各族人民有意义的"犹太—可萨公文"。普兰·迦儿宾所提到的可萨人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它让我们想到，13 世纪时可萨人还没有完全同化在其他各民族中间。

〔3〕阿兰：阿兰人是属于雅利安种、伊朗支系的人民。参阅库拉科夫斯基教授的详细专题论文《古典作家与拜占庭作家记载中的阿兰人》（见《在涅斯托尔编年史家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集》第 13 册，基辅 1899 年版。）[此文中指出了另一篇主要文献，参阅专书《生动的古代》，1894 年，第 65 ~ 77 页]："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在顿河沿岸地区所遇到的阿兰居民点的命运，是我们所完全……不知的。但指出下列事实未必没有意义：在克里木草原境内，今耶甫帕托里斯克县迄今还有两个乡使用着阿思之名，这两个乡名为比尤克·阿思与库丘克·阿思，即大小阿思乡"（库拉科夫斯基，上书，第 65 页）（马列英注）。

阿兰人是住在南俄草原上的萨尔马特系游牧部落。一部分阿兰部由于民族大迁移逃到了欧洲，另一部分残留下来，加入了可萨汗国。阿兰人在刻赤、奥塞齐亚及顿尼茨河上等地留下了一些富有考古资料的有意义的埋葬地。阿兰人被认为是今奥塞特人的祖先。

〔4〕这里的萨拉森人系指花剌子模人而言。

河水灌城,将全城连人带财产全都没为泽国。

(5)然后他们又向偶像教徒脱耳克[1]地区进军,将脱耳克人打败后,他们又去征讨斡罗思,在斡罗思土地上大肆蹂躏、毁灭城堡、杀害人民,并围住了斡罗思的首都乞瓦(Киев,基辅)城,[2]经过长期围攻,乞瓦,也被他们所攻下,城里的居民遭到了残杀;当我们路过那里时,看到田野里有无数死者的头颅与骨头;这座城市很大,人口很多,而现在几乎化为乌有:差不多只留下了二百座房屋,他们让那里的人民受到最沉重的奴役。从那里前进,他们蹂躏了全斡罗思。上述首领们从斡罗思与库蛮尼牙向前进军,他们与匈牙利人及波兰人发生了战斗,[3]很多鞑靼人在波兰与匈牙利阵亡了;如果匈牙利人继续英勇地抵抗下去,而不逃跑,鞑靼人就将从那里撤军,因为鞑靼人已十分震恐,他们都想逃跑。就在这时,拔都面对他们拔出宝剑,反对他们[的逃跑情绪]道:"不要逃跑,你们想逃也逃不了,如果我们命该战死,也该全体死在一起,因为成吉思汗预言过,我们都会战死的,如果这句话应验了,现在这个时刻已来到了,我们应该忍受才是。"这样,他们都振作起来,不逃

---

〔1〕这是在南俄草原上从事游牧的一个突厥部落(马列英注)。

脱耳克人是11世纪中叶出现在南俄草原上的突厥系游牧民。屡见于斡罗思编年史上。11世纪后叶脱耳克人侵入斡罗思,但被击溃。脱耳克遂西向经过多瑙河,蹂躏了马其顿尼亚,向君士坦丁堡前进。但未到那里,他们就折回来了,因为脱耳克的军事首领显然被希腊人出卖了。这时大部分脱耳克人被歼灭了,小部分人折回来后被斡罗思人驱散,散布在各个城市中。

〔2〕乞瓦(基辅)于1240年秋拔都第二次远征南俄草原时被围。拔都亲自统率着蒙古军队,包围了乞瓦。斡罗思编年史家在描述围城时,记载了大批蒙古军队参加围城:"鞑靼大军云集城下,车声辚辚,无数骆驼与马群嘶号着……连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伊帕齐耶夫编年史》,1871年版,第522页)乞瓦显然于1240年12月初被攻占(各种斡罗思编年史上指出的日期不同,一作11月19日,又作12月6日),城陷后遭到了残酷的破坏。

〔3〕蒙古部队于1240—1241年间多次侵入波兰。他们蹂躏留布林、桑多米尔、克拉科夫后,进入西里西亚,在那里击溃了他们所遇到的西里西亚公爵亨利的军队,亨利在里格尼茨之战中被杀。摩拉维亚也遭受到完全破坏,

与侵入波兰的部队同时出动,蒙古主力部队在拔都领导下从所谓"通向斡罗思的大门"的山路侵入了匈牙利。企图在佩斯进行抵抗的匈牙利军队被击溃了,匈牙利京城在强攻之下被占领了。蒙古人追击着逃跑的匈牙利军队,侵占了一个城又一个城,蹂躏了各地。蒙古部队追赶别拉国王一直追到了亚德里亚海。但是在1242年拔都于接到窝阔台的讣告后中断了军事行动,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回到蒙古去了。西欧编年史家与史学家将蒙古部队的突然撤退解释为骑士部队对他们的反击与他们对骑士的恐惧。但蒙古人撤退的主要原因是:斡罗思人的英勇反抗削弱了蒙古军,以及不里阿耳人的大规模起义——蒙古征服者对于自己的后方十分担心。

跑了，于是全军蹂躏了匈牙利。

(6)从那里回军，他们来到了莫尔多瓦[1]地区，莫尔多瓦人是偶像教徒，被他们所战败。从那里他们又去征伐必列儿，即大不里阿耳，[2]鞑靼人对那个地方进行了彻底破坏。由此往北，他们征讨了巴失乞耳，[3]即大匈牙利，把巴失乞耳人打败了。由此继续往北，他们到了巴罗昔惕人[4]那里。据人们告诉我们说，巴罗昔惕人的胃和嘴都很小，他们不吃肉，而拿来煮。肉煮好后，盛在瓦罐里，吸取一点肉的气味，这样就足以维持体力了，他们不论吃什么都吃得很少。由此前行，他们到

---

[1]莫尔多瓦人，是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莫克沙河及苏拉河上的芬系部落。部分莫尔多瓦土地于1229年被蒙古人所征服。蒙古人对莫尔多瓦人的毛皮、蜜、蜡、粮食十分赏识(参阅科罗特科夫:《金帐汗国北部兀鲁思问题》，第77页)。1239年半壁破毁的莫尔多瓦土地彻底地被征服了。

[2]大不里阿耳:这里所谈到的是由于强大的"不里阿耳"部落联合崩溃后所出现的伏尔加河不里阿耳，拜占庭史学家曾屡次提到他们向拜占庭进行军事远征。"大不里阿耳"于7世纪时在可萨人的打击下崩溃后，一部分不里阿耳人逃到了多瑙河上，另一部分人逃到了伏尔加河中游。在那里建立了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的早期封建国家，这个国家在卡马河流域及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境内。不里阿耳人以其高度发展的文化著称，他们从事农业与畜牧业，拥有许多城市，其中最大的城市为:必里牙耳、不里阿耳、速瓦儿等。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者将必里牙耳城的名称用来称呼整个不里阿耳。普兰·迦儿宾也将不里阿耳人称做必列儿人。在12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宾·法勒端(《伊宾·法勒端行纪》，译自阿拉伯文，克拉契科夫斯基编辑，列宁格勒1939年版)与伊宾·鲁思特的记载中保存了有关不里阿耳人的经济、生活、贸易的有趣报道。1223年不里阿耳人首先遭遇到蒙古人的侵袭，但当时曾予蒙古人以反击。1236年拔都军队破坏了不里阿耳各城邑，征服了不里阿耳人。但不里阿耳人不是一下子就被征服了的，他们起义反对蒙古奴役者;1240年发生了一次特别大的起义。后来不里阿耳并入了金帐汗国。关于不里阿耳可参阅《苏维埃鞑靼自治共和国史》卷1，喀山1955年版，第42~98页。

[3]巴失乞耳[余按:《蒙古秘史》262节作巴只吉惕]。必须指出，阿拉伯与波斯著述家用巴失乞儿惕这个名称表示匈牙利，这也就是普兰·迦儿宾使用这个名词的原因。普兰·迦儿宾在本书中三次复述了这个说法。根据最近的研究，中世纪乌拉尔山麓的巴失乞耳人与匈牙利人之间存在着部落亲缘关系。在游牧部族的打击下，一部分巴失乞耳人西窜，在匈牙利定居下来，剩下的巴失乞耳人与突厥人、蒙古人混合起来，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最后成了民族学上的一个崭新的民族，但也称为巴失乞耳人。

[4]巴罗昔惕:是住在彼尔姆与维亚特省的芬系部落。这里所以提到烟气，是由于他们在夏天常升火驱逐蚊蝇(马列英注)。

阿拉伯与中世纪作家们把居住在维亚特卡河流域及伏尔加河不里阿耳北面其他地区的彼尔米亚克、沃齐亚克等芬系部落称作孛剌昔惕。普兰·迦儿宾所指出的烟气未必能作如马列英所注解的那样具体理解。普兰·迦儿宾在这里显然复述了东北部各族人民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在古代作家的记载中很流行。普利尼、斯特拉波等古代作家都谈到过吸烟气为食的种族。

了萨莫耶德人[1]那里，据说这种人只靠狩猎过生活；他们的帐幕及衣服都用兽皮制成。由此继续前行，他们来到了海上的某地，在那里遇见了一些怪物，[2]据人们确实可靠地告诉他们说，这种怪物全身看来虽是人形的，但腿却与牛腿一样，他们的头虽是人头，而容貌却像狗；他们说完两句人话，说到第三句时即作狗吠，谈话中间他们常吠叫起来，但毕竟他们还是能回到思路上来，可以让人们了解他们谈话的内容。鞑靼人从那里回到了库蛮尼牙，他们之中迄今还有一部分人留在那里。

(7)同时，窝阔台派绰尔马罕带着军队去南征撒耳柯思人，[3]把他们打败了。撒耳柯思人是偶像教徒，没留胡须；他们有如下风俗：父亲死后，他们剺面示哀，在一耳到另一耳之间割一条刀痕。战胜撒耳柯思人后，他们南下征讨阿美尼亚人；但他们通过沙漠时，据人们确实可靠地告诉他们说，又遇到了若干人形怪物，[4]这种怪物只有一只完整的手，另一支只有下臂甚或下臂也没长全，有时长在胸中央，也有只长一条腿的，射箭时需二人合作；他们跑起来连马也赶不上，他们用一条腿

---

〔1〕萨莫耶德人。普兰·迦儿宾关于萨莫耶德的记载是西欧地理学文献关于这个种族的最早记载之一。这一记载除对萨莫耶德的生活与职业作了足够可靠的记载外，还清晰地指出了他们的居住地区，以及迄今没有查明的情况，即蒙古人远征了萨莫耶德人。普兰·迦儿宾所指出的后一情况，我们不论在一般而言对成吉思汗的远征记载不多的蒙古编年史中或在汉文史籍中都未获证明。但是，显然正是普兰·迦儿宾所指出的这一点，导致了受苏联人种学家们支持的所谓萨莫耶德人南源说的建立。这一学说的创说者费雪尔、卡斯特连认为，萨莫耶德人最初住在南部，住在叶尼塞河上游某处，后来他们从那里被驱逐到了北方。

〔2〕显然，马列英以列尔别格的著作（列尔别格：《古俄罗斯历史析疑》，圣彼得堡 1819 年）为根据：在普兰·迦儿宾的这个报导中看出了关于海象与海豹的歪曲报导。《蒙古人的历史》的另一位注释者达维札克认为，普兰·迦儿宾提供了若干有关被萨莫耶德人驱走的已灭迹的某种族的报导，见达维札克：《地理学会颁布的行纪及回忆录汇编》（巴黎，1839 年，第 4 卷，第 493 页）。但是阿列克塞耶夫指出（阿列克塞耶夫：《西欧旅行家报导下的西伯利亚》，第 12 页），普兰·迦儿宾的记载反映了流传于中世纪文献中的关于奇异国及那里所住的怪物的传说，这个看法最为可能。马可波罗、鄂多利克等其他中世纪著述家所谈到的有关狗头人的报导，也属于这类传说。十分有趣的是，关于狗头人的这种传说在蒙古中世纪文献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编年史《刚噶因·兀鲁思合勒》（《恒河之流》）中对于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各族人民有相当详细的报导，其中也有关于狗头人的报导。关于狗头人的传说在亚洲很流行，并为中国人所知，考狄研究了关于狗头人的中国故事后，认为这个传说起源于印度，从印度流传到了别的国家（考狄：《传说中及自然界中的怪物》，第 79～81 页）。普兰·迦儿宾也听到了这个传说。

〔3〕普兰·迦儿宾此处系指撒耳柯思而言。后面他又用这同一名词来表示乞儿吉思。

〔4〕中世纪传说的反映，详见第 32 页注释〔1〕。

跳着向前，如果跳累了，据说就手足并用、侧手翻筋斗前行，伊西多尔[1]把他们称作"齐克洛彼德"。当他们这么着又累了时，就又如前般地跳着向前。鞑靼人将这种怪物杀死好些后，据宫里与皇帝住在一起的斡罗思神甫告诉我们说，这些怪物便组成使团来到皇帝宫里求和。由此前行，他们到了阿美尼亚，打败了阿美尼亚人，并征服了谷儿只[2]的一部分；谷儿只的另一部分便按照他们的命令派人来每年向他们缴纳四万伊贝贝[3]的贡赋；直到如今还是如此。他们从这里进发，到了强大的鲁迷算端[4]的领地上；鞑靼人与他们进行厮杀，战胜了他们。一路打着胜仗，他们一直打到了合列不[5]算端的领地上，现在他们已占领了那个地方，此外，他们还打算占领其他地方，后来直到今天他们还没返回本国。这支军队还向报达[6]哈里发的领地进军，那个地方也被他们征服了，哈里发除进贡巴达金及其他贡礼外，每天须向他们缴

---

〔1〕即西班牙主教、卓越的学者、中世纪早期作家塞维利亚人伊西多尔(570—636年)。他著书甚多，他在所著的书中显示了他的博学，以及善于以通俗精炼的形式普及当代知识的才能。伊西多尔的地理学著作《宇宙》为世人传诵，在这本书中传达出了为当时公认的关于自然的观点及地理学现点。伊西多尔著名的百科全书性质的《词源说》一书也很流行。此书的生命比它的作者要长得多，在好几百年内作为地理报导的主要资料。书中也有关于人所罕知的偏远地方的各种奇异民族的报导，这与中世纪早期的地理知识水平是完全吻合的。普兰·迦儿宾对伊西多尔著作的引用告诉我们说，他对这位去世已六百年的西班牙主教的著作仍是很熟悉的。

〔2〕原文：为谷儿只(格鲁吉亚)的拉丁名称。

〔3〕伊贝贝：显然，这是拜占庭帝国所使用的必赞的一个别称，见本页注释〔6〕。

〔4〕鲁迷算端。古代东方各族人民将罗马称作鲁迷。4世纪时罗马帝国分裂后，鲁迷这个名称仅用于拜占庭。从11世纪初起，鲁迷一语则仅指小亚细亚而言，当乌护—突厥蛮人在亚洲进行侵略时，小亚细亚形成了一个塞尔柱王朝的小亚细亚支系统治下的国家。在蒙古人侵略小亚细亚时，鲁迷算端为阿剌丁·怯亦·阔巴一世(1219—1236年)。

〔5〕合列不：合列不州位于叙利亚北部，以马阿剌城为其首邑，第二大城则是与该州同名的合列不城(今阿勒颇)。全州处于艾育伯朝咱喜儿·吉牙撒丁·哈昔篾力(1186—1216年)的统治下。

〔6〕报达哈里发：报达是巴格达的中世纪名称，为从762年起到1258年止统治伊朗的阿拔思朝哈里发的京城。阿拔思朝最后一个哈里发是木思塔辛，普兰·迦儿宾在大汗贵由登基之时，曾在蒙古帐幕里见到哈里发的使臣。

纳400必赞[1]的贡赋;他们每年都派使臣到哈里发那里去,让他来朝见。哈里发派人带了贡赋及大批贡礼,请求恕罪;皇帝亲自收受了贡礼,但仍派人去叫哈里发来朝见。

22.8 关于战争以及军队的划分,关于武器及作战时的诡计,关于围攻城堡及他们对待投降者的背信弃义,关于对待俘虏的残忍(第六章)

谈完了权力,现在来谈战争,内容如下:首先谈军队的划分,第二谈武器,第三谈作战时的诡计,第四谈围攻城堡,第五谈他们对待投降者的背信弃义及对待俘虏的残忍。

22.8.1 军队的划分

军队的划分如下:成吉思汗下令,每10人置一人为长(就是我们所称作的十夫长),10个十夫长置一百夫长统辖之,10个百夫长置一千夫长统辖之,10个千夫长置一万夫长统辖之,万人之队被他们称作万户。[2] 全军由二至三个首领统率,但他们又服从于其中一个。军队在作战时,若从一个10人队中逃跑了一个、二个、三个或更多的人,则将这些人全部处死,若有一个10人队全部逃跑,而其他10人队没逃跑,则将这个10人队全体处死;简而言之,若他们不是全军整个儿退却,逃跑者一律处死;[3] 同样的,若有一人、两人或更多人勇敢地冲杀上去,而10人队其余的人没有跟上去,这些人就被处死,若10人队中有一人或更多的人被俘,而其余的伙伴没有去救他们,那么这些人也

---

〔1〕必赞,即所谓拜占丁,最初为拜占庭钱币,后来作为任何东方国家所用金币的通称(法语besant源于此)。它的价值不定,由铸造地点(及金的含量)决定。大概,伊贝贝即是拜占丁(马列英注)。

巴托尔德在《马可·波罗行纪》注释中写道:按照玉尔的意见,马可·波罗及其他中世纪作家们将必赞一语理解为阿拉伯的底纳儿(约值五卢布)(巴托尔德编辑、米纳耶夫译:《马可波罗行纪》,圣彼得堡,俄罗斯地理学会出版社,第75页)。

〔2〕原文tima:蒙古语土绵的俄语译名。tima这个词屡见于翰罗思编年史中。

〔3〕大家知道,蒙古军队具有严峻的军纪,这种军纪的律令在成吉思汗札撒中有明文规定。

将被处死。

22.8.2 武器

(1)每个战士至少必须带有下列武器:弓两张到3张,其中至少有一张好弓,3个装满箭的大箭筒,斧子一把,还有拖炮用的绳子。富家子弟佩带尖顶、一面锋利、略作弯形的剑;他们还有装甲马,保护小腿的护甲,盔与甲胄。有些士兵备有甲胄及革制的马护甲,护甲制法如下:他们取一些宽度跟手臂差不多的牛皮条或别种动物的皮条,三四根皮条放在一起灌以树脂,然后将好些皮条用皮线或绳子联结起来,上面的皮条用绳子结在下端,而下面的皮条则将绳结在中间,就这样一一联结起来;因此当下面的皮条弯曲时,上面的皮条就会翘起来,这样联结在一起的皮条在体部围有两三层厚。他们将马的护甲分为5部分:马的两侧,一边一块,从尾部直延伸到头部,在鞍子旁、鞍子后面背部与颈部都加以系结;在薦骨上安上另一块护甲,此处有两块联结在一起,护甲上有一个孔,可让马尾穿出来;在胸部再安上另一块护甲。各部分护甲皆延伸至膝或小腿关节处,额前则置一铁条,从颈的两侧与上述各块护甲联起来。甲胄也分四部分:一部分是从大腿上直到颈部,适应着人的体形制成,紧压着胸部,自手以下则成圆形紧围住身体;在背后另有一块贴在薦骨上,从颈部起直到与紧围住身体的那块相连;肩部一前一后两块,用扣子固定在两肩的两片铁条上;两手上部各有一块,从肩部起直到手腕处,手腕以下就没有掩护,每个膝盖上各有一块;所有各块全用扣子连接起来。盔帽上端用铁或铜制成,但围住颈部与咽喉的那一部分是革制的。革块也按上述方法联结起来。

(2)有些人的甲胄、护甲之类按如下方法用铁制成:他们制了许多一指宽、有手掌那么长的细长铁条,每一铁条上开了8个小孔,铁条内塞进三根致密结实的皮带,铁条一片片叠起来,铁条与皮带用细皮线穿过铁条上的小孔结在一起,在上部他们再缝上一根皮线,这根皮线与别根皮线缝在一起,使铁条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许多铁条仿佛构成了一根皮条,然后再按上述方法一块块连接起来。他们所制的这种铁甲用来武装人或马。他们将这种铁甲擦得铮亮闪光,人们可以从上面

照见自己的脸。

(3)某些士兵用矛，铁矛的颈部有钩子，可以把人从马鞍上钩下来。他们的箭，有两英尺一掌加两指的长度，因为英尺的尺码有多种，我们在这里采用几何英尺的度量制：12大麦粒等于一指宽，16指等于一几何英尺。铁制的箭头极锐利，跟双刃宝剑似的两面都削尖了；在他们的箭筒内常放有一把磨尖箭头用的锉子。上述铁箭头有很尖的一指宽的末端，插进木杆中。他们的盾牌用柳枝或别种树枝制成，这种盾牌除用在野营里，在夜间保护皇帝与诸王外，我们再也想不出，它还有什么其他用途了。他们还有射击禽兽及手无寸铁的人民用的宽有3指的另一种箭，[1]此外用来射击禽兽的箭，还有多种。

22.8.3 关于他们在作战时所用的诡计

(1)他们在作战时，先派遣一个先行队[2]前行，这个先行队除毡子、马与武器外什么也不带。他们不抢劫、不烧房屋、不打野兽，他们只是对敌进行杀伤，歼灭敌人，或迫使敌人逃跑，但他们总是宁可将敌人杀死，也不让敌人逃跑。跟在他们后面的军队便将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见人就俘走或杀死。此后，军队首领们派遣探子去侦探人与城堡，这些探子进行侦查工作都十分机敏。

(2)当他们走到河边，即使这条河很宽，他们都以如下方式渡河：[3]贵人们有一种平滑的圆革，圆革边缘做了许多个小环，穿以绳子，然后用绳将圆革收扎起来，做成一个圆囊，囊内装以衣服与其他财物，牢固地缚住；然后再在中间放上马鞍等较硬的物件，人就坐在中间。这样准备好的船，缚到马尾上，让一个人牵着马，与马一齐游水前进。有时他们手拿两支桨，划着桨渡过河去；同时将马赶进水里，一个人牵着马游水前进、其余的马跟在后面，渡过水或大河。另一些较贫穷的人

[1]蒙古编年史上提到了各种箭，例如“豁朵里”(箭名)、投箭等(参阅《蒙古秘史》198节)。

[2]普兰·迦儿宾的这段记载与蒙古编年史《蒙古秘史》上的资料吻合，《蒙古秘史》上载有一段给进军中亚的先头部队的简短的命令：自回回住的城外绕去，不许动其他百姓。待太祖到时却夹攻(《蒙古秘史》257节)。

[3]普兰·迦儿宾所述用皮船渡河的方法，与迄今还用于西藏北部的方法相当接近。这是游牧民常用的渡河方法。

具有牢固地缝成的皮囊；这是任何人都具备的。在这种囊或袋内装以衣服及自己的一切财物，袋上部牢牢缚紧，挂在马尾上，然后按上述方法渡河。

(3)要知道，每次当他们遇见敌人时，他们便迎上去，每个人对准敌人射去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不能战胜敌人，就重新退回来；他们这样退却是行使一种诈术，他们想让敌人追上来，进入他们布下埋伏的地方；如果敌人进入了埋伏地点，他们便加以围歼。如果他们看到与他们作战的是大部队，他们就撤退，后退一至两天的路程，再悄悄地去袭击另一个地方，进行抢劫；同时还杀人，破坏，进行蹂躏。如果他们看到这么着也办不到，他们便后退 10～12 日的路程。有时他们驻扎在安全地段伺机再起，直到敌军分散开来时，他们才悄悄地来到，蹂躏全部土地。他们作战时十分狡猾，因此他们与其他族人民已经厮杀了四十多年。

(4)战斗将开始时，全军按作战的阵势布置起来。首领或军事长官们不投入战斗，却面对着敌人远远地站着，让一些骑马的少年与一些妇女和马匹跟在自己身旁。有时他们制出一些人像，立在马上，这样做就使敌人感觉声势浩大。他们将俘虏及跟随他们的其他各族人民的队伍派去冲头阵；这些人中间可能也派了一些鞑靼人与他们一起冲杀上去。另一些由较勇敢的人组成的队伍则在敌人没觉察的情况下，从远处由左边或右边绕过去，将敌人包围起来，[1]围困在中央，然后他们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虽然他们有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敌人却以为他们人数很多很多。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首领或军事长官身旁的那些少年、妇女、马匹与人像时，他们以为这些人全是战士，便陷于恐慌与混乱。若偶尔敌人敢于应战，鞑靼人就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跑，当敌人开始逃跑，互相分离，他们便进行追击，追击中杀死的人比作战时所杀死的人还要多。

---

〔1〕将普兰·迦儿宾的记载与较晚的一部蒙古编年史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该书中留下了关于作战时按照所谓“弓键”即“用弧形阵势包围敌人”的特殊阵式布阵的记载（参阅扎姆察拉诺：《17 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列宁格勒 1935 年版，第 58 页）。显然，13 世纪征服时期，蒙古人也曾用过这类弓形阵势。

但我们还须知道，如果能有别的方式，他们是不愿进行厮杀的，他们用箭杀伤人马，当人马被箭杀伤很多时，他们才与敌人进行厮杀。

22.8.4 围攻城堡

他们以如下方法攻占城堡，遇有城堡，他们就围住它；他们常常将城堡围困得水泄不通，昼夜不停地用炮与箭猛烈地对敌攻击，以使城堡里的人片刻不得休息；鞑靼人则将军队分为几批，轮流进攻，更替休息，因此他们不至于过分疲劳。如果这么着还不能攻下城堡，他们便抛射希腊火，[1]他们还常将被他们杀死的人的脂肪，熔化后泼到房屋上；据说，火扑到这种脂肪上，燃烧起来时就熄灭不了；但扑灭的办法毕竟还是有的，听人讲，可用酒或麦酒来扑灭；若它扑到人体上时，则可用手掌来扑灭。如果城堡有河，他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攻占城堡，他们就将河堵死或另辟一河床将水放走，若有可能，他们就放水淹没城堡。如果这么着还行不通，他们就从城堡的地下挖掘坑道带着武器攻进去。攻进去后，一部分人放火，另一部分人与城堡里的人进行战斗。如果这么办还攻不下来，而敌人得不到外援，又无力击退他们，他们就在城下扎营、设上堡垒，抵挡敌人的矛头，作长期围困之计。

22.8.5 鞑靼人的背信弃义以及他们对待俘虏的残忍

当城堡被他们围困住时，他们便和婉地对城堡中的居民讲话，给他们许多许诺，好让他们将城堡交出；如果他们投降了，鞑靼人就说："你们都出来吧，好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处理你们。"他们出来后，鞑靼人就问，他们中间哪些人是手工业者，这些人都被留下了，而其余的人，除了鞑靼人想留做奴隶的，全部用斧砍死；他们即便有时据说饶恕了某些人，但受人尊敬的高尚人物却永远也得不到饶恕；有时他们偶尔由于某些原因留下了某些贵人，但这些人不论哀求也好、赎买也好，总无法从俘虏中脱出。战时，他们将俘来的所有的人全部杀死，只

---

[1]希腊火：是古代与中世纪作战时使用的燃烧混合物的名称。最早使用这种混合物的人是希腊人，因此得名为希腊火。这种混合物中包括石油、树脂等成分。几乎所有各族人民都知道它的用法，蒙古人显然从汉人那里承袭了它的用法。蒙古编年史上讲到了一个传说，据说蒙古人在许多只鸟的尾部系以燃着的棉花或灯芯，将鸟儿向被围的城内放去，纵火烧城（见《阿勒坦·脱卜赤》）。这个传说反映了蒙古人在围攻城市时实际使用了燃烧物质。

留下一些充当奴隶的人。他们将指定要屠杀的人分配给各百夫长,让他们用双刃战斧砍杀;百夫长便将俘虏分配下去,交给每个奴隶杀10人上下,具体数目则由长官随意规定。

22.9 他们怎样与人们媾和,他们征服了哪些地方,抵抗他们的是哪些地方,他们对待臣服者的残酷性(第七章)

他们怎样进行战斗讲完了,现在来讲被他们所征服的土地。我们按如下方式来讲:首先讲他们怎样与人们媾和;第二,讲他们征服了哪些地方;第三,讲哪些国家英勇地抵抗了他们;第四,讲他们对待臣服者的残酷性。

22.9.1 他们怎样与人们媾和

(1)必须知道,如果人们不屈从他们的话,他们决不与人们进行媾和,因为如上所述,成吉思汗降过这样的圣旨:若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征服所有各族人民。鞑靼人对降服的各族人民的要求是:他们想去出征时,就须跟随他们一起去征伐所有的人,还须将所有一切,包括人和财产,抽十分之一缴给他们。他们从10个少年人抽走一个,对于少女也是同样情况;他们将这些人押到自己国家里去,充当奴隶。其他东西他们也进行计点,并按他们自己的习惯进行分配。当他们完全控制了这些人后,他们不履行任何许下的诺言,只是尽他们所能找到一切办法来进行陷害。例如,当我们路过斡罗思时,一个据说是出自贵由与拔都那一派系的萨拉森被派遣到斡罗思来,根据后来人们对我们说,任何有3个儿子的人,这位总督都要抽走一个;同时他还带走了所有没娶妻的男子及没有正式丈夫的妇女,他将行乞度日的穷人们都用同样方式赶走了。按照他们的习惯,对其余的人进行统计后,他下令道:每一个人,不论老幼、甚至出生才一天的婴儿也算在内,不论贫富,一律必须缴纳下列贡税,即:白熊皮一件、黑海狸皮一件、黑貂皮一件、某种动物的黑色皮子一件(这种动物产于当地,它的拉丁名我们说不上,但德语称

做 iltis,波兰人或斡罗思人称做“多霍里”、[1])黑狐皮一件。谁若不缴上列贡税,就要被送到鞑靼人那里,成为他们的奴隶。

(2)他们也派人去召见各国的国王,让其刻不容缓地来见他们;当那些国王来到时,却得不到任何应有的尊重,而被与另一些渺不足道的人物同等看待,还必须向领袖与他的妻子以及官吏、千户、百户们献上厚礼;此外,所有的人,甚至奴隶们,全都十分讨厌地向这些国王索取礼物,而且也向派遣来的使臣们索取。他们甚至杀死某些国王,例如米海尔[2]等等就被杀死了;但为了招引其他的人,其余的国王则被放回去了;他们还用饮料或毒药害死某些人。他们心中打算的是:独霸世界,因此他们总想找机会对付贵人们,杀害他们。他们向那些被他们放回去的其余的国王们索取了兄弟或儿子(作人质),这些人任何时候也不准放走,例如雅罗斯拉夫的儿子、某阿兰领袖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这样。如果父亲或兄弟死后没有继位者,他们从来也不放儿子或兄弟回去;这时他们就整个儿地夺取了他的国家,例如我们看到,对肃良合的一位领袖就是如此。

(3)在被他们放回去的国王的领土上,他们委派了八思哈[3]或总督;该国自领袖以下都必须听他吩咐,若有某城或某地的人民违抗他的意志,这个八思哈就以不忠诚于鞑靼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将这个城市或地方摧毁,用强大的鞑靼部队杀死城市与这个地方的人民,鞑靼部队奉支配上述国土的长官之命,常突然袭击居民,例如不久前我们在鞑靼地域中时,他们在库蛮地区自己所建的一个斡罗思人城市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不但占领土地的鞑靼国王也即鞑靼总督如此,而且路过这些地方或城市的所有的鞑靼人,尤其是被认为较高贵的人物,仿佛全是居民的统治者。此外,他们还无条件地索取与夺取金银及他们看中意的其他东西,他们想拿多少就拿走多少。

---

〔1〕可与《卡拉姆津书》(卷 3,注 27)中所引用的《古代英雄传》上的引文作一比较,那里把黄鼠狼称作“德霍里”(马列英注)。

〔2〕《伊帕齐耶夫编年史》,1871 年版。

〔3〕原文“巴沙甫”:斡罗思编年史上作“八思哈”(参照马列英注:《布列什奈德书》,卷 2,第 78 页)。

(4)此外,归顺的国王们发生了纠纷,必须到鞑靼皇帝那里去受审理,不久前谷儿只[1]皇帝的两个儿子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儿子是合法生的,名为篾力,而另一个名叫大卫的儿子是私生子;父亲把部分土地留给了他,蔑力年岁较少,他见上述大卫已先到鞑靼皇帝那里去了,便与他的母亲一起去见鞑靼皇帝。蔑力的母亲就是谷儿只女王,该国可由女的来统治,她丈夫是靠着她统治国家的;她在半路上死去了。他们来到那里后,便将大量礼物分赠给许多人,他想要回父亲留给大卫的那部分土地,因为大卫是私生子,没有权利领有那份土地。大卫却说:"我是妾所出之子,但我请求按照鞑靼习惯公平地待我,合法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与女奴的儿子之间不应该有什么差别。"因此,判决就不利于合法的儿子,按照判决要他服从年长的大卫,让他安然统辖父亲留给他的土地,这样幼子白丢了赠送的那些礼物,对兄弟大卫的官司也打输了。

(5)他们也从离他们较远并与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所畏惧的、不受他们统治的邻界的人民那里取得贡赋,据说对待这种人民很体贴关怀,为的是他们不起兵反抗,也为了让别族人民不害怕地投降他们。他们对待斡罗思[2]人或谷儿只人就是这样的,据说他们从谷儿只人处每年获得四五万伊贝贝或必赞[3]的贡赋。还没有受到他们侵扰的其他族人民,据我们得知的消息,他们也想去加以征服。

22.9.2 他们征服了哪些地方

被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名称如下:契丹、[4]乃蛮、肃良合、哈剌契丹

[1]虽然普兰·迦儿宾对谷儿只两王子的竞争所作的记载,并不完全可靠,但同时却包含了其他史料没有记载的若干细节。根据阿美尼亚与谷儿只编年史上的资料(阿康人格里戈尔:《弓箭手民族历史》,勃莱克与弗赖伊编辑,剑桥—马萨诸塞,1954年,第293、317页),当时谷儿只所发生的事件是这样的:蒙古人侵入后,谷儿只皇帝拉申·乔治四世于1223年死去了。其妹鲁苏达娜女王继位,因为他的儿子大卫长期为鲁迷算端所俘,在地牢里关了7年。鲁苏达娜想让她自己的、一个也叫大卫的儿子继承她。因此她带着自己的儿子与从俘虏中脱身出来的侄儿动身到拔都帐幕里去请求封地仪式,但她自己却[在途中]死去了。拔都汗将王子们打发到哈剌和林去见大汗,他们从大汗处取得了谷儿只王国的王位,鲁苏达娜的儿子当了大卫四世,但须服从于拉申·大卫五世。普兰·迦儿宾在他的行纪中用蔑力的尊号来称呼前者,却没有称呼他的名字。

[2]即阿巴思(哐阿卜合思)人,参阅达维札克书第497页,(马列英注)。

[3]必赞,即所谓拜占丁,最初为拜占庭钱币。大概伊贝贝即是拜占丁。

[4]系指北中国或金帝国而言。

或黑契丹、库蛮、秃马惕(Тумат)、[1]斡亦剌、哈剌尼惕(Караниты)、畏吾儿(Huyur)、速蒙古、蔑儿乞、蔑克里、撒里畏吾儿、巴失乞耳即大匈牙利国,乞儿吉思(Кергис),[2]怯失米儿(Касмир),[3]萨拉森,[4]木速蛮,[5]突厥蛮(Туркоманы),[6]必列儿即大不里阿耳,火罗剌(Корола),火木黑(Комуки),[7]波黎吐蕃,巴罗昔惕,合思(Кассы),[8]雅科卑特(Якоσиты),[9]阿兰或阿速[10],斡别思或谷儿

---

[1]豁里·秃马惕:为成吉思汗之前早已存在的由若干蒙古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如果将全部蒙古部落划分为森林部落与草原部落(见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第33~36页),豁里·秃马惕属于"森林部落"。豁里·秃马惕人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发动了好多次起义。拉施特丁指出:"由于秃马惕人是奸恶的部落"(见卷1,第1册,第122页),在一次起义中遭到镇压,许多人民被屠杀了。

[2]即乞儿吉思及谦谦州,为蒙古西北面叶尼塞河与鄂毕河上游的突厥系部落。谦谦州这个名称指示了居住地,"谦"表示叶尼塞河上游,这个字保留在今叶尼塞河支流谦奇克这个河名中。乞儿吉思于1206年被成吉思汗所征服。

[3]即怯失米尔。

[4]此处之萨拉森人即阿勒颇算端的臣民,参阅达维札克书,第572页(马列英注)。

[5]系指花剌子模人。

[6]即土库曼人(马列英注)。

[7]这些部落名由达维札克作了一些假设性的还原:手抄本中原作 Catoro comoty, Korola, Tomici, Colona Thorati。据这位学者的推测(达维札克书,第575页),火罗剌即卡姆宾的阿尔别特的所谓巴失乞耳的邻部火列里人,火木黑即达格斯坦的莎米黑、火米克或火木黑部(马列英注)。

显然,普兰·迦儿宾所说的火木黑就是火米克,这是在钦察草原的一部分、即高加索山麓下的草原上从事游牧的突厥系部落。

[8]又作 Jassi。关于此部不得而详。参阅达维札克书,第574页(马列英注)。

[9]普兰·迦儿宾除列举了各部人民的名称外,还列举了某些东方流行的基督教派名称,其中就有人神合一说异端派的雅科卑教派。雅科卑教派于451年在世界宗教会议上被斥为异端。人神合一说与正统基督教会的分歧是在耶稣的唯一本质或本性问题上,此说否认耶稣的人神本性、即双重本质的教义。人神合一说及其支派在中世纪时流传颇广。

[10]阿兰人是属于雅利安种、伊朗支系的人民。

只，聂思脱里，[1]阿蛮，[2]康里。[3] 库蛮，不儿塔思即犹太教人，[4]莫尔多瓦，脱耳克，可萨，萨莫耶德，波斯（perses），塔儿乞（Тарки），[5]小印度或埃塞俄比亚（Эфиолия），撒耳柯思（Чиркасы），[6]斡罗思（Руфены），[7]报达（Балдах），撒儿塔（Сарты），[8]以及还有许多我们不知名的土地。我们还看到了从上面这些国家中来的男男女女们。

22.9.3 哪些地方英勇地抵抗了他们

英勇地抵抗他们的地方以及直到如今还没有被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名称如下：大印度，蛮子国，[9]阿兰的一部分，汉地的一部分，撒哈辛。[10] 据那里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围住了上述撒哈辛人的一座城市，想攻下它，但撒哈辛人造了炮来与他们的炮对抗，并把鞑靼的所有

---

〔1〕聂思脱里教派：为公元5世纪主教聂思脱里在叙利亚创立的基督教派，这个教派用他的名字得名为聂思脱里教派。413年聂思脱里在以弗所被世界宗教会议开除，他所宣传的基督人性说被宣布为异端。叙利亚的聂思脱里教派很快地在亚洲传播开来，它传到了中国与蒙古，并通过畏吾儿人传给了克烈与乃蛮人。考古资料证实了编年史上关于聂思脱里教派在中央亚细亚各族人民中间传播的记载。后来，中国长城境外曾发现了拉铁摩尔所曾描述过的聂思脱里教徒城市的废墟。中国南部也发现过聂思脱里教派墓碑。

〔2〕阿蛮，即阿美尼亚人。

〔3〕康里是钦察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之一。13世纪时康里人住在札牙黑河（乌拉尔河）以东。

〔4〕达维札克提出可在高加索库腊河右岸别多吉河与阿位斯克河之间找到这一部落（马列英注）。

对达维札克的假设未必能够同意。原文最有可能是指不儿塔思人，他们是在蒙古人远征伏尔加不里阿耳人时被征服的。不儿塔思人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右岸，同不里阿耳人发生了联系。9世纪时不儿塔思人臣属于可萨人，当时犹太教在可萨人中间十分流行，可能也传给了不儿塔思人。斡罗思编年史及中世纪阿拉伯作家的文集中对不儿塔思人屡有记述。不儿塔思人被蒙古人征服后，很快地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与部落特质，同化在金帐汗国各民族中间。

〔5〕此部人民不详，手抄本中写作：Tarci，Tarti，Tati，Thaos，Thuaos（马列英注）。

〔6〕此处原文应即撒耳柯思人（马列英注）。

〔7〕此处原文应即斡罗思人（马列英注）。

〔8〕蒙古人把中亚居民，尤其是花剌子模人称作撒儿塔兀勒。普兰·迦儿宾袭用了这个蒙古名称。撒儿塔这个名称源于梵语 Sārtha，意为"商人"。

〔9〕即南中国，伊斯兰教作家作 Manzy，中国史家作蛮子国（《达维札克书》，第576页）（马列英注）。

黄河以南的中国宋朝土地，被称为蛮子国。

〔10〕东方史家作 Saqsyn（撒哈辛），是同可萨人及大不里阿耳人毗邻的民族，大概是芬系民族（《达维札克书》，第576页）（马列英注）。与普兰·迦儿宾同行的别涅迪克特曾指出，当他们到东方去、行经库蛮尼牙时，位于右方有一个被认为哥特人的基督教徒撒哈辛国。柔克义认为，这是克里木的哥特人；他引证了《鲁布鲁克行纪》来证明此点。

大炮全都摧毁了;结果由于大炮与巴里斯[1]的轰击,鞑靼人无法靠近城前去厮杀;最后,他们在地下挖了坑道,冲进了城里;一部分人纵火烧城,另一部分人进行厮杀。城里的居民派一部分人去灭火,另一部分人勇敢地与冲进城里的人搏斗,杀死、杀伤了许多鞑靼人,又将他们赶了回去;鞑靼人看到无法可施,又损失了许多人,只得撤离了那里。

22.9.4 他们对待臣服者的残酷性

在萨拉森人及其他人民的地区,他们就像是那些人民的主人;他们押走了最优秀的工匠,让他们为自己做各种工作,另一些工匠则按照各自的行业向他们缴纳贡物。他们将全部庄稼收割下来送进主人的谷仓;主人发给他们种子及刚够他们吃的粮食;另外一些人则每人每天按重量发给很少一点粮食,此外除每星期三次配给少量的肉外,什么也不发给了。但他们只是对待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如此。此外,只要主人愿意的话,他们就将所有的青年人连同家小一起带走,让奴仆们一起跟着他们走。这时这些青年人就算做鞑靼人的一员,正确地说来,应算做他们的俘虏,因为他们在鞑靼人中间得不到鞑靼人所享有的那种尊敬,而受到与奴隶同等地看待,要像其他俘虏一样地被派去担任一切危险的事。战争中,拿他们冲头阵,在通过沼泽或险湍的河流时,则让他们先渡。他们还须担负一切必须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侮辱了某人或不听从吩咐,就会像对付驴一样地杀死他们。简而言之,他们如果当不上金匠或其他较高级的手工业者,吃喝就很少,穿得也很破烂。某些人的主人极苛刻,什么也不发给他们,他们在为主人干了许多活以后,再也没有时间来为自己挣一些额外收入了,除非他们抽出休息或睡眠时间来干,但这也只有那些准予有家小及帐幕的人才能行。那些在家里被当作奴隶使唤的人确实值得怜悯:他们出去时常常只穿一条皮裤,光着上身、胳膊和腿,夏天受赤日烤晒,冬天则冷得要命。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冻掉了手指和脚趾;也听到有些人冻死了,或者全身

[1]巴里斯,即弩机。"弩机有时大排异常:波罗维赤汗康察克之弩机,好架需用五十人拉射"(《伊帕齐耶夫编年史》,1871年版,第428页)。萨瓦伊托夫:《古俄罗斯家具、衣服、武器等物的描述》圣彼得堡,1896年,第123页(马列英注)。

各部分肢体都冻坏了。

22.10 怎样与鞑靼人作战，他们有什么意图，论武器与军队的组织，作战时怎样对付他们的诡计，关于城堡的防守，怎样对待战俘（第八章）

被他们所征服的土地讲完了，现在来讲怎样与鞑靼人交战。讲述内容如下：首先谈他们的意图，其次谈武器与军队的组织，第三谈作战时怎样对付他们的诡计，第四谈城堡的防守，第五谈怎样对待战俘。

22.10.1 鞑靼人有什么意图

（1）鞑靼人的意图为：若有可能，就要征服全世界，如上所述，这是成吉思汗对他们下的命令。因此他们的皇帝在圣旨中写道："上天眷命普天下皇帝"；在玺印上[1]刻道："上天眷命普天下皇帝贵由汗玺

---

〔1〕普兰·迦儿宾所引用的题词原文与盖在由普兰·迦儿宾带回来、保存在梵蒂冈档案中的贵由汗国书（关于这份国书，见第368页注释〔1〕）上的玺印题词大不相同。国书与玺印经伯希和研究后发表了出来。玺印上的原文包括六行，刻的是蒙古字：

Mongka t(ä)ngri – yin Kücün – dür yeke mongγol ulus – un dalal – in xan j(a)rl – (i)xil bolγa irgün – dür kürbäsü büširätügüi ayutuγai.

（上引原文采用了伯希和使用的拼音），意即："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人达赖汗圣旨。敕旨所至，臣民敬肃遵奉。"

这几行题词值得特别注意。题词中提到的"大蒙古人"即普兰·迦儿宾谈到的4个蒙古部落之一（见本书前面）。题词中用一个不平常的尊号"达赖汗"来称呼蒙古大汗，达赖汗可译作"海洋汗"，意即普天下之汗。

题词末行为禁语，与用蒙古敕令"惶恐从命"结尾的禁语公式相近。通常刻在牌子上的结束语"不从命者罪至死"，也就是这一类禁语。

可以说，蒙古汗的侵略野心在汗的玺印的题词上有露骨的表现。从普兰·迦儿宾引述的若干题词中也部分地反映出了这一点，但普兰·迦儿宾是根据汗的秘书官镇海、八剌、合答黑所述，将题词的内容记录下来的，转写成拉丁文时就不太正确了。所盖的这颗印还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之点，即这些题词是由首饰匠科兹马刻的，整个玺印就是他制成的；科兹马就是曾在普兰·迦儿宾患难时帮助过他的那个人，后来当普兰·迦儿宾回忆起他来时总是那样地热烈。显然，科兹马是蒙古人远征斡罗思诸公国时从那里俘到遥远的蒙古来的一个人。斡罗思巧匠的技艺与他那灵巧的双手创造出了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物件，博得了周围人们的赞扬（大汗的宝座也是科兹马制成的），这是我们从普兰·迦儿宾的记载中所能获知的事。

印。”因此，人们告诉我们说，只要别族人民不降服，他们就决不与之媾和。因为除基督教国家外，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尚未为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了，因此他们准备来进攻我们。为什么这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了呢？当我们在鞑靼地域上时，我们列席参加了几年前举行帝选的庆祝会，那次会上所推选的皇帝(用他们的语言来说，也就是汗)就是贵由。如果他们对教皇陛下、国王与西方各族基督教人民发布了命令，而不予遵行，贵由汗与全体王公们就要举起反对教会与罗马帝国的旗帜，反对各国基督教徒及西方人民的旗帜。据我们看来，他们下的命令，我们是根本无法遵行的，因为这是前所未闻的、极端不能忍受的奴役，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用这样的奴役加在被他们征服的所有各族人民身上。我们无法对他们有半点信任，无论什么人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话，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对所作的诺言就一概不负责任，在各种事情及各种诺言上他们十分狡猾，如上所述，他们想将所有的国王、大臣、战士与高尚的人们全都从世界上消灭个干净，他们也正是狡猾与巧妙地准备这样地来对付自己的被征服者。他们如此地卑鄙龌龊，基督教徒决不能向他们屈服，信仰上帝这件事在他们那里算不了什么，[一旦屈服则]灵魂毁灭、肉体会遭受种种难以置信的折磨；当然他们起初逢迎你，但后来却会像蝎子般地螫人、折磨人。其次，他们人数比基督教徒为少，身体也较基督教徒为弱。

(2)在上述帝选大会上，调遣了军队与统将。从帝国的每块土地上他们从十个人中间抽调了3个人，这3个人的随从们也跟随他们出征。一支军队，据人们告诉我们，将经由匈牙利杀过来，另一支军队则经由波兰杀过来；他们准备不停地厮杀上18年。他们规定下了进军日程：去年三月我们路过鞑靼地区，在斡罗思遇见了从全体鞑靼人中征集来的军队；他们将用三四年时间打到库蛮尼牙，从库蛮尼牙再向上述地区侵袭。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第三个冬天过后继续打过来，或者他们在等候时机，准备有力地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不是主出于仁慈，正如当他们进入匈牙利与波兰时那样予以若干阻难，这一切就会成为确凿不移的事实了。他们将向前进，战斗30年，但就在这时

他们的皇帝被毒害了,[1]由于这件事他们直到如今还没有什么动静。但现在,由于新皇帝已经重新即位,他们又在准备战斗了。还须知道,皇帝亲口说过,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到里沃尼亚与普鲁士去。

(3)由于他们想毁灭或奴役全世界,而那种奴役可以说是我们的人民所无法忍受的,因此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抗击他们。如果一个地区不愿援助另一地区,那么抵抗他们的土地都将陷于毁灭,同时他们常带着被俘来的人民去征伐另一些土地,俘虏总是被驱到队伍的最前面。俘虏若不好好作战,就予处死,如果作战颇力,鞑靼就用种种许诺及甜言蜜语笼络他们,使他们不致逃走,还答应他们,要让他们成为大老爷,当鞑靼人估计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逃走了,便将他们充作倒霉的奴隶;对待妇女也是同样,他们留下她们做女奴隶或妾。这样,他们率领着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蹂躏了另一些土地。据我们看来,如果神不愿为居民而战,没有一个地区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来抗拒他们,因为如上所述,人们是从鞑靼强国的各地被召集到战场上来的。因此,如果基督教徒想要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土地与基督教,国王们、大公们、贵族们与各地统治者们必须联合起来,用共同的决心在他们开始从地面上散开来以前,派人去抗击他们,因为他们一旦散开来后,就没有一个地区能恰当地援助另一地区,鞑靼人将蜂拥而来,到处搜索人民,杀戮人民,若有人进了城堡闭关自守,他们就用三四千人以上将城堡四面包围起来,而他们继续杀奔各方,屠戮人民。

22.10.2 关于武器与军队组织

(1)想同他们战斗的人,每人必须备有下列武器:好的硬弓;他们很惧怕的巴里斯(弩机),充足的箭支;好铁打成的棒槌(dolabrum);长柄斧(箭必须磨尖,巴里斯必须像鞑靼人那样在烧热时投入盐水中进行淬火,以使它能穿透武器);带铁钩的剑和矛,以便将他们从马鞍上

[1]普兰·迦儿宾转述了关于窝阔台之死的某种传闻,据《元史》上说,他是饮酒过度而死的[《元史·太宗纪》:"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辛卯,迟明,帝崩于行殿"——余注]。如果将普兰·迦儿宾的记载跟《秘史》上关于窝阔台得病及拖雷喝了为他准备的药而死去的记载(见《蒙古秘史》第272节),也就是说有人企图毒死窝阔台的记载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他的这段记载是值得注意的。

钩下来,因为他们极易从马上摔下来;刀子与双重甲胄,因为双重甲胄不易被箭穿透;盔甲及其他掩护体部与马以抵御他们的武器与箭的战具。如果某些人没有武装得如我们所说的那么好,那么就应像鞑靼人那样将这一部分人放在后面,拿弓或巴里斯向他们射击。为了有可能拯救躯体、心灵、自由等等,必须不惜金钱准备武器。

(2)各队必须像鞑靼人那样地服从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与军队的领袖们。这些领袖们应当像鞑靼人的领袖一样,无论如何也不投入战斗,他们必须注视着军队,维持秩序。他们还应当规定下同时投入战斗与否的军法,注视着全队阵形,任何人弃离冲杀上去或进行搏斗的其他士兵,就跟不是全体总退却而逃跑的人一样,必须予以严厉处分,因为这时一部分[鞑靼兵]就会去追击逃者,用箭杀伤他们,另一部分[鞑靼兵]则与剩下的人厮杀,由于陷于混乱,剩下的人与逃跑者都将覆灭。同样的,谁若于最后战胜敌军以前,去拣拾战利品,就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鞑靼人是毫不容情地杀死这种人的。

22.10.3 作战时怎样对付他们的诡计

(1)作战的地点应尽量选择在有一片平坦之地延展着的地方,这样便可从各方面发觉鞑靼人;最好能选择在一个后面或侧边有大树林的地点,这样鞑靼人就无法从树林与队伍间潜入。不应该一下子将全部队伍聚集在一起,应组成许多个队,互相分离开,但也不应彼此相距太远;必须派遣一个队去迎击鞑靼的先行队,如果鞑靼人佯装逃跑,不要远追他们,如果有时无法预计,是否会被敌人诱入他们所惯用的预设的埋伏地点,其他队伍就应准备于必要时去援救这支队伍。除此,必须在各个方向上布置探子,以便觉察到鞑靼人的其他队伍从左面、右面或后面杀来,好派队伍去迎击他们;因为他们老是想将自己的敌人包围在中央;因此必须极端谨慎,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军队最易遭到失败。队伍也须谨防,不要远追他们,因为他们惯用埋伏之计,他们在作战时多以诡计取胜,而不采取硬拼。

(2)军队领袖应随时准备于必要时去援助投入战斗的部队,因此应当避免一气儿追赶他们,以免战马困乏,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马,而

鞑靼人对于奔驰了一天的马，总要息养上三四天再乘骑；由于他们的马很多，他们用不着操心他们的马是否困乏了。当鞑靼人退走了，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不得撤离，或互相分散开来，因为他们佯装退走，想分散开我们的军队后，无阻碍地侵入我们的土地，蹂躏它。还须按照常识注意到储粮的过分消耗，以免由于粮食不足不得不将军队撤回，为鞑靼人打开了歼灭军队、蹂躏整片土地的道路，让鞑靼人扩散开来后坏了上帝的名声。应当尽量做到，当某些战士该换下来时，就应让其余的士兵接替他们。

(3)我们的领袖还应当日日夜夜地保护好军队，不让鞑靼人突如其来地向军队进行袭击，因为他们就跟恶魔似地，满脑袋都是恶毒的阴谋与害人之计；此外必须昼夜时刻准备着，不得脱衣而睡或乘凉而坐，以免处于无准备状态，因为鞑靼人是永远警醒着的，他们想看出如何来下毒手。预料到鞑靼人要到来与担心他们到来的各国居民，应备好储存谷物的掩蔽坑及其他设备，原因有二，一即不让鞑靼人占有谷物，二则倘若上帝仁慈，日后鞑靼人从那里逃出去后，就有可能取回这些谷物。干草与麦稻必须烧掉或牢牢地藏起来，好叫鞑靼人的马找不到饲料。

22.10.4 关于巩固城堡

要想巩固城堡，首先必须看清楚它的地势。城堡的地势最好是这样：使它不致为炮和箭所攻克，使它备有充足的水与木柴，使它的进出道路尽可能不被堵死，还须拥有足够的人员以便更替作战。也须小心地注视着，不让鞑靼人使用某种诡计夺取城堡。应备有足以维持多年的储粮，必须始终小心在意地保存储粮，粮食消耗应有一定幅度，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被围困在城堡里会有多长时期。他们对某城堡展开围攻后，常一连气围攻上许多年，今天在阿兰人的土地上有一个城市所遇到的情况就是如此。据我们推想，他们已将它包围了 12 年，城民英勇地抵御他们，杀死了许多鞑靼人与鞑靼大臣。没有这样的有利地势的其他城堡，必须筑好城墙，在城墙四周，围以深壕，加强巩固；还须备足弓、箭、石头、投石机。必须小合提防，不让鞑靼人搬出自己的大炮，

要用我们的大炮反击他们的炮;有时鞑靼人使用阴谋诡计筑起了他们的大炮,就要尽可能地用我们的炮加以摧毁;还须使用巴里斯(弩机)、投石机、炮进行抵御,不让他们接近城下。还应当按照上面所述在其他方面进行准备。必须小心在意地注视河畔的城堡,不让他们用水灌城。还须知道,他们宁愿将人们围困在城堡里,而不愿在野地上进行阵战。他们说,这是他们关在厩里的小猪,因此他们就像上面所述那样地派人看管住了。

22.10.5　怎样对待俘虏

若有鞑靼人于作战时从马上摔下来,那时应立即将他擒住俘走,因为他在地面上就会用箭猛射,杀伤人马。如果将他们看管起来,可以说就能靠他们取得持久和平,或取得大笔金款,因为他们彼此间十分友爱。至于怎样来辨认鞑靼人呢,前面叙及他们的形貌时已讲过了;但是当将他们俘住、加以看管时,必须指派警惕性高的看守人来看管,不让他们逃走。常有许多其他族人民与他们混在一起,但根据前述形貌就可以将他们区别开来。还须知道,跟随他们的军队在一起的,有许多人一遇时机有利,并取得我们的信任不杀他们时,就会从鞑靼的各部队中对鞑靼人作战,这是他们亲自对我们说的,他们将成为鞑靼人的最大祸患和强大敌人。

上述种种,我们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写出来,只是因为这些事都是我们亲自耳闻目睹到的,我们决不想拿这些东西来教导供职于战斗部队中、熟知军事谋略的内行人士。我们相信,经验丰富的内行人士会想到与作出许多更好、更有效的措施;但他们也可通过上述这些东西从某些情况与内容上进行考虑。因为《圣经》上写道:“多听一听,智慧者会变得更智慧些,明智的人会有治国之才。”

22.11 叙述我们路过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情况，鞑靼皇帝与诸王的宫廷，以及在那里见到过我们的证人（最后一章）

怎样与他们作战谈完了，最后来谈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路过的地方的情况，皇帝与诸王们的宫廷机构，还有在鞑靼地域上见过我们的证人。

22.11.1 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及我们路过的地方的情况

（1）如前所述，当我们打算停当，要出发到鞑靼人那里去时，我们来到了波希米亚国王[1]那里。这位国王一向待我们很好，因此我们向他咨询，我们的旅途采取哪条道路为好，他答道，据他看来，最好是通过波兰与斡罗思走去，因为他在波兰有自己的亲人，在那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到斡罗思去。他将公文与一些很好的护送人给了我们，还吩咐他属下的各地各城在我们到达他的侄子西里西亚王公博列斯拉夫[2]那里以前发给我们粮食，博列斯拉夫也是我们的熟人，与我们很亲近。

（2）他也给我们公文与可靠的护送人，并在我们到达兰齐斯克王公康拉德[3]那里以前从他属下的各地各城发给我们粮食。这时，托天之福，斡罗思王公瓦西里科[4]殿下来到了那里，从他的话里，我们完全获悉了鞑靼人的意向。他派使者去到了那里。他们回到了他与他的兄

[1]1240到1253年的波希米亚国王是文采斯拉夫一世，文采斯拉夫一世站在罗马教皇一边，反对日耳曼皇帝腓特烈。

[2]腼腆的博列斯拉夫五世（1226—1279年）是里格尼茨、桑多米尔与克拉科斯克的公爵。

[3]这个康拉德（博列斯拉夫的叔父）是马佐夫与库亚夫的公爵；他的首邑在普洛茨克。兰齐斯克，即今连奇察，是波兰布祖拉河上的城市，见《多桑书》，卷2，第121页（马列英注）。

[4]瓦西里科·罗曼诺维奇，沃伦王公（死于1269年），是加里奇王公罗曼·姆斯齐斯拉沃维奇的儿子（马列英注）。

弟丹尼尔[1]殿下那里，并带回了丹尼尔去见拔都时所需的保护文件。瓦西里科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到他那边去，我们必须准备好重礼分赠给鞑靼人，因为他们不惮其烦地索取礼物，如果不给他们礼物，使者就不能如意地完成自己的差使(事实确是如此)；此外，据说使者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我们不愿让教皇陛下与教会的事情因此遭到阻难，就吩咐用人们准备给我们维持生活的东西，买了几件海狸皮与其他动物的皮子。王公康拉德与克拉科夫王公夫人，[2]几个武士与克拉科夫主教，得知这一点后，便赠与我们更多的皮子。王公康拉德与他的儿子[3]及克拉科夫主教还很热心地请求上述瓦西里科在我们到鞑靼人那里去的行程中，尽可能地帮助我们；他答复说，他乐于遵命。

(3)他从那里接送我们到了他的地区上。由于他款留了我们几天，让我们稍事休息，还根据我们的请求，命他的主教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对他们宣读了教皇陛下的文书，书中规劝他们信奉教会圣母的[神性人性的]统一性；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规劝，尽可能地使王公、主教与聚会于此的其他人皈依基督教。但由于这时王公到波兰去了，他的兄弟丹尼尔公又到拔都那边去了，没有他在场，他们无法作出决定性的答复来，我们必须等丹尼尔回来才能获得最后答复。

(4)这以后王公派了一个随员伴送我们到乞瓦(基辅)去。但我们在路途中经常有着生命危险，因为立陶宛人常悄悄地侵袭斡罗思土地，特别是我们必须路过的那些地方；由于大部分斡罗思人都被鞑靼人杀死或俘走了，因此他们根本不能强有力地抵抗他们，但在斡罗思人这一方面我们靠着上述随员可以获得安全。托天之福，我们摆脱了基督十字的敌人来到了斡罗思京城乞瓦；到了乞瓦后，我们就这次旅

---

[1]即最早在阿里吉河之战(1223年)中同蒙古人厮杀过的加里奇的丹尼尔·罗曼诺维奇(1201—1264年)。拔都第二次举行远征时，乞瓦王公米海尔在鞑靼人将要到来时丢下乞瓦逃到匈牙利去了，乞瓦遂为拔都所占。丹尼尔曾派自己的千夫长德米特利到乞瓦去，德米特利在乞瓦被围时英勇地保卫了城市。加里奇的丹尼尔，为了削弱鞑靼人的羁绊，一方面同拔都进行谈判，另一方而又同教皇英诺森四世进行谈判，请求教皇给予军事援助。但教皇没有援助他，于是他于1249年停止了对教皇的谈判。

[2]王公夫人格列米斯拉娃(马列英注)。

[3]即兰齐斯克公康拉德的儿子——列什科(马列英注)。

行咨询了千户长及当地的其他显贵人物。他们回答我们说,我们若想骑着马到鞑靼地域去,我们的马非全部倒毙不可,因为那里积雪很厚,我们的马跟鞑靼人的马不一样,无法用蹄子从雪底下掘到草吃,而找寻其他食料也办不到,因为鞑靼人既没有麦秸又没有干草、饲料。因此我们商议后,决定将马留在那里,还留下两个仆役来看管这些马。这以后我们须将礼物献给千户长,好让他开恩将大车与护送人员发付给我们。在来到乞瓦之前,我们曾在丹尼洛夫[1]重病了一场;但为了不使基督教的事业受到阻碍,我们不顾严寒仍吩咐下去,将我们用大车在雪地上载走。

(5)这样,在乞瓦将一切事情安排好后,在圣母洁身节(洁身日)的第二天,[2]我们骑着千户长的马同着护送人员们匆匆地从乞瓦(基辅)向另一些蛮部进发。我们来到了鞑靼人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名叫康诺夫[3]的村子。村长发付给我们马匹及护送人员,将我们送到了另一个村子,那里的村长是一个阿兰人,[4]名叫米赫,是一个恶毒不堪、极端狡猾的人。他亲自派了几名卫兵到乞瓦来接我们,假意告诉我们说系奉阔连察之命[5]而来,想叫我们自称为使臣,好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虽然这不是实情,但他这样做却有可能从我们手里索取礼物。我们到了他那边后,他对我们显得是一个不可接近的人,要是我们不答应给他礼物的话,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护送我们;我们见不给礼物就无法继续前进,只得答应给他礼物,虽然我们所给的礼物,我们认为已经够多的了,但他不愿意接受,非要我们多加一些不可。我们只得按照他的意思增添了礼物,他还狡猾、野蛮与恶毒地从我们那里抢走了一些东西。

(6)此后,我们同他一起在四旬斋前的星期一[6]出发了,他把我们带到了鞑靼人的第一关防点。撒灰日[四旬斋第一日,是日有撒灰在

---

[1]这个丹尼洛夫小城,被普兰·迦儿宾称作 Darifone。

[2]1246年2月4日。

[3]第聂伯河上的小城,距乞瓦120公里(马列英注)。

[4]蒙古人在各城市中都置有一个有"达鲁花赤"或"塔失合赤"称号的监临官。

[5]普兰·迦儿宾对于这个蒙古长官的名字有多种写法:Choranza, Curoniza, Karancha。见第326页注[7]。

[6]1246年2月19日。

忏悔者身上的习惯——中译者注]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五,[1]我们于日落时分停下来宿夜,一些武装的鞑靼人可怕地袭击了我们,他们问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答道,我们是教皇陛下的使者,他们从我们那里拿了一些食物立即走开了。到了早晨,我们起身,前行了一段路,迎面遇到了他们的关防长官,他问道,我们来此做什么,有何差使。我们答道,我们是基督教徒的主与父亲教皇陛下的使者。他派我们来见皇帝、诸王与所有的鞑靼人,想叫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做鞑靼人的朋友,并同他们建立和平关系;此外他还想让鞑靼人到了天上在主面前成为伟人。因此教皇陛下通过我们及他的文书规劝他们,想让鞑靼人成为基督教徒并皈依主基督耶稣。因为除此而外鞑靼人无法得救。此外,他还委托我们转告鞑靼人,鞑靼人对人民、主要是基督教徒所造成的巨大摧残,尤其是那些受他统治的匈牙利人、摩拉维亚人与波兰人所受到的摧残,使他十分吃惊,虽然那些人们丝毫没有损害他们,也不想损害他们。由于我主上帝已大为震怒,教皇陛下劝告他们不要继续这样做,并应为已经做出的事忏悔。我们还说,教皇陛下请他们答复他,他们往后想怎么样,有什么打算,让他们写成书信答复他。听明来意,弄懂了上面所说的话后,他们说,既有这些话头,他们愿发付给我们大车与护送人员,送我们到阔连察那边去,当时他们索取了礼物,我们给了,因为我们只得被迫如他们的愿。

(7)这样,给了礼物,用他们本人所骑的马套上了大车,我们急急忙忙地同他们的护送人员向阔连察那边进发。但他们自己先派人骑上快马到那位首领处通报去了,他们将我们所说的话,转告给了他。这位首领是设置于反对西方各族人民的各处关卡上的所有人员的长官,设置关卡是为了防备突如其来的袭击;我们听人说,有6万名武装人员归这位首领管辖。我们到了他那里后,他吩咐我们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安营,还派了一些奴隶身份的管理人来问我们,我们拿什么东西向他表示敬意,即我们想送些什么礼物。我们答道,教皇陛下没有送来任何礼物,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能到达鞑靼人这边来。此外,我们一路上经过

[1]1246年2月23日。

的尽是立陶宛人威胁下的危险地段，他们经常在从波兰到鞑靼地域及我们所经过的路上进行搜索；但我们还是尽可能用由于上帝与教皇陛下的仁慈而使我们能有的一些东西，向他表示了敬意。虽然我们给了他很多东西，但他还是嫌少，他通过第三者来向我们索取更多的东西，他答允说，如果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就吩咐底下人尊敬地为我们带路，既然我们想活下去，使教皇陛下所吩咐的事得以实现，我们只得同意了。

(8)取走了礼物后，他们将我们领到了斡耳朵，[1]也就是他的帐营那里，他们教我们说，我们必须在帐幕门前用左膝跪拜3次，还须注意不要迈腿踩在门槛上。我们小心在意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谁若故意践踏首领帐幕的门槛，就有处死的危险。我们进去后，首领与特为邀请来的其他长官们都在里面，我们于跪拜后，将我们以前说过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我们还将教皇陛下的文书递给了他；但是由于我们从乞瓦雇来的翻译不能将信中的意思解释得很好，而这里又没有另一个合适的翻译，因此他们无法了解信中的内容。此后，他们发付给我们马匹与3个鞑靼人，这3个人都是十夫长，有一个还是拔都属下的人；他们让这3个人带着我们尽快地去见这位首领。这位拔都与所有的鞑靼诸王相比，是除了他所必须服从的皇帝外，最强大的一个。

(9)四旬斋第一个星期天过后的星期一，[2]我们急忙上路到他那边去，让马儿拼命地奔驰起来，因为一般说来我们每天要换三四次新马，我们从早到晚赶着路，此外还常在夜间赶路，但我们还是没能早于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三[3]那天到达他那里。我们通过了整个库蛮国，那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平原，平原上有4条大河，头一条是第聂伯河，靠近第聂伯河，斡罗思那边归阔连察游牧，而另一边，草原这边归地位较阔连察高的马兀赤[4]游牧；第二条河是顿河(Дон)，归娶拔都之妹为

---

[1]原文"斡儿达"是蒙古语"斡耳朵"(ordu)的音讹，斡耳朵是"帐殿"、"行宫"的意思。

[2]1246年2月26日。

[3]即1246年4月4日。这样看来，普兰·迦儿宾于2月4日从乞瓦动身，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到达了伏尔加河拔都的帐营里。

[4]马兀赤：察合台的次子。

妻的王公合儿丹(Картан)[1]游牧;第三条河是伏尔加河(Волга),这条河很大,它所流经的地方都归拔都所有;第四条河称作扎牙黑(Jaec)河,这条河流过的地方归两个千户(长)所有,一个据有河的一边,另一个据有河的另一边。冬天他们(指蒙古人—中译者注)走向海滨,夏天则沿着河岸上山。那个海就是大海(Великое Море),[2]向君士坦丁堡流去的圣乔治海峡[3]就是从那里流出的。我们有好多天在第聂伯河上踏着冰封的河前进。这些河都很大,河里鱼很丰富,尤其是伏尔加河;这些河都流入了被称做大海的希腊海中。在这个海的岸上,我们在许多地方冒着很大危险有好多天在冰上驶行,因为离岸三列夫卡[4]以内全部很好地冻结起来了。但在我们到达拔都那里之前,我们中间有两个鞑靼人先走前去了,以便将我们在阔连察那里说过的全部话转告给他。

(10)我们一到拔都那里,他就将我们安顿在离他的帐幕有一列夫卡之地的库蛮地区境内。当我们将到他的宫里去觐见时,人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从两堆火中间通过,由于某些念头我们不愿这样做。但有人向我们说:"只管放心走过去吧,我们非要你们从火堆之间通过,并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倘若你们对我们的主上怀有恶意或恰好带着毒物,火就会把一切恶物带走。"我们答道:"为了不蒙受嫌疑起见我们愿从火堆间通过。"当我们到了斡耳朵那里,他的管家按迪该[5]问我们拿什么东西表示敬意,也就是说我们向他献些什么礼物。我们还拿过去对阔连察所说的话回答了他,也就是说教皇陛下没有送礼物来,但我们愿尽我们所能给的、用由于上帝与教皇陛下的仁慈所

---

[1]又作 Carton,Carbon,Tirbon(马列英注)。

[2]普兰·迦儿宾在下文中写道:"被人们称传'Mare Magnum'的希腊海,即古代称做'ПонтЕвксинский'的黑海。"普兰·迦儿宾的地理观念相当模糊:他将黑海、里海与咸海全都混为一谈。据他看来,伏尔加河流人的是黑海。

[3]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一次到圣地去的天主教朝圣中说道(《达维札克书》,第853页),这条支流"将罗马尼亚与马其顿尼亚两地分了开来"(马列英注)。

[4]列夫卡是古代高卢的长度单位,相当于法国的"里约"=经线的1/25度=4445米(马列英注)。

[5]斡罗思编年史上在提到契尔尼戈夫的圣者米海尔被杀害时曾提到这个人的名字,称他为按迪合,并说他是拔都的厨子(马列英注)。

得到的一些维持生活的东西向他表示敬意。礼物送上去收下后，拔都的管家按迪该问了我们的来意。我们将过去对阔连察说过的那些话对他说了。

(11)来意听毕，先经跪拜，又如前那样地对我们提醒了有关门槛的事以后，便带我们进了帐幕。我们跪在首领面前进行陈述；陈述已毕，我们递上文书，并要求给我们几名能译述文书的翻译。耶稣受难日[1]他们将翻译人员给了我们，我们同他们一起将文书仔细地译成了斡罗思文、萨拉森文与鞑靼文。[2] 这些译文都交给了拔都看了，他读着，仔细审阅着。最后，他们将我们带回了我们的帐幕。但是，除了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给过我们一小碗黍米外，就再也没有给我们吃过任何食物。

(12)拔都居住之地极为富丽堂皇，那里跟他们的皇帝一样，也有司阍及一应官员。他也像坐在皇座上那样的高坐在上，他的一个妻子与他一起坐着；他的兄弟、儿子与其他幼辈们坐在下面中央的凳上，其余的人则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男的在右面，女的在左面。他们的天幕高大而华丽，用麻布制成，这座天幕原系匈牙利国王所有。[3] 除他的家属外，任何外人不管多么威武伟大，没有获得邀请绝不敢走近他的帐幕去，除非正好碰上拔都本人想见他才行。我们通报了后，就靠着左边坐下，一切使臣来到这里时都这么坐着；当我们从皇帝那边回来则坐在右边。靠近帐幕入口处的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上的金银器内盛着饮料，拔都或其他鞑靼大公一般不饮用它，必须有人在他们面前弹着琴唱起来，[4]这才开始饮用。出行时，在他的头顶上用矛悬起一个避太阳的盾牌或篷子，一切较显赫的鞑靼王公与他们的妻子们也是如此。拔都对待自己的属下十分宽宏大量，但他们全都非常畏惧他；打起

---

[1]4月6日(马列英注)。

[2]1206年以后蒙古人开始使用畏吾儿字母的蒙文。这种文字留传到今天的最早样本是1219年所建的“成吉思汗石”上的题词。

[3]即别拉四世(1235—1270年)，1241年在佩斯之战中为拔都所统率的蒙古军队所败。别拉从蒙古人手里逃出来后，逃到奥地利，然后又到了达尔马提亚，最后逃到了亚德里亚海的一个岛上，在那里等候蒙古军退走。

[4]贡布耶夫认为这种歌唱是对有声望的人表示敬意(马列英注)。

仗来时他很厉害也很有远见，在作战时很狡猾，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戎马生活。

（13）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六[1]那天，我们被叫到帐幕里，前曾提及的拔都的管家见了我们，他奉拔都之命，让我们到他们本国贵由皇帝那边去，只从我们中间留下了几名打算遣回到教皇陛下那里去的人。我们交给他们一封文书，写下了我们的全部行动，让他们递交给教皇，但当他们回到马兀赤那里时，就被扣留住了，一直被扣留到我们回去时。我们于礼拜日作了弥撒并进餐后，便含着苦泪不知一路上的死活，与阔连察发付给我们的3个鞑靼人一起动身了。但我们身体很虚弱，行动很困难；在整个四旬斋内以及其他斋戒日，我们只能以黍米就着盐与水为食，我们只能喝到放在锅里融化的雪水。

（14）库蛮尼牙的北面，紧挨着斡罗思人、莫尔多瓦人与必列儿人（即大不里阿耳人）的是巴失乞耳人，也就是大匈牙利人；从巴失乞耳人那边再过去是巴罗昔惕人与萨莫耶德人，从萨莫耶德人处再过去据说是住在海边沙漠里的狗面人。库蛮尼牙的南面是阿兰人、撤耳柯思、[2]可萨人、希腊与君士坦丁堡，以及亦必儿地区、哈希[3]地区、以剃发的犹太人出名的不儿塔思[4]地区、齐克基[5]地区、谷儿只地区、阿美尼亚与脱耳克地区。西面是匈牙利与斡罗思。上述库蛮尼牙地区十分辽阔广大。我们以最高的速度通过了这片土地，如上所述除通过沙漠外，我们每天要换五至七次新马，而只在通过沙漠时，我们才获得了较结实的、经得住持续劳累的好马；从四旬斋开始直到复活节后的那个礼拜，我们走完了库蛮尼牙地区。库蛮人为鞑靼人所消灭。有些

---

[1]4月7日（马列英注）。

[2]此处原文应即撒耳柯思（马列英注）。

[3]亦必儿为高加索与阿美尼亚之间莫斯赫山的居民。亦必儿人是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居住在许多城市里。哈希人——卡赫廷人。

[4]不儿塔思人住在伏尔加河中游右岸。

[5]又作 Sittorum，Zythorum，Zichorum。斯特拉邦曾记述过住在里海与黑海之间的 Zygi 或 zigoi 部。Д. 雅治科夫在《普兰·迦儿宾行纪》俄译本中认为，齐克基地区是“黑海东岸的齐希亚、兹希亚”（Д. 雅治科夫：《鞑靼行纪选辑》第270页）。我们知道，13世纪时有一个兹希亚地方王朝统治着特穆塔拉坎，1237年到过那里的多明我会教士犹利安曾提起过这个王朝。他写道，他曾从君士坦丁堡到过名叫兹希亚的地方（参阅 A. H. 纳索诺夫：《东欧史上的特穆塔拉坎》）。

人逃走了,另一些人当了他们的奴隶,但逃走的人有很多人(后来)又回到了他们那里。

(15)此后我们到了康里地区,那里有很多地方极端缺水。正因为缺水,造成那里人口稀少。因此到鞑靼地域去的斡罗思王公雅罗斯拉夫的随从们,在这片沙漠上死掉了许许多多。在这块土地上以及在库蛮尼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死人的头颅与骨头,像粪便一样地散布在大地上;我们从复活节后第八天开始,几乎直到耶稣升天节[1]为止,才走完这块土地。康里人是偶像教徒,库蛮人与康里人都不耕种土地,只以牧畜为生;他们不盖房屋,而住在帐幕内。他们也被鞑靼人灭掉了,鞑靼人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残留下来的人都做了鞑靼人的奴隶。

(16)我们从康里地区进入了木速蛮地面。[2] 这些人迄今还说着库蛮语,而所遵守的法律却是萨拉森法。这一带我们看到无数被毁灭的城市、被破坏的要塞与许多荒废的村庄。在这块地面上有一条我们不知名的大河,[3]河边有一座养吉干城,又有一座巴耳赤邗及斡耳纳思城,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名称。这块地面上的统治者名叫阿勒迪莎勒坛讷思;[4]他与他的后裔们全被鞑靼人灭绝了;他的原名我们不知道。这块地面上有好几座大山;它的南面是耶路撒冷、报达[5]与整个萨拉森地区;[6]在它的边境附近住着两个领袖,即不里与合丹兄弟俩;[7]北面滨海,与黑契丹地面的一部分相连。拔都的兄弟昔班就驻在这里。我们从耶稣升天节开始,几乎直到圣约翰节[8]前一星期才走完这块地面。

(17)接着,我们进入了黑契丹地区,鞑靼人在那里只重新建了一

---

[1]1246年5月17日。

[2]这里的木速蛮系指花剌子模人而言。

[3]锡尔河流域有许多城市:讹答剌,牙昔,撒卜兰,昔格纳黑,巴耳赤邗,养吉干,毡的,阿失纳思等。普兰·迦儿宾曾提起过其中若干城市。

[4]即阿剌丁·麻合谋·花剌子模沙。

[5]报达:巴格达的中世纪名称。

[6]普兰·迦儿宾用来泛指木速蛮的萨拉森一词,这里当理解为波斯地区。

[7]这些宗王不是亲兄弟。不里是察合台之孙,而合丹是窝阔台之子。

[8]6月24日。

座斡密立城。[1] 皇帝在这里建了宫殿,我们曾被邀请进宫去喝了点东西,一个从皇帝那边来的人命市长与他的两个兄弟在我们面前跳了舞。离开那里后,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很大的海,[2]海的名字由于我们没有问起,不得而知。这个海的岸边,有一座小山,据说山里有一个洞,冬天从洞里发出强烈的风暴,人们冒着很大危险才能勉强地从那一带通过。夏天在那里也常能听到风的呼啸声,但据居民对我们说,那时从洞里吹出来的风已很微弱了。沿着海边我们走了好几天;海里有许许多多小岛,我们从海的左岸离开了那个海。在这块地面上有很多河流,但都不大;河的此岸或彼岸有些小树林子。这块地面上住着年长于拔都的斡鲁朵;此外,他也是所有鞑靼诸王最年长的一个;那里还有他父亲[3]的斡耳朵或行宫,里面住着掌管行宫的他父亲的一个妻子。因为鞑靼人具有如下风俗:诸王与大臣们的帐营不得毁坏,而总是交给妇女们来加以掌管,并按照赐予统治者们以礼物的常例将一部分礼物赐予她们。此后我们来到了皇帝的第一斡耳朵,斡耳朵里住着他的一个妻子;由于我们还没有见过皇帝,他们不愿邀请我们进他的斡耳朵里去,但他们留在我们的帐幕内按照鞑靼风俗很好地款待了我们,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使我们获得休息。

(18)圣彼得节[4]前一天,我们从那里动身,进入了乃蛮地区;乃蛮人是偶像教徒。[5] 使徒彼得与保罗节那天,那里下了很厚的雪,我们感到冷极了。这块地面上多山,气候寒冷,平地很少(这一族人民不耕种土地,也跟鞑靼人一样居住帐幕;他们也被鞑靼人灭掉了)。我们在这个国家中走了好几天。

---

〔1〕斡密立,可认为即是位于塔城以南基集尔巴什湖稍西面的叶密立城。

〔2〕柔克义认为,如果普兰·迦儿宾没有记错的话,“某个大海”就是阿拉库尔湖。因为在行经叶密立以前必须经过这个湖,而非相反的情况。可能普兰·迦儿宾这里所谈的是回来的路。后一假设为普兰·迦儿宾隔过几行在下面所写的话所证实:“我们从海的左岸离开了那个海。”柔克义的假设与真实情况相近,而马列英注作贝加尔湖,则有所误解。

〔3〕即伊犁河流域的察合台帐营阿力麻里。

〔4〕6月29日。

〔5〕普兰·迦儿宾此处所说,与鲁布鲁克所确定的乃蛮人为聂思脱里基督教徒的记述相矛盾。很有可能,并非全部乃蛮人部是聂思脱里教徒,萨满教在他们中间也很流行。

(19)接着我们进入了被我们称作鞑靼的蒙古国。据我们推想,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走了3星期的急程后,于圣母节[1]到了当今皇帝贵由那里。在这段路上,我们完全急驶着前进,因为我们的鞑靼人受命尽快地载我们赶到几年前即已指定举行的选举皇帝的隆重大会上来,好让我们出席这次大会。因此我们清晨起身,一直赶路到晚,不得进食;常常赶路赶到很晚才止,结果在夜间也吃不上东西,而本该在晚上吃的东西,到早上才发给我们吃,我们让马儿拼命地奔驰着前进。对马匹毫不顾惜,因为一天之中经常换马,马倒下了,就牵回去。这样,我们毫不停歇地快速地前进。

22.11.2 皇帝及其诸王的宫廷机构

(1)我们来到了贵由那里,他吩咐发给我们鞑靼人通常所供给的那种帐幕和粮食;我们受到的款待,一切都比别的使臣要强。但我们没有被他召见,因为他还没有经过选举呢,因此不能因处理国事召见我们。但拔都已将教皇陛下公文的译文及此外涉及我们的书札递呈给他了。我们在那里等了五六天后,他让我们到他母亲那里去[2],那里正举行着隆重的大会。当我们来到那里时,一座高大的白普普儿制成的帐幕已经建起;据我看来,这座帐幕足以容纳2000多人,天幕周围筑以木墙(tabulatum),墙上画了各种画。

(2)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同着指定保护我们的鞑靼人到那里去,许多首领都被召集到了那里。每一个首领带着自己的属下,在山里或平原上走来走去。头一天他们全穿白普普儿,第二天则穿红色的,就在

---

[1]7月22日。2月4日普兰·迦儿宾从乞瓦动身,7月22日他才到达贵由汗帐营内,即他从第聂伯河到蒙古腹地在路上共走了5个半月。这段时间不为长,我们只要想想,马可·波罗兄弟到中国去的旅程共费去了一年半以上。据普兰·迦儿宾自己解释说,驰行得这样快是为了要赶到宣告窝阔台之子为大汗的忽里勒台上去。

[2]贵由汗的母亲是脱列哥那,窝阔台死后她掌握蒙古帝国大权将近五年之久。[《元史·太宗纪》:"帝崩……六皇后乃马真氏始称制";《定宗纪》:"帝(贵由汗)虽御极而朝政犹出于六皇后云"——余注]脱列好那之名证明她是突厥种人。她原为兀洼思·蔑儿乞部长的妻子,成吉思汗征服蔑儿乞人时将她同其夫一起掳获,给自己的儿子窝阔台做了妻子。脱列哥那摄政时期进行汗室贸易的木速蛮商贾势力大盛。其中有一个奥都剌合蛮甚至总揽财政大权。普兰·迦儿宾在下文中说,她毒死了从苏兹达尔来的雅罗斯拉夫大公。

那天贵由到这个帐幕里来了;第三天他们穿淡青色普普儿,第四天穿最好的巴达金。上述帐幕旁的围墙有两座大门,一座是皇帝出入的门,这座门虽然敞开着却没有设警卫,因为决没有人敢于出入这座门,准予进去的人从另一座门进入,这座门的两旁站着佩带着宝剑与弓箭的卫士。若有人进入帐幕的一定范围内,抓住后就要挨鞭打;若他转身逃跑,就用没有铁箭头的箭射他。据我们推测,马放在两箭距离以外之地。首领们在许多亲随卫护下到来,除首领外任何人不得挨近马;有人想在马中间走过,就要遭到毒打。有许多匹马,装配在马勒、胸甲、马鞍及马肚带上的金子,据我们估计总共约有 20 马克。[1] 首领们在帐幕内谈着话(据我们推测,他们在讨论帝选问题)。其余的人则全都在上述围墙外远处。这样,他们几乎等到中午,才开始饮用酸马奶,直到夜晚为止,被他们喝掉的酸马奶,数量着实惊人。

(3)我们被召了进去,由于我们完全不能喝酸马奶,他们给我们喝麦酒,这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尊敬;但他们非要我们喝不可,我们由于喝不惯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只得表示难受不堪,他们这才不让我们喝了。苏兹达尔的斡罗思王公雅罗斯拉夫,[2]中国及肃良合的若干领袖们,谷儿只王的两个儿子,以及报达哈里发[3]的使臣(一位算端)及十多位其余的萨拉森算端都在围墙外,关于这一点,有的是我们所作的推测,有的则是管家告诉我们的。那里共有使臣四千多名,有的是送贡物来的,有的带来了算端及其他臣服于他们的领袖们送来的礼物,有的是他们所派遣的人,有的是各地的总督。他们全都在围墙外聚在一起,并在一起饮用;我们同这些人在围墙外时,他们总是把我们与王公雅罗斯拉夫安置在最高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我们在那里足足过了四星期,据我们推测,帝选就在那里举行。但贵由当选为帝的事实没有在那里发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猜测:每一次当贵由从

---

〔1〕一马克重半磅(16 洛特,马列英注)。因此,马挽具的全部金饰重达两公斤,由此可见蒙古贵族多么富有。我们还可以根据在西伯利亚南部及蒙古所发现的考古资料来判断马套具上的金饰有多么阔绰。

〔2〕即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

〔3〕即 1258 年蒙古人所杀死的报达阿拔思朝最后的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的使臣。

帐幕内走出来，走到围墙外时，总是有人在他面前歌唱，[1]并用枝端有紫红色毛线的美丽树枝迎着他。[2] 其他首领则并无此种殊礼。他们把这所帐幕或行宫称作昔剌斡耳朵。

(4)离开这里后，我们全体一起到三四列夫卡外的另一地去。那里在山里的一条河附近的一个美丽的平原上，[3]有一座被他们称作金斡耳朵的帐幕。

圣母升天节那天[8 月 15 日]，贵由本该在那里登基，但由于下了雹子(这件事我在前面曾谈到过)，只得延期。这座帐幕架在贴金叶的支柱上，支柱用金钉子钉在梁木上，在帐幕内壁上部覆以巴达金，外壁则覆以其他织物，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圣巴尔托洛默节[4]那天，到了那一天有一大群人在此聚会，有些人面朝南站着，有些人相互隔开投掷一石之距，祈祷着，向南方跪拜着，逐渐向远处行进。我们不愿行跪拜礼，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念咒或向大神及其他诸神跪拜。如此继续了很久，后来他们便回到天幕里，拥贵由登上皇帝宝座，[5]首领们一

[1]蒙古人常唱名叫"马黑塔勒"的颂歌以示尊敬。

[2]一定是"秃黑"—蒙古人的饰以马尾的旗帜。在皇帝面前常悬"九秃黑"。

[3]《元史·定宗纪》:贵由"即皇帝位于汪吉宿灭秃里之地"。

[4]1246 年 8 月 24 日。

[5]将普兰·迦儿宾的报导同西蒙·圣肯廷的记述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圣肯廷虽然没有目击这次盛典，但他显然从别涅迪克特(普兰·迦儿宾的同行者)那里获知了当时的情况。别涅迪克特回到小亚细亚时，恰好阿斯采林与圣肯廷也在那里。圣肯廷对这件事描述如下:"全体男爵们都聚来了，他们将一把金椅子放在中央，让这位戈格(即汗)坐上去，将一柄宝剑放在他面前说道:'我们愿望、请求、推举陛下来统治我们全体。'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我来统治你们，当我下令让你们执行事情、召见你们、派你们去到某地，或命令处死某人时，你们是否全都奉行。'他们答道，一定遵命。他又对他们说:'朕之剑即朕之敕命。'他们全都同意了。他们又铺开一块毡子，让他坐上去，说道:'天神在上，陛下所坐的毡子在下。陛下若好好管理自己的王国，大恩大德，大公无私，按照爵序尊重每个诸侯，就将荣耀地治理国家，普天下将服从陛下的统治，主将赐予陛下心中所愿的一切。如果陛下不这样做，就将失去幸福，被人唾弃，穷得连下面的这块毡子也留不下。'这些话述毕后，男爵们又让他的妻子坐到毡子上，将他们俩连同毡子一起举起，高声宣布道:'全体鞑靼人的皇帝与皇后!'"(Speculi Maioris Vincentii Burgundi praesulis belvacenis ordinispraedicatorum. Venetiis, apud Dom - inicum Nicolinum, MDXCI, Tomus quartus liber XXXⅠ. cap. XXXⅡ，第 452 页 a)

圣肯廷的记载是普兰·迦儿宾记述的有趣的补充。圣肯廷是 1245 年奉英诺森四世之命去见当时在波斯的蒙古统将拜住的阿斯采林使节团中的四个多明我会教士之一。

圣肯廷跟普兰·迪儿宾一样，就旅途所见写下了行纪。

齐向他下拜。然后全体人众,除不臣服于他们的我们这几个人外,也都向他跪拜。

然后他们按照习惯喝起来了,不停地喝,直喝到夜晚。此后,用大车送来了没加盐煮的肉块,每人分给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块。在帐幕内分给的肉与稀汤,都加上盐作为调料进食,他们在每次举行筵席时都是这样。

(5)现在我们被皇帝召见了,首席书记官镇海(Хингай)[1]登录下我们与派我们来的人的名字及肃良合领袖等名字后,就大声地在皇帝及全体首领们面前传呼我们。此后我们每个人都以左膝跪拜4次,当时人们提醒我们不要触及门槛。他们仔细地搜索了我们有刀子没有,当什么也没发现后,就让我们从东边的门进去,因为西边的门除了皇帝外任何人都不敢进去。每个首领在自己的帐幕内也行这一套,地位较低的人倒不很讲究这一套。这是在他登位以后,我们第一次在他亲临之下进入他的帐幕内;他在那里接见使臣们。但进来见他的人并不多。使臣们送到那里来的隆重的礼物有丝绸、天鹅绒、普普尔、巴达金、缀金的丝带、高贵的毛皮等,十分耀眼。送给他的还有撑在皇帝头上挡日光的屏伞或篷子,[2]上面缀满了珍珠。某州长官进献给他许多骆驼与用巴达金制成的骆驼披衣,骆驼的鞍子上装了一些可坐人的装备,据我们推想骆驼有四五十峰,还有许多披有护甲的马及骡子,护甲是革制或铁制的。有人问我们,我们是否也想献一些礼物,但我们的东西几乎一无所剩了,我们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在远离帐幕的山那边,有五百多辆大车满载着金银丝衣。全部东西由皇帝与首领们进行分配,而每个首领将自己的那份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自己的属下。

---

[1]镇海,畏吾儿人[《元史》卷120《镇海传》作克烈人——余注],窝阔台的大臣。由他担任逐日记下大汗敕命之事。脱列哥那摄政时撤换了他[多桑:《蒙古史》(法文本),卷2,第189页]。

[2]在东方,自古以来有一种撑在君主头上象征皇帝尊严的特殊的伞。这种伞在梵语中称作“chattra”。伊宾·巴都塔说,忻都(印度)算端头上所撑的那柄chattra,用缀以宝石的丝绸制成,伞柄是纯金的。中国皇帝及帝室子弟也戴伞,伞色及装饰与所属爵位有严格一致关系。宇文懋昭曰:“国主伞或红或黄无定,以金龙为顶盖。后用金凤,太子用金龙。妃紫伞,用金孔雀。一品青伞用银浮图,二品三品用红浮图,四品五品青浮图。”《大金国志》卷34《车伞》。蒙古喇嘛教徒在博克多格根面前也戴一种名叫“拥库儿”的具有传统的伞。

(6)离开那里后，我们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令人惊异的帐幕，整个天幕用中国送来的火红色普普尔制成。人们把我们领进了里边。我们进到里面后，只要我们想要的话，总有人给我们喝麦酒或酒，还给我们吃煮肉。里面还用木板筑了一个高台，皇帝的宝座就安设在上面。宝座是用象牙制成的，雕刻得十分精致，上面还镶有金子、宝石，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上面也镶有珍珠；宝座的后部是圆形的，可以由台阶走上宝座。这宝座的四周放着一些长凳，贵妇们坐在左边的凳上，右边前排的座位没有人坐，首领们坐在后排的凳上及当中，其余的人坐在他们后面。每天有许多贵妇在此聚会。上面我所谈到的3座天幕都很大；其余的帐幕则用白毡制成，也相当大和美丽，是他的妻子们的。他们在那里分开居住，皇帝的母亲在一边，皇帝在另一边审理案件。当今皇帝的婶母，[1]由于毒死了他的父亲，被抓起来了，这件事正发生于他们的军队在匈牙利的时候，由于这件事的发生，在那些国家中的军队从那里撤回来了。她与另外许多人受到了审判，她们全都被处死了。

(7)就在这时，斡罗思苏兹达尔王公雅罗斯拉夫[2]死去了。皇帝的母亲召见了他，[3]似乎为表示尊敬他起见，她亲手给他东西吃、喝，但是他一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得了病，过了7天就死去了，他遍体发青，十分可怕。因此大家都相信他在那里喝了毒药，这样一来鞑靼人便能更方便地完全占有他的土地了。可作为凭证的是，皇帝的母亲没有通知留在那里的人，就急忙派遣急使到斡罗思他的儿子亚历山大[4]处去，让亚历山大来见她，因为她想将他父亲的土地赐给他。亚历山大不愿前来，留在那里没来；这时，她又送去了一份文书，让他来取得父亲的

---

〔1〕普兰·迦儿宾所说的究竟是什么事，不得而详。但类似的事无疑是可能发生的。大汗宫内的内乱、倾轧是很多的。例如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即以行巫谋害蒙哥汗的罪名被处死了。多桑记述说，贵由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按问宗王斡赤斤，当时处死了他的几名官属（多桑：《蒙古史》卷2，第203页）。

〔2〕即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

〔3〕即窝阔台六皇后脱列哥那可敦。

〔4〕即后来有名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涅甫斯基，他稍后来到了斡耳朵中，并于1249年平安地回去了（《卡拉姆津书》，卷4，第78~80页）。

土地。但大家都相信,如果他去了,就会被就地杀害,或永远成为俘虏。

(8)雅罗斯拉夫死后,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记错的话,我们的鞑靼人带我们去见皇帝了。当皇帝听我们的鞑靼人说,我们要求见他,便命我们回到太后那里去,因为他在下一天正要举起反对所有西方国家的旗帜,他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是确实知道的人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前面已谈过了。我们回去后,过了几天又去见他;我们在他那里安居了一个月,但我们又饥又渴,仅能勉强活着,因为发给四个人的粮食刚够一个人吃,我们也没法出去买一些东西,因为市场离那里很远。如果没有天意的安排,没有一个受皇帝宠爱的名叫科斯马[1]的斡罗思金匠的帮助或另外什么人的帮助,我想我们也会死去的。科斯马将皇帝登位之前由他所制成的宝座让我们看了,他还让我们看了他所制的皇帝的玺印,并对我们解释上面的铭刻。我们还通过其他首领的随从,通过许多会说拉丁语与法语的斡罗思人与匈牙利人,通过斡罗思神甫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其他人,得知了皇帝的许多此外的秘密;因为有些人从军30多年,参与了鞑靼人的许多事业,对他们的什么事都了解,有些人懂得语言,跟在他们身边有20年,有些人跟随他们有10年,有的人年头多些,有的人少些;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一切事情,而他们又乐意将所有的事全都讲给我们听,有时甚至不用问,因为他们了解我们的愿望。

(9)这以后,皇帝通过首席秘书镇海派人告诉我们,让我们将我们所讲过的话与所担负的使命写下来后交给他;我们遵命将我们过去在拔都那里所说的、如上所述的话全部写下来给了他。过了几天,他又派人叫我们去,通过掌管整个强国的哈答(Кадак)告诉我们,让我们在首席书记官八剌(Бала)、镇海及许多此外的书记员列席之下将全部说过的话讲述一遍;我们自愿地、乐意地履行了这件事。雅罗斯拉夫的武士

---

[1]这位卓越的金匠,显然是一个被俘的斡罗思匠人,许多斡罗思匠人于斡罗思诸公国被蒙古人侵占后被俘,鲁布鲁克曾谈到另一位法国匠人威廉·布舍的事。蒙古人从被占领的国家里带走了许多手艺高明的匠人与手工业者。例如,我们知道,在蒙古有一座专门造箭的汉人工匠的镇落。

铁木儿(Темер)[1]这一次及另一次当了我们的翻译,当时在场的还有跟他在一起的教士以及皇帝身边的另一个教士。他当时问我们,教皇陛下那里有没有懂斡罗思文、萨拉森文或鞑靼文的人。我们答道,没有人懂斡罗思文、鞑靼文或萨拉森文,但萨拉森人在我们国内终还是有的,虽然他们没有在教皇跟前。我们还是说出了对我们有好处的事,也就是让他们用鞑靼文写下后,翻译给我们听,由我们仔细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好让我们将文书与译文都带去给教皇。当时他们离开了我们,到皇帝那里去了。

(10)在圣马丁节[2]那天,第二次召见了我们。哈答、镇海、八剌与上述许多书记员们来到了我们这里,对我们逐字逐句地将文书进行了解释。当我们用拉丁文写下来时,他们叫人再将每一句话(orationes)译给他们听,检查我们是否会将某些话弄错。两份文书都写好了,他们让我们读了一次又一次,怕我们有所遗漏,他们对我们说:"看仔细了,将〔上面写的〕一切好好搞懂了,你们既是从如此远的地方来的,如果没有完全弄懂,那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当时我们答道:"完全明白

〔1〕普兰·迦儿宾在行纪的末尾,谈到雅罗斯拉夫身边有一位杜巴劳斯神甫及雅科夫、米海尔与另一个雅科夫等随员。

〔2〕11月11日。

了。"他们又将文书转译为萨拉森文,[1]只要教皇陛下愿意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能读懂它的人来开读它。

(11)鞑靼皇帝在习惯上从来不亲口对外国人说话,不管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大人物,如上所述,他通过居间传话的人听话、答话。每次当那些屈服于他的外国人在哈答面前解释事情或听取皇帝的答语时,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大人物都需屈膝跪着,直到话讲毕为止。皇帝将事情决定下后,任何人再也不能、也决无习惯有所议论。上述皇帝设有管家、首席秘书与书记员们,以及处理公私事务的各种官员,但是没有司法稽查官,因为一切事情都按照皇帝的意志来办,而决无争讼时的那种喧哗。其他鞑靼诸王处理归他们管的事也是如此。

(12)皇帝的年岁大约40至45岁,或更大一些;他的个儿不高,是

---

[1]贵由汗的书信用波斯文写在两张黏合在一起的狭长纸条(长1.2米,宽0.2米)上。信的末尾及两张纸条粘合处盖有红印(见第345页注[1])。这封信曾被认为已经遗失了,蒙古学家为信的内容及文字性质建立了种种假设。看来,这里所谓用萨拉森文写成,应理解为用波斯文写成。

1920年,波兰学者基里尔·卡拉列夫斯基僧正在梵蒂冈档案库中发现了这封信后,拍了照交给伊朗学家马歇进行研究,马歇第一次将这封信译了出来。后来法国大蒙古学家伯希和又研究了这封信,并重新进行了翻译,伯希和曾将波斯文原文连同译文、注解一起发表出来。

由于这封信意义很大,兹据伯希和的译文,全录于下。

信的译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全体伟大人民的达赖汗圣旨,(以上几行用突厥文写成)

敕谕大教皇,务令知悉

正当……在怯列勒地方举行会议之时,你们遣使提出请求,所提出之请求已从你们的使臣处获悉。如果你们能履行你们所说的话,你,大教皇,可亲自来见我们,我们将让你们面聆札撒上的每条敕令。

又。你们说,如果我接受洗礼,将是一项好事;你遣使来请求我们,做得很聪明,但我们不能了解你们的请求。

又。你们派遣使者向我说了这样的话:"你们占领了整个马札儿(匈牙利)与基督教徒地区;我很吃惊。对我们说,这该是怎么样的过错?"你的这些话,我们也不了解。成吉思汗与合罕[窝阔台]曾派遣使者让那两个地方听从神的旨意。但那些人不听神的旨意。你所说的那些人甚至举行大会,傲慢自大地杀死了我们派去的使臣。长生天的气力遂将这些地方的人杀死并灭掉了。而有些人则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他那独有的气力得救了。常人怎能[将人]捉住、杀死,并[把人]抓起来(关进牢里)呢?

你不是说过:"我是基督教徒,我爱上帝,我蔑视……"你怎么知道,上帝(既在人间)撒下了罪恶,但却又慈悲为怀。你说了这样的话,但你怎能认识上帝呢?

从日出之地以迄日落之地,全世界的神的气力祐护我们。除神的旨意外,谁也不得有任何措举。如今尔等应出于至诚地说:"我们是你们的臣民,愿将一切财物献上。"你应亲率国王们,无一例外地全体向我们屈服求降。此后,我们才认为你们是顺服者。你们若不遵神的旨意,抗拒敕命,即为(我们的)敌人。

上述一切务令尔等悉知。若有异图,其结果惟有神知。

(回历)644年6月末(1246年11月3—11日)。

这封信带有露骨的威胁性质,与普兰·迦儿宾所说蒙古人准备远征的事实完全一致,但我们知道,这次远征后来没有实现。普兰·迦儿宾报导说,这封信先用蒙文写成,然后又译成萨拉森文。这可能是由于按照东方习惯,寄发威胁性的军事文书必须使用外国文字。

一个很明智和非常机智的人物，他性格很严厉，十分庄重。[1] 据时刻不离地跟在他身边的基督教徒们告诉我们说，谁也没有见他轻易笑过或有过随便的举止。他的基督教徒的随从们还对我们说，他们坚信他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徒，他们所看出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他接纳基督教神甫，供养他们，在大的帐幕面前常设有基督教小礼拜堂；他们按着希腊习惯像别的基督教徒们那样地当众歌唱、敲钟，全然不管那里的鞑靼人或其他的人们有多么多；别的领袖们却不这样做。

(13)据我们身边的鞑靼人对我们说，皇帝想派遣使者与我们同行。但据我们推想，是他想让我们为他请求这一事，因为我们身边的一个年岁较大的鞑靼人提示我们，让我们去请求这一事。但我们觉得由他们遣出使者有所不便，我们便答道，提出请求不是我们的事，如果皇帝自己想派遣使者，我们愿托上帝的福平安地带他们去。我们有许多原因不便让他们前去。

第一，我们担心，如果我们这些国家中的内乱与战争被他们所注意，就会更鼓舞起他们来进攻我们。

第二，我们担心他们是否会是来到我们土地上的间谍。

第三，我们怕他们会被杀害，因为我们的各国人民相当傲慢自大，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根据阿列曼尼亚教皇使节卡尔丁纳尔[2]的请求，有一些同我们在一起的随员穿着鞑靼服到他那边去，他们差点没在路上被条顿人杀死，鞑靼服则被迫脱除了，鞑靼人在习惯上决不与杀死他们使者的人们媾和，而要向他们进行报复。

第四，我们怕他们会从我们那里被劫走，有一次一个萨拉森王就遇到了这样的事，他虽然没死，但迄今还一直当着俘虏。

第五，他们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除了向教皇陛下及其他大公们递交皇帝的国书外，没有接受任何其他委托，也无权处置此外的事，而这份国书我们已拿到手了；我们认为让他们来只会惹起一些祸来。因此我们不愿让他们来。接着在第三天上，正

〔1〕据伊朗著述家说，贵由汗是一个性格严厉的人（《多桑书》，卷2，第234页）。

〔2〕古戈·德·散托卡罗，参照达维札克书，第481页（马列英注）。

好就是圣布里齐节[1]那天,他们打发我们动身了,他们把盖有皇帝印玺的国书给了我们,还让我们去见太后;她给我们每人一件内衬有棉花的翻毛狐皮袄以及普普尔;我们身边的鞑靼人从每一块普普尔上偷走了一小条,而赐给随员的普普尔偷走了足足一半。这件事没有躲过我们的眼睛,但我们不想在这件事上与他们发生争执。

22.11.3 我们回来时所走的路

(1)我们踏上归途后,走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常常必须睡在沙漠的雪地里,那里没有树木,只有平坦的田野;有时我们只好用脚来掘出一个地方。常常,风雪卷刮着,我们完全被盖在雪里了。就这样,在耶稣升天节[2]那天,我们到了拔都那里,我们向他问道,有没有话回复教皇陛下。他答道,除皇帝所书而外,别无其他托付了;但他终究还是添了几句,让我们仔细地将皇帝所写的话转达给教皇陛下及其他统治者们。取得了传驿玺书后,我们离开了他,三一节后一周的星期六,我们到了马兀赤那里;那里有我们的几个同伴与随员被扣留着;我们让鞑靼人放他们回来了。我们从那里到了阔连察那边,他又向我们索取礼物,我们没有给他,因为我们身边没有东西;他从鞑靼人中抽了两个库蛮人发付我们到斡罗思乞瓦城去。但我们身边的鞑靼人直到我们走出鞑靼的最后一个关卡后,才离开了我们。阔连察发付给我们的那两个人,在六天内从最后的关卡把我们带到了乞瓦。

(2)我们于圣约翰节前15天[3]来到了那里。乞瓦人得知我们来了,全都高兴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庆贺我们,仿佛我们是死里重生的人;整个斡罗思、波兰与波希米亚都这样地接待我们。丹尼尔与他的兄弟瓦西里科为我们举行了盛大宴会,强行挽留了我们8天左右。那时他们同主教与其他尊贵人士互相商讨着我们对他们谈的到鞑靼人那里去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他们一致地答复我们说,愿以教皇陛下为

[1]1246年11月13日。

[2]1247年5月9日。可见普兰·迦儿宾从蒙古腹地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拔都帐营共走了6个月之久。

[3]即6月9日,因为伊凡诺夫日(约翰节)是6月24日。

自己的恩主与父亲,愿听从神圣罗马教会的统治与教导,他们还向我们证实说,他们已然通过修道院长将这一事报导了出去,他们还为此让我们带了文书与使者去见教皇陛下。

22.11.4 在鞑靼地域见过我们的见证人

(1)为了不让人对我们到过鞑靼地域,有所怀疑,我们将曾在那边见过我们的人名写下来。斡罗思国王丹尼尔及其全体武士和随从,即其全体随行人员在娶拔都之妹为妻的合儿丹的帐营附近见过我们;在阔连察处我们遇到了乞瓦百夫长蒙格罗[1]及其同伴们,他们与我们同行了一段路;后来他们比我们先到了拔都那里。在拔都那里我们遇到了王公雅罗斯拉夫,他从斡罗思随身带了一个名叫桑戈尔的武士,这个武士原是库蛮人,而现在成了基督教徒;从苏兹达尔地区来的、在拔都那里当过我们翻译的另外一些斡罗思人,在那里也见过我们。在鞑靼皇帝处,我们见过死在那里的王公雅罗斯拉夫及一个名叫铁木儿的武士,铁木儿在鞑靼皇帝贵由汗处,替我们当翻译,他为我们翻译了皇帝致教皇陛下书,并在我们(与皇帝)对答时担任口译;在那里我们还遇见过上述王公的教士杜巴尔赖,侍从雅科夫、米海尔与另一个雅科夫。回到木速蛮地区时,我们在列木芬克[2]城遇见了奉雅罗斯拉夫之妻及拔都之命到雅罗斯拉夫那里去的乌格涅,还遇见了科克帖列布及其全体伙伴。他们全都回到斡罗思苏兹达尔地区去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真相。在马兀赤处我们遇见了留在那里的我们的同伴,王公雅罗斯拉夫与他的同伴们,以及一个名叫斯维亚托波尔克的斡罗思人及其同伴们。离开库蛮尼牙时,我们遇到了到鞑靼地域去的王公罗曼及其同伴们,以及迄今还健在的王公阿洛加及其同伴们。与我们一起从库蛮尼牙动身的还有契尔尼戈夫王公的使者,他们与我们在斡罗思同路了很久。以上所述全是斡罗思王公。

(2)乞瓦全体市民也可作我们的证人,他们给我们护送人员与马,将我们送到鞑靼第一关卡点去,又在我们从鞑靼人处同护送人员以及

---

〔1〕土卑科夫的《古俄罗斯人名辞典》(圣彼得堡,1903年)中没有这个名字(马列英注)。

〔2〕柔克义认为,此名可能指锡尔河流域上花剌子模某城,也可能即奇姆坎。

他们的马匹一起回来时，迎接了我们，全部斡罗思人民也是我们的证人，我们通过了他们的国土，他们收受下盖有拔都印玺的文书与发给我们马匹、粮食的命令；如果他们不将马匹与粮食发给我们，就要被他处死。此外，勃列斯拉夫尔（Браславлъский）商人也是我们的证人，他们与我们同路走到乞瓦，他们知道我们这一行人进入了鞑靼地域，当我们动身到鞑靼人那里去后从波兰、奥地利来到乞瓦的许多其他商人，也可作我们的证人。

当我们从鞑靼地域回来时，从君士坦丁堡通过鞑靼地域来到斡罗思、住在乞瓦的商人们也是我们的证人。这些商人名字如下：热那亚人米海尔，巴尔托洛默，威尼斯人曼纽伊尔，阿克拉来的雅科夫·列维里，皮札的尼古拉，这些是较主要的。其他较次要的为：马尔克，亨利，约翰·瓦西，另一个亨利·博纳迪耶斯，彼得·帕斯哈米；此外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

22.12 全书结束语

请读到本书的所有的人，不要对本书添枝加叶、任意更改，因为我们让真理领路，写下了我们所看到的或从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全部事实，没加任何虚构，这一点上帝可以作证。由于我们路过波兰、波希米亚、条顿尼亚、列奥迪亚与康帕尼亚等地时，当地居民愿意一读上述历史，他们在这部历史结束与进行充分修改以前就将它录下了，因为我们没有空闲时间将它完全结束。因此，当这部历史修改得详细得多、修改得更好了，谁也用不着奇怪，因为只要略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充分地加以修改，并将没写完的东西写出来。

——被我们称作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述毕——

（据《普兰·迦儿宾与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前苏联国家地理学文献出版社，1957 年版。）

23 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

〔俄〕瓦·符·巴托尔德

辽阔的游牧帝国的迅速建立——这是中亚[1]历史上经常重复出现的现象。由于游牧生活条件,各种原因引起的运动,主要是经济性质的运动在短期内可以普及到许多民族、扩展到几千俄里,只有在不可克服的障碍面前才停住。同所遇到的障碍进行斗争的成功以及在各种场合下游牧帝国的边界取决于游牧民的军事力量、他们的首领的精力和才干的大小,以及他们在自己的路上势必碰上的那些政治组织的强大程度。

据我们所知,只有3个这样的帝国同时向中亚的东西两部分扩展,那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匈奴帝国、公元6世纪时的突厥帝国和13世纪时的蒙古帝国;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一些民族只有在被新的征服者从蒙古地区赶出时才迁到今天的突厥斯坦。在上列诸帝国中,前两个只不过联合了各游牧民族来掠夺经常最多地遭受游牧民侵袭的那些文明地区;蒙古入侵则毁灭了亚洲整个境内的一系列文明国家,蒙古帝国在疆域辽阔上超过了世界上迄今存在过的一切国家。

为什么蒙古军队会有这种特殊的成就呢?现在可以认为已完全证实了:蒙古人的征服活动不是以数量压倒一切的一大帮野蛮人的无秩序的入侵;蒙古部队按照完全确定好的战略计划前进,在路上打败了各文明民族的人数多得多的军队。当然,更困难的是保持由如此多种多样的成分组成的帝国的统一——这是对任何一个民族从未提出过的规模如此大的任务,是对半野蛮的蒙古人似乎根本无力完成的任

〔1〕[在此处和后文,巴托尔德把"中亚"这个名称既理解为中亚细亚,而多半又理解为中央亚细亚。在下文中作者区分为中亚东部(中央亚细亚)和中亚西部或突厥斯坦(按现代地名学实即中亚细亚)]方括号内的注文系俄文《巴托尔德文集》编者所加——中译者注。

务；然而帝国的统一不仅被保持于成吉思汗时代，而且也保持于他的儿子们和长孙们时；帝国瓦解后，蒙古成分在各国占优势的情况还保持了好几代。很自然地有人推测，至少在建立帝国的事业上半野蛮的游牧民的首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也就是说这个事业是在成吉思汗的名字下由他的各文明民族代表的谋士们作出的。从这种观点出发，瓦西利耶夫在其《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1]一书和另一些短文[2]中力图证明，铁木真完全处于中国人和接受中国文化的所谓契丹人[3]的影响下。另一些人如已故贝勒津教授在其就当时而言很出色的研究著作《术赤兀鲁思内部制度概述》中，把成吉思汗的天才摆在主要位置上，并对"野蛮人的健全的思想"赋予比有文化的谋士所出的主意更大的意义。据我们看来，历史资料更有利于第二种理论。不管留传至今的有关成吉思汗青少年时代及其最初的一些战绩的记载是多么贫乏和可疑，但这些记载终究使我们有可能至少大体上恢复历史真相。这些原始资料如下：

(1)根据未留传至今的蒙古著作《金册》(阿勒坛—迭卜帖儿)写进在波斯编成的官方编纂的蒙古史(即拉施特丁《史集》)[4]和在中国编成的官修蒙古史(《元史》)[5]中的那种形态的官方编纂的蒙古传说。

(2)14世纪末明代时以《元朝秘史》[6]的名称刊布于中国的13世

[1]《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4册。

[2]参照瓦西利耶夫：《问题和怀疑》，载《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4卷，1889年，第379～381页。

[3]鄂尔浑碑铭发现后，可认为已完全判明"契丹"为kitai这个大概起源于满族的民族名称的汉文写法；众所周知，这个民族于10、11和12世纪统治了北中国，后来这个民族的名称被某些民族用来称呼整个中国。

[4]贝勒津教授所刊布的导论(《突厥与蒙古诸部落概述》)和成吉思汗史的波斯原文和俄译文。我们在引用时指的是译文，并且按照茹科夫斯基所编的索引，第1册表示导论，第2、3册表示成吉思汗史的第1、2篇(《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13、15册)。

[5]迄今用欧洲语言译过来的只有《元史》的简略的译本；俄译本见俾丘林译：《元史》。[详见《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90～92页]。

[6]帕拉基教长从汉文译出的俄译本收载于《北京俄国传教士团从刊》第4卷；关于蒙文原文，见波兹德涅耶夫：《论古代汉蒙历史文献元朝秘史》，载《俄国考古学会通报》1884年，第10卷，第3～6分册。[关于新的版本和译本，见《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90页注4。]

纪蒙古故事。已故贝勒津教授不十分成功地称这部极其有趣的文献为“蒙汉文编年史”。实际上它多半可能是一部英雄、勇士史诗;这里以离奇的色彩描述了蒙古人的传说故事和蒙古帝国建立的历史,而且作者打算颂扬的主要不是王朝统治者,而是他明显地热情对待[1]的看来他本人也属于的草原贵族中的统治者的战友们。

(3)瓦西利耶夫教授所译的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中国人赵珙的记载。[2]

(4)主要由波斯史学家术思札尼编集的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伊斯兰教徒的记载,他的著作《塔巴合第·纳昔里》已出版的有拉维尔第的英译本。[3]

蒙古人或当时他们自称[4]的鞑靼人,分为许多部落,中国人把他们按照文明程度分为三群,即:白鞑靼、黑鞑靼和生鞑靼。[5] 住在中国长城附近南蒙古的白鞑靼接触中国文明的影响最多。占据今蒙古地区大部分的黑鞑靼,没有受到各民族的不断的影响,各文明民族的代表只以商人资格深入到这个地区。与游牧民进行现物贸易操纵在突厥斯坦畏吾儿和伊斯兰教商人手中,在这方面他们始终以具有比中国更大的进取精神而出众。畏吾儿人和伊斯兰教徒甚至把蒙古地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夺取在他们手中,也就是他们在中国买进货物,转售给游牧民;在这种商人手中有时集中了相当可观的资本。[6] 由于这一情况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商人们当然能对汗产生影响,并通过汗影响到人民;此外,在佛教、聂思脱里教、伊斯兰教商人后面,总是有这些

---

[1]尤其是卡法罗夫译:《秘史》第129页。

[2]瓦西利耶夫:《从10到13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附录:有关契丹、女真和蒙古鞑靼的汉文记载的译文》,载《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4册,1859年,第1~235页。[真正的作者为赵珙,参看《巴托尔德文集》第1卷,第90页注4.](按:原文正文此处作“孟珙”,今据作者意,将此处及后文出现的孟珙均改作赵珙。)

[3][也可参看纳萨乌—里斯版术思札尼书。]

[4]在中国、伊斯兰教世界和欧洲,蒙古人都首先以鞑靼之名著称;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元帅曾当着赵珙的面自称为“鞑靼人”(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20页)。

[5]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16页。

[6]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19、228页;《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95页。

宗教的传教士接着出现。当时伊斯兰教对中亚还没能达到完全统治，在蒙古地区没有积极的伊斯兰教宣传活动；佛教和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在蒙古人的突厥斯坦紧邻畏吾儿人中间占优势；聂思脱里教派的传教士得以使黑鞑靼的若干强大的部落如乃蛮、客列亦惕等部信奉了自己的教派。我们在整个蒙古地区、甚至在住在满洲边境贝尔湖附近的塔塔儿部本身处，都可见到突厥名字和衔号；[1]也许，这不仅由于当时突厥人的影响，而且也由于有关以往世纪统治蒙古地区的突厥可汗的草原传说的影响。

被蒙古人称作"森林民"的生鞑靼大部分在今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地区西北的森林里过着流浪生活。根据拉施特丁所说的话来判断，[2]在这些野蛮人眼中，游牧民的生活甚至成为如此不能容忍的奴役，正像游牧民感到农民的生活是如此不能容忍的奴役。珊蛮教在这里十分纯粹地被保存下来；还在蒙古统治时代，外贝加尔地区被认为是典型的珊蛮教地区。[3]

铁木真于1155年左右[4]生于黑鞑靼和生鞑靼地区交界处的斡难河畔。中国人把他算做黑鞑靼；按照蒙古传说，铁木真出身于属于森林部落之一的泰亦赤兀惕部乞牙惕氏族。[5] 按照同一传说，铁木真和他的兄弟们在青年时代过着狩猎和捕鱼生活。关于铁木真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的记载极为矛盾；据赵珙说，[6]他只是个十夫长；据蒙古传说，[7]他几乎是所有蒙古诸部的首领。后一说法无论如何有所夸大，但在关于也速该的功绩及其同贝尔湖塔塔儿人做斗争以及最后死在

---

〔1〕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霍渥斯的意见，他把这样的名字和衔号视为各种部落起源于突厥族的证据（见他的《蒙古史》第1册，第20～25、693～700页）。

〔2〕贝勒津本《史集》第1册，第90页。

〔3〕贝勒津本《史集》第1册，第142页。

〔4〕除中国官修史书和后来的蒙古传说（萨囊彻辰书）外，在所有史料上都如此。参看贝勒津本拉施特丁：《史集》第2册，第85页；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代和古代》，第217页；拉维尔第译本术思札尼书，第2册，第1077页。

〔5〕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1册，第89页。

〔6〕［赵洪］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17页。

〔7〕史学家术思札尼（拉维尔第译本第2册，第935～936页）也说，成吉思汗之父为"蒙古诸部的首领"，但从他所说可知，他混淆了成吉思汗的生父和他的义父客列亦惕汗脱斡邻勒。

他们手中的故事[1]中，大概终究包含了若干部分的历史真相。无论如何，他曾进行过远征，因为他从住在中国长城附近，也就是属于白鞑靼的弘吉剌惕部娶了自己的妻子；[2]这个妻子生下了铁木真及其兄弟们。

不管也速该在泰亦赤兀惕人中间的地位如何，他死后他的年幼的儿子们（长子铁木真为13岁）被全体所抛弃，在若干时期内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着最艰苦的生活，靠吃草根、野兽和鱼为生。[3]但纷争时代有利于杰出人物出人头地。铁木真建立的功绩，也许还有人们对其父军事荣誉的回忆，把一些贵族出身的青年人吸引到了他那里，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他的亲兵。铁木真年轻时，12世纪时强大起来、有些时候甚至连当时统治北中国的满洲金王朝也感到威胁[4]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被毁掉了。金人武装起贝尔湖塔塔儿人来反对蒙古人；但共同敌人被消灭后，正如草原上老是发生的情况，塔塔儿人立刻同自己以往的同盟者敌对，并重新开始进攻中国。现在金人把另一些游牧首领武装起来反对塔塔儿人，这些首领中最强大的是基督教徒客列亦惕汗脱斡里勒，他的营地在土剌河畔。[5]铁木真及其徒众依附于客列亦惕汗，成为他同贝尔湖塔塔儿人、同统治西蒙古的乃蛮人、同外贝加尔地区的统治部落蔑儿乞惕人斗争时的得力助手。当中国皇帝派遣军队到蒙古地区来，想使贝尔湖塔塔儿人遭到决定性打击时，曾邀请客列亦惕汗协助消灭共同敌人，铁木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事胜利结束后，中国政府授予他一个荣誉的衔号。

从中国皇帝处获得“王”的封号的客列亦惕汗，现在成了东蒙古的头号人物。看来，他缺乏他所需要的把游牧部落紧密地联合成一个巩固的国家的组织才能。对铁木真的表面驯顺感到满意，他没有阻碍其进一步提高地位，甚至当铁木真宣布自己为蒙古可汗的继承者、恢复

[1]《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36页。

[2]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1册，第149页；第2册，第54页。

[3]《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38页。

[4]《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172～173页。

[5]《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49页。

了蒙古民族的名称,并采用了汗的尊号时,他也表示同意。按照与官方编纂的传说[1]及事件的此后进程毫无矛盾的勇士故事,铁木真被一群贵族(其中也有最后一个蒙古可汗忽图剌可汗的儿子阿勒坛)拥上了宝座。按照蒙古传说,铁木真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为忽图剌可汗之侄;很可能,这个血统关系是铁木真现在为取得自己的权利的重大根据才想到的:在勇士故事中所引用的勇士们向铁木真宣誓的仪式是很有趣的:"你若做皇帝呵,众敌在前俺做前哨,但掳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按照蒙古传说,[2]铁木真用同样的话确定了自己对其徒众的功绩:"我夺取了许多马群、畜群、帐幕、人们的妻子儿女来给你们,我为你们在草原上狩猎时布置了通道和围猎圈,把山兽赶向你们方面。"[3]这样,蒙古贵族首领的权利和义务被规定得十分清楚:汗带领自己的战友去取得胜利,在出征和共同狩猎时领导他们,从而取得虏获物的最好的一份。

当草原贵族宣布铁木真为自己的首领时,不追求财富和名声,只要日常饮食的平民们,团结在另一个人、即札只剌惕部的一个首领札木合的周围。在官方编纂的传说中,札木合只是个狡猾的阴谋家,他到处鼓动敌人们反对铁木真,最后他遭到了如果铁木真落到他手里、他为铁木真所预定的野蛮的死刑。[4] 在勇士故事里,对两个竞争者的关系有不同的描写,那里总是明显地同情于蒙古人民领袖(指札木合——译者注),尽管这样的描写背弃了贵族利益。

铁木真和札木合幼年时互相亲密地结盟友好,被认为是安答即义兄弟(不过,官方编纂的传说也谈到了这点)。有一天,札木合对自己的朋友说了下面这段话:"咱每如今挨着山下放马的得帐房住;挨着涧下放羊的放羔儿的喉咙里得吃的。"[5]据《秘史》作者说,铁木真不懂

---

[1]拉施特丁书(贝勒津本第2册,第139页)上甚至直接指出了这件事;在中国史书上(《元史》俾丘林译本,第28页)也同。

[2]《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62页。

[3]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2册,第139页;译文据原文作了修正(同书第225~226页)。

[4]贝勒津本拉施物丁书第1册,第201~204页。

[5]《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59页。

这些话的真正含义,但这些话使他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怀疑,他就按照他母亲的劝告离开了自己的朋友(余按:实际应是铁木真听从妻子孛儿帖的劝告离开札木合)。据我们看来,被认为是札木合说的预言很清楚:"放马的"就是草原贵族,只想到"喉咙里得吃的"的"放羊的、放羔儿的"是平民,札木合与铁木真相反,站到了平民方面。[1] 同样的,在被说成是成吉思汗的名言[2]里,"机警伶俐"的牧马人与"不通门径的"经常构成游牧社会下层的牧羊人相对立。各部落的勇士宣布成吉思汗为汗;1201 年在札木合周围聚集起了既不愿屈服于铁木真、又不愿屈服于他的义父客列亦惕王汗的人民;他们向采取了属于哈剌契丹皇帝(从中国边境以迄咸海、从额尔齐斯河以迄阿姆河地区上的君主)的古儿汗尊号的札木合宣誓。[3]

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下去,它的首领开始过着猎奇生活;但不久在贵族内部发生了争吵。铁木真的最早的徒众留在他这方面,同他一起提高了地位;但是,忽图剌可汗之子阿勒坛和出身比铁木真显贵、自愿把优先权让给他(想必估计到这个优先权只是名义上的)的另一些人,现在感到自己的期望受了骗;像铁木真这样的人只会专制地实行统治,他甚至对自己的最显贵的臣属也一定要求无条件地服从。阿勒坛与其他不满的人同札木合联合起来,他们得以把客列亦惕汗和他的戴有中国衔号桑昆的儿子拉拢到自己方面。铁木真与客列亦惕王族早些时候已经疏远起来,因为王汗和他的儿子拒绝与铁木真结成姻亲,拒绝通过结亲使铁木真的地位完全奠定下来。现在,同盟者们使王汗相信,铁木真暗中与他的敌人乃蛮人相勾结。在某些时候铁木真处境很困难,他大概带着少数徒众退到了额尔古纳河下游附近的巴勒渚纳湖,在那里遭遇了很大的艰难。后来铁木真的这些忠实战友获得了巴

[1]至于山和河的对比,铁木真实际上是在山隘里被宣布为汗的(《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 45、61 页),札木合则在额尔古纳河上称汗。众所周知,如今所有较富裕些的游牧人夏天都远走到山里去,只有最贫穷的居民才整年留在河岸上。

[2]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 3 册,第 121 页。

[3]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 2 册,第 124 页;《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 69～70 页。

勒渚温图的名称,他们的后裔享有各种特权。[1] 这群徒众不全是蒙古人,他们之中有在铁木真处效劳的伊斯兰教商人,如中国史上提到的札八儿火者[2]和勇士故事上提到的阿三。[3] 不无狡计和背信弃义行为,铁木真得以在这次斗争中成了胜利者;王汗和他的儿子逃到了乃蛮国,在那里被杀死,铁木真在东蒙古已经没有对手了。

札木合试图让西蒙古人即乃蛮人武装起来反对铁木真;乃蛮太阳汗向汪古惕人即白鞑靼提出结盟反对铁木真,但他们宁可主动地屈服于东蒙古的统治者。乃蛮人的力量过了几年也被摧毁了。札木合成了土匪头子,最后被自己的部属交给了铁木真。与拉施特丁相反,蒙古勇士故事赋予两位过去的朋友的会面以及札木合的末日以及始终围绕在这位蒙古人民领袖个人周围的传奇式的光轮。札木合带着沉重的感觉举起武器反对铁木真,但在这种场合下他也暗中为自己的安答效劳,将敌人的意图预先通告他;因此铁木真现在想饶恕他,让他忘掉过去,恢复旧谊。札木合回答说,他不可能做铁木真的真诚的伙伴,他不由地总要成为惊扰安答的对象;因此他不如死去,他只为自己请求两个恩典:请铁木真让他不流血地死去;当他的灵魂完整地保留着时(按照蒙古人的信仰,灵魂被包含在血中),他将成为铁木真后裔的保护神。他的愿望实现了,他死后,铁木真为自己的对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4]

乃蛮人被击溃和札木合被俘后,蒙古民族的统一和成吉思汗游牧帝国的建立可以认为是已实现的事实了,征服"森林民"和另一些小部落被各位蒙古将领轻易地实现了。关于什么时候铁木真开始自称为成吉思汗,什么时候举行了他那隆重的即位仪式,留传至今的记载是矛盾的。官方编纂的传说[5]把这一事实放在1206年,即打败乃蛮人之后,尽管也

---

〔1〕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2册,第133页。

〔2〕关于此人,参看R. K. 陶格拉斯:《成吉思汗传》,译自汉文,伦敦1877年版,第38页;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23页,该处误称伊斯兰教徒为畏吾儿人(众所周知,汉字可有这样或那样含义);《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210~211页;术思札尼书,拉维尔第译本第2册,第954页。

〔3〕《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95、210页。

〔4〕《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112~114页。

〔5〕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3册,第8、112页;《元史》,俾丘林译本,第35页。

有一些编年史把这件事记载在1203年,即战胜客列亦惕人之后,[1]按照勇士故事,[2]早在他的一群贵族跟随者宣布他为自己的首领时,他就已采用了成吉思合罕的称号;但是,根据这一原始资料,[3]1206年成吉思汗"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4]因为当时他"整治达达百姓"。同时他最后建成了作为他的政权的主要支柱的护卫军。

这样成吉思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领袖",他所创建的国家制度带有严格的贵族性质。在这一方面,把被说成为成吉思汗的格言同鄂尔浑碑铭上把自己地位的提高归诸于民主因素的可汗留给人民的遗言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5] 碑铭作者多次重复地说,当可汗即位时人民腹中无食、身上无衣,靠可汗的辛苦和功绩,贫穷的民族成了富有的,人数不多的民族成了人数众多的民族。[6] 另一方面,成吉思汗坚持说,在他之前草原上没有任何秩序;幼者不听从长者,属民不尊敬长官,长官不履行自己对属民的义务;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向每个人指出了各自的位置。[7] 成吉思汗的全部教言只是对汗族成员、对大臣和长官们说的,而不是像突厥可汗那样是对全体人民说的。

与各文明民族接近,并未改变这一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看到,早在同客列亦惕人斗争时,在成吉思汗军队中,就有到草原上做买卖的商人的各文明民族的个别代表,并且,蒙古传说还提到了两个伊斯兰教人名;此外,铁木真在乃蛮国找到了一个畏吾儿"保管印章者"(突厥语 tamgači,源于 tamga"印章"一词),这个人使他熟悉了印章的

---

〔1〕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3册,第110~111页。

〔2〕《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62、174页,A.O.伊万诺夫斯基教授告诉我说,蒙文原文中有"合罕"一词。

〔3〕《蒙古秘史》,卡法罗夫译本,第114页。

〔4〕[据伯希和修改为"九脚白旄纛";见伯希和:《〈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评注》,(载《通报》第27卷,1930年,第12~56页)第32页,该处解释了这个名词的含义。]

〔5〕W.拉德洛夫:《蒙古地区的突厥碑铭》,第1~3册,圣彼得堡1894—1895年版、1897年新版、1899年第二版,第13、17、19页;V.汤姆生:《鄂尔浑碑铭》,赫尔辛基1896年出版,第103、106~108页;[C.E.马洛夫:《古突厥文字文献(原文和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第35页。]

〔6〕W.拉德洛夫:《蒙古地区的突厥碑铭》,第1~3册,圣彼得堡1894—1895年版、1897年新版、1899年第二版,第13、17、19页;V.汤姆生:《鄂尔浑碑铭》,赫尔辛基1896年出版,第103、106~108页;[C.E.马洛夫:《古突厥文字文献(原文和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第35页。]

〔7〕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三册,第120~121页。

用法以及一般而言公文处理的原理;在此之前铁木真对这一切是完全不懂的,现在他录用这个畏吾儿人为他效劳,命令他教蒙古贵族青年学畏吾儿文,顺便也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1] 至于汉人的影响,在蒙古传说中只字没有谈到。赵珙的记载只指出,与成吉思汗同时的汉人已按汉人的经常习惯,竭力把蒙古征服者的成就解释为汉人的影响,并带着这个目的来找到事实;关于成吉思汗年轻时曾被金朝军队所俘获,他在中国生活过 10 年以上的记载就具有这种性质;[2]对于在成吉思汗一生中延续了整整 10 年的时期,蒙古传说上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未必可能。瓦西利耶夫教授[3]把认为"成吉思"一词为汉文"天赐"的音讹的看法归之于赵珙;但赵珙没有以自己的名义说出这种看法,他只是加上"或曰"二字加以转述;[4]显然,我们在此只有中国俚俗词源学。如果按照瓦西利耶夫教授的见解,这个衔号是铁木真直接从中国叛人处借用的,它未必会这样快地传讹得成吉思汗还在世时中国人自己就已经不懂了;然而当时这个衔号汉字就已写作"成吉思"。[5] 稍后开始出现中国文化对蒙古人的直接影响,从赵珙自己所说的话可知[6],蒙古人到 1219 年、即他们第一次出征中国 8 年之后,才开始使用汉文同中国政府通信;过去甚至连这些公文也是只用畏吾儿文写的。蒙古人与处于中国文化的直接和唯一影响下的民族的差别,最明显地见于如下例子中:哈剌契丹人采用中国的按户征税制,并把它带到了伊斯兰教地区;[7]蒙古人在中国本土则不顾中国贵族的反对,竭力推行人头税。[8]

---

[1]阿贝勒—雷米萨特:《畏吾儿族大臣塔塔统阿》(载《亚洲新论丛》,第 2 卷,巴黎 1829 年,第 61 ~ 63 页),第 61 页。志费尼(列宁格勒国立 M. E. 萨勒蒂科夫—谢德林公开图书馆抄本Ⅳ,2,34,第 9 张)也说,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蒙古青年应当学习畏吾儿文字。

[2]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 218 页。

[3]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 140 页;《问题和怀疑》,第 379 页。

[4]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 218 页。

[5]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 229 页。据瓦西利耶夫教授的看法,铁木真把"在位之年号"称作"天赐";然而赵珙断言道:蒙古人"不知朝号、不知年号"(同上,第 220 页)。

[6]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 219 页。

[7]伊本·阿昔儿书,托恩保本,第 11 卷,第 56 页。

[8]《元史》,俾丘林译本,第 264 页。

关于“成吉思”一词,蒙古人本身有一种在拉施特丁之前的志费尼就听说过的传说;[1]据说铁木真是从有“帖卜腾格理”(意即“上升到天上者”)称号的阔阔出处取得这个衔号的。由此,班札罗夫的见解就有了很大可能性;按照他的假设,“成吉思”是珊蛮所崇拜的一个神灵名称;在一种蒙古抄本上,班札罗夫找到了“哈只儿一成吉思一腾格理”神的名称。[2]

表现为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额客嫁给阔阔出的父亲的成吉思汗与帖卜腾格理的联盟,无疑是成吉思汗的贵族徒众们所高兴的事。志费尼正是从蒙古贵族处[3]听到了充满着对这个珊蛮的迷信崇拜的离奇故事;看来,按照出身,阔阔出也属于高等贵族。当然,成吉思汗不受对珊蛮们的迷信尊敬的束缚,他遵循的只是政治上的考虑;当阔阔出的势力加强起来,有削弱汗本人威信的危险时,他就像以前从高等贵族中干掉自己的对手那样干脆地把这个珊蛮干掉了。出于同样的政治考虑,成吉思汗尽管自己同伊斯兰教徒、同信基督教和佛教的畏吾儿人亲近,他仍是在所有蒙古人处、甚至自称为基督教徒的蒙古人[4]处受到同样尊重的民族习惯的热忱遵奉者;同时,为文明宗教思想铁木真只在自己周围聚拢少数信徒。甚至采用畏吾儿文首先是用于编纂蒙古习惯法,而不是用于将别国文献译成蒙语。无论是习惯法典和按照成吉思汗及其最近的继位者们编写成的蒙古诸部编年史,都完全按照帝国贵族制度的精神,对外人保持绝密,只准汗族成员和少数大臣阅读这些书。[5]

为治理定居民族,成吉思汗需要他在蒙古人中间找不到的有教养

〔1〕国立谢德林公开图书馆抄本Ⅳ,2,34,第14张。

〔2〕班札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珊蛮教》,圣彼得堡1891年,第12~13页。

〔3〕az mghūLān m' tbr Šnideh am。

〔4〕在蒙古传说中,客列亦惕、乃蛮人及其君主们始终都是与蒙古地区其他居民同样的草原人。

〔5〕在讲课时我曾指出,中国人历来有这种习惯。成吉思汗采用了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蒙古人要大得多的民族所没有的这个习惯,这无论如何没有失去意义。在鄂尔浑碑铭上说,可汗(关于这个王朝的民主起源,参看上文)在中国人参加下建立了墓碑,但在碑上写了本民族的成败史,并请全民族来阅读它(拉德洛夫:《古突厥碑铭》,第36页;汤姆生:《鄂尔浑碑铭》,第118页)。显然,这些突厥人与蒙古人相反,无论是汗的墓或本族古代传说,都没有隐瞒人民。

的人；经常作战和处理行政事务使他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亲自掌握必需的知识、亲自指导畏吾儿人；伊斯兰教徒和汉人中间的官员；有与他同时代的人提供的证据留传下来，说明成吉思汗直到死为止除蒙语外不懂任何别种语言。[1] 但他采取了措施，让他的继位者们不再处于依赖异部族官员的状态，为此，他关心自己儿子们以及一般而言蒙古贵族年轻一代的教育。这样，按照成吉思汗的思想，在后来的世代中民族管理机构应按建立军事管理机构的同样原则来建立。按照贝勒津教授的正确意见，[2]蒙古汗的极英明的计划由于他所未能预见到的一个情况即文明与游牧生活的互不相容而遭到了破坏。这种不相容性遭到了某些学者的反驳，例如格里戈里耶夫[3]指出说，游牧人比定居民族有更多空闲时间来从事智力活动；但是另一方面，游牧人缺少从事整整多少个世代养成的接连不断的劳动的习惯，没有这个习惯就不能掌握智力文明。还在成吉思汗在世时就有个别的蒙古青年掌握了一点文化，并能用几种语言说话；[4]但是能占据文化职位的蒙古人为数始终不多，直到蒙古统治结束时这些职位仍在畏吾儿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手中。与成吉思汗的想法相反，他的继位者们仍需要有文化的异族人的效劳，同时没有像帝国的天才创始者那样谨慎而有条不紊地利用他们。成吉思汗偏重畏吾儿人的文明，显然因为它最接近于游牧人；畏吾儿人中间有许多游牧传说和草原风俗习惯的残余。[5] 所有的蒙古贵族青年一代都同样地学习畏吾儿文；因此，掌握这种文化既不破坏这个阶层的统一，又不破坏他们对草原传统的热忱。成吉思汗的继位者们继续让自己的儿子们受教育，但在这方面没有遵守任何制度；在

---

〔1〕术思札尼书，拉维尔第译本，第2册，第1114页。成吉思汗通过译员向中国人长春真人（丘处机）所作说明（卡法罗夫译：《长春真人西游记》，第331页）是中国人关于铁木真在中国住过10年的记载与事实不符的最好证据。

〔2〕《术赤兀鲁思内部制度概述》，第21页。

〔3〕《关于斯基泰的塞种》，圣彼得堡，第61页起。

〔4〕瓦西利耶夫：《中亚东部的历史和古代》，第222页。

〔5〕参看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41页起；《关于畏吾儿人问题》第56页起）所述畏吾儿传说（据志费尼书）。从畏吾儿人所保存的草原风俗习惯中，我们可指出娶父亲死后留下的妻子的习惯，参看志费尼书，国立谢德林公开图书馆抄本Ⅳ，2，34，第184张。

某些家庭中，顺便说说甚至在第二代可汗窝阔台的家庭中，[1]一些儿子获得了基督教畏吾儿人的教育，另一些人则受到伊斯兰教的教育，这当然只能促成纷争和内讧，而在没有这个情况时由于帝国疆土的扩大和缺乏利害关系上的一致就已经造成了纷争和内讧。当帝国创始人个人的影响还存在时，当由他培养出来的人还起作用时，帝国一直保持着统一，即成吉思汗死后30年内继续保持了帝国的统一，成吉思汗活了72岁，他从当时的年轻人中把具有与他同岁人那样才能的人选做自己的助手。只有当成吉思汗的战友们完全离开历史舞台，代替他们出现了一些在别样的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新人时，帝国遭到了瓦解因素的影响。

据我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与游牧部落基本经济单位氏族的瓦解有关。在个人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有关氏族所有权的观念也转到了被认为是全体汗族所有物的国家上。[2] 氏族的致富使个别氏族成员已经不需要其他成员，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氏族的团结；例如，在鄂尔浑碑铭上可汗想描绘自己民族的富裕情况时说："弟弟认不得哥哥，儿子认不得父亲。"[3]由于帝国疆土的扩大，即成吉思汗氏族的共同所有物的扩大，对于汗族这种时刻来到了；个别宗王在被征服地区获得了没有自己族人的帮助维持自己政权的可能；他们不再受成吉思汗那样强大而对所有的人有同样威望的势力的制约，他们很快地成了独立国家的首领，相互之间很快开始了骨肉相残的战争。

（译自前苏联1968年版《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253～265页；原文最初于1897年刊载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10卷。）

---

[1]众所周知，窝阔台的继位者贵由受过基督教教育，窝阔台幼子灭里则受过伊斯兰教教育（关于灭里，参看拉施特丁书，亚洲博物馆抄木 a566，第174张）。

[2]志费尼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见国立谢德林公开图书馆抄本Ⅳ，2，34，第15张。

[3]拉德洛夫：《古突厥碑铭》，第54页；汤姆生：《鄂尔浑碑铭》，第105页。看来，我们的解释比汤姆生教授的解释（第150页）要简单些，但较符合于上下文意。

24 突厥、蒙古人的社会日常生活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俄〕瓦・符・巴托尔德

今年出了科兹明教授的令人感兴趣的著作《经济和民族(民族过程中的生产因素)》是写这篇纲要的直接原因。科兹明著作的论题为中亚细亚,[1]那是森林毗连草原、草原毗连农业地区的地理区,我们在那里可同时看到所有3个相继的经济结构阶段(狩猎业、游牧业、农业)[2]上的代表,有时在同一个民族学集团的各民族中间就可以看到。科兹明教授理由充足地证明了,在这些情况下同一经济结构比起同一族源来,要使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密切得多。

如果我们有了较充分全面的考察和历史资料,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原因和结果就很清楚。如果我们拥有足够丰富的研究以农民为一方与狩猎民、游牧民为另一方之间关系的材料,那么有关狩猎民与游牧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从其中一个经济生活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资料就要少得多。从猎取动物过渡到驯服它们的情形阐明得最差。中亚各民族生活的出色的研究者拉德洛夫,[3]只能对极北

〔1〕[中央亚细亚。]

〔2〕尽管有一种当然早已被推翻的意见认为这种相继性是所有各民族历史的必然的要求,但这种相继性在中亚[即中央亚细亚]史上应当承认是正常的。早就查明,狩猎民可以认识农业早于畜牧业,并直接从流浪的狩猎生活过渡到定居农业生活。

〔3〕在这一方面,他的《西伯利亚札记》一书迄今仍是最完美的。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是不完美的和陈旧过时的。

的民族萨莫耶德人[1]和通古斯人指出其驯服北方鹿[2]的这种过渡阶段的意义；但是这个现象对于生活进化史具有较小的意义，因为通古斯人更经常地直接从狩猎生活过渡到农业。[3] 众所周知，另一种其历史对人类历史有意义的动物西藏牦牛也有野生和家养两种；在另一些情况下，构成游牧民财富的动物（骆驼、马、羊、甚至牛）被驯服得如此早，以致完全或几乎完全没有野生的。

由于缺乏游记文献资料，只好去查阅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在中亚细亚[4]出现了游牧帝国的时候，史学家有关中亚的记载就较详细，中亚游牧帝国的存在也反映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十分自然，最浩繁的文献是有关最辽阔和强大的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其中以14世纪初在波斯编写成的拉施特丁[5]的著作最重要。看来，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的专讲蒙古人的汉文文献也会提供出宝贵的材料。[6]

根据全部记载[7]可知，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人中间既有狩猎部落，又有游牧部落，可能还有农业部落。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赵珙将当时称作蒙古的鞑靼分为生鞑靼、黑鞑靼和白鞑靼。生鞑靼住在蒙古人所住境土的最北面的森林里，黑鞑靼占据草原，白鞑靼住在中

---

〔1〕[聂聂茨人。]

〔2〕拉德洛夫：《西伯利亚札记 · 我的日记本上的零页》，莱比锡，1884年第1版；1893年第2版，共两册，第1册，第206页；拉德洛夫：《关于畏吾尔人问题》（《福乐智慧》的出版前言），圣彼得堡1893年版《帝国科学院集刊》，第72卷，第2期附录，第67页。[有关养鹿业起源问题的文献很多；详见马克西莫夫：《养鹿业的起源》，载《俄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第6卷，莫斯科1928年，第3～37页；瓦西列维奇、列文：《养鹿业的类型及其起源》，载《苏联民族学》，1951年第1期，第63～87页。]

〔3〕帕特卡诺夫：《论西伯利亚异民族居民的增加》，圣彼得堡1911年，第172页。

〔4〕[中央亚细亚。]

〔5〕关于他，详见巴托尔德：《伊斯兰教世界》，第1卷，第73页起。[如今可参阅伊 · 彼特鲁舍夫斯基：《拉施特丁及其历史著作》，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的《拉施特丁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1册，第7～37页。]

〔6〕见伯希和：《库蛮》（载《亚洲学报》第11集15卷，1920年，第125～185页）第130页起。[如今可参看孟库耶夫：《有关蒙古史（13—14世纪）的汉文基本资料》，载《东方外国现代历史编纂学》，第1分册（中国），莫斯科1963年版，第156～194页，他的《有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资料 · 耶律楚材墓碑铭》，载《翻译和研究》，莫斯科1965年，第130～184页。]

〔7〕详情及所引资料，见巴托尔德：《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53～265页。]

国边境上的农业地区。[1] 蒙古传说(其中包括拉施特丁所采用的传说),代替"生韃靼"一词使用了"森林民"(槐因亦儿坚)一词。[2] 对于住在贝加尔湖东面的这些民族之一森林兀良合惕人,拉施特丁专门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在他的描述中看到了差不多是世界文献上描述狩猎民对游牧民关系的唯一尝试。[3] 森林兀良合惕已处在狩猎生活与游牧生活之间的过渡阶段;[4]山羊和山牛(有趣的是,这个词会不会与牦牛有关)对他们不仅是狩猎对象,而且也被他们所驯养;然而与看管绵羊相联系的正常的畜牧业似乎对他们是如此不可容忍的奴役,正像定居农民的生活对游牧民那样成为不可容忍的奴役。当双亲不满于女儿时,他们就吓唬她说要把她嫁给将迫使她看管羊的人;这种威吓看来是如此可怕,以致可以使得女孩子去自尽。森林兀良合惕人从不离开自己的森林;在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迁移时,他们将驮包放在山牛身上,不管到哪里就安下自己的用树皮做成的帐幕(阿剌出乞);他们喝树汁来代替喝水。他们深信,他们的生活比任何别的人都好,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了。森林民占据了辽阔的疆土;从一处森林到另一处森林通常有一两个月的行程,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少于10天。[5]

拉施特丁还有趣地记载道,森林民是现今在欧洲科学中以"珊蛮教"之名著称的宗教崇拜的主要信奉者。不管"珊蛮"一词的起源如

---

[1][见《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56页。真正的作者实为赵珙。](按:原文此处本作"孟珙",今改之)。

[2]据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13页,柏林—彼得堡—莫斯科1922年版,第13页。

[3]贝勒津刊行的《拉施特丁史集》第1册原文,第114页起。

[4]拉施特丁在森林兀良合惕与一般兀良合惕人之间作了区别,但从他所说可知,这种区别对他自己也是不清楚的。担任看守马的坟地的荣职属于森林兀良合惕人(同上,第117页),但在有关一般兀良合惕人的一章中又复述了这一点(同上191页)。[对拉施特丁有关森林兀良合惕人记载的民族学分析以及有关兀良合惕族名的详细资料,参看瓦因施坦:《图瓦一托真人》,第29~31页;是在拉施特丁原文中提到的不是"看守马的坟地",而是守卫"成吉思汗的伟大忽鲁黑(陵园禁地)"(《拉施特丁史集》,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版俄译本,第1卷,第1册,第125页;A.A.谢麦诺夫对"忽鲁黑"一词的解释见同处)或守卫"埋葬着成吉思汗伟大遗骸的"忽鲁黑(同上,第150页)]。

[5]贝勒津本《拉施特丁史集》第1册,原文,第113页。

何，现今被使用的意义上的"珊蛮"一词是从最好地保存了狩猎生活的特点以及珊蛮教特点的通古斯人处袭用的。在突厥人和蒙古人处，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哈木"一词；在成吉思汗时代，以住有兀良合惕和其他森林民的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1]"哈木"最多。

拉德洛夫关于现代狩猎民族的看法[2]（狩猎民族为保障其生活资料，必须有辽阔的、当然是人烟稀少的疆土）也证实了上面所引拉施特丁的话。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建立人数众多而政治上强大的团体是不可想像的；只能举行袭击，而不能举行征服性远征。因此我感到科兹明所说8世纪鄂尔浑碑铭属于森林民族的看法是错误的；让这样的民族在6世纪时建立一个从中国边境延伸到刻赤湾的帝国根本不可想像。如果下令刻写碑铭的那个汗热烈地说过被森林被覆的山，那么碑铭上另一些地方明显地指出了游牧生活条件；例如，当叙述到少量汗的军队战胜了人数众多的敌人时，把汗的战士比作狼，他们的敌人则被比作羊。狼袭击羊群的情景，是游牧人很熟悉的，而对狩猎民则是完全陌生的。当然，有时在狩猎民和游牧民之间进行准确的划分（特别是在他们疆土的边境地带）是相当困难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兄弟们在年轻时曾过着狩猎和捕鱼的生活；他的部落泰亦赤兀惕人被列为森林民；[3]但成吉思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游牧民首领的资格举行其征服活动的。

蒙古各族家庭生活的某些特点也保留在游牧人处；拉德洛夫[4]所指出的狩猎民的习惯（长子们分出去，幼子留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死去继承他的基本财产）也属于此。但这份财产在狩猎生活时代不可能很大；只有在游牧生活时代，财产的不平等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并出现了原始形态的阶级斗争——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斗争形态；大概，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出现了政府的权力、军事和政治威力。至

〔1〕贝勒津本《拉施特丁史集》第1册，原文，第189页；比较贝加尔湖东岸流出的河名：巴尔古津。[关于森林兀良合惕人的后裔图瓦—托真人处的珊蛮教信仰，参阅瓦因施坦：《图瓦—托真人》、《历史民族学概述》，莫斯科1961年版，第170～194页]；关于珊蛮教及其演化，参阅托卡列夫：《宗教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莫斯科1964年版，第278～305页。

〔2〕《关于畏吾儿人问题》，第66页起。

〔3〕贝勒津本《拉施特丁史集》第1卷，原文，第13页。

〔4〕《关于畏吾儿人问题》，第66页。

少在两种情况下从游牧民自己口中而非从其文明邻国人的口中把游牧帝国建立的情况留传了下来,那也就是在鄂尔浑碑铭上关于7世纪时蒙古地区恢复突厥国家组织的叙述中以及蒙古传说关于建立成吉思汗帝国的叙述中,十分明确地谈到了草原贵族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并且在鄂尔浑碑铭中,汗依靠了人民群众,而在蒙古传说中,汗依靠了贵族。没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因素,在游牧生活条件下甚至就没有产生强大政府权力的基础,游牧民族可以极长久地没有汗,而一旦出现了汗,他同自己的属民一起为争夺政权的斗争有时伴随着大屠杀,比后来游牧民在文明国家内进行的征服,屠杀得还要厉害。

拉施特丁所指出的由于狩猎生活向游牧生活过渡,珊蛮威信堕落,看来应认为是一种普遍现象;当人民中发展起尚武精神和依靠武力的习惯时,珊蛮的影响就会衰落下来。罗伯森在喀非尔斯坦(在信奉了伊斯兰教后,现名努里斯坦)被阿富汗政府和伊斯兰教征服很早以前所有的有关喀非尔人的书[1]中谈到这个民族分为三个主要的部落:西雅赫普什、普列孙古里和瓦伊古里部,并且普列孙古里部的特点是尚武精神最弱、宗教信仰最强;只有在这个部落处可以感到有一定的宗教气氛,[2]并承认司祭的权威;[3]而同时普列孙古里部处不敬祖先,不像尚武的喀非尔人那样按照被杀死的敌人数在墓上立几根矛。[4] 无疑属于游牧突厥人的鄂尔浑碑铭,同样地完全没有提到显然比在狩猎民处享有小得多的地位的珊蛮(哈木),却提到了按照被杀的敌人数在勇士墓前所放的石头,想必狩猎民是不做这样的事的。

(译自前苏联1968年版《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468~472页。原文最早刊载于《喀山大学考古、历史、民族学学会通报》,1929年,第34卷,第3~4分册,第1~4页。)

---

[1]《兴都库什的喀非人》,伦敦1896年版。

[2]《兴都库什的喀非人》,伦敦1896年版,第379页。

[3]《兴都库什的喀非人》,伦敦1896年版,第417页。

[4]《兴都库什的喀非人》,伦敦1896年版,自第647页起。[关于喀非尔斯坦诸部落(普拉孙、瓦伊契里、西雅赫普什等部)及其宗教信仰,参看马松和罗莫金:《阿富汗史》,第1、2卷,莫斯科,1964—1965年。]

25 关于畏吾儿文献及其对蒙古人的影响问题

〔俄〕瓦·符·巴托尔德

已去世的密里奥兰斯基于1900年刊布[1]了14世纪后半期西波斯札剌亦儿王朝国[2]担任内阁书记长和官方公文、奖状起草人的官员马合谋·忻都沙所编写的未刊行的波斯著作的若干片断。这部著作中所列职位名称和授予这些职位的所发给的工作细则内容,明显地表明成吉思汗的孙子带到波斯来的游牧人在该国被征服100年后对其原来的故乡的风俗和概念始终不渝到何等程度。在蒙古帝国瓦解后建立的其他国家里也提到过这些职位,但任何地方也没有像马合谋·忻都沙的著作(这一著作后来不仅成了波斯史,而且成了其他蒙古国家史,尤其是金帐汗国史的重要原始资料)中对这些职位的性质解释得那样详细。金帐汗国史家哈默尔·普格斯塔尔在这方面部分地利用了波斯作家的著作,并从它译了许多公文,[3]但疏漏和不确切之处很多。

---

〔1〕密里奥兰斯基:《论成吉思汗的忽塔惕忽·必里克》,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13卷,1901年,第15~23页。

〔2〕关于这个王朝的最详细的著作为A·马尔科夫:《札剌亦儿王朝钱币清册》,圣彼得堡1897年(载于《帝国遁世居所美术博物馆东方钱币汇册》中)。此书及其他许多著作所用的"札剌亦儿王朝"一词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札剌亦儿为该王朝所出自的氏族名,而非王朝创始者之名。札剌亦儿人与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参加了成吉思汗的远征,并分散到蒙古帝国全部疆土上;这个部落的一部分作为个别氏族加入到许多蒙古、突厥民族的组成中(参阅H·A·阿里斯托夫:《有关突厥部落、民族的种族成分札记及其数量的材料》,载《生动的古代》第六年,1896年,第3~4期,第277~456页;单行本,圣彼得堡,1897年,第32、54、114页)。与成吉思汗后裔有姻亲关系,在波斯王朝灭亡后将政权夺取在自己手中的波斯札剌亦儿氏族的起源也是如此。

〔3〕哈默尔·普格斯塔尔:《金帐汗国史》,第493~516页。载在该书(特别是第244~249页)上的马合谋·忻都沙此书的摘录,是很仔细地作出的。[如今可参看马合谋·伊塞·忻都沙·纳黑赤瓦尼:《迭思秃阿勒—迦梯卜·非·塔因·阿勒—篾剌梯卜》(《供书记们确定草原情况用的手册》),阿里札德校订原文,作序和索引,第1卷,第1分册,莫斯科1964年,《东方文献》大丛书原文,第9种。]

密里奥兰斯基的一些文章是论述上述马合谋·忻都沙的著作《忽塔惕忽·必里克》[1]的(该书的内容被说成是成吉思汗所说的,它包含有对蒙古断事官(札鲁忽赤)的训言)。这部书的标题与内容完全不同的,1069年为可失哈儿统治者博黑剌汗编写的,不久前被认为最古老的突厥语文的另一部书的标题相同。密里奥兰斯基无疑认为,博黑剌汗的"畏吾儿"文《忽塔惕忽·必里克》为成吉思汗的亲信,一些畏吾儿人所知道,被说成内容为成吉思汗所述的书,是仿照11世纪的著作命名的。但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博黑剌汗所属的哈剌罕王朝是否确实源于畏吾尔人;[2]更可疑的是,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一部分信奉佛教,一部分信奉基督徒的成吉思汗的畏吾儿教师怎么会高兴去利用像博黑剌汗的《忽塔惕忽·必里克》这样的纯伊斯兰教著作呢。[3] 这两部书的名称相同,很可能是由于所据的原始材料相同。哈剌罕王朝所出自的民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之前处于后来为蒙古人掌握的同一畏吾儿文 化的影响下;在博黑剌汗的国家里,畏吾儿文还没有完全被阿拉伯文排挤掉;[4]除阿拉伯和波斯的职名与其他名词外,也可遇到保持后来为蒙古人从畏吾儿人处借用时同一形态的突厥职名和其他名词。[5] 看来在这些名词中,与"必里克"一词(原意为"知识")一样,也有"忽塔惕忽"一词。

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迄今没有搞清楚。与被拉德洛夫所采用的瓦木别里的译法(源于忽惕"幸福"一词,意为"使有福")不同,密里奥兰斯基发表了一些不同见解。他指出,"畏吾儿"文《忽塔惕忽·必里克》

---

[1]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仍有争议;畏吾儿(回纥字母不区分字母t和d,k和g;无论是拉德洛夫所采用的读法kudatku或汤姆生教授所提出的kutadgu的读法,见《论回纥语的子音体系》,第245页)都有语言学理论的根据。马合谋·忻都沙写作kutatgu或kututku。

[2]参照阿里斯托夫:《有关突厥部落、民族的种族成分札记及其数量的材料》第195页上的注和我的评论《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9卷,自第348页起)[《巴托尔德文集》,卷5,第270页]。[参阅《巴托尔德文集》卷2,第2分册,第289页注177。]

[3]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2卷,圣彼得堡1900年,第419页[《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459页]。

[4]在11世纪东突厥斯坦诸城所铸的钱币上,除阿拉伯文外,也可遇到畏吾儿文;参阅A·马尔科夫:《帝国遁世居所美术博物馆伊斯兰教钱币清册》第192页起。

[5]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2卷,1900年版,第33页[《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374页]。

的作者在其序文中除本书的突厥名称外还写出了本书的全都包含有王权概念的阿拉伯和波斯名称；当然也就初步认为，突厥名称表示的是同一概念。密里奥兰斯基把突厥形容同“忽塔惕忽”拟作伊朗王公的衔号“忽塔惕”（在阿拉伯征服时代，今俄国突厥斯坦境内的许多地区的领主有这一衔号）的试图未见成功；据我所知，在突厥语中并未遇到过“忽答惕”这个衔号。同时我曾发表过被密里奥兰斯基在其文章中的注文中引用过的另一个假设：“忽惕”一词除其原义（“幸福”）外，还像俄语 vieličiestvo（伟大陛下）般地被用来表示汗的尊严；因此“忽塔惕忽·必里克”除字面上的意思（“赐予幸福的知识”）外，还可以有另一种含义：教育帝王的知识。这个在密里奥兰斯基看来“不无可能性”的解释，我觉得好像现在却是最合乎情理的。

密里奥兰斯基死后，我偶然注意到 15 世纪阿拉伯史学家伊宾·阿剌卜沙的证明，据他说“忽塔惕忽”这个名词在中亚也被用来表示畏吾儿文。据伊宾·阿剌卜沙说，[1]“成吉思汗命令本部落的智者和本国的贤明者制造一种作为他们的知识对象和旗帜（即特征）的文字。他们为它制造了蒙古文字，借助这种文字开始决定最重要的事；为了指出它的优越性，用他（成吉思汗）的部落名字给它（文字）命名；于是使用了忽塔惕忽一词，意即忽塔惕人之文字，而忽塔惕为这位毁灭者[2]（成吉思汗）的部落。”伊宾·阿剌卜沙完全错误地把忽塔惕忽一词当做成吉思汗所出自的部落之名（其正确名称为乞牙惕，[3]而非忽塔惕，系由阿拉伯字母的性质造成讹误）；但他所引用的畏吾儿文字名称即是“忽塔惕忽·必里克”，这个标题的前一部分则未必可怀疑。

上述对忽塔惕忽一语的解释并未被这个新的事实推翻。成吉思

---

[1]《法乞哈惕·阿勒—胡剌法》（1832—1852 年弗雷塔格校订本）第 1 册，第 232 页。朗勒（《国立图书馆鞑靼满洲书籍提要》，第 586～598 页）也引用了阿剌卜沙的另一著作（《帖木儿史》）上的畏吾儿文资料；但在这些资料中没有提到忽塔惕忽一词。I·施密特在其《评论》第 115 页中也引用了伊宾·阿剌卜沙有关忽塔惕忽的话，后来成为他与哈默尔·普格什塔尔（《金帐汗国史》，第 192 页）论战的题目，但这次论战后来被遗忘了，因此密里奥兰斯基并未在自己的文章中利用这个证明。

[2]在原文中“忽塔惕”和“木法惕”（毁灭者——为极罕见的形动词形态）二词是押韵的。

[3]贝勒津本拉施特丁书第 1 册，译文第 89 页；第 2 册，译文第 51 页；按照贝勒津的意见，蒙语发音应作乞要惕。

汗曾下令让贵族青年、包括君主本人的儿子们学习畏吾儿文字;[1]同一文字被用在编纂蒙古习惯法("大札撒")和编写蒙古诸部落的官方编年史《成吉思汗金册》上;这两部书藏在汗的金库里,准许入库的除汗族成员外,只有世袭保管《金册》荣职的某些大臣们。[2] 在蒙古人建立的国家里,畏吾儿文字主要是"诸汗的"文字,并以这种性质继续被使用,尤其是被使用于外交公文上,甚至在无论人民或学者都已不懂得它的时候还被使用着。[3]

据马合谋·忻都沙说,在向蒙古和突厥"战士与草原人"[4]发出命令时,使用畏吾儿文字是出于让居民中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语言接到命令,并能毫无困难地理解它。[5] 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波斯北部的游牧民,比起阿拉伯文来,对畏吾儿文懂得更多些;但更可能是,只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传统影响下,依靠当时的现实条件,畏吾儿文也有这种意义。无论在札剌亦儿国或其他蒙古国家中,除波斯官吏(喀提巴米)外,还有用畏吾儿文突厥语起草公文的巴黑失[6]和必阇赤;[7]该书上列举了[8]有"大必阇赤"(兀鲁黑·必阇赤)称号的奖状;但汇编起来的一切公文都是用阿拉伯字母波斯语写成的。

(译自前苏联1968年版《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第365~368页。原文最早发表在《生动的古代》,1909年,第18卷年第2~3期。)

---

〔1〕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2卷,1900年版,第416页[《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453页]。

〔2〕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2卷,第42、45页[《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89、92页]。

〔3〕拉德洛夫:《脱脱迷失和帖木儿忽都鲁诏敕》,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卷3,1889年,第1~40页(此为拉德洛夫的说法)。

〔4〕原文作 sakhranišinnan,哈默尔·普格斯塔尔(《金帐汗国史》第471页)译作"原野居民"。

〔5〕引自哈默尔·普格斯塔尔:《金帐汗国史》,第470页。

〔6〕《金帐汗国史》,关于这个词的含义,参阅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2卷,第52、417页[《巴托尔德文集》卷1,第99、454页]。

〔7〕哈默尔·普格斯塔尔:《金帐汗国史》,第332页。哈默尔在其公文译文的注(第470页)中又把起草蒙古公文者称作哈的卜,但来顿抄本第574号(第180张a)上在此场合下使用"必阇赤"一语。

〔8〕引自哈默尔:《金帐汗国史》,第486~487页。

26 伊斯兰教载籍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记载[1]

〔俄〕瓦·符·巴托尔德

欧洲、叙利亚、亚美尼亚载籍中关于某某蒙古汗信奉基督教的记载,应当十分谨慎地对待:因为大家知道,传教士们常常把只是对基督教进行过保护的那些汗称作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争斗发生于所有的蒙古领地上,他们争着竭力把汗拉到自己方面去;但基督教徒与佛教徒之间的敌对关系比起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仇恨来要弱得多,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同伊斯兰教进行斗争。最初的汗仍是珊蛮教徒,他们在这个斗争中保持中立,只有当这个斗争过分强烈地破坏了社会秩序时他们才加以干涉;其中只有某几个汗受到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谋士的影响,颁布过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命令。关于对伊斯兰教徒表示过仇恨的每一个蒙古汗,都有过他们是基督教徒的记载(察合台、贵由、忽必烈、拔都);甚至对所有各种宗教都加以保护的那些汗(蒙哥等),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记载。如果伊斯兰教作家谈到某汗为基督教徒,那么这种记载当然应该受到很大的信赖(尽管不能绝对信赖,因为它也可能是从基督教徒资料上抄袭来的)。我们得以找到了两件这样的记载,据我们所知,这是过去任何人还没有引用过的。

在伊斯兰教历657年即公元1258—1259年,撒麻耳干人赛夷·阿失剌法丁到德里来做买卖,他在这里见到了《纳昔儿世系表》的作者、史学家术思札尼。赛夷顺便对我们的史学家讲了如下的事。

拔都死后,他的儿子、伊斯兰教徒的压迫者撒里答继位。他即位后

[1]本文的补篇为《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问题》,载《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417~418页。

必须动身去觐见大汗蒙哥；在归途中他经过别儿哥的斡耳朵，但他没有同其叔会面就回去了。别儿哥派人问他给予这种侮辱的原因，撒里答回答道："你是伊斯兰教徒，而我信奉基督教；见到伊斯兰教徒的面是不幸的。"别儿哥在自己的帐幕里锁上门，把绳子放在自己颈上，大哭了3昼夜并祈祷道："主啊，如果穆罕默德教符合真理，为我向撒里答复仇吧！"这以后第四天时，撒里答便死去了。

我们所引用的这段记载是与这件事同时代的伊斯兰教徒写的，从这段记载的内容来看，它不会是基督教徒想出来的。我们也在某些基督教作家处，找到了关于撒里答是基督教徒的记载；据阿不法剌术说，他甚至还被封为助祭的教职。关于撒里答接受洗礼的传闻促使路易九世派遣鲁布鲁克到蒙古人处去(1253年)，他被撒里答所接见，并从他那里带着获得证实的情况离开：这个汗尽管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但并非基督教徒；顺便说说鲁布鲁克引用了他的秘书阔牙合的话："您不能说我们的汗是基督教徒；他不是基督教徒，而是蒙古人。"但鲁布鲁克自己另一处说到阔牙合是聂思脱里教徒；因此，他的话只不过表明，在中亚，基督教徒不自称为这个未转写为东方语言，既不见于谢米列契碑铭，又不见于叙利亚—汉文碑上的名称("基督教徒")。但是，鲁布鲁克是在拔都去世前来到撒里答宫里的；也许，撒里答是在他成为钦察兀鲁思首领后才最后入了基督教的。

另一个记载是舍列法丁写的，他在帖木儿的导言中简述了蒙古史；这篇远未失去意义的导言没有收入彼第·德·略·克鲁阿译本和1887—1888年加尔各答版本中。在谈到第五代大汗铁穆耳或完泽笃在位(1294—1307年)时，舍列法丁说，他的侄儿合失里即别儿剌思之子是基督教徒。这个记载比前一记载的可靠程度较小，因为他不是当时的人，有可能是从基督教徒处抄袭来的；但无论如何它是值得注意的。从蒙特—科尔维诺的信中我们可以推断，铁穆耳在位时基督教徒的处境是十分顺利的。

(译自前苏联1964年版《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263~264页；原文最早发表于《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1892年，第6卷。)

27 关于成吉思汗后裔中的基督教徒问题

〔俄〕瓦・符・巴托尔德

我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第6卷上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1]有必要补充如下材料:

(1) 关于撒里答加入了基督教徒,不仅术思札尼谈到过,而且他的同时代人志费尼也谈到了这一点。[2]

(2)舍列法丁・也思迪说的是铁穆耳的侄儿和继位者海山皇帝(1307—1311年)。这一记载的原始资料为哈木答剌黑・卡兹维尼的《塔里希・古即德》,[3]那上面谈到中国忽必烈的继位者说:"他(忽必烈)死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合罕即忽必烈合罕之子真金之子当了国君;他死后,他的堂兄弟阿难答即忽必烈合罕之子忙哥剌之子当了国君;他在国内宣布自己为伊斯兰教徒,由于他,大部分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在他之后,真金之子答儿麻八剌之子海山当了国君;他选定了基督教;在他的时代伊斯兰教又不受敬重了。在他之后,其弟普颜笃当了国君,他尊奉伊斯兰教。"

由此可见,哈木答剌黑・卡兹维尼关于中国的事的记载比瓦撒夫书[4]等的确切性要差得多。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自己的封土内(在唐古惕地区)传播他的阿难答,[5]并未君临中国;铁穆耳死后,形成了一个想拥立他为君的集团,但另一个竞争者海山集团取得了胜利,阿难答遂为追

[1]《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263页。

[2]卡维温版第1卷,第223页。

[3]布朗版,第579页。圣彼得堡大学抄本第153号第321页上有较令人满意的原文。

[4]瓦撒夫书,孟买版,第498~505页。参照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525页起。

[5]详见拉施特丁书(伯劳舍本第595~603页)。参照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532页和我的论文《答格鲁木—格尔日迈洛》[载《巴托尔德文集》第5卷]。

求君位牺牲了生命。十分自然,海山对待别种教徒[1]要比对待伊斯兰教徒好些,但他不是基督教徒;关于基督教的这种胜利,天主教传教士不可能保持缄默。关于普颜笃(1311—1320年),我们知道,他在位时海山的大臣或被处死或失宠被黜,他在位之初派遣使团前往波斯[2](海山在位时没有派过使团去波斯);这就确证了在他的时代伊斯兰教徒的处境比海山时代好些。

(译自《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2分册,第417~418页;原文最早发表于《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集刊》,1915年,第22卷。)

[1]他在位时曾把孔子的一部书和几部佛经译成了蒙语(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533页),但据瓦撒夫说(孟买版,第502页),他在位时有个丞相是伊斯兰教徒。

[2]据瓦撒夫(孟买版,第502、504页),海山死于伊斯兰教历710年9月15日(公元1311年2月5日);他的继位者的使团于伊斯兰教历711年9月(1312年1—2月)抵达巴格达。参照多桑:《蒙古史》第2卷,第535页。

28 成吉思汗及其遗产

〔前苏联〕密尔彼尔德、帕舒托、契列普宁合撰

迄今为止，在国际历史编纂学上，甘于颂扬成吉思汗的个人雄武及其继承者的虚构的功绩的作者是屡见不鲜的。[1] 像维尔纳德斯基、斯普莱、普拉弗丁(M.契罗尔)[2]之类的史学家对各族人民的命运和苦难漠不关心。他们从历史上搜索为了征服群众从领袖的自圆其说的例子。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成吉思汗及其遗产的兴趣是与对最终抛掉那可憎的"惨痛的"枷锁的各族人民的英雄的过去年代的诬蔑相联系着的。

关于成吉思汗及其遗产问题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

28.1 蒙古国家的建立和对亚洲进行征服及其崩溃

在1206年由最显赫的蒙古游牧封建主参加的、召开于斡难河上的忽里勒台[最高国事会议——译者。下文凡有[ ]号之文字，均系译者所加]上，也速该拔都儿之子铁木真被尊为蒙古人的最高统治者，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氏族领导着毛毡帐裙里的"子孙们"，全体蒙古部落与氏族都被宣布为成吉思汗的兀鲁思[领民、属民]，他们的全部领

〔1〕见 H.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v. 1 ~ 4, London, 1876 ~ 1927, v. 1, pp. X ~ XI; И. Р.《成吉思汗的遗产》，柏林，1925年；维尔纳德斯基：《俄罗斯史上的蒙古压迫》，载《欧亚学报》，卷5，1927年，第153 ~ 164页；埃连任·哈拉达万：《战略家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贝尔格莱德，1929年；A. Zeki Validi(Togan). Considération surla collaboration scientifique entre l´Orient islamique et lEurope.《Revue d´étudesislamiques》, 1953, P. 269。

〔2〕G.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Haven, 1953,(参阅《历史问题》1955年第8期，第180 ~ 186页之书评)；B. Spuler. 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en in Russland(1223—1502年), Leipzig, 1943, S. Ⅶ, 20, 22 ~ 24; M. Prawdin. Tschingis-Chan und sein Erbe, Stuttgart, 1957, 又见 R. Grosset. Gengis Khan le conquérant du monde, Paris, 1953。

土都是他的禹儿惕[游牧领地]。[1]

这一件事标志着为创建蒙古国家所进行的长期斗争的结束。12世纪后叶,新生的草原牧畜贵族(那颜阶级)为反对旧的氏族—部落组织形式、建立新的阶级关系,即我们的大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称的"蒙古游牧封建主义"[2]进行了斗争。随着争夺政权与虏获物的斗争,各封建领袖之间展开了无穷尽的部落间的战争,这些战争加剧了蒙古人的分散性,阻遏了他们的发展,阻碍了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

1206年忽里勒台正式宣告统一国家的创立,它使一切主要部落联盟的领袖们都听命于统一国家。个别那颜们的分立主义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克服部落分散性,将所有分散的部落联合成统一的蒙古民族的条件具备了。国家的建立在蒙古人的社会经济发展上也起着不小的作用。封建关系发展的起始阶段业已过去。新国家是走向阶级社会的最终形成、封建剥削形式的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阶段,[3]当时刚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蒙古人同高度发展的邻国,首先是中国与中亚的联系也显著地加强了。活跃的贸易及中国与中亚工匠在汗帐里及大封建主帐幕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年青国家的经济进步。[4]

蒙古人民历史上的所有这些事件,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蒙古封建国家的建立在当时是重要的进步现象。[5] 铁木真,这个大战略家、杰出的组织家和政治家,在为克服分散性、把诸部合并到统一国家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无可否定的。

诸氏族—部落联盟之一的领袖也速该拔都儿之子铁木真很早就接触到了在不断的仇恨中厮杀不休的蒙古封建主圈圈里的变化无常的命运。铁木真度过了父亲死后的灾难岁月后,凭着他那罕有的军事才干和敌人的不团结,通过勇猛的袭击占据了广大的土地和大批畜群,成了最大的封建领袖之一。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支强大的亲兵,利

---

[1]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45页。
[2]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人的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主义》,列宁格勒,1934年。
[3]《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2页。
[4]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48页。
[5]《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5页。

用这支亲兵他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逐一击溃了他的主要对手：篾儿乞部领袖脱脱、克烈人的领袖王汗、札木合，等等。铁木真用这些胜利、用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大军的创建以及一系列把那颜、那可儿及答剌罕们—新生的草原封建贵族——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措施，预先决定了1206年忽里勒台上的决定。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参加忽里勒台，离开忽里勒台时便成了全蒙古的可汗，头一个蒙古国家的元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政治与军事事业的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阶段就此完成了。

但是，在分析这一阶段时，必须避免走极端，首先要避免过高估计甚至像铁木真那样杰出的个人在创建蒙古国家的复杂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过高估价正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的特点，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歪曲社会历史的真正的规律性，使人类历史充满了"豪杰"、"国家创造者"、"国家观念"体现者。成吉思汗当然是最受赞赏的这种"概念"的英雄之一。这里只需指出一个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也就够了。在Г.维尔纳德斯基的《蒙古人与俄罗斯》一书中，蒙古国家组织的起源首先与战胜了"封建化的氏族社会的原始观念"的"帝国观念"相联系。产生成吉思汗的某种"精神环境"(?)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者。[1] 因此，在"帝国观念"、成吉思汗与国家之间事实上被画上了等号。这里，漫无边际地推崇成吉思汗个人与一般而言关于历史进程、具体而言关于蒙古历史进程的总的唯心主义观念紧密相连。

实际上，蒙古国家的产生是由于内部社会经济过程与蒙古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2]成吉思汗在这一可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阶段所进行的活动，几乎完全是内部性质的。他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活动符合于蒙古诸部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道路，促进了蒙古诸部生活中的一系列进步变化(部落分散性的克服，集权，蒙古地区在统一的国家中的政治统一，等等)。[3]

---

[1] G.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第92页、99页。

[2] 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自第46页起。

[3]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6页。

但是蒙古历史以及成吉思汗事业上的这一阶段到1211年便结束了,以后掠夺性远征的开始中断了蒙古国家组织的发展及蒙古民族的形成。开始了不仅对被征服人民具有毁灭性的、而且在蒙古人民本身生活中起着极大消极作用的新时期。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把蒙古国家创建的进步事实与它的此后的侵略及反动的侵略性帝国的建立混淆起来。[1] 对这样的混淆,必须坚决驳斥,因为这些现象就内容和历史作用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可以确凿无疑地认为,蒙古国家及其机构形成于侵略开始之前,即1211年之前。[2] 而那些侵略远征却妨碍了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它的经济、文化的成长,从而阻遏了国家组织的发展。[3] 企图把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掠夺战争说成是创建蒙古国家必需的(甚至是有决定性的)阶段——意味着对蒙古人民的诬蔑、对他们历史上的真正进步现象的抹煞。

血洗欧亚相当大部分地区,使刚开始形成的蒙古民族分散到广大疆土上的掠夺性远征与蒙古国家的创建道路毫不相干。宣称这些远征是"帝国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或特殊的蒙古"侵略精神"的成果,也未必值得一驳。侵略的真正原因必须从在粗放的游牧畜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蒙古封建主义的特点中去寻找。极其有限的私有经济基础不能满足封建主及其亲兵们对发财致富的贪欲。比起漫长艰巨的内部发展道路来,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封建主宁可走较容易的,在最初时期颇见效的掠夺邻近农业国的道路。这里,13世纪初在邻近封建国家,首先是在成吉思汗以前就与蒙古地区有联系的中国与中亚所出现的历史条件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些国家由于阶级斗争和封建内战衰弱了下来,不能利用自己的经济、军事潜力进行抗战,不能抵抗还保存着父权制纪律的团结一致的蒙古军。游牧民族大规模入侵的成功通常不仅在于他们本身的力量,而在于他们进攻对象的软弱。匈奴人和阿哇尔人是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蒙古人利用邻国的衰

[1] G. Vernadsky, The Mongols and Russia。

[2] 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47页。

[3]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6页。

弱，开始了就其规模和毁灭性后果而言既超过匈奴、又超过阿哇尔侵略者的扩张行动。

蒙古封建军队首先猛攻了建于12世纪初（1115年）据有部分蒙古、中国东北及中国北方领土的金国。统治金国的是由1125年灭亡了契丹辽帝国的通古斯诸部封建上层组成的女真王朝。最残酷的剥削与掠夺被征服居民的方式以及反对女真奴役者的顽强斗争造成了金国的内在弱点。尽管拥有当时第一流的军械及十分优良的军事技术，金帝的军队却在多次战斗中接二连三地败于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在3年内蹂躏了中国北方广大领土，进抵北京（中都），并占领了北京。

金朝政权遭到很大的打击。成吉思汗委派自己的一名统帅——木华黎担任了中国北方的统治者。但远征绝非仅限于击溃金兵与金王朝。正如所有各次蒙古侵略一样，这次远征猛烈袭击了北中国，"像飓风般地卷走了千万人的生命和物质财富"[1]。成吉思汗军队不仅没使中国人民在遭受女真侵略者的百年压迫之后松一口气，而且使他们遭受到更全面的掠夺与更可怖的灾难。从被蹂躏的国土上运走了巨量虏获物，驱走了成千上万的战俘。在战俘中工匠占有特殊地位；如今工匠们被迫用自己的技艺为蒙古侵略军制造军械。被驱去受蒙古人奴役的中国工匠在蒙古封建主帐幕旁受到残酷剥削，而蒙古封建主则寄生虫般地享受着中国工艺的卓越成就。中国军械及中国军事技术——首先是攻城机及投石机的利用以及靠别国人建的制造这些军械的手工业中心，在蒙古军以后的（包括出征中国本身在内的）侵略远征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建于1220年的哈剌和林城——蒙古帝国的头一个京城，就是这样的手工业中心之一。对该城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若干很大的手工业区及许多作坊，在这些作坊里生产着军械及保证蒙古大军有非常好的机动性的运输工具。

下一个牺牲者，即蒙古征服中央亚细亚的牺牲者，为藏族支系唐古惕人之国。这个国家的建立早在9世纪末，从1038年起以汉名西夏

---

[1]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49页。

见知于世。1226 年,成吉思汗进行了毁灭性的西征后归来,侵入了西夏国。毁灭与逐个灭口的系统恐怖手段在这里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国家灭亡了,它的领土变为无人的荒漠,城市为沙所埋。只是经过苏联学者的顽强研究,那成为成吉思汗及其喽啰们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牺牲者的已无可挽回地损失了的文化真相才略为世人所知。[1]

1227 年,成吉思汗远征唐古惕归来时死去了。但他的继承者们(成吉思汗系诸汗)仍野心勃勃的继续举行掠夺性远征和侵略,继续对西方各族人民及东方各族人民——中央亚细亚和东南亚各族人民进行征服。

1231 年,由大汗窝阔台和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率领下的大军再次侵入北中国,进逼还存在于南边的女真中心。蒙古人遭到顽强的抵抗后,答允将河南省给南中国皇帝,拉拢南中国皇帝做了同盟者。在南北同时夹攻下,女真力量被彻底摧毁。女真的最后一代皇帝自杀,国亡。至于南宋王朝的皇帝,他不仅没有得到蒙古人所答允的省份,而且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面临了可怕的危险:蒙古军如今向南中国的边界开来了。

蒙古帝国的寄生封建上层很快地享用了掠夺来的财富,渴望进行新的侵略、蹂躏新的领土。同时,不断的战争需要经常补充粮食、原料、武器、手工业奴隶、农奴。蒙古地区本身的经济是极弱的。而它所拥有的人力、物资则完全消耗在侵略战争上。这就决定了扩张政策的继续和扩大。

中国喘息了二十几年。在整个这段时期内,中国仍然是成吉思汗系诸汗的侵略计划的主要对象。为了巩固对北中国的政权、加强剥削北中国居民,1255 年大汗蒙哥命其弟忽必烈建帐于中国本土。翌年,1256 年,在察哈尔省建造了开平城;开平城很快就成了蒙古京城哈剌和林的竞争者,在此后数年内,忽必烈斡耳朵(帐殿地、汗国)侵入了四川和湖北,这是侵略南中国的开始。

1259 年,由于蒙哥汗之死及其兄弟们展开了争夺汗位的斗争,军

---

[1] 科兹洛夫:《蒙古与安多[甘青边地]及被毁灭的哈剌浩特城》,莫斯科,1947 年;涅甫斯基:《唐古惕语言学》,莫斯科,1960 年。

事行动在短时期内中断了。忽必烈是这次斗争的胜利者。他破坏了必须召开忽里勒台的传统,在自己亲信们的推戴下当了大汗。并且这事不是在哈剌和林,而是在开平进行的,帝国京城也就迁往了开平,1267年后又迁至更南的大都(后改称北京)。这样,忽必烈不仅脱离了自己人民的基本群众,甚至也脱离了一部分封建主,这些封建主在蒙古本土成立了一系列反忽必烈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忽必烈照例举行了侵略战争,出动大军对南中国开始了总攻。

尽管南宋帝国为内乱所分裂,中国人民还是顽强不屈地抵抗了侵略者。蒙古军经过长江中游地区的浴血苦战后,才得以冲入南方;但在那里人民群众与中国军队反对忽必烈斡耳朵的英勇斗争又继续了许多年。直到1276年,南中国京都杭州才告陷落;1279年,国土全部沦于蒙古政权下面。

这时,大汗忽必烈又给自己加上了中国皇帝的尊号,开创了元朝,这是一个奴役中国人民将近百年的侵略者王朝。

这时,蒙古侵略遍及非常广阔的领土上。中亚和东欧遭到了毁灭性的入侵;关于这我们将在下文作专门讨论。至于西亚、中央亚细亚及东南亚的国家,其中仅有少数国家免于蒙古汗国及蒙古封建主寄生统治的侵犯。

在西方,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开始侵略伊朗,[1]与之相伴的是可怕的屠杀、对灌溉渠道的破坏、国内非常好的文化中心的毁灭。不久前还很繁荣的绿洲变成了牧场,像也里、你沙不儿、列夷、可疾云、哈马丹这样的城市几乎完全荒无人烟。数十万居民的也里,在蒙古屠杀后,只留下了40个人;仅指出这点也就够了。1340年,波斯地理学家哈木达拉赫·迦兹维尼写道:“毫无疑问,蒙古强国来袭时所遭到的破坏和大屠杀,就是以后一千年内不发生其他任何灾难,也不能补救,而世界也不会恢复到事件发生前的原状。”[2]

13世纪50年代,蒙哥之弟旭烈兀奉大汗蒙哥之命占领了阿尔布

[1]埃连任·哈拉达万:《战略家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自第118页起。
[2]《世界通史》(苏联10卷本),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11页。

尔斯山脉的亦思马因诸堡,于1256年灭掉了亦思马因国,建立了对全伊朗的统治。接着,旭烈兀侵入阿拔思朝哈里发国,使它遭到了同样可怕的蹂躏,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国的著名京城——报达[巴格达]。蒙古汗国继续疾趋西方及西南方,威胁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只是在埃及马木留克朝算端[苏丹]贝巴儿思的强大打击下,1260年击溃侵略者于艾因—札鲁特(叙利亚),才制止了对亚洲这部分地区的入侵。

在亚洲的另一端——高丽,早在成吉思汗时,当蒙古部队"去援助"高丽权臣崔忠献与契丹人作斗争时,蒙古侵略者就出现了。稍后,窝阔台斡耳朵借蒙古使者被杀为名,蹂躏了半岛北部。由于此后接二连三的多次入侵,蒙古封建主于1259年完全征服了高丽,高丽王承认自己为大汗的藩臣,只成了名义上的国主。高丽人民及其他许多各族人民处于本族封建主及残酷地剥削本国并使之变为今后侵略基地的蒙古侵略者的双重压迫之下。

如今,蒙古封建主的军事计划的主要对象是东亚最后一个未被征服的国家——日本。预料到登陆作战的困难及日本人民的顽强抵抗,蒙古汗于1268年及1271年两次企图用威胁和外交压力征服日本。这些企图都未见效,忽必烈的庞大舰队便于1274年占领了对马岛和壹岐岛,逼近日本海岸,凭借他在中国所获的火器,企图以陆战队登陆九州岛。但是日本民兵的顽强及蒙古舰队为飓风所毁,及时防止了这次侵袭。忽必烈的统帅刘阵亡后,忽必烈军队返回了高丽。1281年忽必烈举行的第二次侵犯企图,尽管经过长期准备,也同样地失败了。一千多艘船舰的庞大舰队在飓风大作下大部分被毁,于是又被日本人击退了。就这样,日本人民的奋不顾身的战斗及时防止了被奴役。日本成了东亚唯一没被蒙古诸汗征服的国家。[1]

自从1221年成吉思汗军队掠夺了木里丹、刺霍尔、彼舍瓦尔诸州,俘获了万名俘虏(这些俘虏由于缺粮被杀于途)以后,印度经受了多次毁灭性入侵。1241年,蒙古人侵占了剌霍尔,1246年又侵占了木里丹;入侵一次紧跟着一次,只有在可怕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的印度人民的

[1]Naraba Yamada. Chenko. The Mongol Invasion of Japan, London,1916年。

英勇斗争才把国家从被占领和洗劫中拯救出来。

蒙古军队在印度支那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于1257年、1284年和1287—1288年3次入侵安南,但由于安南人的坚强及领导他们的统帅陈国峻的勇敢、用兵有方,蒙古军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277年,蒙古人侵入缅国,取得了稍大的暂时成功。他们倾覆了蒲甘王国[按:缅国],使该国名义上臣属了忽必烈政权。

甚至南海诸国也未能免于蒙古的蓄意侵犯。1292年蒙古舰队出现于爪哇海岸,以陆战队登陆,当然,这些陆战队仅使爪哇国总共臣服了几年而已。

自然,蒙古征服所及的非常广阔的领土,甚至连在名义上也没能在统一的帝国范围内保持多久的时期。它们既无历史共同性的联系,又无经济、文化及人种共同性的联系。甚至征服者本身——蒙古人,去到了遥远的兀鲁思[国、汗国]后,也逐渐与被征服居民同化,此点绝对无助于蒙古民族保持统一。这些情况加上"成吉思汗系"诸汗为争夺成吉思汗遗产及新征服的土地进行不断的斗争,造成了旭烈兀系、术赤系及察合台系汗国事实上脱离了蒙古强国。昙花一现的帝国在其创始人死后只存在了三十几年。

看来,被蒙古人征服的全部土地只有两个不取决于它们的历史特点的特征,那就是:残酷无情地压迫被征服居民以及最后终于导致到处推翻压迫、把侵略者赶走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

如:在被征服的中国,除了对农民的直接掠夺外,还实施了一系列使他们受更大的奴役和破产的措施。赋税压迫与日俱增。[1] 蒙古封建主侵占了大片领地,这些领地连同居民一起为他们所占有。据汉文史料载:个别领地所占土地超过6000公顷,农户总数达8万户。忽必烈的一个儿子获得了10.6万家农户。农业税、丁赋、马税使中国农民极端贫穷,造成了丧失土地、贫困、饥饿及中国农业的总崩溃。蒙古统治者的财政政策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国内所有的居民身上:从居民处榨

[1]斯特拉托尼斯基:《蒙古对被征服的中国和阿美尼亚所实行的行政管理》,莫斯科,1913年,自第25页起。

取财富付以纸币,但这种被宣布为唯一支付手段的纸币却不断变更、贬值,变为废纸。流浪现象急剧地扩大,曾经繁荣过的地区荒废了,几乎完全荒无人烟。据当代人作证,由于蒙古封建主专政的结果,"山东、河南多无人之地",[1]给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生产力和文化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这便是元朝统治中国百年的结果。[2]

残酷地奴役人民同样也是蒙古在西亚的领地——旭烈兀及其他被称为伊利汗的继承者的兀鲁思的特征。在伊朗的许多州,税收达收获量的80%。彻底破产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和村子。同中国一样,很多州郡荒无人烟。13世纪初与14世纪中叶的地理学家们的资料在这里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些资料证明了村庄数目的灾难性缩减。哈马丹周围地区13世纪初有660个村子,到了1340年只剩了212个:亦思法来因周围地区村数由451个减为50个;贝哈克周围地区——由321个减为40个,等等。[3] 城市也大为衰落了,据哈木达拉赫·迦兹维尼说,许多城市变成了村落。[4]

奴役居民及蒙古统治者的寄生生活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是:兀鲁思的内部衰弱及人民愈来愈团结一致地、坚决地起来反对侵略者的压迫。早在1265年,伊朗就爆发了舍列法丁领导下的大规模人民起义,蒙古汗很费力地把它镇压了下去。13世纪发生了一系列起义,14世纪30年代起义特别剧烈,当时农民运动遍及了很大部分国土。被称为"谢尔别达尔"("受绞刑者")的起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奠都于谢布哲瓦尔。1353年,即旭烈兀举行远征将近百年,谢尔别达尔们摧毁了旭烈兀最后一个汗秃海·帖木儿汗的汗帐,并杀死了他本人。伊利汗国就这样灭亡了。

几乎就在同时,从14世纪30年代起,解放运动的波浪开始愈来愈

[1]《世界通史》(苏联10卷本),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46页。

[2]E. Haenish. Sino - Mongolische Dokumente vom Ende des XIV Jahrhunderts, Berlin, 1952年。

[3]《世界通史》(苏联10卷本),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13页。

[4]彼特鲁舍夫斯基:《13—14世纪伊朗农民的封建依附形态》,载《苏联东方学》1955年第5期;B. Spuler. Die Mongolen in Iran. Politik, Verweltung a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1350, leipzig, 1955。

广泛地遍及中国。元朝最后一个倒霉皇帝妥懽贴睦尔同中国人民的长年战争开始了。起义者在 1351 年以后特别活跃地展开了自己的活动,当时起义中心在国内所有各省都出现了。农民"红巾军"是伟大的人民运动的主力。1368 年,战争以可憎的奴役者的全部击溃告终。妥懽贴睦尔从自己的京城大都逃走了,他的残余军队最初被驱逐到内蒙,后来又被驱逐到外蒙。同年,起义领袖之一(朱元璋)称帝,开创了新的王朝——明朝。[1] 蒙古侵略者的百年压迫被推翻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 1380 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在库里科沃之野击溃马买大军、为东欧人民奠定了摆脱鞑靼—蒙古压迫获得解放的基础的历史胜利仅相隔 12 年,这并不是偶然的。在残暴的帝国东、西二端,俄国和中国领导了各族人民反对成吉思汗遗产的必胜的解放斗争。

中国人民群众反对妥懽贴睦尔的起义很快地在东亚和东南亚被征服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还在 1359 年,高丽就开始行动起来了。高丽军大败蒙古,并在事实上废除了蒙古对本国的监督。而当妥懽贴睦尔从中国被驱走后,高丽对蒙古诸汗的臣属关系便正式取消了。

14 世纪六七十年代,蒙古军残部从东亚及东南亚的所有国家被驱逐了出来,退回了蒙古本土。军事封建帝国——仅仅用毫不掩饰的暴力与奴役联系起来的一个人为的各族人民的堆聚——的残余势力彻底崩溃了。

现在,从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族人民便能着手恢复、发展在"成吉思汗系诸汗"统治年代里遭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的国家组织、经济与文化了。

但是,如前所述,帝国时期对蒙古人民本身也是危害不小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冒险性侵略政策损害了蒙古民族的规律性发展。大汗将京城迁往中国境内后,就与自己的故土正式断绝了关系,这一点甚至引起了蒙古封建上层分子们的反对。阿里不哥、海都等等的多年起义与此相关。如果说成吉思汗的第一阶段活动标志着国家的统

[1]波科齐洛夫:《明代东蒙古人史》,圣彼得堡,1893 年,自第 1 页起。

一和诸部分散性的克服,那么在对外侵略和元朝统治时期,不断的封建战争动摇了国家的统一,加剧了各部落集团之间的敌对,最后,引起了由于不断的军事紧张状态本来就很衰弱的蒙古地区剧烈的经济衰落。主要手工业中心跟随汗及大封建主们的帐幕迁往国外、牲畜的被驱走以及很多居民群众的移牧,加剧了经济衰落。

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也由于侵略显著地停顿了。成千上万的蒙古人离散在无穷尽的侵略征途上。蒙古人这儿一群、那儿一群地分散在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环境中,相互间失去了联系,脱离了自己的故土,同化在其他各族人民中间了。14 世纪时,西方诸兀鲁思的蒙古基本群众即已在周围居民的影响下说突厥系的语言了——仅指出这点也就够了。因此,进行的不是民族的凝聚,而是民族的分散,而是一大群、一大群人脱离民族的过程。蒙古人民的人力资源、蒙古本土的人口遭到了显著的损失。

使封建寄生上层发财致富的侵略战争害了普通阿拉特群众、也害了蒙古本土。这些侵略战争耗尽了国家的力量,造成了它此后几世纪中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衰落。

28.2 我国各族人民反对鞑靼蒙古入侵及建立汗国桎梏的斗争

成吉思汗所组织的、由他的政策的继承者所继续的蒙古入侵我国及欧亚邻国的历史,揭示了一幅当时世界上繁荣的文明中心遭到野蛮蹂躏的图画。同时它也证明了各族人民、尤其是劳动居民对蒙古侵略者的倔强的仇恨态度。

1218 年,成吉思汗以 20 万左右的士兵开往中亚。沿途占领了谢米列契的主要中心——八剌撒衮与可失哈耳。统治中亚的花剌子模国王穆罕默德虽然拥有的兵力不比成吉思汗少,但是他跟自己的贵族对立,没有领导斗争:他离开马维兰纳儿,将城市交给各城驻军守卫。这里,出现了人民群众(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与乌兹别克人的祖先们)光辉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蒙古军没能一下子占领边境上的

讹答剌城;他们的猛烈进攻被市民们所击退(1219年9月)。成吉思汗留下大军围攻讹答剌,派遣自己的士兵沿着锡尔河上游和下游,朝着不花剌、撒麻耳干挺进。在中亚,农民与市民们(汗的宫廷编年史家所蔑称的"群氓"、"匪类")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当时,当地贵族、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城市长官、伊斯兰教僧侣上层分子急忙同敌人举行谈判,用叛变为代价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人民顽强保卫了速格纳黑、讹迹邗、巴耳赤邗、牙失纳黑、毡的与养吉干城,这些城市在术赤的军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后才被占领、破坏;部分居民被杀,另一部分被编为"哈沙儿",即在攻战时充当掩护,并担任繁重的围攻工作的部队。

另一支蒙古军从讹答剌开往别纳客忒和忽毡。在当地异密帖木儿·灭里领导下的忽毡保卫战,是中亚各族人民争取独立斗争史上的光荣一页。帖木儿·灭里的士兵在忽毡的英勇行为、在锡尔河上及后来在花剌子模作战的英勇行为给敌人造成不小损失。[1] 在[蒙古军]后方的讹答剌城民抵御了蒙古大军5个月的围攻。城陷后,城砦又支持了整整1月。

由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主力占领了讷儿后,进抵中亚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不花剌城。虽然这里有两万驻军,但当地贵族拒绝斗争,把城交出投降了。成吉思汗侵占了城里的财宝后,"下令放火烧城内的街区,数天之内,城的大部分被焚毁"。[2] 接着,蒙古人进抵由步兵守卫的撒麻耳干。在这里,"双方都战死了许多人"。经过猛攻,该城被摧毁了;城墙被"夷为平地"。中国长春真人于1222年经过撒麻耳干时指出,该城所剩居民不及过去的四分之一。[3]

花剌子模京城玉龙杰赤的保卫者为自己博得了荣誉。他们捍卫自己的城市达7个月。痛于攻城的不成功,成吉思汗将大军集中到了这里。但是城民没有放下武器。编年史家写道:"蒙古人激战着,占领

---

[1]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2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第201~203页。

[2]见蒂森豪森:《金帐汗国史资料集(选自阿拉伯文著作)》卷1,圣彼得堡,1834年,第9页。

[3]《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京俄国传教士团教士汇刊》卷4,北京,1910年第2版,第148页。

一个街区后、再占一个街区，攻占一座宫殿后再占一座，占领后即拆毁、付之一炬，直到七天内通过这样的方法占领全城为止。”他们将残剩下的城民召集起来，挑出工匠，而“其余的人则分配给士兵们，让士兵们将他们杀死”。[1] 碣石、那黑沙不、忒耳迷诸城也遭到了玉龙杰赤的命运。接着，马鲁也被占领了。

中亚各族人民就这样在1219—1221年间为争取独立而战。由于波斯、阿拉伯编年史家记载得不充分，市民与农民们的英勇斗争、为了劳动者世世代代用汗水灌溉的土地进行的斗争就看不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或被奴役；好些名城及建筑学上辉煌的纪念碑——宫殿、清真寺、收藏珍贵抄本的书阁被烧掉、毁掉。大片州郡荒芜不堪。[2]

但是各族人民没有向敌人屈服。1218年春，乞儿吉思人起来进行斗争，术赤的军队不得不再次征服乞儿吉思人的土地。[3] 当蒙古主力军撤离后，马鲁城起义了。马鲁城被蒙古兵彻底破坏。马鲁绿洲长时期地荒芜了。

蒙古大军继续进攻，蹂躏了阿富汗斯坦与北伊朗。1220年，部分蒙古军在哲别和速不台统率下从伊朗侵入阿塞拜疆。经过残酷的围攻与猛攻后，萨尔马斯、霍伊、纳希契万、拜剌干等城都失陷了；帖必力思差点儿也保不住。[4]

在木干草原（位于库腊河及阿拉克斯河汇流处东南）驻冬后，蒙古军向谷儿只[格鲁吉亚]进军。谷儿只—阿美尼亚军队在国王拉沙·乔治四世及统帅伊万奈·姆哈尔格尔只里统率下勇敢地迎战敌人，但被击溃。山区人民的抵抗迫使侵略者返回北阿塞拜疆，在那里设里汪

---

〔1〕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2册，第216页~217页；参阅雅库博夫斯基：《玉龙杰赤废墟》，载《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通报》，卷6第2分册，列宁格勒，1930年。

〔2〕托尔斯托夫：《古花剌子模文明社会考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同作者：《古代花剌子模》，莫斯科，1948年。

〔3〕拉施特丁：《史集》卷1第2册，第256页。

〔4〕彼特鲁舍夫斯基：《13—14世纪阿塞拜疆人民英勇斗争史概述》，巴库，1941年，自第18页起；参见A. A. 阿里—札迭：《13—14世纪蒙古侵略者在阿塞拜疆及邻近诸国》，载《历史问题》，1952年，第8期，第59~65页。

京城舍马哈在长期御战后陷落了。蒙古兵通过了打耳班,并逐一地击溃了沃舍梯人与波罗维茨人,然后侵入了克里木半岛,占领了速答黑。游牧于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间的波罗维茨汗国被击败后,向第聂伯河彼岸逃去。

这时,俄罗斯军队——基辅、加里奇、契尔尼戈夫、斯摩连斯克等军及波罗维茨人出兵远征。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军队及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军队没能来参加,因为他们正忙于反击德国和丹麦骑士。军队规模虽很大,但组织上却很松散:没有统一的基础,任何一个封建主可以任意离开战场。1223 年 5 月 31 日在阿里吉河〔迦尔迦河〕上发生了一次非常不幸的战斗。《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编撰者写道:"无数的人死去了,泣声、号哭声和悲伤遍布着城乡……"鞑靼人从第聂伯河回去了,"但是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又到哪里去了"。[1]

蒙古军正要上溯第聂伯河前进,但接着又返回来了。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居民"为他们布下了埋伏",在这里歼灭了不少敌人,"只有不多的人"逃了出来,[2]通过哈萨克斯坦草原回到了蒙古"老营"。

也梦想着征服全人类的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3]开始准备远征欧洲。在准备这次进攻时,蒙古统治者决意占领在第一次入侵后还没恢复元气、正进行着封建内讧的高加索。服从大汗命令的搠儿马罕的蒙古军队,利用有利形势从伊朗侵入了南阿塞拜疆(1231 年)。他们占领了帖必力思,向该城索取了大量的丝作为赎金;接着又进入北阿塞拜疆——进入阿儿兰和设里汪(1235 年)。围攻了当地诸城中最富庶的冈札城。冈札城的保卫战成了历史上英雄主义的范例。进攻者蹂躏了城郊,破坏了葡萄园。尽管有冈札人的抵抗,攻城机还是毁掉了城墙。蒙古军害怕巷战,又将该城围住封锁了一星期。编年史家基拉科斯·冈即凯齐记载道:"那时居民见城市已落在敌人手中,一部分人将自己

〔1〕《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第 63 页。
〔2〕蒂森豪森:《金帐汗国史资料集》,卷 1,第 27 页。
〔3〕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彼得格勒,1922 年,第 150~155 页。

连同自己的住房一起烧掉,以免落入敌人手中;另一部分人将可以烧掉的东西全部烧掉,只留下了自己。"在最后的搏斗中,敌人"不分男、女、孩童,屠杀了所有的居民"。[1] 只有一队大胆的人冲出了包围圈。沙木霍尔、塔伍什、叶尔格万克、马菼纳别尔德诸堡都失陷了。编年史家基拉科斯在塔伍什附近当了俘虏。他写道:"鞑靼人押着我们困苦地光着脚走了许多天,甚至连水也喝不够,他们就这样赶着我们走。"[2]人民的斗争给侵略者造成了严重损失;其中迦尔德满、哈罕纳别尔德及巴库城砦,没有被他们攻占。

那时,阿美尼亚和谷儿只人民也同样英勇地进行了战斗:只消回忆一下阿尼、卡林(埃尔哲鲁木)、卡尔斯、第比利斯、德马尼斯的保卫战就足以说明这点。直到1239年蒙古人才占领了打耳班。高加索各地遭到了可怖的蹂躏。基拉科斯写道:"所有各国遭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灾难。"[3]蒙古人远征沃舍梯人和撤耳柯思人失败地结束了:北高加索各族人民继续独立了许多年。

蒙古统治者所考虑的远征欧洲问题,不只一次地提到哈剌和林忽里勒台上举行讨论:迁帐于押亦河[乌拉尔河]及侵略高加索是远征的准备阶段。[4] 在欧洲进行的广泛的军事外交性侦察抱有同一目的。大汗们没有隐蔽自己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求邻近欧洲国家的国王们屈服,而且也要求法国国王、英国国王以及教皇本人屈服。[5]

1236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召集起由所有各兀鲁思的部队组成的大军后,开始渡过卡马河。不里阿耳人民勇敢地迎战敌人。但力量显得过于悬殊:正如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不里阿耳城被夷为平地,居民

---

[1]帕特坎诺夫:《见于阿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第2分册,圣彼得堡,1874年,第16~17页。

[2]同上,第26页。

[3]帕特坎诺夫:《见于阿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第2分册,圣彼得堡,1874年,12页;又见V. Minorsky Caucasica, Ⅲ. The Alan. Capital Magas and the Mongol Campaig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 Ⅴ. Ⅸ. part 2, 1952, p. 221~238。

[4]雷巴科夫:《俄罗斯同拔都的斗争》,莫斯科,1948年。

[5]安宁斯基:《13—14世纪匈牙利传教士关于鞑靼在东欧的报告》,载《历史档案》第3卷,1940年,第88~89页。

遭到了屠杀。[1] 不里阿耳、莫尔多瓦、布尔塔思诸国遭到了严重的蹂躏。[2] 伏尔加河上的撒克辛城在敌人进攻面前英勇地坚守住了,被蒙古人留在了后方。[3]

1237 年冬,蒙古兵进人也烈赞[梁赞]公国。以犹里·伊戈列维奇为首的当地诸侯拒绝了拔都所提出的臣服及缴纳什一税的要求,他们向蒙古使者宣称:"只要我们死得一个也不剩时,一切全都是你们的。"也烈赞人没有得到其他诸侯的援助,在人数上显著占优势的敌人面前保卫着自己的城堡。也烈赞在围攻下坚持了五天;该城失陷(1237 年 12 月 21 日)后被焚毁,居民遭到了屠杀。士兵和将帅全部战死——"全都同样地战死了"。接着,普朗斯克等城也都失陷了。也烈赞公国完全毁灭了,古传说上这样讲道:"也烈赞的城市和土地变了样……它的光荣沦丧在它那里,什么幸福也见不到了——那里只有那烟和灰烬。"[4]

鞑靼—蒙古人毁灭了科洛姆纳后,于 1238 年初逼近莫斯科。菲利普·尼阳卡将军统率下的莫斯科人战死。2 月,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国遭到了蹂躏——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特维尔、犹利耶夫、德米特罗夫等 14 城被攻陷。2 月 7 日,经过顽强的守御后,克略兹姆之弗拉基米尔城墙被摧毁。居民被残酷地屠杀;好些出色的文化古迹被毁掉了。[5]

孛栾歹的主力军朝北挺进,于 3 月 4 日与犹里·弗谢沃洛多维奇公的军队交战。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军队被包围,他们忠诚地殒身,保卫了俄罗斯。蒙古军继续前进,占领了托尔若克。在离诺夫哥罗得只有百俄里之地,蒙古人回去了。蒙古军的力量衰竭了。他们行经斯摩棱斯克与契尔尼戈夫的东边。他们也没有来到斯摩棱斯克,但围攻

---

〔1〕斯米尔诺夫:《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莫斯科,1951 年,第 49~50 页;参见《古代文化考察》,莫斯科,1954 年,第 41 页。

〔2〕蒂森豪森:《金帐汗国史资料集(选自波斯文著作)》,卷 2,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 年,第 36 页。

〔3〕约翰·德·普兰·迦儿宾:《蒙古史》,圣彼得堡,1911 年,第 36 页。

〔4〕《古俄罗斯战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 年,第 15 页。

〔5〕《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 卷,第 2 分册,第 460~461 栏、464 栏。

了科哲尔斯克。编年史家记载道:科哲尔斯克人"有着精神坚毅的头脑",他们在燃烧着的城的被毁坏的城墙上战斗了7个星期。他们多次出击,毁坏了蒙古人的攻城机;当敌人终于冲进城来时,"科哲尔斯克人用刀"同他们"拼杀"。拔都几乎在科哲尔斯克停顿了两个月,他狂怒地下令将这座城市毁掉,将它们的全部居民杀光。[1]

俄罗斯诸城的英勇的保卫战把侵略者的盘算打乱了。军队人数逐渐减少,而前面还有半个俄罗斯,于是鞑靼—蒙古人返回草原去了。

1239年初,蒙古军重新向俄罗斯进军,如今蒙古军向俄罗斯南部和西南部开来。只有一部分兵力派往北方,在那里毁灭了穆罗姆城和戈罗霍维茨城。3月,一支军队攻占("用矛"占领)了南彼列雅斯拉夫尔,接着格鲁霍夫也被攻陷了;10月,契尔尼戈夫被占领后焚毁。12月,蒙古人冲入克里木。在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拔都重新将自己的军队撤回草原,以充实军力。

向基辅展开了新的进攻,在那里加里奇将军德米特尔指挥保卫战。据基辅斥侯探得,在1240年末逼近基辅的军队里,有蒙古大将速不台、孛栾歹、贵由等人的部队。许多攻城机围着城日日夜夜地射击。基辅人守御到最后。11月19日,敌人从城墙上的巨大缺口冲进了古老的京城。[2] 士兵与居民们大批地遭到屠杀,成千的人们被押走当了奴隶。当了俘虏和受伤的德米特利将军本人,"由于他的英勇",拔都保留了他的生命。几年后到过基辅的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记载道,在这座大城里只剩下了不到200户人家。

蹂躏了基辅后,蒙古军于1240年末继续西进,疾趋加里奇—沃仑俄罗斯。经过残酷的战斗后,占领了当地首邑加里奇和弗拉基米尔;在12台攻城机帮助下攻击不成功后,用欺骗手段占领了科洛佳仁,把它焚毁了。"其他无数多的城市[3]"同样也被毁灭了。但是某些城市,如:丹尼洛夫、克列密涅茨,打退了鞑靼人的进攻。

---

[1]帕舒托:《苏联史纲(12—13世纪)》,莫斯科,1960年,自第133页起。

[2]据另一些资料,基辅于1240年12月6日陷落。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卷,第784~786栏。

一些不大的中心也英勇地进行了防守。学者们发掘了包括在边境上的基辅国的设防城市（布日斯克、密日博日、科捷尔尼察）系统之内的一座小城。小城已被完全破坏和焚毁了，现在该城所有的经济残迹和战死的居民的遗骸都被掀开了。战死的居民的遗骸有的被箭贯穿躺在城门旁，有的手握刀、剑、圆锤躺在家院里；还有紧紧偎抱着孩子的妇女遗骸。在基辅和梁赞进行的发掘也有同样的发现。[1] 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们回忆起我们勇敢的祖先，而产生深刻的尊敬。

蒙古侵略者进抵俄罗斯西境时，已大为衰弱。此外，为了正确地理解当时的事件，还必须注意到被征服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所掀起的争取解放的游击斗争。

现在尚留下有一个关于也烈赞勇士耶甫帕齐·科洛甫拉特的传说，他带着自己的一支由1700名"勇士"组成的队伍，常突然出现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叫侵略者心惊胆战。[2] 其他各地也进行着斗争。在越出俄罗斯国境西进时，蒙古诸将决定以基辅的粮食来供应自己的军队；他们同博洛霍夫地方的贵族订立了协议：他们不破坏当地城乡，但居民得担负将小麦和黍类供给蒙古军队的义务。但是加里奇—沃仑公丹尼尔·罗曼诺维奇回到了俄罗斯，他破坏和烧掉了叛变的贵族们所在的城市；从而破坏了蒙古军的供应品。[3]

波罗维茨人八赤蛮的队伍在伏尔加河沿岸行动着。他得到了居民们的支持；波斯史学家术外尼写道："由他造成的祸害逐渐加剧，暴乱愈来愈发展。"最后，蒙哥汗的两万蒙古军坐着200只船前去围剿他。在一座岛上被围困的队伍进行了最后的战斗。八赤蛮被擒获。蒙哥汗命他跪下，但听到的是骄傲的回答："我不怕死。我不是骆驼，不能像骆驼似的跪下。"于是，他被杀死了。[4] 在莫尔多瓦土地上，一部分埃

---

〔1〕卡尔格尔：《古代基辅》，卷1，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参见布赖契夫斯基：《俄罗斯反对蒙古侵略斗争的考古文物》，载《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科学通报》，第10分册，基辅，1951年，第69页等处。

〔2〕《古俄罗斯战纪》，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13～14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卷，第792栏。

〔4〕蒂森豪森：《金帐汗国史资料集》，卷2，第24页、35页；参见《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the Eastern Asiatic Sources》，ed. by E. Bretschneider，V. 1，London，1887，P. 311～312。

尔治居民没向敌人屈服。据匈牙利修道士犹里安记载说:有一个莫尔多瓦公“带着不多的人前往设防颇强的地方,只要力量足够,就在那里防御下去”。[1]中亚各族人民也展开了斗争。1238年不花剌市民和农民在制筛匠马赫穆德·塔剌比的领导下举行的起义证明了这一点;起义的锋芒指向蒙古政权及其当地贵族中的走狗们;敌视起义的术外尼写道:“他凌辱了大部分达官贵人,某些人被他杀掉了,另一些人逃走了。反之,他对平民和无赖却抱有好感。”农民们碰上什么就拿起什么武装,加入了他的队伍,“追上蒙古军队里的不管什么人,特别是征收赋税的人和富人们”就杀掉。起义者歼灭了1万名蒙古士兵。只是专门派来了大军才把起义者击溃了。[2]

由此可见,当蒙古诸汗向欧洲腹地远征时,后方是不平静的。各族人民的斗争注定了远征的垮台。在俄罗斯作战了4年后向其他国家进军的鞑靼军,遇到了英勇的抵抗。拜答儿、海都与斡儿都的军队约3万人在波兰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侵略者在朝波兰京城克拉科夫进军的路上,蹂躏了留勃林、札维霍斯特、桑多米尔、波兰涅茨、维什利茨,在赫密尔尼克、大杜尔斯克与波兰军交战,一路上焚烧、掠夺、肆虐横暴;1241年3月22日,经过坚强的保卫战后,克拉科夫失陷。但敌人未能占领弗罗茨拉夫。[3]

敬教者亨利公,召集起大军,于4月9日在列格尼茨以南投入战斗。波兰士兵虽勇,但他们被击溃了。连亨利公本人也阵亡了。但蒙古人没能占领列格尼茨;拉齐博日也击退了他们的进攻。按照率领主力军在匈牙利的拔都的命令,蒙古军撤出波兰,于1241年5月初侵入莫拉维亚。波兰人民得以捍卫住了某些大城,并给敌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据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记载,在进入欧洲腹地的鞑靼—蒙古

---

[1]安宁斯基:《13—14世纪匈牙利传教士关于鞑靼在东欧的报告》,载《历史档案》第3卷,第85~86页。

[2]雅库博夫斯基:《1238年的塔剌比起义》,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汇刊》,卷17,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第121~125页。

[3]S. Krakowski. Polska w walce z najazdmi tatarskimi w Ⅷ wieku, Warszawa, 1956 str. 119 以下;G. labuda. wojna z Tatarami w roku 1241.《Przeglad Historyczny》,T. 50,2,1959 str. 189~224。

人中间,“有许多人死在波兰和匈牙利”。[1]

拔都经过战斗突破了喀尔巴阡山脉通道,那里的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的武装岗哨战死。蒙古军涌进了匈牙利,他们毁灭了耶尔拉乌和克维什德。国王佩拉四世于4月初从佩什带着6万军队出战,科洛曼公爵的霍尔瓦将军也加入了这支军队。1241年4月11日在赛约之战中匈牙利人被击溃。据编年史家说,在他们退往佩什去需走两天的路上,布满了尸体。[2]

在敌人冲击下坚持了3天后,佩什失陷了;经过顽强的战斗后,瓦拉廷、阿拉德、彼尔格、耶格列斯、捷密什瓦阿尔都被占领。

鞑靼—蒙古军队侵略俄罗斯,蹂躏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各地,使得欧洲大为震惊。在法国编年史上记载道,在法国,对蒙古人的恐惧引起了法国商业的完全停顿;英国编年史家记载道,英国同大陆的贸易停顿了一段时期。在德国,人们甚至祈祷道:“主啊!从鞑靼人的狂暴中拯救我们吧!”

某些外国史学家企图使人们确信:包括教皇在内的西欧统治者在令人感动的同心一意下力图帮助落在侵略者打击底下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罗马教廷和德国皇帝菲德烈二世虽多次谈到同入侵作斗争的重要性,但他们本身却继续进行残酷的内战,并积极地支持就在那时对俄罗斯、波兰、波罗的海东岸进行武装入侵的那些国家(骑士团、瑞典、丹麦)。[3]

1241年4月,蒙古军占领了匈牙利左岸地区;他们蹂躏了处于匈牙利统治下的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市民和郊区农民们击退敌人,保卫住了布拉齐斯拉夫、科马尔诺、特连庆、尼特拉。

在捷克,战斗继续进行着;蒙古人在捷克占领了奥帕瓦、别涅舍夫、利托维茨,但没能占领奥洛莫乌茨、布尔诺等城。[4] 由于损失巨大,并看到向这个地区西进的不可能,拔都下令将军队从捷克撤走,将全部

---

[1]约翰·德·普兰·迦儿宾:《蒙古史》,第25页。

[2]见《Scriptors Rerum Hungaricarum》. V. Ⅱ, Budapestini, 1938, P. 569~571, 576~580。

[3]帕舒托:《论罗马教廷对俄罗斯的政策》,载《历史问题》1949年第5期,第56等页。

[4]《捷克史》,卷1,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第104页。

力量集中到匈牙利来;1241 年冬,他们在匈牙利渡过了多瑙河。经过一场英勇的保卫战,在 20 台攻城机的攻击下,匈牙利京城格兰失陷。

蒙古诸将想同木干草原那样地将匈牙利平原变为自己骑队在欧洲的饲料基地,但他们没能做到这点:在四面八方的打击下,蒙古军队削弱了。匈牙利农民起来进行斗争。留下了一个关于好样儿的兰卡的农民队伍的传说,兰卡在战败后,为了免于落入敌人手里,扑向了利剑。[1] 蒙古人的损失浩大。前述普兰·迦儿宾在蒙古、在大汗帐幕所在地,见到一处专门的墓地,"那里埋葬着在匈牙利被杀死的人,因为在匈牙利死了许多人"。[2]

诚然,拔都还在克罗地亚蹂躏了扎格列布,在沿岸地区蹂躏了斯瓦奇、达里瓦斯托,焚毁了卡塔尔的一部分。但克里斯的居民向围攻者投掷大石块,打退了围攻者们;蒙古人绕过了设防很强的斯普里特,未能攻占特拉瓦(1242 年 3 月)、拉古札。

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开始的进军,最后在意大利边境附近的达尔马提亚岸边受挫而中止了。1242 年春,蒙古军开始通过保加利亚和俄罗斯退过了伏尔加河。我国各族人民、东欧和中欧各族人民在与蒙古入侵者的残酷斗争中保卫了自己的土地,把巴黎、律贝克、马德里、伦敦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城市和文化从毁灭中拯救了出来。

蒙古入侵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难,我国各族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儿女们。入侵破坏了经济,毁掉了城市文化中心。某些民族(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波罗维茨人、可萨人)完全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我国国土被割裂成许多部分,被各斡耳朵[汗国]及兀鲁思[国、汗国]的统治者所分据。远征欧洲失败归来后,拔都汗及其周围的贵族们在伏尔加河上定居下来,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建都于萨莱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所辖疆土起自也儿的石河,迄多瑙河止(包

---

〔1〕列迭列尔:《从时代的国际关系方面看鞑靼对匈牙利的入侵》,《Acta historica》,t. Ⅱ,f. 1 ~2,Budapest,1953,P. 1 ~45。

〔2〕约翰·德·普兰·迦儿宾:《蒙古史》,第 12 页。

括摩尔达维亚和保加利亚在内);其东北部辖有伏尔加河流域及乌拉尔山地区各族人民的土地,南部辖有克里木及北高加索(直到打耳班为止)。中亚的土地专归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统辖。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的领地分立为单独的兀鲁思。此外,今突厥斯坦(直到阿姆河为止)、外高加索之地也归他统辖。

金帐汗国、旭烈兀系及察合台系之国有一时期在名义上从属于哈剌和林的蒙古大汗。从被征服国家掠夺来的财宝便运往哈剌和林,好些中国、俄罗斯、谷儿只、阿美尼亚工匠在哈剌和林被当做奴隶遭受奴役。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东南部和远东仍处在统治中国的大汗的直接统治下。

蒙古侵略者在经济和文化上要比俄罗斯、阿美尼亚、谷儿只等国落后得多。他们从这里驱走了工匠,运走了劳动工具、金属制品。因此,某些手工业,例如俄罗斯驰名的搪瓷手工业衰落了,石头建筑业暂时停顿了。[1] 蒙古诸汗举行了户口登记(俄罗斯首次户口登记在1257年),对居民课以货币和实物贡税、贸易税以及运输和军事徭役。在高加索,以贡税形态向每个纳税者征收100公斤麦子、50公斤酒、2公升大米、3个口袋、2根绳子、1枚白色的钱币、1支箭、1枚马蹄铁,等等。[2] 苛捐杂税使被征服国家的经济极端衰竭。八思哈们的军队监视着汗的意志的执行。稍有违抗,即以毁灭性的侵袭来进行惩罚。国家在政治上衰落了,出现了许多小的领地、公国;由诸汗有意识地煽起、并为诸汗所利用的内讧不停地发生着。[3]

对我国举行的毁灭性的侵袭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在罗斯托夫、特维尔及诺夫哥罗得的编年史上记载着捏兀柳亦(1252年)、哈瓦底(1281年)、秃来帖木儿(1282年)、阿合马(1283年)、迪兀颠(1293年)、哈兀哈底(1317年)、绰勒罕(1327年)等人的军队在俄罗斯东北

---

〔1〕雷巴科夫:《古代俄罗斯的手工业》,莫斯科,1948年,第525~538页;A. M. 萨哈罗夫:《14—15世纪俄罗斯东北部的城市》,莫斯科,1959年。

〔2〕《僧人马加基亚(13世纪)的蒙古史》,帕特卡诺夫出版,圣波得堡,1871年,第71页。

〔3〕纳索诺夫:《蒙古人与俄罗斯(鞑靼对俄罗斯的政策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格列科夫及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

部所干下的暴行;沃仑编年史诅咒了蹂躏俄罗斯西南部(1258、1275、1277、1280、1286、1287 等年)的那海、帖列不花等大股敌军。

蒙古诸汗破坏和割断了我国各族人民间的历史联系及他们与邻国的往来关系。此外,他们还多次利用一国的兵力反对另一国:金帐汗们常驱使俄罗斯军队去攻打波兰、立陶宛和北高加索;谷儿只人、阿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死在与他们无干的伊朗伊利汗对前亚的侵略性远征中。

在当时国际生活中,蒙古对欧亚许多民族的人民的压迫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像罗马教廷那样有影响的反动势力寻求同蒙古奴役者联盟。罗马教廷在口头上为天主教强国反对蒙古诸汗对欧洲的威胁而斗争,阻止汗国的邻邦"鸽子与蛇交尾",也就是说同诸汗直接联系。而实际上呢,罗马教廷及同它联合的法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却利用汗国去扩大自己在东欧的影响和支持十字军在前亚阿拉伯土地上每况愈下的地位。教皇使节团多次抱着这些目的去到萨莱、帖必力思、哈剌和林和北京(汗八里),1303 年在北京甚至设置了天主教大主教。

被蹂躏与分裂的俄罗斯大大地丧失了以往的国际意义;它丢失了处于汗国统辖下的伏尔加河流域和黑海沿岸地区以及处于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瑞典侵占了芬兰,从俄罗斯夺走了它的卡累利阿部分。相互失去联系的俄罗斯各地被强大的邻国所侵占。西南俄罗斯(日后之乌克兰)孤立了起来,于 14 世纪中叶被波兰和立陶宛统治者侵占。波洛茨克—明斯克俄罗斯(日后之白俄罗斯)和斯摩棱斯克也落到了立陶宛统治之下。

在已经形成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人民为争取祖国土地统一和解放而进行斗争是非常困难的。但人民终究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只消回忆一下诺夫哥罗得的反鞑靼行动(1259 年),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及俄罗斯东北部的其他城市反对征收贡税者的起义(1262 年),怒火扑向汗国统治者及其走狗们的罗斯托夫、科斯特罗马、特维尔居民的经常不断的行动,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人民运动的意义是巨大

的。它迫使汗国统治者寻找统治俄罗斯的另外的方式——只是实行恐怖手段已经不够了。

正是人民起义的浪潮给汗国统治以第一次打击，它扫除了包收税赋制度，迫使诸汗于13世纪末将“税赋”的征收转移给俄罗斯诸侯，接着，它又否定了八思哈制度。

在城乡中复兴起来的俄罗斯人民的不倦的劳动以及解放斗争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进一步集中创造了条件。

蒙古帝国各地区中的我国其他各族人民也没向压迫屈服，从叶尼塞河起，直到帖列克河和顿河到处爆发了起义：苏罗日的起义（1249年）、乞儿吉思人在叶尼塞河上的起义（1254年）、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在孛颜与只忽领导下）的起义；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在很长的年代里没向诸汗屈服，阿儿兰的阿塞拜疆起义者和设里汪山区居民继续战斗着。[1]

保加利亚也落到了汗国压迫底下，它成了那海的纳贡国，但时间不长。1277年，保加利亚人民在牧民伊怀拉领导下举行了起义；斗争时而停息、时而以新的力量爆发，直到14世纪初保加利亚最后摆脱汗国、恢复独立才告结束。[2]

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复兴及俄罗斯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扩大，金帐汗在东欧的政治势力范围及他们的军队对欧洲邻国进行远征的规模显著地缩小了。

28.3　14—15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汗国桎梏的推翻

在14—15世纪间，俄罗斯进行了消灭政治分裂性和建立统一国

〔1〕谢基林斯基：《9—15世纪苏罗日历史概要》，西姆菲罗波尔，1955年，第21页；《古代文化考察》，莫斯科，1954年，第224页；约翰·德·普兰·迦儿宾：《蒙古史》，第36、42页；参见威廉·德·鲁布鲁克：《东方国家行纪》，圣彼得堡，1911年，第66页、第88～89页；拉施特丁：《史集》，卷3，莫斯科—列宁格勒，1946年，第189页。

〔2〕《保加利亚史》卷1，莫斯科，1954年，自143页起。

家的过程。金帐汗国的压迫阻遏了俄罗斯人民的政治、文化发展,妨碍了俄罗斯各地的国家统一。

金帐汗利用俄罗斯诸公国统治者为争夺大公尊号所展开的斗争,竭力唆使他们互相反对,从而互相削弱,保持了对汗国的臣属关系。罗戈日编年史编撰者所描述的金帐汗们的政策的特点是很值得注意的:金帐汗力图在俄罗斯诸侯间煽动内讧,从而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祸害。编年史编撰者写道:金帐汗国统治者被互相敌对的诸侯用来收买他们帮助的"巨量金银黑了良心",他们"使用自己的不敬神的奉承手段将剑和火插入俄罗斯土地,造成教徒们的毁灭",他们"在俄罗斯土地上制造叛乱"。[1]

许多诸侯在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地位的斗争中死在汗国内,他们在那里或由于鞑靼—蒙古统治者自己起意(当他们违抗鞑靼—蒙古统治者的命令时)、或由于同是俄罗斯诸侯的他们的对手的谗言,而被鞑靼—蒙古统治者杀死。1304年,大公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死去后,特维尔公米海尔·雅罗斯拉维奇与莫斯科公犹里·丹尼洛维奇都想取得大公宝座。"二位诸侯都请求批准他们当大公……争吵着来到汗国。"[2]米海尔·雅罗斯拉维奇取得了大公地位的诏敕,但犹里公在十五年内一直向他争夺大公的权利,直到1318年其对手在汗国内被处死后将大公权利争取到为止。1325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宝座的追求者犹里·丹尼洛维奇和特维尔公德米特里·米海洛维奇在汗国内发生了冲突。德米特里在汗国内杀死了犹里,接着他本人被月即别汗下令处死了。1339年,特维里公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与他的儿子费多尔在汗国内被杀害。

力图造成俄罗斯的政治分裂、并挑起诸公国间的内讧,汗国一度决定设置两个大公作为俄罗斯的首领。1327年,金帐汗月即别将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领地分给莫斯科公伊万·丹尼洛维奇和苏兹达尔公阿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前者授以诺夫哥罗得和科斯特罗马,后者则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5卷,第1分册,第95~96页。

〔2〕《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5卷,第393页。

授以弗拉基米尔、下诺夫哥罗得、戈罗迭茨。[1] 诸如此类的政策削弱了俄罗斯,阻碍了它的政治统一。

14 世纪 50—70 年代,莫斯科公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为夺取大公宝座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的主要对手是苏兹达尔—尼热戈罗德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和特维尔公米海尔·阿历山德洛维奇。莫斯科公国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已十分强大,而金帐汗国这时却相反地衰弱了。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已经不考虑金帐汗国的命令,而用军事力量达到自己的要求。例如,1317 年,特维里公米海尔·阿历山德罗维奇从汗国在使臣萨雷霍查的陪伴下带着受封为大公的诏敕到弗拉基米尔来。但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拒绝"让出大公之位",并让贵族和"民众"(或"平民",即许多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宣誓道:他们不同意米海尔·阿历山德罗维奇当大公。同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派出了军队,不让特维尔公进弗拉基米尔来。

当时同米海尔·阿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莫洛格城的汗的使臣向莫斯科公发出了命他来弗拉基米尔"接诏敕"(显然意为让他来参加米海尔·阿历山德罗维奇即大公位的典礼)的命令。德米特里对此回答道:"我不求接诏敕,不让(米海尔)在公国领地上当大(公)。""而你,使者,与你无干"[意即容许汗的使臣随便前来——译者注]。[2] 就这样,莫斯科作为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中心在对汗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强大起来了。

莫斯科大公政权到 14 世纪末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金帐汗国承认了它对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世袭领地"(即不需根据汗的诏敕获得、而在莫斯科公的姓氏范围内由父传子、世代相袭的领地)权利。据尼康诺夫编年史记载说:脱脱迷失汗宣布,他"恩赐"大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他的世袭领地里"。[3] 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依本人的

[1]《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

[2]《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5 卷,第 1 分册,第 95~96 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5 卷,第 1 分册,第 84 页。

遗嘱书里写道:他"以自己的世袭领地、大公国祝福自己的儿子瓦西里公"。[1] 莫斯科公的这样重大的政治成就是俄罗斯人民于1380年对万夫长马买率领下的鞑靼—蒙古军队的历史胜利的结果。

但是此后在占据全俄罗斯宝座的问题上,还是经常免不了有汗国的干涉,公国内讧要由汗国来审理。如:1425年,莫斯科公瓦西里二世和他的叔父、加里奇·密尔斯基与兹维尼戈罗德的封侯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商定,由汗国来决定他们之中谁能当大公的问题;"皇帝(金帐汗)恩赐那人,那人就当大诺夫哥罗得及全俄罗斯的大公……"[2]

俄罗斯向汗国臣服的表现是俄罗斯诸侯要去觐见一次当权的汗。在编年史的记载中特别令人注目地描写了与觐见相伴的危险性。[3]

为了维持自己对俄罗斯的统治,汗国本身多次向那里派遣武装队伍。俄罗斯诸侯也经常从汗那里求得同自己的对手作斗争或镇压人民运动的军事援助。1316年,鞑靼"使者"撒班赤和哈赞赤"给罗斯托夫带来了许多灾祸"。[4] 1317年,莫斯科公犹里·丹尼洛维奇从汗国引来了由合兀合底和阿思忒剌巴勒率领下的鞑靼部队,他们帮助他同特维尔公米海尔·雅罗斯拉维奇作战。1318年,"残暴的"汗国"使臣火赤哈""掠夺了"科斯特罗马城和罗斯托夫城。由于火赤哈杀掠的结果,仅科斯特罗马一地就死了120个人。[5] 1322年,从汗国同莫斯科公伊万·卡里塔一起来到俄罗斯的"厉害的使臣"阿黑米勒对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地方的居民"干了许多坏事","占领了雅罗斯拉夫尔,毒打了许多基督教徒"[6]1333年,汗国"使臣"脱亦迪和撒莱又出现在俄罗斯。[7]

如上所举的例子可以举出若干来。在编年史上经常碰到关于鞑靼力量侵犯俄罗斯及汗国干涉俄罗斯事务的记载。鞑靼人的侵袭带

[1]《14—16世纪大公和封侯的遗嘱书和条约文据》,第34页,第12号。
[2]《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8卷,第168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5卷,第1分册,第71页。
[4]《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5卷,第161页。
[5]《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61页。
[6]《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5卷,第167页。
[7]《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5卷,第1分册,第47页。

来了可怕的灾祸，特别是对边境上的俄罗斯公国：苏兹达尔—尼热戈罗德公国和也烈赞公国的城市居民。1365年，金帐汗塔海带着“鞑靼军队”侵袭也烈赞国；烧掉了它的京城——彼列雅斯拉夫尔·也烈赞斯基。紧接着展开了“恶战”，由于恶战的结果，遇到坚强抵抗的塔海，被迫“带着少数亲兵”退走了。[1]

1337年[原文如此，应为1377年之讹——译者]，汗国王子阿剌卜沙的军队在皁阳河（苏拉河的支流）上打败了俄罗斯军，接着向下诺夫哥罗得挺进。尼热戈罗德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没有采取必要的保卫城市的措施，逃到了苏兹达尔。许多市民为躲避敌人，溯伏尔加河游往戈罗迭茨。鞑靼侵略者杀光了留在下诺夫哥罗得的人（“留下的人和市民全被杀死了”），放火烧了城，接着烧了郊区村庄，“征服”和俘掳了尼热戈罗德乡的许多人。[2]

1378年，“鞑靼军队”再次“突然来到”下诺夫哥罗得，下诺夫哥罗得上年遭到鞑靼军侵袭后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恢复过来。王公不在城里，当地居民几乎全部逃跑（“人们四散逃奔，市民毁坏了城，向伏尔加河彼岸逃去”）。鞑靼军进了城。这时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公从戈罗迭茨回到了下诺夫哥罗得。他提出向侵略者缴纳“赎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再次焚烧了城，次日，“征服了”尼热戈罗德“全州”。[3]显然，鞑靼人的侵袭所抱的目的不仅是单纯的掠夺，而且也在于破坏俄罗斯诸公国的物质资源。汗国封建主力图让俄罗斯人民一蹶不振，使他们遭到经济损失，使他们无力进行抵抗，从而保持对自己的屈服。

1382年，成长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莫斯科，成了脱脱迷失汗所组织的鞑靼入侵的牺牲品。用欺骗手段占领了莫斯科后，侵略者在那里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富庶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变成了废墟。据某一资料说，死了1.2万人，据另一资料则为2.4万人。[4]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5卷，第80页。

[2]普里谢尔科夫：《特罗伊茨编年史》，据原文改写，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403页。

[3]普里谢尔科夫：《特罗伊茨编年史》，第415页。

[4]《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3卷，第129页；《乌斯秋日编年史（阿尔汉格洛戈尔编年史家撰）》，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62页。

据编年史上说,从敌人剑下幸免的人或淹没在血泊中或被压在尸堆下("有些人被压着,有些人在尸体的血泊中喘不过气来")。[1] 敌人不分老幼("从年幼的到年老的")[2]谁也没放过。除了莫斯科,脱脱迷失还破坏了许多城市。

1410 年,尼热戈罗德公丹尼尔·博里索维奇将鞑靼部队引到弗拉基米尔,鞑靼军抢劫了教堂,侵占了城郊人民的财产。强盗们"抢到了无数的金、银、器物"。抢到的钱多到如此程度,以致侵略者们"用斗"将钱进行了分配。[3]

鞑靼的贡税("维霍德")及汗的繁多的"需索"是落在俄罗斯各地居民身上的沉重负担。最初,由鞑靼包税人或从汗国派来的由八思哈率领下的专门的军队来向俄罗斯征收汗国的"维霍德"。但是,如前所述,经过 13—14 世纪末的一系列人民争取解放的起义后,汗国被迫放弃了按这种制度向俄罗斯人民征收"维霍德",而将征收贡税并送往汗国的义务转交给了莫斯科、特维尔、尼热戈罗德、也烈赞大公们。

即便从 14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间发生的诺夫哥罗得事件中,也可看出人民被迫向汗国缴纳贡税有多么痛苦。1327 年,鞑靼使者来到了诺夫哥罗得,"诺夫哥罗得人给了他们二千白银,还派自己的使者带着大批礼物同他们一起去见统将"。[4] 1332 年,汗国向诺夫哥罗得提出了新的"需索"。从汗国回来的大公伊万·丹尼洛维奇·卡里塔"对诺夫哥罗得动了怒,向他们索取卡马河彼岸的白银"[5](即从卡马河彼岸的诺夫哥罗得领地上征收的缴纳贡税的"白银")。诸如此类的需索激起了诺夫哥罗得人的愤怒。伊万·卡里塔想强迫他们执行自己的命令,便将军队开到了托尔若克,切断了通往诺夫哥罗得的商道。这一情况迫使诺夫哥罗得当局派遣使者带着 500 卢布来到了大公处。伊万·卡里塔进一步向大诺夫哥罗得索取"维霍德",以便送往汗国,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5 卷,第 442 页。

〔2〕《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8 卷,第 132 页;第 15 卷,第 1 分册,第 145 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8 卷,第 160 页。

〔4〕《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第 341 页。

〔5〕《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第 344 页。

而且索取的数额要比500卢布大得多。1339年,诺夫哥罗得人派遣使者带着"维霍德"来到了大公处,大公对所缴纳的"维霍德"不满意,坚决地要求缴纳"此外的维霍德":"将皇帝所要的继续缴给我吧,这是皇帝向我要的。"诺夫哥罗得当局宣布抗议,对伊万·卡里特说"这是创世以来从未有过的事"。[1]

到14世纪80年代时,俄罗斯对汗国的贡属关系变弱了。但在脱脱迷失远征莫斯科后,1383年,德米特里·顿斯科依之子瓦西里·德米特利耶维奇大公带着巨额金钱("给皇帝八千白银")到汗国去。接着,按照汗廷的命令,向俄罗斯人民征收特别征派的"全大公国领地范围内的极重的贡税;任何人不得免交;每村摊派半卢布";"然后再以金子交给汗国"。[2] 为了对莫斯科大公的政治进行监督,脱脱迷失拿大公的儿子瓦西里作质,瓦西里在汗国一直住到1386年。这种监督还通过别的途径来实现,例如:通过专门派去的"使者"来实现。1383年,"一个名叫阿答失的残暴的使者"[3]从汗国来到弗拉基米尔,就是这样的例子。

莫斯科当局利用金帐汗国于1395年被帖木儿军队所击溃,在某一段时期内停止缴纳"汗国的维霍德"。[4] 但是到了1408年,俄罗斯在汗国的统治者之一——也迪该的侵犯下遭到了大难。1411年,瓦西里·德米特利耶维奇被迫带着给汗的"大量财物"到汗国去朝觐。[5]

在15世纪三四十年代巨大的封建战争时期,鞑靼人对俄罗斯事务的干涉加强了。在这一时期内,俄罗斯人民所受到的汗国统治者对国库的压榨也更加厉害了。1445年,由诸侯马木底牙黑和也古卜统率下的鞑靼军队在苏兹达尔击溃了俄罗斯军。瓦西里二世·瓦西里耶维奇大公被俘。为了获得自己的释放,他答允下了巨额赎金。他被释放

---

[1]《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第345、350页。

[2]《前人和后人校订的诺夫哥罗得的最初的编年史》,第4卷,第90页;《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8卷,第135页;第15卷,第1分册,第149页;第23卷,第130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25卷,第211页。

[4]纳索诺夫:《蒙古人与俄罗斯(鞑靼对俄罗斯的政策史)》,第140页。

[5]《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1卷,第219页。

回莫斯科去了,但是汗国的使者同他一起来到了那里,使者被派来向俄罗斯人民征收尽可能多的金钱。[1] 瓦西里二世的政敌——封侯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等人——组织了反对他的阴谋,他们摆出一副从汗国的沉重暴力下解放人民的勇士的样子,以显示自己暂时对居民的同情。阴谋者责备大公直:"你过分喜爱鞑靼人和他们所说的话,而对教民却过分折磨、毫不仁慈,你把金、银、地产都给了鞑靼人。"[2] 瓦西里二世的对手同瓦西里二世算政治账时,竭力把事情造成这样,即:他们在捍卫着全民族的利益。把大公操纵在自己手里后,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及其同谋者们对他说:"现在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基督教,为了你的赎金;与你同来的那些鞑靼人看到了之后,就会减轻交给皇帝的赎金。"[3]

鞑靼—蒙古的统治就这样地以沉重的负担压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它耗尽了他们的力量,阻碍了他们的正常发展。俄罗斯人民只有从自己的肩上抛掉这种重压才能朝着进步发展的道路前进。

广大人民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反对鞑靼—蒙古压迫的斗争。这一斗争破坏着汗国统治的基础,最后,当条件成熟时,便导致汗国统治的推翻。在许多场合下,反对金帐汗国统治的人民运动与反对俄罗斯封建主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一起了,俄罗斯封建主们经常同侵略者们具有共同的语言。

1320 年,罗斯托夫来了"鞑靼恶徒"(显然是来收贡税的),市民驱逐了他们。[4] 1327 年,特维尔关厢人民举行起义同鞑靼—蒙古侵略者进行斗争。

关于 1327 年特维尔起义的最早的说法见于罗戈日编年史的编撰者所述及特维尔文集中。[5] 按照这一说法,起义原因为:特维尔居民遭到了从汗国派到特维尔来、住在大公宫廷中的八思哈绰儿罕(舍兀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5 卷,第 492 页。

[2]《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4 卷,第 1 编,第 2 分册,第 443 页。

[3]《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8 卷,第 198 页。

[4]《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 卷,第 3 分册,第 530 页。

[5]《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18 卷,第 415 ~ 416 页;第 15 卷,第 1 编,第 42 ~ 44 页。

合勒、失扯勒罕·丘颠齐耶维奇)的压迫。特维尔居民("平民")受到了绰儿罕及其军队带来的许多苦难,他们不只一次地向自己的王公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申诉,并请求他"保护"他们。阿历山大要求人民忍受。但人民的忍受已经超过了所能忍受的限度,于是特维尔起义了。清晨,人民运动在集市上仿佛借口一件小事而开始了。鞑靼人夺走了一个外号叫杜德科(笛子)的教堂执事的马。那教堂执事召唤其他特维尔人来帮助自己,他喊叫道:"特维尔男子汉们,不要让他抢走!"教堂执事的召唤像警报一样地响了起来。市民们像接到积极反鞑靼行动的信号般地接受了他的召唤,于是他同鞑靼人打("战")起来了。鞑靼人认为自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因此是不可侵犯的("独裁的"),他们便动用了武器。人们开始慌乱起来,但这种慌乱很快地就被特维尔市民的有组织的行动所代替。显然,事先就作了起义的准备。城里响起了召集人民举行市民会议的钟声。根据编年史上所载判断起来:在进一步发生的事件中,行动起来的已经不是被遭到抢劫的教堂执事的喊声召来的偶然纠合在一起的人们,而是作为在市民会议上作出一定决议的关厢人民组织的"城市"("举行了市民会议,全城转变了,全体人民在那个时刻集合了起来……")。由于起义,鞑靼人被杀死了。在叶尔莫林编年史上记载道:特维尔人放火烧了躲藏着绰儿罕的大公宫廷。从汗国向特维尔派来了由五个万夫长统率下的远征讨伐队,残酷地镇压了特维尔公国的城乡居民。

在民间创作中反映了1327年特维尔起义。在关于失扯勒罕·丘颠齐耶维奇的歌子中保存了关于特维尔千夫长及其兄弟领导反鞑靼运动的资料。[1]

在另一些编年史上,记载1327年特维尔起义的文辞却不同于罗戈日编年史编撰者及特维尔文集的文辞,不同点在于:把发起反对绰儿罕说成是特维尔大公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诸如此类(歪曲历史实际情形)的说法是由于统治阶级力图缩小人民在对汗国压迫作斗争中的作用和强调大公政权在这件事上的意义而出现的。

---

〔1〕《基尔沙·丹尼洛夫收集的古代俄罗斯诗歌》,莫斯科,1938年,第21~24页,第4号。

14世纪70年代是同汗国桎梏作斗争的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涨。1374年,下诺夫哥罗得爆发了特别大的反对汗国横霸的人民起义。当地居民(显然,首先是全体关厢人民)杀死了汗国万夫长马买的使者及同他一起来的鞑靼人(据一种资料说,达1000人,据另一种资料则为1500人),并捉住了他们的"长官"萨来哈及其亲兵们。瓦西里·德米特利耶维奇(据另一种资料为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公命令自己的士兵"将萨来哈及其亲兵分开押走"。看来,他想将他们看守起来,或许是想使他们免遭市民的惩治。但是萨来哈和他的那些人逃到了主教的院里,放火烧了大殿,开始对尼热戈罗德人进行射击。这就成了尼热戈罗德人采取行动的信号。结果萨来哈的全体亲兵都被杀死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摆脱报复"。[1]

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涨为全俄罗斯范围内,由许多公国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反对汗国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到了14世纪末,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成熟了。

1378年,在汗国内取得政权的万夫长马买,向俄罗斯派遣了由统帅别古赤率领下的大军。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带着很大一支军事力量前去迎战。敌对双方在也烈赞国沃查河上相遇,结果俄罗斯战士获胜。这是14世纪头一次有组织地进行的俄罗斯对鞑靼人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鞑靼人战败。

1380年,马买对俄罗斯举行了新的大规模远征。各种各样的史料对这次远征的目的说得各不相同:有的认为冀图扩大俄罗斯各地所缴的贡税额,有的认为想为沃查河上的失败复仇,有的认为企图重复拔都时期对俄罗斯造成的大破坏。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入侵,一旦侵袭成功,就会造成俄罗斯与汗国关系的大转变,迫使俄罗斯屈服于汗国力量。

史料上没有对马买军队的数量作出精确的记载,有时给出了显然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5卷,第1编,第106~109页;第8卷,第21~22页;第11卷,第20~21页;第18卷,第114~115页;第23卷,第118页。

夸张的数字。迎战马买的俄罗斯军队的数量在各种编年史上也记载得各不相同。据 A. H. 季霍米罗夫推测，鞑靼与俄罗斯兵力大致相等，各由 10～15 万士兵组成。[1]

难以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是：在俄罗斯各地中有哪些地方提供了士兵。但是，必须想到，士兵们是从许多公国集合起来的。军队是全俄罗斯的。回避参加对马买斗争的有也烈赞国，此外，看来还有诺夫哥罗得国和特维尔国。斯摩棱斯克军也没来。

起来保卫祖国的不仅有诸侯手下的人，而且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史料上所载死在战场上的人中间有这样一些平民，如：皮靴匠犹尔卡、瓦修克·苏霍博列次、谢恩卡·贝科夫、格里佳·赫鲁列茨。[2]

俄罗斯军与鞑靼军于 1380 年 9 月 8 日在涅普里亚德瓦河、顿河汇流处的库里科沃之野相遇。俄罗斯人在艰难的流血战斗中对敌人取得了出色的胜利，虽然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代价。

表现出俄罗斯人民真正英雄主义的库里科沃战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库里科沃战役后，汗国从此一蹶不振。它的行将到来的毁灭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库里科沃原野之战是所有斯拉夫人民、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各族人民反对土耳其、德国及其他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范例。库里科沃战役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响应。在描述这一事件的文艺作品《在顿河左岸》中写道，库里科沃战役的光荣传到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族国家、君士坦丁堡、罗马和迦法："光荣飞向铁门、罗马、迦法沿海，飞向托尔纳夫，又从那里飞向察留格拉德，赞颂着伟大的俄罗斯在库里科沃原野上战胜了马买。"[3]

库里科沃战役后，1382 年，脱脱迷失汗向莫斯科举行了远征；脱脱迷失汗统治汗国时期乃是汗国有名的政治上升时期。当脱脱迷失临近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企图召集军队力量。但许多诸侯与贵族不相信有可能击败鞑靼进攻。他们中间吵成一

[1]季霍米罗夫：《1380 年库里科沃战役》，载《历史问题》，1955 年，第 8 期，第 16 页。

[2]《关于库里科沃战役的故事》，莫斯科—列宁格勒，1959 年，第 198 页。

[3]《关于库里科沃战役的故事》，莫斯科—列宁格勒，第 13 页。

团,使得大公政权失去了支配行动的能力。此外,可以看出库里科沃战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那一次作战后使俄罗斯暂时转弱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抛下城市,去到了彼列雅斯拉夫尔,接着又到了科斯特罗马。看来,莫斯科所爆发的人民起义是他出走的原因之一。叶尔莫林编年史对这次起义所作的记载最与事实相符。人民敲响了钟,召开了市民会议。看来,在市民会议上作出决定准备保卫城市。市民们在所有的城门上组织了警卫,不放任何一个人出去。在城墙上设置了由武装起来的莫斯科人组成的守卫队。关厢人民扣住了企图逃出城去的贵族,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从城墙上用石头扔在他们身上。大主教基普里安和大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妻子叶夫多基娅也被扣住了。只是经过很大的困难他们才出了莫斯科,但是财产没有交还他们。

这时,莫斯科出现了一个在俄罗斯的立陶宛公,奥尔格尔德之孙奥斯帖。看来,市民会议把他召来当了统帅。脱脱迷失对莫斯科的围攻继续了三天。莫斯科人英勇地进行抵抗。他们射击侵略者,向他们扔石头、浇开水。莫斯科人使用秋菲亚克(一种火器)和炮作为防御工具。编年史记载了织呢匠亚当所建立的功勋,亚当从弗罗洛夫城门旁的城墙上一箭射死了脱脱迷失的亲信、汗国的一个著名的诸侯。只是使用了诡计,鞑靼人才占领了城。在两个叛徒、即两个尼热戈罗德公的调停下,脱脱迷失使莫斯科人同意派遣自己的代表去进行谈判。鞑靼人杀死了代表,并冲进了城里。莫斯科遭到了洗劫和焚烧。[1]

在 1408 年也迪该入侵时期,人民群众在保卫莫斯科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当大公瓦西里一世·德米特利耶维奇得知鞑靼人已逼近来后,便到科斯特罗马,显然是召集军队去了。瓦西里的叔父谢尔普霍夫的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公和大公的兄弟们在莫斯科领导了保卫城市。许多原在附近地区居住的居民,都逃避鞑靼人聚到了这里。城里发生了一件与 1382 年事件相似的事。富人们企图逃跑。不满情绪在人民群众中间滋长起来。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23 卷,第 127～129 页;M. H. 季霍米罗夫:《14—15 世纪的中世纪莫斯科》,莫斯科,1957 年,第 223～228 页,第 247～251 页。

也迪该于11月末逼近莫斯科，到了科洛明斯克村。他的军队抢劫了彼列雅斯拉夫尔、德米特罗夫、谢尔普霍夫、维列亚、犹尔耶夫、罗斯托夫、下诺夫哥罗得、戈罗迭茨等城。莫斯科人给自己的城市设了防御工事，用射击迎接了鞑靼人。也迪该试图迫使瓦西里一世的对头（特维尔公伊万·米海洛维奇）派来军事援助，但特维尔公回避了。当也迪该接到汗国发生了新的内讧的消息后，他向莫斯科人拿了3000赎金，撤围回国去了。

也迪该没能重演1382年脱脱迷失所做到的事——毁灭莫斯科。不论俄罗斯和汗国都已经不是那时的情况了。金帐汗国的崩溃与俄罗斯各地的政治联合同时并进着。同汗国进行斗争被视为全民族的事业。互相敌对的各公国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到人民群众的要求，害怕支持汗国统治者，这从特维尔公伊万·米海洛维奇的例子上显然可见。

在15世纪三四十年代封建战争时期，人民解放运动加强了，在这一时期内汗国企图恢复自己对俄罗斯的统治。1445年，莫斯科发生了人民运动。人民起义的借口是俄罗斯军队在苏兹达尔败于鞑靼人。当时，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瓦西里耶维奇当了俘虏。人们预料，鞑靼军队将向莫斯科开来。这时，城里起了火灾。烧掉了大批房屋，死了许多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极端紧张。莫斯科富人们（封建主、富商们）从城里跑出去了。但普通市民们（编年史上的所谓“愚民”或“愚民、歹徒”）表现得很坚强。他们没有听信关于鞑靼危险的传言，留在原地不走，他们扣留了企图逃出莫斯科去的人们，痛打他们，给他们带上枷锁。“愚民们”还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修补了由于火灾而损坏的防御工事。由于关厢人民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城里重新安定了下来。[1]

1480年，当阿黑麻汗远征俄罗斯失败后，俄罗斯摆脱了鞑靼—蒙古桎梏。关于这次远征，各种编年史上保留下了互不一致的记载。但不管怎样，无疑的是，阿黑麻没能通过奥卡河的支流乌格拉河继续前进。俄罗斯军队使他停住了，而实现这点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在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18卷，第195页。

一部分贵族中间,失败情绪很浓厚。编年史编撰者谴责了"爱银子的、富有和大腹便便的坏蛋及基督教徒中的叛徒、讨好于伊斯兰教徒的人",他们对伊万三世证明说:抵抗敌人是毫无希望的,"不能同他们作战"。许多贵族当时引用了过去的可悲的经验:1382 年莫斯科被脱脱迷失所占领,瓦西里二世于 1445 年被鞑靼人所俘。伊万三世本身表现得很不坚决,害怕采取积极行动。

莫斯科预料若鞑靼人到来("鞑靼正在寻找一条可以悄然通过的道路,进趋莫斯科"),准备与他们交手。城市布置了防御工事。"愚民们"要求当局领导起保卫俄罗斯及其首都莫斯科的事业,给予阿黑麻汗应有的回击。当伊万三世从作战地区来到莫斯科、出现在关厢时,居民围住了他,要求同鞑靼人进行积极斗争。"他们悲痛地向大公诉说起来,并且控诉道:当你大公陛下在和平安宁时期作我们的大公时,你枉自从我们那里收了很多赋税;现在你自己触怒了皇帝,不向他缴维霍德[贡税],却把我们交给了皇帝和鞑靼人。"大公注意到了"对大公发出怨言"的莫斯科关厢人民的不安定情绪,他甚至不敢留在城里自己的宫殿里,而住到了红庄。他担心市民在打"坏主意",也就是说他提防着他们会把他扣留起来。[1]

大公被迫考虑了酝酿着反对"富有的与大腹便便的"贵族们的运动的关厢人民所提出的要求,回到军队里去了。[2] 阿黑麻汗的计划失败了。

人民捍卫住了自己的独立。200 多年来使我们祖国极端衰弱的鞑靼—蒙古统治垮台了。[3]

在 14—15 世纪中,中亚和高加索各族人民同俄罗斯各族人民一起经受了蒙古统治的沉重压迫。察合台兀鲁思于 14 世纪分裂为两个国家,其中之一据有包括谢米列契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莫戈儿斯坦,另一个国家则据有马维兰纳儿(由察合台后裔统治)。在这些国家的统治

---

[1]《俄罗斯编年史会编》,第 6 卷,第 223 ~ 224 页,第 230 ~ 232 页。

[2]季霍米罗夫:《14—15 世纪的中世纪莫斯科》,第 231 ~ 237 页。

[3]契列普宁:《14—15 世纪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莫斯科,1960 年)一书阐明了俄罗斯与汗国相互关系。

者之间不断发生纷争和毁灭国土的战争，许多城市毁灭了，农业开始衰落。

14世纪后叶，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异密帖木儿或瘸子帖木儿，开始走上统治地位。他与异密忽辛联合，夺得了马维兰纳儿的政权，接着他又排除了忽辛，当了独裁的执政者。在自己的长期统治期间(1370—1405年)，他向花剌子模、外高加索、伊朗、小亚细亚、印度举行了一系列掠夺侵略性远征。14世纪80—90年代，他同金帐汗脱脱迷失进行了斗争。侵略者对待保卫自己独立的居民所采取的行动是残酷无情的。战场上尸体堆积如山。被杀死的人多到如此程度，据说用他们的颅骨建造了几座塔。俘虏不是被杀死，就是被活埋到地里。

城市遭到彻底破坏，被夷为平地。大批大批的财宝从被征服国家运到马维兰纳儿来，手工业居民被强迫地迁来这里。依靠蹂躏和掠夺以往繁荣过的地区，帖木儿以重新建造起来的宫殿、清真寺及其他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美化了马维兰纳儿。但是人民却依然赤贫如故。

人民群众没有停止解放斗争。1365年，撒马尔罕发生了大规模起义。这时，城市处在莫戈儿斯坦军队进攻的威胁下。它没有防御工事，因为蒙古人害怕人民运动，禁止建造防御工事。封建主们逃出了撒马尔罕，将撒马尔罕扔下，听天由命。市民们将保卫城市的事业放到了自己手中。伊斯兰教学校的学生毛兰—札德和清棉手工匠阿布—别克尔·克列维领导了保卫城市的事业。他们都是“谢尔别达尔”(14世纪30年代在呼罗珊发生的反蒙古运动的参加者的称谓)。毛兰—札德走进清真寺进行了演说，在那里痛斥当地封建主们，号召市民们抵抗蒙古人。贵族不支持毛兰—札德，而人民却跟着他走。莫戈儿斯坦军队的进攻被击退了。城里建立了人民政权。1366年，忽辛和帖木儿使用诡计才把“谢尔别达尔”的起义镇压了下去。

1388年，由于获知脱脱迷失进攻马维兰纳儿，花剌子模发生了反对帖木儿的起义。这时，帖木儿对花剌子模举行了第五次远征，残酷无情地将一路上遇到的一切都消灭了。帖木儿攻占玉龙杰赤后，下令将该城夷为平地，并在它所在的地方播种了大麦。

就这样，他以中亚暴君的全部残酷性对人民的任何不满表现进行镇压。血流成了波涛翻滚的大河。但是，人民解放运动在帖木儿死后察合台国的崩溃中起到了自己的作用[1]。

外高加索人民直到 14 世纪中叶为止，都处在中央设在阿塞拜疆的旭烈兀系国家的统辖下。15 世纪后叶，他们经受了帖木儿入侵及他同脱脱迷失斗争所带来的灾祸。被称为七年战争的 1399—1405 年帖木儿所举行的远征给外高加索人民带来了特别大的不幸。帖木儿侵入了阿塞拜疆、谷儿只和阿美尼亚。"在对谷儿只进行军事远征的时候，帖木儿的军队深入险峻的山地和森林地区，进入该国腹地很远，仗着人数上的优势战胜了对帖木儿军队进行顽强抵抗的谷儿只军队。经过残酷的战斗，谷儿只农业成了帖木儿军队的掠夺对象，很大部分居民被杀死了，城乡遭到了破坏和蹂躏。"[2]帖木儿及脱脱迷失的斗争席卷了北高加索疆土，那里的居民全部被杀死了。

由成吉思汗开始的、由其子孙们继续进行的血腥战争使俄罗斯人民和我们祖国其他各族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给他们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难。因此某些史学家企图用这样的理由来为成吉思汗的行为辩护：说什么他似乎结束了封建闭塞性，促使各族人民互相接近——这确是枉费心机的事。这些史学家们闭住眼睛不顾如下事实：成吉思汗的侵略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在许许多多个 10 年内阻遏了它们的统一和它们的相互接近。各族人民反对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独裁国家的解放斗争乃是最伟大的进步行为。

（译自《苏联历史》1962 年第 5 期）

---

[1]《9—15 世纪封建主义时期苏联史纲》，第二编，莫斯科，1953 年，第 648 ~ 661 页。

[2]阿里 · 札迭：《13—14 世纪的阿塞拜疆社会经济与政治史》，巴库，1956 年，第 392 页。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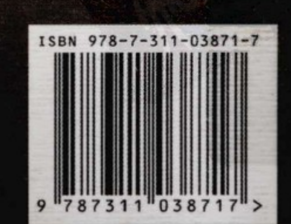


项目执行／施援平

封面题字／冯天亮

责任编辑／高燕平 杨林坤 施援平

装帧设计／张友乾


ISBN 978-7-311-03871-7

定价：160.00元（上、下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　上册　修订版
作者=余太山从书主编；余大钧译
页数=438
SS号=13195252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05